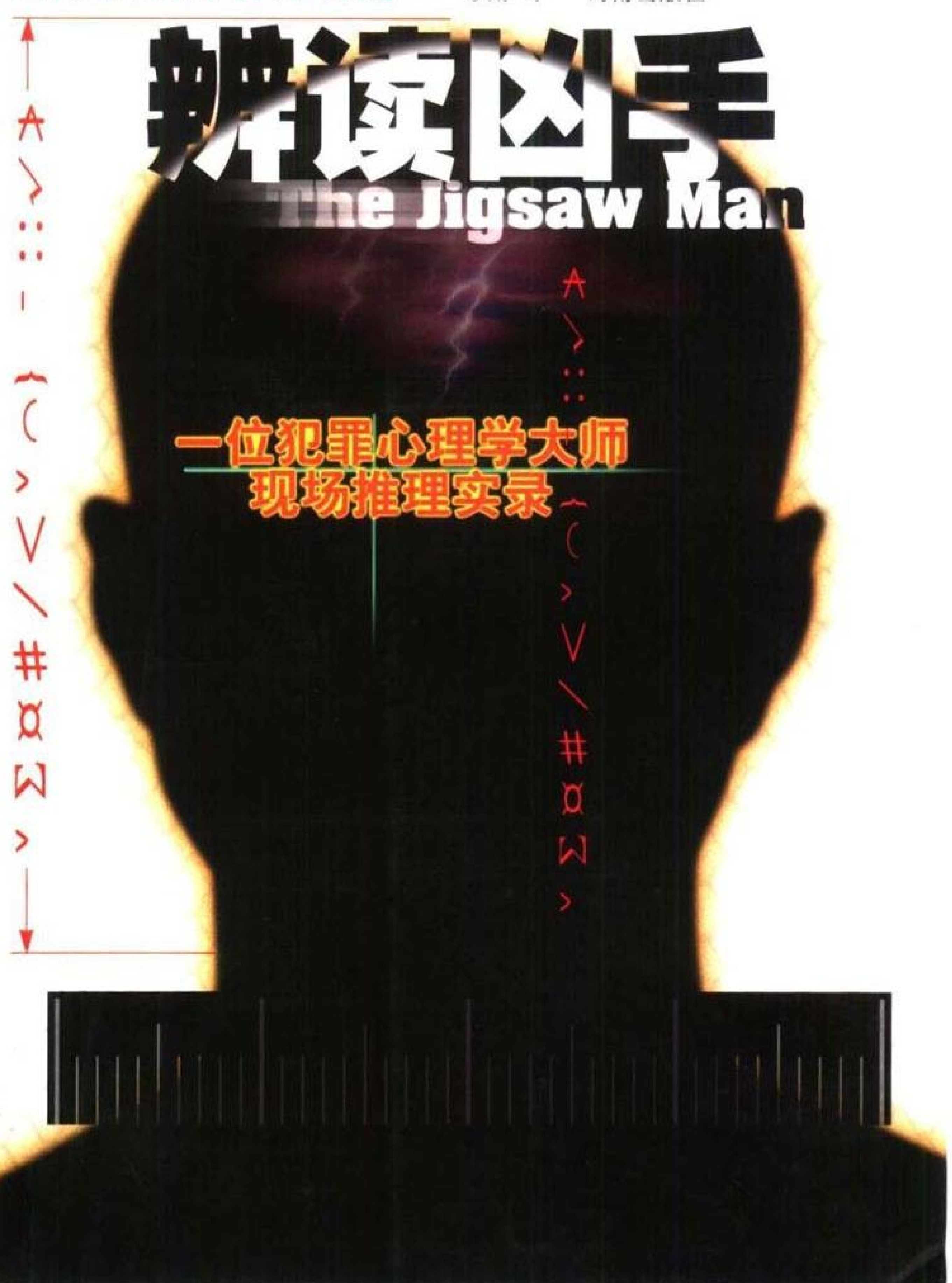
当代西方刑侦经典系列之一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斯 译

海南出版社



辨读凶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 斯 译



海南出版社

辨读凶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斯 译

The Jigsaw M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辨读凶手/(英)布里顿著;李斯译．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
ISBN 7-5443-0019-6
Ⅰ.辨… Ⅱ.①布… ②李… Ⅲ.纪实文学-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597 号

辨读凶手

一位犯罪心理学大师现场推理实录

(英)保罗·布里顿 著
李 斯 译
责任编辑 野 夫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94 千字
书号:ISBN7-5443-0019-6/B·4
定价:24.00 元

目　　录

1 少女琳达之死

1983年11月22日，星期二早晨。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越过倾斜的平地和不太整洁的园子之外是一块野地，我看到那里正在发生奇怪的事情。数十人从树林里钻出来，一个挨一个接连不断地朝前走。一团团厚重的雾气从他们的嘴里喷出来，就像说话时吹出的气泡一样。随着每一次呼吸，气泡破了又圆。

队伍里不时有人蹲下来查看地面，其他的人也会暂停下来等着，并将头稍稍弯向结了冰的草地和泥土。他们虽然都穿着很厚的保暖衣，但我看不到他们脸上有一丝温暖的痕迹，也看不出所做的事情有什么让他们高兴的。

“他们在干什么？”心理学科的一位秘书安妮·切尔默斯问。

“看上去像是警察。”我说。

“有点像。”

她又不出声了，我们一起站在窗户边上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警察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到了莱斯特郡纳波拉夫的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

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这座爱德华时代建筑风格的医院是最主要的方位标志，它位于东部内陆区，在风景如画的几座村庄之间的农田里突兀而出。该院始建于1905至1907年之间，当时用作该郡的疯人院，坐马车或骑马从四周的集市来到此地，一定有荒僻小村的感觉。当时，周边所有的农田都归该院所有，并且由病人来耕种，因此，这家疯人院几乎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它永远也无法改变所有疯人院都共有的疯癫形象，因此而引起当地人内心的恐惧，特别是小孩子。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地方的名字在1938年给改掉了，不再叫莱斯特拉特兰疯人院了。

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并不是个令人害怕或让人退避三舍的地方。走进大门之后，人们立即会注意到这里宽敞和安宁的气氛，因为公路要经过门房、停车场、一块绿地、板球场和花坛之后才能够到达

医院的主楼。更大的建筑是红砖墙的外层，屋顶是涂了沥青的很陡的石板，还有两个极高大的烟囱，几英里外都看得见。

我记得自己5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是来这里面试，准备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来这里实习。尽管作为荣誉见习人员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但是，看见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仍然令我心存忌讳。很宽的石板台阶、橡木门、接待室和管理部门的过道，看上去都像是从古旧的市政厅里搬来的一些东西。在地板上走着发出回声，橡木门在厚重的活页上转动，经年累月的扭动擦得铜制把手发出光亮。

会议室里挂着历任负责人的油画，都留着络腮胡，硬硬的衣领一直扣齐下巴。早年，我们只需要在会议桌的一个边上就可以开会，但后来，心理学科室扩充人员，这时开会整张桌子都坐满了人。

1978年10月我接受了这里的工作职位，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开始治疗各种各样的病人，处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问题。我的大部分工作是接诊伍德兰日间医院的院外病人。伍德兰日间医院是很大的一栋乡村建筑，有七八间病房，离精神病院的主楼有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我当时还在重症病室工作，这是医院的一个小区，里面有4间病室，病人必须在这里进行数个月的集中治疗，然后才准许出院或转至长期住院病房。

大部分住院病人都需要长期治疗，他们是一些由于额叶皮层萎缩或因为压抑而得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也有由于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来此住院的年轻男女。我很少去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年老病人的病房，但是，我注定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堵有异味的墙壁，那是后院病室里压倒一切的气味。看来，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尿液已经渗入那栋房子的墙体之中了，无论怎么擦洗，尿臊味总也清除不掉。

谢天谢地，心理学科室离主楼较远，设在以前一位医疗督导的房子里，称为“玫红楼”。这栋两层的红砖楼上有很大的一个八角窗，窗前有很小的一个石垛阶地，我们常常坐在上面吃午饭，打开一瓶葡萄酒，并看着附近田野里的兔子草。

现在，有更厚重的脚步声在那片具有采邑时代风格的田埂和结了冰的地上响起，来去匆匆。警察一整天都在田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在树下长时间讨论事情。由于我们所在的玫红楼与别的地方隔开

了，因此直到晌午我们才得知警察搜查那个地方的原因。

“是一个姑娘，”安妮·切尔默斯说，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她给人杀了。”

“杀了？在哪里？”

“我们的一个门房在今早上班的路上发现了她。当时她倒在黑渣路那边。”虽然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大门口，但我从来都没有走过那条黑煤渣路。那条路沿着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周边延伸，是从纳波拉夫村南边到恩德比北边的一条近路，约15分钟的路。

“知道她是谁吗？”我问。

“当地人，一个少女。”

突然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艾玛。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之后她会带我家的白猎狗到田里遛一圈，直到天黑回家。跟很多父亲一样，我总是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是，艾玛成年之后就一直是自己从学校走回家的。

“谁会干这事？”安妮问道，她心里越来越烦了。他们会认为是这家精神病院的某个人干的，我暗地里想。这是相当自然的反应——但它是错误的。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里并没有狂暴或有危险的病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些年老体弱者，连洗澡都需要人帮忙。重症病人都是大家认识的，而且在伍德兰日间医院，对于不能够控制时常进入他们脑海中的奇怪念头的精神病人或焦躁的病人，我们一直在进行治疗。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攻击性，也不会产生那样的暴力。

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了晚间新闻。

“今天早晨，在纳波拉夫村附近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一位15岁女学童的尸体，她身上只穿着一部分衣服。警方正在调查该谋杀案。

“该少女名叫琳达·曼恩，是当地人，她最后被人看见活着的时候是星期一晚上约7点30分。她是今早在当地一条叫做黑渣路的小路上被人发现的。警方立即封锁了那个地方，并开始寻找这名少女最后活动的痕迹。死亡原因尚未透露。”

照片显示稍有些瘦的黑头发姑娘，面带羞怯的笑容，看上去身体尚未成熟到撑起衣服的程度。

1983年11月，我刚刚被莱斯特郡卫生署任命为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并将我的办公室搬到莱斯特综合医院新开的精神病科室。我仍然还去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在玫红楼接诊门诊病人，并在伍德兰医院治疗日间病人。

如我所料，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成为警方最早注意的焦点，不过，我没有料到他们会在隔壁找地方常驻下来。玫红楼的一个没有占用的地方变成了处理事件的办公用地，凶案组的人搬来了文件柜、塑料白板和索引卡。

他们怎么搞到办公用具的？我在想。几年以前，我们第一次搬进玫红楼的时候，我们申请、借用，后来发展到偷窃一些必需用品，比如椅子和台灯。这家医院的管理部门几乎没有给我们发放任何东西，但是，我透过玫红楼没有使用的那半边锁着的窗户，发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上面都蒙了一层灰。

"我们能不能弄一些来？"我问房管科。

"呃，恐怕不行——那些东西都有专门的用途……"

"准备搬去哪里？"

"哦，这我说不好。"

够了，我想。心理学科有四名心理学家，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年龄大致相仿，都想成就一点事业。

"这么说，大家都有份了。"我说，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么干。

"可这叫偷东西。"鲁塞尔紧张地说。

"不，完全不是，"我安慰他说，"我们只是将资源重新挪动一个位置，这样便可尽其所用。"

鲁塞尔说："那大家都不要撬锁，也不要打破窗户……我意思是说，我可不想去破坏什么东西……"

"让我来。"

我从果园那边扛来梯子，搬到楼上，推开了顶楼的开口。顶楼屋顶下一团漆黑，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往前摸，尽力沿着屋梁爬，以防从屋顶摔下去。

找到另一处开口后，我撬开门将梯子伸进去。这里是这栋房子里没有人占用的一半，里面是一些没有人使用的家具和桌上用品，完

全就像一处阿拉丁的洞穴。我们无法从锁着的正门出去，但是，我找到了一处较大的带格子窗户，就在对着园子的那个后部。我打开窗户，开始从这里往外递东西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我们去了四五次，除开地毯以外，我们找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在这间医院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老护士区，有几块极精美的地毯放在那里没有人用，因此，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次需要更大胆一些的方法。我们都达成了一致看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白天抬着两块 15 平方英尺的毯子从忙碌的医院走过也许不会显出异样，只要我们脸上有自信的表情就行，当然也不会有人来问我们。

这个办法起了作用，结果我发现自己有了一间相当舒服的办公室，就只有墙壁不太好，都铺了白色的瓷砖，看起来这间办公室就好像是洗手间一样。从来没有人提到不见了的东西，但我总禁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内疚，特别是刑警队搬到隔壁的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琳达·曼恩的调查案成为我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因为我总在看当地报纸，看电视新闻，看到无数的公众呼吁和海报宣传。事件调查室接到数十份目击报告，还查寻了几十年的当地档案资料，寻找过去的罪犯或有可能与之产生联系的罪犯。又有两队警员搬了过来，进入了这个板球亭，那个亭子正对着医院的板球场。一队警察负责在邻近村庄进行挨家挨户的问询，另一组在医院里查寻案卷，希望能够在院外病人和日间病人当中，找到曾在过去的 5 年当中出入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人，并有作案可能的蛛丝马迹。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也找到了几名嫌疑对象，但是，到圣诞节了，凶案组看来仍然没有捕获杀死琳达的凶犯的迹象。警官们主动要求在圣诞节期间继续留在事件室，《莱斯特信使报》登了头条："请协助查找这名恶徒。"

几个星期以后，我记得自己顺着森林公路走到伍德兰日间医院去开会，突然间想到，自从谋杀案之后，这条路变得极长了。朝黑渣路那边看去的时候，警察留下的黑黄两色的现场围绳还在铁栏杆上转动，就跟已经为人遗忘的圣诞装饰一样。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真正嫌疑的人呢？我在想。他们真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开始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许是个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心理学的一

切就是要了解人的动机，了解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去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有这么多问题是我想去问一问的，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个警察不去问的。

在那条偏僻的小路上，天又冷又黑，两个人曾来到这里，其中一个死掉了。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某种社会交往，不管是短暂的或是狂暴的联系。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历史。他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和彼此的反应，是由他们是谁以及构成他们的性格来决定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情形。例如，你带三名年轻妇女到同样的几条街上去，进同样的店子、餐馆和酒吧，她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有人可能看到人们在大笑，因此非常开心，觉得那些开心大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而另外一些人也可能会看到同样一批人但觉得他们充满敌意，或者是在嘲笑自己，也许是在拿自己开涮。第三类女人可能对一切采取相当现实的态度，认为这些陌生人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而已。

这三类女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穿不同的衣服，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款式的衣服特别适合她们。想像第一类妇女有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她喜欢有人看她，因此穿上一些惹眼的衣服。第二类妇女想办法避开这些，她不希望突出自己，而且更小心，更保守。第三类女人穿衣服只是想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觉得舒适。

她们每个人都不同，面对同样的情形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过去的产物。琳达·曼恩星期一晚上一个人走在黑渣路上的时候，她的内心带着过去塑造的她这个人的一切，而这些过去了的一切决定着她面对凶杀者时的反应。她逃跑了没有？她愤怒了没有？她很被动吗？

同样，我明白，杀她的人决非讽刺画或漫画书里面描述的那种恶棍，他也有丰富的生活，这些生活内容构成了他的性格和行动。我想，他看见琳达的时候，内心在想些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她呢？如果他能够对一个小姑娘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对所有女人都持什么样的看法？他有没有可能是个极聪明的人？他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转身走开的时候，风吹动我卷起的裤管，并把树叶沿着阴沟和

铁栏杆吹得呼呼直响。就在某个地方,就在不远处,杀死琳达·曼恩的凶手还在街上走着,吃他的午餐,洗他的淋浴,睡觉,也许还会去当地的酒吧喝上几杯啤酒。

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我放下了琳达的事情,开始考虑起会议的事情来。调查凶手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心里想。并没有人来请心理学家去抓杀人犯,那是警察得去做的烦心事,而且我并不羡慕他们。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84年2月2日,验尸官交还琳达的尸体拿去埋葬,她安葬在万圣祠的墓地里。墓碑上写着:

琳达·罗斯·玛丽·曼恩
逝于1983年11月21日,15岁。
我们没有来得及道别,
但你永远都在我们身边。

2 心理学家

没有任何一次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中的分水岭会使我确信,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人们常常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寻找触发因素,但是,任何决定或选择,无一例外都是众多细小的事情及其影响积累起来做出的,这些涓涓细流汇集在一起,因为偶然的因素就形成了决定。

在少年时期,我对事情如何以机械的原理运作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不拆老钟,对母亲厨房里的一些无线电器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对蒸汽机也不太关心,玩具飞机和在学校里搞的那些机械工程实验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买了第一辆车,是一台老式的斯坦达10型带篷车,根本就没有二挡,总共花了我39英镑,当时,我对车轮如何转动的道理一点也不通。我记得第一次跟随妻子玛丽莲一起开车出远门,到她在威尔士的老家去看她祖母。那辆带篷车的最高时速是56码,我们就

那么慢慢地滚着，乐得一路庆贺自己新发现的自由。

刚过切普斯托，到了老路的某个地方，我注意到这辆车的最高速度在下降。我的脚板已经把油门踩到跟车地板一样齐了，那车还是只能爬到 35 码。事情越来越糟糕，一直到最后只能跑 20 多码了，我决定该找个修车的地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燃料问题，也许汽车最高能够跑多快取决于油箱里面有多少油，油越少，速度就越低。

一位修车工从油脂井里跑出来，他看上去一脸厌倦，一堆头发盖住了一只眼睛。他用油布擦着手，慢腾腾地来到篷车的前盖处。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尽量装出内行的样子，听上去好像了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

"油怎么样？"他说。

"油？啊，呃，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发出吱吱的响声。你听到响声没有，玛丽莲？"她摇头。

修车工奇怪地看着我，让玛丽莲把车盖拉杆拉开。我从他肩头望过去，看见他在摆弄一些线头，并查了一下电池。然后他就抽出油杆。

"你看看。"他说，把亮闪闪的油杆举得高高的。

"看上去很干净的嘛。"我主动说。

"干净？听我说，伙计，里面没油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仅仅要说明我对大多数机械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还要说明我真正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虽然机器让我提不起精神来，但是，我对人有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如何工作的。我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一些事情，为什么会成为彼此不同的一些人。

这些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我们的过去，而我自己的过去是从 1946 年 5 月开始的，此时和平突然在欧洲出现。我在利明顿皇家温泉出生和长大，那实际是个小镇，它的辉煌年代早在一百年前就过去了，但名字听上去还是相当悦耳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台地上许多客房和旅馆曾接纳过来此一试温泉水的大人物和良善之人，但如今都已经改作了公寓和平房。

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一个父亲——我还没有长到有能力注意这

类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说有关他的事情，并非所有的故事都那么赞美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自己讲的故事。我最早的确切回忆是在利明顿一处受人诅咒的地下公寓里长大的日子，那地方受人诅咒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那片沼泽地的涨落，但是，我母亲确认，那是一个极干净的地方，人们甚至都可以把地板拿起来全都吃掉。

母亲一生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她都勤勉不辍地带我和弟弟去圣彼德教堂做弥撒，她感谢教会给予她的一切帮助，因为她是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

她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一家老人院里当助护。这个印象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有位看上去有一千岁的老人叫布鲁厄，有一天我在学校放假时看见了他，当时，母亲给他带去了午餐。他一身的烟草味和陈茶叶味，经常穿着拖鞋和晨衣坐在那里，看上去是在盯着一处想像当中的窗户朝外看。他一定有 80 或 90 多岁了，当时我只有 7 岁。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保罗，先生。"

"你喜欢海盗吗，保罗？"

"我不知道海盗。"

"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探险家怎么样？"

我摇头。

他用牙齿吸气，然后朝我身后看去，就好像他话说到一半就忘了我们的谈话。但是，几天之后，我母亲带着几本书回家了。

"这是布鲁厄先生给你的书。"她说。

那是我们家头一批真正的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现在都还在——艾伦诺·斯特莱德的《迷失在加拿大的荒野》、罗伯特·路易·史迪文森的《瑞士之家罗宾逊》和《金银岛》，还有詹姆斯·奥利弗·克伍德的《猎狼者》。

我猜大家一定在想，这就是我终生喜好读书的开始吧。布鲁厄先生继续送我一些书，直到他再也无法送书的那天为止。一年后，我自己就开始跑到利明顿图书馆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利

明顿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利明顿郊外扩建的一个新村，不久就被那个城镇吞没了。

图书馆与我家之间是堪皮因山，是我儿时的玩乐场。一棵孤零零的橡树站在山顶，爬到橡树主干的树杈上以后，可以看到全镇的风光，还可以看到沃韦克那边，那是郡政府所在地，离这里 4 到 5 英里远。橡树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儿童游乐场所，它可以是一个城堡，也可以是一条海盗船或骑士的堡垒，这取决于伙伴们所玩的游戏内容。

我并不觉得家境贫寒什么的。有些人家钱多，有些人家钱少。同样，没有父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战争总会让人体验到这些感情。因为这个原因，继父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带着矛盾的感情迎接他。当时我已经 12 岁了，我看不出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多大一个洞是他能够突然间予以填补的。

他是俄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是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是俄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后来逃出了斯大林的营垒，从他的家乡一直走到瑞士。最后他来到沃威克郡，当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他阅读英语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他烦恼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英语讲得很不错。哪怕如此，他看来还是一个异乡人，很不自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出身富贵人家，有很高超的技能，还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他发现自己与背景完全不同的一批人混在一起做工。哪怕在同样来自东欧的移民当中，他好像也是不合群的，因为他有智力，因为他以前是位有身份的人。

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里，获取良好的教育是一件相当碰巧的事情。那间小学为很大的一个受托区服务，来此就读的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各不相同，有富贵人家的子弟，也有孩子来自野蛮人的人家。那是个严酷的地方，管教极严，孩子们每年升一级，教学是在启蒙，也可以说是在带孩子。

13 岁之前我手指上的每一片指甲都没有了。奇怪的是，这可不是同学当中一些粗野的孩子干的事。这都是亚当斯先生干的好事，这位老师把人弄疼的时候特别兴奋，真是个变态的人。他最喜欢的惩罚方法是让学生把手指放在书桌上，然后用约两尺长的木条敲指甲。

我并不是因为接受这样的惩罚而特别出众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班上任何一个没有手指变黑的男孩子都被认为是那位老师宠爱的学生。另一位小学老师把我们的拼写课上得“生动活泼”，他让我们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每拼错一个字，他就用尺子很尖的一边猛敲一下手。到今天，我还不能够拼得很正确；那都是他打人引起的恐惧造成的。

如果当时的教育水平很可悲，英国教育制度的不公正却使事情更糟糕。在11岁的那年，学生都得参加一项称为满11岁的考试，这个考试决定学生是继续上文法学校还是上次等的新式学校。一条路能通往大学，另一条路为大学之外的学生做好准备。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组织这些考试的，但是，我们班几乎是按富家子弟和穷人家的孩子来分成两组的。因为文法学校要求穿校服，而且要求孩子们在文化上要有所追求，因此，让人感觉好像只有富家子弟才有钱支持这样的一种教育。

当时，这些孩子放学后得留下来多做温习和辅导，准备应付满11岁的考试。别的孩子，包括我在内，就可以随自己的便了。如所预期的一样，一组的所有学生都通过考试，而其他的人就都看着试卷说：“这是什么？”

这样，我的未来就决定好了，我去了次一等的新式学校。这里没有O级，也没有A级。我得准备将来自谋生路了。这个现实有一天击中了要害，当时，我站在一个教室的前面，注意到附近有扇纸板门开着。我朝里面看去，看到了一些化学烧瓶、试管、本森灯和架子——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秘密。

我拿起一个试管问老师：“这是什么？”

“啊，放回去，”他说，“你以后永远也不会需要这些东西。”

虽然我不会想办法重写自己的过去，但是，我觉得任何一种决定一个11岁儿童未来的教育制度，都是对当时的少年最大的犯罪行为。

哪怕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都还在想，我本来是想上大学的。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计划存够钱后最终拿到自己的O级或者A级。这个进一步求学的概念当时并不为家人所完全理解。我母亲是在爱尔兰的一处小村庄里长大的，她的生活需求是最基本

的，最直截了当的。她认为大学教育并不在当务之急的事项当中，她害怕学者，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

我记不住为什么决定要当实习警员的，也许我们当地有一两个警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尽管有一次因为打破了一只破旧街灯的灯罩而受到当地巡警的训斥，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利明顿发生过任何一次犯罪事件。这也是儿童时代好的一面。人们几乎是夜不闭户，车不上锁，母亲可以把婴儿车放在商店外面，孩子们也可以自己走路上学。犯罪只是传奇故事书中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别的民族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我假定真正的流氓恶棍很容易辨认出来。柯南道尔和查尔斯·狄更斯在我的想像当中描绘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形象——那是像莫里亚迪和比尔·赛克一样超凡出众的人。当然，在现实世界里可并不这么简单。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恶行并不会像一枚勋章、一块纹身或疤痕一样磨损的。我曾在沃威克郡当过警员，因此曾在利明顿警察局工作过，当时，也就是 1963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的清晨，15 名戴面罩的劫匪在莱顿布萨德附近的布里德高桥上阻劫了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的夜间火车，掠走了 263 万多英镑。这个事件称为火车大劫案，当时都震动了全世界。

照警界的话说，那就像让人抄起一桶冰水往自己脸上倒过来了一样。有一阵子，整个警界都是一阵木然，人们在想，杰斯·詹姆斯抢了火车，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这里。有一种被侮辱和愤怒感，特别是在报纸描述那次事件为罗宾汉式的抢劫时——那笔钱并不属于任何人，反正是要被毁掉的，那些强盗只不过帮了自己一把，祝他们好运吧。不幸的是，开火车的杰克·米尔斯在抢劫过程中遭到毒打，而且，不管那次抢劫在公众听起来有多么浪漫，警方还是对所犯下的暴力罪行做出了严肃的反应。

作为一个警员，我在这些事件当中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我记得，电传机咔嚓咔嚓地响个没完，坐在办公桌后十多年都不怎么挪窝的警官突然间都行动起来。几天之后，他们将嫌疑犯的照片登了出来，当时，我盯着布鲁斯·雷诺尔茨、查利·威尔逊和吉米·怀特的脸看，心想他们看上去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在我旁边长大

成人的那些人，或者是一个朋友的父亲，或者是当地的商人、店主、出租车司机、学校老师……他们看上去像是任何人，就是不像火车抢劫犯。

我发现自己在问："这些长相一般的普通人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变成这样的人的？是什么使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还有别的选择没有？"

克雷兄弟也是一样，我记得看到龙恩和莱吉早年的照片，他们与体育名星和伦敦东区的名人一起喝酒吃饭。他们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那些事业成功的男人。只是在后来，当他们的照片越来越多地公开出现，人们也慢慢了解到他们的谋杀生涯之后，他们的样子才变得凶险起来。

我作为一名警员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从隔壁的小餐馆把饭菜端去送给囚室的人。我会敲响铁门，并把餐盘从窄口里递进去。

"你好，保罗。"有天晚上，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

那是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同学，比我高几个年级。他现在给锁在囚室里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我想。他为什么会与我不同？

一年之后我离开了警界，但是，这些问题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可能也是我成为心理学家的一个原因吧。同时，我开始干各式各样的工作，什么样的事情都干过，我都记不清名字了，范围从商店的地板到董事室不等，还有这中间无数其他的工作。

虽然仍住在家里，但我可以享受到挣钱的自由。我买第一条牛仔裤的时候，我继父是不怎么赞同的，但那次不止是一次时装的选择。我挣到钱了，因此有权选择自己穿什么。"我家到处都是泰德熊。"他说，还极不耐烦地叹口气。

有时候，我去当地的舞厅，特别还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 1963 年的年底，就在考文垂的洛卡诺舞厅。有位年轻的小姐一晚上似乎特别喜欢跟我跳，我也没有怎么注意到乐队，也没有注意到乐队非常奇怪、笨拙的领唱歌手，他不停地在台上跳上跳下，还在大厅里跑来跑去。那就是米克·杰格和滚石乐队。

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 12 月 27 日，我以前的一位同学约我到利明顿的科特舞校去跳舞，说伍迪·艾伦和挑战者乐队在那里表演。我不是特别有兴趣，但他借了我一件大衣，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

那地方很吵，很挤，但是，有两个姑娘特别出众。我跟其中的一位一起上过学，后来她当了护士，但是，我不认识她的朋友。她个子很高，很苗条，生着一头棕黑色的头发，穿着格子呢裙，外面扎着皮带，还有带长袖口的白衬衣。我的眼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我请她跳舞的时候，她还红了脸。

之后我送她回家，她家是在城的另外一头。那是个清澈明净的夜晚，小路和树篱上都结着一层霜，亮闪闪的。在她家门外，她很害羞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步行6英里才回到家里。每走一步我都对自己说，我已经找到了将来要娶的姑娘。

婚礼在1966年6月上旬进行，我们到威尔士的登比度蜜月，在海岸的一家宾馆过夜，然后坐火车旅行。后来，我们一起搬进了我在利明顿租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公寓一楼。我的妻子叫玛丽莲，是沃威克大学的一位私人秘书，我也继续做些变动不定的工作，甚至还在伯明翰的一家赌场当过收钱人，直到有位警察"劝导"我说，这工作对一位年轻人的生涯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艾玛生了下来，两年之后艾恩也出生了，我们就找了一处抵押房，是一个三居室的半独立式房屋，我们两个人都认为那地方不错。上大学的梦想只好搁置起来，因为有时候我要打两份工才能够让日子过下去。同时，玛丽莲处理家中的一切事务。我们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我自己的童年加上我孩子的童年都是如此。

到1972年秋天，我在汽车产品公司当出口联络官。那是一家国际汽车零部件公司，当时是城里最大的雇主。我的工作是确保分配给我的客户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零部件。那当然不是一份"事业"，我明白为别人工作的单调乏味，因此脚下走不出快步来。我永远也不会肩负任何一种责任，只能够希望40年以后得到足够的退休金，好让自己安度晚年。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其中一些需要动脑筋，但是，没有一份工作让人有成就感。我知道自己得找到一份事业，让自己真正能够投身其中。那必须是一份我愿倾尽毕生精力做下去的事情。

在玛丽莲的支持下，我上了夜校，好拿到O级成绩，目的是要上大学。这意味着下班回到家后吃一顿饭，然后踩着自行车去沃威克郡中部的成人再教育学院，晚上7点之前要赶到，到9点30分再回

家。回家后得完成家庭作业，半夜或者凌晨1点才能睡觉。

1973年夏季我去参加考试，并且马上想到要拿A级。可不幸的是，我发现那里没有我要选的夜间课。我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再回头了，我要上大学把很多事情扳回来，所以，为什么不现在就扳回来呢？我跟上班单位的一位高级经理约好见面，解释了我想白天去上大学，请求他能否安排我晚上工作。

我成了上夜班的员工，从晚上8点工作到早晨8点，一个星期工作四个晚上。这些日子的安排是这样的，白天去上课，上夜班之前睡几个小时，然后周末再睡睡。再怎么差也就是一年的事情，我想。但是，换了工种以后，我去报名，结果发现A级课程必须两年才学完。

争吵是没有用的。我请求得到一个课本的清单，回到家开始白天自学。我的目标是1974年10月上大学，这意味着7到8个月的时间内参加考试。

到一月份，我得到一个临时的机会，可以去牛津读法律，也可以去伯明翰读医学，但两者都必须搬家再找一处抵押房，而且还没有工作。沃威克大学在考文垂的郊外，只有12英里远，它成了更有吸引力的一项选择，假如这所大学愿意接纳我的话。

“有什么事吗？”秘书停下打字抬头问我。她有一头长长的直发，还有整整齐齐的刘海。“我在找入学辅导员萨缪尔博士。”我说。

“我想他可能在喝早间咖啡，但是，你可以去他办公室看看。向左转，沿着走廊过去，第三个门。”

她看着我走过去，我觉得自己有些不自然。看来我是整个沃威克大学校园里惟一穿西服的人。

我在门口停顿一会儿，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敲门。里面没有人应声。

“你在找吉姆吧？”一个矮个子、谢顶的男人不知从哪个地方冒出来说，“他在喝咖啡，我替你叫他吧。”

“没关系，真的。我可以等。”我说。

“没事，没事，他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了。”他一下子又不见了。

尽管已经在汽车产品公司工作了一整个晚上，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今天太重要了。我早晨8点就回了家，刚好赶上早餐，然后招手跟正要上学的艾玛再见。然后我洗了个澡，刮了脸，把皮鞋擦得亮

亮的，穿上了西服，搭517路车到了考文垂的郊外。

有人顺着走廊走过来了。他看上去跟我年纪相仿，也许稍长几岁，穿着熨得很整齐的宽松裤子和V形套头衫。我看得出来他在想，这人是谁？我可不认识他。他来当学生年纪太大了，而且他还穿着西服。

"什么事？"

"我叫保罗·布里顿，想来这里上你们的课。"

他稍稍有些奇怪，说："啊，明白了！最好进来说吧。"

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学校负责人的房间，但是，我想像得出来。那里面有一张用了很久的桌子，几把椅子，一块很大的黑板，还有数百本书摆在四周的墙上。

"你做了正式申请没有？"他问。

"啊，没有。"

"一般来说要走这样的过场，否则我这办公室门外每天都会有几十人等着。"

"对不起，我想……"

看上去他稍稍有些逗乐了。"不过，你现在已经进来了，你为什么想读管理学？"

这个问题我早有准备，我明白必然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我对他说，我想当心理学家，而沃威克大学的管理学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这门课的三分之一是讲行为科学的。除此之外，我还有很多实际的工作经历，而且这所大学离家也近，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搬家了。他听我说着，有时候也问一些问题，他还侧着脑袋听，好像怕漏掉了哪句话一样。

"你比普通的学生年龄稍大些，布里顿先生。"他说，话里没有批评的意思。

"我27岁。有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处抵押房产。"

"这么多！我恐怕还是不明白你为何来到我们这里。这一般不是我们办事的方式。"

"看来亲自来一趟见见做决定的人是很重要的……就是管事的人。"

他大笑起来，因此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我明白艰苦工作的含义。过去10年我一直都在做全职工作——各式各样的工作。我上过夜校，拿到了O级，现在已经开始考A级了。"

"那是两年的课程，你说的是10月份来这里上学。"

"我想参加5月份的考试。"

"从现在开始只有4个月？"他无法掩饰声音里面的怀疑。

"我明白，但我不能够再等了。我比其他申请人年龄大些。时间在流逝。我还得养家糊口。"

他朝前倾一倾身子，"这就使我想到下一个问题。你准备如何处理三年全脱产学习的经济问题，布里顿先生？"

"我想申请助学金。"

"如果没有呢？"

"我跟家人都商量好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萨缪尔博士向后靠坐在椅子上，一边斟酌词句。

"我们沃威克大学的一些课程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你的数学成绩如何？"

"我在O级得了最好的成绩。"

"明白了！但我们一般要求A级数学水平。"

我的心沉下去了。

"不过，我们来试试，好不好？"他站在很大的一块黑板前面，拿起粉笔画起一幅图形的轴线来，一边画X轴，另一边画上Y轴。然后在底下写了一个代数方程式。"你能否把这道方程式的轨迹在图上标出来？"

地狱在摇铃，我想。我明白这种计算的形式，但自己太紧张了，无法将详细的算式列完。我用手指沾着黑板底下的粉笔灰，划出了这个方程的典型曲线。

他微笑："对了，不过应该从稍稍低半寸的地方开始画。"

他回头坐下来，两手交叉在一起，并紧紧压住嘴唇。长长的沉默令人难受。

最后他说话了，"如果我是你，我会集中精力去拿A级经济学。你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你能够拿到D级或以上的分数，我们

保证给你一个位置。”

我高兴得直想对着空气打几拳。

“你可不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

他又大笑起来：“真奇怪，我觉得自己很明白。”

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我把每一点空余下来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但是，一件更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艾恩被诊断出严重的髋骨障碍，引起他剧烈的疼痛，而且意味着他不能够行走，必须背在身上或者放在推车里推着走。髋关节里的润滑系统出了毛病，导致髋关节头和承臼磨损。

整形外科大夫和医疗专家看了他的病，最终决定收他住院，并进行牵引手术。玛丽莲每天早晨送艾玛上学，然后去医院，我下班后直接去医院，白天跟艾恩坐在一起。这件事情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真是可怕的一段日子。

尽管所有这些事情搅在一起，我还是想办法参加了考试，然后就只好等结果，看看所有这些艰苦的工作和家庭的牺牲是否值得。

到8月中旬，我仍然还在等待考试结果，并且要去医院陪艾恩。玛丽莲跟我一起去，白天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呆在那里。此时，医院的大部分护士我们都熟了，这时，有一天下午，其中一位护士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有可能去上大学，”我说，“这要看……”

“啊，考试成绩，”玛丽莲说，“今天早晨就到了。我给忘了。”

我看着她，几乎不敢问。

她微笑，“你得了个A。”

哪怕有助学金，我们在接下来的3年里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所幸我娶了一位能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碗柜看上去经常是空荡荡的，但她总还是煮出极好的饭食来。她给了我学习所需的空间和支持。

在沃威克大学开始学习的一个月内，单独成立了一个心理学系，我立即就从管理科学系转到了心理学系。不久我就意识到，我已经找到了终身的事业——心理学不仅仅提供给我一个满足自己好奇心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修复人类生命的一个机会。

人类思维有很大一部分尚没有弄清楚。它的参数仍然是极宽泛

的一些用语，包含了我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包含了以前发生和以后将要发生的、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大脑中三到四磅重的一些灰色泥浆如何就能够产生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和理解的所有事情的？莫扎特写出了交响曲，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画了油画，希特勒发出了"最终解决令"，少年妈妈把婴儿扔进垃圾桶，罪犯不敢走出大门一步，一对夫妻折磨和谋杀少女……发生的事件或说出的话不管多么重要，最后都回到了某一类型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交往上，回到构成大脑里面的那团粥样的三四磅重的物质上。

我们来想像一张渔网，上面有数百根线织成的经纬网，还有连接的数千个网结。任何一个网结可能都是有趣的，但是，如果你提起这个结，其他所有的结都会随它一起动起来。它们都是内在地相互连接在一起的，除非理解这些结周围的原则，否则你就无法明白其中的一个结。这就是心理学特别有趣的一个原因。这有点像拥有一张三维的地图，而你在其中旅行和穿越。

听了三年课，做了三年作业，写了三年的深夜作文，我终于拿着一张优秀成绩单毕业了，而且还拿到了莱斯特大学高级研究生助学金。我的工作与恐惧焦虑有关——特别是与测量蜘蛛恐惧症有关，也就是对蜘蛛的害怕心理。我设计了极复杂精巧的迷宫给人类受试者和蜘蛛来使用，以便探索这个问题。

莱斯特离利明顿35英里路程，搬到那边去的过程真不轻松。对玛丽莲和孩子们来说，那就像搬到世界另一头去一样，他们极想念原来的家。艾恩当时已经7岁了，现在行走和跑步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关节问题经过了好多年之后才算完全康复。我们对他说，他会交上新朋友，我们搬到新房子去的那天，他跑到房子外面去，站在街边上说，除非他找到一个朋友，否则他不肯进屋。

他站在那里的样子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最后，住在对面的那位女士对她的小儿子说："啊，你去跟那个小男孩说说话。他站在那里都好久了。"艾恩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研究生工作开始后，我成了全国最大的莱斯特卫生署的一名无薪临床受训心理学家。我长期的目标一直都是要在临床实践中工作，9个月后，我有了一个机会，接受了一份有薪资的全职职位。

通过了入学考试以后,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评估和治疗因为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幸事件而受到损害的人们。这里面包括经常受恶梦侵扰或有严重焦虑症的人,还有一些人有性欲或者人格上的毛病,有些人无法入睡,无法停止洗涤,有的连出门寄一封信也不敢。还有受身心关联影响的一些人,他们觉得自己瘫痪了,或者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怪毛病,连医生也看不出来。所有这些病症都不是什么小事,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质量,甚至会毁掉人际关系和家庭。我记得有一天,一位 8 岁的小男孩到我的办公室来,他给我一只钢笔,明显是他用零花钱买的。

"送你这个是因为你帮了我妈。"他紧张地说,然后就回到他妈妈身边。在过去的六年当中,他妈妈一直无法离开房子,也不敢去商店,更不敢带他去公园。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她现在已经没有广场恐惧症了。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的少妇玛莎,才 20 来岁,她的医生让她来看我。玛莎有一种跟焦虑相关的毛病,对她的婚姻形成巨大的压力。她和丈夫极想生个孩子,但她总是没有办法怀上孩子,而且几乎从来都没有来过月经。除此之外,她还有相当严重的听力问题,而这些问题让她烦得不行。

虽然我想办法让玛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她的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她的自信心极差,对自己的价值也估计不足。同样,与她有关联的那部分相当正常的历史,和我从她的话里听到的和从她的举动中观察到的都不一致。她的话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她的身体却藏不住那个欺骗。

我开始跟她讲一个故事,说有的时候,人们第一次到我这里来非常紧张,很着急,他们是根据在电视和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来判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

"他们花好几天的时间提前准备,把自己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来回演练几次,但是,等他们进来的时候,想说的话一句也不记得了,因此觉得自己蠢得不行,"我说,"然后,我们开始谈到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快,他们立即就紧张起来,很不好意思。毕竟,我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知道这很困难,但是,这就像高空蹦极跳一样,你总得走到飞机门口去,你得完成那最后的一跳。"

我继而解释，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很多人的问题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还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有了。也许一个成年人让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他们又不知道如何提起这些事情来。有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多少也应该负一些责任，这种想法是相当错误的。在我继续谈话的时候，玛莎开始哭起来，最后一发而不可收。她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听力失聪而受尽凌辱，最后被送进了聋人学校。在学校读书期间，她经常受到一个教员的性骚扰。那样的性攻击行为还在成年期以前就开始了，而且持续达数年之久。

因为没有办法让人理解她，而且又痛苦又害羞，玛莎把一切的残忍行为全都咽在肚里了，觉得自己多少也有一些责任。我让她把一切痛苦都回忆出来，跟她解释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谁。我讲话的时候，可以看到内疚在她的心中溶化，就在我的面前溶化了，一个新人就在我面前诞生。

玛莎走之前在院外病人诊室里对我说，她同意再来看我。当天晚上她就来了第一次月经，几个星期内怀上了孩子，而且一连生了3个孩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当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可以帮助像玛莎这样的一些人。我全力以赴的一切，我所梦想的一切已经成为现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虎头蛇尾的感觉，也没有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我找到了一份终身的事业，它会向我挑战，会使我产生无穷动力，会为我的家人开辟一个未来，而且还能够修复人们的生活。

3 倒错的性欲

1984年年初，大卫·贝克探长打来一个电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某个病人遇上了麻烦。莱斯特郡警察局的这位局长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一番之后对我说，我的名字是他的一位同事告诉他的。

我梳理自己的记忆。

"您以前曾帮过我们一次。"他提醒我说，然后提到了那位警官的名字。

“啊，是的。”我说，想起了那个案子。是一位年轻女子迷上了一位警员，很危险的案子。

“实话说吧，心理学非我所长。”贝克说。

“你瞧，我是个侦探……”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一定是有什么事了，我想。

“我在想，你的工作让你能更准确地理解人的动机，以及人何以会成为他们自己现在这个样子的，对吧？”

“是啊，大致是这样的。”我谨慎地说。

“你瞧，我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困难的谋杀调查，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见见我。如果能够帮忙，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真的大惑不解。我能够对一个调查做什么事情呢？我的警察工作知识只限在16岁时当警员的那段时间，当然，儿童时代还读了些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然后，我想起了琳达·曼恩的事，这使我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那当然，”我说，“明天如何？”

“来之前先好好吃顿早餐，”他含义模糊地说，“午饭你就不需要了。”

在莱斯特郡伦敦路的郡警察总部，贝克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他从警27年的证据。墙上挂满三角旗、照片，装饰他办公桌的是一台精巧的天平，也就是卖毒品的人用来称毒品的那种秤。他四十好几了，身体虽然很健壮，但也称不上是高个子，头发已经开始谢顶了，还有一张天真可爱的脸。他的步伐流露出军旅的痕迹，喜欢穿熨得极平整的黑色肩章制服。此时，他穿着夹克坐在那里。

“关于我想问你的一些问题，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什么规矩立在这里，”他开始说，就跟一个知道自己有可能会说些蠢话的人事先说的话一样，“案发现场一直没怎么动，如果我带你去那里看看，你能够说出作案人的大致情况吗？”

我深吸一口气，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琳达·曼恩的案子上。

“根据你能够让我看到多少。”

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你听到卡罗琳·奥斯本死亡的消息了吗？”

我很惊讶：“没有，对不起……”

“她的尸体8月份在莱斯特联合大运河旁边的艾里斯通齐腰深

的草地里找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些方面令人十分困惑。”

我点头。

贝克介绍案情的时候显得有些踌躇，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头一年，也就是 1983 年，对莱斯特警视厅来说是极不顺畅的一年，共有 3 桩凶案悬而未破。7 月份，年仅 5 岁的卡罗琳·赫格的尸体在接近特威克洛斯动物园旁边的草地上找到，那是她在爱丁堡的波托贝洛区失踪 10 天后的事情。同月，宠物美容师卡罗琳·奥斯本在莱斯特遛狗的时候为人所杀，然后是琳达·曼恩谋杀案。

卡罗琳·奥斯本 33 岁，在莱斯特丹华斯路街角的高地上生活和工作了 7 年。她开有自己的店，就是克利帕佩特宠物美容店，门面开店，后面及楼上住人。她死的那天是晚 6 点出的门，在艾里斯通草地一带遛狗。艾里斯通草地是很大的一片绿色区，有体育场，有小块菜地、垃圾场和人行道。她遛的是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猎狗塔米和邻居的一条带斑点的拉布拉多猎狗，两条狗叫同一个名字。她松开狗圈让它们满地乱跑。

当天晚上，卡罗琳的狗被发现独自在当地居民约翰·道格拉斯的门前转悠。约翰认出了塔米，并发现它曾在水里浸过。他带这条母狗回到家里，然后让它回家去。3 个小时后，丹华斯路的邻居听到塔米在嚎叫，因此打电话报了警。

深夜搜寻找不到卡罗琳的影子。星期六早晨继续找，约在 10 点 30 分左右，一名警犬训练人发现卡罗琳的尸体躺在齐腰深的草地里，衣服一件没少。

“有几处让人极度不安的细节，”贝克说，一边拿出用螺旋铁丝串在一起、标着“警察局长专用”字样的散页文件夹，“她的手和脚都用麻绳捆着。脖颈给刺了 5 刀，胸部刺了 2 刀，心脏都给刺穿了。没有抢劫或性攻击的迹象，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凶器……”

他停顿一下：“但我们找到了这东西……”

在她尸体旁边找到了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个五角星。这是经常与恶魔仪式或妖术相关的一个图形。

“我们觉得，这是凶手留下来的。”贝克说，无法掩饰他的不安。

打开第一份散页文件夹之后，他问道：“你以前见过犯罪现场的照片没有，保罗？”

我摇摇头。

"对不起,不是件悦目的照片。"

头几页里面夹着确定案发现场范围,即那条联合大运河和牵道的照片。然后,图片逐渐集中在尸体上,而且是从所有可能角度拍摄的。真是惨绝人寰,极其惊人,我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极想马上放下照片,合上本子走人。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惨景。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刀口在尸体上是什么样子的,也知道了一个人暴死的时候,其肢体会做出平常不可能摆出来的姿势,因为血流得太多,简直都没有办法猜想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对卡罗琳进行死后剖析时,所有的步骤也都拍了照片,我打开另外一个文件夹,很快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是躺在案发现场的人,一是经过冲洗、称重然后又进行洗涤供病理学家研究的一个人。那就像是看着一幅雕塑一样,它几乎是完美的,但只是这里那里有几处被人可怕地撕裂的破洞。就好像一件艺术品被一个蓄意破坏的人砸坏了一样。

我强迫自己看这些照片,开始集中心思想卡罗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需要明白伤口的分布情况,以及这些伤口是如何按部位分类的。我几乎下意识地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他用了什么样的刀?他是右撇子(95%的人是右撇子)吗?如果是这样,有没有可能看出他开始刺杀的时候是正对着卡罗琳还是背对着卡罗琳?他是什么时候绑起她的?她有意识的时候有多长?她死得快不快?

这些答案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到更大的动机问题。杀手杀掉卡罗琳后能够得到什么?出了岔子的抢劫案与受性冲动而杀人的含义很不相同。

最后,我合上了文件夹,从桌上退回身坐了下来,想办法让自己忘掉那些照片。

"卡罗琳长得什么样?"我问贝克。

他将一张快照递过桌子来。照片显示她对着相机微笑的样子,明快而活泼。他开始为我报出相当专业的标准描述:身高、体重、发色、面容……但我让他停下来了:"我是说她人怎么样?"

"啊,明白了……嗯,她很健康,工作勤勉,很聪明,我想属于事业型的那类女人吧。她显然花了很多时间搞自己的生意。她和丈夫约

在18个月前分居，而且正在办离婚的事情。他住在最南边。他经检查没有问题。就我们所知，她没有秘密生活，也没有男友，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生意。"

"当天晚上没有人看见她吗？"

贝克摇摇头："我们估计，当时艾里斯通草地有约二百多人。约有120人来过这里，都说不记得自己在牵道上看见过卡罗琳。我们也去度假公司查过，看看有没有人在联合大运河上租过游船或水上住宿船……但没有。"

贝克掩饰不住自己的挫折感。这次调查是在莱斯特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调查之一。有约1.5万人接受了调查，其中一些人接受了数次调查，有约80位男士因涉嫌谋杀而遭逮捕，进一步问询之后又被释放。

会面结束的时候，我说："稍后再来找你行吗？我需要想想这事。"

"那当然。"他说，一边跟我握手。

"能否带一些材料走？"

"需要什么你开个单子。"

我一走进家门，玛丽莲就嗅出有什么不对的味道了。我不想谈这个案子，吃饭的时候，我一向很好的味口也没有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沉浸在卡罗琳·奥斯本死亡案的痛苦之中，一点一点地思考细节。在琳达·曼恩的案子中，我只是想过应该问些什么样的问题，而现在却是现实的问题。关于卡罗琳的杀手，我能够对警方讲些什么呢？那当然不是一时冲动犯下的案子——绳子和刀子都是专门带去的，就跟那个五角星形图一样。这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计划和意图。

这也不是一个男人碰上一个漂亮妇女时，突发性冲动但被她拒绝而在逃走之前愤怒地将她刺死的案子。卡罗琳死前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并被人以特殊的方式绑了起来，然后才受到攻击的。但是，尽管有这些控制的要素在内，但也缺乏成熟的因素。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公众场所，这样一个忙碌的时候作案？如果选择更隐蔽的一个地方，他一定能够获取更多的东西。他有可能实施更多的控制，

让绑绳绑得更紧，从而让他得到更大的快感。反过来，杀人的过程只在几分钟内便完成了。

这样一种见机行事的因素暗示，杀手是卡罗琳不认识的人，尽管杀手有可能认识她。也许他以前曾看见她在那里遛过狗，也许是她店里的一位顾客。

从动机角度来看，我可以肯定是性攻击，尽管不是我们常常会想到的强奸和性虐待的那种性攻击。这种行为显示出更极端的性欲证据。我在莱斯特综合医院接触性欲反常者的临床经验帮助我明白，人们的性功能有可能与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当男人和女人发现自己无法产生参与者都觉得完美的性隐密感觉时，性冲动并没有就此完结。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养成了恋物癖，还会产生极强烈的性幻想，致使他们无法完成或者欣赏性交活动，除非他们想像或者实际有某种具体的因素在现场出现，例如某种类型的色情材料、内衣、鞋子或仪式化的行为。

有些人对这类的事情兴趣极大，使实际的性交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没有价值了，因此，就连他们的自娱思绪也越来越朝向恋物癖好和鲜明的性幻想了。对一个男性来说，女性有可能不再是一个心甘情愿和急切的参与者，而有可能成为一个失去人格的泄欲工具。

卡罗琳·奥斯本被杀害就是有人产生典型的性欲堕落的表现。捆绑、控制和对受害者的选择都暗示存在一个其性欲已经与愤怒以及控制混在一起的杀人犯。杀人者不去幻想心甘情愿的性接触的某种形式，而是突出对女人采取极度的性攻击。他一定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反复演练过这样的情景——他想像一个女人被人盯住，加以控制，绑起来，服从指挥，被人毁伤，然后被杀害。

但是，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种人的呢？

一般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情绪和对妇女的愤怒常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一个孤独和性欲不成熟的年轻男子也许发现，他自己缺乏必要的社交技巧让姑娘们对自己产生兴趣。他看到别的男子或年轻人很容易得到女人，而这样的事情却不在他的身上发生。

他感觉受了伤害，感觉被人遗弃了，他也许由于孤独和性挫折而抱怨女性，迁怒于她们。时间一长，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强烈的苦涩

与愤怒感，这些感觉都有可能引起性欲倒错。他不去幻想双方都同意和都能够得到快乐的性行为，反而开始将通过自娱获取的快乐与狂暴的性暴力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幻想当中，他能够让女人做自己希望她们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因为他相信女人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惩罚她们。

在尸体旁边找到的五角星形图就是症结所在。卡罗琳的被杀并不是一个仪式牺牲品。那个图形是早先就画好的，然后留在那里，这样一来，那个杀人现场就好像是某种献给妖术首领人物的仪式化的性牺牲品的重演。这就是杀人者对他残暴的倒错控制冲动、折磨或谋杀一个女性的合理化解释。这会使他的行为得到一个目的，哪怕是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目的。如果恶魔崇拜或人类牺牲是这一行为真正的动机，我应该在现场看到更为精确的准备、降解和戏剧痕迹，因为这些通常与妖术联系在一起。

我找来一张大页书写纸，开始写下我可以从这些材料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串心理学特征。“缺乏最终的复杂行动或在杀人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暗示出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年约十四五岁到二十多岁，”我写道，“他有可能是孤独的，而且在性欲上并不成熟，以前没有或者很少有女朋友。他希望结交一些人，但又缺乏必需的社交技巧来开始或保持社交关系。”

另外，“他有可能跟父母一起住在家里，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是相当常见的一个特征，特别是在社交技能不好，而且在性欲上没有自信心的年轻男子当中。

另一个有关的常见特征是他可能的职业。他无法用言辞恰当地表述自己，这使他很难保持管理级或更高级人员的工作。因为这个原因，我写道：“他更有可能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从事需要一些技巧的工作，同时也喜欢用尖刀。”提到尖刀的原因，是从他在卡罗琳的尸体上所做的事情上看出来的。

“他体力很好，属于运动型身材。”我写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他的受害者被降服和捆绑，以及造成创伤所需要的力量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他有可能认识卡罗琳，或者至少意识到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她有可能在他自慰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事情发生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了解这一片地区，就生活在附近——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最近的过去某个时候他是生活在这里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够想办法杀死卡罗琳，然后又能够很快从艾里斯通草地消失，而且没有引起那片地区的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一个行动古怪的人。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必须对周围的环境非常清楚。

同时，当时是夏天，作案时天还比较亮，在那样一个公开场合作案是需要有冒险精神的，但他的冲动又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甘愿冒此风险。

“他狂暴的性幻想只有通过色情杂志、书籍、广告画和录像带得以满足，其中一些是狂暴的，而且突出妖术内容，”我写道。“如果找到他，并在他房间里看一看，我觉得你们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样品证据，还有他对刀子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凶器没有在现场找到，这表明凶手有法律意识。同样，这暗示他有可能把刀子当作一件宝贵的物件，而且他也不会轻易地扔掉刀子。他一定将刀子藏在什么地方。我在大卫·贝克的办公室里谈到了每一点，感觉到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尽管他心存感激，但是，他不能够肯定我是如何在照片和案史信息中读出这么多内容来的，而这些东西是他和同事研究了好几个月的。他会对我的结论采信多少？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曾以这种跟踪方式请一位心理学家卷入一件谋杀案的调查当中——这是片处女地，没有地图，我是个向导，跟踪的是大卫无法看到的迹象。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因为听不到贝克的消息，我以为自己的角色已经完成了。没有办法确定我所做的事情有无帮助，我只是回头去做我的临床工作而已。

14 个月之后，也就是 198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我下班回家途中看到一则报纸广告——21 岁的护士阿曼达·韦顿在人行道上被杀。她曾在我们医院当过护士，也曾在格罗比路医院工作，就在莱斯特市的西北角，她是国家录取的护士，最近刚结束了她的培训工作，不久就要结婚了。

大卫·贝克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早晨我又到了他的办公室，听他简要介绍另一个案情。阿曼达的尸体是一个少女在星期六

下午 4 点 15 分发现的，她躺在一个有树阴的人行道的树篱下面，这条路从格罗比路医院通往吉尔罗斯墓地。在几码远的地方，另一条路边有一栋红砖房子，称为小教堂，是个临时的精神病用房，病人在这里生活一阵子后再回到社区。几名员工曾看见"一个人影"在事发时间左右潜伏在人行道上。

跟卡罗琳·奥斯本一样，阿曼达身上也是反复挨刺，没有一处让人想起性残杀的正常迹象。一开始，警方认为他们是在与一头乱咬人的小泽鳄打交道。阿曼达的钱包里有 20 英镑，她装在棕色手包里的现金卡也不见了。

她早晨从银行取了款，然后跟她的男友克利夫德·艾瓦斯菲尔德一起去购物。这对恋人午饭时分手，阿曼达遭受攻击的时候，克利福德——当地一家足球队即艾普沃斯足球队的经理，正在边线上看球赛。星期六晚上他到这位护士家接阿曼达去参加聚会时得到了消息。中午，阿曼达步行到波蒙雷斯区阿玛迪斯路的一个朋友家。她下午 3 点 15 分左右离开那里，然后去波蒙雷斯的弗雷切尔购物中心，在马丁报摊买了一张贺卡。商店的伙计记得她。

3 点 45 分，她顶着雪片和寒风往回朝医院走。那条路大概需要 17 到 22 分钟走完，她应该于下午 4 点左右走到。她的尸体 15 分钟后被人发现。贺卡就躺在附近的地方。

"我们只有半个小时来解释。"贝克说，一脸明显的急迫感。

"我需要了解阿曼达。"

"早年生活，"他边说边找出一个夹子，"她家来自伯顿隆德伍茨，在北边，离此 10 英里。父亲退休……曾为罗尔斯罗依斯汽车公司工作……阿曼达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惟一的女儿……总想当护士……别的就没有什么了。"贝克继续大声朗诵案卷："她星期五跟她母亲通了 3 次电话，谈婚宴请帖的事。她计划于 7 月 27 日结婚。"

贝克又把一叠犯罪现场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看上去几乎是一脸歉意。我深吸一口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刀伤的模式跟第一次谋杀是一样的，主要集中在颈部和肩部。这次又没有明显的性攻击迹象存在，但是，我毫不怀疑，这是一种性犯罪动机。这就好像在一块模板上再套一块模板一样。有差别，但是，这些差别远远不及相

似之处。

“你们对付的是杀死卡罗琳·奥斯本的同一个人。”我说。

贝克点头同意。

“攻击是突然发动的，并不是事先构思好的。他冒了更大的风险……”

“这意思是说……”

“嗯，它说明这里存在一些差别，要么说明他处在更激动的状态，要么是他病了。他与自己的受害人没有很长时间的人际交往——不像跟卡罗琳一样，这又表明他不成熟，否则事情会办得更仔细一些。性谋杀犯倾向于把技术上的事情做得完美无缺，这样可以增强自己对受害人的控制程度，而且每杀一个都会有新的控制感。但是，这个罪犯冒了更大的险，甚至用了更短的时间。也没有捆绑受害人的企图，四周也没有什么象征性的东西。”

“这意思是指……?”贝克问。

“嗯，这表明他认识阿曼达的可能性更小。”

“这么说他是随意杀人了?”

“呃，不是……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她是个随机受害者。”

贝克抬起眉头来。

“可能有几十位女性从那条小路上走过，而他却放过了她们。有某种东西使阿曼达与众不同。她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时候，正好是他的性冲动最强烈的时刻。也许她看上去像他认识的某个人，或者她的头发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系着，或者是因为她穿的某件衣服。”

吉尔罗斯墓地方圆好儿公顷，在贝克给我的航拍图中占据了最显眼的部分。他解释说，警方搜寻这个地区，因为这里是吸胶水的人经常来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阿曼达的钱包。他几乎是捎带着说，卡罗琳·奥斯本就埋在这个墓地里。我们的眼光短暂相遇片刻，我看得出来，我们是在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他有没有可能去过那个墓地?

那个墓地很开阔，我推测当地人死后很有可能会埋在这里。我想如果有什么联系，那也是一种混杂不清的突出事件，不过，造访卡罗琳的墓地有可能成为那种有可能使他的性欲高涨的事情。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拿着一把刀，事情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他从墓地走出来，

然后遇到了阿曼达·韦顿。

公众有三份报告说下午3点15分和4点30分之间看到过墓地有一个男子，或者几个男性。有一份描述涉及一个在下午4点零5分离开人行道的男子。他是个白人，高个子、衣服颜色单调，要么是黄褐色，要么是青橄榄色。

贝克解释说，凶案小组在卡罗琳被杀后调查过大批疑犯，也查了当地已知的暴露狂和性犯罪者记录。我的心理学描述至少在一开始就帮助他们分配好了自己的人力资源，并集中在更小一批疑犯身上，这些疑犯都有我所描述的相关特征。

我们同意几天之内再谈，之后我就离开警察总部，开车去了莱斯特综合医院。我在那边还有国民医疗服务的工作等着要做。

保罗·肯尼斯·波斯托克现年19岁，是莱斯特市的波蒙雷斯人，身高1.95米，重95公斤，他显然符合在人行道上被人看见的那个陌生男子的描述。

波斯托克的祖母鼓励他到警察局洗清罪名，所以，星期三下午，也就是第二次谋杀案发4天后，他来到了黑鸟路警察局。他很紧张，他解释上个星期六自己的活动时有数处自相矛盾。第一次凶杀案之后，他被调查了3次，但他都提供了相当充足的不在场证据。他与父母一起生活在波蒙雷斯区的布雷克斯雷沃克，离两次凶案的现场不远。此前8个月，他家住在沃尔顿大街，也就在卡罗琳·奥斯本的宠物美容店所属的那个街区，他家的两条狗就是在那里梳理的。

波斯托克看上去是个性情温和的巨人，他是肉类加工厂的屠宰工，当然就涉及用刀子了，他在那里是受人欢迎的一个人。他酷爱健美，上下班都是骑车，并且把他祖母的车库改建成了健美室。

他在西莱斯特读高中时打过曲棍球，那是由于他的身高的优势。后来，他又对武术产生了兴趣，在莱斯特工人俱乐部参加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的训练。他将用具洗得干干净净，包得好好的过来上培训课，但很少跟别人说话。

"他总是很镇定，很少说话，"另一个接受培训的人柯林·安德伍德告诉当地的报纸说，"有时候，别人不小心伤到自己的时候，人们都会发脾气，但是，保罗却不发脾气。他总在控制着自己，把这当作游

戏的一部分。”

贝克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讲了这个疑犯的事情。

“他正好符合你给我们的描述。我们正在申请搜查证，准备搜他的家。”

“记得我在卡罗琳案子之后对你说过的话吗？”我说，“如果他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就一定能够在他家里找出刀子来，一定会有色情材料，还有很多做妖术用的东西。”

贝克并没有忘记：“听我说，我还得请你帮个忙。关于你跟我讲的那些动机方面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对别的小警员也说一说，特别是进行审讯的那些警官。我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们明白自己对付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听我说，这是给你的警察工作。”

开车去黑鸟胡同警察局的路上，我禁不住自问，为什么郡警察局的一位最高级侦探会来找一个地位相当卑微的心理学家，帮助他们进行疑犯的审讯呢？当面调查是他们最拿手的事情，而我在这方面的知识简直可以说非常之少。

我开车在莱斯特郊外慢慢走的时候，开始按照我的临床工作来思考了。如果我将保罗·波斯托克拿到我的诊室内诊断，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记录下他的病史，而要这么做，我就必须与他建立亲近的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将他们最深的秘密随便解开的。有人拼命抵抗这么做，或者把关键的问题全都隐藏在自己心里。要克服这些问题，那就必须有特别的当面质询技巧，使人能够慢慢地揭开自己的面纱。

我想，我能够给警察提供的也就是这些对杀手的性心理以及他的性变态和性幻想的本质的理解。

到了警察局以后，我被带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五六位警探随随便便地坐着，其中一些还卷起了衬衣的袖口，夹克衫都搭在椅子上，肘子都歇在桌子上。其中一些人是我已经认识的，但是，当贝克介绍我并对我说这些孩子都因为我的报告非常准确的描述而留下“深刻的印象”时，我还是有些不自在。尽管我是一个局外人，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它说明了他们给予大卫·贝克的很多尊敬

和敬佩。如果我跟他没有问题，那我就跟他们没有问题。

房间里人人都相信了，波斯托克就是他们寻找的那个人，特别是对他父母家实施搜查以后。在他的卧室找到了一些刀子，跟其他的一些武器比如剑、手枪放在一起，还有一些功夫名星的卡片。墙上贴满海报和图画，其中一些是他为自己画的，里面包括妖术符号和捆绑情景，上面都是一些无上装女性，这些女性正被人绑着进行折磨。其中一个符号跟在卡罗琳·奥斯本尸体旁边找到的那一张一样。侦探们还找到了大量暴力卡通和杂志。

贝克向我解释了办完余下事情的重要性。经过这么多的工作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够让一个有罪的人由于某方面原因被忽略掉了，或者没有按照正确的程序办事而又一次一身轻松地走出去。同样，他说，不能够引诱一个无辜的人招供，也不能够胁迫一个人错误地认罪，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开始描述这种性欲倒错和性变态的本质，跟我第一次向贝克讲的差不多。我讲到了人们成长发育的基本模式，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及他们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以规避别人以他们真正的样子去看待他们。

"请给我讲讲初审的情景。"我说。

"他不怎么配合，"警督艾恩·利西说，说话很粗鲁，"首先，我无法决定他到底是他妈一个白痴还是一个天才。现在？嗯，我认为他并不是有意不合作，但是，每当问及关键问题时，他都缩起尾巴来说'不'或者说'不记得'。"

"他人怎么样？他是否镇定自若？"

"他不是那么想攻击人的样子，也不是那么凶。你可能是想问这个吧。他说他想帮助警方。他不停问到他的父母。老实说，我认为他很害怕。"

我对此作了一些考虑。"好吧，有可能他把这一切都闷在心里，因此也有可能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怀疑。他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在一刹那之间就起念杀人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他都出来干了两次。同时，他以前也接受过问询，并想办法洗清了罪名。这意味着他已经为自己树了一个形象，戴着一个假面具，因此很难让他再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现在，我得想出一个办法，同时还不能够得罪任何人。"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们是如何进行审讯的。你们都是专家，我完全根据人类思维如何动作来行事。根据你们告诉我的情况，这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施虐的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想办法躲过侦察，同时还没有惊动周围的任何人，这暗示着他在跟普通人相处的时候，倾向于避免这样的行为，这就很可怕了。""他不会坐在那里想：'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将把那些人挡在外面。'他有可能不承认对那些妇女干的事情，也不承认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不能够面对那样的羞愧，也不能够接受他自己认为一定会得到的判断，这样，他就会回避谈论所发生的事情。"

贝克说："那么，我们该从哪里着手呢？"

"最重要的是，你得做好准备，准备再准备。审讯者必须明白跟案情有关的一切细节，必须了解受害人和疑犯。你必须让疑犯能跟你轻松地谈话。对待他的态度就好像他真的要把所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但又觉得在感情上很困难一样。不要妄下判断，不要正面冲突，也不要显出反感的样子。"

我开始设计与我在诊室里处理不愿谈及往事的病人时使用的方法类似的方案。

"想像事实就在一系列同心圆的中央，你无法直接到达这个中心——疑犯不会让你这么做——这样，你就可以从一些不着边际的地方开始，比如谈谈他的家庭，谈谈他早年的生活、学校的假期和他的朋友等话题。让他慢慢习惯于仔细谈论这些细节，这样，在以后，当他快谈到谋杀案的时候，你就不必突然换挡，从泛泛而论突然转换到非常仔细的一些问题，这种不连续的问话会使他缩回去。

"如果你靠得太近，他会对你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当时不在那里'，或者说'我不记得'。你可以猛拍大门，但他会退缩得更深。让事情暂时缓一缓，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谈。这次再往回谈一谈，让他重温旧地，然后再带回原地。你必须带领他以最清楚的细节走过白天——你什么时候离开的？是向左转的还是向右转的？你的双手当时是不是插在口袋里？你自己觉得呢？

"然后让他检起故事，你会发现他又向前走了一步，然后承认'我有可能在牵引道上看见过她。'不要显出惊讶的样子。不要说：'嘿，

别搞错了，你上次没有承认这个的。她到底是站在什么地方的？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样你一直向前走，直到你到达另一个他想不起来或者不知道的地方。不要逼得太急，再往回退一点，要使用刚刚用到的同样的方法。不要说：'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也办不好。'可以对他说：'嗯，好吧，我们今天谈得很不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觉得如何？'"

同样重要的是，审讯者要解释波斯托克形成了倒错的性欲，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他们必须帮助他明白，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的，其他的人也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我说："告诉他说，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办的一件事，但是，你以前听说过一样的事情，他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感觉的人，哪怕他很难明白这些事情。"

他们离事实的距离越来越近以后，障碍会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当这些障碍到达这么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们会突然间从一个障碍处塌下来，审讯就直接到了最中心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突然到来，是因为到了最后，一切都会当作一种解脱说出来。"不要阻止他，让他无边际地谈话。再后，你可以将他拉回正轨，问他一些可作为证据的具体问题。

"你走了这么远之后，就可以开始问到听上去不是事实的一些问题了。也许他在说'我在那里，我与她说过话，我杀了她，但是，我并没有做出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事情不是那个样子的。'

"此时，你们就可以正面提问，提一些挑战性的问题了。那些他不想提到的施虐或者残忍的事情，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但是你需要非常精确的细节。"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听审讯录音，反复思考所提的问题和回答。慢慢地，每一个障碍都打破了，保罗·波斯托克的记忆回到了1983年他遇到卡罗琳·奥斯本的那个炎热的夏天的晚上，回到了艾里斯通草地，再后又回到了那个寒冷的下午，是他在吉尔罗斯墓地旁边看到阿曼达·韦顿的时候。后来清楚了，他那天到了卡罗琳的坟上，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年轻护士。为什么选她呢？

"因为她穿着红色的鞋子。"他说。1986年6月，波斯托克在莱斯特刑事庭供认对两宗谋杀案负责，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律师公开了几封信，是波斯托克在监狱里等待审判期间写给他的女友的。

其中一封说：

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不仅毁掉了自己努力追求的一切，而且还毁掉了受害人全家的生活，毁掉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计划出来的生活。

这样的现实，我对其深感歉疚的犯罪现实，意味着我已经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了，我连刑警的眼睛都不敢正视了。如果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我已经干下的事情，我会尽全力去争取。

到进行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新址，是莱斯特郡的一处极小的村庄，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乡村生活的恬静。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几步都可以走到田野里，那里有林地，有树丛和溪流。漫长的午后散步当中，我想清楚了最复杂的一些事情。我让杰斯满地乱跑，看着光线慢慢暗淡。

这栋房子很现代化，有足够的办公空间——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国民医疗服务方面会有怎样的发展，这间办公室就有了额外的用处。

波斯托克案只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我想，但是，它回答了我关于利用心理学分析罪案的可能益处的众多问题。很明显这个方法能够用来将疑犯的人数限制在相当窄小的范围内，并能够让审讯人员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我们说罪犯是男性，年龄在 15 岁以上和 20 岁出头之间，这就使得疑犯的人数大大减少。我们说他没有结婚，住在一个对当地地形的细节非常熟悉的地方，这就使人数又一次减少了。然后是指出他所做的事情所需要的体力，从而使问题的中心更加突出了，比如指出他喜欢体育活动，喜欢摆弄刀具等。

我不能够对警察说出保罗·波斯托克的名字，也不能够说出他的住址，但是，我知道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他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还了解他的动机。

4 庞大的DNA测试

我工作的重心一直都是评估和处理因为生活当中出现的不幸事

件而受到伤害的人们——他们都是受害人，而不是罪犯。到 1986 年，我发现自己从一个病室到另一个病室，从早到晚地看病人，每小时看一个人。也许，毫不令人奇怪的是，挑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尽管他们的痛苦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如此。

大约是在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临床工作越来越多地跟司法(跟犯罪相关)程序联系在一起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我的诊室更能够说明这些变化了，来这里的病人越来越多，他们都犯过罪，或者就快要到犯罪的边缘了，还有由于这些犯罪而产生的受害人。

事情的开始，是因我在莱斯特综合医院的性变态临床诊断中慢慢增多的偶尔的咨询开始的。例如，当地一位议员后来写道："亲爱的保罗，我有个病人看起来符合典型的延迟射精标准。不幸的是，他还说自己对妹妹的孩子也有性欲上的冲动。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很明显，如果你能尽快安排做一次体检，我将会非常高兴。"

其他一些案件是法庭的移送案件，因为那些病人可能有偶尔的暴露癖、偷窃或犯罪性的损害行为。也有可能是辩护律师寻找能够减轻判决的证据，或者是地方法官想明白他们处理的是什么人，然后好通过判决。也有一些在性欲上自我伤害的人，还有另外一些人担心自己的一些冲动，因此希望得到帮助，以免不测事件发生在自己头上。

与有犯罪倾向的人相处需要与无犯罪倾向的人相处时完全不同的思维定式，因为，跟一个有问题的人保持自然的亲切关系，人们首先会克服这样一个想法：坐在对面的人也许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准备干出一件伤天害理的可怕的事情来。你的第一直觉是，对这些人要严酷一些，而不能够自动地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那年夏天，我开始意识到，地区司法心理学服务处的负责人职位尚且空缺着。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认真地考虑到我想沿着这个方向走多远了。这当然意味着更高的一个职位，收入也更高，但是，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会离开自己一直都很喜欢做的临床工作而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

它意味着为排在临床病人队列末尾的那些人提供全日制的住院服务——最危险、病情恶化程度和受伤害最严重的一些病人最终都

会来到我的跟前。我希望把自己所有的工作生活全都花在这些可怕的犯罪行为研究当中,并分担受害者的痛苦吗?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同时还在厨房跟玛丽莲一起花很长时间谈论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很复杂,因为我一直有志于在自己的临床工作当中增添一些职业心理学的内容。这包括诸如职业压力、团队精神和商业风险因素等领域。从工业和商业到心理学,这从一开始就好像是一个自然的进展。

可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确为犯罪心理所吸引。是什么使人想猛击一位妇女或者强奸一个儿童的?引起一个人的狂暴和毁灭心理的触发因素是什么?又是什么使一个人成为社区当中充满爱心和尽职尽责的人的?

我知道自己能够帮助一些人。例如,如果我能够在一个性犯罪者的早年给他以治疗,那么,数十人就有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受害人。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治好了一些受害人,我就修复了他们受到的伤害,使他们解脱了自己的痛苦。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价值的。

7月份,我接受一项任命的职位面试,如果成功,9月份就可以开始工作。同时,我继续进行自己的临床工作,并准备进入谢费尔德大学,作为业余研究生研究职业心理学。

琳达·曼恩在卡尔顿·海斯医院附近被害已经过去两年半了,但当时我去看病人的时候,偶尔还会开车经过黑渣路。那宗罪案当时还没有告破,经常会出现新的协查呼吁,一般是在她死亡的周年时出现。事情一直就那样悬着,直到1986年8月1号星期五那天,我到街角去买牛奶的时候,注意到《莱斯特信使》报的报眼上出现了这么一则消息:

高级刑警和穿制服的警察带着警犬在纳波罗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寻找昨天晚上失踪的一名15岁女学童,这名女童的失踪地点与3年前遇害的另一名学童的失事地点相同。

恩德比区米尔胡同的多恩·阿曼达·阿什沃丝昨天下午去纳波罗区看她的朋友,之后就没有人看见过她了。她于4点30分离开纳波罗区卡尔顿大道一些朋友的家,然后就失踪了。

到第二天中午，多恩·阿什沃丝的尸体在一条人行道的路边上找到，这条路通往卡尔顿海斯医院的东边，当地人称它为十塘胡同。跟琳达一样，她也在当地的路特沃斯文法学校上学。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这第二起谋杀案成为当地和全国报纸的头条消息。因为自己一直很忙碌，因此只是偶尔从无线电新闻和报纸头版中听说一点点消息，但我知道，当地居民都吓得要死。

这次，警方很快便逮捕了一个疑犯，从纳波罗区找到了一名17岁的少年。他是卡尔顿·海斯医院的厨房杂工，在医院员工和病友进餐的大餐厅工作。8月11日，他被起诉谋杀了多恩·阿什沃丝，并予以拘留。

几天后，一封信送到我的门前，是当地卫生署送来的——那是一份正式的合同，确定我将成为地区司法心理学服务处新的负责人。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系并不认为我能够肩负这样一份责任，同时还能够完成大学学业。我一直指望由于在谢费尔德大学的研究而得到资助，但是，目前的情形清楚地说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有指望了。也许，如果我推迟一年，并集中精力完成自己新的工作，经济问题也有可能在将来得以解决，他们是这么想的。

我得做一个决定了。我是跟原来计划的一样继续下去——那就得自己找钱资助——使身在权位的那些人生气呢？还是放下大学的事情，接着在第二年获得一个职位？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那个新职位，是否真的想当那么一个官，是否真的就那么喜欢司法工作。

9月1日上午9点，我开车来到莱斯特的阿诺尔德洛奇医院，把车开进停车场，然后去我的新单位看了看。那是相当低矮的一栋两层楼，有棕红色的砖墙，四周用16英尺高的铁链围着。大部分窗户都是反光玻璃做的，不能够完全打开。

这是一处地方隔离单位，里面有约24名病人，但计划最终要扩建到60张床位。外面的铁链和控制室表明，里面的病人必须留在里面，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一般是最多住两年。同时，这个地方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安全。我心里在想，我到底准备让自己进入什么地方啊？

到里面以后，最深刻的印象是暗，暗黑。天花板看上去极低，让人产生压迫感，选来装饰室内的彩色木板使天花板看上去往下坠。

每个门上都安上了锁，中央控制室安装了电线，可对整个建筑里面的任何一处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

这里跟莱斯特综合医院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的走廊完全不同。我们经常会忘记，工作人员比住院病人在封闭的机构里面会度过更长的时间。

阿诺尔德洛奇医院的男性和女性病人多在18至40岁之间，其中一些人干下了极可怕的事情，或者有可能是纵火者、恋童癖者、强奸犯、施虐狂、杀人犯……他们都很年轻，身材壮实，我能够感觉到这里面的一股能量，但那不是令人激动的一种能量，而是必须小心防范的一股力量。

在我必须治疗的病人当中，有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她曾在一购物中心放火。有一位21岁的男青年曾试图割破父亲的喉咙。有个男的相信他的小女儿是恶魔的孩子，并觉得他必须挖出她的眼睛，肢解她的身体，之后再扼死她。另有一个男的有施虐幻想，他曾将以前的女朋友绑起来进行折磨，然后将她杀死了。

这样的人都经过了司法程序的处理，有的定了罪，有的根据《精神卫生法》予以关押。其中一些人曾送到监狱里去了，或者到了像诺丁汉郡的兰普顿这样的隔离医院。他们被转到阿诺尔德洛奇医院进行进一步的专家治疗，然后再送回社会。他们是否对社会构成威胁是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但是，个别有暴力史的病人只有得到内政大臣的批准才能够被释放。

总体来说，如果罪犯被认为对社会存在严重的威胁，并随时可能复发，但又有治愈可能，则他们会送到一个高等隔离医院。我们接受高风险病人，或者有可能随时构成威胁的病人，但两者都具备则不收。这里面的逻辑是，一个逃跑的病人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但只有在特别的环境中才会如此，反过来也是一样，他们有可能随时构成威胁，但对社会又不会构成严重的危险。

许多病人都由法院直接送往阿诺尔德洛奇医院，只要他们符合风险管理要求，他们的心理毛病也属于该医院的治疗期内能够处理的范围就行。另外一些病人从普通监狱里转来，他们在监禁期间出现了心理问题。同时，还有非住院罪犯和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的诊疗工作。这些人多半是当地医生推荐转诊的病人，有时候是由律师，更

多时候是由国民医疗服务处的临床心理学家转荐来的，这些人不想将有抡斧杀人可能的谋杀犯收进自己的医院。

我的责任范围是整个莱斯特郡、诺丁汉郡、德比郡、林肯郡和南约克郡——近一千平方英里的范围。在头几个月里，我将在司法心理学服务处为近五百多万人口服务。开车去巴恩斯雷或林肯郡都需要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会与当地议员、缓刑官或心理学家（需要了解转荐来源）见面，然后再次上路。

别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在这里一样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这严酷的事实。每一天都让人无法相信，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伤感，直到我不断增厚的职业外壳硬到足以保护我不受最恶心的细节的伤害。许多罪犯的历史表明，他们本身都是受害者，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受过虐待、遗弃或暴力行为的伤害。如果我要帮助他们，就必须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11 月 22 号，我接受新工作都已经 3 个月了，这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莱斯特信使》报的一名记者打来的。他问我是否能够告诉他杀死琳达·曼恩和多恩·阿什沃丝的凶手的心理学特征。

“有人已经为此被拘留了。”我说。

“你没有听到消息吗？他已经释放了。就是这种新的血检搞的——基因指纹。”

我稍稍有些吃惊。我对他说，对此我无法评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基因指纹和 DNA 测试的事情。令人吃惊的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离我的办公室几英里远的地方，由阿莱克·杰弗雷博士在莱斯特大学发现的。他是位年轻的科学家，曾调查过分离不同人的 DNA 来确定其基因差别的可能性。每一个人的细胞都包含有全部人类的蓝图，它们都是以 DNA（脱氧核糖核酸）形式的代码信息携带在人体当中的，这些信息都分成组，称为基因。由于基因主管遗传，杰弗雷就推断说，如果他能够从一个细胞当中提纯 DNA，并将其绘成图谱，那么，它就应该是彼此不同的。地球上拥有相同 DNA 图谱的人就是全等双胞胎。

这个技术在医学、科学和法律当中有极大的应用可能，但是，直到 1986 年，它还只用在亲子鉴定和移民争端中。11 月 21 日，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厨房杂工成为第一名由

于基因指纹的检测结果而被释放的杀人疑犯。

对莱斯特的刑事侦查处来说，结果是一场公关灾难。杀死两名学校女童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而一位无辜的少年却在监狱里被关押了3个多月。大卫·贝克在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受到无情抨击。他说，那次逮捕"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位年轻人是当着律师的面进行录音审讯之后受到起诉的，"他对那次谋杀的某些部分不负责任"。

"他是否完全排掉了嫌疑？"一位新闻记者问。

"目前尚没有人完全洗脱嫌疑。"

琳达·曼恩几乎是在从我的办公室可以看见的距离内受害的，我记得自己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谁干下这么一件事情的。三年之后，又有第二个姑娘被害，大卫·贝克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问一些认真的问题。他的电话很短，没有什么细节。他不相信电话接线生，因此想见面谈。莱斯特郡建了新的警察总部，有意建在城外一片很宽阔的地方，离纳波罗区只几英里。入口的大厅看上去像是个汽车旅馆的接待室，顺着七拐八拐的走道走一会儿，我就找到了贝克的办公室，比他原来的那间宽敞得多，但也空荡得多。记载他过去的业绩的那些纪念物要么是在路上损坏了，要么是还没有打开。

他介绍我认识警督托尼·佩因特，他是个高个子、健壮的人，罗马式的脸，戴着飞行员眼镜，还有当地的口音。他的年龄跟贝克相仿，资历也差不多，这两个人看上去就好像是一起提拔起来的。贝克是两个人当中话少些的一个，但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

"我们有些麻烦问题，保罗，"他说，手摆弄着自己的下巴，"我们相信自己抓到了凶手。我们拿到了坦白认罪书，我们有证人看见他在犯罪现场，他知道多恩之死的细节，而这些细节从来都没有公开报道过。我们起诉他，然后，他的父亲看了一篇破杂志故事，里面讲到基因测试的事情，并开始要求我们也为这个孩子做基因测试。"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朝天看。

"我相信你见过阿莱克·杰弗雷博士吧？"

我摇头。

他继续说："嗯，不管怎么说，他做了一项测试，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的，然后，他回来说'你们抓错了人'。你无法向这样的事

情挑战。你如何向崭新的科技挑战呢？世界上没有别的第二个人明白他妈的这件事。”

这番话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时间竟没有话了。

贝克说：“我想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就我而言，这次调查无可挑剔。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看看审讯这个厨房杂工的记录。我希望知道，我们是否以任何方式将他告诉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了。这些审讯是否有强迫的意思？我们是否给他施加了压力，逼他承认或者坦白什么事情？他怎么知道他所了解的那些情况的？”

佩因特解释说，总共约有14盘录音带记录了审讯过程，是在威格斯顿警察局花几天时间录下来的。一名律师当时在场，旁听了大部分的录音。

“但是，这件事不是最要紧的，”贝克打断说，“外面还有很多人感到十分害怕，一些父母不知道让孩子放学自己回家是不是安全的。”

佩因特说：“我们一会儿抓人，一会儿又放人，很被动。”

贝克说：“说到底，我们这里有一个双重杀手逍遥法外，我们希望你帮助我们抓住他。”这次我准备得充分一些，我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东西：“这意思是说一切得从头开始，从头研究全部审讯。”

贝克回答说：“很好，不管你需要什么东西都行。我们不藏什么东西。”

托尼·佩因特已经将多恩·阿什沃丝凶案的审讯递过来了，他会让我了解从第一天起开始的问询。

多恩在学校放假期间找了一份临时工作，是在恩德比区米尔胡同的一个报摊工作。7月31号下午3时30分，她离开报摊。根据一个朋友的说法：“她很高兴的样子，整个下午精神都很好，说星期六准备跟她父母一起去汉斯坦顿去度假。”

在家中，多恩对她母亲说，她准备去纳波罗区跟同学一起喝茶。她应该在晚7点回家的，因为她要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是她以前带过的一个小男孩的生日。她甚至还去报摊商店买了一盒斯玛蒂当作礼物。

她下午4点离开商店，直奔纳波罗区。多恩高1.63米，牙齿上

还有钢丝套。她的头发为棕黑色，直发，中等长度。她穿白色短裙，齐小腿肚，一件白色的无袖圆高领衫，还有多颜色的无袖上衣，有粗棉布斜纹夹克。据说她身上仅有 10 英镑。

去她两个女朋友家的最直接的路线是走十塘胡同，十塘胡同是乡间小路，从恩德比区布洛金顿小学的运动场伸出来，穿过一片田野到达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东头，最后在纳波罗区接上莱斯特至考文垂的公路。

在东边，几乎是与十塘胡同平行的是 M1 号高速公路，这条公路切过纳波罗区的最东边，然后在恩德比区的体育场附近直接转向北边。

多恩向十塘胡同去的时候有一个选择，她可以在高速公路的人行桥向左转，然后走小路到爱德华王子大道，她也可以转向右边走更短的路线到十塘胡同。

在纳波罗区，多恩见了好几个朋友，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是华勒姐·奥尔索普夫人，她是多恩住在卡尔顿大道上一位同学的母亲。她看见多恩离开的时候经过她家的前窗。

多恩好像是从来路回去的，直接朝回家的方向走。一位摩托车手约在下午 4 点 40 分跨过艾德华王子大道时看见过她，当时她跨过农场的入口朝十塘胡同走去。

她半裸的尸体是警察星期六中午在靠近人行道的一块田角上找到的。几乎完全被草、荨麻、树枝和堆在上面的树叶盖住。

佩因特打开了犯罪现场的第一本照片夹。树叶清开以后，可以看见多恩向左侧躺着，她的膝盖向上缩在胸脯上。她的腰部以下全裸，内裤挂在右脚踝处，白色的鞋子还穿在脚上。她的乳罩掀起在乳房以上，一行已经干燥的血迹糊在她的左腿上。她在炎热的夏天已经躺了相当长的时间，昆虫首先发现了她。虽然她的眼睛仍然闭着，但嘴唇和眼窝都有一些奶白色的粘液。我想扭过头去。我想给这小姑娘一点点遮体的东西，想把照相机移开。我深深吸一口气，翻过了这些页，心里记住了无数的抓痕、虫子咬过的痕迹和荨麻刺在她身上的样子。

佩因特翻到了病理报告部分，解释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多恩的左上侧前额有两处擦伤，左脸颊有肿胀部分，左眼至下颏有硬伤。口

腔里面有破口，是她的牙托造成的，脸、胸和后脖子上有擦伤。根据法医的鉴定，有些伤口是她的尸体被拖动和掩盖时造成的。

她死于人为窒息，勒死之前还有可能被刀柄击伤过，有可能是袭击者从背后用前臂压住其喉部致死。

多恩是处女，她被强奸，还受到鸡奸。法医报告说："考虑到喉部的伤势严重，我必须指出，性攻击是发生在扼死之后，因此，强奸行为发生在死亡过程当中，或者发生在死亡之后。"

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我是过了很久之后才跟佩因特说起这一点的。奸入的时机往往会暴露出一些线索，能够看出杀人者的动机。一个因为害怕而杀死受害人以保护自己身份的强奸者，与一个在受害人死亡时或者死亡之后通过虐待受害人而获取倒错性快感的人，他们的心理学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一开始，凶案组集中在有人看见他从事发地带逃走的那个年轻人身上。一位女摩托车手急刹车才躲开了一名慌里慌张逃走的年轻人，那人约在下午 5 点 30 分在爱德华王子大道的 M1 号公路桥下跑过莱斯特至考文垂之间的高速公路，当时是星期四。30 分钟之前，马斯顿暖气片公司的一名工人曾在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最远的那一头听到多恩被找到的那个方向传来两声尖叫声。下午 4 点 35 分在附近的田野里抱在一起的一对情人被找到了，还有两个独立的证人，包括当地的一位农民，他们都报告说看到一个男子蹲在草丛中，下午 5 点 30 分还看见他蹲在爱德华王子大道护堤树篱里。

"然后就是这名厨房杂工，"佩恩特说，"4 名不同的证人都报告说看见他的摩托车停在 M1 号公路桥的桥底下，时间在下午 4 点 30 分和 5 点 30 分之间，还有人看见一个手拿非常显眼的红色防撞头盔的男子，就跟那名杂工的一样。"

"你们怎么找到他的？"我问。

"星期六晚上，一个小男孩推着一辆摩托车朝我们在恩德比区米尔胡同的检查站的一个警员走过来，他报告说看见多恩在星期四下午朝十塘胡同走去。那个警官记下了他的名字，两天之后找到他重新跟他谈话，结果发现就是那个厨房杂工。"

佩因特让我注意好几处疑点。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另一名员工在多恩失踪的那天度假回来。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那个厨房

杂工到他这里来，告诉他说多恩的尸体在“M1号公路桥一个入口处的树篱里找到了”。

“又过了14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她，”佩因特以不能够相信的口气说，“他怎么知道某个入口处有一条通往十塘胡同的路的？还知道从M1号公路的人行桥通往十塘胡同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同样，星期六下午1点45分，这名厨房杂工曾对当地的一个人说，多恩的尸体已经找到了。是的，是找到了，不到两个小时以前。但是，找到的消息并没有公布。他是怎么知道的？“谋杀发生后，我们找到他来问询。”

“然后呢？”

“他承认了一些事情，但前后都不对劲。他一会儿说这件事，过一会儿又否认有这件事。或者说一些谜一样的话，抱怨别人干了什么事。他承认跟多恩一起在人行道上走，描述了他如何攻击她，并详细说明尸体掩藏的情况。我不管这个小伙子的想像力有多么丰富，但是，他不可能构想这么多事情而且还说得那么准确。”

佩因特还拿出了很多供词，都跟这个17岁的少年的性偏好有关，他的这些情况早已经在警方的掌握之中，因为以前他曾与一个14岁的女朋友在当地的铁路路基上发生过肛交。在另外一个事件当中，他承认在一次性攻击期间摸过一个9岁的姑娘，这件事已经有证人证明。

警方明显找过确证材料，好像在这名厨房杂工与对多恩·阿什沃丝的肛门攻击之间确立了推断联系。

佩因特说：“当你听这些录音时，你会明白我所说的话。他承认了这件事，否认这件事，然后又承认，再后否认，然后说：‘我要求进行血检。不是我。’”

我问：“基因指纹能够将两件凶案联系起来吗？”

“那是惟一的一件好消息——我们找的是同一个人。”

我在心里思考这话的含义。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就已经杀了两次人。我在想，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再次杀人呢？

佩因特开车送我到现场，我们在爱德华王子大道上的十塘胡同脚下停下车来。我们在用拖车做的流动工作室登记完之后，步行沿着水泥斜坡来到一处入口，那就是通往十塘胡同的入口。软弱的光

线从人行道两侧的山楂树缝里渗进来。秋天已经迟到了，荆棘和杂乱的树丛里仍然有一些青绿色。

走过四分之一英里之后，小路就变窄了，树篱紧闭在路侧，形成极窄小的绿色过道，只有通往邻近田野的农场人口才会打破这个过道的封闭。

"你会看到其中的很大一片在搜查时清理了，"佩因特说，呼吸越来越重，"有些地方，荨麻和荆棘高齐肩头。"

"她在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有位骑摩托车的人下午 4 点 40 分看见她从爱德华王子大道朝这个农场的人口方向走。她得再花 10 分钟才能够到达这里。"

已经清除了很大一片灌木，已经很难想像那天下午多恩受攻击时这个地方的情景，但是，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块隔离的地方。第一次接触一定是在人行道上，然后是以某种交换开始的，一次谈话，或者一种威胁，或者只是看了一眼。根据多恩的反应，她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关于她的情况我了解得很少，无法猜测她的行为。

她有可能是在小路上死的，然后她的尸体就给拖到了或者举起来翻过一个人口到了田野的一角。草和荨麻都相当高。

一串枯萎的花靠在大门柱子上。佩因特说，阿什沃丝一家因为这次谋杀案而伤心欲绝，他们不停地往这里放上一些花以记住这个地方。

"一旦开始，你如何能够停得下来呢？"他问，"你能不能说：'今天算了，今天就不放了。'那你如何能够克服不再去的内疚呢？"

用钥匙打开挂锁后，我们推门进去。大门上生了锈的活页发出吱吱的声音。我想，要打开这扇门需要两只手，这意味着多恩有可能是举着推过去的。我感觉到自己脚下不是很平整，并注意到一些带刺的荨麻和荆棘。这有助于重构当时所发生事情的情景。

我们沿着十塘胡同继续往恩德比方向走，我注意到人行道分岔的地方，一条通往人行桥，就是跨过 M1 号公路的那座桥，另外一条通往那个操场。我自问，犯罪现场暴露的情形如何？有没有可能在 M1 号公路上停下一辆车，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来，杀死一个人然后逃走？

隔着五块田地，在医院那片地西头，就是琳达·曼恩被杀死的地方。我们在伍德兰日间医院停下来，沿着森林路朝黑渣路的入口走去。

离开黑色的煤渣路走了几码后，我透过铁篱朝树林小空地看去，那个地方就是琳达的尸体被找到的地方。这条人行道现在已经装上了街灯，但是，1983 年那个寒冷的 11 月的晚上，这里很黑，而且很安静。

我们这次又有一个少女在人行道上给人捉住了。当时，她被人从一个门里拖出去，并在仅几米远的白桦和冬青树林里给人杀死了。跟多恩一样，她被发现的时候腿也微张着，身子底下还有一根树枝。如果这有什么意义，我一点也不明白。

尸检显示琳达的脸和下颏上有擦伤，锁骨和上胸部也有更严重的硬伤。佩因特说，杀手用她的头巾勒她的脖子时曾跪在她身上。没有进入她的阴道或肛门的迹象，但发现她的阴毛上粘有干结的精液。“本来是想性交的，但发生了早泄。”那位法医的结论这么说。

当天晚餐时分，我试着将白天的一些回忆放到一边去，谈到了平常的一些家事。碗筷洗涮完毕后，我帮助艾恩做家庭作业，然后慢慢走进我的书房锁上了房门。托尼·佩因特给了我一些证明材料、一些病理报告、地图和航拍照片。

现在，我得恰当地重构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通过受害人的脸，而且还要通过罪犯的眼睛。奥斯本的韦顿案给了我一些信心，允许我构建一个框架出来。有 4 个问题必需回答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何发生的、对谁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这同样的一些问题跟我的临床工作类似，特别是当处理一些受害人的问题的时候，但方式稍有不同。在我的诊室里，我看到一个受伤害或者处在痛苦中的人，我得找出他们在心理学上讲是属于哪类人，他们如何会走到那一步的。在这个案子里，我的桌子对面没有人坐着，也不能够依靠别的任何人来跟我讲一点琳达和多恩的事情。

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在第三个问题上，而且，我了解得越多——关于她们的长处和短处，她们的爱与仇恨及恐惧——心里就越是难受，因为它们离我越来越近。这必须是发生在警察那里的事情，我想，而明显的倾向是要推开这些，只是集中精力来思考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无法这么做。我以极大的热情回答头三个问题，最后全都有

力地影响到第四个问题的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得想像这个人就在我的诊室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而我也是在进行一种单边的审讯。如果我确切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去杀死一个女性的，那我就可以准确地构思出他的人格作用机制。然后，我可以从他的犯罪行为回到他从前的生活中去，并画出他的家庭、朋友和人际关系以及接受教育的图景。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与自己的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在小学和初中是什么样的情景？他有可能是平均智力水平还是稍差一点点，或者稍高一点点？既然他对一个特别的女性做下了这样的事情，那他对妇女的感情、概念和假定总体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他有可能拥有很多女朋友吗？他现在会有一个女朋友吗？他有可能做什么样的工作？需不需要一些技巧来做这些工作？他有社交能力来保持住一份长期的工作吗？

像这个人和保罗·波斯托克一样有性变态的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他们可以在监狱、特别医院、地区隔离单位，有时候还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非住院病人当中发现。我在司法临床工作虽然才只有3个月的时间，但已经掌握了五六名有问题的病人的历史，他们总想着要强奸和杀死年轻妇女。我的临床工作一直都在增加，我有办法接近会刊、个案分析报告、心理学家和专家们出的专著和研究论文，这些人在英国和海外都接触过类似的会谈。

下面就是我坐下来透过纳波罗区的那名杀手的内心看到的东西。

两天之后，我又回到了贝克的办公室。我有数页手写的大页书写纸放在我的面前。

"他是当地的一名男性，或者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我说。他能够在犯罪之后很快消失，而且不引起可能证人的无意间注意，这一点说明了他是当地人。以前还没有人提供如此准确的描述，可以用来认出凶手，或者从公众当中拿出一些建议来。

"很多事情可以指明是一个单独的凶手所为。性心理变态者很少一起出猎的，而且一个人也能够搬动尸体。"同时，我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不合群的人，也不是特别突出的疑犯。如果他是，则当地村里一定会有人说出他的名字，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会使妇

女感到不安，或者有奇怪的行为。

这就强烈地指明这是一个年龄稍大也很稳重的人，不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这种人也许结了婚，也许有固定的女人。这种人的控制力更强，在面对犯罪而进行的详细问询时能够镇定自若。

佩因特问："这么说，他有可能有妻子或女友？"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处在某种夫妻或者情人关系当中就排除他。每次他都能够控制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从而使他不被抓住的成功机会最大化。他非常小心，还会做一些计划。这样的人更有可能进入某种关系。"

"你们还得问自己：他如何想办法保持住了自己的职位，哪怕他生活在一个很封闭的小圈子里，他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秘密而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了解自己的邻居，他们知道他，但是，他并不突出。你们得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再一次说明，他是个年长的人，也许处在一种关系当中。"

贝克问："这么说，他的家人也许在替他做掩护？""不，我不这么看。他的某些行为也许会使周围的人很不舒服，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是个性谋杀者。"

贝克说："多大年龄？"

"至少二十七八岁。"

"而且很聪明？"

"如果你看看小心和计划的程度，我会说他至少有正常的智力水平。"这可以从他在适合实现他的目的的地点抓住那个少女，然后又在事后逃跑这一点上看出来。

"你们对付的是一个性犯罪者，而他的性变态的性质也许是由性幻想冲动引起的，正如保罗·波斯托克所受的那股冲动一样。他周期性地体验到进行性控制和性主宰的冲动。他需要通过攻击来表达自己的冲动，他要主宰人，要控制人，要强奸和杀死一个妇女。如果你看看记录，就会发现这个人会引起你的注意，也许只是因为小小的性犯罪行为。"

我可以看出，贝克以前想办法做过这件事。一个人拿起勃起的阴茎对准一名女性强奸和杀死一名妇女之间的概念性跳跃太大了，但是，我知道，同样的冲动有可能引起这两种行为，一种冲动也有可

能引起另一种冲动的产生。

我曾在一个诊所里与一些暴露癖谈过话，他们的理由听上去很合理，你打开他们的过去时，其他的因素都会冒出来。对于男性来说，视觉刺激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色情杂志满是裸体女性图片的原因。有些暴露癖错误地假定，如果一个妇女看见一根勃起的阴茎，那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她也会因此而充满性欲，她就会与他们发生性交。另外一些暴露癖暴露自己，是因为看见一名现实中的妇女远较看见杂志上的女性更为刺激——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有时候还有攻击或者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这是他们早年生活当中发生过的某种事情，他们遭到女性的拒绝，或者受到一名妇女的嘲弄，或者他们希望令人震惊，或者想吓唬或主宰一个妇女。

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可能混合起来，你无法拿起其中一根线条然后说，“这就是解释”，因为那是误导人的。

性变态行为有很多种，如果我们在一幅图的轴线上进行排列，则会看到稳定的上升趋势。有人从极小的犯罪上开始，然后进入规模越来越大的犯罪活动。杀死琳达和多恩的人并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凶恶的性犯罪者。杀死她们的人开始的时候只是犯些小小的罪，然后慢慢越来越严重了。

佩因特说：“这么说，他有可能以前就犯过强奸罪，但不一定杀过人？”

“是啊，但是，并非所有的强奸都有报告，或者被人查出来了。”我说。

“而且他还有可能再次杀人。”

“是的，当那股冲动足够强烈的时候。他不是个禁欲者。他需要性交，必不可少。但是，这两次谋杀之间隔了 3 年，在这期间，他有可能在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找到了性生活。他有可能跟他的妻子或者女友一星期性交几次，但是，这对他远远不够。他的性欲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必须得到满足的。”

虽然生理上的攻击差不多，但是，佩因特挑出了两个案子当中的不同之处，他问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对琳达进行肛交，也没有想到要将尸体隐藏起来。

“杀手的行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环境也是不同的，也

不允许人重复以前的活动，或者，一个受害人也有可能通过她所说的话或者所做的事情而使事件发生改变。同时，杀人者在两次谋杀期间也慢慢增强了信心，而这个信心也会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下面这一点我必须花更长的时间去思考。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阴道和肛门攻击必须分开，因为既然在两个情形当中都没有发生性器上的混淆，因此，这些攻击行为都是有意分开的行为，而且，我不清楚事情是以哪一种顺序发生的。"

贝克问："有没有可能他认识那个姑娘？"

"有，或者说认识她们。"我说。

"有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使他要选择她们？"

这个问题是我头天晚上自问过的，我将两个姑娘的照片一起摆在我的书架上发问。两个姑娘从年轻的角度来看长得都很漂亮，但是，她们显然也能够被一个对妇女而不是对儿童有性趣的男性从色情的角度来看待。

这名罪犯出外寻找符合某种标准的受害人。她必须有合适的年龄以对他形成性刺激，但又不至于形成威胁，这样，她就不太有可能攻击他或者以某种让他干不成事的方式羞辱他。琳达和多恩都是理想的人选——年龄大到足以形成性刺激，但又小得无法自卫，没有世俗的经验。这就是他选择她们的原因。

我讲完以后，大家坐下来又喝了一杯咖啡，同时，佩因特对我讲了案子的进展情况。自从厨房杂工给释放以后，威格斯顿警察局的事件室已经接待一千多份消息。有50名警察都在忙双重杀手的查找工作，主要集中在多恩·阿什沃丝的身上，因为她的死亡在大众心目中仍然很新鲜。

两名警探，德里克·皮尔斯和米克·托马斯负责疑犯和逐户问询工作组。他们在重新追踪姑娘们走过的路，审讯一些疑犯，并反复征询证人，问他们还能不能记起更多的细节。这期间，《莱斯特信使》报准备了一份长达四个版面的特别报道，里面有关于这个凶犯的所有已知细节。特别警察亲手将这份报纸特刊送到纳波罗区、恩德比区和小村庄的每一栋房子。

12月18号，英国《罪犯报》在英国广播公司一台播放了对犯罪情景的重构节目，里面突出了下午5点30分被人看见从十塘胡同跑

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情景。1300多万人观看了那个节目，节目之后，60多人从远至伦敦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打来电话。寻找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

同时，我也开始倾听警方与那名厨房杂工的对话。我将第一盘带子插进磁带播放机，听到一名17岁的少年很有信心但小声地回答警方提出的诸多问题。他说，他认识多恩有3个星期了，看见她在村庄周围走过。然后，在7月31号星期四那天，他正好休息，因此一直睡到了10点或者11点钟。在下午，他开车顺着爱德华王子公路转游，然后朝纳波罗区走。在公路桥的地方，他看见多恩朝通往十塘胡同的地方走。

"你怎么知道那是多恩?"

"根据她的发型和她走路的姿势。我知道那是多恩。"

"你非常了解她吗?"

"只是根据长相。就这么多。"

"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一条白色的裙子，还有黄色或者白色的夹克。我心想要不要上前跟她说话，问她到哪里去，就这么多。然后我想，我得回家去了，然后得去灌点油了，否则油很快就会用完。摩托车已经开始漏油了，漏，漏，漏得很多，因此，我就一直开回家了。"

讲到关于别人看见他的车停在桥下的事情，还有一个年轻人手上拿着红头盔的事情时，这个杂工说不是他。

"如果你停下来跟她谈过话，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诉我们吧。因为如果你撒谎的话，哪怕你跟这事毫无关系，那也会让你看起来很糟糕。我认为你在桥下停了车。你极有可能跟她谈了话……"

"是啊，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杂工说。

"你在桥下停了车，不是吗?"

"的确下来看了看车，看看是不是还在漏油。"

"你跟她说了些什么?"

"我刚刚看见她接近那个大门。"

这样的问题来回问了很多次，没有一点点进展。有一阵子，那个少年说他到了十塘胡同，然后他又说那是一天之前的事情。

最后，那位警官直接问到关键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你是有意要

杀她的吗?”

“没有。”

“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是这样的,我看见她朝胡同里走去,就开着车到了她身旁,然后下车。开始跟她谈话。我问她昆妮在哪里,还有迈克尔在哪里。她说‘我不知道’。我就说‘你去哪里?’她说‘我回家’。我跟她走到胡同一半的路,然后我就说‘你没有事吧?’她说‘没有事’。这样,我就回家去了。骑上摩托车就直接回家了。”

这次,问询的线条又逐渐断了。疑犯越来越烦了,说自己记不清了,还说他应该受抱怨。在接下来的问询当中,他又被带到了他的性史,并承认与一名14岁的少女在当地的铁路上发生过正式的性交,一次或者两次,“我有可能滑进了她的肛门,可是我并不清楚。”他说。然后他又重新说一遍,否认自己以前有过任何性经验,甚至不承认自己曾有过手淫行为。

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拿出任何只有杀人者才知道的一些细节,尽管他语无伦次的回答和不断的变化表明他的智力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问及他如何知道尸体已经找到时,他说多恩的哥哥曾告诉过他。多恩并没有哥哥。他还否认自己星期天晚上碰到过某个警察,说那个警察是自己编造的,“目的是想让我有麻烦”。他有时候好像在回答与所提问题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

我换了一盘磁带,听出了托尼·佩因特的声音。他让那少年看了多恩·阿什沃丝的照片:“我觉得你负有责任。”

达威警官说:“我并不觉得你是有意要杀死她的。”

“我都记不住了。我也有可能疯了,我不知道。”

达威问:“你在梦中想到她吗?”

“是啊,有时候,但是,我再也记不住了。”

佩因特说:“给我详细描述一下所发生的事情。”

“她躺在底下,我开始用手摸她的上面。她当时在挣扎,直到我把手摸进她的裙子。瞧,我跟她一起走进胡同,并开始摸她的屁股。她也向我靠过来,差点绊倒。我继续摸她,她还在挣扎,但是,我将她按下去了。然后,我的头就开始转起来,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我不

记得自己干了什么，直到后来跑开为止……我就是疯了。无法控制自己。多恩说她不会告诉任何人。就好像别的哪个人接过来一样。我真是疯了。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一样，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我并不想那么干的。别的人在逼迫我那么干。我的手脚都不听自己使唤了。一开始，她让我随便来，后来她就躺下去了。她在挣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觉得干那件事情的人不是我。但是，等我做完事情站起身来以后，我撒腿就跑。"

他差不多立即否认了一切，然后显出很烦的样子。"我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为什么拿我来问罪？我甚至都没有跟多恩说过话。"

星期五早晨，问询又一次开始。他说，他离开多恩的时候，她还活着。他显出很害怕的样子。

佩因特问："你怎么才使她不能动的？"

"我想我是压在她身上的吧。"

"你的手在哪里？"

"抱着她的胳膊。"

"你趴在她身上做了什么？"

"只是大笑，并且还跟她开了玩笑。我对她说'我不会放你走的'。她也开始大笑起来。她在我身上到处爬。"

"然后，你干什么了？"

"我趴到她脸上看，坐在她的胸部，就这样的。坐在她胸脯上。"

"那是你伤害她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

"她不再挣扎以后，你感觉如何？"

"不知道。"

"努把力，再告诉我们更多情况。"

"我意识到她不再动的时候，心里在想，真他妈的，啊我的天！我只是站起身来，顺着胡同就退回去了。我在想，她发了心脏病，或者得了类似的某种疾病吧。"

"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地方？"

"就在沟边的树丛里。我记不准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干那件事。所以我真的记不准确。"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当中，他努力再回忆一些东西出来。

"是的，我一直把手抓到了她上半身。然后我又把手伸进了她的裙子。她说'不'，我就强行往里伸。她开始喊叫起来。我用手捂住她的嘴以免被别人听见。然后，她就在那里躺着一动不动了。我只是用手使劲捂住她的嘴和鼻子。她就窒息死亡了。我记得起来的就只是这些了。我无法让她就那么躺在那里，所以将她藏了起来。"

"你怎么藏的？"

"用许多荆棘盖住藏在一片矮树底下。"

"你离开她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的？是哪一种体位？"

"趴在地上。"

"什么？肚子朝下，还是侧面躺着，还是仰面朝天？"

"侧着。"

进一步问询的时候，他解释说，他用手指压在多恩的喉咙上，让人看上去她是被扼死的。

然后，他脱掉了她的内裤与她性交。之后，他托起她翻过树篱，将她的尸体藏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问询当中，这名杂工接受了多恩如何被他捉到和受攻击的详细情况的测试。

"你如何打倒她的？"

"我用脚从她身后踹倒她的。"

"几分钟之前，你已经说过你们已经经过那道门进入田间了。"

"那是个错误，搞错了。"

"你在哪里干下这些事情的？是在胡同里还是在田间？"

"在入口那边。"

"你说脱掉她裤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把全扯掉了？"

"是啊。"

"你把内裤都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就扔到一边去了。"

"我把别的东西都弄回去了。我把裙子放下来。胸罩放下来。还有衬衣。扎进去了，就这样的……"

"你是如何粗暴对待她的？"

"不知道。"

"告诉我吧。"

"我打了她。"

"你用什么打她?"

"这个。"他举起自己的拳头。

"打哪里?"

"脸上。大概就是这里,靠近下颏部。"

"下颏周围?"

"大概是吧,是的。我打了她的嘴部。"

"还干了别的什么事情没有?"

"打了她三次。"

"那是在你对她发动性攻击之前吗?"

"是的。"

"是因为她不肯干那件事情吗?"

"是的。"

接近审讯末尾的时候,这名厨房杂工听到一个问题,是要他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多恩。

"……她开始大叫起来,因此我想,如果就让她这个样子,她一定会告诉她妈妈和爸爸,那我就会有麻烦了。因此,我就干了一些事情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开始尖叫起来,因此我就把手放在她的嘴上,同时用另一只手抠她。我脱下了她的裤子,然后跟她性交,然后将她埋起来了,这就是我记得自己干下的所有事情。我直接从那条胡同回家了。"

在这一切的表面,那少年坦白的事情听上去都是决定性的,但是,在他的答问之间,有很多否认和180度的转弯。同时,我听不出有什么精心计划的欺骗,也听不出他在有意构筑一道防线。那厨房杂工只是咕噜地说话,经常是毫无目的的。

我可以看出为什么大卫·贝克有麻烦。不管理由是什么,那个少年对事发现场非常了解,对伤势和企图掩盖尸体的企图也很清楚,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公开。

有四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出自某种令人惊奇的偶然,他的幻想或他撒的谎非常准确,导致他本人受到起诉;第二种可能是警方无意间将一些细节透露给他了;第三种可能是他参与了两手谋杀案,但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精液,也没有留下司法

证据;第四种可能是,他目击了所发生的一切。

第一种可能性太小了。如果他得到过大量不正确的细节,而在其中他又说出了几处正确的细节,那我倒情愿接受这样的可能性。

根据磁带上听到的内容,非常明显的是警方并没有给他提供信息,而且,尽管他们对他反复无常的回答有些恼怒,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指明他受到了任何压力或恫吓。

我对这些犯罪行为进行的心理学分析指向一个单独的杀人者,这就排除了那个杂工成为参与者的可能性。那就只剩下第四种可能性了。是他目击了谋杀过程,还是在事后被尸体绊倒?到了再次查看十塘胡同的时候了。

在接近人行桥的地方,我走到一处田野的角落,然后朝远处的十塘胡同看去。因为所站的地方地势较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多恩被发现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她最有可能给人捉住的那个地方。蹲或者坐在树篱中的人很容易就看到几乎是秘密发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他为什么要说接触过她呢?是不是他所站的地方离事发地点非常之近,致使他能够看到多恩的内裤已经给人脱下来了,而且看见她一个人侧卧在那里?

这些问题是那些磁带不能够回答的。

圣诞节的前几天,我回头向大卫·贝克和托尼·佩因特汇报。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我无法明白自己要告诉他们的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我开始说话之前,两个人都相当自信,说警方的问询根本没有向那名厨房杂工透露任何有可能影响其回忆的内容,也没有对他施加任何压力。

贝克问:"这个小孩是无辜的还是一个共谋犯?""事情并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也不是那么一点干巴巴的事实,"我说,"他在问询期间得到了一些信息,或者受到一些压力使他做出与事实不符的坦白。可能这就是你的意思吧。"

"那他就必须在场啰?"

"极有可能。我认为他有可能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的天!"佩因特难以置信,直摇头。

"这还能够解释他对多恩·阿什沃丝和琳达·曼恩的不同叙述。在一个案子当中,他可以说得相当准确,而在另一个案子当中,他一

点主意也没有。这表明他根本就没有参与第一个谋杀案。"

贝克点头，然后将他的椅子向后推得老远："这么说，我们还得继续查找凶手了。"

"恐怕是这样的。"

他站起身来："嗯，我们准备一次性了结这个案子。如果科技能够证明这个孩子是无辜的，那么，科技也能够向我们指明到底谁是杀人犯。"

"你的意思是？"

"我们要找到留下精液的人。"

贝克解释说，他已经得到许可，对纳波罗区、恩德比区和小索普区所有的男性居民进行自愿性的血液检测活动。年龄段为琳达被杀时14岁到34岁，并且包括在过去的5年当中生活、工作或与这3个新区有任何关系的男性，包括卡尔顿·海斯精神病医院的病人。

这项计划庞大的规模让我吓了一跳。在波斯托克杀人案之前，没有人曾请一位心理学家描述罪犯的大致特征，但是，贝克愿意接受各种可能性，而且打破了一些新领域。现在他要发动极其庞大的一项活动，要对数千人进行DNA测试。

"当然，必须自愿进行，"贝克说，"我们已经在向这样的每一位男性发出信函，征询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提交血液和唾液样本，这样我们就能够免除他们受问询的责任。"

我想，这个办法能够起作用，因为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想法是非常聪明的。我们都相信，一个当地男性或某个最近生活在当地的人就是杀人者。大部分男性都会愿意提交样品，使他们自己排除在接受问询的人员之外。不愿意提交样品的人将接受更仔细的了解，这就使疑犯的人口数减少了许多。

我在想，杀人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如果他拿出样本，实验技术人员会使他与谋杀案产生联系。如果他不提交样本，警方会打电话来，这次会将他翻个底朝天。

"如果有人代替他拿出样本怎么办？"我自言自语地说。

贝克回答说："我们将要求拿出身份证明。这也不能够保障万无一失，但希望会得到足够好的结果。"

"如果有人替他做测试，事情就会暴露出来，"我说，"他们将无法

保持沉默，特别是测试结果一直保持为新闻的时候。"

1987年1月2号，消息公布出来，《莱斯特信使》报是这样登载的："为查凶手，警方展开2000人的血检工作。"全国媒体迅速转载这一消息，新闻记者从伦敦来到这里报道行动进展情况。不久，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也都蜂拥而至。

已经在恩德比区的戴恩米尔学校和纳波罗区的布莱比地区议会建了两处测试点。1953年1月1日之后和1970年1月1日之前出生并生活在这三个区的男性都接到信函。有早晨和晚上两个测试时段，一星期进行3次。

血样和唾液样由警方医务人员取走，然后送到亨廷顿的东米德兰司法中心实验室和奥马斯顿的内政部中心研究机构。

第一份样本于1月5日提取，到1月底，1000男性已经进行测试。实验室努力跟上，但工作还是拖到后面很远。突然之间，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行动"开始显出严重失误的迹象。不仅花费惊人，而且还需要比原来多出好几个月的时间。

说积极的一面，共有90%的人回了信。男性大多真诚应对自愿受检，哪怕这并不是一项司法要求——这说明各个社团都强烈希望抓到凶手。没有回信的人都受到更仔细的检查，但是，凶案组的人员一开始就在全国东奔西跑起来，跟踪搬出了这个地方的那些男性。

媒体称这项测试工作为"放血"，用这个词来指狩猎之前先让猎狗闻闻血腥。我在这件案子当中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我还是定期看看这方面的消息，或者在电视上看到节目当中提及此次活动。我明白，贝克和他的小组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次行动的费用在不停地上升。

在已经接受过问询并在问询过程中进行过记录的数千名男性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柯林·皮奇福克，他是一名25岁的面包师，琳达·曼恩的尸体发现后的几个星期内，他搬到了小索普区的一处新房。

问到琳达·恩曼失踪那天的去向时，皮奇福克说他于晚6点开车送妻子卡罗尔去莱斯特的一个夜校上课，然后回家带3个月大的儿子，直到晚9点她下课时再去接她。这意味着他在关键时刻无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因为发生凶案时他并不在当地居住，而杀手又不太可能是带着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的，因此，对他的分类属于较低可

能那一种。

计算机上有数千人的名字，每个人都给分了一个类，并列在不同的范围内，这取决于他们的年龄、住址、犯罪背景、有否不在场证据和与那片地区的联系，比如看望一个亲戚或者去了那家医院等。

计算机在英国的刑事调查当中仍然属于较新的一种应用，因此，很难将名字和显著的事实进行交叉比对，以看出它们是否多于一次地出现在侦查当中。因为这个原因，皮奇福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哪怕他最终看来出现在三个不同的索引当中：住户名单、性犯罪前科和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非住院病人名单，1980年他曾因暴露癖而被地方法官判入该院治疗。

他自16岁起便在莱斯特的汉弗郡面包房工作，19岁的时候与未婚妻卡洛尔见面，因两人都是莱斯特市班纳多斯儿童之家的志愿工作者。他们的儿子于1983年出生，之后，卡洛尔就想搬出城去，并选择了小索普区，因为她父亲就住在纳波罗区。

1987年1月，皮奇福克收到一份血样提取通知，因为他没有报告，两个星期后又寄来了一份提醒通知。为免这件事情引起警方更大怀疑，1月27日星期二晚上，一份血样和唾液样本送到了戴恩米尔学校。一本护照和驾驶证当作身份证明也提交出来。

检测结果出来后，一封信送到海巴恩克罗斯区的一栋房子，说柯林·皮奇福克的检测结果呈阴性，这就使他免除了接受凶案调查的责任。

到4月份，凶案组完成了近4000份成年男性和少年的血检工作，但是，检测工作仍然拖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回馈率为98%，远远超过预期的结果，但是，可能的样本提供者的人数还在增长，费用也在往上猛窜。

整个行动持续了一个夏天，有活动采血车在各处住宅区和工厂转动，但不久之后，凶案组就给撤回了，媒体开始提出一些问题，说这是不是对警力和纳税人的钱财的极大浪费。

大卫·贝克需要休息了，事情正好就在8月1号发生了。汉弗雷郡面包房一名24岁的烤炉工艾恩·凯利跟几个工友在莱斯特的一处酒吧里喝酒，谈话转向了柯林·皮奇福克。

"柯林让我替他做血检。"凯利说。

"检测什么?"

"就是凶案质询用的血检。"

凯利解释说,皮奇福克给他编了个故事,说他已经替另外一个人做了血检,是替一个在年轻时曾因为暴露癖而出了麻烦的朋友做的。他解释说,第一个姑娘被杀时,他并不住在那个区,因此,他以为警方不会让他参加检测的。

6个星期后,一位听过那次谈话的面包房经理向当地一名警察报告了这个情况。这条信息传到了凶案组,然后拿每户的户籍文件上的签字与血检表上的签字进行比对,发现两者不符。

9月19日星期六,凯利在家中被逮捕,并立即承认了为皮奇福克做血检的事实。他解释说,柯林割下了他自己的照片,然后用他的护照照片予以替代,完了开车送他到学校,抽血的时候他在外面等着。

凯利因为企图干扰司法进程的共谋罪而受到起诉,同时,下午5点45分,刑警来到小索普的海巴恩克罗斯住宅区的那栋房子拘留了柯林·波奇福克。一名刑警宣布了他的权利之后问到:"为什么是多恩·阿什沃丝?"

面包师耸耸肩:"机会。她在那里,我也在那里。"

对于我协助进行的调查,因为没有正式的联络,因此,调查结果如何我一点不知道也不是什么意外之事。在这个案子当中,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发现柯林·皮奇福克被逮捕和审讯的细节。大卫·贝克请我去参加莱斯特警察总队的晚宴,有一批肩饰顶铜衬的要员出席,这样的会议一年要进行好几次。

皮奇福克的坦白据说"冷漠无情",毫无忏悔的意思。1983年11月21号,他送妻子去了学校,然后开车四处跑,想找一些妇女暴露自己的性器。他从莱斯特开往纳波罗区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就放在车后座的手提式婴儿床上。然后,他的车在卡尔顿·海斯医院旁边向北转向了森林路。

他碰到琳达一个人朝恩德比区走,然后就在通向伍德兰日间医院的车道上停下车来。然后他在街灯下等着琳达过来。他暴露了自己,以为她会朝恩德比区跑的,但是,琳达向回跑向黑渣路,然后跑向了暗处。

皮奇福克坦白说："这是我对暴露癖所不了解的地方。百分之一的人会吓得要死，然后尖叫起来，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别的所有人只是从你旁边经过而已。她们从你身旁走过，根本就不理睬你。但是，她转向跑到了黑暗的人行道。她自己跑到了一个角落里……她的两大错误是跑到了人行道，还说'你妻子怎么办？'她看到我手指上的结婚戒指了。"

他说，琳达试图跟我谈话，想让我不要强奸她。她自己脱了一部分衣服，吓得半死，根本无法尖叫，也无力反抗。皮奇福克说自己完全插入了她体内，但又因为暗示他早泄而生气了。

他还说，插在她体内的时候他就开始扼她的脖子了，这与后来发现的事实不符，但也许是他幻想的关键部分。

皮奇福克以前见过多恩·阿什沃丝，是他骑摩托出去买做糕饼的佐料时碰到的。她刚巧走过爱德华王子大道，然后进入十塘胡同。他停下摩托车跟上去了。

"没有人看见过我。我想他们看见过别的很多人，但是没有看见我。我就在大白天里，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工作服，还有一件绿色的尼龙派克上衣。"

他跟在她身后顺着小路走，然后加大脚步赶上去。他回转身来，迫使多恩朝农场大门走，用手捂住她的嘴，并将她朝田里推。门上的挂钩掉了。

皮奇福克根本不理她别强奸的请求。之后她坐起来说："你完了没有？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了。请走吧。"

然后他用手臂在身后扼住她的咽喉。

在整个问询期间，不管怎么提问，皮奇福克都否认曾鸡奸过多恩。他解释说，他所做的事情都描绘得非常清晰，每一个细节都说了，但坚持说自己事后根本都没有碰过她的身体，也没有想办法掩盖她。这与多恩被发现时的样子和她承受的伤害情况不一致。贝克因为这些明显的不一致而困惑，留下一大堆问号，但是，因为抓到了这个人他还是举手干了一杯，在整个审讯期间，他一直都称这个人是"密友"。

如果我想学点什么东西，如果我想了解警方审讯的整体情况，贝

克已经给了我一个机会，而且干得很不错。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如此透明地做好这件事，也不会解释得如此透彻。但是，他也的确有需要道歉的一件事。

"你给我们的建议，其中一些我们没有认真看待，"他说，"你告诉我们说杀人者以前应该有较轻的性犯罪记录。这一点我没有听。你是对的。"

5 局中局：狐狸与猎犬

1988年8月，一封打印好的信件寄至莱斯特郡麦尔顿莫布里的佩迪格里宠物食品公司总部，信是给执行董事约翰·西蒙斯先生收的。这封信贴在一盒狗食罐上。从外面看，这盒狗食罐与每年销售的上百万盒别的狗食罐没有任何差别，说实在话，与码在我的食品间里面的狗食也没有差别。

这是一项给佩迪格里宠物公司的勒令，你们每年必须支付10万英镑才能够保证你们的产品不至受到毒物的污染。

附带的一罐"佩迪之友"已经混入有毒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是经过特别选择的，它们是一些无色、无味和剧毒的化学毒素。一般的宠物主人喂食之前几乎看不出来。

如果玛斯集团佩迪宠物食品公司到时不付款，一大批类似的食罐都会染上毒剂，并将出现在全英国零售商的货架上。

一开始，只有佩迪之友狗食会投毒。如果那种产品的销售剧降，而且支付的款项没有按时拨出，则另一种产品又会受到破坏。这个过程会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款项按时付出，或者你们公司倒闭。这家公司的命运会成为别的宠物食品制造商的样板……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几乎所有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偶尔都会接到这样愤怒的信件或者要面临如此粗鲁的敲诈举动。一些制造公司的员工、生气的客户和经营不善的供应商、嫉妒的竞争对

手——有动机的人太多，但是，这些威胁很少是真正兑了现的。

但是，这次不同了，随附的产品已经被打开，里面掺了毒药，还有商标盖住了切口。事情做得很有技巧，掩盖得不错，根本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切口。

这封讹诈信所提出的警告是：全国各地的超市里每天将有五罐食品受到毒素污染，媒体将接到加密电话。总共索要 50 万英镑，每次支付 10 万英镑，接受账户为不同的建筑合作社账户，户名以后再通知。

"如果你的公司同意支付，应该在《每日电讯》报的个人栏目登载一个声明，就写'亲爱的桑德拉，生日快乐。爱你的约翰'，"那封信说。

"桑德拉和约翰"是佩迪公司的代码，而敲诈者也将在所有信件和电话呼叫中使用"罗密欧和朱莉叶"这个代码。他的最后期限是 1988 年 12 月 1 日。

大卫·贝克打来电话，当时我在家剪草坪。我的心一沉。我很喜欢贝克，但是，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想到一些恶性犯罪的情景。虽然我极希望能够助一臂之力，但是，除开结尾之外，我可以说里面没有半点东西是自己真正喜欢的。

也许贝克感觉到了我的不安，因为他很快说明，这次没有人死掉，也没有人被强奸了。哪怕如此，他声音里面透露出来的着急味道也还是能嗅出来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到了他的办公室。

"三个问题，保罗，"他说，一边在他面前乱翻一堆文件，找出了那封讹诈信，"其一，这是当真的吗？其二，干这件事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其三，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

助理警长马尔科姆·卡恩斯隔着桌子坐在贝克、艾恩·利西和警督迪姆·加纳对面。仔细观察这几个警官之间的相互动作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警方的层次秩序尽管很灵活，但也是极具权威性的，在一个房间里立即可以认出更高级别的长官，因为人人都称其为"先生"、"老板"或"长官"。

在这个案子里，麦尔柯姆·卡恩斯是 ACC（助理警长），他是贝克的上司，但是，他是一个制定政策的人和管理人，而不是一个有经验

的刑事调查人员。他没有贝克的内行经验，也没有绝招，但是，他仍然必须做出主持会议的样子。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相互作用。

让卡恩斯到这里来就自动表明了这是件不同的案子。它给我的一种怪异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哪个杀人者脱逃在外。然后我又意识到，如果有杀人者，则感觉起来是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犯罪行为已经发生，现在必须解开它——而一种敲诈行为也是很紧急的，因为这样的犯罪行为仍然在进行当中。

贝克将敲诈信放在桌子上。我研究了里面的语言和句子的构造。有一些公式可以用来估计写信的人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看看布局谋篇和构造就有可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来自特别的背景，因为它们会显出一个人的某种风格来。这有点像我自己的情形。我经常为法庭写一大堆心理报告，然后发现自己的私人信件开头的地方读起来也像司法文件。

"这是一个疯子还是一个怪人?"卡恩斯问道，"我们应不应该拿它当真?"

根据这封信透露出来的智力水平，我看不出写信的人有任何"发疯"的地方。这里面看不出有任何心理问题，没有狂热的政治企图或集体惩罚意图，也不像有跟音联系（前面一个词刺激接下来的一个词，而不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意义为准）。有心理疾病的人写东西的时候，根据所患疾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他们经常一开始就提出一个特别的话题，然后，随着句子的进展，这个话题不见了，接下来的词或者短语是由前面的一个短语来决定的。

"根据该公司的规模，这是极有可能付得起的一笔钱，"我说，一边看着那个50万英镑的勒索金额。"既不是高得惊人，也不是小得不值得动心思和冒风险的一笔钱。关于这种纸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吗?"

贝克说："这种纸到处都有，因为信是复印的，因此我们不准备去找油墨了，但会在几天之内确定打印机的牌子。"

所有这些都表明，讹诈者对调查程序很清楚。他还做过调查，因为信是直接写给约翰·西蒙斯而不是直接写给"高级官员"或"执行董事"的。

投了毒的罐子仍然留在警方化验室里，但看来不太可能是在生

产过程中投的毒。该产品是购买来的，然后由某个会用烙铁，而且会用浸泡法或蒸汽法松开标签的人投的毒。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明确："这不是一场游戏，我是当真的，你们已经接到警告了。"

我拿走了一份复印件，还有我当时记的摘要，并说想好后再回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如果讹诈者说的话兑了现，则我一定会明白更多事情。

保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哪怕跟玛丽莲也没有说起过，当然，她看见我把一罐罐的佩迪格里之友从食品橱里搬出来的时候大感异常。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真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这一阵子换个牌子好不好? 没有任何问题。"

两天之后，我回到莱斯特警署，列出了讹诈者的心理特征。从智力上看，他处在平均水平，或者略高于平均水平，受过普通的高中教育，但可能没有上过大学。这从信中所用结构和语言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看得出仔细认真和事先预备的痕迹，看得出他的毅力和决心。有人花时间进行切割和重新封合食品罐的实验，直到找出正确的方法为止。这表明他是更成熟的一种人——有耐心去计划和探索，是一个有反侦察知识和了解司法线索的人干的。

关于这封信的作者的一切都指明这是一个非结伙的人。信里面的词语和结构有独特的风格，好像是一个人写的，而不是有好几个人同时在那里提建议。另外，参与这次行动的人数越多，风险也就越大。

"最大的动机是出自贪婪，这是明白无误的。他有可能喜欢做游戏，但是，他不喜欢修饰，也不愿使事情太复杂化。"

我讲完之后，贝克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次调查活动的管理小组，以便对一些重要步骤提供及时的建议。这是新的重要的一步。5年之前，当我就卡洛琳·奥斯本的谋杀者第一次给贝克提出心理分析时，他只是想明白他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现在说明，有人明白心理分析不仅仅能够透露出作案者的一些情况了，这样的分析有助于预测这样的人下一步会干什么。

佩迪格里危机管理小组来到了这个房间。彬彬有礼的约翰·西蒙斯坐在中间，旁边是那家公司的一位公关部经理，他跟每个人都使劲握手，小心地照料这个房间里面的事情。还有一位企业律师，他的潜力超过所有人的影响力。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佩迪格里跟警察局有不同的时间表。对贝克和他的人马来说，第一重要的是要保护公众，找到勒索者。公司也想保护公众，但同时还必须额外负起对董事会和股东的责任。商业上的含义差不多是明摆着的。

佩迪格里公司是玛斯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玛斯集团是一家大型国际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哪怕如此，佩迪格里公司也有行动自由，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且很快付诸行动，而不需要花很长时间与海外联系。这就使实施战略速度更快，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调转航向。

"威胁是否认真?"西蒙斯说，直接说到最重要的问题。

"是的，当真。"

"好吧，我们现在干什么?"

"嗯，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要务是保证不要有任何人因此受伤。"

"我同意，"西蒙斯说，"我们还不能够让客户受到惊吓。"

贝克总结说："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决策。"

西蒙斯问到这种可能性：如果讹诈者的要求没有人理睬，他会不会就此罢手。

"我不这么认为。"我告诉他说。

"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样做也不好，"贝克说，"有人在我们这里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而他仍然逍遥法外。如果让他跑掉，他下次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话题谈到安全方面，还有防止投了毒的食品罐摆上货架的可能办法。佩迪格里公司和警方已经与各大零售渠道谈到了在大型超市里的安全措施问题。不幸的是，安全措施与让商店成为大众爱去购物的地方之间有冲突。你不能够将一个品牌放在柜台底下等顾客来要这种产品——他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

西蒙斯说："我们这么看看吧，大家把每一罐佩迪格里之友都从

架子上拿下来。也许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干什么?"

公关部的人直摇头:"我们每年花数以百万计的英镑确立我们的品牌形象。我们处在一个竞争极严酷的市场,客户的信心和忠诚是最为关键的。只需要打击一次,这类的事件就有可能让公司倒退好多年。如果货架上拿走了这种产品,客户会转向别的产品,他们不会忘记的。"

"从货架上拿走产品不是办法,"我说,"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他只需要另找一种产品就可以了。这样你斗不赢他。你能够做的一切就是满足他的威胁。"

他们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佩迪格里公司的顾问提到了可能的反响。"如果他当真按威胁的做了,我们其中一个客户损失一个宠物,如果我们默不出声,则会面临对抗性反应。"

"正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必须将商业风险与实际投毒的风险放在一起衡量,然后再想一个办法来将所有这些平衡起来,"我说,"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个人投毒,同时又要诱他出笼,好让警方抓住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与他接触,并与他谈判。"

我看得出来,他们不太喜欢这个点子。

"目前他正在定调子。你们得让他保持在暗处,然后慢慢使他转过身来。让他相信你们是合作的,但也有一个限度——不是你们选择的限制条件,而是你们无法控制的一些东西。只要通过特别的办法在具体的一个水平上满足他的要求,你们就可以使他的期望值降下来。"

西蒙斯问:"那么说是要让警方来接触了?"

"不。由佩迪格里公司来做接触工作。敲诈者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介入。"

公司的律师表达出对付钱之事的担心,而且还担心为未来的类似事件做出危险的先例。

"是否选择支付一点什么东西的决定由贵公司和警方来决定。如果你们说绝对不,那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个人以某种方法实施方案。这是你们决定的事情。

"我建议各位支付有限的一笔钱,足以保持他继续把游戏玩下

去，并阻止他实施投毒计划。但是，你们无法完全按照这个办法行事，你们在玩游戏，但并不是完全按照他所希望的规则来，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你们很抱歉，你们在努力想办法……就是这类的拖法。

“目前为止他控制着大部分局面，但是，慢慢地，我们可以从他手中夺回控制权，只要我们能够与他保持游戏就行。”

西蒙斯问：“我们怎么做呢？”

“你们什么都不做，”贝克说，“我们替你来做。我们在报纸上登出广告，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在佩迪格里公司开一条专用电话线。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来打电话。”

8月31日，《每日电讯》报的个人栏目登出了下述文字：“桑德拉，生日快乐亲爱的。希望帮忙，希望谈谈，电话0674××××。爱你的约翰。”

第二封信到了，这次提供了一个账户单子，是哈里法克斯、阿比国民公司和全国建筑合作社的账户。各个账户都用约翰和桑德拉·诺尔曼的联合户名开的，开户时间为1986年9月开始以后的两个月。储蓄本、现金提取卡和个人身份号都送到了伦敦西区汉莫史密斯区的一个住宅区的地址。

这就使一个全新的因素又必须予以考虑了。全国共有数以千计的自动提款机，客户一天允许从每个帐号提取最多300英镑的款项。

讹诈者可从任何地方提取存款，可从数千处不同地点的机器里提取完账上的钱。他可以让别人替他取款，也许是让一组人替他提款。分支机构多得惊人。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敲诈者最危险的时刻就是那个提款的时候——有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时间，他必须露出自己的面貌才能够拿到钱。这次，共有数千处提款地点。警方如何才能够把所有提款地点都守候起来？这个作案想法真是一个创举。

大卫·贝克将细节告诉我以后，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不安。他以前的很多想法都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当那个人提款的时候，他就能够抓住他。

但是，也有有利的一面。你不能通过自动取款机获取大量钱财。对于一个希望拿到50万英镑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数万次提款。每次他输入个人身份数字的时候，计算机都会准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时间他在哪里，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跟踪他，并了解他的行动方式。

这个人已经显示出了解警方收集信息的方式，他明白帐号会被跟踪，也能够找到谁开的账户。因此，他是通过邮件来开的账户，也不需要自己亲自到一个分支机构去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被摄像机拍下来。他还明白住宅区的地址，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出入这里的人或者还可以请人为你拿东西。在两年的计划当中，他做了一整套的死环设计。这是极漂亮的一个设计，很棘手。

"我们以前见过这样的事。"贝克说。

"在哪里？"

"在诺福克。有人盯上了养火鸡的伯纳德·马修斯。敲诈者索要5万英镑，并用了差不多是同样的汇款单——用假名和假地址开的建筑合作社账户，也用了现金卡，全套的东西。后来的监视成了他做的一场恶梦。"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是非常小心，径直去了同一台取款机。我们就是这样抓住他的。"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关了起来，判了6年。"

贝克马上想到了我的下一个问题。"据我们所知，他是一个人干的。"他说。他还补充说："审判官拒绝让这个计划的细节公之于众，因为他说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这就是说，有人独自想出了这个点子，或者有人发现了这个结果。"

"正是。"

警方派往佩迪格里公司的谈判者在等待时机，他们想办法拖延时间，并因为延迟而道歉。他们没有让步，也没有向敲诈者挑战。他们用的一些话是像："是的，我们明白你的情形，但是，你们也必须明白我们的情形。我们对你是很认真的，我可以保证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将10万英镑存进一个账户里，有人会提出一些问题来——税务官、我们的会计、集团的董事会。我们得让这事悄悄进行，你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们得小心行事。"

又交换了一些信息，到10月28号，分成五批受控制付款的第一

批进入了诺尔曼的帐户。在接下来的7个星期里，共有5.6万英镑存进了账户，但警方想办法堵住了大部分帐户，这样，钱就只能从哈里法克建筑合作社的投资账户中提取了。控制的平衡已经开始慢慢转移了。

当然，佩迪格里公司否认自己明白哪些账户有问题，它们告诉敲诈者说，这显然是建筑合作社那一方出了问题。他们不能够打电话去问出了什么问题——这次敲诈行为是秘密进行的。同时，莱斯特警方正在组织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秘密监视活动。这次行动代号为"蟑螂"，涉及来自各地区的数百名刑警，他们守候在哈里法克斯分理处的各个现金取款机旁。哪怕动用了如此巨大的警力，还是不可能覆盖所有的现金取款机。

同时，建筑合作社的主计算机也特别加进了一个程序，相关密码输入以后，计算机的反应会慢下来，并立即提醒警方。

第一批款项存入的一个星期后，有人从伦敦南部里丁的一处现金提款机提走了300英镑。之后，北到格拉斯哥，南至艾克斯特，西至威尔士的阿伯里斯多威斯的现金提款机几乎每天都有人提款。大部分提款时间都在晚11点以后。

"他是不打算从同一台机器里提两次款了，"贝克说。他虽然没有感到惊讶，但明显非常失望。很快抓住罪犯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但是，仍然有一些好的迹象出现。目前还没有发现投毒事件，罪犯每提一次款都冒了一次被守候人员抓住的风险。

由于提款的地理分布极广泛，使人联想到这有可能是一个团体而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干。一个人能够覆盖这么大的范围吗？

在我家的办公室里，我打开了英国地图，将每次提款的地方标出来。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敲诈者在达尔斯顿、阿伯里斯迪威斯和布里斯托尔这样一些地方是连续提款。几乎就像一个电路一样一直带他回到伦敦，因为伦敦有数处提款机被他提过款。根据汽车路线来分析，我推算一个人是有可能使用这么一个提款法的，而且如果是这样，则他有可能住在伦敦附近，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细节，因此无法准确地说出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关于这个人我还知道一些什么呢？他不是一个年轻的罪犯，不是23岁的人。不，他是个完全成熟的人，能够作出正常的反应，而且

极有耐心。他等了两年来启动自己的计划，而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两年看起来就像一辈子一样长。

他有晚上旅行的自由，因此他不用去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否则，他就必须请病假或者要求休假，而这又会引起别人注意。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没有工作，退了休或者做一种倒班的工作。他有可能没有结婚，也不太可能跟别人住在一起。他必须回答太多的问题才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晚间外出，还有钱从何处来。

查看他留下来的一些迹象，跟我以前处理的一些警方案件不同。这里没有犯罪现场可供分析，事件不是一个有倒错心理或性变态的人一时犯下的滔天大罪，也不是找情感或者性满足，这名罪犯是在贪婪的动机下作案的。

每一个夜盗、银行抢劫者、绑架者、盗用公款者、强奸犯、恐怖分子或故意破坏者都是一个独特的人。不管好坏，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每次我询问某个人，或者警方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对付的都是不同的人，我在诊室里要会见或者在一桩犯罪行为当中要发现的都是不同的一个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付受贪婪或报复心理驱动的人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他们都不难理解，他们跟我们其余的这些人都更接近一些。我们能够理解动机，而面对一个有施虐狂或者受虐狂冲动的精神病人，一个可以强奸和肢解另一个人的人，却是相当费脑筋的一件事。

存进哈里法克斯账户里的钱每次提完之后，威胁也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刺耳。敲诈者越来越生气，对一些借口也烦了，最后终于打了电话给艾塞克斯郡巴塞尔顿的一家超市打了电话，时间是12月6号。一个男性声音对办公室的一个文员说，有一罐佩迪格里之友已经被投了毒。

那只罐子已经被切开，是用破刀片划开的，放回货架之前重新封好了。所幸上面明确标出"已投毒"的字样。

圣诞节前，赫福德郡的罗依斯顿的一家超市和牛津附近的赫福德山的一家超市又出现了两次投毒事件。这次又有警告电话打给商店和警方。

我发现这件事极有趣。拖长一段时间以后，敲诈者都会等得不

耐烦并开始谈判，然后就走开了。或者他又随便起来，然后犯一个错误。当控制权慢慢从他手里夺走后，他对事情的控制能力比他开始想像的小得多了，他就开始退出。我们这边的人都没有露出这样的迹象。敲诈者几乎是想挑战所有的不同场景，每当警方觉得已经把住了敲诈者的龙脉的时候，他就重新弄点新名堂出来。

“他这是想夺回控制权。”我在管理委员会的一次极困难的会上说。

“可是，你说过我们能够让他停止投毒的。”佩迪格里公司的公关部长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个人从一开始起就准备好了他的每一个步骤。他明白佩迪格里公司会对商业威胁做出反应。他认为他能够将你们的信心磨垮，然后让他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

约翰·西蒙斯看上去心情暗淡，我知道他们都累了。

“他最后一定会继续动手的，”我说，“如果他因为提不出大笔款项而心烦，也因为在全国到处跑而筋疲力尽了，他会找到一个新目标。目前他正在思考。‘这个办法有效，我可以对任何人使用这个办法。’”

圣诞节前不久，筹码提高了，敲诈者说，除非50万英镑立即全额到位，否则他会向媒体批露英国超级市场货架上有投毒食品的事件。佩迪格里公司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场风暴的中心。他们到底是公开声明还是保守秘密？他们是付钱还是像放水一样慢慢往账户里一笔笔地放钱？我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他已经有能力这么做了，这是有所准备的演示。我认为你们应该与他保持接触。除非你们说‘滚一边去吧，你一分钱也拿不到’，否则，他就不会实施威胁。你们任何时候对他说那样的话，他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实施投毒，预先不会有任何警告。如果你们不收回产品，如果你们不公开声明，他会觉得他自己占了上风，因此就会继续施加压力拿钱。”

佩迪格里公司稳住了神。

同时，每日的提款还在进行当中，每次都被建筑合作社的中央主机监测到了。在伦敦，提款处大部分分布在泰晤士河以北，从西点一直延伸到艾克塞斯郡的一些可乘车往返的城市里，比如吉林汉姆和索斯恩德。仔细地研究过这个模式以后，我推断这个敲诈者有可能

住在市中心，因此我对这个提款地点进行了一番数学计算。结果他应该在霍恩切奇区，就是稍稍靠近伦敦东部的那个区。

蟑螂行动的代价越来越高了。哪怕有庞大的侦探队伍成对工作，任何一个时间段里能够被覆盖到的取款机还不到一半。因为这样一种取款模式，只有英格兰南部的哈里法斯取款处一个星期盯上两天，也就是星期一和星期四，从银行关门到凌晨1点。

这样的情形从1月持续到2月，一个星期的费用约在100万英镑，但是，敲诈者好像总是先走一步。令人万分惊讶的是，他从来都不去受监视的机器里取款。每次警察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会默不出声。为什么？

为什么英国历史上最昂贵和最广泛的监视行动竟然无法抓住一点能够透露作案者身份的线索？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这个事实。

到3月开始的时候，索要的金额已经升到了125万英镑，投毒的数量也上升到了14罐——每次都有事先的警告。敲诈者已经提到了1.8万英镑，钱又快取完了，他没有再进行威胁，也没有再次投毒，反过来，他默不出声了。

我觉得大卫·贝克和他的人马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觉。一方面他们控制住了敲诈者，同时，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只付出了极小的一部分金额，因此他们感到极大的满足。这家公司得到了保护。事实上，除开抓住罪犯以外，其他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他放弃自己的活动，要么再找个公司来敲诈。

3月12日，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可能促使他下定决心了。一家全国性报纸不顾莱斯特郡警方的反对，透露出一家不知名的宠物食品公司受到讹诈，还有警方进行秘密行动的消息。敲诈者这才明白，警方从一开始便介入了这次行动。

大卫·贝克和麦尔科姆·卡恩斯对有人向记者泄露行动消息非常生气。长期进行的秘密行动现在完全泡了汤，敲诈者现在只好去找一个新的目标了。

10天之后，他果真就这么干了。无可争辩的是，只有一种产品一定能够比宠物食品更能触动消费者的心灵，而他选择的正好就是

这一产品：婴儿食品。

世界最大食品制造商之一亨氏有限公司收到一封要求30万英镑的勒索信件，否则，该公司"将在全部产品系列受到致命物质的攻击并在公众抵制后受到无法挽回的毁灭性打击。在我们完成这些事情之前，将发生无以数计的致死事件"。这次他又要求通过《每日电讯》来传递消息。

同一天，一罐亨氏奶粉经邮局到达莱斯特警方。这罐奶粉已经装入了苛性钠，随附的信件说："这次我们得保证有人购买产品。然后，如果一次死人事件对你们来说不够，我们会继续下去。"调查新的一次威胁的任务属于苏格兰场派出来的东英格兰南区的地区刑侦组，他们立即与莱斯特警方取得了联系。

大卫·贝克给我打了电话："他又露面了，并找到了另一个目标——亨氏奶粉。我们将去苏格兰场参加一次会议。我希望你也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搭早班车出发，有我和贝克、麦尔科姆·卡恩斯、迪姆·加纳。我们在餐车进了早餐，然后讨论政策问题。卡恩担心，大都会的警方会接过调查案。一般来说，如果调查活动涉及不止一个区，则最开始的那个区会得到领导权。

"大都会一定会想办法接管这个案子，"他说，急急忙忙地吃完了一份吐司，"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我们的调查案——关于这个人我们掌握的情况更多。我们应该成为领头的警方。"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抓住他。"贝克提醒他说。

"是啊，是啊，那是当然，但是我不想让这个案子给人夺走。事情是在这里发生的。我们应该领头处理这事。"

我感觉到这里在赌地位，而且感觉到大都会警察局总是假定，比较起乡下的那些"木脑袋"来说，他们总处在更具精华的队伍中。

不管这些争权夺利的谈话如何，当我们走进新英格兰场的会议室的时候，几秒钟就明白了谁在负责此事。在桌子最前面的地方等候的是麦尔柯姆·康贝尔中校和警督大卫·塔克。含义非常明确——我们处在他们的辖区内。这是他们进行的调查，而且他们已经支起了帐篷。

我挨着卡恩斯和贝克坐在桌子的一头。两边各坐着亨氏公司和

佩迪格里公司的代表，两个代表都有法律顾问、市场推广人员和极有活力的公关人员。在桌子的末尾坐着一位年轻人，他看上去极聪明的样子，衣服穿得有板有眼，注意力很集中，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风险控制公司来的人，这是一家安全防卫公司，专事反恐怖、人质谈判和个人保护工作。亨氏公司请他来做顾问。

会议室的窗户沿一边排开，可以看到窗外周围的屋顶，尽管景色被玻璃上的抗裂涂层遮住了一些。仅在两个星期之前，安全部门就粉碎了一起暗杀首相的恐怖主义企图，他们在斯卡伯罗区发现了一个储藏炸药的地方，离撒切尔夫人去保守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话的地点不远。

康贝尔中校做了案情介绍，并请贝克详细介绍莱斯特郡进行的整个行动的详细情况。毫不奇怪，佩迪格里小组看来放松多了，而亨氏公司却特别小心。每当问题涉及商业上的考虑、以前的威胁或安全措施时，那些商人就沉默不语了，特别是亨氏公司。

我意识到房间里有两种张力，一是桌子对面的警方的紧张，而更有趣的是面对面坐着两家公司。那情形有点像在一次团体治疗房间。事情办得不好，但谁也不愿说什么。

最后，我忍不住了。"对不起。不知道是我一个人看出来了还是大家都明白，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得想办法把事情谈出来。"

房间里一片沉默。

约翰·西蒙斯讲话了："他是对的。"他看了看桌子对面来自亨氏公司的同事，"问题在于，我的母公司与亨氏公司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我不能到这里来了以后，仅仅把一些机密的公司材料放在桌上，因为这些材料可被竞争对手加以利用。"

亨氏公司那边有了动静："我们也有类似的考虑。"

康贝尔中校甚感震惊，看上去准备将几个头脑碰到一起去了，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各位先生，我们在对付的是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些人已经经历了这些事情，"他指着佩迪公司的人说，"事情一直进行得不错，他们尽最大努力掌握了这个人的情况。现在，他在威胁着要向婴儿投毒，而且，我尽最大努力体量公司间各

种微妙的竞争,但是,我无法让任何事情挡在这次调查活动当中,因为一些人的生命已经处在危险之中。如果这件事情办砸了,我们手上将躺上几具死亡婴儿的尸体,而且,除非我得到完全的合作,否则,你们都将为此承担一些责任。"

这样一个严厉的警告一般来说会立即产生效果,但是,这些人都是做国际买卖的商人,他们在众人之中爬上了顶峰。他们是些武断的人,极聪明的人,有分析能力的人和极有动机的人,对他们来说,按照商业意义上讲的风险评估是他们每天都做的事情。他们必须得到满足,即我们这个桌上其他的人都不能够因为一只纸老虎而吓趴下了。从他们的角度看,警方如果说"清除货架,召开记者招待会,把你们最难获取的公司机密放到桌上来"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弄错了,数千人的工作就处在风险当中,数以百万英镑计的损失会发生。

需要我来打破僵局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一个妥协方案终于达成了。谢天谢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在房间内,可以现场做出决定。最终,各方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大家都把最高的商业机密和资源拿出来,只要有利于侦破就行。作为回报,所提供的一切情报都不能用于获取商业优势。

最终,会议回到了实际问题。亨氏公司的人员并不了解我。我是位国民医疗服务处的心理学家,但却在这里告诉他们拿这次威胁当真,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他们有来自风险控制公司的顾问,也许还遇到过很多讹诈活动,大部分还都是老手而不是新手干的。

但是,安全顾问光是保护客户而不管别的人,他们一个星期要拿走数千英镑的报酬。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子,但却被警方请来这里了解所有的情况。

思考过各种各样的选择之后,我提议说,应该利用跟以前一样的办法,我们应该表现得只给这人足够让他围着转的钱就行了,同时想办法把控制权从他手中夺回来。我们对他已经掌握了很多——他可能的年龄、他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活动规律。

约在下午 6 点,会议结束了,公司的人出门向电梯走去。虽然他们都表现出合作精神,但是,我无法想像他们会一起到当地的一家酒

吧去喝啤酒。下楼之后，司机可能在等着将他们拉走。

康贝尔中校邀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他打开一个小柜子，拿出了半打玻璃杯和非常漂亮的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忙乱了一天，我们都默不出声地坐着，闷头啜饮。

我有些话想说，但又不能当着佩迪格里或亨氏公司的人说，因为这话里面有别的含义。

“吐出来吧。”康贝尔说，他朝后躺着，把玻璃杯搁在他的膝盖上。

“是关于我们这一方的人。我觉得他是，或者过去是一个警官。”

沉默有了新的意义。塔克摇起头来。

“真是没有想到。”康贝尔怀疑不定。

我继续说了下去：“这次行动当中的一切都表明他对警方调查罪案的情况非常熟悉——警方是如何监测账户提取情况，如何跟踪电话，如何辨别产品是在哪里买的。所以他利用普通就能够获取的纸张首先复印信件，他甚至连纤维都没有留下一根。更重要的是，每次有重大的监视行动开始时，他都会钻进地下。看起来就好像他知道哪些日子和哪些机器受到了监控。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的？”

利用多个现金提款机获得讹诈所得钱财的方法，一直都还是个机密，审判官决定保密，是因为防止有人以类似方法作案。现在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人刚好碰巧也想到了这个主意，要么就是作为一名警官，他更有可能了解详情。”

我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警察当中存在很大的忠诚，这样的想法不太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也无法想像自己当中的一个人反了水。感谢康贝尔，他让我继续说下去，并鼓励我把更多理论说出来。

“在某种时候，他是大都会的人，而且级别还在警督之上，”我说，“他已经展示出对犯罪和犯罪调查方法的理解。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搞钱的方式，但是，他还喜欢将这样的理解放在一起自娱自乐。这几乎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艺术形式。”

“他非常小心，但他在警界干得并不顺心。他认为他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停滞不前，他抱怨自己的上司。他把这次行动扩大到全国规模，目的是要展示出他自己本来可以干得多么好的。

"他明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警方已经介入。他明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明白他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的警察经历告诉他,只需要一点点线索就可以送自己回老家。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自己会被捉住。他将用这一系列的行动来对付世界最大的一些公司,这会使他出名。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往日的同事和他的上司总会谈起这个大师级的罪犯,因为这名罪犯并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没有一点蛛丝马迹。

"根据他的活动情况,我可以说他有可能退了休,靠退休金生活,或者是请了病假。但是,他好像知道这么多正在进行的行动,因此,你们得注意有没有一个有内部接触的人。"

"我的天!"附近有一个人说。康贝尔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一点表情。

我知道自己说对了——所有的事实都支持我,但是,这样一个尴尬的情景却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

哪怕我们还在谈话的时候,投了毒的食品仍然还在超市的货架上。艾塞克斯郡凯尔姆斯福德一个农夫的妻子打开一罐婴儿奶粉的时候,被罐上的氢氧化钠(苛性钠)灼伤了脸和手指,那瓶奶粉是 4 月 8 日她从拉莱夫附近的一家圣伯里超市购买的。后来的检测证明,那罐奶粉里面用铜图钉投置了婴儿致死量 27 倍的毒素。里面还有一封信,是用针刺在戴诺泰普纸上的,上面写着:"有毒。本店还有三只未加标识的有毒罐。"两天之后,牛津柯雷的海伦·柯波克正在喂酸乳酪给 9 个月大的女儿吃。她告诉警方说:"我朝下看那个罐子,发现好像有些金属末一样的东西。我看看维克多莉亚,她好像在嚼什么东西。我打开她的嘴,发现一小片金属在她舌头上,结果发现是刀片的碎片。"

维克多莉亚的嘴在流血,她被带到了医院。在等待伤害情况报告时,柯波克夫人注意到罐里有个纸条,上面写着:"亨氏豆子及亨氏羹里也有毒。"

亨氏公司立即撤下了该超市货架上的产品。如果该公司曾考虑过这件事情是否当真,这次就应该没有怀疑了。

有各方参加的另一次会议安排好了,这次是在莱斯特警察总局。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亨氏公司不愿采纳在佩迪格里公司起过作用的

策略。该公司没有耐心了，根本不喜欢与敲诈者玩长达几个月的猫捉老鼠游戏。这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种。“我们从来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一次又一次有人问我：“他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如果我们不照他说的做，他会干什么？”到目前为止，针对佩迪格里和亨氏公司的每一次投毒活动都附带着一份警告信息和电话警告，给商店一个机会予以干涉。

“事情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有人问我，“或者他会不会升级？”

我可以在会议桌上感觉这种挫折感。“是的，”我回答，“他的行为是对你的行为的直接回答。如果你决定不理睬他、什么也不给他，他就会感觉到你让他别无选择了。他的骄傲感和所有的投入不可能让他什么也不干。”

我建议利用以前的方法，但是，亨氏公司好像态度很强硬，不愿展开谈判。“如果这样，你就得让事情公开，”我说，“如果你当众扇他的嘴巴，他就会实施他的计划，一个婴儿会死掉，两个婴儿会死掉……这会使你到达什么地方？这个人看来不准备浪费自己的时间。”

警方同意我的看法。他们最大的关心是要维护公众安全，没有人会在可能对亨氏公司造成的影响上表现出骑士精神。该公司的人员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他们知道市场，也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潜在的动不动就会造成数以百万英镑计的损失。

“这是个相当严峻的行动，我们得有十足的把握。”

“我有把握。”我说。

报界已经报道了数起投毒事件，但是，这些事件一律贴上了无关联事件的标签。直到4月26日星期二，事情才爆出头条来，《每日邮报》登载：“婴儿食品投毒讹诈。”同时，《晚间标准》报登载说：“发现更多危险食品罐。”

苏格兰场“出于行动原因”透露了最少量的信息，但是，这次公布事件以后引发了投毒报告的浪潮。当天下午，内政部大臣约翰·帕登对众议院说：“英国购物者处在令人惊骇的新的威胁当中，出现了‘消费恐怖主义’活动……很难想像这些思维扭曲的人竟然会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婴儿发出如此邪恶的攻击。”

亨氏公司的执行董事约翰·亨奇先生警告母亲们特别小心，并说

会在有投毒报告的地方撤下产品，并替代以全新的产品。

“撤下产品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人有可能明天再返回来，第二天再来，下个月再来，他会再干一次的。”

对我来说极不平常的是，我跟踪报纸上的事件报道，还有晚间的新闻报道。当这些故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时，一切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24小时之内，投毒报告的数量达到了24起，不仅仅影响到亨氏公司，而且还包括其竞争对手考盖特公司。到周末的时候，报告数量上升至300起，有3个人因为浪费警力和政府钱财而被逮捕。

警方相信，敲诈者只应对其中的两起报告负责，这两次都有明确的警告，而其他的都是照本宣科者和类似敲诈者的行为，或者只是一些误报。可悲的是，有人想趁火打劫，希望借机搞钱，出风头或者申报保险赔付。这正是两家公司和调查小组最担心的事情，但是，这也是警告公众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亨氏公司和考盖特公司悬赏10万英镑，同时内政部召集警方和两家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未来的对策。农业及渔业部的官员以及卫生和社会安全部的官员也都到场了。

一个接一个的零售点决定撤下亨氏产品，他们不愿承担风险。亨氏公司立场坚定，计划用防撬容器替代所有产品。这样的转换需要时间，而且要花费数以百万英镑计的钱财。

同时，警方也受到父母和消费团体的谴责，因为警方没有及时警告公众。当敲诈者已经被追踪达数月之久的消息公布时，人们的愤怒达到极致。

亨氏公司的一组高级管理人员从美国飞来主持公司的对策。泰德·史密斯先生是主管公司外交事务的经理，他从希思罗机场的协和飞机上走下来，痛斥向婴儿食品投毒的人为“暴徒和恐怖分子”。他发誓说，亨氏公司不会向敲诈者付一分钱。“我绝对愤怒万分，恶心透顶，”他说，“这些人是在向我们社会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也就是婴儿发出攻击。”

照本宣科和投毒浪潮以及诈骗活动席卷欧洲，类似的案子一直传到远至澳大利亚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伊利诺伊州的3家超市从货架上撤下了亨氏食品，因为有带孩子的人报告说在两罐食品中发现了大头针。公司报告说一个星期内损失掉2500万英镑，而且，尽管

公司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是，第一批防撬罐还是要到5月15日才能够到达超市。后来，报告称，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向美国董事会提交了报告，建议关闭亨氏公司在全英国的所有分公司，而这将使5000人失业。只有政治干预才能够挽救他们的工作。

亨氏公司继续坚持“不让步”的原则，他们既不收回产品，也不支付勒索款。因为这一点，敲诈者怒火万丈，给一些超市、警察局和媒体打了很多匿名电话，说将继续投毒，并扩大已经引起的恐慌。他的信件越来越有威胁性了。

“到目前为止，你们应该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了。一个婴儿的死亡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字，但至少我们不能够再被忽视了。”另一份信件警告说：“婴儿不会向他们的父母报告说那些产品已经不是平常的味道了。他们的生理系统也不那么容易恢复。”

同时，他的要求也在加码。已经不是一开始的一次性30万英镑了，他现在要求在5年之内每年都要付款，总共需要120万英镑。

到6月底，据说他已经在鲁顿、坦布里奇韦尔斯、雷莱、巴希尔顿、牛津、克罗依顿和罗依斯顿超市货架上刺穿了食品罐。在每个案子当中，商店和当地警方都接到了电话，但是，有位妇女几乎吃下了成人致死量5倍的氢氧化钠，毒液就投在亨氏减肥浓菜汤里面。

最后，公司接受了策略变化。以艾恩和尼纳·福克斯的名义在伍尔奇及全国省际建筑合作社开设的8个账户全都打开了。提现卡和密码寄送到了伦敦南部的数个住宅区。

这些地方都置于伦敦东区南部地区刑事组的全天候监视之下，行动代号为“刺痛”。这次还涉及苏格兰场请求的为时最长的一次媒体报道管制。敲诈者并不提取自己的邮件，警方的行动几乎要成为瞎胡闹了，正在此时，他却在9月5日与亨氏公司进行了接触。

敲诈者假装是另一个人，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故意包含一些拼写错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不识字的知情人而不是原来的敲诈者。这位“线人”说，他知道敲诈者的身份，但是，他不能够直接说出来，因为所涉及的人是一个“搞欺诈活动的条子”。如果公司支付他5万英镑，他愿意说出名字来。

这封信涉及警方调查的许多内幕情况，甚至还提到了“刺痛行动”这几个字眼，还有参与行动的数名高级警官。

现在可以毫不怀疑这名罪犯的内线了。他甚至有可能与非常接近这次调查行动的某个警察是同盟。

苏格兰场采取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也就是设了一个"局中局"，主要是为了阻止消息走漏。苏格兰场重案组的头目西蒙·克罗肖警监负责这次"防泄露"调查，他在苏格兰场之外设立了一处秘密总部。他只带了他信任的3名警官，这3个人都请了病假，另外40人是从特别行动组临时抽调来的。

现在有了两个调查小组，但是，敲诈者应该只知道其中一组。

同时，亨氏公司支付了1.9万英镑到了两个建筑合作社的账户上，这些账户是由"线人"指定的，而且，每日进行的提款活动从9月上旬开始。5个星期之后，这笔钱开始快速消失，而警方却一点也没有接近自己的目标。

到了10月中旬，也就是13号的星期五，克罗肖警监发动了代号为"阿金库尔"的一次终极行动。他选择了伦敦周围的15处伍尔奇现金提款机，布置人员在营业时间以外连续监视这些机器。特别行动组得到指令，他们应该在靠近机器，但又不被人看见的地方守候。讹诈者的现金卡插进机器的时候，计算机会注意到这次交易，提醒指挥室，监视组就会接到无线电信息，立即采取行动。

尽管科技发达，提款活动还在继续，到10月20号的早晨为止，已经有1.4万英镑被提走了，此时，敲诈者在伍尔奇合作社的恩弗尔德支行进行了他的第56次提款。

那天晚上，行动组碰到了很大困难——一场严重的电缆事故使伦敦区所有的提款机都出了故障。克罗肖和警督帕特·弗莱明决定继续坚持监视。午夜过后不久，派到伦敦北区恩弗尔德区的一台机器旁边守候的两名特别行动组的警官看到一个粗壮和灰胡子的男性将车停在了附近。

他接近了提款机，发现机器坏了，然后就往回走。

他为什么戴着头盔？其中一个警官问，因此就走上前去了。

向他提问的时候，那人说："没有问题，小伙子们，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是无辜的。"接着他就晕了。

第二天，报纸头条宣布一切都结束了。

"投毒事件告一段落——前刑警接受讹诈案调查。"这是《每日邮

报》登载的消息。"前警探因向食品投毒被逮捕。"这是《每日电讯》报的消息。

该报继续说:"一名前警探昨天因涉嫌150万英镑讹钱案和向亨氏及佩迪格里食品公司的食品投毒案而被逮捕。

"此人曾是基地在伦敦的地区刑事组队员,这个组自去年8月起一直在调查讹诈案。在伦敦东区北部的恩费尔德负责逮捕他的两名警官都与他很熟。在他因为健康原因而退休之前,他有一阵子归属帕特里克·弗兰明警督的领导之下,而弗莱明正好就是负责讹诈案的调查工作的。"

罗德雷·韦切娄43岁,他被带到帕丁顿格林警察局接受审讯。在他的皮夹内找到了现金提款卡,搜查他家后找到与账户相关的文件,一根注射器、钻头和氢氧化钠。如我所预料的,他住在艾塞克斯郡的霍恩切奇区。

从一开始起,韦切娄就拒绝合作,而且,因为他了解审讯技术和司法程序,审讯小组想法把每一个漏洞都堵了起来。慢慢地,这位"婴儿食品讹诈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透露出来。他1947年出生于赫克雷,通过了6个O级考试,并且为上赫克雷大学而学习过化学、物理学和数学,希望拿到A级考试成绩。但是,他学到一半便退学了。1967年他进了普莱塞电子公司,到1976年的时候,他已经爬到了一级工程师的位置。

在29岁的年龄,为了寻找新的挑战,他加入了大都会警察局,并证明是位相当出色的新警员,在海顿培训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很快通过了警官考试。后来,作为综合大道警察局的一名警探,他介入了迈克尔·法根突破白金汉宫并一路闯入女王卧室的调查案。

那是他的警察生涯快速起步的开始,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基地在伦敦东区巴金塞德的刑事小组。不幸的是,事情到此就不再有动静了。韦切娄相信他比自己的大部分高级官员都强,但感觉到自己无人赏识,因为他还不是共济会会员。

1986年7月,他参加了一次培训课,学习警方监视工作方面的高级技术。该门课程包括针对家禽饲养人伯纳德·马修斯的一次讹诈案的个案分析,作案人是23岁的微生物学家和正拼命挣扎的商人威廉·弗雷里。

这就是韦切娄从以前的讹诈案中学到的知识。所有的细节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包括弗雷里所犯的错误，因为他从建筑合作社的账户中取款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网撒得很大。受到这个方案的启发，韦切娄知道他应该加以改进。他开了很多账户，在全国各地取款，并且通过在地区刑事小组的同事来收集警方调查活动。

他回到艾塞克斯郡霍恩切奇的老家，开始用假名在建筑合作社开了很多账户。两年之后，也就是 1988 年 8 月，他向佩迪格里公司的约翰·西蒙斯写了第一封信，同时仍然在那里当警探。10 月份，他以健康为理由退休，因此使他能够自由地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到处取款。

同时，他在警局像同事一样在同一酒吧里喝酒，还去参加他们的圣诞节派对。有时候，他还会访问地区刑事组的警官，并且偶尔看看黑板上写的蟑螂行动计划。有一次，当他的两个同事在建筑合作社的取款机外等候的时候，他本人就坐在汽车后座上跟他们谈天。

他本想把这次犯罪活动做得完美无缺的，总共提出 375 万英镑的要求，但实际只拿到了 3.2 万英镑。他一共对 17 起投毒事件负责。

我是到 1990 年中期才知道调查小组的一些情况的，当时我在阿诺德诺奇医院接待了一位访客。一位高级警员解释说，审判日期快到了，起诉组还在准备最后的细节。

"鉴于你所提出的建议如此准确，特别是在描述罪犯特征并现场控制他的行为的时候，出庭律师感觉到如果你能够拿出证据来将会极有用，"他说，"我们希望你解释一下你是如何想到那样描述罪犯特征的。"

那位警察还带着相当多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在韦切娄家中发现的。除开一些与商业相关的报纸以外，还有一些写给女人的信件，这些女人在色情杂志上做过寻找奴役伙伴的广告。他能够在性游戏中勃起，而且经常寻找同类女性。

他跟守寡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经常到处旅行寻找性伙伴，其中一些建筑合作社的提款与他去过的地点相符。

其他的一些材料还支持我最初的结论，即敲诈者倾向于有幻想和夸大狂。他曾对以前的一个女友说，他曾秘密打入爱尔兰共和军。

他还成立了一家笔友俱乐部，通过色情杂志寻找施虐受虐狂，但是，那个俱乐部垮台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妇女参加。

同样，一个曾在《每日镜报》当过晚间新闻编辑的新闻界的熟人乔治·韦伯说，韦切娄曾建议他们共同写一本书，讲讲最完美的犯罪。已经完成的几章包含住宅区地址和建筑合作社的账户的细节，但是，韦伯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

我看到的一切都没有让我产生惊讶感，它只是填充了罗德雷·韦切娄较微妙的色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但是，我知道他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

哪怕如此，我对在审讯当中提供证据的要求却感到不太对劲，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法将起诉过程推进。我解释说："当我描绘心理特征时，我用来描绘疑犯的都是普通用词，我无法说出他的生日，不能描绘他眼睛的颜色，也不能说他的牙齿是不是好的。我只是处理极大的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的事物。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有人问我一种可能性有多大的时候，比如说他是一名警察的可能性有多大时，我会说90%。这就自动导向下一个问题：'这么说布里顿先生，你是在说，还有10%的可能是，他不是警察而是别的某种人?'

"所以你看，这并不能够使你们的案子有任何进展。如果律师要我拿出证据，我会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要么是有不利这个人的证据，要么就没有。我能够说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个案子。"

那名高级警官回到伦敦，几天之后，他打电话来说，高级律师同意我的看法。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并不想因此而让人人都知道我介入了此事。到当时为止，我为警方工作还是一个机密。我在莱斯特郡卫生署的上司都不知道我的这些额外活动，不过，这些事情发生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经过在伦敦老城3个月的审讯后，罗德雷·韦切娄被判犯下7项敲诈罪、威胁杀死亨氏客户和两项对佩迪格里之友宠物食品投毒的罪行。他被判处17年监禁。

但是，他的罪行造成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他监禁期，我们每次去超市买东西都还心有余悸。数以千计的食品现在都改用特别的防撬

容器和浓缩包装了。我们每买一罐婴儿食品、果酱、汤类和香肠都要多付3个便士。

它还影响了人们在银行和建筑合作社开设账户的方式。警方要求设置更严格的限制，不能随便开设账户，因为他们仍然被韦切娄随便就设计出那样一种用假名开账户而不必亲自去银行办理手续的方法所震惊。

同样，刑警都成了计算机交易在银行系统如何实现的专家，他们对诈骗和勒索的潜在可能而担心。召开了金融管理者的高级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样的可能。

在我们自己家里，佩迪格里之友重又搬进了食品柜，杰西也没有露出不再吃这种食品的迹象。

6 罪犯心理轮廓描述

在全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辨别和理解犯罪心理的各种理论和研究。回头来看，其中一些理论是相当奇怪的。法国狱医罗瓦涅拿病人的头来做石膏模型，看看头骨有没有“退化”特征。意大利医生切萨雷·罗姆布罗索教授设计了一系列奇怪的测量仪器来支持他的学说，即罪犯的不同等级都有特别的“面相”。例如，杀人犯有突出的下巴，颊骨分得很开，头发浓密，胡子稀疏，面色苍白。

现代人对于“罪犯型人类”的研究是以更精确的科学原理为基础的。审判心理学成为一个专业领域，它来自两条线，一是监狱系统，心理学家在监狱里研究很多年，一方面研究单个的囚犯，同时还寻找管理监狱的最有效的方法；另外一条线来自特别医院和地区隔离单位，一些因为心理异常而犯罪的人被关押在这里进行评估，然后予以相应治疗。

进行临床问询、评估和治疗一直是我工作的重心，但是，在我看来，理解范围更广泛的犯罪和罪犯心理层面也是很重要的。是什么促使一个人去诱拐、强奸、杀人、折磨或虐待另一个人的？塑造他们、让他们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发育过程是怎样的？

我从一开始就向大卫·贝克描述的心理学特征后来证明与保罗·波斯托克和柯林·皮奇福克相符合，我的分析来自对于性功能异常和性变态人格的理解。这个理解又来自于心理学文献和我自己直接的临床经验。虽然性心理异常的人在总人口当中相对少见，但是，在我们的监狱、特别医院和地区安全隔离单位里却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专捉小孩子，另外一些人专门捕捉妇女并强奸她们，还有一些人专门盯住男性。有些人还要对杀人负责。所幸，很多人在他们“成长”的早期就给看出来了，因此他们就没有造成最大的伤害。每当这样的人给逮住的时候，更多的人就会了解他们的背景，了解他们的心理成因，特别是他们的动机。

在极其痛苦的临床问询当中，他们的人生经历被拿出来予以解剖——他们的童年、小学生活、就业、住宿衣食、爱好、性欲、人际关系和犯罪顺序都拿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研究。当然，他们会撒谎，不仅仅对临床工作者撒谎，而且还对他们自己撒谎。什么东西都不能够从表面去理解，那些事实必须经历理性的判断。他们的叙述必须经过检查，还必须与其他的一些材料来源进行比对，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者、教师、朋友和法庭及医疗记录。这是一项不间断的竞赛，我们永远也输不起的一项竞赛。

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系列的图片从一个人在一辈子的不同时期内形成。这些人格结构和动机拿来与其他一些人的进行对照，这些人不一定杀了人，但是，他们也有同样的许多特征。对照也会在正常的普通男性与女性之间进行，它们是一些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是哪些因素使他们彼此分开的。通过仔细地探索和研究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数据库，得以在其基础之上开展工作。

我第一次坐下来描述心理特征时，就是这些知识在支持着我的结论。有数以千计的性偏差人格结构，所有这些结构都是人跟人不同的，但是，许多核心的要素总还是一样的。这就像看着不同的房子，我们知道家家都有卫生间，都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洗衣房。

给一个罪犯描述心理简图的时候，他们犯罪的细节都是针对着这个知识的基础来的。围绕着它的一切，地点、时机、武器、受害人、攻击的手段和残忍程度、谋略的水平等，都会透露出犯罪者的某些方

面。这个人的一切都在细节当中。如果你错过了它,你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你不明白你自己在研究的东西,你也不会看到它。这有点像走进埃及坟墓而不明白墙上写的都是象形文字。了解这种语言、句法和语法,你就能够明白里面的信息,了解建筑这些坟墓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懂如何看那些文字,那些雕刻就只是墙上的一些漂亮图画,它们跟你无关,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们会被作出错误的理解,并导致完全错误的结论。

也许更好的一个比拟是玩拼图玩具。例如,每有案件发生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4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发生的,谁是受害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当我拿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才会去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谁干的?

为了找到答案,我得在巨量的信息当中进行筛选,然后决定哪些是我可以依赖的信息,哪些是不那么重要或者完全可以弃置一边的。这有点像同时玩几盘拼图游戏。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另一个游戏会告诉我如何发生的,第一盘游戏告诉我受害人的情况而第四盘游戏就告诉我犯罪者可能的动机。完成以后,每一个游戏都会成为更大的拼图游戏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最大的拼图游戏就帮助我找到罪犯的心理特征。

尽管到1990年的时候我已经为无数的案子提出建议,但是,我对心理学轮廓描述史,或者按更知名的说法称罪犯轮廓描述史却没有兴趣。我埋头于自己的临床和咨询工作,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去看看别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警察工作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完全没有任何报酬。我惟一的契约是保持匿名。

这种情况到1980年代中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我突然接到一个邀请,去参加由约翰·史迪文森召集的一次内政部会议,约翰是学法律的,他是全国警察局长协会刑事罪犯轮廓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有调查重大暴力犯罪的第一手经验,他是通过警视厅的途径慢慢升到警察局长协会小组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他作为大都会警察局的一名警督工作了许多年。

全国警察局长协会是英国警方最有权力的机关之一,因为该组织将最有资历的一些警官召集在一起,他们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约40个警察局。

我接受了邀请，坐在不同级别的高级警官当中，还有一些公务人员、心理学家和精神卫生职业工作者。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罪犯轮廓描述"，并且探索其未来的发展。其他的一些人已经独自开展了这项工作，早期的结果看起来极有希望，也到了明确说明下一步该干什么的时候了。

桌上的人都在介绍自己，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说得更肯定一些——散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协议，要形成一个未来战略，扩大对于罪犯轮廓描述的理解。我在数年内都没有再听说这件事了，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的警督艾恩·约翰斯登打来的。这个组织最初设立目的是要在内政部与警方之间设立一个桥梁，以确保警方得到必要的东西，该组织另外还有研究和开发任务，他们要注意世界执法部门在培训、装备和科技方面的进步，其中罪犯轮廓描述就被盯上了。

约翰斯登希望来这里跟我谈一谈，我们最终在莱斯特大学的老教授楼里见面，是在我对三年级学生进行日常的临床审判心理学讲课完毕之后进行的。约翰逊是位极其讲求实际的人，也是位喜欢搞笑的人，他是典型的威尔士警察，喜欢打曲棍球，经历过战争的严酷。他修着大学生式的短头发，健壮而结实的身材，戴着塑料架的眼镜，看上去像是克拉克·肯特的乔装用品。

他踮着脚尖小心地围着自己访问的对象转了一圈，七拐八拐地说到了此行目的，然后说，数年之前，内政部拨了相当大一笔研究款项，用以建立一个数据库，要包含关于性犯罪和强奸案以及作案者的资料。这是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服务机关，让全国各地的警察都能够接触这个项目，并获取根据这个数据库建立起来的犯罪者轮廓。

这笔经费促使了罪犯轮廓研究组的成立，是在塞雷大学的心理学系，属于大卫·康特博士的领导。我以前曾在内政部见过康特博士，并得知他与塞雷警局进行的罪犯轮廓工作——特别是在约翰·弗朗西斯·杜费的案子当中。杜费被称为"铁道强奸犯"，他谋杀了3名妇女，并强奸了至少20名妇女，到1987年才被捉住。

自从建立起来以后，罪犯轮廓研究组据说卷入了50多起强奸案和凶杀案的调查工作，并帮助警方抓住了10多名危险的罪犯。但是，根据约翰斯登的意见，这些成功目前还没有得到证明，而且，因为

资助了这个项目，内政部希望确保这笔钱花得值。

很明显，衡量成功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罪犯轮廓描述与案情的结果相符。这样的轮廓描述有多么精确？是否导致罪犯被逮捕或起诉？它是否使罪案调查导向积极的方向？

约翰斯登同意我的说法，但不幸的是，他很难从塞雷项目中拿到轮廓描述资料。因此，他想从其他的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给不同的警局发一份问卷，问他们对轮廓描述的看法。

"如果我起草一份问卷，然后寄到你这里来，你会看看吗？"

"当然会的，"我说，假定这会花他一定的时间。但令人惊奇的是，问卷在两天之内就到了。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经常接到约翰斯登的电话，谈话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对罪犯轮廓描述的分析看来停滞不前，因此他请我评估不同的研究提案和独立报告，是为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准备的，包括对警方压力与患病率的研究，还有灾难事件紧急行动组的人员带来的影响，比如洛克比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和派帕阿尔法油轮大火。

约在这个时候，内政部的一项组织评估导致警察研究组的成立，这个组织最后接管了以前由警方基本需求支持组处理的大部分调查及开发工作的大部分关键领域。在这个变动期间，我接到来自内政部中层高级官员的电话，说这个部门希望正式评估罪犯轮廓描述工作。

他的谈话里浓缩了大部分外交辞令，满是条件句和其他分句，他告诉我说，整个领域必须进行独立评估，因为有的部门要求政府再拨一大笔资金到罪犯轮廓描述工作当中，但是，政府又无法知道这笔钱是否用得值。

他到莱斯特来，问我这样一个评估应该如何进行。我们花很长时间谈话，我告诉他需要进行哪些质量检查。时间一到，他又回来了，然后说："你来做这项评估如何？"

这我可没有想到。

"你觉得如何？"他问。

"我觉得这个主意值得一试。"

"那好，请到伦敦来，我们再谈谈这事。"

我觉得他们选我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参加以前的任何一次由政府出钱赞助的项目，也没有因为自己所做的罪犯轮廓描述工作得到报酬，因此，这对我将来的财务状况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一直还很有成效。

在伦敦，我见到了警察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也就是格罗里娅·雷柯克博士，她以前是一位心理学家，在监狱系统工作过多年。评估涉及好几个关键的因素。某方面，这是一个用户调查——警察希望从轮廓描述当中得到什么？这就意味着要会见警方负责政策决策的高级警官，比如约翰·史迪文森，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侦探。

评估还必须看看产品，看看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已经存在的罪犯轮廓描述在与案件的结果比较起来时有多么准确，有多大价值。同时，很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看在别的一些地方人人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比如美国的 FBI，还有欧洲的警察。

“你觉得这项工作会花多长时间?”雷柯克博士问我。

“两年。”

她有些退缩了：“不能够花两年进行，必须尽快进行。我们能够给你的时间最多 75 天。”“这不可能，”我说，“想想必须接受问询的人和必须评估的文件吧——不仅仅是这里，而且还有海外的资料。”

雷柯克博士明白这项工作的规模，但她解释说，评估工作如果花两年那早就过期了，而且还会从她手中溜走。“我们对自己看到的一切还不满意，因为需要尽快得到一些答案。”

“根据你的时间表，你能够得到的最多是一种粗线条，”我说。

“那也行。让我们得到总体的一个轮廓，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出决定。”

内政部需要一份报告，这报告仅仅基于 75 天的工作，但是，我有全职的工作要处理，还有很多警察要求我帮助他们进行调查行动。这意味着必须把自己的年假用掉，还必须把周末和法定假期也用掉。事情干了一年，而在这段时间里，我会见了许多人和机构，只要跟犯罪调查有关的人都问。

艾恩最早想发出去给警察局长和 CID 头目的问卷现在起了关键的作用，这可以找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他们曾帮助警方完成了重大的调查活动。侦探都接到问询说，为什么会请人来做罪犯轮

廓描述，案件具体的细节如何以及描述有多么准确。

同时，我会见了涉及各个研究领域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对罪犯轮廓描述有一定掌握，而且还看到了很多发展，比如凯特凯姆，这是全国最大最完整的数据库，主要处理儿童谋杀案、绑架案和失踪儿童案。这个数据库是在霍格、麦克斯韦尔、哈伯谋杀案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三名女学生是从不同的郡来的，但是被同一名男性所杀。这个数据库1986年在德比郡建立起来后，保存了自1961年以来的所有与儿童相关的犯罪行为的具体案情，我也看出，如果管理得当，它会是未来罪犯轮廓描述方法中极有用的一个要素。

艾恩·约翰斯登和警督约翰·多森安排好了约会，并在我与数名高级警官会面时充当联络人，并且还选择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警探，他们都跑了数千英里路。他们是我研究侦探程序时最重要的指导。

出现的情况令人惊讶。意见有很大的差别。一些有经验的调查人员对此充满敌意，宣称罪犯轮廓描述只不过是"一堆心理学牛屎"，并说他们再也不会用到这样的描述。另外一些人对罪犯轮廓描述留下很深印象，而且还看到了实际的益处。

有极差体验的数量之大使我深思。我开始这项评估的时候，觉得有可能会碰到少数一些罪犯轮廓描述不太准确的例子，但是，我第一次发现，对案件调查活动产生不良影响的潜在可能非常之大，这使我感到害怕。一些警官告诉我说，有些轮廓描述不准确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如果依靠这些描述，他们会使调查组受到严重误导。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谋杀案或者强奸案的调查当中，则有人可能会死亡或者受到攻击。

数据在积累当中，整体的情景并没有得到改善。英国的罪犯轮廓描述不仅没有成为对犯罪侦破活动的巨大帮助，反而有可能胎死腹中。

现代的罪犯轮廓描述是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的，如果不看大洋彼岸取得的成绩，则这样的评估不能够称之为国际性的评估。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传说，他们是这么讲起罪犯轮廓描述的起源的。一名"发疯的炸弹"分子10多年内一直在纽约市进行恐怖活动，他给一些报纸寄送辱骂性的信件，并且炸掉一些标志性的地

标。1956年，美国精神病医生詹姆斯·布鲁塞尔医生研究过犯罪现场、罪犯发出的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情报，然后告诉警方说，他们在寻找的是一个未婚的中年东欧移民，信罗马天主教，并与他母亲一起生活在康乃狄格州的一座城市里。他穿着非常讲究，极整洁，不喜欢父亲，逮捕以后会发现他穿着双排扣的西服，扣子一直扣齐脖子。

被逮捕以后，乔治·麦斯基的确穿着双排扣西服。他几乎完全符合轮廓描述，只有一项事实，即他跟没有结婚的姐姐而不是跟他母亲一起生活。问及他如何描述得如此准确时，布鲁塞尔医生解释说，他平时检查病人时会努力预测他们会在将来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他将这个程序反过来，看看行为之后，再努力猜测出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虽然有开始的这些著名案例，但是，罪犯轮廓描述到1960年代却又慢慢失去影响力了，然后，1970年代美国的暴力犯罪模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因为谋杀率急剧上升，而且越来越多的谋杀活动是由陌生人进行的，因此，罪犯轮廓描述又热了起来。

1970年代早期，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的匡蒂科市建立了新的联邦调查局研究院，里面就包括刚刚兴起的行为科学组。介入这些活动的警官主要负责教学，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分析一些暴力犯罪，并且"简要描述"可能的嫌疑犯。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尽管其中一些人研究过文献，而且还跟很多调查人员一样大量依靠自己的刑事侦察经验以及对过往案件的了解。在10年时间里，对犯罪采取的这种行为科学研究方法导致联邦调查局建立了美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和暴力犯罪理解计划。后者是一个报告系统，犯罪行为在这里用一份共16页的问卷得以总结，问卷由负责凶案调查的刑警填写。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尚未了结的跨州际谋杀案联系起来，但是，它后来却成为罪犯轮廓描述当中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因为美国幅员辽阔，疆界很广，联邦调查局没有足够多有经验的描述者到全国各地旅行和研究犯罪现场。他们可以利用由当地警方收集的细节，将犯罪行为分类成较广泛的领域，然后对犯罪者轮廓进行描述。尽管很多工作是由计算机进行的，但是，轮廓描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有经验的FBI特工一起集体研究，另外辅助以有心理

学背景的研究。这个方法证明很有效，他们的成功率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高得多。

很明显，开始这项评估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会见的人就是塞雷郡的罪犯轮廓描述研究组的大卫·康特博士。我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材料，这样我就可以看看他的数据库已经生成的罪犯轮廓描述的成功率。内政部曾觉得很难拿到这些数据，但是，我假定，康特博士和涉及的别的人会对一起工作有兴趣，并确保评估成功。

我去看了他好几次，并解释说，我希望得到他的合作和参与。但是，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康特博士解释说，他觉得把塞雷郡的材料包括在评估当中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不同意这样的评估方法。我感到非常惊讶。那么，犯罪轮廓描述如果不是根据其准确性和价值，难道还有别的方法来评估吗?

他对我说，操作性的轮廓描述并不是他感兴趣的范围，他也不明白一些警官为什么会不停地来找他描述罪犯轮廓。我提醒他说，有可能是因为他给自己的项目起的这个名字使然。

评估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直到最后我只等来自罪犯轮廓描述研究组的材料了。如果实际上是由内政部赞助，而且还是专门用来为警方提供罪犯轮廓描述服务的一个实体的结果不能够包括进来，我的这项评估工作几乎就不可能算是完整的。

这就直接导致塞雷警察总部的一次吵吵闹闹的会议，当时，康特博士同意提供轮廓描述的复印件。他另外还清楚地说明，所有描述均不是根据性谋杀或强奸案数据库得到的，因为这些案子都不是根据作为他的轮廓描述工作的科学基础得来的。反过来，康特博士和他的小组采纳了一次集体讨论的意见，就是让一些想法弹来弹去地实验，直到他们都同意罪犯的某一细节为止。这事情我知道，康特博士以前已经说明过了，这不是把事情推向前进的正确方法。

最后，我接到许诺提供的 50 份轮廓描述当中的 36 份，结果令人丧气。因为问卷是由不同的警方提供的，我已经合理地推断到了可能的结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轮廓描述是准确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描述有助于某些逮捕工作。塞雷郡特别拿出了两个案例，作为他们成功的范例。在第一个案例当中，也就是一个系列强奸案的调查当中，高级刑警报告说，如果刑侦小组根据轮廓描述的指导

行事的话，调查工作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或者会误入歧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提请注意这项事实：本来是两个彼此不搭界的系列强奸案，但是，在原来的轮廓描述中却并没有提及，而且这件事情是由警方后来在侦察中了解到的，这又导致了对轮廓描述的修订。轮廓描述当中曾提到罪犯可能居住的地区，而且根据这个含义，警方应该去查一查，结果却出现在那名强奸犯实际居住的地区相反的地方。他们感觉到这个描述的其他方面只不过是警方调查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信息的重复而已。

在第二个案子当中，也就是一名妓女被杀害的案子，一名高级刑警报告说，轮廓描述大部分都错了，包括指明单独一个男性犯罪者（共有 3 人犯罪），还说，这次犯罪行为是突发行为、没有组织、全凭冲动（那是一次有计划的犯罪行为），还是罪犯会由于突然间的暴力行为或者相关的失控而引起警方注意（结果却没有），还说他住在离案发现场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他们就生活在离案发现场步行可及的地方），还说他会因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现出相当严重的内疚，如果“穷追不舍”，他会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几个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表示忏悔的迹象，审讯期间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了政府不应该再资助这项活动，不应该再拨款给塞雷郡根据数据库进行犯罪者轮廓描述的活动，尽管刑事调查心理学硕士学位仍然广受欢迎。

1992 年 6 月，我在内政部的一次小型高级官员会议上递交了报告，然后又向全国警察局长协会的刑事小组委员会提交了报告。许多人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个报告证明是如此令人诅咒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要拘泥于文字，也不要急着失望，因为他们最后会看到黄金。

我做了一系列相当正式的提议，比如这个目标如何实现，中心意思是说，犯罪者轮廓描述的工作在未来应该全部由警方所拥有和指导。不能让任何有财务或者名声利益的人参与进来，每一份描述都必须随附准确性报告，如果结果不能够出来，则必须注意它的来源何在。

我画出一幅蓝图，里面包括了由警方管理、以计算机为基础、受人工智能原则指导的一个支持系统，它最后能够通过寻找某些犯罪

要素的出现并根据这个出现而得出具体结论的方法来减轻很多重复劳动。我认为在犯罪分析当中由计算机彻底替代有经验的心理学描述者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计算机能够节省时间，并作为刑事调查人员早期的指南。

同样，经过仔细研究刑警进行调查的程序，可以明显地看出，完全有可能告诉警官们如何在犯罪现场寻找心理学线索。我在与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得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尽管有些描述的准确性存在问题，但是，许多官员还是对描述给调查工作带来的动力感到乐观。当一些警官看着一个犯罪现场时，一个新的视角已经为他们所掌握，他们可以带着这样新的视角来看待未来的刑事调查。

作为一个总结，我说我建议的一个明确目标是要让英国在两到三年内成为欧洲罪犯轮廓描述优秀技术的中心。

7 把游戏玩下去

利兹市米尔加斯警察局看上去如同一座庞大的现代红砖墙建筑群，上个世纪中期，人们一不小心就会闯进这样的建筑。与周围旧式的利兹市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平房、工厂和车库极不协调。

这个警察局有我见过的最大的专案室，是一间巨大的开敞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里面隔成了几个小区，用于逐户查询、车辆追踪、情报、已知联络和大型调查行动中的其他专门领域，普通公众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一些行动。

警督包勃·泰勒带我四周看了看。他这人长得像一头熊似的，非常结实，看上去如同凯尔特武士一般，还有一头黑发和毛丛丛的美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泰勒，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搞到我的名字而且跟我打了电话的。

他直视着我坦率地说："我手头有件非常棘手而且很复杂的谋杀案调查行动。老实说，这是一件血淋淋的恶梦，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没有意义。我们搞到的一切就只有问题。"

他停了一会儿，扭身脱掉他的夹克："你听说过朱莉·塔特被谋杀

的事件吗?"我摇摇头。

"嗯,因为行动方面的原因,我一直非常小心,并没有透露出任何细节。让我来带你了解全部案情吧。朱莉于 1991 年 7 月 9 号从利兹市失踪,10 天之后我们找到她的尸体,是在离此地南边约 80 英里的一块田野里找到的,靠近格兰特汉姆。她是被人用一把锤子或者一块砖头打死的。"

"她死多久了?"我问。

"8 天,也许 9 天,"他一把抓住一包尚未开包的香烟,"让我从头说起吧。"

泰勒解释,朱莉失踪前两天,她和男友大打一通,两人都在早晨进了利兹市的圣詹姆斯医院。朱莉的头部和面部有伤,她的男友多明尼克·默雷的踝骨受伤。他们不顾医生劝告,7 个小时后双双离开医院。

朱莉 18 岁,一般在家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住在利兹市奥克伍德的一间属于会堂的房子里,不过,她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跟多明尼克一起住在吉普顿区圣韦尔弗里德里克住宅区的一间公寓里。根据邻居的说法,她和多明尼克的关系一直不稳,闹哄哄的,头天打个头破血流,第二天又在公开场合展示爱意。

7 月 9 号,她于下午 7 点 45 分离开多明尼克的公寓,说她要去利兹市综合医院上班,她在那家医院当实验室助理,每周上几个夜班。

"但是,根本就不存在这份工作,"泰勒说,"我们去查过了,然后又再次检查过了。那家医院没有人认识她。"

"那她到那里去了?"

"问得好。"

泰勒交给我一封信,是装在一个透明信封里的。"3 天之后,这封信到了多明尼克的房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认为这是朱莉的笔迹。"

多明尼克:

你好!

快来救我。我被人绑架了,我一直恶心,被人扣在这里当人质,

直到下个星期一的晚上。请立即去告诉我母亲。我多么爱你，多明尼克。

妈妈快给警察打电话，快快救我。什么都没有吃，不过他们给我食物。感觉恶心但我一天还是喝两杯茶。妈妈，多明尼克，快救我(然后出现一段好像是别人写的文字，上面是她母亲的电话号码。信的结尾是：爱你们两个人)。

朱莉

笔迹似乎很不成熟，但是，某些句子跟我掌握到的关于这个姑娘的有限的情况不相符。在我看来，朱莉不太可能使用像"人质"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接下来的这句话"我多么爱你，多明尼克"听上去的确像是她有可能增加上去的一句话。这表明，至少这封信的一部分是她按照别人的口气写上去的。

这封信的结构非常清晰，大量的信息和指令都通过仅仅三个段落传递出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封信要寄过来。并没有对朱莉的家庭索要钱财。反过来，却要她的母亲去报警。为什么一个绑架者希望警方介入呢？

泰勒手上还有一封信，这封信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

"这封信是同一天到达的，也就是7月12号，是给利兹市警察局的。两封信都是从牛津郡的亨廷顿市发出的，前天发出来的。"

信封上的"总部"两字拼写有误，泰勒还指出，现在已经没有"利兹市警察局"这么一个单位了。

所有的拼写和语法错误都是敲诈者所为。

一名年轻妓女昨晚已在切佩尔镇被绑架，只有在下列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她才得以安全释放。如果下述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则人质将再不会露面，而且，市中心的一家大型商场(不一定是在利兹市)将在7月17日凌晨5点发生爆炸。

1)支付现金14万英镑(壹拾肆万英镑)。

2)5000英镑转入两个银行户头，送出两张现金卡和密码，这两家银行户头必须允许至少每天提取200英镑。

下个星期二，也就是7月16日，由一名女警察带着钱开车至伯明翰新街车站，并在第9站台候车室的电话亭等待电话。她必须穿上浅蓝裙子，钱必须放在肩挂包里。

她必须于晚6点之前到达那里，并在晚7点时等待电话，然后，她将得到接听下一个电话的地点。（接到电话后，她必须从城里开车顺A38M阿斯顿高速公路向北行驶，并开进向南的M6号车道，之所以给出这个信息，是为了防止她在城里迷路。）她必须灌足至少可以行驶200英里的汽油，还必须带上钢笔和纸，但不得带上无线电或发报装置，所有电话都将是预先录制的，不可能进行对话，也不会答话。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任何公之于众的举动或者明显的警方行动将导致不再有进一步的联系。

钱币必须按50、20、10英镑的面额等额提供，而且必须是用过的旧钞票，现金卡上必须用大号笔标上密码。钱必须用至少120微米厚度的聚乙烯布包好，然后用胶带粘好，现金卡必须绑在聚乙烯塑料布上，用棕纸包好，并用尼龙绳系好，留下手提的环扣。整个包裹的尺寸不能够超过350mm×350mm×90mm。

收到钱后，利兹市将在约午夜时分接到一个电话，告知将发生爆炸的商店的名字和地址，5个小时的时间将足以进入该店。人质会在所有的钱从账户中提走后释放。

人质将得到很好的食物，并将在专门租借来的房间里得到很好的照料，她将一天24小时受到PIR监测器的监督，这些监测器与主控制板连接着。钱提取完毕后，你们会接到人质关押的地址，进入房间之前，电源必须从房间外面断开，打开房门或者任何移动都会启动监测器。不得跟踪这名女警官，因为她将受到监控，沿路会有人在秘密的道路上监视她。飞机的声音也会被听见。

星期二，这名女警官必须在所有时间里只带装钱的包裹。她将带着这个包裹去很多电话亭接听电话指令。在一个电话亭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塑料盒，里面有很小的LED绿色灯，这个盒子必须拿起来，然后放在汽车仪表盘的仪表板上，而且还必须从正面的挡风玻璃上看得见，这个盒子里还将有一只较大的红色LED灯（防撬型）和一只较大的琥珀色LED（发射器监测仪）灯，如果这两个发光灯当中的一个发光，则不再有任何联系了。装钱的包如我所说必须随身带着，

而且，在一个目的地，它必须用夹子夹住，然后挂在一棵树上，绳子上不能够有向下的拉力。女警官然后必须在60秒内回到车上，此车必须停在离悬挂地点约300米的位置。然后再开约800米的距离才能够取下装有LED灯的塑料盒。

这笔钱将由与笔者无关的某个人来领取，但他必须是惟一一个每星期二都来这条"爱情胡同"停留几个小时的人，他的女伴将被劫持为人质，直到钱从他手里拿到为止。他将拿到一个短波双声道收音机，我会通过这部收音机与他联络。如果事情不出错，这两名人质将不会受到伤害。

这次行动已经计划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设置一把微型手枪再加上弹药却花费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错，或者警方不能够满足要求，则将再也看不到人质了，另外，那家商店也将被炸掉，这次行动将重新开始，下次可能要利用比如电气公司、煤气公司或者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将在他们工作期间实施绑架，然后让公司付赎金。

钱拿到之前不得公开此事，然后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必须说明钱并没有交出。额外的5000英镑必须与大笔款项放在一起，因为主要的款项将掩埋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样，钱币上的系列号就无法追踪了，现金售货机并不能够识别系列号。

仅在几页的纸面上就罗列了大量的信息，而且还有一整套复杂的指令。作者显然已经花了极长时间来考虑此事，但奇怪的是，他竟然想办法把错误的地址写在信封上，而且弄了好几处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这些错误是有意而为的还是真的？

"他为装钱的包裹要求的尺寸……"

"完美无缺……"泰勒说。

"走出伯明翰的路线？"

"完全合乎逻辑。"

多么惊人的细节，我在想，但是，其中任何一条对于直接勒索钱款的企图来说都没有意义。为什么要向警方寄送敲诈要求，使必须调查这一犯罪行为的人成为主受害人吗？为什么只要如此异常的一笔钱？14万英镑相对于所花的时间、所做的努力，最重要的是相对

于收取款项时所冒的风险来说几乎只是一小瓶啤酒。

朱莉的家人和男友都认为，她并不是妓女，但是，24 小时之内，警方已将她与利兹市切佩尔镇红灯区联系起来，数个已知的妓女都确认她失踪的当晚见过她。

我问泰勒星期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一名女警察一直在伯明翰新街车站内等候电话。电话响了，但等她拿起电话的时候却没有人接。三天之后，朱莉的尸体被发现了。

“因此，头两封信一定是在她死后寄出来的。”我自言自语地说。

泰勒点头。

我开始翻看照片，上面显示朱莉的尸体包在一条床单里躺在一棵树下。那片田野可从一条沿 A1 号公路方向延伸的乡村土路走进去，离大北公路仅数百码的距离。惟一的另一个容易注意到的特征是一条已经废弃的铁路，已经被荒草埋没了，离她躺在下面的那棵树的距离也不远。

尸检报告指明并没有发生性攻击的证据。她脑后的两处伤痕是由厚重的钝器造成的，也许是一把锤子，颅骨已经砸开了。右脚踝上的一系列伤痕与绳子或铁链捆绑相符。朱莉至少已经死亡一个星期了。尸体快速的腐烂表明她的尸体一直放在某种容器里，空气流透不畅，而且附近有热度。

朱莉是个漂亮的姑娘，5 英尺 9 英寸高，棕色眼，齐肩长的棕色卷发，一般是扎在脑后的。她的上门牙有明显的缺口，最后一次被人看见的时候穿着黑色兼紫色的夹克、黑衬衣、小山羊皮鞋子，还背着一只黑色的肩挂包。

“她做妓女多长时间了？”我问。

“时间不长，也许还是业余的。她没有犯过罪，也没有受到警告。”

她还有使用假名的习惯，有时候用她母亲结婚以前的名字“阿特金丝”，或者用“希尔”，那是她生父的姓氏。在学校时，她是个极有希望的运动员，曾得到过数十枚金奖和其他奖品。16 岁毕业后她还坚持跑步，在高街的连锁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根据她朋友们的说法，她喜欢晚上出去唱卡拉 OK，也喜欢出去喝酒，在利兹市中心有很多人认识她。

朱莉的尸体被发现的3天后，另一封信又寄到了米尔加斯警察局。

朱莉·塔特必须被杀死，文字永远也无法表达我的遗憾，但是，我已经警告过，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错会出现什么情况，写此信时此事尚没有公开，如果你们几天之内找不到尸体，我们将与你们接触，告诉你们详细的地点，尸体必须搬走了，因为看来已经开始腐烂了。

她没有被强奸，也没有受到性攻击，也没有受到任何方式的伤害，直到死前她才给绑了起来，并在脑后挨了几下，这是为了让她失去意识，然后给勒死了。她永远无法看到以后发生的事情，没有感觉到痛苦，也不知道发生了任何事情。

炸弹没有像事先保证的那样被留下来，因为引信附近的密封胶一定是在运输途中损坏了，发出难闻的气味，因此就没有放置。原来是准备炸掉考文垂市的欧文家具店的。

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声音……我仍然坚持将这个活动搞下去，直到我拿到那笔钱为止，不管会有多少人会为此而受难。在两个星期左右时间内，我将演示我的炸弹。

我仍然要求得到以前的那笔钱，而且条件同样，如果你们希望避免严重的火灾损失和未来更多妓女的生命损失的话。如果想与我联系，必须在星期六的《太阳》报个人栏目上登载一个广告，会有电话拨到莱斯特森林东站向北开行的候车室电话亭，就是离皇家汽车俱乐部最近的那一个亭子。在接下来的星期二晚8点，接电话的人必须是上次使用的同一个女警官（我假定那当然就是在伯明翰新街出现的那同一个人），她接电话时必须说："我是朱莉"，之后她会接到进一步的指令，下次更清晰一些，如果她错过指令，会有一次重复电话打来，她必须第二次拿起话筒，如果第一次已经听清楚，也只会有一次重复电话。如果每个电话亭都有人占用，则会有人尽快打来电话。这些电话会跟以前一样录制下来，这次由星期一晚上在另外一个城市红灯区抓来的人质来进行。

《太阳》报里面的广告必须写明："为了朱莉好，我们再来谈一次。"如果27号星期六或者8月3号星期六看不到这则广告，那么，炸弹一定会在8月6号星期二放置完毕。直到信息已经收到或者炸

弹没有能够带来任何反应以前，不会有妓女被抓住的。

内政部病理学家立即再次检验朱莉的尸体，在她脖子上又发现一处压痕，表明曾进行过绑扎。死亡原因是勒死，这是只有杀人者才知道的一个细节。

收到这封信后，地区刑事组和凶案组开始计划全面诱捕敲诈者的行动。7月27号星期六，他们按要求在《太阳》报上登了广告。这就使第4封信出台了，是从约克郡寄出来的，这封信是在星期二早晨在利兹市的信件分检室发现的。

这次是用大写字母手写的，此人明显想掩盖自己的笔迹，也许是用另外一只手握笔写的。这封信列出了当晚交付赎金的最终细节。

*必须有*一名女警察于晚8点30分在莱斯特森林东站的M1号公路处等候电话。她接到电话后必须说"我是朱莉"，并将她的车型和颜色报出来。她然后会得到头两天被抓到的一名"妓女人质"的名字和地点。这名女警官必须按照录音指令到达下一个接听电话的地方。

另外，敲诈者还写到，必须在情人胡同里找到一对年轻伴侣，并在接下来的赎金交付过程中扣作人质。男性人质将派去取钱，这样可以阻止等候在那里的警方神枪手。

然后，这封信慢慢变成了独自一方的辩论，列出了他的这个计划的可能结果，但在每一种情况之下，他都列出了他为什么会成功的理由。他在向警方发出信息说，看我有多么聪明，我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他是在对警方说，不要搞公路堵截那类把戏，不要用报警装置、直升机、卫星观测、标记染料和发报器——他已经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了。

他尖锐地批评了他在报上看到的报纸头条：

朱莉不是被大棒打死的(《每日镜报》吉姆·奥弗尔德的文章)，她只是在后脑勺给打了三四拳，然后被勒死的。她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那天晚上，行动在8点31分继续进行，电话在车站的电话亭里

响了。但是，女警官听不清楚录音信息，电话就立即挂断了。

包勃·泰勒把所有情况全都跟我讲完了，然后到处找烟。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挫折感。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杀手想拿一个姑娘的死亡搞钱，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个敲诈者不小心杀死了自己的人质，也不知道是不是涉及朱莉在内的一个流了产的诡计。很多事情毫无意义。

我喜欢泰勒直截了当的态度，我们说好几天后再次见面。

在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在家里仔细研究朱莉的死亡和敲诈信。人们经常说要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但是，我的分析必须离开这些信件，踏人杀死朱莉的凶手的内心。我了解他，我必须通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并听到他所听到的声音，哪怕这意味着"观察"和"倾听"一个担惊受怕的年轻人质的尖叫。

朱莉显然对卖淫业不是很熟。她没有经验，因此也可能很容易受伤害，因为她没有遇到经常有人谈起的性暴力行为和仇恨，定期在街头从业的女人经常会成为这些暴力行为和仇恨的牺牲品。

7 月 9 日，她离开多明尼克的家，然后到了利兹市中心，她跟另外两名妓女在斯宾塞之家共有一个地址。她们那天晚上一起外出，在街上接客，晚 11 点 30 分左右她们离开了朱莉。

酒吧的人走完，店铺都关了门以后，利兹市很少还有妓女在街上逗留的。除开拉不到生意以外，这个时间也不是很安全，因为姑娘们不可能始终互相盯着。因为某种原因，，也许是没有经验吧，也许她背上了债务，或者是想去当兵之前存一笔钱，朱莉还在街上工作。

那天晚上，有人在远处盯着她，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是不是就找她？他以前一直都在街上搜寻目标，等待合适的受害人。她必须是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人看见她上了自己的车。

妓女很适合他的目标，因为这样的女人很容易找到，也比别的任何人更不惹眼。她的消失不会跟比如一名女学生到时没有归家一样引起很大反响。有数十名，也许是数百名当妓女的妇女会消失，有时候消失数天或者数星期，她们会在习惯的红灯区消失，然后又在另外一个红灯区里出现。她们通常是根据生意流动的，有时候是一时兴趣、更多的则是因为害怕。有些妓女，太多的妓女永远不再出现，或者说，如果她们出现，那也是在人数越来越多的文件里面，上面标着

"未破妓女谋杀案"。

从杀手的角度看，朱莉符合他的目标，因为他并不想上报纸头条，也不是想从她家要赎金。他对她个人没有兴趣，他需要她成为一个容易控制的人质。

他开到她身旁，她靠近窗户，报了自己的价格。她在附近有房间，但他要求在车里进行。这样价格就高一些了，她边对他说边就上了车后座。事情也许比这更暴烈，因为他有力气将朱莉拖进车里，并且很快让她失去反抗能力，但是，这样做会引起别人注意，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没有人注意到此事。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将她的手脚绑了起来，使她不能够动弹，然后开车到了事先准备的一个地方。他计划让她活着，至少等她给男友写一封信之后。另外一封信，也就是详细说明赎金递送方法的那一封，是事先写好的，已经准备投送出去了。

但是，为什么从警方要钱呢？为什么发出复杂的指令，说不准有人跟踪你，不准使用无线电，也不准使用跟踪装置，而你索要钱财的对象正好就是会反着来的人？

答案很快就明确了，他的主要动机不是钱。所有复杂的细节和精巧的埋伏都指向一个决意要向警方挑战的男性，他邀请警方跟他一起玩一场游戏。他的信件读起来就像一系列必须满足的要求的购物单，明确说明钱应该如何包好，塑料布的厚度是多少，最后的尺寸是多大。为什么要如此具体呢？这样的事情很重要吗？你只是想施加一些控制，让你的对手跳进尽量多的环路。

投入银行账户的5000英镑也只是游戏的一部分。他知道提款会被追踪到，而且明显是在向警方发出邀请："只要抓得到，你们就来抓我吧。"

同样，对于他计划的情景来说，14.5万英镑的要求也太小了。如果他要求得到一百万英镑或者两百万英镑，则这个计划和风险是值得的。惟一的别的解释就是，他欠了一笔数目很具体的债，必须付出这么多钱，比如抵押贷款或者一笔商业贷款，或者他相信以前的某次不公正的行为正好花去了他这个数目的钱。

敲诈者明白他很聪明，现在他要求警察对他表示尊敬。也许他们以前没有对他表示敬意，把他当了人渣或者某种小罪犯，但现在他

将显示给他们看。他将向全世界证明，他到底有多么聪明，而实际生活给他的机会却太少太少。所有的失败和失望都将会被忘掉，人们会永远记得此事。他也许没有拿到什么大学文凭，但是，他有脑子，他太聪明了，不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我想，他有可能一直让朱莉活到了第二天早晨，这意味着他需要一个地方来放置她——一个车库、地下室或者一个车间——他必须在那里安静地呆一阵子。当然，他必须杀死她。他必须让警方明白他是当真的，而且，为了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必须绝对清楚，杀过一次人之后，一切都无所谓了。

那不是性攻击，他还有可能带着冷漠看待朱莉的死亡。如果他的确从这次行动当中得到了快感，那么，这就像从树旁经过的时候顺手摘下了樱桃。但他明显不想被人看作是冷血杀手，因此，他的第三封信里就没有暗笑的味道。

反过来他写道："朱莉·塔特必须被杀死，文字永远也不能够表达我的遗憾……"而且还强调说她死得毫不痛苦。这是一种形象上的操作。他希望被人看作是一个拉法尔式的人物，一个聪明的大盗，一个公众会赞扬而警方也得勉强尊敬的人物。

我向刑事管理委员会递交了心理描述报告，这个委员会共有约12名警官，汤姆·库克是里面官职最高的人。我们在米尔加斯警察局的一间会议室开会，里面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会议开始的时候，负责调查的各个方面的警官汇报了自己的进展。某些小组在跟踪朱莉最后的已知活动，跟她的家人和朋友谈话，另外一些小组进行逐户调查，问星期二的晚上有没有人看见过她。刑警还在牛津郡亨廷顿市的数家旅馆和寄宿所进行调查。

同时，信件里面的一切都进行了分析——纸张文具的品牌，可能在什么地方销售，打字机（老式的奥利维迪牌打字机，'f'键不好用），传递过这封信的所有人，从分拣室一直回溯到收取邮件的地方的每一个人的指纹都必须予以确认，以便与可能的敲诈者的指纹分开。

有一头调查涉及到包裹朱莉尸体的那条床单上的不太常见的洗衣房标签。那个标签上面印着"MA143"这几个字样，这可以一直回溯至1940年代早期，然后追踪到了考文垂市莫斯雷大道的一家商店，这个地方在20年以前是一家洗衣房。

同样，他的第二封信是在利兹市打上邮戳的，结果导出第二条线索。那上面贴着一枚一等邮票，邮票上面描述的是一头泰德熊的头，这枚邮票很不平常，是在一次展示会上销售出去的，而且还有其他10枚不同的邮票。有可能找到购买这枚邮票的人。

包勃·泰勒介绍我认识了凶案管理小组委员会的人，并明确地说，人人都必须认真听讲，之后可以提一些问题。

“你们在寻找的这个人约40多岁或50出头，”我说，一边看看我的笔记，“信件里面的方法和语气透露出成熟，这是年轻罪犯所不具备的特征。”

“他的智力高于平均水平，也许符合大学入学水平，但他的正规教育只到了高中水平，还没有到可以拿学位的程度——语言的质量和结构可以说明这一点。”

“离开学校以后，他极有可能继续接受了自我提高教育，有可能学习过某些正式的课程。他对电子学和机械学非常熟悉，也许是他的工作使然，但是，他的理论知识远远超过他的实践水平。他不是大公司里面的高级职员，这从信件里面的概念性布局和语言的复杂程度可以看出来。这些信件是由一个熟悉打字机键盘，但又有可能只会两指打字的人打出来的。

他有可能结过婚，但不太可能有能力维持较长时间的婚姻。

他是个极有能力的计划者，我们可以看看他设想到的那么多事情。他需要时间来准备，这样的事情不是自发想出来的，他还有可能多次演习过他的计划。

他可能有案底，但这多半是些财产犯罪、欺骗、诈骗等罪行，”我说，“他的计划防止出现错漏，明显了解警方查案程序，表明他以前领教过这个程序，但我看不出有任何东西指明他以前杀过人。”

我指出的一条查询道路是任何对以前的利兹市警察局有过个人和家庭恩怨的人。

“这个人有可能把自己碰到的麻烦归咎为警方，”我说，“你们应该往回调查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报复的心理有可能会潜伏很长时间才演变成实际的行动。这个人或者他的家庭一定与警方有过接触，他们要求得到公正的处理。这意味着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份文字的申诉记录，这份记录会使搜查范围缩小许多。”

同时，我警告说，也不能对这一条查案线索寄予太大希望。虽然信件是应该予以追踪，但是，我又被第一封交给警方的信件里面的拼写错误和已经过时的地址而困惑。

"这些细节不太有可能没有引起这个人在计划当中的注意，他几乎肯定是在制造死胡同让你们钻，他将躲在一片烟雾之后看你们走入歧途。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烟雾和歧途，他才会弄巧成拙，让我们有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后找到他。"

现在，我讲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我而言是引起了特别共鸣的："朱莉·塔特迟早是要被人弄死的。这个人希望警方拿他当真，为此目的，他必须杀死她。而且，如果必须的话，他还会继续杀人，直到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警方的注意为止。"

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朱莉并不是在一次拙劣的绑架案中死的，也不是想逃跑的时候死的——这是目前谣传的两种死因。杀她的人希望搞一次竞赛，他是在设置一场游戏，在发动一场挑战。他希望引起警方的高度注意，希望被警方看成大敌，因此，他的计划和要求设计得非常彻底，其中大部分是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主要还是一个玩游戏的人。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最刺激和激动人心而且能够自我满足的东西是他曾参与此事，"我说，"他现在是在全国规模上玩这场游戏，他的满足感、控制感和快乐的强度很难传达出来。他已经执迷于此事了。哪怕他一时得到了满足，过一阵子之后，他还会再回来——他自己无法停下来。"

汤姆·库克问，我对这名敲诈者可能的住宅有无看法。看过利兹市的历史和地图后，一个很大的三角形已经出现了，利兹市、伯明翰市和亨廷顿市。他非常了解利兹市，足以确定朱莉在什么地方，也能够将她带走而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亨廷顿市投下头两封信，并在伯明翰火车站的中心位置选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电话亭来接听第一笔赎金的投放指令。所有显著的位置都与很好的公路和铁路条件联系在一起。

"他与西米德兰区有很强的地理联系，我觉得他就生活在这个三角区内的某个地方，"我说，"如果你们要我伸出脖子来仔细看看，那我觉得右边那个角更靠近朱莉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我讲完之后，大家休息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警方怎么想。其中

一些人也许对这份描述心存疑虑,另外一些人不知道到底怎么想,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接下来就是讨论决策的问题,这是更微妙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能冒犯专业人士,也不能够说目前的调查是在朝错误的方向走。

在我看来,他们有5个选择。

1)追寻所有现有的调查线索,但不管威胁,也拒绝谈判。这不是上策。朱莉已经死了,杀死她的目的是要引起警方注意,如果警方不理睬他,我毫不怀疑全国各地会有很多妓女死亡。

2)发动强大的媒体攻势,把所有的细节公开,希望有人能够将他辨认出来。这种可能性极小,但极有可能让他退缩几个月。然后,他再回来,也许再杀几个人表示他回来了。

3)对他的要求让步,付出赎金,相信他会退出去。这不是警察能够做出的选择。

4)公布虚假的罪犯轮廓描述,例如说敲诈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低智商和性欲不成熟者。尽管我是出自全面考虑的需要而将这一条包括在内,以便诱使罪犯出来联络,但是,我很快将这一条消除掉了,因为这个办法太危险,罪犯有可能会再次杀掉一批人,以惩罚警察对他的侮辱。

那就只剩下第5种选择了:把游戏玩下去。如果刑事管理小组委员会都认为他最大的动机不仅仅是钱,而且还有竞赛本身的话,那么,这就必须成为全部调查行动最重要的组织动机。按我们的话说,把这个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到场上来,并在每个环节理解可以给他的选择,我们就可以让他的游戏需求得到满足,这样可以使他分神,不再想办法去杀人。同时,我们可以使他走得更近一些,使他暴露出更多关于他那一方的信息,或者使他产生过度的自信,产生麻痹思想,从而使他的行动出错,导致将警方引到他身边来。

正如罗德雷·韦切娄一样,每一次新的接触都会增大我们抓住他的机会,每一封信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让他觉得他可以赢得这场游戏,然后准备好打击他。

第5个选择,也就是最后一种选择被接受了,警方准备好了与他进行下一次的接触,并接受他肯定会提出的要求。行动小组必须准备好应对他制造的任何一种情形,而不能够仅仅等待事情发生后再

临时做决定。其中一部分工作涉及选择和反复演练送钱人。涉及数十名警官和专家的庞大的凶案及勒索案调查行动，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将集中到单独一名女警官的头上。在那段时期里，她肩负着整个行动的重任，而且我们还必须确保她能够应付这样的压力，并且有能力处理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这次外部行动得到了地区刑事组，在本案中就是第3小组的协调和支持，他们的基地设在威克弗尔德，有一名高官还来到林肯市的贝弗斯托克之家来看我，当时我一个月在那里进行一到两次门诊工作。我们讨论了能够取得成功的送钱人或者谈判者的条件——必须是一个聪明、脑子转得快，也能够处理快速变化的情形的女警官。她必须维持自己的角色，哪怕在她感觉到完全孤立无助，而且处在一个精于计算、极富欺骗性的杀手的威胁之下也不能够吓得不能动弹。

敲诈者会有意用自己的用词、腔调和节奏来控制和吓唬她，也许甚至还会进行更直接的身体接触。

"她必须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演习，"我说，"我不管她说她有多么自信，她一定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那个人跟她讲话时，一切都会停滞下来。"

几天之后，那位警官让我认识了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女刑警，她跟我握手的时候，眼睛直盯着我的眼睛。安娜（非真名）有丰富的从警经验，但从来也没有去充当过送钱或交货人。她的外貌看上去有点问题。敲诈者曾规定，警方必须派以前的那名女警察。他会不会发现这里面有什么变化？这取决于他上次离那名女警察的距离有多远。如果他发现已经换了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许会再杀一个人，或者去哪家商店放一把火。欠如何防止这件事？我考虑了半天，提议做一个造假故事。我们可以告诉他说，第一位女警官因为工作压力告了病假。这会增强他所需要的控制感和恐吓感。

安娜坐在贝弗斯托克之家我的办公室里，听我描述那个敲诈者如何有可能操纵她。最后，我让她拿起附近的一部电话，并站在她身后她看不见的地方。

"你好，我是朱莉，"她说，声音听上去有所准备。

"关掉你的无线电——马上！"我大喊起来，装着一个敲诈者所能有的全部的恶毒和操纵感。

她畏畏缩缩地说："我……我没有发报器。"

"别侮辱我了，"我痛骂她，"我在电话亭附近加装了一个无线电监测器。我知道你有一部发报器开着。关掉它！"

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安娜在考虑我们刚刚谈过的一些细节："听我说，我们正在努力满足你的需要，非常诚恳，但是，请告诉我，你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

"我要他妈的问几个问题，把那个送话器关掉！"

"好吧，好吧，我现在就做。"

安娜表示，她不是要关掉步话机，她知道那个敲诈者并没有什么监测器，他只不过是想唬弄人。如果他当真有一台，她会说她在惊慌中打开了开关。

"现在试试别的，"我说，"哪怕他威胁你，讥笑或者虐待你，那暂时也不要惹急他，尽量友善一些，让他觉得你是在按他说的做。但是要记住，他还必须明白你只不过是来使，他无法从你那里获得任何政策上的让步。应该让他明白，虽然你有可能想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你只不过是轮子上的一个螺丝钉。你可以利用自己处在不利地位的态势来满足他的控制需要。"

这次，我又站在安娜身后，让她拿起电话。

"把电话亭里的灯泡卸下来，"我说，"然后等待 20 秒钟，走到电话亭后的那个灌木丛里去，上那辆蓝色福特车，车就停在那边，上车后立即开走，一直向前开。走左边第一条车道，以每小时 45 码的速度开，在左侧 1.25 英里的那个停车道旁边的电话亭旁边停下来。走进电话亭，在那里等待电话。这个时间都是经过精确定位的，如果 6 分钟内你无法到达那里，我会明白你没拿我说的话当真。啊，你一定已经甩掉观察你的人和后备人员了，不管怎么说事情也就是这样了。马上动手！"我大叫一声。

安娜说："这我做不了。我无权做这样的决定。"

"不，再试试，"我说，"不要光说不行，还得告诉他一些理由。"

"我可以按你的要求来，但我不能把灯泡卸下来。"

"我不想听你的借口。"

"我知道你是当真的，但是，我很害怕不能到达那个地方。"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否则今晚会有人死掉，而且是因为你的错

而死的。事情不是我来决定——她的生死取决于你现在做什么。"

对话继续下去，我们不断地练习，反复磨练安娜的反应，直到她有能力流畅和自然地应对很多种威胁、要求和诡计。最后，我有了相当大的信心，如果行动的这个阶段出了错，则不会是因为这名信使出了问题。

8月6号，是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投放赎金的活动重新开始，安娜在莱斯特森林东站的电话亭里等候。最后期限过去一小时后，各行动单位解除了戒备。敲诈者没有能够保持联络。两天之后，另一封信在利兹市邮件分检处发现了，是从诺丁汉寄出来的。包勃·泰勒将内容传真给我了。

朱莉：

因星期一晚上在哈德斯弗尔德的红灯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质，因此星期二未能如期抵达，另外，星期一晚上，我们那对可爱的情人也没有出现在情人胡同，后者比妓女更为重要，因为如果警察不合作，则妓女可以随时处置掉。因为必须找到另一对合适的伴侣，因此，日期必须改在星期三。这样一来，会有电话在8月14号星期三晚上8点15分（不是8点30分）打到老地方。额外的15分钟是因为地点变化而需要的时间。

另外，这次你们的女警官将需要一把斯坦雷式的刀子，刀口必须十分锋利，这次她不会走到原来的那个电话亭去了。这是你们在原来的那个地方接听电话的最后一次。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错，你们不会得到已经投入了爆炸装置的地点，也不会知道妓女的尸体所在地，提醒你们一句，你们是在24小时内找到朱莉的尸体的。我的确想到过要等事情全部完毕后藏起她的尸体来的，但我为她感到难过，她之所以非得被杀掉，是因为她看到了自己被关押的地方。但是，这次，第二名妓女将被关押24小时，如果有任何错误出现，我这里也不会出问题。

我还想知道你们希望被告知爆炸物所在地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必须通过莱斯特的第二个而不是第一个电话亭告知我。

这次，他又为失约而道歉——几乎是在说"如果你们一直跟我玩

下去，我也会跟你们认真玩”。他希望警方崇拜他，把他看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又有一批误导性的线索扔进了锅里，就好像一把盐，一撮佐料一样。斯坦雷牌的刀子？他另外需要 15 分钟？胡同里的情人和日期的变更？他喜欢在锅里搅几下，然后看着它冒泡。

行动按指令于 8 月 14 日星期三再次开始，这次，电话是在 8 点 16 分打来的。勒索者说，他又找到了一个人质，是从伊普斯韦奇找到的一名叫傲萨娜·达卫斯或达卫茨的妓女，他命令安娜从向北的 M1 号公路一直走到第 40 个交接处，然后走 A638 号路到威克弗尔德。走完八分之一英里后，在一个汽车站的右手处她会看到另一个电话亭。她总共有 90 分钟。

在控制中心，刑警们挤在一起，想尽快查明有没有人报告一名女性在伊普斯韦奇附近失踪。一队没有标记的警车护送安娜到了下一个接头处，她在顺着公路走，发现八分之一英里处并没有电话亭。附近有两个可能的电话亭，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另派了一名女警官去那里，这样一来，两个电话就都有人接听了。

安娜没有接到电话，电话打到另一个女警察那边了。拿电话筒的时候，她却发现话筒卡住了，这女警察想把话筒弄下来，却听到勒索者说他半小时内再打回来。11 点 30 分还没有电话打来，结果这次行动又撤销了。

包勃·泰勒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并没有隐藏住自己的烦躁。他咒骂英国电信，也咒骂勒索者。电话筒卡住了，这是个简单的故障，但是，他现在害怕警方将因为另一名女性的死亡而受到惩罚。

与伊普斯韦奇警方查对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人失踪，绑架所用的那条街名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还向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警察局长发了电传，让他们知道有可能会发生另外一次绑架案。

8 月 15 日早晨，M1 号高速公路上的一名清道工在第 37 个交接处发现一块涂有白色的砖块扔在一处废弃的铁路桥附近，这座铁路桥跨过了那条公路。这块砖头上还系着一个棕色信封，附近还有一只银色锡罐，上面有两只灯，其中一只还亮着。

南约克郡警方不知道有一个反勒索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他们担心那是一枚炸弹，因此请来了军方的一个排弹小组，这个小组利用遥控机器人毁掉了受怀疑的装置。信封留了下来，里面有一封用蜡纸

写的口信，命令警方到另一座人行桥上去，那座人行桥就在离高速公路不远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另外一块有白色油漆的砖头，但再没有发现信件。

尽管有东西不见了，但这条赎金投放线路倒是清楚了。勒索者想将送钱人派到人行桥下，他会把一条绳子从桥上放下来，然后由她用钩子钩起来。之后，他会拉上去，自己再逃跑，也许沿着废弃的铁路跑。

铁路连线使我很有兴趣。新街车站在第一次提要求的时候就用到了，朱莉的尸体也扔在一段废弃的铁轨附近，而现在，最新的赎金投放地点又设在杜芙谷铁路线，也就是另一条废弃的铁路线。同时，所有的信件都是从经过铁路网的城镇寄出来的，而且就在离车站几百码远的邮筒里。

如果将一枚小卵石放在地图上，它有多少次会落在离废弃的铁路线或者铁路桥不远的地方呢？这是我自问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是的，但并不是三次投放就会三次落在同一个地方。铁路明显是这个人生活和计划当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他不一定在铁路上工作，但是，他对铁路的兴趣决非一般。

他的赎金投放工作失败的六天后，第七封信到达利兹市，这封信是 8 月 19 日从格兰特汉姆寄出来的。信里面满是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显示出这个人有多么大的操纵欲，是多么狡猾的一个人。

伊普斯韦奇根本就没有妓女遭绑架。反过来，他说那都是一个诡计，想看看警方会如何应对和反击他。他只是在为未来更大的赎金要求收集一些信息。

他写道：

游戏现在已经废止。英国警视厅会告诉我想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但是，我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却是那个包裹，我从来都没有指望那个包裹里面会放钱，但是，我要想办法让送话器无法工作，让它失去效用，我希望得到警方使用的那种送话器的类型……

在我再次尝试之前，诸位可能需要时间整理一下文档，这一切也不过是为了一些文件嘛，如你们现在都知道的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去伊普斯韦奇抓住什么人，也没有这样的计划或者设计，朱莉不幸死去

之后，我再也不需要这样做了。你们会表现出合作精神，我需要怎样就怎样。

为了你们记录的方便，告诉你们：朱莉是于7月9日星期二晚上11点30分被我捉到的，就在罗德雷路附近，她当时穿一身牛仔上装和一条裙子，我相信我上次已经提到过一点，说明了时间和死亡的原因。尸体很快抛掉，是因为它原来放在一个温室不透气的箱子里的，当时天气很热，已经在里面放了两天……我用那不透气的箱子将尸体搬到了你们找到她的地方，你们根据轨迹可能已经知道了。

信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解释信息是如何留下来的，那个方案是何等的聪明，但是，他写的一切都需要打上问号。他放这个烟幕弹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把一些真实的细节夹杂在谎言中，试图将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这封信还确认，朱莉·塔特是作为一种展示被杀的，根本不是偶发事件，尽管他还努力掩饰起自己的动机，说他根本没有那么残酷。

8月21日，勒索案终于曝了光，《约克郡晚报》的头版头条上登载着："要么付赎金，要么我再杀人。"

刑事调查管理小组曾决定将事件公开的，因为一项石墨测试显示出勒索者留在信封上的一道信息。它原来有可能是在另外一张纸下面的，有人在上面的纸上写道："马维斯，星期二我不在家，费尔。"

没有办法证明这是假造的还是真实的，但是，包勃·泰勒公开了这个内容，希望有人会认出名字，并打电话报警。这样就触发了另外30多条必须跟踪上去的线索。

同时，勒索者已经悄悄地潜入地下了，尽管我知道他一定会再次浮上来。他太喜欢这场游戏了，不可能让它这么快就结束。在整个九月份，我经常接到泰勒或者他的一个手下的电话。我实际上碰到了一对正在企图跟踪一辆特别车辆的情侣。

有数条线索跟踪上了，包括有人在巴恩斯雷的一条情人胡同里看到一辆值得怀疑的红色铃木牌汽车。刑警还跟踪了涂有白色油漆的砖头的来源，并将那些砖与一家已经倒闭的制砖公司联系起来。

沉默于10月15日打破了，当时，一封寄给英国铁路公司的信送达伦敦的尤斯顿车站。里面的第二个信封上面有标记："仅高级官员

收。”

除非我们得到20万英镑的款项，否则我们会使一辆铁路快车翻车，要么是在东海岸的225号铁路，或者是在西海岸的推拉式铁路枢纽。我们已经选好了一处高速路段，一些材料已经隐藏在附近了。下面描述我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们对行动计划是相当认真的，如果你们对此信置之不理，或者钱不及时送到的话，我们将实施它。我们知道你们会告诉警方的，但是，如果在媒体上公开，或者有明显的警方行动，那都将导致失去联络。如果你们不理睬这封信，你将发现我们到底是不是当真的。

如果你们还假装满足我们的需求，但又不真的送钱来，那么，下面这样的事件一定会让各位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

这封信继续详细地描述币值以及如何将钱捆好、包好，最后放进一只没有加锁的箱子里面的问题。英国铁路公司必须于接下来的星期一在《伦敦晚间标准》报的个人栏目上登载一个广告，广告内容为：“火车准备出发了。”

两天之后，也就是10月23日星期二，英国铁路公司的两名女员工只好带着钱开车到了克鲁里车站。其中一位女职员必须一直留在车厢里，另外一个在约晚7点时在平台上等候接听电话。

她必须回答：“我是阿曼达。”然后会得到另一个火车站的名字，她必须马上去那里，然后在那边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接听电话的人必须穿上一条裙子，还必须穿高跟鞋，我们不希望见到受过培训的奥林匹克运动员，那名妇女还必须带着一张较好的公路图，还有很强的公路方向感……

注意。作为防范警方伏击的措施，我们有一张王牌拿在自己手里，这是我们拿到钱的时候可以打出来的一张牌。关于这一点，你们稍后便会清楚。但是，你们的女性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如果她们不想装什么女英雄的话，取钱的时候将有手枪对准开车人，但是，她不会看到任何人。

这封信一开始受到英国铁路运输警察局的调查,然后送交苏格兰场。亨氏食品勒索案中的一位熟人,也就是帕特·弗莱明警监受命负责此事,并作出决定说,如果威胁是真实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在那个阶段,他不知道西约克郡的警察正在跟踪一个杀手和勒索者。

同时,包勃·泰勒也有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利兹市米尔加斯区西约克郡警察局局长"的。"米尔加斯"几个字拼写有误,后来成为最关键的一个证据。

事关朱莉:

鉴于你们仍然没有找到我的蛛丝马迹,现在到了从你们手上获取 14 万英镑的时候了。因为已经杀了两个人,我对于判什么罪已经无所谓了,一个是杀,两个也是杀,而且妓女也很容易找来杀,但是,如你们知道的一样,这次我是在谈生意,星期一之前我根本不需要再去找一个人来,而且我已经将提钱事宜考虑得很周到了。钱数跟上次是一样的。

10 月 21 日星期三,同样一名女警察必须在晚上 8 点之前出现在卡利索尔车站的 3 号站台(斜坡底部)上的电话亭前,作好准备在约晚 9 点 15 分接听信息(录音信息)。

我相信你们会把钱送来的,因为你们不想威胁一名女警察或者妓女的生命。

几天之内,苏格兰场和利兹市的凶案小组已经确立了那个联系,我也将信件拿来进行过比对。我毫不怀疑那些信是由同一个人写的,尽管他想尽办法掩盖这一事实。里面有无数的线索——语法很差,用大写写的地址,相对较少的现金要求,利用铁路,还有关于如何捆钱和包钱的长而仔细的指令。这些相同点远非其差异性可比拟的。

第 2 封信明确说明投放赎金的不正确日期——10 月 21 日星期三。星期三比 21 号晚两天,是 23 号,也就是英国铁路公司投放款项的同一天。这是有意设置的一个错误,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勒索者是想将警力分散,让他们同时在长达 150 英里长的铁路线上采取监视行动。来自不同地区刑事组的数以百计的警察会跟踪同一个人,并

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彼此干扰。

我推测有第三种可能：他哪个送信者也不联系。也许他只是想坐在那里大笑，因为明白警察每次都有挫折和失望感，他们的热情和耐心一定会磨完的。

对英国铁路公司的威胁包括描述如何利用两块I型钢卡在铁轨之间使高速列车脱轨的一张图纸。有专家确认，这样的一个装置的确有可能使高速列车脱轨，并以时速100英里的速度使火车飞入空中。这样一定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然后，帕特·弗莱明打了一个大胆的电话，他选择不按勒索者的要求行事。他希望等待时机，并希望通过报纸栏目与勒索者交流。在指定的时间内，女警察苏珊·伍雷在克鲁里车站接听了电话，但她没有说“我是阿曼达”，而是假装一个来往搭车的人，她只是听见电话铃响就接了。同时，在卡利索尔车站，安娜在那里白等了半天，监视行动只好作罢。

10月28日，第2封信到达了尤斯顿车站。

祝贺各位，你们现在有资格得到应有的报复了。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一个小小的惩罚会实施出来，一列电气机车的集电弓架会给撞下来，然后极有可能会有一节电线断裂，合适的地点尚没有选择好，但我们正在研究当中。这只是小试牛刀，我从一开始便希望证明我的决心。

五天之后，英国铁路公司的一位巡道工在离米尔密斯村不远的沃尔法汉普顿的西海岸铁路线上，发现了好几块砂石堆在一座铁路桥的正桥底下。其中一块石头上面写着“致英国铁路公司执行官”。仔细检查显示，那块石头曾钻了一些孔，最开始是用绳子和铁丝吊在桥上的。那是个隐蔽的爆炸装置，用来毁掉机车的集电架——集电架是从车厢延伸到顶端电缆线的一个装置。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损失只会使火车在几百码的范围内停下来。最差的情况是，它会使高压电缆断裂，从而使乘客触电。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装置没有成功，因为火车的冲力可能把悬挂的东西冲跑了，然后又在铁轨上压碎了。

但是，勒索者又一次展示了他对于火车的了解，还有他的毁灭潜力。他不仅仅是一个怀着敌意搜集机车号码的人，而且，铁路系统也像是一个框架，他所有的计划包括了铁路系统。

朱莉死去已经4个月了，警察感觉到至少有两次要抓住这个杀手了。直到他下次再玩游戏之前，警察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跟踪每一条线索，并收集起审判证据，为有朝一日对他的审判提供有效的证据。

8 游戏尚未终结

最典型、安谧的圣诞节是没有风雪肆虐的圣诞节，村庄周围的小山上浓雾并未消散。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之后，我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继续那里的工作。1月24日，我在老守门人的房子里进行院外病人问诊，守门人的这个门房是审判单位的一个小小的前哨。此时，我的秘书迪安插话了。

"西米兰德的一位名迈克·詹金斯的警督要你马上回电话，是急事。"

我这天下午的日记是这么记的："西米兰德——出了麻烦。"詹金斯告诉我说，一位年轻的房地产经纪人斯戴芬妮·斯雷特被人绑架了，随后寄来了一封索要赎金的信件。如他所说，朱莉·塔特躺在泥地里的形象出现了，往事立即就在我的头脑里闪现出来。他又回来了，我想。

在开车去伯明翰的路上，尽管我不认识斯戴芬妮，但是，我一直在想像这样一位年轻的妇女被人绑在什么地方，也许还精疲力竭，可能受了伤，也许由于担心和难以置信而吓得要死。这样形成的一种紧迫感是我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案例当中都没有产生过的。某人的生命处在随时结束的危险当中，取决于警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斯戴芬妮可以活下来，也可能随时殒命。

到达伯明翰的劳埃德之家时，已经是下午5点30分了，詹金斯前来迎接。他是位老式警察，一级级爬上来的。刑事组的助理局长

费尔·汤姆斯也来迎接。我以前在内政部组织的罪犯轮廓描述评估工作中采访过汤姆斯，发现他是位个子高大但也很聪明的人，说话的声音跟他的骨架相配。自那以后，他做了一次咽喉手术，声音也就完全变了样。

他们大致介绍了一些情况。两天之前，22岁的斯戴芬妮于上午10点30分离开她在格雷特巴尔的船台房地产代理公司，带一位男性客户去看腾贝里路附近的一个三居室房子。客户说他是威克菲尔德的阿·索斯沃，一个星期之前给该代理公司打电话询问购买房子的事情，后来又到公司来了解20多处闲置房产的细节。

数名邻居在斯戴芬妮到来之前曾看见一名男子等在空房的门外，他们描述他年约40多岁，约5英尺8英寸高，齐脖子长的黑发，戴黑边迈克尔·凯因式眼镜。半个小时之后，其中一位邻居看见一辆浅红色汽车停在屋后的一条胡同里。侧窗上写有"排水管堵塞并损坏"字样。

中午，船台公司的另一名职员西尔维娅·贝克接到一个电话，是找经理凯文·瓦茨的。打电话者为男性，说斯戴芬妮已被绑架，索取赎金的信件会随次日的邮件送达。他最后警告说："如果报警，她必死无疑。"

这家代理公司很快查明，所提供的地址根本没有索斯沃此人，他提供的电话是诺丁汉郡A1号公路旁的一处电话亭。斯戴芬妮的汽车在空房外找到，房间里面的楼梯处还发现墙上有一小小的血渍。

"我们一起去重案室吧，"詹金斯说，"之后你会看到事发地点和照片。你还可以与值勤的警员谈谈。"

我们开着一辆车速很高但又没有挂警牌的车从灯光明亮的市中心出发，经过喧闹的住宅和商业区，最后到达内切尔斯格林的两层楼的警察局后面的一个小而挤的停车场。窗户都挂着帘子，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是灯火通明的，分别都贴着行动组的各个临时小单位的标志，有特别调查室，有简报室，有事件室等，全都是大型侦察行动组织的专家功能组。

到了特别调查室后，詹金斯将我介绍给其他投入行动的高级刑警，然后就递给我一页传真。"我们在分捡室截获了这封赎金信和一盒磁带，"他说。

这次，拼写和语法错误又属于这个勒索者。

贵公司职员已遭绑架，交出 17.5 万英镑后可获释放。若有运气，他会没事，不会受伤害，为证明这一事实，你们将于次日或稍后几天收到一盒录音磁带，上面有他的声音。他将在 1992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获释，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1 月 29 日星期二，支付一笔数额为 17.5 万英镑的赎金，不得越过此时间限制；

2)不得以任何形式通知警方，直到他获释为止；

那笔钱必须用手提袋装好，并严格按照下述方式封装：50 磅面额的旧钞共 7.5 万镑，20 镑面额的旧钞共 7.5 万镑，10 镑面额的旧钞共 2.5 万镑，分扎成 31 捆。每捆各 250 张。

必须由凯文·沃茨（如果不是由别的人质）充当联络人，必须由他将赎金递送至指定地点。但是，请注意，所有消息都是预先录制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通信或谈判。

你们已经接到警告了，他的生命就在你们身上。

一盘普通的磁带插进了办公桌上的一台机器。斯戴芬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听上去很担心，但并没有到害怕的程度。她诵读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文字，全都是绑架者写的。在一片静寂当中，我几乎能够听出即将提出来的问题。但是，在我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思考这封信背后的作者。

我明白，每过一个小时，斯戴芬妮的生命就受到更大的威胁，也使封锁消息的任务更艰巨，但是，我又不能够武断从事，过于匆忙。别人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为警方提供咨询是有危险的，因为所提供的建议如果太离谱，则有可能将刑警引向完全错误的方向。在这个时候，哪怕一丁点错误都有可能导致斯戴芬妮被杀害。

我不太情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因此坐下来研究那封信，我很自信，作者一定会暴露自己的，不仅仅会从信纸里暴露自己，而且还会在犯罪本身的结构当中暴露出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他的方法当中找出蛛丝马迹，并把这些蛛丝马迹描绘到我们对人格和动机的心理理解中去。这花了我好几个小时，反复再三地研究事件发生的时

间，最后我相当肯定了。我以前与这个人打过交道。作者就是杀害朱莉·塔特的那个人，也是想从英国铁路公司勒索钱财的人。

根据计划、智力和傲慢的口气可以看出来。信中的拼写和语法错误是相同的，钱要打好包的方法也是同样小心的。很明显，这次勒索是长时间准备的结果，也是带有丰富行为色彩和精打细算的计划。他让人猜想他原来是准备抓一个男性员工的，这一点是他设的一个圈套，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圈套。这与这次行动计划的其他一些细节不太相符。在两个案子当中，朱莉和斯戴芬妮都被迫送出口信，以确认她们被人绑架了。

“你能肯定这是同一个人吗？”詹金斯问。

“差不多可以肯定。我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

“他是不是认真的？”

“很认真。”

“他会杀死斯戴芬妮吗？”

“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他杀害过朱莉·塔特，为的是要证明这一点，他这次冒了更大的险。他约会的时候让自己在船台公司被人看见了。”

“斯戴芬妮有没有可能已经死掉？”

“不可能，他会尽量让她活着以证明生命还在，以便录制下一道消息。”

托马斯问：“这是不是说他计划在最后杀死她？”

“这取决于你们做什么事，也取决于斯戴芬妮。他知道警方会卷进来，他也明白斯戴芬妮会认出他来。”

我解释说，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她对勒索者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有些人受惊后非常温顺，如果斯戴芬妮一直消极顺从，而且对勒索者表示一定的尊敬，这有可能会打动他，并使他不太可能去伤害她。

这些还只是我最初的一些评论，我必须更多地了解斯戴芬妮才能够更好地预测她的行为，并确定她为什么会被特别挑选出来。

虽然人们极想尽快抓住绑架者，但是，一切都会让位于两个最主要的优先任务——让斯戴芬妮活着，并且让她安全返回。

我给玛丽莲打电话的时候，不能够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新闻封锁。“你在哪里吃饭呢？”她问。

"我会想办法的。"我说,眼睛看着桌上一点也不想吃的三明治。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慢慢熟悉事件室了,每天一直工作到深夜。我最主要的联系人是汤姆·法尔探长,他随时向我报告各个线索追踪的最新结果。

星期天下午,斯戴芬妮的父亲沃伦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女儿在录音电话里说,她一点也没有受伤,还说出了头天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然后她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我不好说太多话,不管结果如何,我会永远爱你的。请带好我的猫。"

离交付赎金只有4天的时间了,现在话题回到了警方应该如何行动的事情上。船台公司的母公司皇家人寿地产公司乐于支付那笔款项,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有一名年轻女性的生命押在赌桌上,这里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主义精神了,否则会危及她的安全。警方会跟着凯文·沃茨掌握赎金提交线路,等他放下钱,然后跟踪勒索者到他藏身之处,最后找到斯戴芬妮。

曾想到过要在钱上安置一些跟踪装置,但是,警方不能够肯定那个绑架者到底是不是在吹牛,也许他真的拥有一些小装置能够扫瞄这样的跟踪装置。这个险不值得冒。其他的一些点子包括用便衣警官替代凯文·沃茨,或者在他的汽车里藏一名刑警。这些方案最后都一一否决掉了。

根据我对这个人的计划和专业知识的了解,有可能他会准备一个筹码,以防自己被抓住,比如宣称斯戴芬妮只有有限的氧气供应,或者说她穿着不能长期保暖的衣服。但是,思考过这些以后,我有一种信念,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非常自信,根本都没有想到过自己有被警察逮捕的可能。

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凯文·沃茨将把钱放下,一个人走。他身上将携带一个发射装置,空中和地面将有50多名皇家通信兵尾随。

托马斯问我说,送钱的人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有数种可能的情况出现,但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勒索者会给他一系列复杂的指令,带他走出监视圈并且失踪,从一个电话亭到另一个电话亭,让警力铺到无法涉及的地方。

然后会出现两件事情——要么勒索者很快地干扰事情的进程，希望让警察猝不及防，或者让警力铺得很开，让警察在极长的距离内来回折腾。伯明翰和西米德兰一带的交通一般非常繁忙，旅行时间很难预测，因此我推断，他会采取第二种选择，即让警力铺得极开。

看着他过去的活动地图，我想投钱地点应该在三角区的北边，那是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一旦他觉得警察已经被引诱到在电话亭之间来回折腾的圈套中，他会在两套指令之间突然行动。他会制造一个改道的条件，挡住一条路或者迫使凯文的车靠边。

我最后说的几句话之一是："请记住那些桥和废弃的铁轨"。

1 月 29 号星期三下午 3 点 35 分，凯文·沃茨在船台房地产代理公司接到了电话。钱已经装在他车后厢的一只口袋里，然后他沿 M6 号公路向北开行，绕过曼切斯特市，然后开上 A57 号公路到达离曼彻斯特东边 15 英里远的格罗索普火车站。下午 7 点，电话指示他到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那里已经有一个信封贴在话台反面。

我自己留在家里，但我的思想仍然跟凯文在一起，一直跟踪着他孤独的旅行。凯文可以用双声道无线电与伯明翰的警察通话，将指令传递至悄悄跟随其后的不同的汽车和摩托车。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浓雾飘了出来，而且越来越浓厚了。凯文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乡村路上穿行，因此只好将车速降到几乎是爬行的程度。他艰难地找到了各种不同的电话亭，每次都会拿到新的指令，最后让他来到南约克郡奥克斯普林附近的一处偏僻的奔宁山区的小路上。

因为浓雾的原因，无线电联系断断续续，凯文在背诵不同的指令，希望警方能够听到他。能见度已经降至 5 码，这个时候，他按照指令在一处红白相间的锥形交通路标处停下车来，并将钱投进一个早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口袋。里面有指令告诉他拿着袋子到另外一个电话亭去等候，但这只是一个花招。

在一百码之内，凯文在小路中间看到另一处锥形交通标志，还有很大的一个纸板标语。

停车

仅只60秒。

靠近有标语(4)的墙边＞木盘＞不要移动盘里面的探头将钱跟袋子放在盘里＞如果蜂鸣器没有响，将钱留在里面＞把汽车前面的路标拿开，然后开车＞你离开后才会有人来拿钱。

凯文将钱放在木盘里，木盘放在一座桥的胸墙上，然后，凯文开车离开，一边用无线电拼命跟警察联系。跟踪的警察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投钱的地方。他们到达桥头的时候，剩下的一切就只有那个锥形交通标志，一个用喷罐喷的号码4，还有放木盘的那个胸墙上的一层薄沙。

绑架者躲在废弃铁轨下面30英尺的地方，他只是简单地拉动系在木盘上的绳子，钱就滚了下去，然后他就骑着摩托顺着小路跑了。总长达110英里，费时4个小时的监视行动变成了一场灾难。浓雾使一切泡了汤。

斯戴芬妮·斯雷特会怎么样呢？

4个小时后，一位跟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格雷特巴尔市波斯托克路的32岁的喷漆工听到屋外有汽车停下来了，而且发动机还在转动。他从卧室朝外面看去，看到一辆朱红色的微型梅特罗车，里面还坐着两个人。一位妇女走了出来，跌倒在路上，看上去好像喝醉了，没有方向感。

几分钟后，沃伦·斯雷特打开了前门，斯戴芬妮倒在他的怀里。

当天早晨我接到电话，得知赎金投放的事情。最开始的惊慌和勒索者失踪的消息造成了震惊，但因为斯戴芬妮安全回家，而且没有受任何伤害，因此震惊很快就消失了。警方惊喜不已，我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当我得知绑架者拿到赎金的方式时，我不禁大骂自己，并保证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一定会坚持守在指挥室里。

浓雾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我知道那些桥和废弃的铁轨，它们在那个人的计划当中扮演了极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当时在场，一定会提醒警方注意，要他们注意比较每次指令与附近的铁路桥和废弃铁路线在地图上的关系。监视小组有可能会查出这些地方，这样尽管有雾也有可能抓住绑架者。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询问斯戴芬妮，让她回忆出被绑架时的

每一个细节。心理学家常常使用一种称为“认知谈话”的方法，专门用来一步步慢慢地带受试人回到过去，让他们处在一个场景里，要他们以不同顺序描述事件，找到各个场景的细节、响声、气味和质地感。

虽然没有请我去跟斯戴芬妮谈话，但是，几个月之前，我曾用这种方法与一个12岁的小姑娘谈过话，她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绑架，并残酷地遭到强奸。

当地的刑警要求为她的攻击者做一个心理轮廓描述，但是，我看过克洛尔的原诉后发现没有足够的信息供我作出任何确切的结论。我需要了解关于她受攻击的一切，他的车辆，行走路线，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但是，我们如何掌握这些内容呢？克洛尔明显受了惊吓，我们要考虑罪案调查的需要，也必需考虑她的处境。这名罪犯还有可能攻击另外一个姑娘，下次还有可能杀人。

她母亲和父亲不同意做应该做的事情。其中一位看到她的痛苦，因此不忍心，希望我们不去找她谈，但另外一个发现她有足够的力量，也决心要抓到伤害她的人。最后，大家决定继续进行下去，我也选择在她家进行问询，至少让她觉得有些安全感。

我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认知谈话结合深层放松。克洛尔闭着眼睛靠在长椅上，手就放在双腿上，我解释说，我将带她回到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去，说我知道这会让她觉得痛苦，非常非常痛苦，但是，我不会更多地伤害她了。

“如果我请你告诉我一些有可能让你感到恶心或者害怕的事情，你应该伸出左手的手指，就这样，然后我就会停下来，让你有一点点思考的时间。”我就向她示范，“如果我说得太快，或者说你搞糊涂了，那你就伸出右手的手指，我会回头慢慢地说。”

我们尝试了放松，然后练习了一会儿默想，直到她感觉稍好一些，知道她自己能够控制谈话过程为止。并不是由我来开始说：“现在，做一个勇敢的小姑娘，把那个恶棍对你做的一切告诉我。”我们是一起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克服了其中一些伤痛，绕过了一些障碍，把她试图隐藏起来的一段一段破碎的记忆重新串在一起了。

我们一起开始。首先由她自己像拖网一样在记忆里搜寻，中间没有任何打断。没有经验的谈话者总想用一些问题或请求尽早进入

叙述，希望得到更多的细节。让她自己确立事件发生的全范围，我们会发现新的信息，这是直接提问时有可能会错过的。只有当她因为压抑而呆住时，我们才会及时插进一些轻柔的问话提醒她："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任何人都会是这样的。你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开始。"

后来，在讲别的一些细节时，最可能的事情就呈现在我眼前了。她先被人用黑布蒙上了眼睛，但绑得不是很结实，她仍然可以在绑布下看得见。

"你说汽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伤着你了，然后走到后车厢来。你能不能说说他怎么伤着你了？""他用一只手抓住我的肚子，然后用手搓我的屁股，还使劲拧，然后，嗯，他……"她停下来了，左手的4根手指全伸出来了。她小小的身体僵硬起来，我仿佛可以听到她的心在狂跳。

"克洛尔，你现在在自己家里，很安全，你爸爸妈妈都在厨房里，他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了。你先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等你觉得稍好一点点后，再举起手指来。如果没有事情，我们会继续下去。但是，我今天不再问你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了，我希望你从黑布底下朝外看看，告诉我他的手是什么样的。那双手是不是很平滑，很软，是不是很粗糙，很硬，或者是在这两者之间？"

她安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不能肯定她是否将一切都挡了回去，再也不想跟我谈起这些事情来了。然后，她轻轻地说："是一双柔软的手，手背后还有毛。"

"请再看仔细一点点，他的手指上有没有戴戒指？"我只能够用自己的口气来安慰她，并确保我们处在房间彼此离得最远的地方，这样可以减轻因为离另外一个男人距离太近而有可能很快引起的恐惧感。但是，我不能够给她任何线索，以免误导她的答案。除非我能够让她稳稳地保持在重新用感官来体验她的痛苦经验和处在家里的安全藏身处之间，否则一切机会都会丧失，而她重复过的痛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次又等了极长时间。

"是的，就跟爸爸的手一样。"

慢慢地，事件的顺序就越来越清楚了，而且细节详细得多。最终，她已经能够听到轮胎在柏油路上转动的声音了。她通过车后厢里的一个缝隙看到一排街灯，还有一条可以听到汽车声的深巷。她

现在可以描述汽车尾灯的样子了，这就使得车辆型号的范围缩小了许多。最后，她对攻击者的描述慢慢包括了他最喜欢用哪只手，还有他的眼睛，下半边脸，用的词汇，还能够准确地描述他的口音。

必须从斯戴芬妮·斯雷特那里得到同样多的细节。如果她看不见他的脸，那她看到他的手没有？路上花了多长时间？路是七拐八拐的还是直的？有些事情似乎毫不相关，比如日间的无线电节目，或者说出来的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警方派摩托车投递员将一些材料送到我家，几乎每天都有。后来发现斯戴芬妮是位极聪明的受试人，她看到了绑架者手背后的黑毛，还有他在词尾发 K 和 T 这两个音时的特征。尽管她眼上一直都蒙着黑布，但是，她明白自己被绑架的地方有一个老式的拔号电话，还有一部调在 BBC 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收音机。门铃听上去像是现金出纳机上的叮呤声。

因为她曾在那栋房子里与他见面时看到过攻击者的脸，因此，她可以帮助警方的画师很好地描述他的长相，还有他当时穿什么衣服。他穿的粗呢外衣的上衣口袋上有一个火车标记。她是在带他看楼上的卫生间的时候受到攻击的。她一转身，发现他一手拿着一把刀子，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尖尖的锉刀。“我吓坏了，大声尖叫起来，但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我真是害怕极了，只是在那里大喊，在那里尖叫。”她说。

他将她推到浴缸里，绑起她的双手，将黑色塑料眼镜戴在她眼睛上，这样她就看不见了，然后她在她的喉咙上绑了更多的绳子。再后他像狗一样牵着她下楼，走到外面他的车旁，里面的客坐早就完全后倾下去了。

她到达目的地后，也可能是天黑之后，她被他从汽车里带出来，进人了一间房子，然后系在一把椅子上。他给她吃了一些土豆条，绑架者就让斯戴芬妮换上他带来的衣服，然后在她手上和脚上戴上绑着铁链的手铐。

“我希望你不要患上幽闭症，因为你是在箱子里。”他说，然后他将她装进一口棺材一样的容器里。里面很挤，她只有侧过身来才能到达底部。他告诉她说，箱子的顶部有石头，如果她乱动，石头会砸在她身上。他说他还在箱子两侧装了电极，如果她想逃跑，很有可能

会被电死。

在接下来的7天里，斯戴芬妮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地狱里面。

我读着谈话记录，非常肯定有两件事情使斯戴芬妮得以生还。这个人并不是他想传达出来的那种拉费尔大盗的惯匪形象；他在报纸里一直都是一个冷面杀手的形象，他对此毫不在乎。其次，斯戴芬妮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感到如此震惊，成了一个完全听之任之、百般顺从的受害人。这对于一个极想获得控制感的男人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没有这两个因素，我敢肯定一定会有另外一具尸体扔在一块田野里。

斯戴芬妮回家后，汤姆·库克问我说，斯戴芬妮是否还有危险，或者绑架者有否可能再次与船台代理公司联系。我说他极有可能再次联系。斯戴芬妮已经对他非常重要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忘记他的初衷。哪怕他有一阵子会保持沉默，但他一定会再次回来，因为他希望再玩这场游戏。

媒体解禁后，头条新闻对于警方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情，我也很奇怪，媒体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怎么会那样批评警方。不管怎么说，斯戴芬妮还是安全回来了，因为她的安全返回一直是最重要的事项。在伯明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体负责联合调查行动的汤姆·库克透露了这个事件与朱莉·塔特谋杀案之间的联系。他描述了两个案子之间众多的联系，并说那名男子最主要的动机不是钱。

被逼问之下，库克说："嗯，这我们要看保罗·布里顿怎么看了。"

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在与刑事调查案件产生联系时公开提出来。结果这话立即产生了反应，库克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问题越来越多了，已经产生了泄露，再也盖不住了。当天下午，负责媒体工作的警官从利兹市打来电话致歉："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她说，"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错误。"

不久，新闻记者就找到我了，那天晚上，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心理轮廓描述已经成为当年最热门的一个故事当中的新视角，我一直苦心经营的匿名活动终于曝了光。

每次有人请我作出评论或者接受采访，我都礼貌地加以拒绝。"也许等他被抓住或者定罪以后吧。"我说，希望这样可以将他们挡在外面。同时，新闻评述把我描述成被与一个疯子进行的智斗困住的

人。我真的感到害怕了，因此干脆不看报纸了。

因为斯戴芬妮令人惊讶的回忆，调查工作产生了新的动力，慢慢的，警方开始收网了。一位极好的画师画好了疑犯画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还可以拿出那个杀人犯的录音。

开车前往伯明翰的途中，斯戴芬妮虽然眼睛给蒙上了，但仍然能够与绑架者说话，绑架者也告诉了她还差多少英里，而且快到的时候还告诉了她。根据斯戴芬妮的描述和所花的时间，他们把罪犯的活动区定在林肯郡一个A型公路的小三角区内。一组刑警住进诺丁汉郡边上的一家小旅馆里，随时可以快速出击。

1月7号，一封从谢菲尔德地区寄出的信件寄达利兹市米尔加斯警察局。还有复印件寄到了西米德兰警察局、琳·达特夫人、《世界新闻》、《太阳报》、约克电视台和BBC电视台。这三页纸读起来就好像是减刑请求，也像是杀人犯的辩护词的开头。

事实如下。

本人是绑架斯戴芬妮的人，但并不是朱莉·塔特的谋杀者。这两个案子之间不可能产生任何联系。

我也不是那么愚蠢地试图勒索英国铁路公司的那个人。那个想法是对我曾与一个人讨论过的方法的翻版，我现在相信他一定利用我的文字处理器提出了他的要求。之所以突然之间中断与英国铁路公路的联系，是因为我惊讶地得知他利用了我关于收取赎金的办法后介入了此事。我本可以利用此事，让警方继续认为那些案子彼此有联系，因为这对我有利，但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是斯戴芬妮和她的父母，不知道她们看了这些报道之后有何感想。我在几件事情上给斯戴芬妮做了保证，后来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做的其中一些保证包括：1)我以前没有杀人；2)只要她不取下眼罩，她最后会被释放，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当时不会，以后也不会……

我知道，能够也的确极其成功地实施了犯罪，这个事实才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对自己对待斯戴芬妮的方式非常恶心，也感到极其难过，也为自己对她的父母造成的伤害感到有罪……哪怕此时此刻，我的眼中仍然噙满泪水，我在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在哭泣，稍稍有一点运气，斯戴芬妮很快就会忘记这一切，而我自己呢？我永远也无法忘

记。

对不起，斯戴芬妮。对不起，斯雷特夫人及先生……

这封信以大胆的声言结束："这个案子永远也不会闹到法庭，因为我有后续计划，只要警方跟在我身后两步我便实施。"

很明显，他已经感到害怕了；画师的画像使他害怕，突然之间，他担心自己的行动自由了。他不想背上杀人犯的罪名，但是，他的无罪请求里面包含着他就是杀害朱莉的人的罪证。在致西约克郡警察局的信中，他将"米尔加斯"写成了"米尔加特"，他于去年10月寄给利兹市，并以"事关朱莉"开头的那封信正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另外还有类似的语法和拼写错误。

从心理学上看，他现在感到自己身后有人追踪了，并且装出后悔的样子，就好像是在为自己起草一个辩护词一样。他没有料到绑架斯戴芬妮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哄动效应，以致于警方将他与朱莉·塔特的谋杀案联系起来。

压力持续显出效果，2月20号，他打了电话给船台代理公司，要求与西尔维娅·贝克讲话。听到声音后，她按下一个按纽，通知了纳切尔格林警察局。

绑架者说："我是绑架斯戴芬妮的那个人。斯戴芬妮和你是惟一能够辩认我的两个人，但是，斯戴芬妮已经不会那么做了，因为她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你明白吗?"

当天晚上，英国警视台和ITV电视台都准备在晚间新闻中播放绑架者的录音磁带。将会有逾1500万人看到这个节目，观众还将听到一些细节，这个人有可能住在什么地方，他开什么样的车。

已经在事件室摆放了50条电话线，准备接纳潮水一般涌入的电话。其中一通电话是西约克郡凯夫雷市的苏珊·奥克打进来的，她把节目录下来了，当天晚上回家后看到了那个节目。她给事件室打电话，声称她辨认出了绑架者的声音：那是她的前夫迈克尔·山姆的声音，他在斯万的一家工厂和纽华克的萨勒姆码头经营电动工具维修生意。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伯明翰警察局，第二天早晨便开始了一项监视行动。背景调查确证，山姆的确拥有一辆桔黄色的奥斯丁梅特罗

汽车，曾因为欺骗和诈骗罪受到轻罪起诉，是个极喜欢看火车的人和铁路狂。事实上，51 岁的山姆作为一名疑犯仅有一点不太像——他只有一条腿。2 月 21 号中午前不久，4 名警官走进那个车间，只往里面简单地望了一眼便知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暴露出来的迈克尔·山姆的照片与几个月前拿出来的心理轮廓描述几乎完全相符。他属于那种差一步成功的人，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极有希望的运动员，但后来因为癌症而不得不锯掉了自己的一条腿。他的 3 次婚姻全部以失败告终，他做的无数次生意也是一样。每次取得一点成功，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使全部的艰苦努力付之东流。

他极聪明，也很能干，他曾在商船队工作过 3 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安装起吊设备，安装中央取暖系统等。1978 年 4 月，他偷窃了一把电动焊枪，并重新喷漆，而且在上面装了一个假铭牌，因此而被以欺骗和诈骗罪判处 9 个月的徒刑。他在监狱期间诊断出癌症，外科大夫将他膝盖以下的小腿锯掉了。

他对生活不满，知道自己能够干的事情有很多。怨谁呢？当然不是他自己。因为手头很紧，他的第 3 次婚姻出了问题，因此决定显示自己的才能了。

山姆被逮捕后给带到了纽华克警察局，汤姆·库克决定，西米德兰警察局首先审讯他，因为山姆已经承认了绑架斯戴芬妮一事。然后，再由西约克郡警察局审讯杀害朱莉·塔特一事。同时，审讯专家也开始搜索车间，他们的发现以后将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将他与他犯下的所有罪行联系起来。从他被逮捕时穿的裤子上取下来的纤维，与寄给英国铁路公司的勒索信上找到的纤维是一样的。在车间找到的纤维也使山姆与包扎朱莉尸体时使用的绳子和床单联系在一起，一块旧窗帘上已经化开的血渍也肯定是从朱莉身上溅出来的。

从一开始起就已经很清楚了，山姆并没有打算放弃游戏。烟、撒的谎、假痕迹和夸张的言词都是拿出来表演的，用于使审讯人员东奔西忙。他指摘警方案子中所有的歧义，并装出软弱无助的样子，发明了一些情景，让警方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同谋，这个同谋有可能还得到了 2 万英镑。我还能以别的任何方法来干这件事吗？山姆诘问，

一边指着自己的假腿。他宣称，他的小摩托并不能够装进奥斯丁梅特罗车，他不可能让那么多勒索信按时送达所有地方。当然，他不会说出所谓的同谋的名字，这显然是另外一出戏，用来使事情复杂化，并且惹恼警方。

他甚至还玩出了戏中戏，他在一些纸片上写下一些数字，而且确保警方能够发现这些纸片。警方审讯人员会花数小时时间问他说，这些数字是不是指埋放赎金的地点在地图上的参考号码。山姆只是微笑，一句话也不说。

等他递送至米尔加斯警察局的时候，包勃·泰勒和他的小组明白自己将在审讯中遇到的困难，因为他们必须审出他杀害朱莉·塔特的事情。泰勒请我看来自伯明翰的录像带，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审讯战略。离山姆再次出庭只有 3 天时间。

我当天很晚才到，并在警察局的餐厅里与包勃·泰勒和他的小组一起吃饭，边吃边呷着茶，茶杯上还刻着西约克郡的盾徽。谈话转移到了山姆有否可能承认关于朱莉的事情。

"他不会忏悔的，"我说，"至少是在定罪之前不会忏悔。他会把游戏玩下去，并认为他自己比你们聪明。"

这样的事情到来时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之后我们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设备，比如录音和录像设备。有人将伯明翰拿来的审讯记录带插入机器，迈克尔·山姆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但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的脸。

上面有时间刻度的录像带显示他悠闲地坐在审讯室里，身上穿着白色的开襟衬衣和长裤。他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自信，但也不急不躁的。被逮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最开始的震惊仍然留在脸上，他没有想到警方能够抓到他，但事实证明他错了。

他苍白的脸相对而言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坐姿还是显示他希望把一切事情都说圆满了，而没有准备和盘托出。他继续否认杀害朱莉·塔特，也不承认勒索英国铁路公司，我可以看出他在努力为自己制造一个智力空间，这样他就可以再次控制住局面。

山姆并不想被人看作是一个精明的冷血杀手，他希望成为一个在智力上闪闪发光的光辉人物，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盗匪，就跟《抓贼》里面的加里·格兰特一样。他要解释血淋淋的罪案，惟一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替身，说是别人干的。

但是，这会对审讯人员造成麻烦。如果有人从始至终一直说要怪就怪那个同谋，那他们如何对付他呢？

“要明白这是一个虚构，”我说，“但是，你仍然能够让他保持这个虚构，因为这样一来，你们仍然能够套出很多只有杀害朱莉·塔特的那个惟一的人才知道的一些细节。你们掌握了所有这些细节之后，才能够一举击破同谋说。

他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在撒谎，但是，他会在无意之间给你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是你们可以放在陪审团面前的。然后，他们可以决定这个人到底是如何掌握这么多机密细节的。”我警告说，山姆会想办法控制住审讯过程，他会承认他绑架了斯戴芬妮·斯雷特，然后还会谈到他的忏悔之心，同时，他会拒绝承认他跟朱莉·塔特被谋杀的事情有任何联系。他们必须让他保持在正道上，但又不能用攻击行为，也不能显出愤怒。

“状态对山姆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相信，桌子对面的人有足够的智力明白和继续玩这场游戏。如果他认为你们值得他玩下去，他会直率得多。但是，如果他觉得你们缺乏信心，或者只是在装装样子，他就不会玩下去了。”

要让这些发挥作用，精心准备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决定山姆是否认为自己有罪的惟一重要的因素。审讯人员需要对犯罪和调查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得让自己准备好不要使用粗略的词语，他们得问出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他有可能拿出的任何一种答案都应该有更多的问题可以问，等等。他们是在编织一个细节之网，最终会使疑犯落入陷阱。

同时，审讯专家也在把每一个可能的破绽联系起来。他们拍摄下了再现镜头，表明电动摩托车是可以放进山姆的奥斯丁梅特罗汽车后箱的，也证明前轮箱可以装下朱莉的尸体。还找到了一些油漆痕迹，证明电动摩托车确曾放进汽车后箱。

山姆后来寄给警方和船台代理公司的一些信件的确是在一个文字处理器而不是在老式的奥利维迪打字机上打印出来的。他已经删除了文件，但他不知道这些文件仍然能够从计算机存储器的“过渡”段调出来。他还想办法制造了朱莉失踪当天他不在场的证据，说事

发当天他在诺丁汉附近的一个铁路调车场看火车，而且还拿出了编有号码的照片来支持自己的说法。但是，对铁路时间表的调查显示，他拍下来的火车当天并不在场。

转移到利兹市的3天后，迈克尔·山姆被起诉犯有绑架和杀害朱莉·塔特的罪行。只有一个秘密仍然没有解开：他把赎金藏在什么地方了？

9 我的怀疑对象多达1750万

1992年7月28号早晨，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个留言："保罗·布里顿，请给温布尔顿警察局的约翰·巴塞特警司回电话。"我的秘书戴安娜还在底下压了一张字条："这是不是说我得把你明天的日程安排清除掉？"

我把字条塞进上衣口袋，抱怨着自己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我怎么找得到时间去伦敦呢？我在国民医疗服务网的日常工作已经推后很多了，得花一个多月的周末才能够彻底清除干净。我还得为英国警视厅完成两份法庭报告，有位律师等着我去对他的一位客户进行心理分析，还有一个压抑特别严重的年轻妇女需要治疗。

常言说得好："如果你想完成某件事，最好交给一位忙人去做。"不知怎么的，我大部分日子都必须努力挤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别的事情。

见到约翰·巴塞特之后，我立即为他沉静的声音和安祥的面容所打动。他的头发很久以前就已经是一片银白了，因而眉毛显得又浓又黑。他常穿黑色制服、白衬衣、很宽的植物花卉领带，极可能是父亲节收到的礼物。

温布尔顿警察局的事件室仅只比普通的会客室稍大一点点，里面堆满电传、电话和计算机终端设备。墙上挂满一排排的白板，列着参加调查行动的一些警官的名字，还有计算机代码，表明这些警官各自都在追踪哪些线索。在附近，带照片的温布尔顿公园的彩图上盖满了黄色的不干胶字条。

一桩杀人罪案的头72小时通常都是最重要的，而如果杀人者是陌生人，或者杀人计划特别周密细致，则查寻工作注定会更加困难。13天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房间里仍然有极其高昂的气氛。水渍斑斑的咖啡杯在与堆得满满的烟缸和外卖三明治包装纸争夺地盘。看上去谁都不想回家去。

巴塞特领我走过一个过道，中途停下来端了一杯茶。高级警督米克·威克逊从他肩后冒了出来。米克较年轻，不像巴塞特那样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是第一个到达凶案现场的人，他也不可能忘记那个场面，有些尸体的样子你一辈子也难以忘怀。

约翰·巴塞特放下茶杯靠在一张办公桌上。威克逊在窗户旁边找了一把椅子坐下了。

“受害人是一名23岁的女性，名拉雪尔·尼克尔，”巴塞特一边说一边摸索着自己的领带，“她是个漂亮的姑娘，被人杀了，很惨的样子，极可怕。公众的反应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你没有看报我感到很惊讶。”

“拉雪尔跟男友安德鲁·汉斯康比住在一起，就在巴尔哈姆的榆林大厦的一个两居室里。他在城市里骑摩托送信，7月15号星期三上午8点30分离家上班。”

“拉雪尔15分钟后离开公寓，带着儿子阿列克斯和宠狗去温布尔顿公园散步。”他朝威克逊看了一眼，“那个小孩子几岁？”

“才两岁。”

他拿过一张地图放在桌上。“那片公园是约一千公顷的一块敞地和林地。那个地方属于公用绿地，供人们散步，打高尔夫球，野餐、骑马，就是那类事情吧。”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巴塞特若有所思地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她只是最近才开始利用温布尔顿公园，因为她在离家较近的克拉彭公园和图丁贝克一带散步的时候，有一些男人调戏她。她觉得也许温布尔顿公园会好一些。”他口气里面有明显的调侃意味，“她一星期大概去4次，让阿列克斯在户外玩，然后让宠物狗也做一些锻炼。这天早晨，她穿着蓝色牛仔裤，一条灰色T恤，还有棕色皮靴。”

他用一只钢笔指着公园东侧的一处风车：“她的银色沃尔沃车就停在这里。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她一度开始顺着这条路行走。我

们有位证人说，他看见拉雪尔和阿列克斯正好在上午 10 点 20 分走过停车场和风车林之间的那条路。攻击就是在那里发生的，离停车场约 500 码的距离——那条小路就在这里穿过一片林木稀疏的地方。那个地方因此并不是完全掩蔽的，但是，从远处看去，还是能够挡住人们的视线。

"她的尸体在离那条小路约 12 英尺远的地方找到……"

米克·威克逊打断他的话："那人疯了……他一定觉得非把她的头全砍下来才行。什么样的……"他没有说完。

巴塞特看了看那些照片："你看，并没有想办法掩盖尸体。那条路上的下一个行人发现了她。"

"那个小孩子呢？"

巴塞特回答说："他没有受伤，但我们觉得他一定看到了攻击行为。他们在上午 10 点 30 分发现他趴在母亲身边想摇醒她，他到现在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来。"

"这孩子将需要帮助了。"我说。

"是啊，现在已经有人在照料他了。"

一组照片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这套彩照是从绿地杂树林的远景方向开始拍的。拉雪尔的尸体几乎看不见——在树林中间看去就是一堆白色，就好像扔出去的一只白色购物袋一样。

最后，镜头移近了，直接拍摄被害人，并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拍下来了。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有任何尊严或者稳私可言。镜头下的拉雪尔·尼克尔纹丝不动，几乎光着身体。不管以后将做什么样的事情来恢复她的尊严，但在接下来的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里，她将成为调查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证据。

每一英寸的地方都会拍照，会刮削下来，会用药水擦拭，或者割开。体液、指甲里面的脏物和阴毛都会拿去装在塑料袋或者玻璃瓶子里，然后在查证链的各个环节不断传递：从病理学家到化验室，从审讯室到法庭，再到陪审团。暴死会成为公众事件。

"这是什么？"我指着拉雪尔面部的一张近照问。一片对折的纸贴在她右边的太阳穴上。"我希望你能够回答我们这是什么，"巴塞特说，"那是银行给拉雪尔的账户密码通知。也许她身边带着它，但我们完全搞不清楚那片纸怎么会跑到她额头上的。我们不知道这意

味着什么。"

这没有意义。如果那片纸在打斗时从拉雪尔的口袋里抖落出来，那又是怎么跑到她脸上去的呢？攻击发生得非常迅速，极狂暴，几乎不可能偶然飞到她脸上。那片纸像是有意贴在那里的，但是，为什么？

"犯罪现场值勤官(负责登录能够找到的任何物证线索)没有找到化验室能够进行化验的任何东西，"巴塞特说，"没有血渍、精液、唾液、毛发……什么都没有。凶器也许是单刃鞘刀，有铜制刀柄。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凶器。"

"这么说，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威尔逊回答说："地上有鞋印，也可能很重要，也有几份有趣的证人证词。当时，附近的地方有 100 多人，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调查。到目前为止，有两个人回忆说看到过一个人在小河边洗手，离案发现场大概 150 码远。"

"讲讲这个人的样子好吗？"

"那是在克林塘边，"他指着地图说，"他大约 20 岁或者 30 岁，约 1.78 米高，棕色短发……"

我打断他："别担心体貌细节，那是你们这个部门的事情。我想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他是不是跑到了那里，是不是很害怕的样子，是不是很着急？"

"我可以说很激动，"巴塞特说，"他拿着一只袋子，并在那里洗手。另一名证人看到一名男性朝万茨沃斯的诺斯泰德普拉斯地方政府所属的一个广场跑去。描述彼此不同，他有可能是一名慢跑者。"

"鞋印的情况呢？"

威克逊说："我们从人行道上取下了单只脚印。"

"你们有什么东西能够与拉雪尔或者阿列克斯比对吗？"

"没有。"

"别的地方呢？有没有别的一些脚印并没有出现在引我们从小路走到尸体的那些照片中？比如草地里。"

威克逊摇头。

"好吧，你们说阿列克斯没有受伤。身上没有青紫或者抓痕……"

"他身上全是泥。我们觉得他有可能是被推到地上的。"

我开始翻动尸检记录了。

"这个杂种让我们日子难过。"巴塞特说。

"错过了足球比赛的好节目。"他的同事说。

我明白他们的难处。他们有一个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杀人犯要对付,而这桩罪案又引起了全国的公愤。报纸上的报道说得神乎其神,而且并不总是一些正确的细节。妇女都担惊受怕,不敢去温布尔顿公园了,别的一些公园也不敢去。事情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当地一家妇女团体决定赞助40万英镑资助这次刑事调查。这笔钱当然会用到正途上,但是,警方只好拒而不纳。

但是,调查小组倒是接受了霍尔姆斯(内政部大型要案查寻系统)的帮助,这是一种计算机装置,可以对调查期间收集得来的数以万条计的不同信息内容进行分类、存储和交叉比对。这个系统是1987年以后才有的,当时是因为追踪约克郡杀人狂的时候,发现大量的重要信息有淹没在成堆的案头文件当中的危险。后来很清楚,如果当时有了计算机,能够将他的名字在与罪案相关的地方突现出来,则杀人者彼德·萨特克利夫早就作为重点疑犯受到怀疑了。"说说温布尔顿公园的情况好吗?"我问巴塞特。

"我能够说什么呢?我们这里有暴露癖,有骚扰事件,但从来没有出过这样严重的事件……到这次为止一直都没有过。我们在查找平常的人口——性攻击者、窥淫癖、露阴癖。我们还调查公园传出来的指控,而过去有劣迹的性犯罪者可能利用这个公园,他们可能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周围的地区呢?"

威克逊皱了皱眉头。

"我需要尽量多的细节,不仅仅是公园的细节,还有公园之外的一些情况。看看有没有奇怪的事件或者奇怪的申诉。"

巴塞特说:"我们会的。"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听他们介绍案发之后每天的调查进展情况,并拿到了一些证词、照片、尸检记录、地图和拉雪尔的家庭录像带。这些东西可以供我以后研究。约翰·巴塞特显然对心理轮廓描述的原理非常有兴趣。我听说,他的兴趣早在前一个案子中就产生

了,当时,他领导刑警侦破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一宗婴儿绑架案。他曾推论,勒索者必定与那家医院有联系——要么是护士,要么是非住院病人。这个假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因此,那个婴儿后来安全返回,没有受伤。

那是最快乐的几个案子之一。虽然他在30多年的时间里调查过数十宗案子,但很少碰到像杀害拉雪尔·尼克尔的人这样凶残的罪犯。巴塞尔今年离退休只有一年了,他极希望以这个案子作为他一生从警的句号。并没有什么挣分数或者拿奖金的刺激,他只是想让这条杀人疯狗远离街道。

他清清嗓门:"我一向非常乐观,保罗,但是,我的怀疑对象多达1750万——12岁以上的所有男性都有可能。我们必须将怀疑对象的范围缩小。"

"好吧,"我说,"首先,我必须尽量了解拉雪尔本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有否工作?她一般干些什么?她是深明世事,有观察能力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天真的人?面对生人的时候,她倾向于保守还是微笑,或者进行眼光接触?如果受到威胁或者攻击,她会不会反抗?她属于攻击型的人还是有可能讥笑别人的那种人?她还有哪些人际关系?她还有没有别的男友?她以前的男女关系是否以恶劣的方式结束?她以前做过妓女没有?有没有滥交历史?"

这些都是惯常要问的问题。

"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巴塞特说,有一点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这有什么差别呢?"威克逊说,"她已经死了。我们在证词中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内容吗?"

"不。我需要了解拉雪尔,就好像她此刻就坐在桌子对面一样。她会说什么,她会怎么想,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她会怎么反应?只有当我了解了她,才能够更进一步了解杀她的人。"

"打个比方说,一位年轻妇女倾向于挑起别人的性欲,不是有意如此,而是无意而为。她有可能因为自己的长相或行为举止而吸引人,让人产生性幻想。一个男人走过身旁看她一眼,她有可能会感觉很好,因此而笑着对他说'你好'。这有极不相同的意义,同样一个年轻女性如果不喜欢出风头,不吸引别人注意自己,也不与陌生男性打

招呼，则情形就绝然不同了。”

我接着说：“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受攻击水平。拉雪尔是一种高风险的受害人还是低风险的受害人？如果我知道这一点，则可以开始问这个杀手为什么要选择她。”

巴塞特说：“这些答案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那就派人去跟她的亲友谈话，特别是她的父母和她的男友。要注意他们的偏见。他们会掩盖住一切不利的一面。我希望了解有关她的一切情况，这才是事情发生转机的关键。”

巴塞特说：“你把问题列出来，我们去找答案。”

在屋外，暑热在炙烤着水泥和柏油，行人在汽车废气和商店遮阳篷间断的荫凉之间懒洋洋地走路。凶案组为我提供了一部汽车和司机，他是位年轻的刑警，我们一边在下午慢腾腾的汽车队伍里挪动，他一边为我解释路标。

巴登·鲍威尔是童子军的创始人，那部风车就是因为他而著名的，我们开车来到风车处，停下车来。我凝眸远眺起伏的田野和落满树叶的绿地。米克·威克逊打头领路，我也脱下夹克搭在肩上，跟着他在被太阳晒得起了硬壳的土路上走着。案发当天早晨，这里曾是一片湿地。我们走过稍稍隆起的一块地方，然后穿过一片开阔地，这里的每一个坑坑洼洼都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

我走进一处封闭的林间空地的树阴，立即注意到有人故意误导方向。刑警们找到的是一处假凶杀地，离真正的案发现场有 13 米之远，以便阻挡媒体和吊唁人。除开在附近的一棵树下留下的一些花圈和卡片之外，这地方看上去像是一处理想的野餐地，有斑驳的阳光，还有微风掠过。

林间空地让人想到公园里的大帐篷，既凉爽又有封闭感，比我看照片时感觉要私密得多，也更隐蔽得多。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可能再是凶案发生那天早晨的情景了，地面植物已经被清除，树叶堆和植物全都在搜查中破坏了。这当然就使凶案现场照片极其重要了，因为那是当时的现场最原始的记录。

高出这片林地的一个小山丘上长着很多草，比我想像的距离近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重要，但是，这显然是一个极佳的观察地点，人可以坐在这里等候，可以观察，看看有没有人顺着小路走到林

间空地来。

米克·威克逊指着一些地方为我介绍情况，说明阿列克斯的T恤衫是在哪里找到的，还有脚印。有人曾看见那人在河边洗手，我就沿着那条小河走了很多次。我在想，一个人能够多快就在树林里消失呢？这个时候，我看见刑警们在林地里走动。

我在寻找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潜力，树和地面植物能够提供掩护和视点。根据人们的动机——有天真的恋爱者，他们希望找一个没有人的隐密的地方。也有窥淫癖、有偷袭者、强奸犯或者杀人犯——我能够明白这个地方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合适的犯罪地点。目前我还不能够做到的是通过犯罪者的眼睛或者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临死的年轻妇女的眼睛来看透这一切。

回家的途中，我收听了无线4台的新闻，主要内容是英国警方故事和高等法院涉及新闻记者佳妮·阿兰的诽谤案。佳妮起诉一家电视台，声称该台污蔑她与南非新纳粹领导人尤金特里·布郎切有艳事。

里面没有提到拉雪尔的事情。她的凶杀案已经退居次版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很少有一件凶案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注意力的。她被凶杀的一个星期之前，另一名年轻妇女佳迪·拉特克利夫也在汉普顿郡遭人刺死。两位女性都是被刺死的——但是，一件案子上了报纸头条，而另一件案子却很少被人提及。

我可以明白这一点。拉雪尔被攻击是在大白天发生的，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每天都有上百的妇女和儿童在那里玩耍。惟一的证人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有可能终生无法忘记这样的心灵创伤。较不明显但有巨大影响的是他们播放了拉雪尔跟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放声大笑和微笑的录像镜头。如果她的面部只是作为一张照片出现在电视台上，则绝不会在人们的意识里保持如此鲜活的生命力。

还有别的一些因素也使这次凶杀案的影响超过别的犯罪行为。我听说拉雪尔在什么地方死亡的消息时也是大吃一惊。温布尔顿公园在母亲和孩子心目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是温布尔玩偶们的虚构的家园——就是故事书和电视节目里面的那些可爱的小精灵的家园，就是这些小精灵使公园成为数以千万计的男女老少心目中的神奇之地的。杀死拉雪尔的人并不仅仅杀死了一位年轻的母亲，他还

永久性地毁掉了温布尔玩偶的家园，他污染了我们所有人儿时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我想到了小阿列克斯。虽然他还不到两岁，但不会受到能够掩盖其痛苦的整体创伤性遗忘症的打击。他会记得母亲的尖叫，还有突然之间的沉默，但是，他以后能否完整地回忆出当时的场景，并且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码事。从他心里再次唤起这段记忆的危险在于，这有可能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他没有被杀掉，也没有受伤害，这个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指示器。这表明，拉雪尔是非常具体的攻击目标。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我。拉雪尔的太阳穴上那张折叠起来的纸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贴在那个地方，谁贴的？是拉雪尔随身带着的，还是那个杀人者带来的？那是留下来作为一张名片、一个嘲笑，还是出自某种仪式的需要？那东西贴在那里并不合适。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重复杀人者，会不会再次出击。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哪怕没有详细的分析，事情看起来还是不太像掩盖起来的家庭谋杀，也不像走了火的争执引起的，也不像哪个精神病人一时发作而弄出的一次性事件，不像是以后不会再产生的事件。

假定是最糟糕的一个情景，那我们对付的就是一个残暴的性攻击精神病人。但是，他是以什么样的周期作案的呢？一年，一个月，一天？时钟在滴嗒作响，我们必须尽快抓到他，以防他再次袭击别人。

在约翰·巴塞特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前，除了等待之外我什么也干不成。同时，我必须在一桩高等法院的案子当中提交证据，在那桩案子当中，一名年轻妇女宣称她在德比的一家旅社受到系列性攻击。旅社的那名雇员被逮捕了，接受了审讯并受到起诉，但是，他的首席律师的辩护词是：22岁的约瑟芬并无行为能力在法庭面前提供证据，因为她有严重的智障，因此就不应该产生审判活动。她的父母和旅社的员工都十分气愤——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能因为一个年轻妇女有智障就失去了提出自己被强奸的指控权。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几乎就是一份公开的许可证，任何人都可以对有智障的人进行性攻击，因为他们知道法律不能够拿他们怎么样。

他们甚至还与当地的议员艾德温娜·居里联系，寻求她出面帮助。

最后，代表皇家公诉服务处的警方与我联系，请我对约瑟芬进行检查，这样我就可以对她是否具备行为能力提出意见。我得回答两个问题：她能否区别对错？她是否明白上帝的概念？

因为她必须在圣经面前发誓。她是否能够按照审判程序行事，是否有能力对律师提出意见？我的理解是，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全都是否，则不管证据如何也不能够进行审判。但是，我的工作不是要发现她是否有行为能力，我的作用是为法庭提供参考意见，而且不管家庭和朋友有什么样的压力，都必须予以客观的建议。

后来证明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一方面，约瑟芬的父母希望在我对她进行检查的时候支持她，但是，这又不是我工作的方式。同样，因为已经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和怨恨，人们很有可能无意间使约瑟芬对可能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了解产生偏见。

我与约瑟芬一起坐下来，用的就是那家旅社的房间，因为周围是她所熟悉的环境。她很焦急，坐在扶手椅的边角上，双手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扇动翅膀一样。

"我要去见我妈妈，"她泪水涟涟地说。

"她就在不远的地方。她一会儿就回来。我只是需要和你谈谈话而已。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什么也没有干。我什么错事也没有做。"

"我没有说你做了任何错事，约瑟芬。"

她非常焦急，总想为自己开脱，很多有学习障碍的人面临身边的很多事情出错时都会有这种常见的反应。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我需要用专注和耐心跟约瑟芬谈话，而且还必须找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地方。约瑟芬的障碍是这样的，我必须构造一种语言交换的方法才能够让她明白。她必须明白我的意思，必须应对我的提问。同时，我的问题必须在口气和暗示性上完全中立。我必须找到答案，同时不会对她的事件回忆过程产生暗示影响。

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保持开放的思想。没有这一点，我还不如不去那里。

约瑟芬稍微放松一点之后，我开始努力发现她是否理解上帝的

概念。问题必须小心地提出来。我不能问:"谁是上帝?"因为那会暗示上帝是某种人类。

"请对我讲讲上帝,好吗?"我问。

约瑟芬说:"上帝住在天堂。"

(因此她认为那是一个地方,上帝是一种活物。)

"天堂在哪里?"

"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

"是不是人人都会去天堂?"

"我祖母去了天堂,因为她不坏。"

(这里面的含义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不能够进天堂了。)

"上帝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能够上天堂?"

"他总看得见你。他知道你在干什么。"

(她有这样一个意识,认为上帝无所不在,知道人们都在干些什么。)

"听我说,约瑟芬,我必须对法官说你是否知道善恶。"

沉默。

"告诉我做好事是什么。"

"我不坏。"

"坏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坏。"

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抽象了。她无法给善恶下一个定义。我再次慢慢开始,还举了一些例子。

"你有没有手袋?"

"有。"

"如果你拿着手袋,那是不是错误的事情?"

"那不是。"

"如果别人拿你的手袋会发生什么事?"

"嗯,那是不对的。那是我的。我不坏,我不拿别人的手袋。"

很明显,约瑟芬有简单的善恶观念,但不具备对其真正的理解。还很明显的是,她很急躁,很害怕别人说她错了。

在伯明翰郡伊莉莎白二世法院的证人席上,我对法官和陪审团说,约瑟芬有能力按审判程序进行下去,但法庭必须对她有所让步。

律师必须明白她容易受到攻击，说话的时候不能使用容易增大她的焦虑感的语气。同样，如果他们以正常速度说话，使用普通的语言，她就会失去方向感。他们必须慢慢讲话，并使用简单的词汇。

可以对约瑟芬进行交叉问询，但不能对她进行恐吓或威吓。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够向她提一些困难的问题，但是，如果律师使用对普通证人的那种突击方法，她有可能受不了，还有可能受到情绪上的损害。

我对他们说，她有足够明确的上帝概念，但是并不能深刻了解。她明白讲真话的重要性，不过她对善恶的理解是基于具体的例子而不是抽象的定义上的。如果法庭坚持要更高的标准，则她的行为能力不够。

法官的判决有利于诉方，尽管辩方提出了争议。结果，因为法庭判令约瑟芬有行为能力，因此就可以提交物证，这里面包括DNA测试结果，证明从她房间找到的精液属于被告。他被判有性攻击罪，并被判处长期监禁。

当约翰·巴塞特再次打电话来的时候，他拿到了我想知道的关于拉雪尔的大部分答案。我记下了笔记，之后花大量时间查看照片，是她在海边度假期间拍摄的。她在大笑，还甩动被风吹动的金发。

毫无疑问，拉雪尔有天然的优美姿态、自信和魅力，很上相。她曾当过业余模特，很喜欢体育和户外活动，比如网球、游泳和散步。她上过大学，但没有拿到学位就退学了，然后，她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孩子和安德鲁·汉斯康比的身上。

他在伦敦西南地区的里奇蒙德游泳池当过救生员，他们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几个月内，两个人就恋爱了，并搬到一个公寓里住到一起了。一年之后，阿列克斯出生。安德鲁是位有天赋的半职业性网球教练，后来还当了摩托信使以便挣到更多的钱养这个新家。

拉雪尔个子很高，很优美，极漂亮，但并不挑逗人。她并不拿自己的美作为炫耀的资本，尽管她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她并不了解自己对其他人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的全部效果。我觉得自己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看到的是她的死相，是她的性格已经消灭不存的时候。后来，当我看到假日快照和家庭录像时，才开始理解为什么别人会被她的美貌所俘虏。

稍稍吃过一点晚饭后，我打开书房的台灯，研究那些证言、照片、尸检报告和地图，我把这些东西全摊开在书桌和地板上。我的书房相当小，书架顺着一面墙几乎触到屋顶，里面的书东倒西歪的，看上去没有一点顺序，但是，只要没有人去清理它，我几乎总能够找到自己要找的书。对面是一些文件柜，里面塞满了案例笔记和研究论文。这几个文件柜的顶上是好多捆《英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我闭上眼睛，努力回到温布尔顿公园那个漂亮的林间空地。一个形象正在我的脑海里成型。我知道这个杀手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他，因为我在别的一些人身上看到过同样的冲动，就是我问诊的那些人，是我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治疗过的那些病人。我知道，这个杀人过程是一个幻想活动中最有决定性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样的幻想已经预演了许多年，直到它变成现实为止。

很少有人天生就成为性攻击者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烈的、需要证明和被别人正视的欲望。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更有能力形成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对自己更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感觉到，人们尊重我们，希望听听我们说什么，正如我们自己也慢慢认识和尊重别人一样。

同时，我们有越来越强烈和越来越成熟的性欲望。令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因素通常是一起成熟的，因此，我们的性欲的表达跟积极的社会价值观彼此相联系。因为性欲和勃起而自然产生的幻想和脑海中的形象一般涉及双方都同意的性交；彼此的吸引、追求还有交合过程都是双方喜欢的。

但是，有极少数的一些人会产生直截了当和强烈的性冲动，但他们又没有同时产生信心和自我价值观。也许他们早年想形成两性关系的努力受到过挫折，不管是在性交上面还是在感情追求上面。这使他们感觉痛苦，感觉被人抛弃，或者受到别人的讥笑。

他们被人抛弃的感觉不一定非得有实际的基础，他们只需要感觉到这是真的就行了。如果是这样，就会导致一些人一辈子直走下坡路，总得不到足够的性生活，而且同时还感到没有人陪伴的孤独感。

更少的一种人会发现自己心中郁积起一股怨气，一种苦涩感，还

有为一切而抱怨别人的需求。他们相信，别人伤害了他们，因此他们必须进行报复。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会感觉到他们对别人没有控制感，因此就开始形成一种私密的幻想世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孔武有力，由他们在这里决定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这种情况还伴有强烈的性需求，则幻想也许会慢慢演变成对在想像中与他们保持人际关系的其他人实施性控制或性强暴。他们的幻想开始反映出他们的困境，他们并不尊重别人，因为他们本身不受人尊重。他们的愤怒、痛苦和抱怨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拥有了一种幻想生活的全部种子，最终一定会演变成性攻击。

这样的一种人经常有非常强烈的视觉幻想系统——那是一种虚拟现实，非常生动活泼。今天的科学家和计算机程序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有希望赶上。

在这种人创造的另外一个世界里，人们是按照他们指令或者确定的方式行事的。随着这样的幻想系统成熟，就要求更多的能量和专有的细节才能够像在开始的时候那样给他以回报。这是逐步升级的一个过程。一种幻想一度可能只涉及参与者对非现实世界的虚拟。但是，这样的道德沦丧慢慢会需要越来越极端的表达，为的是要保持同样的快乐水平。这通常会表明不断增强的性暴力程度和细节强度。最终，他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形成一些图像和场景，非常清晰，非常生动。

在受虐和施虐性幻想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是，能够采取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小的。有些人集中在语言交往和虚拟当中，另外一些人需要各种各样的约束和捆绑，再有一些人需要鞭打，或者需要像武器、棍棒和刀子等工具。这些工具用来配合特定的一种受害人和背景，这些受害人和背景都是事先想好的，以便能够使他的性发泄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最终，光是幻想本身还不足够，他也许开始在现实世界里演练其中的一些情节。例如，我们也许会看到这样一种人，他幻想强奸一名女性，某一年龄段的女性，有金色或者棕色头发，蓝眼睛，或者绿色的眼睛。他想像跟在她后面到了她家，她并不知道他就在那里。他等在房间外面，从卧室窗户看去，在她脱衣的时候，她的侧面轮廓会在

窗帘上映出来。他进入房间，一般是以特别的方式，并走上楼去。取决于他幻想的类型，他会狂暴地强奸她，或者她也许会默认，或者一开始抵抗，最后她自己也因此而产生性冲动，最后他们就达成了双方都很愉快的性交。

这样由幻想提供的快乐开始消退后，他会把其中一部分幻想带入现实世界，他会在街上乱转，不断地演练。这使他得到极大的性冲动，使他的肾上腺素急剧上升。不久之后，他就需要远远超过这种幻想和在街上乱逛的东西了，他开始跟踪特定类型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也许不是与幻想中一模一样的人，也许更高，也许更矮，也许更瘦，也许更胖。但是，她们都代表着众多的机会，他会在远处跟踪她们。如果她们身边有别的人，比如男友或者孩子，他们会在脑海里消除掉这样一个女性。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会碰机会找到一些女性，她们是一个人，但又具备他们想像当中的那种女性的某些特征。这样的事情也许会持续好几个月，他会一直在公共汽车站里等候，他会爬进船坞，或者在铁路线上四处走动，在公寓的卧室窗口来回张望。

最终，他们精心思考过的手段和冒险的决心也更大了。他开始手拿什么东西准备强行入室，或者带上能够绑上她的东西。也许用一个面罩来掩盖自己。他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撬开房门然后又转身逃走。

他真正无法预测的是这些女性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虽然在幻想中他能够控制她的反应方式，但是，他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控制她的反应。有时候，一个受害人是完全被动的，而且，起决定因素的是凶手的性格倾向，这有可能会挽救她的生命，也有可能导致他杀害她，因为他没有停下来的理由。也许事情是这样的：她会反抗，非常激烈地反抗，而且口中还谩骂他。这有可能使他杀害她，也许他反正是要杀害她的——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幻想中所发生的事件与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的混合情形。

但是，拉雪尔·尼克尔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杀她的人是一个陌生人——这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一方面，阿列克斯没有受伤。如果这是拉雪尔很熟悉的一个人，那么，那个孩子认出他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攻击的性幻想因素和攻击地点也表

明那是一个陌生人。如果他决定去杀害一个认识的女性，他一定知道她大概住在什么地方，或者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工作，或者她在某个既定时间会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选择一个地方，使他有更多时间与她待在一起。

那片林间空中是捕捉某人的一个危险的地方。虽然从远处看它是挡住了，但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有别人从旁经过，从而会打断他。他很愿意冒这个风险。

同样，他也不能够准确地了解拉雪尔会有何等反应。也不知道她会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她要充当那个角色，充当好他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为她安排好的那个角色。

7月15号星期三上午10点，他一定知道能够去公园的只有一些慢跑者、骑马的人和出来遛狗的人，其中会有一些年轻女性，有些还带着孩子。从他那个角度看去，其中一些女人一定很有刺激性，让人浑身发痒。他想要这些女人，但又不具备开始一场普通谈话，或者与她们闲谈的技能。

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愤怒已极，他心中一肚子苦水，压抑许多年了，这使他的性幻想如火上浇油。他一直都在反复演练，用他的幻想当作一个演练的模板，他从背后袭击女人，并把这些幻想带回家。

但今天是一个例外，因为今天，他已经不可遏止的渴望和上演幻想的机会彼此碰撞，并在拉雪尔·尼克尔这个人身上结合起来。

在她看来，温布尔顿公园是一个休息和放松之地，是阳光灿烂和风抚青草之地，她可以遛狗，可以带着孩子安全地玩耍的地方。而对于那名杀人者来说，这是一个游乐场，可以找到受害人的地方。他有藏身之地，有观察哨口，有逃跑路线。他以前有可能见过拉雪尔，甚至远远地跟在她身后跟踪过，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只是在公园乱逛，一直走到他最喜欢的等待之地。

然后他就看见她了——一个年轻女性，金发碧眼，非常漂亮，很自信，穿着他认为极性感的衣服。她正好就是他的梦中人。她不仅美艳惊人，而且身上还透露出一种自信和自然。可笑的是，使她在别人眼里如此出众的品质却刚好就是使她成为这个男人大脑里合乎标

准的受害者的原因。她将把他过去一切的伤痛召唤到眼前,使他得到即刻的满足,使他的痛苦与被排斥感一下子集中起来。他离开树林朝她走去的时候,产生了无所不能的完满感。她将付出代价,为所有的女人付出代价。

拉雪尔给了他一个友好的微笑,但是,他对这样的微笑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已经远远超过建立一种友谊或者人际关系的心态了。到拉雪尔意识到她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一切已经太晚了。她也许四周看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出来帮上忙,结果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知道的一切就是她的孩子也处在危险当中,但她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恐惧是绝对的。

她扔下了阿列克斯的丁恤,它标志着最开始的接触点。他用声音控制住了她。刀子就顶在她的胸前,拉出血痕来,命令她到他希望她去的地方。她完全吓呆了,那完全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情,以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她永远也不可能幻想到这样的情形,也不可能了解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跟许多女人一样,拉雪尔以前也许跟人谈到过被陌生人挟持时会有怎样的反应。也许她说过:"我会给他来一拳,然后使劲踢他。"或者说过:"我会尖叫,让他滚开。"但是,结果在攻击发生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胆量或者抵抗力了。那不是因为恐惧而无力反抗,那是一种被动感,一种完全笼罩住她的被动感。

对于那个杀死她的人来说,拉雪尔的顺从还不够。她必须受到羞辱。他会迫使她离开小路,使她跟孩子分开。他会割开她的喉咙,这样她就叫不成了。他会迫使她跪下来,这样她就完全彻底地满足了他的幻想,因为有一个女人被完全控制住了,羞辱了,还低了头。然后,他会乱刀刺死她,一刀接一刀地刺,哪怕她早就不再反抗了。

但是,他不仅仅需要她立马死掉,他会扯掉她的牛仔裤和内裤,也许就在她死亡之前,他会将一种光滑的东西塞进她的肛门。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性行为,那是一种暴行。对他来说,性欲是与征服密不可分的,与他幻想中的女人低头和被弄脏是密不可分的。到目前为止,拉雪尔已经满足了这个角色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分钟之间,也许还不到 5 分钟或者 6 分钟。拉雪尔身上中了 49 刀,她的喉头割得非常厉害,看起来她的头几乎

就要断掉了。她的尸体倒下来的时候是极难看的一个样子，屁股显著地露在外面，任何路过的人都会看到她最没有体面的部分，而这都是杀人者在那个环境中所能够安排的最让人出丑的事情。

他的狂喜无法言表。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够获得幻想之外如此快乐的东西。这是真实的，他并不需要花力气在他的想像中拼凑这一切，他可以看到手上的血，他手上还捏着刀子。不管别的一切会如何发生，没有人能够拿走他对于完全彻底的满足感的回忆，也无法消除他那一刻的满足感。

当性勃起和狂喜开始下降的时候，焦虑感会慢慢起而代之。那就是一种内疚意识。他明白他已经以一种自己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在他的想像当中，但他突然之间跨过了这一步，他走过了一个关键的地方，使他与众多的人类区分开来。不管别的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他永远都会是一个性谋杀者。

他感到的不是那种自责，那是即将到来的内心的呐喊。他现在只知道他会成为一个受责骂和被追捕的人，他必须用尽自己的一切智慧和资源来保护自己。

我朝后靠在椅子上，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眼睛，直到天花板上冒出金星为止。我一直非常集中精力地思考问题，已经无法再集中精力了。我忘记了拉上窗帘，而此时窗外已经是一片漆黑。我的书房对着前庭，至少，如果我剪掉小路边的灌木丛，就一定可以看到前庭。我记不住上次修剪灌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去年夏天吧。

我对园艺全无兴趣，艾恩和艾玛称为我"破坏者园艺家"，他们说，如果一切都挖起来然后平整掉，仅只剩下棕色的土地，我才会真正满足。他们错了，但是，我就让他们拿这个想法得意去吧。

多年以前，我和玛丽莲决定一起去当地的一所大学上园艺课。一个星期去一个晚上，那课程是为刚刚学着摆弄各种花卉和灌木的人开设的。第一天晚上，那位年长的女老师谈的是羽扇豆。

"对不起。"我有点得意地举手提问。

"说吧，什么问题？"她微笑着说。

"到底什么是羽扇豆？"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确定我是严肃地问这个问题的。之后，她带玛丽莲到旁边去说："布里顿夫人，你当真觉得你家先生很喜欢这门

课吗?"

我记不得如何回家的,不过我并不觉得那是完全浪费时间。如果有哪种花是我认识的,那就是羽扇豆。

我离开书桌到了厨房,然后把开水壶插上。在我用茶匙往杯子里铲咖啡的时候,玛丽莲穿着晨衣出现在门口。她看看钟,拿了一杯水,一句话没有说就轻轻走开了。我早就该上床睡觉了。

"好吧,保罗,你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你明白他如何走到这一步,"我说,一边又坐到书桌前,"但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

我打开大页书写纸笔记本,喝了一杯咖啡,并在上面乱画起来:"罪犯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

大部分性攻击皆为年轻男性所为。这个杀人者已经熟练到了实施犯罪的程度,但他也许仍然处在杀人的初期过程。他有时间想到一次杀人,但没有时间想到另一次杀人。

"他与异性展开社交的能力极差。"我写道,特别突出他没有用普通谈话的方式跟女人交往的能力。

他一定有一段不满意或者失败的人际关系史,也许根本就没有。除开他的性变态以外,他还极有可能有某种形式的性紊乱症,比如不能勃起或者早泄等。"

我明白这极有可能只是形成他与异性交往的能力极差或者人际关系时常失败的一个因素。也许早期进行的一次性交能力没有成功,因为他无法勃起,或者出现早泄,结果使他大受嘲笑。如果是这样,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性功能紊乱在很长时间后就已经自行愈合了。

"他有可能为某些色情材料所吸引,而这些材料会在他的性幻想生活当中起一定的作用,其中的一些幻想会是暴力型的,他也会幻想到类似的经历。"

像这一类的观察并不是从虚空中冒出来的,至少有120年的心理学实验已经在实验基础上完成,因此,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以万计的研究资料在展示着人类功能和动机的各个层面。这种实验已经演化成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就是审判和临床心理学。来自全世界的这样浩无边际的知识对于我的工作至关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还是要了解什么地方、哪些东西是彼此

有联系的。杀死拉雪尔的人以前也许没有杀过人，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在公园里杀死一个陌生人的男性。可悲的是，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男性。每当这样的杀人者被抓到的时候，有关他们的背景、动机和病理学的更多的东西都会透露出来。已经找出了很多共同因素。例如，研究表明，高智商杀人者倾向于有更好的组织，更讲究自己行凶的方法。他们详细勾勒自己的犯罪途径和过程，他们对受害人施加的控制更为严格。在拉雪尔的案子当中，攻击是残忍的，可怕的，而且看起来乱七八糟。这可以从现场看出来

我在纸上写道："罪犯可能只有普通的智力，也只受过普通的教育。如果他有工作，一定是一种不需要太多技巧，但一定很辛苦的职业。他一定是单身，而且有相对孤立的生活方式，跟父母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或者单独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或者住在卧室兼起居室的地方。他一定有孤僻的爱好和兴趣。这些爱好和兴趣一定是不寻常的活动，也许还包括对武艺或者摄影的普通爱好。"

"他一定生活在可以轻松步行至温布尔顿公园的某个地方，而且极熟悉这个地方。他目前可能还没有开车。"

所有这些结论都是根据我们对以这种方式杀人的罪犯的一般理解得出来的。

看看事件发生的过程，我怀疑杀死拉雪尔的人以前杀过人。一般来说，重复杀人者会在杀人过程中越来越熟练，他们会完善自己的技巧和行为，留下越来越清晰的特有记号。

哪怕拉雪尔是他的第一个，但仍然有很大一种可能性，即杀死她的人有性犯罪史——以前不一定被起诉，但是，他有可能因为犯了一些小罪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不体面的自我暴露，或者偷女人的内衣。我将这种可能性排列为一半对一半。我并不希望约翰·巴塞特只靠这样的分析，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应该完全排除。

把赤裸裸的阴茎显露给一名措手不及的女性看，到杀死一个人，这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巨大的生理和心理跳跃，但是，这个杀人者有可能远在他真正做到这一点之前就在自己的脑海里完成了这样一次质的跳跃。他在想像当中演练过，但并不是每一个细节，因为他的大脑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受害人或者地点。拉雪尔是机会选择的结果，她之所以被杀也是因为他当天的冲动特别强烈。没有警告，没有自

我保护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事先准备好的。

之后，他有可能会非常激动，但这很快便在几天之内消失。如果有幸的话，性满足与被发现的恐惧和担心极有可能使他保持一阵子的沉默，但最终他的渴望会再次返回大脑，他会再次出击。我在页底写下了最后一个结论："在我看来，这个人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再次杀死另一位年轻妇女，这是他强烈的性变态和攻击性幻想冲动的结果，就跟以前所描述的所有人一样。"

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我开车去上班，一团团的泥水灌满了水沟，雨点都挂在树枝上。经过基布沃斯村的时候，我看了看当地的教堂，这个教堂极有名望，因为它有两道大门，一道朝东开，一道朝西开。

在往日，曾经有过两个彼此搭界的村庄，基布沃斯波香和基布沃斯哈柯，这两个村庄共用一个教堂。有人曾对我说，各村的大户曾发生过争论，不知道谁应该得到优先，谁应该先得到服务，因此，问题最后通过两道大门得以解决，这样可以让各村的村民一同到达教堂。如果人生所有的障碍都能够如此简单地解决便好了。

在莱斯特郡，人行道上满是办公室的文员们在匆忙行走，他们举着伞弯腰低头走路，一边躲避路上的汽车溅起的泥水。

对于这个人我还知道些什么呢？我心里这样自问着，完全无法将杀死拉雪尔的人抛出脑海之外。巴塞特曾说过，总共有 1750 万嫌疑人。心理轮廓描述有助于缩小疑犯范围，但是，有极差的社交技巧的孤独的人数以千计，他们是些孤立和不快的人，长得一点也不好看。那并不能够使他们成为杀人犯。

杀死拉雪尔的人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会吃，也能喝，还可以跟任何男性一样睡觉。他有生日，头上可能还有一个屋顶。但是，正如拉雪尔·尼克尔是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女性，有自己的内心生活，杀死她的人也有自己的内心生活。

那天白天，我替一个 12 岁的小男孩看病，他在米德兰放火。我坐在他对面，往下看了看，看见了他的案宗封面上他的名字、年龄、住址、婚姻状态和犯罪性质。那些细节只是给了我一个简单的描述，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案卷里面有什么，也没有说这个男孩子到底是谁。我知道里面远远不知几行字，正如杀死拉雪尔的人也远远不止

心理轮廓描述当中的17条。

但他是谁呢？使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塔楼医院的餐厅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个答案钻进了我的脑海。跟神话故事或者刺激读物里面的情景不一样，我并没有在云中看到什么脸面，也没有在雨水滂沱的窗玻璃上看见什么东西。一个罪犯的生理特征一般与我没有太大关系。拉雪尔的杀人者也有可能就坐在对面，在借用我桌上的盐和胡椒，而我不能够认出他来，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研究的是他的想法，不是他的眼睛。

同样，如果他来到我的诊室，让我了解到他的性欲全部的细节，我会立即明白，他有可能就是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那个人，根本不需要他本人说出来。

使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东西是性变态幻想，这是驱动他的根本动力。这是使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回到书桌上，就这个杀人者的幻想写了整整一页，希望这有可能让警方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以前在任何一个刑事调查案件中都没有这么做过，但是，这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向前迈出的积极的一步。

根据对来源材料的检查，我有这么一个意见提出来，即这名罪犯基本上属于有性变态的人格障碍型，这种障碍的详细特征是普通人口中极为罕见的，他们在有总体的性变态的男性当中也只是一小部分人。

我还认为，这名罪犯的性幻想当中一定包含下述因素当中的至少一部分：

1）成年女性；

2）这名女性将被用作性物体以满足这名罪犯；

3）不太可能找到他有密切的人际关系的证据；

4）里面一定有施虐内容，可能涉及刀具，一把或者数把，有生理控制和语言辱骂的行为；

5）渴望凌辱女性受害者；

6）涉及肛门和阴道攻击；

7）希望看到女性受害者显露恐惧；

8）我会推断这样的性狂想最后会导致杀死女性受害者；

我还想强调：我觉得他的性幻想包括上述的某些方面，但不一定全部包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自慰性幻想仅仅局限在上述几点。

拉雪尔被杀死后，警方头一个月接到2500多通电话，那件案子的知名度还在继续扩大，但这是一把双刃剑。7月15日在温布尔顿公园附近的几乎所有人都站出来了，但结果是警方发现自己埋头于大量文件处理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要辨认凶手。

到目前为止，我的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和罪犯的幻想分析已经传真到温布尔顿警局了，我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做完了。但我看到消息说，已经有10多人被作为疑犯接受了问讯，然后又无罪释放。

约翰·巴塞特没有把事情办成，这使他特别难受，因为他将于11月份退休。他一个星期回到公园一次，把他的车停在拉雪尔从沃尔沃车走出来的地方，然后一个人站在林间空地里沉思。对于这位前任机队小组的警官来说，这是他一生所调查的凶案当中最惨的一桩。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被逮捕，没有人被起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他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我必须现实一些，而且明白，每过一天，我抓住这个人的机会就小一点。我无法逮捕一个人，也无法起诉他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因此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这让我想起1950年代的一宗著名案例，就是斯特拉福郊外的米昂山的巫术杀人案，那是苏格兰场的费边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没有破获的惟一两桩凶案之一。之后，他每年都去那个现场，希望灵感会助他破获此案。

巴塞特的突破于9月17号星期四来临。当时，英国警视台播放了罪犯重构情景，还播放了警方希望调查的那些男性的电视合成图片。其中一个涉及在河边洗手的那名男性，他被描述为年约20至30岁，约1.78米高，棕色头发，剪着较短的发式。他的打扮与众不同，白衬衣上扎着腰带，手上还拿着一个包。

第二组电视合成图片显示一名男性朝万茨沃斯的诺斯泰德大厦的一个地方跑去的情景。他被描述为1.83米高，很瘦，齐肩的夹杂着浅黄条纹的灰白头发别在耳后。他穿着灰色或汽油蓝的拳击短裤。虽然过去有人问我说，我研究出来的细节可否公之与众，我一向

都说不行。这次我同意让我作出的心理轮廓描述来构成节目的一部分，因为罪犯再犯的可能性太高了。电视播放的头一天，我曾对英国警视台的尼克·罗斯仔细解释过应该如何利用那些材料。结果只在那个节目中拿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几个小时之内，有300多通电话打进来了，其中有20通电话被列入紧急处理对象。其中一个人的名字4次被提到——柯林·斯塔格，一个没有工作的单身汉，一个人住在离温布尔顿仅只一英里的一个住宅区里。

斯坦格以前也接受过调查。凶案发生的当天，他约在晚上12点30分带着一条狗朝公园走去，结果被一名警员挡住盘问。当他听说公园已经被封锁后，斯坦格提到，他当天早晨8点15分和8点50分之间还去过那里。他说他带着狗去过柯林塘，然后就回家了。警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

这名29岁的男子数年来一直生活在阿尔顿住宅区，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曾跟他父亲共一套公寓，1986年，他父亲得癌症死掉了，之后他就一个人生活。也住在那个小区的莉莉安·阿维德回忆说，凶案发生的几个小时后，她在街上看到过他，说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衫，白色短裤，头发刚刚洗过。柯林告诉她说，拉雪尔被杀的前10分钟他还在公园那边，而且还解释说他常常站在凶案发生地那边的一个山坡上。阿维德夫人当时很是奇怪，他怎么知道凶案会在哪里发生的呢？因为那个公园立即就被封锁了。

英国警视台播出电视合成像的几个小时后，刑警在斯塔格的公寓里逮捕了他，公寓就在罗汉普顿伊普斯雷园的阿尔顿小区里。媒体很快提到，他的前门上画着一对冰蓝色的眼睛，还有一个警告："基督徒走远些，这里住着一个不信教的人。"房间里面有各种色情杂志，还有很多讲神秘事件的书。

时间紧迫。刑警有3天的时间审讯这名疑犯，之后要么起诉他，要么释放他。

我回到莱斯特的办公室，不再考虑拉雪尔·尼克尔凶杀调查案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已经扮演完毕。同时，仍然有另外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迈克尔·山姆释放斯载芬妮之后，到底把钱藏到哪里去了。共有15.5万英镑不同币值的赎金仍然没有找到。

警方最初的搜查曾在一块田里找到一个空洞，就在苏顿昂特伦特区的山姆家附近。同时，还在他的车间里找到一只红色金属箱，上面发现有泥土，这表明钱在某个时期是给埋起来的。山姆是个特别的游戏玩家，我的第一反应会说他："在同一个洞里不停地挖掘。"他的伎俩之一总是依靠人们做出假定，也许他希望警方假定他已经把钱转移了，但事实上他只是把它埋得更深而已。

围绕赎金的神秘事件使他大为兴奋，他利用这一点来支持自己的宣称，说他有一个同谋，而这个同谋此刻正在大把地花销这笔钱。不支持这个说法的证据强而有力，但是，警方希望把最后一个松口的地方扎紧。

经过数月的搜寻之后，在塔利何安排了一次会议，那是警方设在伯明翰的一个培训中心。我参加了来自西米德兰和西约克郡的联合调查小组，他们在阶梯讲演厅里聚会，讨论最新的进展。一位 SAS 上校确证了我们所有在场专家的调查研究领域，然后接受了提问。人们希望，他在寻找北爱尔兰共和军的秘密武库时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找到失踪的钱财。

那个理论是相当吸引人的，而且基于这么一个想法：北爱尔兰共和军不会使用永久性或比较明显的场所作为武器藏匿场所，比如公路旁边的紧急停车道或者田野的角落。他们会寻找可以利用地标再次找到的地方，一般来说不一定是明显的地方，除非是你特别熟悉的一个地方。例如，他们不会利用一个田角，"隐藏的东西"有可能会藏在第五根桩柱下面，然后还有对面树丛中的第三根路灯柱作为参照。

但是，这个案子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寻找。我们再次回顾了迈克尔·山姆的生活和时代，讨论他的习惯，以前的历史，还有字母和数字也许是藏匿地的重要指标。有很多种可能性存在，如预料的一样，山姆留下了很多错误的线索，但最终，讨论集中在斯托克峰上，那是格兰特汉姆南边的一个地区，离朱莉·塔特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仅只 1.7 英里。其他的一些因素使山姆与这个地区联系起来。当地的一位农民曾报告说，朱莉·塔特的尸体被扔出来的那天看到一辆桔黄色的汽车，这跟山姆的梅特罗车相差无几。有条铁路线从中经过，还有一座立交桥跨过那条铁路，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察火车的视点。

山姆可能在匆匆忙忙中重新藏起了那笔钱，因此，那一定是他熟悉而且感到放心的一个地方——是他以前去过的某个地方。在9月，警方曾在一次问讯中提到过斯托克峰，山姆也说他去过那个地方好多次。他无意中说出，最后一次到那个地方是2月的一个潮湿的星期三。

那笔钱必须在1月30日释放斯戴芬妮到2月21日山姆被逮捕之间的某个时间埋下来的。一位气象学家确认，2月19日格雷汉姆区在下雨。这也是山姆给船台公司的西尔维娅·贝克打电话的那一天，当时他想让她闭嘴。这个行动表明，他处在极大的压力中，因为他明白，24小时后，他的声音将向数百万人广播。

那位上校看了看斯托克峰，然后指出一些有可能藏东西的天然的隐藏处。最初的搜查什么也没有找到，但是，利用地面探测器搜寻显示地面有波动。最后，12万英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找出来了，都埋在铁路沿线。

山姆想构造的"同谋辩护"现在破裂了，但是我毫不怀疑，他还会发明另外一个故事来解释新的情境。他被逮捕之后已经过了10个月，再过6个月他才能够面对诺丁汉皇家法院的陪审团。

10 掩蔽行动1

9月下旬，约翰·巴塞特再次打来电话，接到电话时我有些惊讶。他说，他的一名警官有一个请求，然后，他就介绍了警督基斯·佩达。

佩达小心措辞："我花14个小时的时间跟一个人谈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人有可能帮助我们了解杀死拉雪尔的人。我现在不是很想透露更多细节，因为有可能会对你的判断产生一些误导影响。我想知道的是，这个谈话当中是否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总体地说：按照你的意见，按照你给我们做的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和性变态分析，这个人也有可能不是拉雪尔·尼克尔的谋杀者。"

"能把磁带交给我吗？"我说。

"我这就安排人送来。"

当天晚上，我开始倾听磁带录音，同时，玛丽莲为我端来咖啡，打开房门的时候耳朵都塞着，还踮着脚尖走路。我不在乎半夜工作，因为我常常整夜不睡准备大学的考试和论文。我不知道玛丽莲是否也是这么看的，她以为那些日子已经远远地抛在脑后了。

磁带里面录的是警察与柯林·斯塔格在温布尔顿警察局里的一系列谈话。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看看案发当天早晨他在什么地方活动，还问到了他的生活方式、历史和习惯。差不多很快就清楚了，他对公园非常熟悉，用非常准确的字眼描述不同的小山、小路、池塘和林地。他一天去那里散步两到三回，有时候还到邻近的普特雷墓地去看看他父亲的坟。

斯塔格说他记得拉雪尔被杀害的那天，因为他那天一直头疼，而且还有颈部抽筋。他早晨6点30分醒来，为当地一家报纸代理行送了一些报纸，然后带着自己的小狗布兰迪去散步，当时是上午8点30分。他在地图上指着他行走的路线，并解释说那是一条近路，他因为头疼而不想走远路。

"我想回家去再睡一会儿，"他说，"我感到没有睡醒。"

他说他直接回到伊布斯雷园，吃了些薄脆饼干，然后就坐在靠背长椅上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慢慢就睡着了。他不记得是哪个节目。后来，他听到头顶上有警方直升机的声音，因此就醒了。当地一家店主告诉他说温布尔顿公园出了命案，他也在报纸上看到了报道。

问及他是否在公园见到过拉雪尔时，斯塔格记得约在两年前见到的一个人有可能是她。她用婴儿车推着一个婴儿，躺在塘边上。

"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我看到她穿着比基尼式游泳衣在进行日光浴。我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第二天又回到公园去，希望能再看到她。

问及是否可以看看拉雪尔被杀那天他穿的鞋时，斯塔格说："两天前我扔掉了……可能还在小区的垃圾堆里吧。"

斯塔格承认自己仍然是个童男，他说自己以前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但是，他想性交的企图都没有成功，因为他"就是硬不起来"。

在第二天全天的谈话当中，斯坦格都坚持认为他不知道拉雪尔被杀一事。他说，他在A3地下通道处碰到的那个警察告诉他说，凶杀的受害人是一个年轻妇女。他否认自己是那个有人看见在克林河

边拿着一只黑袋子，或者在腰上扎有皮带的人。他永远也不会在那条河里洗手，因为他说那条河受了污染，里面有臭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听那些磁带，期间我和基斯·佩达谈过几次。我发现，佩达以前对心理轮廓描述有过某种“开放思想”，差不多就是怀疑了，但是，当他去柯林·斯塔格家去逮捕他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轮廓描述和疑犯之间的相似点太多了。现在，他非常热心，希望了解更多心理轮廓描述方面的事情。

“在什么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说‘是的，他与本次调查无关’？”他问。

“嗯，例如，如果他说他已经有了两年快乐的婚姻生活，而且还有一个孩子，那就与凶手的情况不符了。或者说，如果他有一个长期的职业，需要高水平的智力，或者说他表明他与妇女有成功和稳定的两性关系。这些东西都可以消除对他的嫌疑。”

我把这些都解释清楚了，而且仔细听完了磁带，因此就对基斯·佩达说，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能够确定地将柯林·斯塔格排除在调查之外的要素。这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是说他就一定有罪，我们只是说他不能够被排除在外。

那些磁带里面还有相当惊人的忏悔。斯塔格先生承认，拉雪尔被杀掉以后，他曾在温布尔顿公园不体面地暴露过自己。一名在操场上遛狗的妇女看见他全光着躺在地上，只带了一幅墨镜，一身的衣服都堆在旁边。她从旁经过的时候，她宣称他张开了双腿，而且还微笑。斯塔格被起诉不体面暴露罪并被课以 200 英镑的罚款。

在整整三天的质询中，斯塔格的否认既肯定又确切。但是，尽管缺少物证，他仍然是警方重要的疑犯。

一个月之后，这种情况得到改观。有人将斯塔格写的一封信交给警方，那封信是斯塔格写给一位妇女的，这名妇女曾在《鲁特》杂志上登过征友广告。朱莉·派因斯一开始与他保持通信，但后来中断了通信，因为她说他的信件越来越下流了。两年过去了，但是，他被逮捕以后，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她与事件室联系，并将斯塔格写的一封信交给警方，这封信是她一直藏起来的。他在信中想像自己在当地一个公园里裸体日光浴，并开始手淫。一个漂亮妇女吓了他一跳，但是，那女的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请他一起去户外性交。

我直到1992年9月底才知道此事，当时，约翰·巴塞特来到我在莱斯特的阿诺尔德洛奇的办公室，是跟米克·威克逊和基斯·佩达一起来的。我感到十分有趣。为什么一个凶案调查组的三名领导人要从伦敦开两个小时的车来看我？

我们在会议室坐下来，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掏笔记本，也没有掏钢笔出来。巴塞特首先发话："保罗，我想问你一个假想的问题。我想试试你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根据你对凶犯性变态的分析，有没有可能设计一种秘密行动，使我们要么使一个人洗脱与凶案的关系，要么使一个人更脱不了干系？"

我吃了一惊。以前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三名警探都不出声。

"你们意思是说搞这样一次行动，在其中，对凶犯某种特别的性变态的了解可用来给某人一个空间，让凶犯与他觉得安全的一个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从而使其暴露其与凶杀的牵连？"

他们点头。

我花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是的，有可能。"

"那好，"巴塞特说，"这是第一道障碍……"

一个笔记本掏出来了。

"有好几个办法可以这么做，但这意味着必须有人接近疑犯。"

佩达问："一名秘密警察？"

"或者一名妇女。从基本上讲，秘密活动的警官可与他接触，并允许疑犯与他们交上朋友。这种关系设计用来形成一个逐步泄露秘密的通道，使疑犯有可能最终选择将其性变态的一些方面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很多捷径可走——是一些判断点，疑犯可以选择走几条路。只有当他选择事先规定和非常特别的一条路，这次行动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如果选择了别的任何一条路，则这次行动就要结束，因为从我的角度看，疑犯可因此洗脱自己。"

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这对我没有差别。我对疑犯有强烈和狂暴的幻想的分析是在任何具体的一个人受到怀疑之前形成的。自那以后，还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改变看法。

佩达问："这么说，具体怎么着手做呢？"

我用一块白板大致描述了两条假设的秘密行动，设计用来利用

杀死拉雪尔的人极其丰富的性变态幻想。

“我们假定联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取决于一次偶然的会面，或许是例如信件的交换。在合适的情景下，而且有合适的女友——罪犯有可能开始显露幻想，表明他对极狂暴的、非双方情愿的性活动的需求。”

“这将包括使用刀子以利刺激，包括在他的幻想当中穿透和控制那个女性，还有屈辱和极度的主宰行为，甚至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同时，他会在性欲上激发起来，会产生攻击欲。当他更多暴露自己的时候，这些幻想会慢慢集中在一个地点，很类似拉雪尔被杀掉的那片林中空地。在最高的强度上，到达不可遏止的时候，他们会重演杀人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罪犯会从重演杀人的过程当中得到极大的性满足。这不是一种智力刺激，那是他为自淫找到的最强烈的刺激。”

“这可以通过信件实现吗?”佩达问，指的是利用一名女警官进行的秘密行动。

“一开始可以，但这名凶犯会很快想办法从这种文字关系发展到人对人的会面，还有私密关系。他会希望将自己看作是对女友非常有吸引力的人，而且有可能编造出他认为有必要的任何一个故事来获取两性关系当中的生理上的私密关系。”

巴塞特问:“他有可能发明一些事情?”

“他不会立即就使自己卷入凶杀案，请记住，他有很强的警惕意识和自我保护感。但是，等他的变态性欲发动起来而且急不可耐的时候，就会淹没他的警醒，还有可能导致他暴露出对拉雪尔死亡细节的了解，这是只有杀人者才了解的。”

我解释说，罪犯的行为和关系的发展有可能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比如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凶手非常谨慎。等他相信警方调查毫无进展，公众对此也不再注意的时候，他就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安全了——他会觉得自己已经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如果他有理由假定警方还在继续高度关注此案，那么，他就会更加谨慎，而且对任何人际关系都小心对待。”

巴塞特和威克逊交换了一下眼色。

“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威克逊说。

佩达回答说:"是啊,但保罗说过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这次行动得到批准,"巴塞特说,"你是否愿意为我们具体设计一个方案,并充当我们的顾问?"

"我先得问几个问题,"我说,"你们说这事以前从来都没有干过——这样做是否合法? 我不是律师,不太了解这类事情的法律意义。政府会不会说'是啊,这个点子非常有趣,但不允许进行,这是在进行无警告的访问调查,甚至是执法人员诱人犯罪'。"

"这不存在问题,"佩达说,"律师会用密齿梳子仔细梳理里面的法律问题。皇家公诉机关如果说此举不合法,在法庭上站不住脚,那我们搞这个行动显然没有意义。"

巴塞特同意,说:"这将是最清白干净的一次行动,必须绝对纯净。我们知道这一点,警视厅也明白这一点。"

我点头:"好吧,如果是这样,那就必须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进行。我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解释的设计一次行动,但这要求一个疑犯积极主动地爬上第一级梯子,他自己的选择会使他得以解脱或者洗不清罪名。我不愿意设计这样一个行动:它在功能上等同于把一个人放在滑坡的边缘上,然后推他一把,这样他就没有选择了。"

他们都同意。大家都不愿意让一个无辜的人受到审判,而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继续杀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起草了一个单子,是秘密行动的警官必须达到的具体要求,然后给基斯·佩达打了电话,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两个都行,或者两个人同时上也行。

首先是一个男性白人,年龄在 25 至 30 岁之间,看上去身体健康。他必须非常聪明,但也稍稍装出不那么聪明的样子,而且要能够描述一系列性幻想和行动,跟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那个人的性幻想和行动差不多,但不能够完全一样。

重要的是,这名秘密行动警官的背景故事必须包括他成功地在谈话调查当中逃过了警方,要么就完全没有接受过谈话调查,因为警方一直没有找到接近他的机会。他必须有能力独挡一面,在两个人的关系初期非常谨慎,在受试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活动时显出惊讶或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样子。他们将形成一种排他的俱乐部关系,各自的个人业绩是他们彼此承认和接纳的条件。

当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开始加深的时候，警官会慢慢地透露出他更多的历史，这里面包括严重的暴力性犯罪。这有助于形成一个环境，使受怀疑的人能够感觉到安全，甚至在透露自己的背景时有自我吹嘘的良好感觉，这时，那个警官不能提到拉雪尔·尼克尔的名字，也不能够提到他选择的任何一个正式的人。

第二个同谋是一个白人女性，年龄约在20到40岁之间，有金黄色头发，或者浅色头发，齐肩长或更长。她必须是传统概念上的漂亮女性，或者能够给人一种迷人的感觉。她应该看上去有性经验，但又不是滥交的那种感觉，而且容易对"有趣"或者有经验的男性产生兴趣，这些男性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

她必须能够对疑犯给出的任何线索有反应能力，并做出由于强迫性的活动而产生性冲动的样子，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她最好稍稍有些被动，但经常是主动的。她应该愿意指明她以前很喜欢与带领她进入性幻想的男人共享性爱经验，这样的男人一般希望从浪漫之爱进入暴力行为，并将自己的业绩抖落给她听。

如果她在背景中加上对于神秘宗教的兴趣，则会成为极有用的一个要素，她应该对这样的一些男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愿意通过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哪怕这明显与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标准相抵触。

我并不知道柯林·斯塔格将成为这次秘密行动的受试人，但是我知道，他一直都还是警方的怀疑对象。这对我没有什么关联意义。我是根据自己数月前对杀死拉雪尔的人进行的性变态分析而设计这次行动的，当时，斯塔格先生尚没有受到怀疑。

佩达和威克逊两星期后来阿诺尔德洛奇看我，同时带来两名警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在大门口迎接他们时，我可以发誓自己以前见过他们。他们甚至想办法找到了一名蓝眼睛的女性，就跟拉雪尔一样。

莉西·詹姆斯和罗伯特·哈里斯（不是真名）都得到过简单介绍，他们知道这次行动使他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如果他们去交朋友的疑犯后来证明的确是杀死拉雪尔的人，则他们就让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了，特别是莉西。

两个人都来自苏格兰场的秘密行动小组，也就是SO10组，那是执法部门当中最秘密的一个机关之一。这个小组处在所有秘密侦查

行动的最中心位置，也进行警察部门中最危险的一些任务，比如渗入匪帮、保护处在危险中的陪审团成员，或者假装合同杀手。他们都是些有经验的人，很放松，也有自信，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曾参与过这类的行动，因此，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此任务是很重要的。

柯林·斯塔格回给朱莉·派因斯的"征友信"自动暗示让秘密女警察认识他的一个好借口。如果一种友谊成熟了，而疑犯仍然处在照片阶段，则这有可能进入电话谈话阶段，然后再进入个人接触阶段。我以清晰的细节向他们描述，如果碰到杀死拉雪尔的人，则他们可能会遇到幻想类型和性变态行为。

"您觉得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吗?"莉西摇着头说。

"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杀死拉雪尔的凶手最开始不会现出恶魔的样子。你不会看到他的眼睛背后的东西。他有可能会以一名年轻的孤独者的身份寻找伴侣，但是，你必须明白，真正的凶手会一路利用和操纵你。他的脑海里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你以前从来都没有碰到过的。"在阿诺尔德洛奇谈过几次后，凶案组决定只利用一名秘密刑警，也就是莉西·詹姆斯，我也就专心让她做好准备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她会听到的每一句话，因此，很多事情取决于莉西有否能力很快做出正确的决定。她有可能要面对面地处理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如此，而她要面对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凶手。她有否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快速反应的头脑？她有否能力做出谦卑和被动的样子？但在性欲上面又显得敢于接受新思想和一些怪异的幻想。

我在会议室里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侵入了她的私人空间而且小声说："你有一双非常漂亮的蓝眼睛。"

我注意她的身体语言。她会不会退缩，或者移开一点？莉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很快就明白了，微笑了一下，然后小声大笑。这是她通过的一系列测试当中的头一个。

她必须记住自己编造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些粗线条，而且还有极详细的细节，这是每个人在一生的经验中都具备的。她的童年、上小学的情况、家庭和友谊。这些东西都必须列得清清楚楚，这样，她就可以回答任何问题而不会犹豫或者说漏嘴。

最重要的是，在她的历史当中，莉西最终必须透露她在 12 至 18 岁之间的某个时期被一种巫术或者神秘宗教所吸引，她在那里慢慢

和有系统地明白了属于性欲方面的仪式化虐待。这最后使她成为一名被动的参与者,也成为对一名年轻妇女进行性谋杀的主动帮凶。10年以前,她因为思想混乱和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矛盾心情而准备脱离那个团体。但是,她相信,只有这样一种有着跟她类似的实际经验、因此也明白和能够分享随之而来的非常特别的精神性欲的男人,她才能与之进入完全私密的性关系。

她从那以后尽管想努力建立起一些关系,但是总是没有结果。因为她明白这些关系不可能像她在那个团体的时候体验到的那种关系一样有力和不可抗拒。这些失败造成了她极度的精神痛苦,因此,她总是带着极大的谨慎来思考一种生理意义上的私密关系的发展。

这次秘密行动设计用来让一个疑犯消除或者证实他与拉雪尔死亡一案的干系,看看他是否有着与杀人者一样的性变态。如果证实如此,他也确曾杀害了拉雪尔,那么,也许他会透露出对于那次犯罪行为的内疚和知情。为了让这次行动发挥作用,疑犯必须总是先走一步,不能把一些话塞进他嘴里,也不能灌进他的大脑。莉西只能够对他发出的线索做出反应。

一开始,莉西必须显示她对透露自己的过去非常小心,担心暴露之后会使她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当她谈到她在神秘宗教团体当中的经历时,她必须慢慢讲,慢慢透露出一些细节,就好像她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放心了一样。但有些方面会让她有所保留,那就是阻止她完全敞开内心的一个障碍。

"你觉得自己在最深刻的方面与普通人不同,"我告诉莉西说,"但是,你发现自己很难解释为什么。你在等机会发现这个人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在两个人建立关系的初期,莉西不能够透露出对拉雪尔被杀案的任何兴趣或者了解,这是绝对重要的。如果疑犯提起此事,莉西只能显出一闪即过的小小的好奇,尔后就改变话题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莉西应该继续闪过这个话题。只有当提起三四次之后,她才能够让自己认真地谈论此事,然后说"那好吧,讲讲这件事。"

同样重要的是,莉西不能够提到任何暴力攻击和虐待性的话题,那是我预测会驱动杀人者的性幻想的东西,比如身体控制、语言辱骂、刀子和对女性的侮辱。她不能够透露新材料,也不能够透露讨论

的话题引导他，她只能够对疑犯已经提起的话题进行反应。

这是一项安全措施，以防一名无辜男性被引导作出不真实的宣称，以便从莉西那里换取性交益处的可能性。但是，将由别的人来确立和决定任何一个疑犯是否犯有杀人罪。我的任务是设计一套明确的步骤，允许这个人自己做出决定，他可以借此澄清自身，也有可能使自己进一步脱不开干系。

"他会像恶魔一样，"我提醒说，"如果他是杀死拉雪尔的凶手，他会尽力获取性秘密而不使自己处在风险之中。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调查莉西·詹姆斯，以及她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因此，他有可能会制造一些情景，希望借此让你得到满足。"

"他会编造一些故事吗？"她问。

"极有可能，"我说，"但最后他的性变态驱动力会到达这样一个水平，使他保持谨慎和自我保护的倾向丧失，他有可能开始透露对拉雪尔凶案的一些细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得同意认真听他说，但要表明你需要证据，说他只不过是在编造一些故事来哄你，想哄你上床。"我帮莉西编好假履历之后，就开始确保她喜欢自己扮演的新角色。与疑犯面对面的时候，她不能够随意浪费时间。

"他们怎么虐待你，莉西？你17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嗯，他们……嗯，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告诉我他们对你干什么了？我需要听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强迫你干什么事情了？"

一开始莉西不情愿，很不舒服，但是，她进入自己的角色之后就慢慢有了一些自信。在真正的行动当中，当疑犯透露他自己的某些事情，而且让莉西回报一些类似的机密的时候，她必须有能力大方地谈及与那些人进行过某种形式的性交，哪怕对面的那个人是个杀人犯。这需要很多练习。

我装成那个疑犯打假电话试了试，然后指令说，那封信必须事先想好措词，这样的话，莉西就不必引入疑犯已经使用过的材料、话题或想法。

"这会花多长时间？"佩达问，意识到了成本和时间上的压力。

我画了一个草图，大致描述了可能的反应："你们是在寻找一次

旅行，从开始到结束大概为24到26个星期。莉西与他建立两性关系需要大概2到6个星期，然后才可能进入某种亲密关系。如果到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不妨中断这次行动。一旦幻想交换开始了，你们应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完成余下的事情。”

“如果到时他没有透露任何凶杀细节怎么办？”

“那你们只好中断，并可排除他与此事的关系。他要么的确没有什么可以透露，要么永远也不会透露。”

这一切说完而且做完之后，我们就等着上面的绿灯亮了。

11 绿链道上的系列强奸犯

在伦敦西南地区的艾尔莎姆镇地区，离温布尔顿公园10多英里地方的一间警方事件室里，一场追猎活动正在进行。要查找的是一名系列强奸犯，他至少已经攻击过人4次，每次攻击都越来越残暴。极明确的DNA测试证据表明，几次强奸案之间互有关联，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调查此案。

这次行动的代号为艾赛尔斯通，两个星期之后，警督约翰·皮尔斯于9月初打来电话。几次推迟赴约，然后沿M25号公路狂奔一阵子后，我们最终于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会面了。“他可真是难缠的一个人物啊，”皮尔斯想办法让我熟悉一下事件室，“暴力程度都在桌上摆着，有个受害人最后看上去像一件碎布玩具。”他走路和讲话都很快，为我介绍这个行动小组的各个成员时看起来很放松，很自信。

“我们通过DNA测试发现两宗强奸案和两件未遂强奸案彼此有联系。我们还掌握了其他一些性攻击行为，都跟同一个人有关。我们有很多证人，有相当明晰的画师印象图，还有相当有把握的监视装置。我们缺乏的就是一个疑犯。”

“我能够帮上什么忙？”

“跟我们多讲讲这个家伙。我们缺少什么东西吗？他为何选择那些受害人？你随便跟我们说点什么吧。”

他开始向我简单介绍已经确证的攻击行为，从 1989 年 8 月 10 号的第一次攻击开始。简妮是一位 30 岁的单身母亲，她每天早晨都会出门遛猫，然后为孩子买早餐，再后就回家清理卧室。

她住在一栋跟别家不搭界的房子里，背后是一片开阔地，靠近普鲁姆斯泰德的温斯公园。早晨 8 点 30 分，她在楼上靠屋前的卧室里梳头，结果抬头看见一名男性站在门道里。他的嘴、鼻上盖着一块布，手上拿着一把黑色手柄的斯坦雷刀。

他命令她回到床上，将 T 恤衫卷起来盖住自己的头，然后用皮带或者铁丝将 T 恤衫绑在她的眼睛上。她替楼下的孩子担心，因此让他关上房门，并让他动作快些。她面朝上躺下，他就强奸了她，中间并未出现完全的勃起。之后，她看见他消失在开阔地的破栅门后面。

"他如何进入房间的？"他问。

"她感觉到自己出门遛猫的时候后门是开着的。他就从在楼下玩耍的孩子们身边走过，割断电话线，然后就找到了简妮。"

"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偷走的？"

"没有。"

因为强奸者的面部部分遮住了，简妮无法帮画师画出印象图，但是，她描述自己的攻击者约为 5 英尺 10 英寸高，年龄约在 19 岁，中等个子，暗灰黑色头发，穿着廉价的褪色牛仔裤和一件棕色夹克。

"这是惟一的一次室内攻击，"皮尔斯说，"如果不是 DNA 帮忙，我们根本不会将这次攻击行为与后来的强奸活动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的已知攻击隔了 3 年之久，距离有 4 英里。苏珊是一名 17 岁的姑娘，住在普鲁斯泰德西南地区的路易山姆市，1992 年 3 月 10 号晚 8 点 40 分在住地附近搭乘公共汽车去看附近住宅区的一位朋友。她在与阿伯纳西路交接的利高路附近下车，然后一个人往前走。等她接近科德韦尔住宅区时，意识到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白人青年。

她转身向左边的住宅区走去，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庭院，这时候，他就朝一些停车房跑过去。苏珊进入第二条胡同的时候，她就在后面受到攻击了。他抓住她的右臂，拿着一把刀子站在她面前，说"如果你想活，那就别出声。"

他将苏珊拖到车房后面，迫使她将上衣和乳罩掀起来，一边亲她的嘴和脸，一边玩弄她的乳房。当她挣扎的时候，他用刀子顶住她的腹部，提醒她注意他有刀子在手上，一边还说："如果想活，你就得闭嘴。"然后，出于她不明白的某种原因，他开始猛击她的脸。他扯下她的牛仔裤和短衬裤，将她推倒在地，将她的手腕扳到脑后，一边猛力对着她的屁股撞，费了半天劲都没有插进去。

最后，他站了起来，穿上自己的裤子，若无其事地离开之前用脚使劲踢她的头，踢了有六到八下。

"那完全是他妈的没有一点头脑的暴力行为，"皮尔斯说，"他根本不需要那么做的。"

在苏珊的衣服上找到了精斑，DNA 测试也证明与第一次攻击有关。

八天之后，这名强奸者又一次发动攻击，这次是在艾尔山姆的野外，离路易山姆市有两英里。17 岁的琳纳在家里吵了一架，然后于晚 7 点 30 分出门散步。她走的路线是从艾尔山姆宫殿路到通往野外的一条小路，然后是朝艾尔山姆宫殿路延伸过去的一片林地。约在晚 8 点 15 分，她在高地上停下来看加纳里码头和水晶宫塔的灯光。

琳纳转身走开的时候发现附近有个男人，看样子是想从她身边走开。但是，等她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他却突然间出现在她面前，右手拿着一把刀子。他取下了脸上的巴拉克拉法帽，让她看到了他的脸，然后说："跪下来，我手上有刀，准备用一用。"

他迫使琳纳躺下来，用刀子刺在她的左乳房上，并刺破了皮肤，小伤口流出的鲜血染红了她的胸罩。现场因为有齐腰深的草遮着，他就脱掉了她的上衣和乳罩，并开始抚弄刀子下的乳房，然后脱下她下面的衣服，命令她双手抱住双膝，然后将双膝打开。他想插进去，但他的阴茎太软了。然后他开始上下移动，模仿性交的样子，还说"这样舒服吗?""你是处女吗?""你感觉到我已经在你里面了吗?"

琳纳不小心松了一下手，结果使他大为恼怒，他威胁说要将她打昏。到攻击行为的最后，他慢慢有了一点勃起，因此想再次插进去。之后，他将刀子放在她的阴道口上说："你差点就让我插你一刀了。"然后他用刀子在她的胸部与下颌之间来回移动。

"好姑娘。"他说,一边站起身来。

"我是不是要等到你走了才能够站起来?"她问。

"随便吧。你会当个好姑娘,不要惹任何麻烦。"

有两个小学生看见琳纳从事发地点跑走,因此帮助她到了附近的商店,她就在那里跟警察打了电话。她衣服上的精斑生成一个DNA样本,她也想办法为警方制作了一幅印象图。根据皮尔斯的说法,相像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五,这样一个人物画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画师的印象图有可能造成极大的误导。如果它们与疑犯没有合理的相像度,则有可能引起重要的证人不打电话来。

第三次攻击是在一条以国王约翰之路知名的公用小路上发生的,这条小路跨过琳纳走过的那片开阔地。那是更大一个系列的小路当中的一条,连着伦敦东南部的数处公园和公共地,共同形成所谓的绿链之道。它从伦敦的两个地方开始,一是布罗姆雷,一是水晶宫殿,并一直向北蜿蜒而去,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

发生第一起强奸案的那栋房子背后靠着温斯公园,那是绿链之道的一部分,这个地方也是发生第4次强奸案的地方。

1992年5月24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也是法定休假日,22岁的卡茜用婴儿车推着两岁的女儿顺着国王约翰之路走。就在下午2点之前,卡茜注意到有个男人在一排被废弃的一些灰色波纹铁门后张望什么。不久之后,她走进这条小路较窄的部分,两旁是铁轨和矮树丛。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跟来,突然之间,她的头就被一根带子猛拉回来。她松手放开婴儿车,一顿乱掌打在她的头部和上半身上,然后她就被打倒在地上了。

攻击者脱下了她的短裤和衬裤,他一定还抽掉了她的月经棉条,还想办法将她的上衣掀到了腋窝下。然后,他强迫她张开双膝,同时脱掉了他自己的短裤,短裤下显露出一种老式的Y形内裤。他在她的两腿间、靠近阴道的地方自淫,插进去的时候还用手扶着阴茎,因为当时还是太软。

他还在她身体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就跳了起来,拉上短裤就朝来的方向跑走了。卡茜看上去像一个血乎乎的碎布娃娃,她找到自己的衣服,然后推着孩子到了婆婆家,然后就晕倒了。后来她对警察说:"我请他不要杀死我。他不停打我,他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不停

地打我的头，十分气愤的样子。"

皮尔斯呷一口咖啡，然后咕哝着说："这个不要脸的王八蛋。那条路上来往的人很多，况且是在大白天，随时都可能有人碰到的。"

"他喜欢冒险，至少一时想冒险。"我说，一边看着案发地带的航拍照片。卡茜还帮着提供了一幅画像，别的受害人都说有些像，或者说还不错，但她的描述是，这名攻击者至少有6英尺高，这远远超过了别的受害人的估计身高。

皮尔斯还介绍了别的几次攻击案，他相信仍然是有联系的，所有这些案件都与绿链道相关。特别是艾尔姆斯泰德林地的一次攻击行为，离艾尔山姆南边发生的那些攻击行为仅只隔着一英里距离。这次发生在8月30日。一名47岁的女教师早餐后遛狗，然后她从主路的分岔处走下去，此时，她的威尔士矮脚狗开始叫起来。

一名青年从她身边走过，然后挡住了去路。他开始隔着裤子摩擦自己已经勃起的阴茎，然后抓住狗链绕在她脖子上，迫使她靠近他。他将她顶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此时，她觉得那条威尔士矮脚狗一定是咬了他的脚踝一口，因为他急忙站起身来，朝林中空地爬去。

她提供的描述与其他描述类似，看到画像后她回答说："就是这个人。"她还描述那个人是"D形横幅"，这是以前老师们用来描述有轻微学习障碍的学生的一个词。

皮尔斯进一步描述了两件案子，这两件案子是特别调查行动开始后发生的。9月1号晚上7点，一位在艾塞尔斯通事件室做普通行政工作的女职员离开艾尔山姆车站去开她停在一条侧街上的汽车。她注意到一名男子跟在她身后，肩上扛着条纹塑料袋，里面装着长形物。她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就跑掉了，但她注意到他跟疑犯描述很相像。

这次不期而遇被认为是真正的目击，因此引起人们的担心，觉得这名强奸犯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关注因为这个案子而引起的知名度了，而且还对艾尔山姆警察局的人产生了兴趣。这个说法在一个星期之后得到印证，有一名14岁的男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滑旱冰，此时，一名很符合疑犯像特征的男子走到他们身边来，然后敞开了黑色的皮夹克，露出了里面的一张追查强奸犯的招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他说，然后就走开了。

皮尔斯带我在事件室里四处走动的时候嘴里一直在说话，他让我认识事件室里其他的一些人员。“我现在最好把你介绍给特别调查办公室的人。”他说，一边带我走进一个旋转门。斯迪夫·兰德由警督看起来跟我见过的所有警官都不一样，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才恍然大悟。他穿着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一身三片式定制西服，扣得严严实实的背心上挂着一条金链，西服口袋里还装饰着一方手帕。

兰德由听着案情汇报，不一会儿之后便借故离开了。我感觉到他认为我的出现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他更喜欢常用的警察方法，不希望有咨询心理学家出现。但是，皮尔斯对心理学有极大的兴趣，他读研究生期间就一直在研究心理学的许多领域。

他给我时间读到了主要的证言和医疗报告，然后，皮尔斯就安排带我去犯罪现场看看，这花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下午的暑热使汽车像一只炉子一样，停下车来走走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对第一件确知的强奸案有特别大的兴趣。这个案子使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件案子与别的案子都不一样，因此，调查组的人都认为这个案件与其他几个案件比较起来属于失常现象。皮尔斯在介绍案情的时候快速介绍了很多细节，然后快快赶到出事地点，他觉得这些攻击能够显露强奸犯的方法。

但从我的角度看，对简妮的攻击包含比别的案件更多潜在的线索。其他的受害人都是选定的，而且是在户外进行的，也许是随便选的，也许是纯机会主义的，但是，他找到简妮却是明显有什么东西在引导着他。他如何知道她就在屋内？他是不是一直都在观察她，或者跟在她身后走过？

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一定有过对话，他们彼此说过的话可以显示出他受教育的水平，动机和对简妮的了解程度。

“可不可以再问问她？”我问。

“我想可以吧。”皮尔斯说。

“还有她的邻居。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报告看到过某人偷窥，或者在出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人在那一带转悠过。”

“你说的是3年前的事情。”皮尔斯忧心忡忡地说。

“是啊，那是令我觉得奇怪的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指……”

“我在想，他在第一次攻击之后是否从那个地方搬走了。你不可能发现各次攻击行为之间会有3年的沉默。像他这样的男性有特别的性欲要求和性幻想，他们能够几个月不出声，但一般不可能数年不动窝。也许第一次强奸攻击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外面呆一阵子。”

“这件事情当时没有报道出来。”皮尔斯说。

我在想，他去哪里了？在监狱里还是去了医院？他搬了家还是两性关系崩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有理由来解释这么大的一个时间差。”我说。

在不同的案发现场，皮尔斯为我介绍了各个受害人在什么地方首先发现那名男子，然后说攻击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后来的攻击行为当中，他让人看见他的脸，而且有惊动也不怕了，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小路上攻击卡茜的时候，那条路上有遛狗的人和儿童来往来往，有骑车的人和跑步的人经过。他根本不怕被人发现，也不怕卡茜的孩子在场，他增大了暴力程度，不停地击打她的头部。

皮尔斯让我看了简妮、苏珊、琳纳和卡茜的照片，这几个人都年轻漂亮，这使警方相信这几名女性都符合强奸犯心目中的某些生理特征。我提议说，与其去寻找生理上的类似性，还不如去看看这些受害人在强奸犯面前是个什么样子的。她们是不是有可能看上去不堪一击，或者看见他的时候很紧张，因为她们不敢回视他瞪眼，只是扭头朝别处看，等等。

我对艾尔姆斯泰德林地的攻击行为也不是很明白，就是那个遛狗教师的事情。这其中的许多方面都需要解释。除开比其他几名女性年龄更大一些之后，攻击的时候没有用到刀具，而且那个教师还看到一个男子隔着裤子摩擦自己的阴茎。我们从其他几次攻击当中发现，那名男子在保持勃起方面有问题。

她还描述了一名看起来智力有问题的男子，但是，我认为那不太可能是绿链道上的强奸犯。他的控制能力和心理能力在其他的几次攻击行为中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他有可能没有用复杂的骗局，也没有将受害人引诱到更有利的作案地点，但是，他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智力干出自己想干的事情来。

伦敦南部地方报纸的报道上发现了很多线索，可以用来追查绿

链强奸案，刑警也在追查已知性犯罪者的活动情况以及行动诡秘的男子的报告。两个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共鸣。10月12号星期一，一名妇女报告在靠近第一次强奸案的发生地温斯公园被一名男子跟踪。她晚10点用婴儿车推着孩子从那里走过，突然间注意到一名男子坐在公园长板凳上。她害怕这个人，因此请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里面的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看着她。她经过长板凳的时候，那名男性站起身来企图跟踪她，但车灯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改变方向走了。

在另一次事件当中，一名男子想强行进入一名年轻妇女的家中，谢天谢地门上的安全链帮她将那个男子挡在屋外了。尽管这与室外发生的攻击事件不太相符，但是，此事表明那名强奸犯有可能再次回到室内。

大多数强奸犯都被认为是喜欢这种或者那种——室内或者室外环境。这与他们的性幻想机制很有关系，也与他们最初如何开始这些犯罪行为有关系。室内强奸犯经常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名入室行窃者或者偷窥者，而室外强奸也许可以追踪到早期的暴露癖犯罪或者当众手淫行为。如果罪犯又回到室内作案，这就意味着第一次强奸案在追查线索中具备更重要的意义。

同时，我已经起草好了这名强奸犯的心理轮廓描述，并在艾尔山姆警察局召开的、由刑警和穿制服的警官参加的会上宣读了这份描述。皮尔斯介绍我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好奇而不是自动的接受。有些警官相对年轻，职位不高，从来都没有跟心理学家打过交道。

我这么开始："此人年龄超过28岁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处在20到25岁年龄段的可能性却比较大；这名犯罪者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经验才能够获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信心，但是，他的年龄又没有大到以更有控制力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的程度，几次没有成功的强奸行为确证了这种性交经验的不足和不成熟特征；我还知道地点发生了变化，时间一长，人们一般都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太愿意走那么多路，而且经常使用汽车；这名男子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他知道当地的公园、小路和公汽路线。"

"他的智力处在中等偏下的水平，"我说，"他读书不行，某些课程

似乎还必须特别辅导。"这是指他的方法，他没有能力躲避警察。我找不到任何迹象来说明他在攻击的方法上有心理疾患。

"如果有人雇他工作，那一定是不需要太多智力的工作，而且很有可能是体力活。没有理由相信他会从事独自一人的工作，或者为同事所讨厌。"

这次又跟我对他的智力的了解有关系。从证人提供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很明显没有耐心，而这正是某类管理型工作或者有提升机会的职位所需要的最低要求。体力活的可能性更大。我提到他与同事的工作关系，是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推测："啊，他一定是那种鬼头鬼脑独自一人干活的人。"原型和假定可能会是非常有害的东西，我希望警官们应该打开自己的思路。他们在寻找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有可能是智力和感情都不太健康，但是，他也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特别突出的人，就好像圆孔里面打进的一枚方形楔子一样。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有精神疾病，但是，如果有也不一定会显露出来。

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碰到那名男子，碰到这个跟别的工人一起工作或者在别的社会场合显得非常安逸的人，那也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不是系列强奸犯。同样，我说罪犯有可能在工作期间看见一些妇女，不过我并不指望他会与这些妇女建立很深的工作关系。

"他甚至有可能喜欢跟年龄小些的姑娘们呆在一起，因为她们看起来不太有威胁性，也更容易对表面的人际关系留下深刻印象。"我说，这是要解释年轻男子在十八九岁和二十出头本来跟妇女建立关系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困难，但最终却没有能够建立起两性关系。他们需要感觉自己很重要，受人崇敬，因此他们就发现，年轻姑娘会给他们这种崇拜感，因为他们会被成年男性所吸引。正因为如此，13到17岁的姑娘经常发现自己上了二十五六岁的男性的床。

"有很明显的证据证明他有性功能不调，例如，他有勃起不能和早泄的毛病，"我说，"我还认为，他不太有能力维持很好的男女关系，因为他交流能力不强，而且还有可能嗜酒。"

"他是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对于被逮捕或者被人认出来似乎不是很在乎。"我说，但是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有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年轻罪犯倾向于更大胆，不计被人抓住的后果，但是，等他们成熟以后，

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且更加小心。尽管大白天袭击卡茜冒了很大风险，但我感觉到这名男子有可能会随时间的进展而更加小心。

“虽然他从受害人的害怕表情当中得到很大快感，但是，他并不完全符合施虐狂的严格标准。”我说。我知道这是从文献和自己的临床研究工作中得来的结论。这名男子得意于让妇女干他想干的事情，但如果那是他的欲望，则他有可能施加更大的痛苦和更极端的控制行为。但是，反过来，他的暴力在远没有达到施虐水平的时候就停止了。

“同时，他的愤怒是相当大的，他在艾尔山姆警察局外面接近那名女职员的事情如果得到确证，则说明他有可能是在嘲笑警方，并向警方发出挑战，让他们来捉他。”

“他有可能是覆盖整个犯罪地区的某些警官所认识的一个人，也许是因为财产犯罪，包括人室行窃行为。”我说。这就回到第一宗强奸案了。我感觉到刑事调查小组对那个人的处理几乎是当成了局外人，认为那是一次普通的流氓行为，不能跟其他几次强奸案相提并论。但我却不这么看。罪犯进入了陌生人的房子，切断了电话线，孩子们还在楼下玩的时候竟然强奸了一名妇女。他的移动和方法表明他以前曾进入过那间房子。

他对当地情形的了解并不少，而且也不是一时一刻的。这强烈暗示他在住宅、教育或职业上与这片地区有联系。尽管这些有可能还是目前存在的情形，但我说他有可能在第一次与第二次犯罪行为发生之间搬走了。

跟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凶手一样，我推测这名强奸犯曾在幻想当中实施过这些攻击行为，远在他将这些幻想拿到现实世界里来实践之前就在脑海里演练过。这又回到了我对罪犯进行诊治的临床工作。我从他们的历史当中了解到他们如何获取性满足，他们只需要透过窗户看见妇女脱衣或者做爱就能够得到性满足。这使他们慢慢养成跟踪女性的习惯，偷窃她们的内衣，然后会进入她们的房间。

“此人极有可能有较轻微性犯罪的记录，包括露阴，尤其是窥淫行为，”我说，“从这个方面看，你们也许希望注意一下在有林木的公园玩耍的伴侣的报告，尤其是涉及第一次强奸案发前两到四个月时间段内由室内妇女在白天或者晚上发出的偷窥报告。从晾衣绳上偷

内衣的图案也许也有指示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宣读心理轮廓描述报告期间,室内还没有任何一名警告提出反馈。一般来说,我只向特别调查办公室或者几名高级刑警提出报告,但现在满屋子都是人,听众多了,很难知道自己所说的话是否为他们所明白。在我讲到这个人应该如何抓住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更明显了。

"在我看来,他最终会以三种方式之一引起你们的注意,"我这么说,然后列出了那三种方式,"首先,根据公众或地区警官提供的信息。这是因为他将成为一名突出的人物,会成为公众担心的对象,或者作为一名胆大妄为的家伙为大家所讨厌,他的行为使当地人感到不安,因为那些行为带有攻击或者性骚扰性质。"

"其次,在犯罪的时候被抓住。"

"其三,根据记录排查找出疑犯来。他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存在于你们的视线当中。如果你们查查文档,特别是去与地区警官谈谈,他有可能就在那边。你们已经认识他了。"

最后我提醒他们说,他们要找的是一名危险的年轻人,他还会继续攻击别的妇女。"他的暴力程度会升级,这取决于受害人的行为,而且这有可能导致某人死亡。"

"我希望所说的一切能够起一点帮助作用,但我想强调一下所涉及的或然因素,不想误导大家,局限于我以某种方式为大家拿出的这名男子的轮廓描述。"

我问是否还有什么问题,结果看到海洋一般面无表情的脸。我想并非我的所有想法都让他们明白了,也没有人看上去想讨论一下这份心理描述。我回到家里,将手写的注意事项打印出来,并将复制件寄给了约翰·皮尔斯。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了,这也没有让我吃惊。我干过几十件案子,其中许多案子仍然在调查过程当中,我习惯于不再听到结果了。除非警察希望我帮忙设计一个讯问策略,或者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指导,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来找我了。在艾塞斯通行动的例子里,我已经完成了他们希望我做的工作,因此只是简单地假定,不久之后警方会抓住绿链道的强奸犯,并完成对他的起诉。

12 他们只有10岁

从远处看去，利物浦的马什莱因警察局看上去如同荒野中的一座城堡。那里有荒废的工厂，成片的公寓和一排排整齐的灰色住房，低矮粗壮的水泥和玻璃大厦是典型的60年代建筑风格，两侧受到大量的电视摄像机、弧光灯和带有卫星锅的厢式货车的攻击。比萨饼纸盒和塑料咖啡杯塞满了警察局里面的大小房间，这是已经进入第4天的一场长时间折磨留下的残余物。

在一个灰蒙蒙和阴惨惨的早晨，天气非常寒冷，我开车从莱斯特穿过乡村，沿M6号公路向前开，150英里的路程花了近3个小时。我将车停在警察局附近的一条小路边上，看到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像师在那里，心中就在筹划自己的办法。我想，得采用直接进去的办法，因此就低着头朝前挤过去，希望自己不会被人认出来。

在前台，一名中年警员带着一脸烦躁的表情上下打量我，因此旁边已经有记者开始起哄了。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问。

"阿尔伯特·克比警督约我来的。请你告诉他布里顿先生到了。"

"是啊，来干什么？"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当面讨论一下。"我主动说。

"听我说，先生，你注意看看那边，"他指着大群记者说，"人人都想与警督谈点什么事情。"我知道这名警员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他要挡住一些访问者，要评估一些信息，但是，我不准备当众宣布自己的身份。"听我说，真的，请给他打电话。他在等我。"

这名警员半信半疑，然后消失在门后去打电话。一名年轻妇女出现在我的肩头，她的眼睛底下是一圈圈的深纹，还拿着几乎已经空了的塑料咖啡杯。

"您跟这事有何关系吗？"她问。我看见她的肩头扛着一部很大的录音机。

"对不起，您说什么？"

"您跟詹姆斯小孩一事有关系吗?"

"啊,不。我来这里谈谈配餐的事情。"

直到头天晚上,也就是1993年2月16号接到阿尔伯特·克比的电话之前,我只不过略略知道一点4天前利物浦有个小孩被杀的事情。我很少看报,有时候一连好几天没有机会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新闻。这不是我有意要这样做,而是根本没有时间。

警督小心选择自己的用词:"这个小男孩名叫詹姆斯·巴尔格,被人杀害了。两个男孩子将他抱走,也许是两个少年。当然,他们有可能完全是无辜的,但是,他们两个都还没有露面。所发生的事情,保罗,我可不想瞎猜。"

"我能够干什么?"

"我需要一些建议。我们必须找出到底是谁干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必须尽快破案。"他停顿一下子,"这是相当敏感的一件事情,詹姆斯受到伤害的方式令人不可接受,也无法理解。这事已经在当地社区引起公愤,我们这里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公共秩序方面的问题。"

我明白了他话里的话。

"我明天再来。"

"那太好了。"他说,听上去松了一口气。

我们以前见过面,是一年以前在内政部的一次会议期间,当时是进行心理犯罪分析,是由我在莱斯特主持的。级别各异的警官得到邀请,并在会上拿出了不同的案件供讨论之用。克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很高,属于运动型身材,除开警察以外,很难想像他会在别的行业里工作。他有一张年轻的脸,眼角有些皱纹,慢而稳重的步伐,看上去像板球裁判在查看球场。

那位值勤的警员回来了,现在是一脸堆笑。

"耽误你时间不好意思先生,有人马上来接你。"

走道里全都挤满了人,我们一边走的时候克比一边很快地看着送交给他的进展报告。他必须带领全队人马工作,如果他抗不住压力沉不住气,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工作了。

"我们过了极难过的一个夜晚。"他小声说。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一名青少年提来审问,但一群施私刑的暴民想把他家

的臭房子烧掉。我必须从逐户调查的队伍中派出十几名警官去街上防守。这使我们的工作也许耽误了至少24小时。”

我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詹米·巴尔格的命运震动了全国，但是，利物浦一向就是全国最容易动感情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人已经把沮丧变成了愤怒和恶意——那是社区精神当中最不好的一面。一开始，人们的敌意找不到方向，但我根据经验知道，它最终一定会集中在警察身上，因为人们有权利要求知道：“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杀人凶手？你们是要保护我们的，你们干什么去了？”

利物浦一度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但是，它作为商业和工业中心的伟大时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过去了，现在只留下大批的空闲仓库、废弃的工厂和再也不用的铁轨。找到詹米的那个地方就是沃尔顿，曾在利物浦于上世纪末向外扩展的时候被吞并了，那个地区最典型的东西就是一些平坦的台地和狭窄的、曾经铺有石子的街道。失业率一直很高，工作一般是临时的，但是，当地人都有很强烈的自豪感和团结精神，这在足球比赛的看台和当地的酒吧里可以看出来。

克比的办公室离事件室不远，里面的温度调得太高了，他指着最大的一把椅子让我座下，并让我认识了他的两个同事。其中一位也许是此办公室人员，办公室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荣誉状，这些荣誉状都是他可从培训学校升到高级职位期间所获得的。

“是啊，我们从哪里开始？”警督问。

“从开始讲起。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情总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刑事调查进展到这个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极准确地说出关于时间、事件和顺序的精确细节，根本不去看笔记或图表，一切都是直接从脑海里冒出来的。

我开始记笔记。詹米·巴尔格只有两岁半，1993年2月12号星期五，在布托尔的斯特兰德购物区失踪。他当时穿诺迪牌T恤，海军式的夹克，里面有芥菜色的衬衣，有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下身穿银色竞赛服，脚下穿着白色的袜子和运动鞋。

克比递给我一张照片。詹米有一头金发，他那张可爱的脸在我看来会激起我们这个文化中的任何人的保护之情的。他的额头相对较大，大大的双眼彼此隔得很开，绝对能够唤起任何人的爱怜之心。

他的母亲丹尼丝·巴尔格下午3点38分在肉贩A.R.迪姆斯那里帮人卖肉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孩子不见了。3分钟后,头顶上的保安摄像机拍下了他在楼上跟附近的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在一起。再过3分钟后,他在马丁报摊旁边的空地里,这时他的手牵着其中一个大男孩的手。下午3点43分,有人看见他们离开通往斯坦雷大道的出口。

克比往录像机里塞进一盘录像带。屏幕闪动几下,然后出现了颗粒很大而且有时间标识的图像。摄像机的角度很高,没有焦点,但还是能够轻易地看出在拱廊里走动的购物者。有母亲推着婴儿车,有退休的老人在药店外面拉家常,还有一个孤独的园艺师在整理绿地。

在屏幕的右下角,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站在年龄稍大一点的男孩子旁边。再往前几码的地方是一个少年,他转身示意让他们往前走。让人着急的是,屏幕不是很清晰,连带詹米往前走的那几个男孩子的脸或者年龄也看不出来,而且我连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猜不出来。从表面上看,他们有可能是两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子带着一个小弟弟散步玩而已。

克比倒带:"此带子之前的约一个小时,有两个身份不明的男孩子曾想骗走这个购物中心的另一位母亲的孩子。有人作证,还有一些描述。我们还找到几个声称当天下午看见带着詹米的那两个男孩子的证人。我们觉得已经确定了他们行走的路线。"

"星期天下午找到了詹米,是在沃尔顿樱桃巷附近的路基上找到的,那是从艾基山到布托尔的一条铁路线。火车将他的身体压成两半,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经死亡。"

"他受了什么样的伤?"

克比将一只信封从桌上递过来:"这些照片你不一定喜欢看。"

照片贴在A4幅面的条纹自贴纸上,每页都有10多个图片。我用一把放大镜仔细研究这些图片。第一张是普通的外景镜头,看上去像是一条废弃不用的铁路,只有两排铁轨。枕木都埋在碎石里,铁轨的一侧看上去像是大桥或者站台的残余物。另外一侧显示很陡的一个草坡。有很茂盛的灌木和矮树丛,看上去是相对秘密的一个地方。

我注意到破砖块上有血迹，还有一张照片显示一只白色软面运动鞋。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都按被发现的顺序拍下来了，包括在铁路桥较远的一侧找到的一罐造型漆。然后，我看到一个孩子的半截尸体在铁路之间。头和上半身头朝下摆着，包在带兜帽的夹克里。一张近距离照片显示几块破砖在他的头附近，他的左眼上还有一些蓝色的油漆。沿铁轨再下去几码的地方是另外一半。初一看去，那就好像是画家的塑料模特儿，我花了一阵子时间才明白过来，那是詹米裸露的下半身。

脱下来的衣服都扔在上半身附近的地方。他的蓝条纹白袜子上面沾有少许血迹。竞赛服的底部也是一样。内裤发现藏在一块砖下面，那上面的血渍比较多。他的白色围巾在离开尸体较远的地方发现，还发现附近有几只中号电池。围巾附近的枕木和道碴有血渍。

克比站在窗边看着转亮的天色，他不想再去看那些照片。跟他的很多组员一样，他也是位父亲，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默西赛德郡，因此很能理解邻里心中的悲痛。

根据尸检报告，詹米死得很快，但也死得极难受。他头上有22处伤痕，身体上也有20处。他的头骨有厚重钝器连续打击造成的骨折。在攻击期间的某个时候，电池和油漆罐似乎与他的尸体接触过。

"保罗，有好些事情我需要知道，"克比说，"一些孩子能够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两个孩子带走了詹米，然后交给了一名成人，或者扔在附近之后被一名成人发现？"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提出下一个问题。

"另外，如果你能够讲讲对此负责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不胜感谢。"我还在翻那些照片，对任何不小心碰到那个现场，并且发现詹米尸体的人我都抱以最大的同情心。那样的记忆将伴随他们一生。

"我想看看事发现场，"我说，"如果你不在意，我想顺着詹米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斯特兰德购物中心是一座乏味的水泥建筑，四周围着铁路线和公寓。1968年开业的时候，它的名称是"新斯特兰德购物中心"，那是新近从美国舶来的大型购物中心概念的一个模式。虽然在80年代末期予以重建，目的是要将内部弄得亮堂一些，再加上一些雕塑品

和蕨类植物，但是，这个地方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吸引人的地方，特别是因为5天以前发生的那个事件。从现在起，它永远成了詹米·巴尔格被人牵走的地方，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母亲的地方。

在大门的入口处摆着一些鲜花和相互搂抱的玩具，附近还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着："看见过下面这些孩子吗?"上面还有四张彩色照片，其中一张是詹米穿着他的英雄T恤衫、嘴边还淌着冰淇淋的照片。其他一些照片是从录像带上翻拍下来的，显示詹米被人领走，还有那两个少年放大的面部照片，但仍然看不太清楚。

在肉摊外面，我开始把录像带里的那些带颗粒的图像与现实世界里的板凳、花坛里面的蕨类植物以及儿童专用道联系起来。星期五的下午这里一定是非常忙碌的一个地方，人们都来这里购买周末用的货物。在114间店铺里，最大的3家是伍尔沃斯、T.J.休斯和马克斯及斯宾塞。还有一些折扣店——那是经济困难时期的一个标记。

偷窃一直是这里的商贩们面对的一个大问题，1989年对这里进行重新装修的时候加强了保安措施。总共装了16台保安摄像机，全部对准走道和拱廊，每台摄像机都是每两秒钟摄下一张图片。另外，还从私人保安公司请来了穿制服的保安人员。

在A.R.迪姆斯肉摊上，照得非常明亮的窗户上装饰着每日特价的标志。詹米最后一次被看见的时候是在门道上吃一块斯马迪糖，这时候，他母亲正在钱包里翻找钱币准备付帐给肉摊老板。在这样一个地方绑架孩子是冒了相当大风险的——丹尼丝在任何一刻都有可能转身并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从大厅里走过去，通过"持家之母"店，然后朝马克斯及斯宾塞走去，我到达了摄像机第一次拍到詹米和两个孩子的照片的地方。他们极有可能经过马克斯及斯宾塞店离开这栋大楼，然后跨过斯坦雷路朝通往利兹至利物浦的运河走去。五天以前，有证人报告看见詹米站在这条运河的曳船道上哭，因此蛙人已经搜查过这条运河。这名证人当时以为，那条路下边的三四个男孩子带着詹米。

回到斯坦雷路以后，我转身向帕克大街走去，通过一家耶和华见证会的过道，最终来到繁忙的默顿路。再往前走约半英里，在一个转盘处，陪同我的警察就在叉道上朝左开去，通过阿麦克建筑公司的办

公室到达牛津路。就是在这里，也就是星期一的早晨，一位看管人听说了詹米的事情之后再次看了对准停车场的那台监视摄影机里面的带子。他从星期五下午开始看起，一直看到有两个小男孩牵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的手行走的粗颗粒图像为止，他还发现那两个男孩子一边走一边挽着中间的小孩子的样子。带子上的时间指示为下午4点03分。

这次，这些图像又太差了，很难辨认出任何人来，但是，录像带里拍下来的砖墙却让人可以猜出那两个孩子可能的身高。此时可以第一次判断，那两个孩子还不到青少年期。

再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标处，那是一片凸起来的地方，很像一块扫平的金字塔，有好几块足球场那么大。

"以前这里是一个填起来的水库。"一名刑警解释说。

"有没有证人——"我的话没有说完。

"有，是一个退休老人，她正在外面遛狗。那两个男孩子拉着詹米往上爬坡，他跌了几跤，头两边都还擦出伤口来了，因此大哭起来。她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就说詹米摔了一跤，而且迷了路。她主动要求照看他，但他们说正要将他带到警察局去。"

顺着大石头铺成的石级爬到水库顶部，我看了看四周青草茂盛的平地，上面满是破瓶子和狗粪。另一名证人看到那两个孩子跟詹米一起坐在石级上，詹米坐在中间。后来，她看到他们站在远处的路基上，朝下看着底下的一排房子。

离开水库之后，我们顺着布里茨希尔路走到立交桥，然后转头朝康迪路走，沿路都是背对背的一排房子，有些房子保持得不错，有些房子挂着破旧的网眼帘，还有一些肮脏的窗户。在一家花店里，一名妇女说曾在下午4点30分看到过詹米。她也曾问过那个小孩子，当时他看上去十分疲倦，精神不太好。其中一个男孩子说他们是在斯特兰德购物中心发现他的，正准备将他送到沃尔顿胡同警察局去。

那名妇女一直看着他们安全跨过公路，以防他们出什么交通事故，然后他们沿着康迪路往前走，直到消失在视线里。几分钟后，他们又折回来，然后向右转，朝教会西路走去，再进入城市路，并在那里跨过了一座铁路桥。在几码远的地方，一条人行道出现在公路上。这条路顺着铁路线往前延伸，前面是一排高低交错的房子。我看看

手表。那已经花去了40分钟。拖着一个疲倦和害怕的小孩子走路，那两个男孩子肯定需要至少两个小时。

那条小路类似很多从大城市的垃圾场退出的小路。那样的小路看上去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要通往什么地方。没有路标，既不清洁也不是很脏，但是，经常会有很多人从那里经过。各种各样的材料筑成的篱笆、铁链、石头和木桩与铁路线隔开。

"孩子怎么会到那个地方?"我自言自语起来。

"我们认为是从这里扔到那边去的。"他说，指那条路线。

我在衡量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在一条公用小路上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剥去詹米的衣服？这让人想不通。儿童与成人对于同一片地区有非常不同的记路法。成人以特别的某些街道名记地方，而儿童是以穿篱笆过小路和抄近路来记忆路线的。

"不是从这里。"我小声说。

"您说什么?"

"还记得刚才经过的那个篱笆上的小洞吗?"

"那个洞太小了。"一名刑警说。

"对孩子就不小。他们就是这样把詹米弄到铁轨上去的。兜帽是从底下翻过去的。"

我走到了这条小路的尽头，抬头看看，一眼看到沃尔顿希尔警察局。如果那真的是他们的目标的话，这就是他们能够将詹米弄到的最近的地方了。

在犯罪现场的四周围着黄黑相间的警察封锁带，一堵低矮的石墙旁边放着一些鲜花。十多名当地居民到这里来过，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知道自己应该来一下。

我沿着铁路线在碎石路上走过的时候，法医还在忙着工作。铁路一边是一排房子，另外一边是当地人的墓地——那是当地儿童的游乐场，孩子们都拿铁路当近路走。墓石有很多都损坏了，软饮料罐扔在坟地之间的草径上。

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警察局。可笑的是，警察局的小卖部正对着这个地方，不过，后来的搜查期间砍掉了一些树枝和矮树丛，否则，当时的视线一定是挡住的。我默默地开始将四周的环境与犯罪现场的图片联系起来。铁路线是灰色的，因为多年的使用而破旧不堪，但当

日一定派过大用场。这个地方单调简陋，看起来让人悲伤，让我想到了通往奥斯维辛的最后一段路程的新闻记录片。虽然大屠杀的恐怖与我们能够想像起来的差不多任何东西都不太有可比性，但是，对于詹米来说，这是同样可怕的一个地方。

在铁轨的两边，碎石墙指向一个古老的站台，或者是一座桥的石墩。后来我听说，这些东西是一个名叫沃尔顿胡同大桥的火车站的一部分，在二战期间，由海路到达英国的美国军人就是从这条铁路线上运输的。

刑警指出小油漆罐和几件衣服被发现的地方。我在想詹米到底是在哪里被剥掉衣服的，他在尖硬如花岗石一样的碎石路上走了多远？在一个地方，也就是最后攻击发生的地方，砖和石上的血迹最多。

身体的下半截是在铁轨与最靠近警察局的路基之间的地方找到的；上半身在更靠近艾基山的路基上找到，就在同一排铁轨之间。火车明显带着极大的冲击力撞倒詹米——谢天谢地他当时已经死亡——但是，我从那些照片看不出他的尸体被移动的距离，只有数枕木的根数——总共七根——我才准确地判断出到底有多远。

我们的车往回向警察局开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了。路上的行人很多，都竖起衣领来遮挡严寒，我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在想最后一次看到几个小孩子在路上行走的人。虽然他们对最后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够负责任，但是，我知道在他们余下的一生中都无法逃避这样一个感觉："早知道……"有些人会在晚上睡不着觉，以后看到任何一个儿童都会想起这样一个小孩子，他在那里大哭，怕得要死，最后还是被人夺走了性命。

到了警察局后，我将照片、尸检报告、证言和地图全都铺在办公桌上。一般来说，我会将它们带回家去花几天时间回顾细节，但这次时间太紧迫。要求拿出结果的压力非常之大，国内国际对此案侦破都施加了很大压力，社区的愤怒也越来越严重了。尽管打了数千通电话——有时候一小时达 200 通——尽管进行了逐户调查，尽管贴了很多海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在电视上反复播放了录像带，但是，杀死詹米的凶手的身份还是不知道。我呷一口咖啡，向自己提出 4 个问题——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干下的？谁是凶手？是

什么动机让杀人者去杀人的？

只有当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后，我才能够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谁对此负责？

我朝后靠着，闭上了双眼，然后想像那个忙碌的星期五下午发生在斯特兰德购物中心的情景。有两个应该上学的男孩子，但他们没有上学。他们并不只是一般的熟人。他们之间有一个契约，一种感情，可以彼此探索事物，共享秘密。它有一种特别友谊的成分在里面，他们对彼此都有一种期望，并且争先恐后地赢得对方的尊敬。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从他们轻松地获得詹米并带着他走到自己的末日的方式中看出来。

同时，在斯特兰德购物中心别的地方，丹尼丝·巴尔格正在完成她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任务——为丈夫雷和她的小儿子买东西。这是普通的一天，詹米一般来说非常高兴，是那种很好玩的小孩子，对他来说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一个游乐场，每一个新景观、声音或者气味都在继续他的认知和发育过程。跟大多数小孩子一样，他的好奇性和探索欲是非常巨大的。

对詹米来说，有屋顶的购物中心跟很大的一栋房子有一样的特色。外面很冷，但购物中心里面却很舒服，它建起来的时候就是让人感到舒服和吸引人的。窗户上的标志、明亮的灯光和绿色植物在他眼里看来都是愉快的，它们的设计也是用来使人感到舒服的。

詹米这样岁数的儿童一般都很小心不会离开父母太远，除非他们觉得安全。哪怕他们扩大了自己的探索范围，哪怕多走出几步，他们一般也会回头看看，以便跟父母保持某种联系，一般是在视线之内。如果他们遇到某种他们觉得可怕的东西，就会很快退回去，但如果看起来那些东西并不可怕，他们会继续走得更远一点点，慢慢地建立起一些自信心。

有某件东西吸引了詹米的注意力，因此他慢腾腾地走过去瞧瞧。他知道他的母亲在哪里，因此感到很安全。一旦走出商店，他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景色，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那是想像中的游乐场上无穷尽的机会。

因此我们有两条可能的路线——两个也许不到少年期的小男孩，还有小詹米·巴尔格和他的母亲。这天开始的时候，他们彼此根

本不搭界,但彼此都在不断地向对方无可挽回地靠拢,直到最后永远也无法分离。

对于这两个男孩子我知道些什么? 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这天很早就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想了半天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在某个时候,这样的想法就变成了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成了一项使命。虽然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计划图像,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大致的轮廓。

也许一切都是从一句无意间说出的话开始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不带走一个小孩子?”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哄来一个小孩子,然后带走他。”

“那是啊。”

然后他们彼此鼓气。

“如果有人说我们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有人看见的。”

“可要是万一有人看见了怎么办?”

“那他们也不过以为我们是在闹着玩。”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对话慢慢演变,最后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共同的意图。要让这两个孩子产生到了这一步的想法,他们的背景一定是充满了混乱和不快的,有的是父母离异、兄弟中有犯罪的、父母当中有一个有暴力行为或者虐待行为,或者是单亲家庭,不太容易在家庭生活当中建立起情感空间,无法集中精力考虑养孩子的事情。这些因素在我们的诊室里接二连三地出现,很多有情感障碍的儿童都有这样的家史。

两个受了损害的男孩子在这个案子里碰到一起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能够与彼此产生联系。我倒料想两个孩子都曾受到别人的欺侮,在家里和学校都是一样。同样,有些学生逃学也是因为孩子的家庭问题引起的,还有他们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或者无法遵守学校纪律的原因。他们在购物中心闲逛时,这两个孩子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现在就干吧。”

“那里有一个。”

“不,他跟他妈妈在一起。”

"那我们上楼去吧。"

"好吧。"

他们不会有能力对现场进行详细的犯罪分析，但是，如果事情有问题，他们能够感觉到，然后慢慢等待时机。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孩子。

"喂，小孩子，你想不想玩？你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来吧。"

小孩子就朝他们走几步。

所幸，在当时，那位母亲转了身，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她看到了，但并没有辨认。如果一位30岁的男人在那里逗他的孩子走，那就是不同的一个故事了，但是，这里只是几个小孩子，他们对着她咧嘴大笑。

"跟他逗着玩的。"他们说。

他们差不多就被抓住了，但是，他们并不害怕。没有人知道或者预料到他们在安排一次杀人活动。他们只是在附近闹着玩，仅此而已。他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笑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母亲一点都没有察觉他们真正的意图。

在这个阶段，害怕会阻止许多人，但是，这并不是这些孩子随便闹着玩的一件事。他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对付成人的办法，因此可以向成人的世界挑战，并且不接受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同样，他们两个人都不希望让对方瞧不起自己。

在A.R.迪姆斯肉摊外面，他们找到了完美的受害人，那就是詹米·巴尔格。

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也正好是最容易管束和控制的年龄，而且还容易带着到处走动。

如果詹米再大几岁，绑架他的人风险就大得多。但是，在两岁半的年龄，他还不怎么会说话，也没有寻找路人帮忙的社会经验。后来，当人们挡住他们并问他为什么哭的时候，他们问的是两个绑架者而不是直接跟这个小孩子说话。同样，如果性格再发育一阵子，语言也再多一些，詹米就有可能跟那两个男孩子说话，他们就有可能发现自己在对付的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无生命的东西。这有可能使他们觉得很难杀死他

这两个男孩子仅只觉得詹米是某人的孩子，但他们也明白自己

是在与这个社会最严重的禁忌挑战。他们不一定能够说出来,因为他们毕竟只有那么一点年龄,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投放在孩子身上的价值观。

实际接近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刻。他们的心在狂跳,肾上腺素大幅升高。这正是他们喜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非常之快,根本没有暴力行为。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购物中心里有两个世界。在成人世界里,如果一个男人带走一个孩子,或者猛力拉走一位妇女,则人们会产生反应,但是,詹米的绑架发生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它并没有引起可能的数十名证人的注意,因为男孩子们一般不会把刚刚学步的孩子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弄走。

我们不知道他们对詹米说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说。也许他们只是伸出一只手,他也伸起手来抓住,因为他习惯于接受爱与善待。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死定了,因为那两个孩子后来证明他们坚决不肯松手。

他们带着他走出购物中心,一点也没有显出惊慌或者担心的样子。彻底控制住一个小孩子的激动心情以及想让这个孩子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能力远远胜过了同情心或者对于铸成大错的警醒。他们的担忧只会使兴奋的程度更高,而且他们知道,哪怕被人捉住了,他们也可以说,是詹米自己跟着他们走的。

到了外面,他们带着这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穿过斯坦雷路,然后向南到了运河的曳船道。他们想带他去一个能够控制他而又没有人干扰的地方,但是,又没有找到一个具体的方案。他们在这期间一直在谈话。

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运河旁边,詹米因为跌倒或者挨打而开始流血。突然间,事情不太对头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一直是个"关爱"之地,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这些小孩子结果成了一个威胁。他的妈妈在哪里,他找不到她了。他小声地说着,然后就哭起来。现在他更难控制了,两个小孩子现在只好连说带哄外加威胁地来控制他。

"闭嘴,不然打死你!"一个说。

"是啊,要么闭嘴,要么找死。"

其中一个有可能推搡他一把,另一个有可能照做。

哪怕受了伤而且还担惊受怕,詹米还是有可能继续跟着他们走,

因为他们是他在那个新环境里惟一认识的两个人。如果他们伤害他太多,或者只是让他太害怕了,那他就有可能停下来不走或者大声嚎哭,因为一般来说这会将他的母亲召来。或者如果那两个男孩子走迷了路,将他丢在后面一点点的地方,又假如一个路人走到他身边,也许这段距离就使詹米与他们分开,并使他落入别人的怀抱。但是,他们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一直靠在很近的地方,因为詹米是他们的战利品,他们不会将他交出去。

这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数名证人看到詹米很疲倦的样子,而且边走边哭,但是,他好像是跟在两个孩子身后,而且没有挣扎。这会告诉路人什么信息?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景——较大的孩子必须照顾较小的孩子,但又觉得这小弟弟是个麻烦。

他们每次遇到一个成人的时候,都会提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故事来满足他们的关心,比如询问到最近的警察局的路怎么走,或者跟詹米谈话,显得跟詹米很熟的样子。他们并不着急,看上去非常轻松,因为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地区。也许他们在等待天黑,或者只是在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最后,他们直奔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地方——一条离公路很远,也远离成人世界的铁路线。詹米现在到了他们的世界。

走下路基之后,再也没有必要对詹米温柔或者哄骗的必要了。他们扯下他的帽子,扔到了树丛里。他们彼此怂恿,开始干起他们谈到的事情了。对詹米的攻击不是要满足一个人内心的幻想,他们不指望从詹米的反应当中获得什么东西,他们只是要显示两个人联合起来有什么样的力量。

他们开始折磨他,不时地剥下一些衣服,使詹米感到浑身疼痛。詹米开始生气了,他们就开始大笑起来,并满足自己的控制感。他们观察过人类受难的样子,并意识到他们能够产生的力量,举起一只手,这小孩子就会畏缩,打他就可以看到眼泪。你甚至有可能让这个孩子做出一些讨好你的行为来,因为他在希望这样能够阻止你继续打他。

最后,他们来到一段铁轨旁,那个地方看上去就像一个封闭的舞台一样——那里是一个小小的圆形剧场,四周围着树丛和灌木。这是他们的地方,因此肾上腺素上升起来,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因此

他们开始有计划地毒打和伤害詹米了。在某个时候，他们会用一块石头或者砖头砸詹米。更多的是用石头或者砖头扔他，因此这个小孩子的困境就增大了。然后，他就成为更为剧烈的攻击行为的受害人了，因为那两个孩子探索性的暴力开始活动了，这里面涉及直接的身体接触。这里不存在麻痹或者失控的成分，事实上，暴力行为表明他们有明确的意图，还有一种探索感在里面。比如，其中一个孩子抱住詹米的头，另外一个就往他眼睛里面倒油漆。

最后，詹米的痛苦和折磨过去了。他并不是很快死亡的。对那两个男孩子来说，这只有一点泄气的感觉，但他们并不害怕，也没有懊悔的意思。如果是那样，他们就会逃离。反过来，他们还拖着詹米的尸体放到铁轨上，然后才想到要用砖头和碎石将詹米掩盖起来。

六点钟我给妻子玛丽莲打电话，告诉她我会回家很晚。

"要我为你留晚餐吗？"她问。

"不。我随便吃点。"

"你没有事吗？"

"没事。很好，稍微有点累而已。"

"你什么时候回家？"她问。

"你看到我的时候。"

一个小时后，我给克比和他的同事们打电话，让他们回到办公室。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共 15 点心理轮廓摘要。

"这是个悲剧，但不是一件复杂的谋杀案，"我说，一边把面前的纸张拉直，"要回答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请继续寻找那些孩子。从尸检报告中看不出特别能够暗示出成人罪犯有意捕捉受害人的痕迹。尸体上没有精液，肛门上的伤口与阴茎或者手指奸污不符。同样，那一带没有听说过有成人罪犯劫掠儿童的案子，附近也没有出现成人作案留下的任何特点。警察局离那里太近了。"

"所有伤痕全都是轻伤。带詹米从购物中心到死亡现场的全都是一连串的小事件。案发现场是大家都知道的儿童玩乐场所，电池和一罐汉布诺尔瓷釉也是儿童用的东西。"

"同样，将詹米的尸体放在铁轨上处置也是天真的欺骗行为。一个成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会用其他方法来掩盖死因。"

克比叹了一口气，点头同意。

接着我讲下一个问题。我告诉他们说，我并不相信詹米是在一场失控的游戏中死掉的。一切都表明事先有所精心打算，而且是有意而为的。

"他们本来就想弄死他？"克比悲伤地问道。

"发生在詹米身上的不是一件意外事件。哪怕最后的手段和致死的工具并不是事先计划好或者一开始就选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意图，那就是要带走一个孩子然后弄死他。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詹米并不是他们当天想要找到的孩子当中的第一个。我们还知道他们带着他走了一条很长而且拐弯抹角的路线，最后才找到他们弄死他的地方。在这一路当中，他们克服了一连串的障碍，非常谨慎、有计划而且是有意为之。他们有很多机会走开，丢下那个孩子不管而又不会对他们自己形成任何风险，但是，他们坚决地带着他，哪怕这里面牵涉到撒谎。从开始到结束，这一路他们都有这个意图在里面。"

克比在他的操作记录本上记笔记："关于这两个孩子您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吗？"

"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孩子一定生活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也许就在视线所及之处，但一定需要走一段路。人们行事是根据自己对周围地形的了解而形成的一套心理地图。这些孩子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知道街道、人行道和小路，那是他们自己的地盘。"

"你们还有可能发现他们的生活背景当中有一些家庭问题，不一定是父母离异，但一定有与不稳定的成长过程有关的家庭变故。这是展现反社会型与暴力型倾向的儿童典型的特征。"

克比问："他们会不会有前科？"

"不一定，"我提醒说，"没有理由期待他们以前有定罪或者在法庭上露过面。他们以前可能有过一些不适当行为，但那不一定会引起警方注意。"

"精神疾病或者其他心理病症的明显信号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容易假定这些孩子都有极严重的反常行为或者精神疾病，而且会是精神卫生服务站或者至少是当地人了解的。但是，你们考虑一下他们如何轻易地对付了路上遇到的所有那些成人。他们有信心，而且有推理能力，轻易就化解了路人的疑心，而且还编造出了极有道理的

故事。"

"这也表明他们一定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而且还是极老练的骗子。"

"很明显，这两个孩子星期五都没有上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是长期逃学，但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惊讶，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家庭生活有长期的分裂的话。逃学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极常见，因为这样的孩子无法对付教室里日常的活动和教师的权威。"

"这两个男孩都有可能与父母分居，而且接受了一套不同的价值观。有非常强有力的街头文化影响会吸引一些孩子的注意力，这些少年形成了彼此依靠的一套办法，并且共有一些幻想和实施幻想的习惯。他们与其他孩子分享的那些价值观对他们的生活规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家庭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

"就跟匪徒行为一样。"其中一名警官说。

"可以这么说，但这次不一定是个匪帮行为。它比匪帮的行为松散得多。那个地区一定有很多小团体，它们有时候团结起来，有时候彼此竞争。他们也许有不同的风险和规则，但是，将有一套压倒性的价值观是他们所有人都遵守的，这套价值观不包括甚至排除他们家庭那个'现实'世界的价值观。"

"他们会对别的人讲起杀人事件吗?"克比充满希望地问。

"肯定不会对他们家里人讲。他们的父母不会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卷进如此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一开始，那两个孩子会对当地的议论和当地人的态度保持极大兴趣。他们想知道人们怎么想、想看看人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或者是可怕的行为。"

"这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会产生不安感，还有激动和焦虑不安的证据，有可能会出现夜惊。导致杀死詹米的控制感和肾上腺素上升会很快消失，当肾上腺素水平退潮以后，他们会开始问：'我到底干下了什么样的事情?'詹米并不是一声不吭就死掉的，他也不是一点血没有流就死掉的。这些孩子会保持鲜明的回忆，知道实际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一切都不是电视里面所表演的样子——血会留下印迹，一个孩子的尖叫声不能够像音量开关一样调小一点。另外，他们现在是各走各的路，不再有对方可以依靠了。他们现在会发现自己并不能够完全忘记那件事，而且自身也会受到心灵的创伤。他们会

非常害怕，担心被人发现了。他们会担心对方会说出来。虽然他们结成了对子，但他们现在突然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联盟，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因此还不能够彼此依靠。"

克比问："我猜想其中一个还是个头吧？"

"也许吧，"我说，"但这在杀人当中并不是很有意义。在整个过程当中，其中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可能在当天找到无数的机会离开另外一个逃回家去。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他们肯定知道这是不良行为？"

"是的。他们撒了谎，而且还欺骗别人以保护自己。他们将詹米拖上铁轨以便造成假象，好像是火车将他轧死的。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在楼外，挤成一团的记者已经少多了。有些人躲进了汽车以回避严寒，他们不时擦一下汽车玻璃以便看到警察局的大门。我悄悄走了出去，避免跟人产生眼光接触，而且看到自己的车还好好的，因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回家的路似乎很长。尽管空调打开了，我还是感到很冷。我知道即将会到来的空虚感终于到来了。每次重构一个受害人的恐怖场景，每次设想一个罪犯在参与犯罪行为时那邪恶的狂喜之后，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空虚感。

我在 M6 号公路上的一处加油站停了一会儿买了一杯咖啡，那个加油站就在斯托克奥特伦特郊外。其他的几个人也是中断行程来这里小歇一会的，但他们看上去一身轻松，在那里默默地享受生活。我真是羡慕他们。我还在想着丹尼丝·巴尔格，还有詹米从她身边溜走时她生活的恐怖情景，而这样的情景已经一辈子也无法从她脑海里消除了。

天已经很晚了，村镇的灯光时隐时现，此时我才开进车库。楼道上的灯亮了，玛丽莲一直没有睡，她还在等我回来。她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心里老是惦记着路上的冰。我并没有跟她讲白天所做的很多事情，她心肠很好，并没有多问。她比我更仔细地跟踪每天关于"詹米宝贝"的新闻报道。跟其他的任何母亲一样，她对事情如此轻巧地发生而深感震惊。她还记得我们自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她转头刚刚一秒钟，回头就发现孩子们不见了。就因为那

短短的一下子，所有母亲都体验到了一种焦虑和恐惧感，那会使她们的脉搏狂跳起来。

"有什么要紧事吗？"她睡意朦胧地问道。

"没有。"

"今天晚上电视上又播了。那可怜的母亲……想像一下她心里多么难受啊。"

我已经在一张安乐椅上靠下了。

"你准备睡觉吗？"她问。

"一会儿吧。我还听得到路上的声音。"

我已经睡着了，此时，两队刑警天亮不久就在沼泽胡同警察局集合起来，克比跟他们大致讲了一下情况。他们掌握了两个男孩子的名字和住址：罗伯特·汤普逊和卓恩·凡纳波斯，两个人都是10岁半。汤普逊住在离樱桃胡同路基仅200码的地方。

根据我的建议，警方重新调整他们的调查重点，使其更靠近事发现场，然后找到一位妇女，这名妇女觉得他从录像带的图片中认出了汤普逊。去那两个孩子的学校仔细问询后发现，上个星期天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

因为在柯克戴尔逮捕一名12岁的孩子曾引起轰动，所以这次行动采取高度保密和不事夸张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原因除开避免群众聚众闹事以外，克比还希望确保公众继续打来电话。当有疑犯被抓时，潜在的证人都假定自己的信息不再有用了，有些极重要的线索就会断掉。

他还清楚，当天晚上，英国警视台会在BBC1台晚9点的节目当中播放詹米·巴尔格最后的活动情况的重构图。从购物中心的保安摄像机上截取下来的照片经过国防部专家的修补后也会向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重新播放。

上午7点30分，警察在沃尔顿一栋房子前敲门，另外一栋是在诺里斯格林。警探大卫·坦纳是负责逮捕的警官之一，他事后说："当他（卓恩·凡纳波斯）穿着睡衣下楼来的时候，我心里想一定是搞错了。他只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给带到了不同的两个警察局，他们的家也被搜查了，还将衣服拿去进行法医分析。跟数百万其他的人一样，我当天晚上也

看了英国警视台的节目，专程为此节目飞往伦敦的克比数处提到了心理学轮廓描述。

同时，沼泽胡同警察局还专设了25条电话线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倾泻而来的电话提到了43个名字和一位重要的新证人。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得知有人被逮捕的消息。我当时在沃威克郡的警察总部，那是看上去相当威风的一处乡村建筑，就在利克沃顿村的郊外。当时我在那里主持一项长期的研究项目，旨在辨别和分析在调查谈话中做得更好的一些警官的特色，希望这些问话技巧能够教授给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因为30年前，我的一部分警员培训就是在这里开始的，我还记得在野外进行的拉练，那个拉练场现在变成了一处高尔夫球场。阿尔伯特·克比打电话过来，口气听上去很轻松："我们已经关押了两个男孩子。他们的一些衣服上有蓝色油漆，也许还有血渍，但这些当时并不太重要。"

"他们承认什么事情没有？"我问。

"没有。这也正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他们才只有10岁。他们年龄太小了，很难相信是他们干下的事情。你明白这个情形的，我们得确保他们知道并完全理解他们所说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对杀死詹米负责，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的任何一名警官都还没有跟这样小的儿童进行过调查问话。这是全新的一场球赛，我们一点错误都犯不得。"

"我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我说，克比也同意。他希望得到一些建议，看看他们能够得到些什么。

"好吧，但我需要有关他们的背景和环境的一切可能的细节……"

"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在你的心理轮廓描述当中了。他们都是一样大的年龄，生于1982年，彼此相隔12天。罗伯特·汤普逊住在离现场200码远的地方，是一个单亲家庭当中的7个孩子之一。父亲多年以前就搬走了，他显然一天到晚在街上晃，根本就得不到父母管教。当地情报记录并没有他的劣迹，但是，他有个哥哥曾犯有轻微罪行。"

"卓恩·凡纳波斯也有家庭问题，过去3年曾接受过社会工作者的监督。他的父母离异了，他在学校有问题，因为他抱怨说学校有人

欺负他。"

"这两个男孩是朋友，生活在彼此很近的地方。两个人在上个星期五都没有上学，而且一贯逃学。因为学校成绩差，他们两个都留了一级。"

"有人跟他们谈过话吗？"

"只是随便说了些话，目的是想建立友好关系。"

"他们表现如何？"

"很害怕。"

"那好。我会打电话给你。"

时间紧迫。从他们被逮捕的那个时候算起，汤普逊和凡纳波斯最多只能够关押36小时。同时，他们的家人已经转移到了安全住所。

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生活在利明顿温泉区，我们生活在离一处废弃不用的粘土开采场很近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掩蔽处和缝隙可以探索。有时候，我放学后会在那里玩耍一阵子，周末也有去那里玩的时候。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好像是青蛙骨头的东西。我走得近了一些，发现它们是被人用小木棍叉在地上的。

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后来我看到稍大一些的孩子们，大概是9到13岁之间的样子，他们会抓住青蛙，用叉子将他们叉住，然后看着它慢慢死掉。有时候，他们还会打断一条青蛙的腿，然后让它很快地跳，再轮流用铅笔刀甩着刺它。他们好像极喜欢这么玩，就好像这样玩青蛙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刺激一样，他们伤害别人也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快乐。

他们知道那么做是错误的，正如他们知道偷东西是干坏事一样，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会产生极大的快感，因此他们会毫无顾忌地继续做下去。同样这批孩子会回到家里，喝完茶后上床睡觉。他们兴许不是什么天使，但也不是特别坏的孩子。他们凑到一起就会开始玩抓青蛙和杀死青蛙的游戏。

发生在詹米·巴尔格身上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事情，只不过放大了规模而已。这样一种俗套和陈腐的解释会使人们感到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两个杀人犯跟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有一条小路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走到那里去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无法抗拒的力量面前毫无办法。他们选择了自己所干的事情。我坐在沃威克郡警察总部楼上的办公室里，开始构思与这两个小男孩的调查问询策略。但是，如果提问者想发现发生在詹米身上的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两个孩子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故，致使他们需要绑架一个不认识的孩子，更不用说要杀掉一个孩子。

许多人都很难接受一个孩子能够犯下严重罪行的说法，因此，结果是他们都想相信詹米之死是一种过错，或者是一种无意的行为，因为另外的一种可能太难以想像了，太可怕了。我们都认为儿童时代是天真的人生，有纯洁的心灵，我们都需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形象。

可是，我从自己的临床工作当中得知，儿童是能够做出惊人的事情来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时，如果我们说他们是天生的一伙恶徒时，心里会好受一些。原发性精神病患者的确存在，但这种人很少，他们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谈起话来跟正常人一样，但有一些东西是极其不同的。他们出生的时候身体有缺陷，他们无法产生同情感，无法共享其他人类的感情，也无法感觉到内疚和懊悔，也没有真正的焦虑感。

根据我对绑架詹米的人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也清楚，他们的杀人决定决非空穴来风——那是从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成长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结果。儿童跟成人一样有很宽广的气质范围、能力和倾向。其中很多人不会无故或者虐待性地伤害别人或别的东西，但有一些人会从欺侮同学或者折磨动物及其他东西中得到额外的快感，另外一些人只是跟着看热闹，被动地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

哪怕你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所有孩子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残忍的人，但所出现的问题不是什么东西令事情如此发生，而是说什么东西阻止他们不那么做。我们再次回到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些东西都来自父母和社区。道德理解力是一种慢慢形成的东西。

看来从欺侮同学或者折磨动物到实际杀死另一个人类之间仍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跃。但是，这样一次跳跃并不一定超过例如一群美国士兵从开始推搡一群越南平民到突然间屠杀整整一个村庄的农民更大的跳跃。这是一些人聚成一个群体之后产生的力量。

对詹米的绑架者来说，他们有可能谈到干一些冒险和愚蠢的事情，但不一定是非法的事情，比如爬上极高的水塔或者在阳台上吊着，然后向每一个人挑战。或者他们兴许开始谈到在学校打架的某个人。

"如果有人对我干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是啊，我也会。"

"你没有那个胆子。"

"我不会无故发脾气。"

"你一定会吓得要死。"

"到时看看谁在吹牛。"

"不是我。我什么都不怕。"

有如此之多的道路可以通往这样的对话，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惊人之处，这跟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并不需要一个形象生动的录像带或者暴力电视节目才能够展开这样的计划的。

但是，如果你找来不同的一对儿童——其中一个也许来自更优越的家庭背景，更聪明一些，或者在学校成绩更好一些，或者找一个被人看作是一个人因此对别人的价值观也很尊重的人——对话就有可能完全不同了。

"如果有人对我干这样的事情，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我希望你不会。"

"他们不可能干了那样的事情而不负责任。"

"那是啊，但你也跑不了。"

这是不同的一种推理过程，一个不同的人和一个不同的结果。

虽然我在利物浦和阿尔伯特谈到了这些，但是，让他的问讯人员了解这些也是极其重要的。两个小时后，我给他打了电话，然后就通过免提电话跟他讲起来。"我有十多个点子——其中一些都是不证自明的，"我说，"首先你们得明白，哪怕这些孩子有可能杀了人，但是，他们会像常人一样反应，就跟吓坏了的儿童一样。这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他们不再能够控制什么东西了。"

"这一点我相信。"克比说。

"一开始他们会否认一切牵连——正如我在轮廓描述当中所说

的一样，他们是些极会编故事的孩子——但最终他们也许会开始说，另外一个孩子才是煽动者，他本来不愿意参与此事的。”

“你们还必须记住，他们会在情绪上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创伤。他们必须阻挡这一切记忆，但很明显，任何问话都会使他们想起当时的情景，会让他们想到所有的细节。在他们讲到所干的一切事情时，这会引起他们更大的心灵创伤。”

“我如何能够回避？”克比问。

“首先，尽量让每次问话时间短一些，中间多休息一下，让他们吃些小吃，让他们感到舒服。然后慢慢来——一次走一步——让他们来解释发生的一切。你们不能拿他们当成人，一次又一次地问同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他们因为某件事情而特别反感的时候。让那两个孩子讲出他们的故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讲，同时你们慢慢地帮助他们打开回忆，但不要暗示他们一些事情。让他们讲出一些事情来，然后给他们机会再次接触自己讲过的相关的话题，但又不能够让他们反感或者害怕。”

“不要显出敌意或者批评他们——哪怕只是声调或者面部表情都不行。你们必须拿他们当作受害人而不是罪犯来对待。他们必须应付自己做下的事情，那是非常容易让他们受到创伤的事情。他们的心理功能尚无法接受反复不断的问询攻击——那会使他们陷入心理崩溃。”

“同样，你们必须考虑问询小组的事情，因为那些人也有可能处在情感创伤的风险当中。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件罪案，如果这两个可能有罪也有可能无罪的小孩子受到情感毁灭，他们的负担甚至会更沉重一些。他们必须在余下的一生里带着对此事的了解度过每天的生活。”

我们数次演练这个策略，直到克比非常满意而且明白了每一个细节为止。

问讯时我并不在场，也没有人请我去听听问讯磁带。但是，警方和两个小孩子之间的对话在他们于 1993 年 11 月在普里斯顿皇家法院接受谋杀审判时公开了。

勃比即汤普逊在问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懒洋洋地坐在椅子里，有时候弄湿自己的指关节，还用手指在自己的嘴边上划圈。他似乎

对延迟问讯感到很厌烦。沃尔顿胡同警察局的问讯室很小，只有单层强化窗，还有固定在墙上的录音机。

菲尔·罗伯特警官和警员包勃·雅可布两个人都是刑警，他们都坐在靠近勃比的地方，想建立某种亲密关系。如果房间里有人想休息一下子，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问讯就会停下来，录音带也会关掉。有时候，勃比想喝饮料，或者想吃点东西。有时候是他母亲安娜，她在那里心情烦乱地抽泣着，因此想休息一会儿。

他用非常细小无力地声音说话，说星期五下午他的确去了斯特兰德购物中心，但他否认带走了詹米·巴尔格。他描述他和卓恩如何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商店里面行走，后来离开，然后去了图书馆，再后回家去了。

“你见过到詹米没有?”罗伯特问。

“见到过。是早晨。我和卓恩在上电梯。他跟他妈妈在一起，身上穿着蓝色的外衣。”

40分钟后，问讯中断了，此前一直在确定两个孩子那天都干了些什么的细节。

第二次问讯的时候，罗伯特警官说：“我们相信你和卓恩一起带着詹米一起离开了。”

“谁说的?”勃比问。

罗伯特回答说：“我们说的，现在说的。”

“没有。我从来没有带着他离开。”勃比回答说。

罗伯特说：“好吧，那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报纸上说电视显示卓恩牵着他的手。”勃比回答说。

这是第一次承认他们曾跟詹米在一起，但是，勃比坚持说，他们只是跟那个小孩子一起在斯特兰德转了一会儿，然后让他走了。勃比开始哭起来，但没有眼泪：“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他。”

在娄阿莱因警察局，卓恩·凡纳波斯由警官马克·戴尔和警员乔治·斯哥特负责问讯。卓恩说，两个人不上学是勃比的主意，他开始描述那天发生的事情，先在秋千上玩，然后在电梯里玩了一会儿，最后去了当地一个足球场。他根本没有提到去过斯特兰德购物中心。

直到第三次问讯时卓恩才被告知勃比对当天活动的不同描述。

他开始哭起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带走一个小孩子，妈妈……我并没有牵他，我甚至都没有碰过那个小孩子……"他安静地哭着，抬头看看他母亲和父亲，他们就坐在他身旁。苏和尼尔·凡纳波斯鼓励卓恩诚实一些。同时，两名警探开始问勃比，说有人看见他们在布里茨希尔水库边，跟詹米在一起。

"我从来都没有带詹米上那个山坡。我根本都没有上那个山坡。我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那个证人一定是在撒谎。

"你想今晚把这些事情全都说完吗?"安娜·汤普逊问他。

勃比回答说："是啊。"

"那你讲真话。"

"我说的是实话。"

最后，勃比承认自己去过那个水库，詹米在那个地方哭着要妈妈，头上还擦破了一点点。他说他们就将他放在那个地方了。"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是卓恩带走那个孩子的。"

2 月 19 号那天，两个孩子都接受了 3 次问讯。最短的一次才只有 11 分钟。尤其是勃比，他证明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撒谎者，他能够把问话者从他不想谈到的任何话题上牵走。当被逼到死角，问到他是否在斯特兰德购物中心偷了一些电池和油漆时，他最后承认说："卓恩也许偷了那些东西……不过……他有可能把那些东西夹在衣服里了……我从来都没有。那不是我……"

如我所料，他们彼此咬起来。

当天第二次问讯期间，卓恩第一次承认是他从购物中心带走詹米的。"我没有杀他，妈妈。妈妈，我们带他走，然后在运河那边扔下他了，就这样。我没有杀他，妈妈。"

在旁边的人看来，已经很明显，卓恩在隐瞒一些事情。他想说实话，但又不想伤害父母。这种情况向苏珊·凡纳波斯解释了，然后，她与儿子呆了一个小时，再次告诉他说，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她还是一样爱他。当她抱着卓恩摇动时，他止不住大声哭起来，最后小声说："我的确杀了他。"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卓恩慢慢道出了实情。星期五早晨他非常兴奋，因为那是学期中休假之前的最后一天，一位教师说他可以带一些沙鼠回家玩。他在学校大门口遇到勃比，他们就决定一起逃

学。这并不是第一次。

一般来说，他们会把上学的小书包藏在地铁下面的某个地方，然后玩一整天，有时候是去商店偷东西——糖果、玩具、油漆罐、饮料、蜡烛，差不多什么东西都偷。有时候他们只是在商店里乱转，玩一玩电脑游戏或者在斯特兰德购物中心光滑的地板上溜着玩。

他们在肉摊外面碰到了詹米。根据卓恩的说法，勃比说："我们去把这个小孩子弄丢吧。"

"我们从休斯店里走过去，他（詹米）就跟在我们身后。罗比就说：'来吧，小孩。'那个小孩子就跟着我们下楼梯。罗比说：'我们带他到外边去，他自己走到公路上就给车轧死。'"

"我说：'这是干坏事，不是吗？'"

卓恩说自己就是那个牵着詹米手走出购物中心的人，跟摄影机里面录下来的一样。他们一起带着那个小孩子穿过斯坦雷路，卓恩抓住他的双腿，勃比抱着他的胸。根据卓恩的说法，当他们到达运河边时，勃比"抱起詹米来，猛地扔在地上，把他的头磕了一个大包"。

描述致命一击的时候，他说："我们将他带到铁轨上，用砖头砸他……

"勃比往他脸上扔了一块砖。勃比说：'捡一块砖砸他。'我只是把砖扔到地上去了。我只拣小石头，因为我不愿拿砖砸他。他一下子就倒下去了，但他又爬起来，不肯躺在那里。我也拣了几块石头，故意打偏。我有两次打了他的胳膊，因为我想拿他身边的砖头。"

"勃比用一根铁棍打他，然后我们就用砖头砸他。然后就跑走了。我们按照去的方式往回走，然后去了录像室……"

这就是苏珊·凡纳波斯那天晚上7点30分找到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手和衣服上全都是泥，他们的夹克上还沾有大块浅蓝色的彩釉。苏珊非常生气，对勃比大吼大叫，让他从她儿子身边滚开。他跑回家去，告诉他母亲说，凡纳波斯太太打了他。作为证据，他把身上的一处擦伤给她看，那是他在铁路场上弄的。安娜·汤普逊送他到了警察局，告对方打人。同样，苏珊也带卓恩到了警察局，要一名警员给儿子发一次警告，要他以后不要"逃学"。可笑的是，这就使两个小孩在杀人之后的一小时内到了警察局。

直到第三天问讯的时候，勃比才最终承认碰过詹米。他那洋洋

自得、鬼都不怕的神气松驰了一下子，因此他说："我的确碰过那个小孩子。我想把他弄出铁轨来。我抱着他的肚子把他弄起来。然后我又放回去了，因为我发现自己满身是血。"这是个聪明的解释，可以说清楚使他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血渍。

"卓恩坐在墙上朝他的脸上扔砖头。卓恩朝他肚子上砸了一砖。他倒在地上，倒在铁轨上。然后，卓恩捡起一根铁棍，朝他头上打了一下子……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他，只是抱着他到了铁丝网下面看看还有没有气。因此我没有什么要担心的。如果我要杀一个小孩子，还不如将我自己杀了哩，是不是？"

他几乎没有一点痛悔或者懊恼的迹象，只有卓恩说："告诉他妈妈我非常难过。"

2月20号星期六，利物浦警方公布了一份短短的声明：应公众强烈要求，今天晚上6点40分，沃尔顿地区的两名10岁男童因诱拐和杀害詹米·巴尔格已受起诉。这两名男童还因为企图诱拐另一名两岁男童而受起诉。警方将根据1991年刑事审判法第59条之规定对该两名男童予以刑事拘留，并将于星期一送交少年法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股深深的忧郁像雾一般缠绕在人们心头。许多人都感觉到了——那是一种全国性的悲哀，无法解释清楚，但我知道它与詹米有关。每个人的童年回忆的一部分都死在那条铁路线上了。

人们有时候问我，如何应对悲伤，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工作带回家去做而又不影响自己的家庭。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没有把工作带回家去做，我把自己的一小部分留在每一个犯罪现场之后，每次我都在自问，会不会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连最后的一点自我都拿不回家去了?!

13 掩蔽行动2

莉西·詹姆斯于1993年1月19日第一次写信给柯林·斯塔格，

说她是朱莉·派因斯的一个老朋友，她说朱莉是那种“老派的人”。她说偶尔翻出了斯塔格写给朱莉的一封信。

那封信一直印在我脑海里，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发觉自己总在想着你，如果能够更多了解你，如果能够给你多写些信，一定会使我觉得很有趣。

我想大致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离了婚(跟朱莉一样)，坦率地说也有过一些单相思的关系，但自己也因此吃了一些苦头。我身高5英尺8英寸，金发，30岁，过去有人说我长得漂亮。我的兴趣听起来可能让人觉得无趣，但是，我不太与人交往，很喜欢一个人呆着。我读很多书，经常还想到要自己写一本书。

我在音乐方面有奇怪的品味，我最喜欢的唱片是娄·里德唱的《特立独行》。我为人谨慎，但也没有到偏执狂的程度。因为我和朱莉的关系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如果你不告诉她我曾给你写过信，那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正在考虑搬家的事情，但又不想让别人寄来的信件弄丢了。我在伦敦设了一个权宜通讯地址，因此你可以通过那个地址跟我联系。我一个星期去伦敦市中心两次。我希望这封信没有打扰你，并盼望着你的回信。

莉西

X

另，我的名字是莉西·詹姆斯

斯塔格立即回了信，而且显出非常谨慎的样子。他说他不记得给哪位叫“朱莉”的人写过信，但他又说，他有心与莉西通信，因为他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样的人。他也不太与人交往，过着宁静和安逸的生活。他的消闲项目包括在当地公园定时散步，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还听一些音乐。他还喜欢在夏季去公园做一些裸体日光浴，但是，一些头脑狭隘的人认为他这是有毛病。

他说自己经常“孤单得要命”，说他不喜欢“头脑封闭”的人。他说生命太短促了，容不得别的任何人告诉你应该怎么生活。

斯塔格请她寄一张相片给他，还说希望她能够很快回信，这样大家就可以更深入地彼此了解。基斯·佩达把那封信给我看，我提议莉

西的回信口气应该热烈一些，跟典型的求偶信件一样。我铺设了基本指南，说那封回信里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或者应该反映出什么内容，然后由警方去寻找合适的词汇并构造句子。

2月初，斯塔格的下一封信到了，他想起来自己是跟一个叫朱莉的人写过信，并承认那封信写得太露骨。他想给莉西也写类似的信件，这样可以显示他对于两个人在一起时的幻想。同时，他鼓励莉西也这么做，应该透露出自己的内心欲望和幻想。

随信附有斯塔格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讲他在后花园里做爱的事情。他描述自己光着身体躺着，莉西就在自己面前脱衣服，并以万种风情、百般媚态请求做爱。他牵着她的手躺在草坪里，躺在潮湿的草地里，他慢慢地手淫，同时摸她的头发。因为想到邻居有可能发现他们，这反倒使他非常兴奋。

直到2月15日我在阿诺尔德洛奇看到佩达时才看到那封信，当时他看起来很是高兴。

“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他说，“他才寄出第二封信，接着故事就写出来了。”

“是普通的幻想，”我提醒他，“要暗示出什么东西还需要很长时间。”

佩达说：“但这个故事显然无法排除他的嫌疑。”

“是的。”

斯塔格明显记得他是如何给朱莉·派因斯写信的，因此他给莉西的第一封信是要试她的可靠性。他很快就开始从莉西那里产生性幻想而不必由她挑起了。惟一的其他兴趣点看来就是对于户外性交活动的爱好，被人发现的想法可使他激动，并显示出少许对女性参与者的控制型性姿态。

到此时，莉西和斯塔格已经交换了情人卡，而且另一封幻想信件又寄到了。他又透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私生活，承认自己的个人生活变得“非常好色了”，一边看男士杂志一边手淫。他希望莉西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不快，希望他们不久能够见面，并建立令人激动的两性关系。

这个幻想跟在他的色情杂志里发现的一个故事差不多，但是，它强化了他的回信里面明显的性特点，也更加透露出他希望从与莉西

的关系中得到的东西。

她的回信并不能够极大地提高性表达的强度，我提醒说，她也不能够讲一些由可能的罪犯预想到的性主题。她不能够决定他讲什么，必须由他带头。

莉西写了回信，赞扬斯塔格是“极聪明的说书人”，但又说他必须等待一阵子才能够得到她类似的回信，因为她在这方面要开个头是很困难的。她描述自己生活在斯娄夫郊外，并计划在几个星期内搬走。

同时，这次行动碰到了未曾料到的障碍。一部讲罪犯心理轮廓描述的电视记录片正在计划之中，参与的人当中有大卫·康特，制片人希望特别集中在拉雪尔·尼克尔的案件调查上。康特此前已经对记者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帮助刑事调查人员，但并没有接到邀请。这部记录片对这次隐蔽侦查行动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次行动能否起作用取决于柯林·斯塔格相信调查活动已经停止，而且一无进展。

佩达尽最大努力让那个计划暂停一下，因为没有成功，他就怂恿我合作一点，而不是让他们去采访康特，因为康特本人并不直接了解正在进行的调查行动。他的想法是尽量转移对这个案子的评论，并泛泛地谈一谈心理轮廓描述的事情。

我心里极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结果是我尽最大努力说些转移注意力的话和胡扯。对于看了那个节目的任何人我都感觉对不起。

2月25日，佩达对我讲了接下来的一封信。这次又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设计用来建立两性关系，第二部分是另一个幻想，这次是以这样一个标题写的：“特别招待我漂亮的莉西。”他描述，在一个炎热的晴天，他们一起去当地一个公园野餐。走到一个小小的林间空地的时候，发现那里有少数几棵树挡住人们的视线。他们就在一棵倒下来的树下选择了一个地方。他准备食物，并把红酒拿到附近的小溪里去冷却一下，此时，莉西就脱了外衣，只穿一件比基尼式游泳衣，他们肩并肩坐在一块地毯上。他们开始彼此抚摸，然后脱衣服，直到莉西裸体躺在地上。

斯塔格带她去那棵倒下来的树下，让她趴在树干上，这样他就可

以从后部插进她体内。她发出猛烈的呻吟，因此他问她是否 OK。“很好，真是好极了。”她说。

斯塔格最后说下一封信接着讲。对佩达来说，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一把抓紧这封信的复印件，不一会儿又停下来大声念出信的一部分内容。

“瞧，他去那里了——他去了林地。正好就是事情发生的样子——那棵倒下来的树，小溪、他在谈从她身后插进去。他在再创当时的情景。”

我努力打消他的兴奋：“是啊，但他也就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东西使他直接与谋杀联系在一起，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幻想与你在男士杂志里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佩达很容易因为信中提到的地理特征和控制性的男性行为而陶醉，但是，如果这次隐蔽行动要产生什么重要的意义，事情就必须从杀人者一般性的期待相符发展到非常狭窄和对他尤其具有针对性的内容上，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你不应该马上回信。”我说。

“为什么？”

“让他有时间反思一下，并从这种关系当中退出来。应该由他来决定调查行动发展的方向。”

“如果他放弃，不再进行下去怎么办？”

“那他就将自己排除出去了。”

这件事情既不是想让柯林·斯塔格有罪，也不是尽量减少他信件中有利的细节。我根据事实真相来评价每一封信，并指出了凶手所没有预知的一个因素：在他的性幻想中，有更多的女性主导作用。

当莉西再次写信的时候，她并没有拒绝斯塔格，她说明她更喜欢说真话，而不仅仅是一些幻想。同时，她必须指明，她对男性主动的性交行为是持开放态度的，没有提到任何极端的暴力行为，也没有从拉雪尔·尼克尔谋杀案当中抽出来的任何特点。

“你可爱的幻想之信极吸引人，但愿这些是你真正的想法，也是你对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真正的构想。我希望这件事情保持为私密活动，而且是真实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杂志里看到的普通故

事。我的幻想无边无际。我的想像力一片狂乱。有时候，这使我感到不安，如果你时不时讲些跟我一样不同寻常的梦，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信件定期交换。斯塔格写到了他的孤独，还有他与妇女关系很差的历史。他不能够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有如此漂亮的一个女人对他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她还对性生活保持如此令人激动的看法。一般来说，他遇到的妇女看着他的样子就好像要将他甩得远远的，和她们鞋跟上的泥巴一样。

虽然他的一些幻想已经开始包含像“狂喜中的尖叫”、“在你体内狂乱地抽动”等语句，而我知道，这些话包含的意思太多了。但男性主导的性交行为继续保持在幻想当中，因此我建议莉西的下一封信可以用类似的语气回信，以便符合他所描述的控制和羞辱行为。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都不能够拿出确切的例子来。斯塔格必须拥有完全的自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采取回应措施。

如果这样，我预测他会做下列三件事情之一。

1）退出这种关系，因为基于这样的性幻想的私通行为不能够使他产生兴趣；

2）说明他很喜欢在私密关系中出现这样的事情，但这样的关系只能够维持在与别的、许多双方同意的成人性关系没有什么差别的水平上，因为那些人的性生活可以用象征性和彼此交换的性控制和性屈服添油加醋，哪怕有时候还涉及到捆绑之类的活动；

3）试图与莉西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它能够不断地集中在包括她在内的生理和性狂暴的幻想上，而且最终由最严重的那一类性攻击行为构成。

我知道，任何选择最后一项的人，如果他应该对拉雪尔·尼克尔的死负责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些狂暴的幻想引起的性兴奋和预期如此之强烈，到时候它会置他自己的谨慎于不顾。最终，他有可能向他想像是一个知己的人透露出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如果他感觉到这样的一种透露会成为更大的性满足的一部分的话。

这就是使整个隐蔽行动运转起来的发动机。

如果斯塔格选择了前两种当中的任何一种，他就能够自己排除自己。只有当他选择最后一项，并表明他的性欲与可在杀人者身上

预期到的性欲相符的时候，整个行动才能够继续下去。但是，这还不能够证明他犯有谋杀罪。

莉西写道：

“你要我解释一下对你写来的一些特别信件的感受。好吧。首先，它们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奋，但我禁不住觉得你只是在宣泄自己极大的压抑，你是在感觉要爆炸的时候才显示自己的控制能力。我想要你爆炸，我想感觉你无所不能、压倒一切的样子，这样我才能够完全处在你的淫威之下，失去抵抗力，任由你百般羞辱。这些想法已经让我飘飘欲仙了……”

回信的准确用词不在我的角色之内，我只负责每封寄出的信件的语气和原则，以及每封来信得以解释或理解的各种方法。我不会选择这封信里所用的“羞辱”一词，因为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斯塔格的任何一封信里。不过，我感觉它还是处在我为此次行动所设定的指南范围之内。斯塔格的下一封信明确说明，他不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退回去。同时，他的幻想远远超出“控制”与“羞辱”。他认为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要产生一点点疼痛。

他承认自己有点“退缩”，之后他描述自己希望虐待莉西的肉体，并臭骂她一顿，直到她感到“羞辱和污秽”。同时，他催促她不要拿他当作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他会向她显示出肉欲，但也会表示自己的爱。

“你需要让一个真正的男人好好操他妈的一顿，而本人正是适合干这件事的男人……我是这世界上惟一能够让你好好享受一顿的男人。我要确保在虐待你的时候让你疼得直叫唤。我将毁灭你的自我价值，让你往后再也不敢抬头见人……”

这里面的监督、谨慎和测验是很明显的，就好像他朝前跨出一步，然后又退回一步，以确保一切都平安无事。同时，他已经第一次在信中透露出我注意到属于虐待狂成分的气质。

他在接下来的信中很快由原路退回，再次显示他的孤独和空虚感，特别是看到别的年轻浪漫的伴侣时。他看来很担心，希望莉西不要因为他的上一封信中的过度内容而退缩。

在回信中，莉西并没有排斥斯塔格，也没有显出被冒犯的样子，但是，也没有鼓励他再去想一些过分的主题。反过来，到了她透露她

自己的一些历史细节的时候了，同时假装自己极小心的样子。她必须指明她的过去有一个黑暗的秘密，而且是她不愿谈的。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斯塔格向莉西保证，他鼓励她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并且坚持认为他不会被她以前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所震撼，哪怕是杀人。信中并没有任何过度性暴力行为的证据，但是，他显示出一种追求这种两性关系的意愿，而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不管社会规则和规定。

斯塔格接下来的幻想再次在野外铺开，这次是一年夏天在公用绿地上的行为，里面有语言虐待，而且在没有得到莉西的允许的情况下使莉西被数名男子插入。斯塔格还送了她一份礼物，是一个小金属圈，他说这可以保护她不受"陈腐、邪恶、封闭思想的人"的毒害，而且戴上它还能够使她产生性兴奋。

莉西慢慢开始讲出她自己的一段特别的历史，不再说任何新的话题了。4月14号，她写道："我以前只见过惟一的一个男人使我感到完美。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共享的一段经历，就是那些经历使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女人……我相信自己只会在再次遇到那样一个具有同我一样历史的男人时才会感到完美。我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普通人会喜欢的，因为里面涉及让一些人感到恶心甚至是伤害一些人的内容，哪怕那些事情不好，我也因此而感到内疚，但是，我无法忘记它们让我产生的极度兴奋。我极想再次体验那样的兴奋，但又不能够通过伤害别人做到这一点……"

斯塔格希望将两个人的关系快速推向前进，4月28号，他们第一次通过电话交谈。跟预期的一样，新层面的接触引起了更大程度的谨慎。

通话期间，斯塔格说隔壁的一些人在传播关于他的谣言。

"啊，为什么呢？"莉西问。

"嗯，电话里不好说，但我下封信会写清楚。"

"那好吧。"

"大概是指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哦，是啊，那就没事。"

"是啊。"

"人们总是无法把话都闷在心里。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滋

味，我意思是说……"

"是啊。"

"在北方事情更糟糕。你知道北方人是什么德行，他们就是爱说你的一些闲话。"

"是啊，就是嘛。可是，这可不光是你所说的那种闲话。"

"是吗？"

"这一切是关于……你知道，是关于人格损毁，你知道的。"

斯塔格保证要写信并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我建议的一样，莉西对他的话题没有显示什么兴趣，或者不太关心，并集中精力谈她自己的生活和历史。

"你觉得……你喜不喜欢那么干？"她说。

"是啊，我想那是最好不过。"他回答说。

"那就好。"

"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些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

"嗯。"

"你有可能在报纸上看到过的，比如……"

"我不怎么看报纸的，我连电视都还没有哩。"

"我……我意思是说，那些事情当中……我受了怀疑。"

"嗯。"

"但我想告诉你，就跟我对任何人说过的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干过任何事情。"

"嗯。"

问及她觉得他的信怎么样时，她小心地回答他说："那没有关系，我一点也不在乎。"这样就回避了说喜欢那些东西。

第二天进行第二次对话的时候，莉西建议他们最终应该见见面，并提到应该在海德公园搞一次野餐什么的。在同一次谈话当中，斯塔格开始讲到一个幻想，说是他当天已经寄给他的。

在那封信里，写到了莉西被毒打了一顿，他从后面插入的时候他还用皮带猛力拉回她的头，因此引起她的疼痛。

我告诉佩达说，所描述的暴力程度已经超过了有时候能够唤起一些人或者夫妻的控制及屈服的象征性表演的程度，这一点是一个相当清楚明白的提示，表明是杀死拉雪尔的人所具备的性偏好。

在同一封信里，斯塔格写到他的过去，描述他在 17 岁的时候看过一场色情电影，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在当地的公园光着身体进行日光浴。他光着身体躺在深深的草中，然后产生了性兴奋，并开始手淫起来。一个男人从草丛外面走进来，并要求加入他的行列。

斯塔格承认自己加入了那场同性恋活动，但坚持说他并不是同性恋。他说所有形式的性活动都能够使他产生勃起，但目前，他只对女人有兴趣。他希望把莉西的"屁股都操没有了"，让她疼得不行，而且没有人帮助她。他请她夏天去罗依汉普顿跟他呆一阵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公园进行漫长的散步，"每五分钟就可以搞一次淫荡活动"。

这次掩蔽活动已经进行了三个半月，突然有一天，佩达请我于 5 月 7 日去伦敦的诺贝里警察局参加一个会议。他说会议很重要，并没有讲得很复杂，我一进屋子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屋子里坐满了苏格兰场来的警官，包括代理副警监和掩蔽行动 SO10 小组的指挥官。掩蔽行动要进行评估，而这些人有权力让它继续下去，或者终止它。

佩达和威克森用幻灯片、问讯、信件和这次行动的副本做了报告。我在这间会议室的作用很小，只是回答偶尔的提问。

关于这次行动的合法性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人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反过来，高级警官们更关心其可行性以及行动方面的话题，比如行动的生存能力，行动太早解除后对公众的风险以及钱方面的问题。

要花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这是问得最多的问题。最后，佩达告诉我说，他可以让绿灯继续亮下去了。

如所许诺的一样，斯塔格的下一封信解释了他为何因为拉雪尔的谋杀案而被逮捕，而且因此感到很压抑，因为他并不对此负责任。他说，有很多单身汉都被叫去进行问询。他的邻居和当地其他人也对警方说了一大堆废话，而警方就相信他们的话。

"我不是杀人犯，因为我相信，所有生命形式，从最小的昆虫到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是神圣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斯塔格还提到了因为风化罪而被起诉的事情，声称那是被邻居陷害的结果，因为邻居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名字。他们在街上骂他，

孩子们还往他的厨房玻璃上扔鸡蛋。他说,最近流传的谣言说他光着屁股在自家后院里手淫。

到5月13号莉西接到下一个电话的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行动必须转移到下一个阶段,必须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了。直到目前为止,她只讲到了自己很少的一部分历史,但现在她保证准备向他透露她最阴暗的一面了。她开始为她过去的故事编造基础了,说自己曾被吸引到一个宗教团体中去了,那还是少女时代,然后卷进一桩性谋杀案,涉及一名年轻妇女和一个小孩子。她向他敞开内心,因此也希望他做同样的事情作为回报。

莉西曾说:"听我说,我知道你曾在一封信里跟我讲过你17岁的时候在公园里跟一个男人的事情……"

斯塔格说:"是啊。"

"我非常明白承认那一类的事情心里是什么滋味,可是……"

"是啊。"

"……可是,不要担心,我并不觉得你是个同性恋或那一类的人,我只是觉得……"

"我不是,我明白。"

"……你只是孤独而已,就是这样的。"

"是啊,的确如此。"

"所以我不太担心。"

"不,你不用担心。不管怎么说,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吧。"

"是啊,可是我不担心,你知道你说的那个女人,坦率地说,柯林,就算你真的杀了那女的,我也不在乎。我一点也不在乎,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那会使我感到更轻松一些,因为我有些事情想告诉你。我会在星期四告诉你,明白吗,那只会让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命,是命运将我们俩个人带到一起来了。"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不想说那事,但我会在星期四告诉你。"

"好吧。你知道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什么过错也没有。你明白的。"

"好吧,很好。我现在不想谈这事,但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

他们计划于5月20日下午2点在海德公园见面，在那里一起野餐。斯塔格那天正好30岁，莉西曾保证为他过一个生日的。一天之前，我在阿诺尔德洛奇的附属建筑物里与莉西见面，坐在她身边为她做准备。我们都明白，如果疑犯没有自我排除，行动就能够到达这一步。

莉西坐下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热情的微笑，她穿着一件衬衣，还有牛仔裤，看上去很放松。她聪明和富于幻想的性格有时候掩盖了她深层的经验和冷酷的一面。很难想像她曾利用女性特征和魅力深入过最危险的一些犯罪组织。她的生命曾数次受到挑战，但最后都因为自己的智慧、美貌逃脱了风险。

每次掩蔽行动结束的时候，她都必须接受培训以便用稍稍不同的方式再次包装所有的事情，然后外出扮演另外一个角色。那就像体验派表演的最高形式。

这次，莉西必须装做一个心灵受损而且受过毁伤的年轻妇女，她正酝酿着一个私密，并寻找一个能够共享类似体验的男人。她必须明白，这个女人会有怎样的感觉，会怎样表现和谈话——那是与扮演匪徒姘妇和恶女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她以前从来都没有干过类似的事情，而且还不能够做太多的假定，反过来，她只能够吸收一些细节和点子，就跟一块海绵一样。

"他会想办法接近你，并摸你，"我告诉她说，"但你必须想办法保持身体的距离，让他稍微远一些，但同时又不能够排斥他，也不能够显出蔑视的样子。如果他看出或者推断出你不是所说的那种人，或者把你的拒绝解释成你只是另外一个对他说不的女人，那对你本人或者本次行动都没有好处。"

"我如何保持距离？"她问。

"求助于你自己内心的悲伤。你对他说你少女时代发生的事情，谈活人祭仪行为产生的感觉。这些事情都是令人不安和不舒服的，你可以利用这些痛苦和伤害感拒他于半尺之外。"

"他会觉得这是个无法说服人的理由，他听过很多女人找这样的借口。你说的事情必须是绝对真实的事情。"

海德公园是经过精心选择才定下来的会面地点。莉西身上不仅

带有报话装置，而且她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有一组便衣警官照应，这些警官都混在中午吃饭的人群当中。在任何一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够忘记，她是在跟一个杀人疑犯在一起，而且，如果揭去了假面具，她就处在极度的风险之下。

我觉得莉西穿的衣服应该表明她意识到自己的性欲，但又不显出可以滥交的样子。佩达的想法不一样。他提出穿上防刺刺背心的问题。

“我不想穿，”莉西说，“那会影响我穿的衣服，而且会妨碍我的活动。”

佩达说：“我还是建议你最好穿上一件。”

“如果他得到一点点暗示，那会使整个行动泡汤。”

莉西坚持己见，最后决定穿上一件带花图案、但又不是太有挑逗性的漂亮衣服。星期四下午2点之后不久，打开绑在她身上的磁带录音机之后，莉西在柏油路上躲着路上的水洼往前走，并在戴尔咖啡屋外的一个路灯底下信心十足地站着，等待她约会的人到来。

柯林·斯塔格早已经来到海德公园等候了，而且站在远远的地方观察她。因为两人的接触又进了一层，他又一次变得十分谨慎了。他立即根据照片认出了莉西，而且跟事先约定的一样，她身上挂着一个M&S购物包。他从湖的南面接近她，外面正在下着大雨。

“莉西。”

“你一定是柯林。”

“是啊。”

“就像是《初见雨中》一样，柯林。”

“我知道，是啊。”

“你一定都湿透了，快过来（到她伞下）。天啊，你都湿透了。你还好吗？”

“我来得早了些。”

“是吗？”

“是啊，我一直都在那边等着。”

“啊，我也来得早了点，但不是太早。啊，真是讨厌，我们原来还准备来一次野餐的。”

“我知道。典型的不凑巧。”

"啊，生日快乐。"

"嗯，谢谢。"

雨水迫使他们进了戴尔咖啡屋，是一家自助餐厅，他们坐在那里，随便谈谈各自的一些事情。莉西对他讲了活人祭仪的故事，解释说那样的经验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她。那个影响如此之大，她感觉到自己再也无法真正跟任何一个男人产生什么私密感觉了，除非他也有类似的一个背景，而且明白她的内心感受。

如我预测的一样，斯塔格说他并没有这样一个背景，但极想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如此多的方面彼此相像。他再次说明他与拉雪尔·尼克尔的杀人案没有关系。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分手的时候，斯塔格从他的夹克里拿出一个棕色信封交给莉西。出租车开到边上来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于下午3点05分关掉了录音机。

当天下午，佩达给我打电话，并且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他提到了那把刀子，"他着急地说，"他就这么走了，但提到了他妈的那把刀子。"

"是在见面的时候吗？"我问。

"不，不，是在信里。他给莉西写了一封信，并把刀子给她了。"

"信里说什么？"

"你到机器旁边去，我给你传过来。"

这封信有一种警示的意思，还透露出一种危险的气氛。斯塔格描述带莉西去一个隐蔽的地方，他知道就在公园那边，他们要在那里脱掉衣服，并在炎热的太阳下躺在一条毛巾上。

他们注意到有人从树后偷看他们，斯塔格就鼓励莉西装装样子给那个偷窥者看。"把我吸干吧。"他说，声音大到足以让那个偷看的人听见，而莉西也就跪了下来听他的安排。然后，他将她弯在树干上，从后面插进她的身体，一直将她按到地上去了。斯塔格秘密地召唤那个陌生人走得更近一些，并将他的阴茎抽出来，主动将莉西送给他。然后，他抓住她的头发，强行将她的头向后拉，然后将阴茎插进她嘴里。

突然间，陌生人提议来点危险的事情，莉西也同意了。他在自己的衣服里面翻出了一根绳子和一把刀。两个男人就抓住莉西的胳

膊，面朝上将她绑了个结结实实的鹰形。

那人跨坐在你身上，他的阴茎还在往你肚皮上滴精液。他用刀锋轻轻地从你乳房处一直往下滑到阴门，没有割你，只是让你产生痒的感觉。然后，我将刀锋放在他阴茎下面，挤了几滴精液在刀锋上，然后他用刀子将精液拿到你嘴边，让你一点点舔干净。你舔了，你现在已经急不可耐了，眼都红了，在那里激动得大声叫唤。然后，那人自己割开了自己的胳膊，仅仅只是割出一点血来而已，然后就滴到你的乳头上。你慢慢将它揉到自己的乳房上，这使你的头来回狠命摇动，就好像你已经进入抵挡不住的高潮一样。

这个幻想进而继续描述两个男人插进莉西的场景，还说那把刀子继续拨弄着她的乳房，而且对着她的脸。信结束的时候，斯塔格说，他希望莉西觉得这很能够满足她，并对她说，根本不会伤害到她的身体。

令人奇怪的是，他声称那个故事是根据他觉得莉西最喜欢的东西而描述的，但是，莉西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刀子、疼痛、语言虐待、滴血、倒下来的树、小溪或者林地。而且那封信并没有受到任何发生在海德公园的事情的影响，因为斯塔格是带着那封信去公园的，那封信早就写好了。

"事情正如你所说的一样，真是令人吃惊。"佩达说。

我制止他的话："为什么吃惊？"

"不是讲犯罪的话，保罗，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你看来对斯塔格非常了解。"

"不。完全不是。我了解性变态方面的一些事情。"

"好吧，这个幻想会把斯塔格带到哪里去？"

"它符合我期望会在杀人者自淫常备节目中发现的东西。它还具备已知与杀害拉雪尔·尼克尔的人相关的一些重要因素……"

"把底线露给我看吧。"

"你们是在寻找一个有极严重的性变态的人，这样的人在普通人口中的比例很少。"

"少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拉雪尔在温布尔顿公园被杀时，那一带有两名这样的男性的可能性小得无法叫人相信。”

柯林·斯塔格明显显露出自己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年轻男子，而且急于失去自己的童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他愿意讲出任何事情以满足性交一次的愿望，但这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要露出如此之多的暴力性幻想的情景。还有很多别的奸淫行为和出格的性活动可以想像，可以编写，但是，他只选择这个范围狭窄的话题，而且只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写。

在总人口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所过的性生活包括象征性的强迫、捆绑或者虐待成分。如果这就是斯塔格先生所透露出来的全部内容，那么，他就可以让自己从这次调查活动中排查出去。反过来，他进而超过了这些范围，突出了极度的暴力、强奸以及性痛苦成分。这在斯塔格受怀疑之前的数个月前就已经是杀人者所具备的特点了。

当然，我不能够说柯林·斯塔格杀了拉雪尔·尼克尔，而且同样，少见的性变态也不能够成为谋杀证据。惟一能够让法庭满意的证据，必定是疑犯讲出了那次杀人的细节，而那是只有杀人者才可能清楚的。很明显，如果斯塔格不是杀人者，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他并没有自知有罪的犯罪意识。

六月到了，夏天也快来临，掩蔽行动还在继续当中，节奏得到很好的控制。同时，我还有其他一些案子在手头上。

对迈克尔·山姆的审判已经在诺丁汉皇家法院开始了，他承认绑架并非法监禁斯戴芬尼·斯雷特并敲诈了船台房地产经纪公司。但是，他否认杀害了朱莉·塔特，也否认敲诈西约克郡警察局和英国铁路公司。

公诉方理查德·威克雷说，毫无疑问，迈克尔·山姆犯下了上述所有罪行，并且列出了 20 多条无可置疑的证据将斯戴芬尼·斯雷特的绑架者与杀害朱莉·塔特的绑架者联系在一起。“游戏玩完了，山姆先生。”他望着被告席那边说。

我没有看当天报纸里的审判报道，从包勃·泰勒那里听说此事时很惊讶。

“山姆明天或者后天会出现在证人席上，”他说，“这会是非常关

键的一天。"

审判被认为是极有利于控方，但很多东西取决于山姆表现的效果。"你知道他那个人的，保罗，如果你能够去观察一下他，并提出你的一些意见，谈谈山姆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我们将非常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7月1号，我见到了理查德·威克雷和泰勒，控方问我是否觉得山姆有可能慢慢承认杀害朱莉·塔特的事情。我摇摇头。

"只有当他觉得这么做，就能够强化他自视的那种拉弗尔英雄形象，或者如果他决定自己肯定还是会被定罪的。但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

"他还在玩游戏吗？"

"是的——他在这场游戏里面投入了自己的一切。如果他承认一切，那也只是在被定罪以后才有可能。"

虽然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我有一个印象，觉得威克雷以为他能够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成功，并且能够在反复讯问的时候让山姆陷入困境。

泰勒必须在拥挤的法庭里替我找一个坐位，这多少让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和听到山姆。公众席里面很挤，而且所坐的方向也不对。记者席里面是满的，我也不敢冒然跟舰队街最精明的一帮人混在一起，因为总有可能被人认出来。

最后，他们在记者席旁边为我找到了一把特别的椅子，而且我在那里坐下来并且往本子里记录一些东西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地方。迈克尔·山姆在上午11点45分进入证人席，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西服，还戴着金边眼镜。

我匆忙记下："镇定。预演过一个故事。很放松，靠在证人席上。他对友好的提问回答不错。他已经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构造，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利用，就好像一切都在他的记忆里面一样。为做到这一步，他必须将自己所犯的罪抛置一边……有些概念不太站得住脚，是在被逮捕后临时想出来的，并不是原来的那一套方案，因此，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

山姆承认早在1991年2月就开始筹划绑架的事情了，当时，他用4块8×4英尺的刨花板做了一只箱子。这只箱子后来用来囚禁

斯戴芬尼·斯雷特，但是，他说，他并没有用它囚禁朱莉·塔特。

一开始，他计划绑架克鲁威的一个房地产代理人，希望借此找到足够多的钱为他妻子丁娜在伯明翰买套房子。他说，他做了合适的安排，并去看一栋他认为适合他计划的房子，他还在自己的鼻侧点了两粒疣子以掩饰自己的外貌。但是，那个计划流产了，因为隔壁那家屋子的一名建筑工开始跟他谈起话来，因此他觉得再继续下去不安全。

两个星期后，他说他正在跟他车间里的一个朋友一起看电视，突然间，午间新闻里播出了在林肯郡发现一具尸体的报道。他的朋友告诉他说："那是个事故。她想跑走，结果我就揍了她一顿。"

他的朋友鼓励他写两封信，让警察局离开现场，"他说他想利用别人的手来写点什么东西"。山姆说他同意了，因为当时他的婚姻出了岔子，而且当时，"我对一切都不在乎"。我在那里飞快地写着一些东西，而坐在我旁边的记者席里面的那个人假定我是另外一名记者。休庭期间，他说："我们不是在哪儿见过吧？我是伯明翰 BBC 电台的某某。"

我曾在纳什尔格林警察局的专案室里进进出出，他有可能是在那个地方见到我的。

"你是在米德兰一带工作吗？"他问。

"我四处走动。"

我不想被人认出来，也不想回答任何问题。这件事之所以记在我的脑海里，是因为审判结束之后，我接到同一家电台的记者打来的一个电话，请我评论一下。当他听出我的声音之后，里面有一声"啊我的天"，然后是一声叹息。

在展示山姆的物证期间，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还在努力在陪审团面前为自己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我写道："对斯戴芬尼来说，他是在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仁慈的绑架者形象，而其反面就是杀死朱莉·塔特的无情和残忍的谋杀犯，也是斯戴芬尼·斯雷特的可能杀人者。"

我对公诉人建议说，他应该探索山姆为自己树立的那个形象，还有他为朋友树立的那个形象。他如何解释一些好人作恶的事；他如何解释其他人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

我说，利用柔软的口气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很重要。山姆对于

敌意的正面交锋应付有余，而且能够保持自己的自信心，因为那样会提高他的防备心理。

理查德·威克雷非常聪明，因为他带山姆走过了他计划中的每一个阶段，让疑犯显示了他自己的丰富的筹划能力以及如何聪明。他只承认自己想到的一些好点子而不想讲那些一般的计划过程，也不提他自己在计划当中所犯的一些错误。

威克雷已经编好了一个套子。"我们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一致意见：杀死朱莉·塔特的和敲诈英国铁路公司的是同一个人？"

"是的。"山姆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威克雷问："那我们如何解释给英国铁路公司的信件的不干胶上的纤维与你的蓝色裤子上的纤维之间的联系？"

山姆开始努力思考起来。每当法医证据面对他的时候——血渍、地毯上的纤维、绳子上的一股股线——他的不安感就会升高。很明显，他非常看重这些证据，因此不知道如何应对。同样，当他必须现场思考而没有机会坐下来筹划的时候，他就容易受到攻击了。

威克雷稍稍变换了一下策略，而且谈到山姆的时候还利用了我的一些用词，比如"无情、残忍、杀手和失败"。他利用全部的音域，从软到硬，使疑犯的自信心一步步下滑。

山姆回忆他拉扯斯戴芬尼·斯雷特的时候哭了起来，但那些眼泪是为他自己受伤的自尊心而流的，并不是因为他受了惊吓的人质流的。他说他从来都不想伤害她，只要她不揭下眼罩来就行。

"如果她当真揭下来了，你会怎么做？"威克雷问。

山姆哭起来，说他从来都不曾伤害过一个女人。威克雷然后举起一块钉满铁钉的板子，那是山姆设计用来在斯戴芬尼打算逃跑时让她无法动弹的一件工具。山姆局促不安起来。威克雷轻轻但反复地使用"杀死朱莉·塔特的凶手"这个词，而且每次注意地看疑犯在证人席里不安地扭动。

在我看来，当山姆说"如果我杀了朱莉·塔特，那我就无法面对它"时，那就是最为重要的一句确定性的声明。他无意间承认为什么要努力反抗，不想承认他是个冷血的残忍杀人者。当威克雷问到山姆，他跟他宣称是杀死朱莉的凶手的那个人还是不是朋友关系的时

候，他说："这我现在还说不准。"

然后，他暗示说，他一直以为她的死是偶然的事故造成的。威克雷看起来无法相信："事故？那个姑娘头上挨了打，然后又被扼死。那样的事情怎么能够说成是一个事故呢？"

"反正那是我当时的解释。"他说。

然后，威克雷反复要求他报出那个朋友的名字。

山姆每次都拒绝了，他说最后有可能会说出来，但只有在他自己洗清了自己的罪名之后才有可能说出来。

7月8号，陪审团退庭合议定罪问题，然后在两个小时内返回。大法官伊戈尔先生判处山姆4次终身监禁，并说："你是个极端邪恶的人。陪审团裁定你犯了谋杀朱莉·塔特的罪行。这是冷血谋杀行为，有意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将她扼死，那是出了差错的绑架行为，因为她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谈到斯戴芬尼的事情时，法官说："我毫不怀疑，她在被囚禁的头两天或者头三天面临着绝望和生死危险。如果在你看来有必要，她会跟朱莉·塔特一样被你毫不留情地杀死。她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她有令人敬佩的道德勇气和朴素的性格特质。"

4天之后，在约克郡的富尔苏顿监狱里，迈克尔·山姆从他的囚室里带出一个口信，希望能够见一见西约克郡的刑警。包勃·泰勒去了一趟，不知道那是不是游戏的一方抛出来的另一枚骰子。

山姆坐在桌子对面，承认从来都没有一个"朋友"存在过。他于1991年7月10日下午6点在他的车间里杀了朱莉·塔特。他说，他一直都想杀掉她，而他一直都准备让斯戴芬尼回家去的。

14 掩蔽行动3

莉西·詹姆斯把自己最大的私生活秘密透露给柯林·斯塔格了，她承认自己参与了对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孩子的祭祀谋杀活动。她现在等着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警方的怀疑是正确的，我并不指望他会在这个阶段公开承

认杀死了拉雪尔。我告诉佩达说,如果他觉得自己编造一个杀人故事能够骗莉西上床,那他有可能会这么做。同样,这也能够起到检验作用。如果她向警方报告,他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风险,但他会明白再也不能够信任她了。

他们见面的几天后,斯塔格在一次电话中透露说,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跟一个表亲一起杀了一个小姑娘,还把她的尸体藏在汉普厦南边海岸的新森林里了。

佩达给我打了电话,开玩笑说我和斯塔格一定是串通好了来玩警察的。

我们安排了一次会面,是在阿诺尔德洛奇,谈谈事情应该如何发展下去,也为莉西准备下次与斯塔格会面的事情。下次会面计划于6月4号在海德公园进行。

"你必须尽量减少对尼克尔谋杀案的明显兴趣,"我告诉她说,"而且要强调你因为透露了自己的过去而感到很不安全。你已经对他讲了一个秘密,是非常珍贵和易受攻击的一个秘密。"

"他讲的那个在新森林杀死一名女性的事情怎么办?"

我看着佩达,佩达点头。

"我们检查过了,那是个编造的故事。"

"好吧,莉西,你得带着怀疑的态度处理此事。别怪他撒谎。哪怕这事是真的,他所描述的那件事情在规模上跟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完全不相称。这件事并不能够自动地证明他就是你想献身的一个男人,也不一定就是能够满足你要求的一个人。"

"同时,你应该问一些关于假定的谋杀的事情。问他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感觉如何,让他明白你需要知道他的经验是否真的能够跟你的经历达到同样水平。让他习惯于谈到一些细节。"

"为什么?"佩达问,看上去很惊讶。

"因为这个方法会使他习惯于回答莉西的问题。如果他最终透露自己是拉雪尔的杀手,那么,莉西问她很多细节问题,以证明确有此事时,他就不会感到很惊讶了。"

跟计划的一样,莉西讲出了以前那次"谋杀"的细节,并强调说她希望知道完全真实的事情,她并不想要柯林只说一些逗她高兴的事情。她在自己的信中再次说明了这个想法,并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

的电话中也是这么说的。

从他们通信的早期开始，斯塔格就一直在请求莉西把她自己的一些性幻想写给他。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在回避这一点，让他带头说出所有事情，但是，现在，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她并没有往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斯塔格的意思，而且还暗示出他怀疑她的诚意。

在6月23日的会面当中，我对佩达提出建议说，让莉西提供一份幻想是合适的，但这个幻想必须完全根据斯塔格已经介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内容。最重要的是，莉西不应该使已经介绍进来的生理和性暴力活动升级。她的幻想应该反映出斯塔格用过的语言和描述风格，而且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反映出他已经寄给她的实际的幻想。

讲清楚这些指南以后，我让佩达和他的小组进而起草具体的文字。

莉西最终描述，在一个火热的夏天，她跟斯塔格一起在草地里手牵着手走过。他们开始激动起来，然后接吻。

你的手摸到我的乳罩上来了。我的乳房现在开始变形，它们想要彻底放松。你急于将它们释放出来，因此把乳罩都扯破了。这使我更加激动，我的两腿间已经感觉到了特别的湿热。我抓住你的T恤衫，掀起了后半截让我的手从你结实和肌肉发达的后腰上摸过去。我的内心充满了动物一样的狂热，并开始求你塞满我的全身。你要我闭嘴等着，你有其他的一些点子在酝酿中。

这封信继而描述这次性活动为一名年轻妇女所中断，她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她也兴奋起来，并接受斯塔格的邀请加入游戏。然后，他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刀子。

我吓了一跳。你手上拿着刀子。看见你的手放在两把极不相同的刀上真让我感到害怕。你从我一脸惊讶的表情上一定能够明白……

你走到我们身边来，并对那个女的说："吸我。"她看看我，然后你

和她就不再需要人来请了。她跪下去，开始舔你。你握着刀子靠近她亮闪闪和发硬的乳头，然后用刀子在上面慢慢地转圈子。她的乳头旁边印出了浅浅的月芽形。它慢慢地变黑了，然后一圈血迹开始滴下来。她几乎都没有看见，她在你的阴茎上大饱口福……

跟安排好的一样，这个幻想几乎是以前做过的游戏的翻版。斯塔格介绍了林地的背景，介绍了刀具、还有第三者以及滴血。他也用过那样的语言。

斯塔格确信莉西有诚意，而且明显因为他的信件而感到兴奋了，他很快就安排了另外一次见面，是在海德公园，时间是 6 月 29 日。莉西坐在戴尔咖啡屋里念着他最后的一封信，他慢慢有些不自然了，因为他担心旁边会有人听见。

他请她跟他一起度周末，说他们可以去一些地方，比如温布尔顿公园。莉西假装最后才终于明白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啊，怪不得你一直在说你为在那个公园里的事情而被逮捕的，是不是那件事？就是说在温布尔顿公园发生的一件事，是吗？”

“是的，是去年发生的。”

“啊，我不知道你自己在信件里谈的是那件事，我还以为，怎么说呢，我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报纸上全都登过了。”

“啊我明白了，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事听上去有点熟悉。可是，嗯……”

“是的。”

“你是说，你离开那个地方不远？”

“不远。”

“啊，你认识她吗？”

“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你知道的。她据说经常去那个地方，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她。”

“这一切真是极有趣，是不是？”

“我以前曾看见过跟她一样的一个人，她在那边的一个大池塘边裸体晒太阳。”

“是吗。”

"那边有个很大的湖，你知道吧，还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嗯。"

"我对警方讲了那件事。有可能就是她吧。但又不是很肯定。因为她个子很高，有点瘦，金发，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

"啊，那可真是有意思了。你知道谁干的吗？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不，不知道。"

"说吧，你一定知道的。如果你一直住在那边的话。"

"很多人都住在那边的。"

"我倒想见见这个人。我倒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你不会吗？他现在一定撒手不干了，我想的话，他一定在大笑。"

"嗯。"

"他们问你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警察？"

"是啊。"

"啊，很多事情。一开始他们对你不错，问到我的生活，还有那一类的事情，然后就开始是些烦人的问题了，你知道吧，问这样的一些问题：'你为什么要杀她？'我就说：'我没有杀她，''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在那边看到过她。'我跟向你描述的一样向他们描述那个女的，还说有可能是她，但我不是很肯定。你明白吧。"

"可是，实话对你说吧，他们觉得我现在还在干那样的事情。我被警察弄得很烦了，啊，星期一法定休假日，5月31日。"

"我倒希望你干了那事——因为我知道你已经侥幸逃过去了，那是非常聪明的。但愿是你干的。操他妈的！"

"关键在于，事发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是吗？"

"是啊，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我害了一场病，你知道吗，想增加一点体重，然后……"

"是啊。你当时在场的时候看到过那一类的场景没有，假如事发的时候你在场的话。"

"不，这就是麻烦所在，你知道吗，因为当时那里有些很大的山……"

"是啊。"

"事情发生在山的一面，而我当时在另外一面，你明白吗，当时很……"

"什么，你是说同时发生？"

"是啊。"

"我的天。"

"当时，我头疼得不行，要炸开似的，我无法把狗带到太远的地方去，否则，我一定就走到那边去了，你知道吗？"

"啊。"

"我只想再回家去睡一会儿。"

"我的天，你差不多就可以看见了，不是吗？"

"是啊。我本可以看着他干那事，然后跑开的……"

后来，莉西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看到他，或者看见他干那事？"

"是的。是啊。"

"比如，比如说他强奸了她，他还干了很多事情？"

"是啊，他干了很多事情，是的。"

"还干了肛交？"

"他还差不多把她的头割下来了。"

"是吗？"

"是的，他捅了她49刀，他们说。"

"啊，我的天。"

"因为我去接受问讯的时候，警察还让我看了照片。"

"你看见她没有？"

"是啊，看见了，看上去，你知道吗，她光着身体，而且，你知道，啊，地上到处都是血，你知道，草地上都是血。"

"我的天，你还得非常小心，不能够说出一切来。"

"因为他们以为，如果他们让我看了照片，一定就会突然崩溃，然后说，好吧，我干的。你知道吧。"

"他们并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有多么坚强的脑袋。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这样的事情，先生。"

"是啊，因为我意思是说，当他们逮捕我的时候，他们搜查了我住

的地方，因为我有三间卧室，而且……你明白吧。”

“是啊。”

“在其中的一间大房里面，我把它全都涂成了黑色，我有所有那些巫术题材，墙上也都画满了，而且，你知道，他们一看见就说，是啊，就是这样的，我应该是干了那件事情的人，你知道，他们坚信不疑，你知道。”

“你看见照片的时候，她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

“嗯，他们给我看的照片是，她躺在地上，是草地上吧，你知道，就像个孩子似的，那一类的样子吧。”

“啊，是啊，是吗？”

“她看上去……啊……但是，照片是从她后上方拍的，她的头看上去有点圆，草地上到处都是血什么的。她完全光着，啊，从那个角度看上去，我可以看到她的阴道，还有，你知道吗，她完全张开着，他一定是强迫她张得开开的。当时，他一定是在杀她，当时。还有，我不知道肌肉什么的，你知道吧，她尸体上的肌肉，就是让她一直张开的样子。事情在于，你知道，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都勃起来了……”

“是吗？啊，我的天，我希望他们没有看见你勃起来了。”

“不，不，因为当时有个桌子什么的，你知道。因为他们一直在录音什么的，警察一般都是这么干的，啊，我说的一切话他们都录下来的，你知道吗，他们想从里面听出两重意思来，你知道——”

佩达和他的小组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可以证明犯罪意识的证据。斯塔格的确看到了一张照片，是在警方早期调查他的时候看到的——是单张照片，专门选择来显示拉雪尔的尸体，但又保证不显露她被杀死的任何一点细节。

那张照片是确定场景的照片，显示拉雪尔光着身体蜷缩在草地上的样子，下半身接近镜头。照片没有显示她的脖子、手、脸或阴部。斯塔格描述过伤口，还有其他一些细节，警方认为那不是他能够从照片上看到的东西。

他描述拉雪尔差不多给人割下头来，哪怕他不可能看到她的脖子。他说她像婴儿一样躺在草地上，他能够看到她的阴部，说：“大开着，你知道，因此他一定是强行掰开的。”

这个描述形象准确地符合拉雪尔肛门的状况，但是，如果仅从第KP27号照片上来看，斯塔格不可能知道这样一个细节，除非那是猜测。他提到了她的阴道而不是肛门，但是，没有性经验的人经常会把两者搞混，并在他们的意识里将两者混在一处。同样，他描述拉雪尔“张得开开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意识到人在死亡之后肌肉不会收缩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拉雪尔的肛门仍然是松开着的。

斯塔格说看见照片时产生了性冲动，这完全符合他已经显示出来的极少见和严重性变态的特点。

佩达的反应是既高兴又松了一口气。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希望展开一次行动，让疑犯在这次行动当中自我排除，因此能够节省时间和金钱，或者会让疑犯进而自己承认犯罪事实。虽然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但是，我能够感觉出来，这位刑警已经在上司那里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得以让此次行动得以进行。他安慰我说，这个决定已经得到大都会警察局最高层的批准，我的理解是已经得到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的同意。

现在根本不存在行动是不是继续下去的问题。因为已经有了很大突破，佩达仍然希望斯塔格会进一步向莉西透露更多内容，或者导致警方找到凶器。

可是，一个星期之内，他的立场因为一个全国性的报纸故事而受到极大震动。在《星报》的一版和两个内页中，是记者采访柯林·斯塔格的记录，标题是“我并没有杀死拉雪尔·尼克尔”。在里面，他声称他是无辜的，而警方一直在努力将谋杀行为牵扯到他身上。威克逊、佩达和莉西一齐开车从伦敦向北来我这里，途中，他们到了一家汽车维修站加油。佩达看了看报摊，发现了那个标题。

那是一场灾难。从一开始起，我就向调查人员提出过警告，说外部的公开报道会影响疑犯透露自己的活动，如果他的确是杀人犯的话。曝光不仅仅会使他在自我暴露的过程中提高警惕，而且他还会成为其他一些女人的性兴趣的接受者。而这会使这次掩蔽行动的效果冲淡。

佩达看上去极想上前掐死某个人。“我们这下子他妈的怎么办?”

“使损失减少到最小。”

“我洗耳恭听。”

我转向莉西：“你应该在电话里直接跟他摊牌。你告诉他你对他编的那个故事感觉倒胃口。他一直并不关心她。你已经向他敞开了内心，并且把自己的私密告诉给他了，现在，他已经让你处在危险中了，因为他现在开始跟媒体接触了。让他确保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次谈话当中，莉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快。斯塔格尽最大努力去赢得她的芳心。他还另外写了一封信，表示因为让她反感而道歉，同时另外编了一个幻想来“鼓动她的情绪”。

他把故事背景定在一个温暖的夏季的夜晚，他坐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放松。他注意到有人从他身边走过，是一个性感的高个子金发女人（莉西），他们就开始在树干上做爱。

另一个男人参加进来，并强行将他的阴茎塞进了莉西的嘴里。同时，斯塔格说他想做个实验，然后从他的衣服里掏出了一把刀。

我又塞进你的双腿之间狠命猛操。你现在两头都给两只肿胀的阴茎钉住了。我一边操一边抽出了那把刀在你脖子周围划。一滴滴的血沾在那男人裸露的双腿上。你正在兴奋地尖叫。他的阴茎从你嘴里弹出来，你就把上面的血舔干净，同时他粘乎乎的精液粘在你的头发和脸上。

寄出信以后，斯塔格还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想尽快在现实生活当中实践这个幻想。这里再次显示出他严重的性变态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是实际的性攻击行为更有力的指示，比以前的任何一份材料都更有力。

7 月 20 号，佩达和莉西在我面前坐下来，这是最后的几次见面。莉西和斯塔格将在第二天再次去海德公园见面，我们在一起讨论策略。文章发表之后，莉西再次建立起友善关系，她现在必须结合积极的吸引和合适的保守来对付了。

这是他们第 4 次见面，我知道她现在要拒斯塔格于千里之外是越来越困难了，尤其是他的性欲一定已经开始高涨了。

第二天早晨，在11点35分，莉西悄悄打开录音机并与斯塔格一起坐在戴尔咖啡厅。最后，她终于把握机会把话题转到了拉雪尔·尼克尔的凶杀案上，斯塔格也就描述了他在警察局被关押的三天里发生的事情。他说当时，警察"只是在想办法拖垮我"，不利于他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数名妇女，她们当时也在公园行走。

他讲故事的时候，双手悄悄伸到桌子底下想摸莉西的大腿。她挪了挪自己的位置，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但不一会儿之后，他的双手又开始动起来。

莉西承认，那个杀人犯让她极感兴趣。

"我老在想那件事。我努力想像，想到那个人我就非常激动。"

斯塔格说："但愿我是那个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意思是说，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内疚，明白吧。那样的确能够让我非常兴奋，从一开始就能够让我感到兴奋。"

"可是，是哪些地方让你感到兴奋的？真正让你兴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看见死尸还是想像它，还是别的什么？"

"是他干的那些事情。因为他真的同时在跟她性交，硬把自己挤进去，就是这样的。"

"他是那么干的吗？"

"他一定是那么干的。是的。可我的意思是说他一定是那么干的。他干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疯了，你知道吧，他操她的时候一定是疯了，因为她被刺了49刀，那类的事情……"

离开咖啡厅以后，他们开始在海德公园里散步。

莉西说："他们没有告诉你他先刺她哪个地方？"

"没有，没有，我知道的一切就是他刺了她49刀，你知道吧，她的头被砍下来了。"

"是吗？"

"是的。"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干，而且真干了？"

"也许就是想把她的头砍下来吧。"

"你说她开得大大的。"

"是啊。"

"什么开得大大的，她的性器吗？"

"是啊。"

"嗯?"

"是的,她的确是的。她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因为,嗯,那个照片就好像,啊(他调整姿势,直到自己向左侧躺在地上,头向后仰着,膝盖拉起来,胳膊放在一侧,双手合在一处,就好像祈祷的样子)。她就是那个样子的,就是那个样子。"

"什么东西扔在她旁边?"

"是啊,她的头就那样吊在她身旁(他又将头向后仰过去),你知道,因此一定是割掉一半了,但照片是从后面拍的,你知道吗(他指着自己的后背)?"

这次他又详细描述了拉雪尔尸体的情况,而这是他看到的单一一张照片里面不可能透露出来的细节。尤其是,他说明她的双手放在什么地方,而且是手掌合着手掌,但是,标有 KP27 的照片并没有显示出她的双手。

斯塔格还重复了凶案发生时他也在公园的叙述,但又专门说明他不是凶手。

我一开始便为此次行动设定的时间上限已经达到,在我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掩蔽行动也该结束了。在有高级警监、刑警和我本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斯塔格现在不太可能向莉西承认了,哪怕他的确就是杀手。同时,考虑到《星报》文章的情况,他有可能发现有很多女性愿意跟他联系了。

为了不弄坏已经掌握的材料,大家决定结束掩蔽行动,并让莉西·詹姆斯退出。这件事情必须小心进行。因为警方现在越来越相信斯塔格应该受到谋杀罪起诉,所以,莉西必须以某种合适的方式断开联系,以便使激怒斯塔格并刺激他再去杀别人的风险降到最低。

最后一封信于 1993 年 8 月 10 日发出。第二天,我去了专案室,佩达告诉我说,已经达成一个决定,要逮捕和起诉柯林·斯塔格。来自警视厅的高级律师已经看到材料,并认为已经有足够证据形成起诉案。

我和佩达讨论了问讯方面的事情,我们都估计斯塔格会立即要求请律师,并采取"无话可说"的办法。斯塔格于 8 月 17 日被逮捕,当时在温布尔顿警察局引起了很大的激奋。许多警官在这件案子上

已经花了一年多时间,现在都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其间,特别行动小组的代理组长还专程前来表示祝贺。他大步迈进大门,一身有花饰的警服光灿灿的,然后转身对佩达说:"我们脸上再不会因为此事而挨臭鸡蛋吧?"

"相信我。"基斯说,根本都不愿意考虑一下失败的可能性。

布鲁斯·巴特勒是警视厅派来的特别案件律师,他说,他需要我出具一份声明,显示该掩蔽行动的正直动机,并解释它如何设计用来导致使该疑犯牵连在内或自我排除。他向我解释了本案敏感的地方和有可能形成先例的性质,这意味着文字工作必须做得完美,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应该有所考虑。

我不是律师,因此不知道他的话里面所含的法律上的困难,尤其是有可能出现辩方动议,认为掩蔽行动期间取得的证据不可接受,因为里面涉及警方圈套,或者涉及未加警告的问讯。我从一开始就得到保障,说这一点不成问题。

"里面涉及高层政策讨论,"巴特勒解释说,"这个问题一直会捅到最上层。"

"谁在最上层?"我问。

"本案处在首席检察官特别案例表的顶层。这个特别案例表每周进行一次审查。"

我记得我问过佩达,如果证据被判不可接受会怎么办。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接受过最好的咨询。相信我。"

我再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那不是我的事情,也不是我的责任。实施掩蔽行动,并最终起诉柯林·斯塔格的决定是这些人做的——那是他们的表演。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我参加了警视厅和代表皇室的政府公诉人的一系列会议。因为已经处在羁押状态,斯塔格将一直留在拘留所,直到新年后再接受地方法官在调查庭的调查。

我原本想过上更安静和正常一些的生活的,但现在,这样的梦想和愿望正在快速破灭。哪怕我于10月份休了几个星期的年假,表面是因为我儿子的婚礼。但是,这个假期还是因为一些新案子而被扰乱了。我被7岁的尼基·艾伦谋杀调查案耗费掉很多时间,他在森德

兰市维尔加斯区被人刺伤并毒打致死。在别处，我正在调查发生在伊斯林顿和伦敦北区的一系列强奸案，另外还在协助坎布里亚郡来的刑警调查一系列猥亵电话案。

15 萨曼莎——她几乎给人切成鱼片了

有些犯罪会捕捉住公众的想像力，而另外一些案子会随着其他新闻事件的出现而销声匿迹。一般来说，如果受害人年轻漂亮，而犯罪行为尤其令人发指，则这样的案件受公众关注就很容易理解，但是，这并不能够解释萨曼莎·碧塞特和她4岁的女儿佳丝明的死亡没有在1993年最后几个月引起轰动。

凶案发生一个星期之后，我与大伦敦市警察局的警督米基·班克斯第一次在伦敦东南部见面时，他问我的就是这些问题。公众注意力有可能成为一桩刑事调查案的命脉，尤其是当一桩犯罪行为非同寻常，而嫌疑犯又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班克斯并不想让人听出自己冷酷的一面，他抱怨说："那些杂种（媒体）还想要什么？我们这里有一位可爱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被人以可怕的方式杀害，而他们却毫不买帐。这样的消息应该在全国各地到处都登才对嘛。"我明白他的困惑。我很少使用"可怕的"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如今用得太多了，已经变成了一般的词，不太重要，而萨曼莎和佳丝明的死亡是真正可怕的，杀死她们的人必须尽快逮捕。班克斯和基斯·佩达是朋友，佩达曾提起过我在拉雪尔·尼克尔谋杀案中所做的一些工作。这就是11月9号班克斯打来电话，并约我于次日会面的起因。尽管他描述了方位，但我还是费了很大劲才找到泰姆斯米德警察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警察局，看上去像是波特卡宾活动房屋，或者像一所破中学。看上去它是草草拼凑而成的，四周围着很高的铁链做围篱。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班克斯一定要我把车开到警察局里面去，否则就有丢失的可能。

"你好，保罗。你迟到了，"他说，口气里面没有一点批评的意思，"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吗？一路可好？能够找到我们我还真是高兴。

你的车在哪里？想要一杯茶吗？糖？牛奶？"他一路说个不停，我们就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前，上面挂着手写的一个标志，是"警督办公室"。班克斯已经50多岁了，脸上皱纹极多，额头上纵横交错。他并没有多少客气，外衣一脱，袖子一卷，然后就点上了一支烟。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种惯于行动的警官，并没有多少时间用在官场的套路上。这样的人是从他的同事当中赢得尊重的，因为他总跟他们混在一起，甚至比大家更辛苦地工作。

屋子里面的烟雾多于空气了，因此，为了照顾到我，他打开了一扇窗户。

他问我："你要什么？"

"你有什么就给我看什么吧。"

"有位母亲和她4岁的女儿被人以血淋淋的方式杀害，"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样的事情你并不是经常听说，我也不想再看它了。萨曼莎·碧塞特和她的女儿佳丝明住在普鲁斯泰德的一间公寓里。她们的尸体是上个星期四早晨(11月4日)萨曼莎的男友发现的。我们对时间顺序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作为嫌疑人他已经被排除出去了。"

班克斯抽出一本犯罪现场照片，快速翻到远景照："我可以告诉你，场面看起来吓死人，摄影的人从此之后就不再干活了。萨曼莎被人刺死，而且肢解了。这就是我们发现她的时候的样子。"

那个场景看起来几乎是超现实的。一位年轻妇女的裸尸躺在地上，整个躯体全都割开了，胸腔全都剥开，内脏全都露出来。种种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我感到五内俱焚，恐惧、悲伤和难以相信。我以前看到过数十桩犯罪的现场照片，每一张照片都刻在我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怀——但是，这一桩罪案的照片太不一样了。它就跟静止舞台照一样，就好像有人屠宰她，剥开她，仅仅是为了变态地展示她，就好像显示自己的屠宰术一样。

一个世纪以前的杀人者杰克一定会为这份活计叫好，我想。我曾看过他的受害人的一些照片，尤其是最后归咎为他做的案子的其中一张照片，那人是玛丽·简·凯莉，她最后的死相跟萨曼莎·碧塞特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一个世纪以前专门在怀特恰帕尔杀妓女的那个人是在逃跑之前残酷而迅速地剥开妓女胸膛的。杀

死萨曼莎的凶手是慢慢剥的，他慢慢地品味自己的艺术佳作。

这是一幕戏剧表演，但是，最令人叫绝的是，尸体的四周一点血渍都没有。这使我想到了第一个问题。

"在哪里？血在哪里？"我问。

"大部分伤痕都是死后产生的。"班克斯说，同时转向下一张照片。一大滩血迹沾在客厅的地毯上。"我们觉得他是在大门附近杀死她的，然后将她拖到了客厅。四处都没有撬动的痕迹，她的锁具也都完好。已经对整个公寓进行了彻底搜索，没有发现任何有物品被偷盗的证据。"

尽管他是在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但是，班克斯并没有多说话，他只是快速地翻动她被发现时的照片。他指着厨房的一个有血渍的鞋印——那是整个屋子里惟一一处有被翻动过和搞乱的地方的痕迹——然后，他指着卧室的全景照。

我仔细看过之后才注意到房间左边角上的双层床被子里伸出来的一个小孩子的头。她脸朝墙侧卧着，就好像在做梦一样，梦见所有儿童都会梦到的那些东西。

但可悲的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佳丝明被剥光了衣服，受到性攻击，然后又套上了衣服，放回床上，并用枕头闷死了。什么样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情？他是从地狱的哪个角落爬出来的？这些问题也是米基·班克斯想知道答案的，同时他还问我凶手下一步还会干什么。他带我到了专案室，介绍我认识其中一部分专案组的成员，并解释已经开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行动。警官们在附近的街道进行逐户的调查，另外一些人在调查萨曼莎的朋友、过去的男友和她直到死前的最近几天的活动。

她最后一次为人看见是 11 月 3 号星期三，当时她去幼儿园接走了佳丝明。她匆匆忙忙地步行赶去，正好于下午 3 点 30 分赶到。然后她和佳丝明坐一辆小出租车回到 1 英里半外的家里，是普鲁姆斯泰德区西斯菲尔德台地一排房屋的一楼的一间公寓。

理查德·伊兰姆自 1991 年初以来一直是她稳定的男友。他告诉警察说，周末他在萨曼莎家里过，有时候，其他日子也去，但他主要还是在肯特郡西得卡普附近他父亲的家里住。他最后一次看到萨曼莎是星期三中午 12 点 45 分，他是在这个时候临时到这里来打开公寓

门的。他们两人都很高兴,准备于11月11日带佳丝明去冈比亚度假的,而且一直在谈旅程的事情。一个小时后他离开了,步行去上班,是在一家化工染料厂。

星期四,伊兰姆早晨8点30分醒来,之后去了银行和药房,再后就搭51路车去了萨曼莎的公寓。因为没有人开门,他就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了,一边还喊着"喂"。他注意到地毯上有一块黑的,以为是什么东西泼在地上了。走进客厅以后,他发现萨曼莎半盖住的尸体躺在煤气炉前面。他到了卧室,以为佳丝明一定在睡觉,但意识到不可能,因为她睡得太死了。

"我们并没有将他排除在外,"班克斯说,他又抽上了一支烟。

"他是父亲吗?"

"不。那是在新汉普夏郡与一名新时代旅行者怀的孩子。我们已经与他联系上了,并且正在调查他的不在场证据。"

逐户调查还显示,事发几个星期之前,当地出现过一些不熟悉的车辆和不认识的男性。邻居报告说,星期三晚10点30分和11点之间隔壁公寓里有男女争吵的声音。两名证人报告说听到公寓附近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妇女之间的争吵。

伊兰姆曾告诉警方说,事发一个星期之前,萨曼莎曾告诉他说,有天晚上上床时,有个男人从窗口偷看。还没有等她看清楚是谁那人就跑远了。

苏珊·迪尤尔家的房子正好可以看到一楼的这套公寓,她回忆说,11月4号早晨3点她被一声短促的尖叫声惊醒。她从自家窗户朝外看去,看到萨曼莎家的灯都亮着。两个星期之前,她在家熨衣服时,看到一名男子从她家后门瞪着她看。她描述那人很吓人,而且眼光锐利。

在目前这个阶段,几乎不可能说哪些细节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我只是将所有细节都收集起来,最后才能够慢慢加以甄别。同时,我希望去那个公寓看看。我们开车过去,将汽车停在郡议会开发的一些小型低层公寓后面的死胡同里。一排很陡的水泥台阶从路边沿着那排建筑往下,直到1号公寓的大门前。在这之下,地面陡然向下落,直到有数处房子的一个花园前,然后,地面再次升起,形成有草的一道土梁,这个土梁上面有五六栋高层公寓,正在萨曼莎的公寓和

西斯费尔德台地之上。

警方已经在门前装上了很大一个木头和钢制门。要打开这道门需要很大的力气。客厅的灯打开后，我看见左边的卧室走道和右边的厨房之间的地毯上有很大的血渍。附近有一块纸板，上面也有溅上去的血滴，是从门上滴下来的，但是，那些血滴都很淡薄，而且透明，就好像是从湿手上滴下来的一样，我想。

那是很小的一间公寓，很挤，没有存放东西的空间，但是，尽管如此，里面的东西都还是码放在角落和门后，看起来很整洁，而且有其目的。衣物仍然挂在暖气片上，没有任何东西看上去是经过搏斗之后倒下来的。同样，里面没有任何搜查或者抢劫的痕迹。

我从一个房间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对房间的布置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还做了一些笔记，说明哪些窗户是开着的，偶然发现了哪些东西。窗台上有什么东西被打乱了吗？有什么东西移位了没有，甚至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比如浴室里挂在链子上的一个插头。进入卧室以后，我看到一个儿童用高低床，在左边的角上，在床的下面，也就是呈对角的地方，有一块全床大小的床垫，上面的被子都掀开了，就像某人刚刚起床一样。这是萨曼莎曾睡过的地方。佳丝明的玩具四处都有，排在窗台上，堆在角落里，还有柜子里，连隔板都压弯了。

走廊里的拖动痕迹显示萨曼莎的尸体是如何被人抓住脚踝拖到客厅的煤气炉跟前的，她的屁股下面还有很大一块垫子。房间一角的一块垫子有可能是个备用床。窗上和阳台门上很大的竹制百叶窗已经放下来了——根据邻居的说法，那是萨曼莎从不操心去做的事情。

在厨房里，衣服和床单从隔板上取下来了，散落一地。在这里找到了脚印，还有厨房水槽上的血痕，那也许是凶手洗过手的地方。微波炉的门开着，板凳上还有杯子。刀架上缺少一把刀子，另外有一把插反了。

“你觉得他是如何进来的？”我问。

班克斯以前看过这公寓，他很快就找地方抽烟去了。“跟我们一样，”他说，“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骗人进了大门的。否则，那一定就是她认识的某个人。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他是在大厅里攻击她的，这

才有意义。"

我走到外面，抬头看看阳台，判断了一下高度。然后我转身，看看正对着西斯弗尔德台地后面有草的那个护坡，估量了一下可能性。

班克斯点着一支烟："你为什么不认为她会请他进来？"

"有可能。我只是觉得这类人自有安排。"

回到警察局以后，我开始收集各种声明、照片和尸检报告的复印件。很快可以明白，班克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怀疑萨曼莎认识这名杀人者，也许还估计他会到她那里去。一位住在楼上的邻居以前曾向社会公益部门报告过她，因为她总有客人半夜三更来访。

"我们觉得她有可能在玩一种游戏，"他说，一边还迅速翻动他桌上的一堆文件，"不是很成功，差一点而已——刚刚开始。"

"是什么使你这样说的？"

"在她的文件当中，我们找到一些信件和报纸广告。头几封信表明她很孤独，在寻找朋友。"他递给我一批分类广告的复印件，是登在《格林威治及艾尔泰姆信使报》上的。其中一份广告上面已经划上了圆圈："单亲母亲，27岁，需要朋友。我诚实，可靠，有艺术气息，以前当过嬉皮士，吸过卷烟，不吃肉。"

"那还是1993年早期的事情，"班克斯说，"这些广告在当年稍后一些时候变了。她有可能没有钱花了。其中一些发表出来，另外一些被拒绝登载。我们找到了草稿，文字是她自己起草的。"

他让我看一份分类广告，是拿在《伦敦周报》广告栏目中的，时间是9月8－14日：

"高档，高个子、性感的金发陪伴女，27岁，极希望听到慷慨男士的回音。只需要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所有信件皆复。"

登在另外一份交友杂志上的广告说："年轻性感的长腿金发女郎，需要一位可爱的绅士，有多余的钱可支付小孩子上学费用，可提供定期秘密的幽会，无附带条件。无住处。真实消息。"

她还给一家拍照和录像杂志写过信："秀色可餐，极肉感的金发女郎，适合当女性模特儿，26岁，可为业余和专业摄影人员工作。绝不说谎浪费时间。"

那些广告出现在伦敦的一系列免费宣传单和报纸上，根据一些

朋友的说法，结果萨曼莎接到很多令人不安的电话。班克斯派了一大批刑警去查电话记录和地址，希望找到任何与她接触过的男子的蛛丝马迹。偶有证据表明，萨曼莎有时候还与她在报纸上个人栏目里读到的求偶男士广告联系。

我在公寓里看到的某些东西开始产生意义了，但是，在我确信之前必须了解更多有关萨曼莎和她的生活。班克斯解释了很多细节，并保证为我找到一份来自她母亲玛格丽特·莫里森的证言，她目前因为刺激太大而正在服用镇静剂。

萨曼莎是一位画家的女儿，出生在苏格兰的敦提市，但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和赫特福德郡的赫默尔亨普斯泰德附近度过的。她父亲在她14岁那年去世，她和母亲就一起回到了苏格兰。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言善辩，显示出她父亲的一些艺术天赋，梦想着要去上艺校。但是，她在伦敦生活了很久，发现苏格兰的生活太拘束了。她有英格兰口音也无济于事，她很难在那里交上朋友。

她失望和不快地离开学校，对她的传统中产阶级背景产生了反叛心理，成了新时代旅行者，大部分时间在各种各样的嬉皮村落和"和平护送队"里度过。她是个极不安分的人，几乎像是60年代鼓吹爱情与和平的一群年轻人一样，她试过各种各样的毒品，穿的衣服飘飘然，头发长得没法收拾。

萨曼莎跟另外一个旅行者怀上了孩子，她跟母亲写信时谈到了他的一些品质——受过很好的教育，父亲是位律师，母亲是位教师——就好像是说那就是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父亲，但他们永远没有成为夫妻的可能。

佳丝明出生在伦敦，玛格丽特南下伦敦帮萨曼莎找个住的地方。她在普鲁姆斯泰德的那间公寓住下来，孩子慢慢使她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佳丝明的身上，在费用上毫不吝惜，整天带她出去玩，或者去公寓外面的草坪上玩。除开大量的玩具以外，还有佳丝明在几乎所有的门和墙上画的画。

身为人母之后，萨曼莎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哪怕她仍然还是穿飘飘扬扬的衣服，在后花园光着上身日光浴，经常半裸着身体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阳台门不锁，窗帘也不放下来。她每个星期天跟她母亲通一次电话，并带佳丝明去苏格兰度假。莫里森太太已经重

新结婚，她寄了1000英镑给她去冈比亚度假用，因为她感觉到萨曼莎需要鼓一鼓气。

但是，一个对孩子如此关心，有固定的男友，也有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生活方式的人需要为了钱而跟别人见面？而这一点的证据何在？答案可以在佳丝明的屋子里找到。虽然这间市议会建的公寓房的其他部分极其简陋，到处都需要重新涂漆，需要贴墙纸，但是，这个孩子的卧室看上去却像是圣诞老人住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和游戏器具。根据她男友的说法，萨曼莎准备为佳丝明奉献一切，为了替她买玩具不惜饿肚子。

她很关心孩子的教育，并谈到要搬到教育更好的地方去住。她靠单亲母亲救济金和她母亲的支助过生活，有时候对自己的财务状况非常忧心。一开始，她考虑去当模特儿让人画像。她还给在杂志上登广告寻找新人才的摄像师回信。当这一切都不奏效时，她就开始去找个人栏目了。

我想这是个天真的少妇，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正在寻找的东西里面有多少危险的成分在里面。她是那种极易勾引或者很容易参与下流摄影的人，根本没有那种社会经验看到眼前的危险。

同样，我也看出她并没有当真卷进卖淫业。如果是这样，这个公寓里就会留下卖淫者赚下钱财装饰房间的痕迹。萨曼莎的漂亮程度足以找到一个能够照料她和佳丝明的男人，但她仍然生活在非常简朴的公寓里，根本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她有普通的朋友，衣服都不贵，她母亲还必须为她的冈比亚之行提供费用。

所有这些告诉我，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妓女，因为她没有街头人的狡猾或无情的一面，她本可以借着自己的外貌赚到很多钱的。我觉得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她对未来有那种似是而非的浪漫理想，而且还在想像一下子坠入爱河的事情，跟一个极成功的男人结婚，还会给佳丝明最好的教育和培养。

在我见过的所有犯罪现场当中，没有哪一幕是我不能够以时常浮现的细节一一回忆起来的。它们与我同在，就好像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当它们回到我全神贯注的注意力当中的时候，我并不总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萨曼莎和佳丝明就是这样的。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她们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来回闪现，不管我费多大力气将她们关

在脑门之外。

在过去的15年当中，这份工作改变了我。我身边的其他人都能够看出这个差别来，尽管我不能够肯定有多少成分是因为年龄增长引起的，也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每天接触到的材料引起的。如果你看看现在的我，相对而言我就是个安静和不太出声的人。我这人一向都比较保守，但是，我怀疑十多年前我是个更外向和更能够交结朋友的人。大部分人会说，我以前很开朗，也更容易与人相处。

艾玛和艾恩经常拿我不太冒险的天性开玩笑。我们在过去10年里一直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我认识村子这边的邻居，却不知道另一边的邻居的名字。当地的酒吧不到一百码远，但我仅只去过十多次，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艾恩拖着去的。艾玛常常拿我说事儿，说我去当地邮局会迷路。

我不觉得自己不善社交或情愿独处。不幸的是，我生活的现实就是，我在别人贫困、危险或者受伤的心灵上花了太多时间，因此，当我回家在熟悉的安乐椅里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只想着暂时回避一切，我想离家人更近一些，并努力遗忘一些东西。

我毫不怀疑自己从信仰当中找到了很大的力量。我知道许多人会想，你见到如此可怕的事物，怎么能够相信上帝的存在呢？我一直在努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信仰本身并不需要解释或者辩护。

曾几何时，我产生过一些疑问，而且如果我有机会再次选择，我不能够确定自己会再次选择同样的一条道路，不一定再来当一个法庭心理学家，如果我意识到有这么深的痛苦和不安，我就不会再去选择它了。这听起来有些自怜自惜的意思，但是，我说这话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凌晨一点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些想法，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眼前一个4岁女孩子死后的照片。

同时，这痛苦又会受到一种冷冷的愤怒的影响，这股愤怒在我心里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干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的人从街上清除出去。"我就是在这两种感情之间找到平衡的。我看着佳丝明尸体上的铁青色印迹时，一些问题就开始产生了，这表明重力的拉动引起血液在人死后身体的最低点凝固下来。发现她的时候她是趴着睡的，但铁青印迹的其他分布模式表明，她死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处在不同体位的。她为什么会被人搬动呢？

其他一些事情也引起我的怀疑。我注意到她的内裤上有血，是性攻击的后果，但血渍的分布似乎有事后替换过的痕迹。她的长裤上还粘有尿液，但是，尿液流动的方向似乎也与她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所保持的体位不太相符。这样一种可能性极大：在性攻击期间她的膀胱已经失控，而尿迹表明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可能保持着坐姿。可悲的是，这清楚地表明，她与凶手之间有更复杂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凶手在她睡觉的时候对她实施性攻击，然后用枕头闷死了她。

根据照片拍摄的顺序，顺着走道来到客厅，我看到萨曼莎的胳膊在她头上伸开，屁股下面垫着很大的一块垫子。她穿着沾满血渍的睡袍，右肩处有三处刀口，还有一双暗蓝色的袜子和乳罩。她的上半身和脸被睡衣盖着，还有从厨房的衣柜里抖出来的床单和各种衣物。

不同的一层材料从她身体上揭开的时候都有照片拍下来。他将她从脖子底下一直到耻骨的体壁切开了，一直割到内腔，刀口参差不齐，然后在她的胸腔前横过，躯干全被剥开，并以足够大的力量将肋骨架全部折断了。

米基·班克斯和他的同事说这个凶手“狂乱”和“失控”，但他们都错了。这里面没有乱砍或失控的猛刺行为，跟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人不一样。对照而言，这是非常准确的外科或解剖探索。对她来说，刺杀已经是最轻的一种暴行了——她几乎给人切成鱼片了。

在某个时候，显然还准备将她的双腿卸下来的，但刀子此时显然已经钝了，而凶手又没有那种解剖学知识将一个关节剥开。

因为萨曼莎是在门厅里死亡和出血的，因此客厅里没有血。但是，这意味着沙发上的单独一块血渍非常显眼，而且使我感到困惑。我在想，他是不是坐下来看了看自己剥出来的手工活计，因此而留下一团血渍，或者是说他准备进入房间的时候将萨曼莎靠在沙发上了？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因此做了笔记，准备问一问米基·班克斯，看看她的尸体是否在太平间里重新组装到一起了。

除开几根手指上的小擦伤之外，内政部的病理学家没有找到任何反抗伤痕。他发现萨曼莎死于多处刺伤，其中几刀刺到了心脏，而其他的几处伤口是死后形成的。可能涉及两把刀，都是薄刃刀，非常锋利，约 7 英寸长。

事件发生的顺序一开始令我一点也弄不懂，我开始列出一些问

题准备问米基·班克斯。比如，你能够肯定窗台上的玩具没有动吗？佳丝明的头是在床的右侧吗？萨曼莎的床垫上的被子被掀开了——她是不是每天起床都折被子？除开厨房以外，还有别的证据证明凶手带着血在房间内走动吗？厨房操作面上的咖啡杯使用的新鲜程度如何？电话本是打开的，有没有任何一个电话号码做了标记或者突出来的？厨房墙上有蓝色漆涂上的印迹，佳丝明能够够得着那么高的地方吗？阳台栏杆上有油漆碎皮，是新弄上去不久的吗？是从哪里来的？阳台下面砖墙上的印迹会是鞋擦成的印子吗？

我还记下了很多问题，是班克斯不可能准备好回答的，但是，我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例如，佳丝明身边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拥抱的玩具？她床上的垫子上为没有足印？佳丝明的一张照片也不在墙上了，谁拿走了？盒式放音机的门开着，一只磁带盒放在挡火板上，他是在自己放音乐听吗？

这些有可能只是一些无意义的细节，但是，一切事情都不能够只从表面价值上看，特别是一些进行奇怪犯罪行为的人。例如，跟一个小孩子同处一室，并且墙上有同样的涂漆印迹，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两个人自动就合得来。

12月初，我回头去见班克斯。我们已经在电话里谈过好多次了，他也一直在为我传送新材料。尤其是，我希望问问尸检报告的事情。我坐在他办公室的一片烟雾当中，解释了不同杀人者的精神病理学。在本案中，我看到对一名年轻妇女故意、轻松、几乎是欣快的肢解，还有对一名儿童几乎是偶然的杀害和重新整理。

"但是，我需要更多细节。我希望知道他从哪个地方开始割她的，他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做的。他把这件事情做得津津有味的，为了明白他，我必须准确地了解他到底干了什么。例如，他拿走什么东西没有？"

班克斯说："你什么意思？"

"照片并不能显示她身体上的任何东西是不是被取走了。如果确有其事，那你们在寻找的就是一个猎获战利品的人。"

班克斯看起来惊恐万状："如果的确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法医一定会告诉我们的，不是吗？"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将她还原了，或者只是假定她身上什么也不

缺了。”

我可以看出，班克斯并不喜欢请内政部的病理学单位重新组装尸体的主意，他在寻找更多理由。

“你记得沙发上的血渍吗？”我问，“你想到过那个上面为什么会有血渍吗？”

班克斯点头同意。

我继续说：“我是这么看的。共有三种可能的情景。他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将萨曼莎的尸体靠在沙发上，或者他坐在那里欣赏自己的杰作。但我觉得他有可能将什么东西放在沙发上了——她身体的一部分。”

我可以看出这名刑警的恶心感觉。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他说：“我让他们去查查。”

12 月 14 号写了一篇补充报告，是第一次尸检进行的近六个星期后。那位病理学家写道：“我再次检查胸腔和腹腔有锯齿形切口的伤口，注意到腹壁右侧的一部分，也就是约为 12×10 厘米的一块不见了。”

班克斯有些生气，他不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错过。

但是，这并不会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性肢解和取走战利品的行为并不常见，也是大部分凶案调查人员和病理学家不太了解的。人们甚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一般来说，最关键的事情是要确定死因，在本案中要确定使用了多少把刀子，还有刀子的大约尺寸等。

但是，获取战利品的行为确证了我对这名杀人凶手最严重的忧虑。最后的一批东西都到位了，我现在可以告诉米基·班克斯关于这个杀人者的一些情况，并且讲一讲事件的顺序了。

“这个故事需要一杯茶还是两杯茶才能够讲完？”班克斯问，他要了一些茶。他是个极聪明和说话慢腾腾的人，对自己的工作采取非常实用和实际的方法。他希望了解全部的图景，并尽量多地理解自己的消息来源。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为他感到难过。跟我调查过的其他案件不同，特别是跟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那个引起巨大轰动的案件不同，班克斯几乎是在伦敦东南方的一个穷乡僻壤里工作，得不到大城市警察局的上司的重视。

此案跟尼克尔的案子无法相比，当时，新苏格兰场的高层指挥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关注。媒体的极度关注使破案日程必须确定下来，还有很多有影响力的社区团体在呼吁，尽管有人也说，那是因为案发当时，大都市警察局专员的妻子也在温布尔顿公园。

班克斯在听我解释性变态的本质及其各种表现。这一次，变态的种子也有可能是在此人的婴儿和童年期播下的。

"我会在他的早年生活当中找到变故，尤其是家庭不和的证据，"我说，"在某个时候，他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且很快也成了别人的麻烦的受害者。"

"他带着跟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的一套价值观长大，这有可能使警察或者社会公益部门注意到他，为治理他当时有可能显露出来的心理创伤而进行的所有努力全都流于失败。"

"在这样的童年生活当中，他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本人就是施暴者。"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攻击也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它甚至成了代替说话的方式。猛力迫使别人做自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远较学习一些社交技巧以帮助他们以你的方式看待事物容易得多。

我见过很多病人，他们都是阵发狂暴脾气的受害人，他们讲到压力在内心慢慢积累，就好像有人在用铁钳挤压他们的头脑一样。这样的张力会越积越大，最终必须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一旦施暴，压力就全消了，在一个短时期内，会有一股巨大的放松感，就好像铁钳已经松开一样。

杀死萨曼莎和佳丝明的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积累成了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不被她们看重，而且他的敌意态度还基于这样的假定：如果人们待其不善，倒不如自己先下手伤害他们。这在他对待性和与妇女的关系中也是一样的。

跟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凶手一样，一股愤怒和愤世嫉俗感慢慢形成，而且能够使有能力惩罚、控制和主宰妇女的幻想得到燃料，让她们做自己想要她们做的事情。如果这个过程升级，则幻想会带到现实世界里来，而且予以实施。这个通道不一定是从风化罪到较小型性攻击再到强奸和谋杀行为发展的整齐划一的直线上升路线。罪犯是一些老谋深算的人，也有些是机会主义者，机会来了他们什么事

情都干，只要这意味着今天强奸，明天露阴就行。

理解这一点意味着能够明白机会、性欲和罪犯生活当中的其他因素之间微妙的相互关系，因为他的日常生活也是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丰富的。他有时候也想去看看电影，去餐馆吃吃饭，会感冒，也喜欢某一类型的衣服和发式。所有这些事情的模式都决定了他是谁，他做什么。"是啊，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把一个妇女的尸体割成碎片的。"班克斯怀疑地说。

我解释说，男人对很广泛范围的性刺激产生回应：人们只需要看看今天为他们生产的大量色情产品就可以明白。人们倾向于假定，他们在当地报摊最上层货架的杂志里看到的东西就是色情——光屁股的妇女照片和关于通奸以及淫荡家庭主妇的淫秽故事。

不幸的是，有些出版物专门迎合极狭窄和非常特别的一些胃口，包括处理虐待、暴力和强奸话题的色情出版物，还有最可怕的儿童性活动电影，包括显示儿童作为明显愿意的情人，这些儿童是经过培训和引诱的，还有一些材料发展到显示在这样的儿童在受到残暴的性攻击时明显流露出痛苦的情景。对于容易受到这最后一类材料刺激的人来说，这个儿童的痛苦才是重要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些人幻想得到一些妇女后用作性奴隶，他们要折磨和侮辱她们，最后将她们杀掉或者肢解。有些人的变态锁定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对某些人来说，刺激他们的是全部的场景，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受害人的死亡才是兴奋的内容，正如杀死萨曼莎的凶手要肢解她才会有快感一样。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最严重的性犯罪行为，"我告诉班克斯说，"它看上去有可能不是性犯罪，但是，如果你考虑萨曼莎的伤口就会明白，大部分残害行为都是围绕着外阴和阴道附近进行的，他还从身体的较下部分取走了战利品。肢解是一个成熟性幻想的一部分，这样的性幻想持续了许多年才得以成熟。凶手希望对一名妇女实施完全的控制，除非能够对萨曼莎的身体进行他所完成的那些活动，否则他就不能够达到对一名妇女完全的控制，哪怕他将她转变成性奴隶也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人不是个施虐狂，否则，他会让萨曼莎活更长时间，而且会从她的受难和害怕中得到快感，也能够从他对她的控制当中获得快

感。反过来，他很快杀害了她，然后将他最主要的快感焦点集中在与她的尸体的相互交往当中。"

从一开始起他们就问我说，这个人会不会也是在温布尔顿公园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那个人。两个受害人都是金发漂亮母亲，而且都死得很惨。两个案子当中都有小孩子在场，还使用过刀具。

在我看来，两次攻击行动当中都有一个孩子在场才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所在，而不是一个共同点。在第一个案子当中，阿列克斯对于凶手来说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佳丝明对于那个凶手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性满足目标。同样，普鲁姆斯泰德的凶手所涉及的是更为复杂的一个情景，因为从死后伤残中得到的快感远远大于从实际的屠杀中得到的快感。这里有一种探索和发现的意思在里面，而杀死拉雪尔的凶手只不过是一时狂怒，凶手的愤怒和怨气发泄完毕之后，6分钟之内就住手了。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

班克斯说："你提到他的性幻想是'成熟型的'。他有多大岁数?"

"25岁以上。这不是他第一次犯罪，也不是他的第一次性犯罪。他的性欲已经沿着这条极其狭窄和特别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他一定在以前有较为一般的性犯罪娱乐活动。"

"比如?"

"偷窥、露阴、强暴猥亵、强奸。他也许利用过妓女，或者试图用刀子伤害她们，而不是真正对她们发动性攻击。他甚至还有可能利用交友广告安排与妇女的见面。"

"我觉得你是不是认为他是从阳台上进屋的?"

"我是这么想，但现在还不清楚他是如何知道萨曼莎的。他有可能通过交友广告认识她，然后开始观察她或者跟踪她。这个可能性不能够排除。如果他的确利用了交友广告，那他过去一定跟妓女有过接触。"

我谈到下一个话题，说："没有理由认为他没有正常水平的智力。这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动机都很自信。他想办法搞到了这个地址，而且还在公寓内度过一个多小时时间，但只留下极少可供辨别的痕迹，指明他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和局势的人。他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问题。"我对凶手智力的判断跟他的认知功能而不是精神状态或者任何可能的人格障碍相关。人们经常会犯这样的一些错误，他们假定

某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一定有精神上的毛病。事实上，仅有精神疾病本身并不能够使一个人牵连在一项刑事调查当中，也不能够使其排除在一项刑事调查之外，除非此病使他们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以至于无法实际完成这样一种犯罪行为。同样，人们还假定，如果一个人精神有毛病，则他或她进行的任何犯罪都是这种疾病的后果。这一次，事情不一定如此。一个人犯下罪行而与自己的精神病毫无关系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同样，我们必须记住，精神病症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一个人有可能患周期性的精神疾病。这也正是当一个人扣动扳机或者使用刀具的时候，很难判定他当时到底在想什么的原因所在。

"他是个老谋深算的风险评估者，而自我保护是很重要的，"我告诉班克斯说，这话再一次指明他在公寓内很少留下痕迹的事实，"但是，他并不总是那个样子的。他已经成熟到了能够谨慎地进行此类性谋杀活动的程度，但是，在他犯罪的早期阶段，他不一定就也是同样谨慎的。"

"同样非常清楚的是，他的性兴趣并不仅限于成年妇女。他的性欲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这也正是刑事调查人员一直在努力理解的问题之一。如果这个人目的是要动手杀死和肢解萨曼莎，为什么他还要去碰佳丝明呢？当然，一个理由是，佳丝明挡在他杀人的路上。但如此仅有这样一个原因，他只需要用枕头直接闷死她就完事了。反过来，他却强奸了她，这指明他的性变态范围十分广泛。这意味着，警方在寻找与其他犯罪的可能联系时必须考虑与其他成年妇女，同时也必须考虑对儿童的性犯罪行为。

我继续讲解自己的心理描述："他总是在寻找新的受害人，而且会在机会到来时也向高风险的受害人发动攻击。这有可能意味着露阴行为或者较不那么严重的性攻击罪，或者一边锅里煮着饭一边到外面去强奸别人一回。但是，从周期来看，他对与自己的性幻想有关系的事情产生更强烈的冲动，这也是导致萨曼莎死亡的原因。他将需要寻找新的女性受害人，他会被强烈的焦虑和渴望所驱动，还有一种个人的不满足感。他将需要一个特别的妇女，因为她在他的脑海里特别显眼，但他知道她从来都不会说'我喜欢你，我们上床去吧'。他知道他无法拥有她，因而使他非常生气。他将产生越来越强烈的

被侮辱感，是因为她产生的，也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妇女所产生。"

班克斯问："他有没有可能结了婚，或者有一个女朋友？"

"我怀疑这一点。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太可能拥有使一个婚姻保持下去的感情因素，也无法维持一种长期的两性关系。他的性变态已经成熟，但他的人格却没有成熟，他明显患有某种形式的心理紊乱症，不过，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这些事情会阻止他保持一种两性关系。"

"我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认为他的社交能力就一定很差，也不一定就说明他一定在生活圈子内混不开。我觉得，他在自己所做的事情和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上面非常自信，但我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跟一名妇女合得来，因为一个妇女有她自己的性需要，而且这样的妇女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同等的伙伴，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班克斯问："职业方面呢？"

"从他的智力和社交技巧来看，我看不出他找不到一份工作的理由，但是，那会是一种普通的工作，最有可能是一些不需要技巧的体力工作。"

我提到色情是这个男子生活当中的一大特色，尤其是集中于对妇女的肢解等的材料，如果他能够搞到这样的材料的话。在调查过程当中，如果刑警接触到与这种性质的地下出版物相关的情报，那他们就应该仔细地研究一下邮件单。

"这名男子并不想引人注意，也不追求名声。他并不关心在《10点新闻》中出头露面的事情。在这个阶段，他的焦点在于他从一具尸体上得来的快感上面，而不是大规模的出众感。但是，他的确有一种展示感，这可以从他摆放尸体的方式当中看出来。但是，这个摆法明显是要影响发现现场的人，而不是要对更广大的受众产生什么冲击力。"

"因为此人知道他并不喜欢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喜欢自己，因此，他可以视自己为一个怪兽，或者觉得自己为这个世界的人所讨厌，这样可以刺激他去杀更多的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米基·班斯特别记住，因为他在跟媒体说话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杀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愤怒

和个人不满足感而驱动的，如果他看到别人谈到自己时正好印证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会使他的个人能力不足感和没有自尊感受到激发，从而使他再次发怒。

同时，我知道他也许拥有很强的心理防范能力，不可能总是拿自己当作反面人物来看待，而且会将一些抱怨投入到别的地方。我对班克斯说："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回到家里后捶胸顿足，一脸泪水，直揪自己的头发说'我的天啊，瞧我都干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如何才能够停下来？'他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谈判，更不需要找借口。他可以对一个受害人做出任何事情，因为'她是我的，我说她是我的她就是我的'。根本就不存在懊悔什么的。"

"他以前一定有过侵犯妇女的记录，甚至有可能有肢解动物的历史。"后一种可能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认为，已经在肢解性的谋杀者与童年或者少年期伤害动物的嗜好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又回到了施加暴力和控制力的欲望上面。

已经解释了这么多心理描述之后，我开始构造大约的事件顺序。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悄悄盯人的罪犯。如果他对某个受害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就会盯她的梢，尤其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妇女，也就是他想慢慢品尝的妇女。萨曼莎就是这样的一个妇女。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会对随时发生的如妓女这样一些自动到他家里去的高风险受害人产生反应，但是，当时的环境从自我保护和隐私的角度看必须是合适的。

这名男子有很多在地理上很熟悉的地方，能够从那些地方窥探妇女脱衣或者做爱。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能够看到西斯费尔德台地公寓和那排房子后面的草坡。那个草坡有多处不幸的组合，它并非经常用作人行道，但是，尤其是在晚上，有人坐在那里肯定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这就使它成为观察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女儿的极好的地方，而且那个公寓还很容易进去。萨曼莎从不费心放下窗帘或者百叶帘。他可以一直看到她的客厅或者卧室，使她的生活节奏进入他的幻想。

也许他曾看到她跟自己的男友在煤气取暖器跟前做爱，屁股底下还垫着一个垫子。像这样一类真实的生活情景会进入他的幻想，增强这种体验的清晰度，也会使快感升级。

11月3号星期三晚上，他有可能看到萨曼莎准备上床睡觉，并关掉了灯。他从阳台上翻进去，用手抓住栏杆爬上去，还在靠近地面和有苔藓及泥土的砖上刮了刮运动鞋上的泥巴。他了解那个阳台，也明白公寓的布置和大致方位，因为他一直都在那里观察。否则，在他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时，一定会碰到很多东西而留下自己的痕迹。

接下来的事件顺序从来都不是很清晰，每一种可能性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一个层面上来看，你有可能觉得，到底先杀了谁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做了什么，他如何干下那样的事情和什么时候干下的事情决定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一切最终都要回到动机上来。

我并不觉得任何一个闯入者会攻击佳丝明，除非萨曼莎已经死掉，或者正在垂死之中。我对萨曼莎的一切了解都在明确地说，她一定会拼尽全力去反抗，甚至为了救她的女儿而死去。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听到了一个响声，掀开被子，穿上睡衣，然后去房间查看。他在走道上攻击她，朝她脖子上刺了8刀，然后在那里让她的血慢慢流完。

在卧室里没有发现血迹的事实表明，杀手进入房间之前已经洗过手了，也许是用厨房的毛巾擦过手。佳丝明身上发现的惟一的一些血迹是她自己身上的血。同样，佳丝明不太可能因为自己的母亲被攻击而惊醒并面对着杀人者，因为那样的话，凶手就没有时间去洗手了。我认为，他进入房间的时候她有可能还是睡着的。对她进行性攻击并闷死她之后，凶手回到了走道，并将萨曼莎的双脚拉着拖到了客厅，直到她靠在煤气取暖器上，面朝上躺着。他拉过一张大垫子在她屁股下垫着，这就使她的阴道正对着他，使他想要动手的工作而更加突出。

但到此时，他的兴奋已经积累起来，并达到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平台。他开始肢解，慢慢地探索萨曼莎，对他来说，这种了解的方式是如此私密，如此值得人欣赏，以致超越了普通的性活动。一些妇女排斥他，他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他要慢慢利用这种私密的探索方式来明白，作为一种惩罚，也作为一种报复。

想像这样一种人吧，他一辈子的使命就是收集油画。共有两层需求——一是找到并获取艺术品，然后是慢慢对着它说“这是我的”。

那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这个人正在制造自己的"艺术佳作"，制造场所可提供静静的快感和深刻的满足。

之后，他去厨房里乱翻一通，拖出了桌布、抹布和没有熨好的衣物。他需要找些材料来盖住萨曼莎的尸体，在这么做的时候，他要形成一个小小的静物剧照，别的人发现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包裹好的礼物一样。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发现这具尸体，都会大惊失色，而且一辈子再也无法忘记这样的场景。

这种堕落的舞台造型在卧室里继续着。佳丝明尸体上的铁青色印迹表明，她死后被人搬动过，这意味着凶手一定又回到了卧室，并重新安排了现场。看起来就好像他希望有人打开房间，然后想，多么可爱的一个场景，一个孩子睡在被子里面，然后让他们发现那个非常可怕的事实。这一切办完之后，鲜明的形象会保持在这个人的脑海里。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的自淫幻想中回放这样的情景，就跟其他的男性或者女性记得一次特别的做爱经历一样。

我对班克斯说："这些回忆开始淡化的时候——而且一定会淡化下去——他会自言自语：'下次我会干得更好。'他会看着自己的战利品说：'下次，我要这么干，我要那么干……'你们必须记住，这是此人一生最独特、最值得玩味和最刺激的经历，而当他的冲动足够强烈的时候，他会再次实现这样的体验。"

16 审判之前的交锋

圣诞节转眼就到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努力忘掉工作，并一头扎入家人的生活，不再担心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想关心圣诞树是否有备用的小灯泡。玛丽莲看出我身心憔悴。那是紧张忙乱的一年，她已经开始担心，我的生活当中每天围绕着如此之多的恐怖和堕落行为，我是否经过了足够长的训练，是否扛得住。我自己也不得不开始提出同样的一些问题了。

这在以前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我见过那么凶残的杀人者和强奸犯，我诊治过暴力犯罪受害人，因此，凡请我帮忙者，我一概满口答

应。同样，在我的临床工作当中，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够防止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并且使一些人免于成为那样的犯罪受害人，那这样的工作就一定是值得一做的。可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克服这样一个现实，即正是这些工作才使你的精力慢慢消耗掉的。

因为法庭心理学涉及与罪犯建立一种和睦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实际地帮助他们产生改变，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把他们当作有价值的人。你不能够看着一个人而把他当作邪恶之身，但又必须给予他帮助。反过来，你必须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类来看待，以便能够使他们产生一些变化。

建立这样一种和睦关系的办法之一是让自己忘掉他们对受害人所作的恶，集中在他们作为一个病人的临床需求上面。不幸的是，我的心理学轮廓描述工作意味着我已经见过第一手的可怕行为，并消耗了无数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那些被玷污的年轻妇女和儿童的可怕的残迹。当你坐在桌子前，看着对面那个犯下类似罪行的人的眼睛时，真是不太容易忘记那些血肉模糊的回忆。

出于这样一个理由，事情就不是说我的工作当中的某一面会比另外一面更让人难以接受。看着这些犯罪现场的照片和走过犯罪现场时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但当你坐下来倾听某人回忆他最阴暗的行为或者幻想时，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时，你同样会感到极不自在。

这类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人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构造走向极端和虐待性的事件，所幸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看见这样的事实。令人担心的是，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牢靠的管束。除非他们实际犯下了一桩罪恶，否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行走，也许能够阻挡他们实现性幻想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临床上的禁止，那就是我和同事们在他们身上施加的一种控制。我不能够迫使他们来我的诊室，我只能够鼓励他们，然后用我所有的经验来管制住他们。

另外的一些情形涉及形成确定一些人未来生活的决定。从社会公益部门来看，这有可能是一个风险评估行为，或者是为辩方或者皇家政府提供的一份心理学报告。根据我的判断，一个法庭也许可以决定某人对他们自己或社区构成威胁，因此应该予以管束。我想到一些比如涉及跟踪别人并威胁着要杀死两名妇女的偷窥者的案子。

我必须决定，他的威胁是否严重，他应该被看作一名罪犯或是一个心理失常的人，如果是这样，他对受害人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这样的决定具有极复杂的含义。如果我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有人因此死亡，或者一名男子会被送进监狱或管拘医院，并因此而失去他所珍视的一切——他的房子、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和家人。

也许我必须评估一位父亲是否安全到能够跟女儿一起生活的程度。如果我觉得他形成了一种威胁，而且母亲也无法保护她，那么，这个女儿就有可能被从家里带走，让别的人来看管她或者让别人收养。这名父亲不仅仅不能够再次看见她，而且如果他被贴上难以处理的性犯罪者的标签以后，他以后永远也不能够再见到她了。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的女儿留下来，而他对治疗并没有反应，那么我知道，她就会受到残酷的性虐待，她的一生会被毁掉。因此我犯不起错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一个负担，而玛丽莲也看到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上次度假以来都已经过去三年了，每一个周末和法定休假日都花在工作上了。同时，我的视力也出现了问题。

1986 年我 40 岁的时候，一项常规视力检查显示我得了青光眼，从技术上讲就是眼内压过高。医生通知我这个结果的时候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多少年里，我吃下了很多种不同药物以控制眼内压力，但每一种药的药效都没有能够维持到几个月以上。从一开始起，医生就对我说，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影响。工作时间过长、睡眠不规则、工作压力太大和财务方面的操心都会对病情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玛丽莲看到我身心疲惫、情绪不高的时候操心的原因所在。她希望知道，我到底打算一次干很多事情干到什么时候算个完。

有一个时候，我有 27 桩调查案子同时接在手上，因为警察都希望我能够帮上一点忙。我只是无法同时料理这么多的案子，因此只是采取急事先办的原则。结果，我永远都没有能够处理到其他的一些案子，或者等我真正处理它们的时候，我的建议已经不再需要或者无关了。让专案组或者刑事调查等着我有空时再去处理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得找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内政部接受了我关于在英国建立罪犯轮廓描述机构的全部建议，但是，英国的白厅政府办事很慢。这期间，我又接到一系列请求，去一些轮廓描述会上讲课或者教

学。其中有一些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与评估建议相关的那些教育。我想，这肯定是使事情向前推进的好办法。

“你准备把余下的一生都用来去犯罪现场转悠吗？”玛丽莲在圣诞夜问我。她以前也问过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她想知道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安定下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像别人家一样过一过周末，或者能够外出度假。

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期望。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家，她提醒我注意到多少年以前我们谈过的话，我们谈到很多会去做的事情，可是，时机已经都错过去了。

“事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说。

“什么时候？”

“也许明年吧。我们看拉雪尔·尼克尔案子审判完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谈到以后会做什么事情，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会离开国民卫生服务处。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在风险管理、人质和绑架谈判以及犯罪分析中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我还希望利用自己的组织和法庭专业知识为一些人、公司和执法机构提供犯罪预防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我不会再去犯罪现场寻找零零碎碎的东西了，我知道许多犯罪行为是可以从最开始的地方加以阻止的。根据这些模糊的计划，我确信自己会过上较为正常一些的生活。

在节礼日，我和基斯·佩达飞往华盛顿，玛丽莲作为我的秘书随行。这次旅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美国刑事审判当中拿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当作证据用的例子；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掩蔽行动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同行进行独立的评估。

对柯林·斯塔格的正式讯问应于2月份开始，公诉机关已经决定不仅仅依靠莉西·詹姆斯的证据，而且还依靠我涉及罕见性变态的证据的资证价值，因为那是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人身上应该看到的行为本质。

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和心理学犯罪分析以前都不曾出现在英国的法庭上。但是，在美国却有过先例，联邦调查局的心理轮廓描述已经当作证据使用过，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希望掌握一手资料，看看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障碍，而且那些案子是否具有可比性。

除开回答上述问题以外，布鲁斯·巴特勒还要我们看看两国罪犯轮廓心理描述技巧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他希望我确信我们能够跟上美国的方法学，而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将它与在英国进行的工作进行比较。

到达华盛顿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朱迪·雷接待了我们，他看上去就跟猫王年轻时一个样子。我以前见过朱迪，他当时在英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研究员学习过程，是在布兰姆希尔警察培训学校。他是位极有趣的人，在纽约命案部工作了11年，曾成为雇用杀人者的索命对象。他身上已经中了三粒子弹，虽然他活了下来，但是，他的婚姻却因此而泡了汤。他妻子担心得要死，怕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曾是敌后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在敌人的后方线上工作，是他那个野战排里惟一活下来的人。这些经历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他身上总有一种镇定感，几乎伸手可及。

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市的培训基地，自从《沉默的羔羊》等电影讲述了心理轮廓描述者的事情之后，已经获得了近乎神秘的地位。行为科学研究室就设在"地堡"内，那是为白宫人员建造的一个核弹掩体。里面没有窗户，也没有自然光线，所有生活全都由低沉的空调声来伴随的。

圣诞节期间，大部分员工都放假了，但从事罪犯心理描述工作的一些开路先锋都同意放弃他们的假期跟我们见面，包括罗依·赫泽尔伍德，他马上就要退休了，那是他在那个局里上最后一天班。一开始，他准备只坐几分钟就走的，但结果却在那里过了大半天。

坐在身旁的朱迪·雷为格莱格·库柏做了介绍，他是另外一名高级特工，还有乔娜·蒙罗，她是位惹眼的金发女人，也是匡迪科惟一的一位女性心理轮廓描述者。在多年时间里，有很多女性特工人员加入了，但是，她们后来都走了，只有乔娜留了下来。我觉得这份工作的本质证明的确是太令人不安。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沉默的羔羊》，但我禁不住从一个电影制片人的角度想像它。

我感觉到，这次会议有关键的意义。这将是我对杀人犯的分析和掩蔽行动之后的原则第一次受到一批专家同行的严格检查。

佩达开始描述这个案件，罗依·赫泽尔伍德迫不及待地打断说："啊，这是一名无计划杀人者。"这是联邦调查局用来区分罪犯的范畴

之一。"无计划"是指显示冲动、暴力行为的犯罪现场，里面没有任何事先计划或避免被人发现或侦查到的举动的证据。

我接着罗依的话解释了拉雪尔是如何被人捉住和控制的，她的尸体展示出来的样子，以及凶手如何快速有效撤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后面的作案方式。"这些并不是你们所称的'无计划'犯罪者的典型迹象。"

"是啊，你是对的。"罗依说，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所有人都被掩蔽行动的想法吸引住了——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将这天最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案子上了。一种转换悄悄地发生了，大家没有想到去讨论此事的法律先例问题，反倒成为一场交流知识的学术会。我可以了解这些刑事调查人员和侦探的广博经验，同时，他们也因为我工作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所吸引。

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心理描述方法。第一种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字捣弄活动。以前的数百例犯罪行为经过仔细分类之后放在计算机数据库的不同范畴当中，然后可以拿出来与新犯罪行为进行比对。这可以指明新的犯罪是否与数据库当中的任何其他案件有联系，并有助于掌握系列犯罪者的踪迹。

第二种方法是处理个别轮廓的发展，它更多建立在犯罪心理学和犯罪行为本身的基础上。联邦特工研究具体的个案，并利用他们自己作为刑事调查人员的个人经验起草轮廓描述，利用参加由心理学家和执法专业人员组织的各种会议和讲座时得到知识，这些心理学家和专业人员都具备在这个领域里众所公认的专业水平。

在英国，罪犯轮廓描述和心理轮廓描述中的某些流派利用由联邦调查局开发的数字捣弄方法在不同犯罪之间建立联系。一般来说，他们依靠计算结果的算术级数。我们打个比方说，80%的系列性谋杀案是由20至25岁之间的男性所为，在这些罪犯当中，50%的人以前有过较不严重的性犯罪行为。根据以前的案子中已经确立的罪行得出的这些算术抽取物然后就用来支持一些结论，包括要缉拿的性杀手最有可能的年龄、教育程度、犯罪史以及发生地等的数据。

但是，如果这是心理描述所借重的全部资料，那么，不符合这个

标准的那20%系列性杀人者怎么办呢？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认为每一个案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一个犯罪行为没有理由一定要符合这种整齐划一的范畴，而罪犯更不太可能完全符合这样的规范。除非犯罪现场有别的东西能够支持这样的发现，否则，我觉得，仅仅根据定罪率和与目前正在调查的事情没有特别联系的过往犯罪史来做判断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联邦调查局用来生成个别罪犯轮廓的方法，专门为一个多种犯罪和暴力犯罪率极高的庞大国家所设计。但是，已经证明它很难不经修订后移植到欧洲去用。荷兰政府发现，他们选择联邦调查局对性犯罪的分类法进行心理轮廓描述时，发现90%以上的强奸案都只符合FBI的一个范畴。这清楚地表明罪犯鉴别——使用这种方法的全部意义——极其困难。

就因为那天在匡迪科城的会面，使我们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清楚，我们彼此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我们最终讨论到了如何在未来协同工作，也许可以在一个情报交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这家学院的来客区住下来。这个区设在主接待大楼一楼的楼梯平台处，对面是一个中庭，里面有巨大的玻璃墙体，全都涂上了浅色。这个综合楼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感觉起来庞大无比，十分空旷，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开始想家了。有天晚上，我和玛丽莲离开房间时，听到我们脚下的中庭里有弹钢琴的声音，我们隔着栏杆朝那边望过去，在一个角落的柔和的灯光下，佩达坐在一个大号钢琴跟前，对着空空的房间弹奏着。我们透过圣诞节的嘈杂声响听了几个乐章，体会到一个人怀念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小儿子的心情。看起来这是非常私密的一个时候，不便于打搅他，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房间，直到节奏发生了转换，《刺痛》的主题曲充斥了整个中庭。

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基斯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大个子，各方面都像是个侦探，他有冷静和嘲讽的智慧，有时候这使他显露出有些厌世的味道。他就职许多年，做得也很成功，在尼克尔的案子上他倾注了很大一部分心血。

我们飞回英国的途中，我感觉很不错，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心理描

述者独立地同意了我对于这个案子的结论，而且佩达也相信我们有从美国司法经验中得来的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可以在法庭背景中利用罪犯心理描述。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单独用作证据的证明，而只是证据链中的一环。

正式审讯的公诉小组由比尔·博依斯和尼格尔·斯文尼组成，他们是两位极有才能的律师，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支持此次掩蔽行动的心理学原则。

博依斯尤其对应该考虑如何处理拉雪尔的尸体的证据有兴趣。斯塔格描述过她的尸体是蜷缩在一起，双手合在一处，就好像在做祈祷一样。照片显示，拉雪尔的手是在一起，但并不是手掌对手掌，而是在腕部交叉着的。

“有足够的解释，”我说，“阿列克斯被路人发现的时候，他正在摇动拉雪尔，要她‘醒醒’。如果杀人者离开的时候是让她手掌对着手掌的，拉雪尔的手在阿列克斯拉动的时候就应该自然地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手才会在腕部交叉起来。”

公诉方已经意识到，柯林·斯塔格的辩护律师会集中力量攻击莉西提供的证据，希望能够取消那份证据。博依斯就这份证据与犯罪意识之间的关系问过我：“如果取消这份证据，布里顿先生，你觉得你的证据足以形成给斯塔格定罪的依据吗？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都必须小心，因为你得看着这个人从今以后一辈子沦为阶下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回答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

“当然，那是不够的，”我说，“我不能够说柯林·斯塔格杀死了拉雪尔·尼克尔。我只能够说，那天早晨在温布尔顿公园有两个人受到同样一种极端和暴力倾向的性变态损害的可能性小到难以相信的程度。”

“你能够这样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博依斯说，看上去心安了许多。

正式审讯自 1994 年 2 月 17 日开始，主审官是经历丰富和受到人们高度赞扬的地方治安长官特里·英格利什。他必须决定，皇家政府是否已经确立了针对柯林·斯塔格的表面上证据确凿的谋杀案件，如果是这样，则将嫌疑犯交由陪审团进行审判。

斯塔格一直关押在旺茨沃斯监狱，他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

化。他的体重减轻了，他的短头发已经长长了。他在家里自制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肌肉也没有了。

尽管已经实行了媒体禁令，以免透露出关于证据的细节，但是，记者还是早早就等在法庭外面，以便看到斯塔格过来的样子。这个案子一直非常重要，因此每一个细节都受到监督。比尔·博依斯开始发表开庭宣讲，记者席立即忙碌起来，这座新建的温布尔顿法院也接待了到当时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件诉讼案。

皇家政府一方的早期证人都是发生谋杀案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斯塔格先生的邻居和熟人。公诉方说，斯塔格所提供的不在场证据，也就是说案发时他在自家沙发上睡觉的说法可予否决。一位邻居苏珊·盖尔夫人记得约在上午 8 点 50 分见到过他，当时，她带着她家的两只狗在公园遛完之后回家。她在 A3 地下通道处见到他，非常接近斯塔格跟一名警察说话的地方，她还记得他腰间还系着某种黑色的"腰包"。

简·哈里曼是一名律师的妻子，她那天早晨在公园跟她的 4 个孩子和几只狗一起散步。她走的是跟拉雪尔同样的路线，只是稍早几分钟而已。在一个小林地附近，她注意到一名男子朝一名女士走过去，这女士年约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约 5 英尺 10 英寸高，暗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穿白色的 T 恤衫和黑色的裤子，手上抓着一只暗色的运动袋。他们相对而过，那男的看来猛地转过了自己的头，使他的面部特征看不清楚。

哈里曼夫人继续带着孩子散步，直到柯林塘边，然后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在池塘的另一边，她注意到一名妇女带着一只狗走到树林里，再过几分钟之后，她先前碰到的那个人也走到了同一条路上，就好像在跟踪那女的一样。

这样的一种行动使哈里曼夫人有些担心。几分钟后，那个男的又出现了，是从原来的路回来的。现在，他腰间的 T 恤上似乎有一根很细的带子。

她带孩子们往回走到风车磨坊停车场时，哈里曼夫人兴许在离拉雪尔·尼克尔已经躺在草里死掉的地方不到 25 码的地方经过。她能够向警方非常清晰地描述她在柯林塘边看到的那个人，并帮助警方完成了画师的印象图，这张图在英国警视台上播放过。

斯塔格第一次被捕以后，她在10名嫌疑犯组成的辨认队列中认出了他，说他就是那天早晨10点10分在公园看到的那名男子。她对此一点也不怀疑。

另一名证人阿曼达·费兰夫人也描述了她看见在溪边洗手的那名男子，时间是在上午10点30分之后。她描述说，他的动作令人怀疑，并觉得他当时穿着一件奶色或者白色的厚运动衣和蓝色牛仔裤。费兰夫人并没有能够在身份识别的队列中认出斯塔格来。另一名证人保琳·弗莱明也没有能够认出来，她对法庭说，她看见一名男子在约上午9点30分左右在柯林塘边走，右手上拿着一只黑包。

当地做生意的很多人，包括肉铺老板和守报摊的人也回忆说那天看到了斯塔格，并描述他当时非常兴奋，因为他谈到在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认识他好多年了，知道他平常是个不跟人来往的人，他更喜欢动物而不喜欢跟人交往。

雪利尔·刘易斯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邻居，她住在伊布斯雷花园那边，她回忆说，斯塔格第一次被逮捕后她跟他谈过一次话。他说他看过拉雪尔的照片，说看上去她的头已经被割下来了，然后又扶回到她的脑袋上一样，说她当时看上去像个婴儿的样子。他还承认以前也在公园看到过拉雪尔、看见她在一个池塘边进行日光浴。

现在轮到我了。我给自己的心理学学生们讲法庭报告技巧时，曾帮助他们理解当他们接受反讯问时，自己心里需要有个底，看看提问的人是否准备接受你的意见。每一名好的律师都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对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楚的逻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计划，重要的是要早早看透他的计划，这样，就不会被他突然压过来的一大堆问题难倒，也不会被他引到对一个问题一致的答案，或者是他暗示出来的答案上去，而那个答案是你极不想说的。

辩护方的律师吉姆·斯特曼是位极优秀的律师，他早早就展示出了他的能力。他想让我受到怀疑，因此也希望使整个掩蔽行动受人怀疑。如果他无法让人对我的专业水平产生怀疑，那他会攻击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攻击整个心理学领域和所有的心理学家。毫不奇怪，结果在证人席上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有趣的辩论。

我的证据的中心思想涉及掩蔽行动可信度和纯粹性，从它的设

计和执行两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还有我的研究发现，即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与我从杀死拉雪尔·尼克尔的尚未辨别出来的凶手身上总结出来的性变态分析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性变态，除开在特别医院或监狱里以外，同时同地有两个人都具备这些特征的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他在掩蔽行动期间的行为正好是这种罕见的人身上可以预测到的行为。

毫不奇怪，斯特曼先生对我的发现表示了犬儒主义的看法，称它们是"投机型和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我的直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他问我柯林·斯塔格是否有精神疾病。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替他做过检查。"我回答说。

斯特曼先生说，如果我没有检查过斯塔格先生，那我如何能够拿出肯定的结论？他是否患有《1974 年精神卫生法》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常病症？

"我不知道。"

他想诱我说出一些临床意见，而他明白，这样的临床意见只有在我对斯塔格进行过体检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我想他还希望我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让我用额外的一些例子支持我的说法，因此让我超出自己能够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

"布里顿先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共分析了多少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的谋杀案？"

"一例都没有。"我说。那是个愚昧的问题，我本可以轻松地问他，他曾为多少名据称刺了一名妇女 49 刀的嫌疑犯做过辩护？我的结论基于我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也基于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功能失常方面的经验。

问话非常尖锐，而且有攻击性，但有时候，斯特曼先生逼人太甚了。在一次问话期间，他问："布里顿先生，这是一例'过度毁伤'杀人案吗？"

（他显然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个词，否则就有可能同意他的说法。）

"当你使用'过度毁伤'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指联邦调查局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那个意义吗？"我问。

“是的。”他说。

“他们说，达到一定量的刺杀行为时——我觉得是指 20 刀——那么，杀人者可能认识受害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吗？”

斯特曼说：“正是。如果有 20 刀或以上的刺杀行为，则受害人可能认识攻击者。”（拉雪尔被刺 49 刀，而斯塔格被认为是她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

我回答说：“当有人身上中了 20 刀，则这个受害人认识杀人者，而如果受害人身上只有 19 刀，则一定不认识杀人者，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在英国不是特别有用。”

毫不奇怪，斯特曼不再朝这条线问下去了。

被迫详细讲述掩蔽行动时，我解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目的是要给受试人一系列概念化的梯子让他自己去爬，而不是设置一根滑溜溜的绳子无情地推动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让他掉下去。

斯特曼问我，我是否觉得斯塔格有可能对莉西·詹姆斯说了一些寄希望于让自己在她身上失去童贞的话？

我告诉他说，在来往书信和录音或者的的确确在与斯塔格先生有关的任何别的材料当中，除开所持的真正的幻想以外，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别的证据。

“有多少人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莉西·詹姆斯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可以这样说，能够产生那样的幻想，那么多的细节，那么高的强度，那样的攻击行为以及能够对拉雪尔·尼克尔尸体的位置做出那样准确的描述的人的比例小得难以察觉。”

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辩还在继续着。斯特曼希望知道我如何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就解释了我的临床工作和治疗性功能紊乱的经验。我同意，在斯塔格的书信当中，并没有提到肛交或杀死任何人的性幻想。哪怕如此，那种性幻想的狂乱程度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相信，那样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参与者死亡。同样，斯塔格曾报告说，他在想像类似对拉雪尔·尼克尔的攻击行为时也体验到过性兴奋。

我最后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已经感到自己身心疲惫至极。正式审讯在继续，内政部的病理学家理查德·谢菲尔德医生出庭作证，然后是莉西·詹姆斯（她因为掩蔽行动的工作性质而坐在一个木

制隔栅后作证），最后是基斯·佩达。

莉西出庭作证的时候预料会发生的激烈争论并没有出现。到此时，吉姆·斯特曼也许已经决定将他的力量保存下来，以防这件案子送交审判。他询问佩达说还进行过其他的一些调查活动没有，意思是说，斯塔格从一开始就成为目标，而警方根本就没有再去寻找别的线索。佩达解释说，所有潜在的路线都已经查询过了，包括去意大利寻找一名掘墓人，案发时他在附近的普特雷公墓工作。

最后总结的时候，斯特曼对整个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攻击，说这次行动完全是在利用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不成熟并极希望失去童贞的心理。他非常生气，也非常难堪，他有可能会给莉西写任何东西，只要这有可能使她上床就行。

根据斯特曼的意思，莉西的信件是一些劝诱之词，设计用来使斯塔格发明越来越狂野的幻想。她描述自己是一个希望被人控制的女人，希望受人侮辱的妇女，而他只是顺着她的意思给了她想要的一切。他争辩说，我的证据完全是投机型的，除了我自己的直觉以外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医学上的资格，而且只是在那里"猜想"斯塔格的性行为。

"我们根本不知道公园那天有哪一个精神病人给放了出来。布里顿先生是在根据自己的意见证实一桩罪案的犯罪人。公诉方尚没有能力引证任何一个案件是由一位心理学家宣布有罪的，你们必须开创司法历史。"

我并没有宣布柯林·斯塔格"有罪"，我只是说过他的行为模式和幻想与我从凶手那里预期的幻想没有区别。比尔·博依斯认为，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临床和法庭心理学家，有许多年的从业经验。他说，陪审团将有机会听取所有这些证据，然后拿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看看柯林·斯塔格是不是杀死他自己幻想中的一名受害人的罪犯。

经过 11 天的供证和提议之后，特里·英格利什先生作出结论说，虽然辩方的辩论很有引人之处，但是，这些引人之处使证词更有分量而不是使证据无效。他裁定柯林·斯塔格应该送交审判。斯特曼先生立即提出新的保释要求，理由是该案久拖不决。因格利什先生驳回该项请求，拒绝保释。

17 失踪的女儿

早晨在下雨，一大片一大片敲打在塑料雨衣和正在挖掘的那些人的帽子上。一开始，邻居都没有注意，他们以为是水管爆裂了，或者下水道堵了，以为那是水管局的人在格鲁塞特市克伦威尔大街25号排除故障。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警官们穿着长统靴和黑色大衣在后花园里挖出一层层的湿土。他们躲在冷衫树下和邻近的第七日耶稣降临会的红砖墙下，慢慢剥出了暗黑色的粘土。他们先用机械挖掘机，然后用手挖，一直干到深夜，探照灯在一堆堆的土上折射出令人不安的阴影。找到的第一块骨头只有3英寸长，证明是一种小动物的骨头。

1994年2月26日星期六，《每日邮报》的三个段落最终透露了这次挖掘活动的原因。

搜寻后花园查找失踪女儿

昨天晚上，一对夫妻被逮捕，同时，警方在其后花园中挖掘，试图找到他们失踪的女儿。

希瑟·韦斯特约在7年前消失，当时她16岁，但她父母，52岁的弗里德里克·韦斯特和40岁的罗丝玛丽从来没有报告其失踪案。他们说她是自愿离家的。

这对夫妻被带到格罗斯特警察局进行问讯。在格罗斯特市克伦威尔街半独立的一栋房子里进行的搜查将会于今天继续进行。

格鲁斯特市有很多地方与众不同，它就跟一块冰山一样，是英格兰游离于米德兰以外的一个工业带，并在英国西南部的起伏的美丽群山中扎下根来。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工人，流动人口很多，它有乡村市镇的典型标记，还有其他的许多特色，让人想到一个极力恢复其往日荣华的工业市镇。

克伦威尔大街在这个城市的中央，这里有爱德华时代的排屋，其中许多排屋已经变成了公寓，排屋沿着狭窄的街道排列成行。母亲能从窗口和打开的门道里看着孩子在人行道上玩。

25号是一栋门面平直的房子，处在台地的末尾，正面有小卵石铺成的墙面，还有刚刚漆过的绿色窗户。已经褪色的菊花图案装饰着网眼窗帘，还有一块幸运马蹄铁吊在正门前面。隔壁是用新砖砌的一个教堂，上面有一段告示，开始的一段文字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希望？"

经过3天挖掘之后，警方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他们还在继续挖，主要是跪在地上用泥铲挖，一点一点地抓泥土。他们都很累了，腰酸背疼。后来，终于有一把泥铲挖到一个硬物——那是嵌在泥块里面的一具骷髅。

负责这桩调查案的人是警司约翰·班内特，他很快就成了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在格鲁斯特警察局的前台迎接我，见面后立即劈头一顿责骂，怪我给死因裁判法庭的文字报告太晚了。那桩案子涉及在斯特劳德附近的牛顿市发现的一名男子，他的胸部中了一刀。一开始，警方悬赏一万英镑进行大规模的谋杀调查，但是，我仔细分析了这个人的生活和性格后，建议班内特说，我觉得寻找凶手的活动可以告一段落了——那个致命伤是他自己造成的。

"报告你带来了我真高兴，"我后来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因为如果你没有带来，我会命令这里的莫尔将你铐起来送进囚室，直到报告出来为止。"他咧嘴大笑起来，介绍我认识了特里·莫尔，他是一名警督，也是班内特的代理人。

上了年岁的电梯晃荡荡地抖动，上了两层之后，莫尔看出我脸上的表情："别担心。这电梯有时候会送你上去，有时候不送你上去。"

警司的办公室紧挨着专案室，专案室里有响个不停的熟悉的电话铃声和灯光闪烁的开关板，而这里却有完全不同的气氛，这也是我以前曾体验过的。在典型的刑事调查过程中，所有的精力全都集中在抓住某个人的事情上面。看起来墙上似乎有个没有图像的像框挂着，一切都导向那张本来应该在那个地方的人脸。在本案中，这里已经有一张照片——弗里德里克·韦斯特就坐在楼下一间简朴的问讯室里，他在那里呷着一杯杯的茶，吃一些巧克力饼干。

"你好保罗,又见到你真是高兴,"班内特说着,往后靠在他的椅子上,"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我真是不好意思。你一定对格鲁斯特郡产生了很坏的印象——每次你来这里总有另一桩可怕的案子。千万别怨我们啊。"

他半闭着眼开始简要讲述:"在离此处不远的克伦威尔街25号后园里,我们发现了3个人的遗骸。那处房产属于弗里德里克·韦斯特先生,现年52岁,和他的妻子罗丝玛丽,现年40岁。我们相信,找到的尸体都是年轻女性的,其中一个是这对夫妻最大的女儿希瑟·安·韦斯特,她最后一次活着为人看见是在1987年5月。"

"我们碰到的是极其罕见的情形,"班内特说,"我们手头上的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热情乐观、逗人喜欢,是个直来直去的工人。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他和他的妻子在现在这个地方生活了22年。根据大部分人的意见,他们都是外观上看起来极其友好的人,也是很好的邻居。同时,我们却又找到了3具尸体——内政部来的病理学家一具也不能够确证身份。我告诉你的大部分情况都是临时性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尸体摆放的方式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像的那种样子。"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肢解了,头都砍下来了。"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声警铃。

班内特翻弄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大致描述了他们家的历史,有时候莫尔还插上一两句话。弗里德里克·沃尔特·斯迪芬·韦斯特出生于1941年9月29日,是家中最大的儿子,父亲是赫里福郡和格鲁斯特郡交界处的莱德贝里市附近的马奇马科镇的一名农场工人和车夫。家里共有7个孩子,4个儿子,3个女儿。

小弗里德里克在马奇马科长大,离开学校后,他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一些体力活和开货车。1962年11月7号,他娶了卡萨琳·雷娜·柯斯特罗,是位18岁的女招待,在莱德贝里的一家咖啡馆里工作。他们有两个女儿,卡尔玛因出生于1963年,安娜－玛丽于一年后出生。这家人在雷娜的家乡格拉斯哥生活了一阵子,韦斯特在那里卖冰淇淋。然后,他们回到切尔滕纳姆市的比肖克利夫车队驻地生活,离格罗斯特12英里。

案卷表明，那场婚姻吵闹不断，60年代中期有数次把孩子交由别人看管，之后几个星期又接了回去。1969年1月，弗里德里克告诉朋友说，雷娜离开他跟一名工程师跑到苏格兰去了。

同年，韦斯特跟15岁的罗丝玛丽·保琳·莱特来往密切，她当时生活在比肖克利夫。她父母对12岁的年龄之差甚为忧心，因此与社会公益部联系，社会公益部同意看管罗丝玛丽，但她一到16岁之后，官方就没有权力再过问她的生活了。

罗丝玛丽跟韦斯特一起搬到了车队，跟他的两个女儿生活在一起，不久又怀孕了。1970年10月17日，她在格罗斯特市妇幼院生下了希瑟。这两个人于15个月后结婚，搬到了格罗斯特市面上米德兰大街25号的一个台阶形房子里。梅·朱恩于1972年6月出生，斯迪芬又于一年后出生。再后又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是混种儿。

同时，弗里德里克干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建筑工和零售商。他有犯罪记录，共在法庭出现过11次，主要都是因为小偷小摸和窝赃罪以及违法驾车的事情。1970年，法庭对他失去耐心，他被判入监3个月。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记录暗示有严重的病理学特征。但是，这个人仅仅只有一些小小的犯罪行为，但警方却似乎对他了如指掌。

"这次调查当中有多处令人难办的地方，"班内特说，一边清清自己的嗓子，"一方面，希瑟消失的时候只有16岁。有很多人都曾问起此事，但弗里德里克解释说她跟一个朋友走了。那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结束了。"

我知道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

班内特解释说，警方注意这家人已经有一些时候了。因为有人指控他们有强暴猥亵行为，他们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曾交由别人看管了一年多时间。韦斯特先生曾受控与他的一名或者多名女儿性交，同时还受到罗丝的鼓励和协助。

"她还专门检查是否进入，"莫尔说，"告诉他说那姑娘已经准备好了。"

班内特说："很明显，这是推动弗里德里克的各种基因学说向前发展的一部分。"

"基因学说？"

"别问我——我也解释不清楚。"班内特说。他继续描述说,12个月以前,这对夫妻本应因为上述指控而出庭受审的,但到11点,法庭正在等候的时候,主要证人却突然决定拒绝出庭作证了。"我们并没有把事情办牢靠,结果刑事法庭只好撤席。"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一直与那些孩子保持着联系。她们已经交由当地人带着,最后也听说了在后园里挖出希瑟的事情。他们想办法问出希瑟的下落,但没有成功。

我一边记下事件的发生时间,同时注意到中间有很多时间上的隔断,那就是从信息接受到采取行动之间的一个时差。那是让班内特操心的东西吗?我心里在想。然后,警察也不可能仅仅凭一个孩子的说法就去挖人家的后院。一定是有别的什么东西促使一向极放松的班内特如此谨慎的。

他递过来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证言和案件记录。头5页是卡罗琳·欧文斯提供的一份证言,她是当地的一名妇女,17岁的时候她曾在韦斯特家当过一阵子保姆。在她父母的同意下,她搬到了克伦威尔25号照看安娜、希瑟和新生的婴儿梅·朱恩。

卡罗琳开始在那个人家感到很不自在,尤其因为主人开始对她产生不健康的兴趣,在她面前说些暗示性的话,还谈到了她的性器。弗里德里克·韦斯特曾说过,他知道做一些手术可能提高一个妇女的性快感。最后,卡罗琳去跟以前的一位保姆喝酒,那个保姆就问她韦斯特夫人目前是否企图勾引她。卡罗琳惊恐万状,并决定辞工。

几个月后,也就是1972年12月6号晚上11点,她的男友将她送到图克斯伯利郊外的一个酒吧对面,她就开始搭便车回到辛德福德的家,那里离格罗斯特有12英里。这个时候,一辆灰色的福特大众车开过来了,她认出了车上的韦斯特夫妇。他们主动说让她搭一阵子车,卡罗琳并没有感到不安,因为当时外面非常冷,而且时间也很晚了。

罗丝玛丽掀起前面的座椅,这样,卡罗琳就可以爬到后面的座椅上跟她坐在一起,然后,福特车就开着走了。车穿过格鲁斯特,并沿着去辛德福德的路开去。根据卡罗琳的证言,弗里德里克问她是否跟她的男友发生了性交,还问他们一起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罗丝玛丽就开始伸手到衣服里面摸她的乳房,并想把手放在她的两腿间。

她开始喊起来，但是，罗丝玛丽只是大笑，并奚落她，这时候，弗里德里克就问："她摸起来如何？"

卡罗琳继续反抗，他就把车停了下来，伸手到后面座椅上打她，直到她晕过去为止。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她的双手已经被绑在背后了，还有很宽的胶带贴在她的嘴、鼻和耳朵上。

卡罗琳又被带回到了克伦威尔大街，带进了一楼正面的卧室。弗里德里克倒了一杯茶，然后用双刃刀割开了她脸上的胶带。刀子割伤了她左耳下的皮肤，胶带取下来的时候，她的一大把头发都给扯掉了。

她的衣服给脱了下来，他们不准她出声，否则就要伤害她。她的嘴已经被堵住了，而且眼睛上面还缠着黑布，她被弄到一张矮床或者床垫上躺下来，两腿被强行分开。那对夫妻开始研究她的阴道，并讨论她阴唇的大小和厚度，及这些东西是否会影响到性快乐。弗里德里克说他知道如何通过外科手术改善效果。

罗丝玛丽抓住卡罗琳的脚后跟并抬起她的双腿，让双腿分得很开。弗里德里克然后就开始用两英寸宽的带扣的皮带抽打她的阴部。之后，蒙眼带给解开了，已经赤身裸体的罗丝玛丽开始吻这个少女，并与她进行口交，同时，弗里德里克也脱了衣服，并从后部跟他的妻子性交。罗丝玛丽去浴室的时候，弗里德里克告诉卡罗琳说他打算将她关到地下室去，这样，他的朋友就可以用她了。他们完事之后，她会被杀掉，她的尸体会埋在格鲁斯特的铺路石下，警方永远也不会发现的，因为那里已经埋下了数百名姑娘。

他们睡觉的时候，她一晚上嘴里都塞着东西，而且还给绑了起来。卡罗琳记得早晨有人敲门，她想弄出一点声音来吸引别人注意。罗丝玛丽将一个枕头盖在她脸上，一直闷到她不再挣扎为止。客人离开后，罗丝玛丽上楼去看孩子们，弗里德里克就趴到卡罗琳身上强奸了她，好几分钟都没有射精。

根据卡罗琳的说法，他求她不要告诉他的妻子，因为她会对他发脾气。他说这次绑架是为了让罗丝玛丽高兴，因为她怀孕的时候，双性恋的冲动会很强烈，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卡罗琳。罗丝玛丽回来后，她让卡罗琳去洗个澡，然后将她带回卧室。他们迫使她保证，如果他们放她走，她要回到这里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否则，他们会找到她并

杀死她。卡罗琳同意了，他们就告诉她帮小孩子们穿好衣服，然后她就陪罗丝到当地的自助洗衣店去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卡罗琳就悄悄溜走了。

因为受了很大打击，她没有去警察局报案，反而去了一位朋友家。一开始，她没有胆量告诉她母亲和继父，但最终还是跟警方打了电话，她手腕上绳索的勒伤、腿部鞭痕和脸上的割伤及青紫伤痕还拍了照片。

我看完证言，又在文件夹里翻找那个案子的结论。班内特和莫尔坐着一动不动，就好像等待我的反应一样。我脑海里的警铃几乎响得震人耳膜。

韦斯特夫妇被逮捕了，而且接受了问讯，但他们否认一切行为。最终他们同意，如果卡罗琳取消强奸起诉，他们就承认犯有强暴猥亵罪，甚至有实际的身体伤害罪。这样一来，她就可以避免在公开的法庭上作证，也避免透露自己受过强暴的隐情。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73 年 1 月 12 日，这个案子在格鲁斯特地方治安官员的面前作为一件相对较轻的事情了结了。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承认犯有较轻的罪行，每项罚款 25 英镑。罗丝玛丽透露自己怀有身孕，谈到那次攻击行为时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干，事情就那么发生了。"

班内特可以看出我脸上无法相信的表情。

"别请我解释，"他说，"我也怀疑有任何人能够解释清楚。"

在楼下，韦斯特先生仍然被拘留问讯。他是个矮个子，一头暗色的卷发，还有摇滚式的络腮胡子。他穿蓝色开襟羊毛衫，开领衬衣和T恤衫，还有灰色的长裤。上个星期五早晨，没有佩戴标志的警车将他从克伦威尔街上带走，当时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他被证明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问讯对象，因此，班内特希望我给问讯小组一些建议，并讨论一下解开事实真相的策略。

他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说，警察什么也不会找到。当警方明确告诉他说正在院子里挖掘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谎言将暴露出来——他就承认说："不，她（希瑟）不在院子里，她在后院里。"之后不久，他被带回到那栋房子，他就指出了另外两处尸体埋下去的地方。

他说，她们的死亡都是事故造成的不幸。他争辩说，希瑟行为反

常,因此,他作为一个父亲去教训她,突然间就发现她已经死在他身上了。因为罗丝玛丽会对此非常生气,他就将希瑟拖到楼上浴室里肢解了。他先将尸体散件放在地窖里,后来将她埋在花园里了。

其他人的死亡也是事故。谢莉·罗宾逊18岁,当时投宿在他家,结果怀上了弗里德里克的孩子,而且引起了麻烦。他想教训她一下,结果发现手上又死了一个女的。第三个姑娘明显是谢莉的朋友,她到他家来看望她,因此他没有选择,只好杀了她。

莫尔说:"是啊,他真是个倒霉的王八蛋,他就是弗里德里克。一些女的不断死在他身上,因此他觉得他只好将尸体肢解了,然后埋到地下去,而不是告诉任何人。"

我看着问讯录音材料,可以看出莫尔基本上总结出来了,韦斯特一直在努力将他的罪行减少到最低水平。这一点也不使我觉得奇怪。杀人者总是尽量减少自己的罪过,而不是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

就警方而言,这个案子看来相当的直截了当。3名年轻女性被韦斯特先生杀掉了,韦斯特也宣称自己是单独行事的。他的妻子处在保释中,因为他们觉得罗丝玛丽最低限度是一个共谋犯,或者只是在为她丈夫掩盖罪行。问题不在于要找到更多的受害人,而是集中在对弗里德里克和埋在后院里的姑娘们的调查上。

后来我遇到警察局长黑泽尔·萨维奇和刑警菲尔·奥利昂斯,他们当时在进行问讯工作。班内特和莫尔做了介绍,我们就去了警察局很大而显得空荡荡的餐厅,在一个有福米卡家具塑料贴面的办公桌旁拖过几把椅子坐了下来。十几只荧光灯当中只有两只是亮的,因而在黑暗中投下阴沉的影子。

黑泽尔·萨维奇已经40多岁了,剪着一头短发,黑黑的,还戴着一副很重的塑料框架的眼镜。她身上透出一股紧张强烈的气氛,我可以看出,她也许把全部的职业生涯都献给了警察工作,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当警察局长。

下楼的时候,班内特向我介绍说,黑泽尔负责全部的挖掘工作,她以前接管过针对韦斯特虐待儿童的案子,之后就一直与这家人保持联系。正是她开始提出问题,想知道希瑟到底去了哪里,并开始寻找这个少年。她查了很多数据库,跟希瑟的朋友们谈起过,并跟她的兄弟姐妹保持密切关系。黑泽尔加快了搜查行动,并说服上司开出

了搜查证。

我们坐下来谈到细节的时候，对黑泽尔对这家人的了解产生了很深印象。那远远超出我对一位警官普通的想像，她更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花了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进行接触。很明显，案卷中有关于这家人的很多细节的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谈话的时候，黑泽尔一有机会就插言，她不仅就事论事，而且还谈出了不同孩子如何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产生的不同意见，而且他们害怕父母到了什么程度。这样的话从一个警察局长嘴里说出来是极不寻常的，因此很容易看出，她对此案卷入得很深。但是，我看出她有一个弱点。到底是哪一种弱点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她在这个案子中投下的巨大的精力虽然不一定是不健康的，但有可能会带来麻烦。

“关于韦斯特夫妇，你们还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我问到，我希望掌握最小的细节和微妙的背景材料，因为这些东西会透露更多有关他们的情况。

“他是个怪人。”莫尔说。

“你意思是说……”

“他更高兴罗丝跟别的男人性交。”

黑泽尔说：“他们在楼顶上有一间卧室，装修得就跟新婚套房似的——有四根柱子的床，上面还有特别的刻纹。罗丝就是在那里接待她的男性朋友的。弗里德里克带任何人回家她都往这里引。”

“带回家？”

班内特说：“这是一种准卖淫行为。”

黑泽尔解释说：“弗里德里克在当地酒吧里找到一些男人，然后带他们回家。一楼有一个房间看上去像是哪间妓馆的接待室一样，里面都铺有红绒地毯，还有木刻的吧台。弗里德里克带那些家伙进来，倒一杯酒，就开始谈天，然后，罗丝就带这个人上楼到那个四柱床上。”

莫尔说：“弗里德里克就在隔壁房间里听。我们找到一些录像带和收听设备，还有一些自制的色情像带。”

“还有，”黑泽尔说，一边打量了一眼约翰·班内特，“罗丝让那些男人戴上避孕套。她以前经常将精液收存起来，然后她和弗里德里克就把这些精液注射到女儿们体内，希望让她们怀上孩子。”

"又是基因学说。"班内特说,一边抬了抬眉毛。

他们继续描述说,1970年代,克伦威尔25号成了一个寄宿者之家,二楼的房间全部改成了廉价的床位,韦斯特在当地报纸上和社会保障办公室为这些床位做广告。数十名少年和年轻人据信都来过这里。

同时,罗丝玛丽·韦斯特也开始在一些性接触杂志上为她的服务做广告,用了"曼迪鼠"这个名字。

可以理解的是,一方面考虑到有人死亡,另外一方面还有性攻击的历史,警方认为他们是在描述单独的一些事件和韦斯特夫妇的行为,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行为彼此没有联系。我可以看到深刻的堕落和性变态的连续的线索。不管当前的情形看起来如何可怕,但我深信,实际的情况可能更糟糕。

后院里的三名女性的死亡可能是出自方便的原因——她们挡在路上,或者引起了麻烦——但是,要肢解一具尸体却是需要非同寻常的一种人。这样的人能够切开肌肉和肌腱,扳回关节直到关节断裂后分开。

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很轻松的人,哪怕承认所发生的一切时竟然还显出一股厌烦的样子。这个人有一个清晰的性攻击历史,而且是与他妻子一起进行的,包括据说发生于1972年的一起绑架案、强奸行为、虐待狂、性折磨、生理虐待和谋杀威胁行为。20年之后,我们掌握了惊人性变态的证据,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受到了系统的虐待。在这两者之间,有3名女性死亡,而且被肢解了。

我感到自己的胃里面有一阵冰冷的空虚。每次遇到此类案件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知道,一些家庭会接到坏消息,警方也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我们在处理什么样的一件事?"班内特问。桌上人的脸都集中在我的脸上。

"你们在寻找掠夺性和虐待性的性变态的证据,"我说,"我以前见过这样的案子,而且在临床上处理过这样的案子,但是,此案有特别可怕的特征。我们这里有综合起来的堕落行为——一个丈夫和妻子,他们彼此的力量相互借重,彼此觉得对方的行为是合法的;他们两人都参与了此案,而且是共同犯罪;他们杀人不仅仅是为了夺人性

命，他们的受害人还是一些玩具，供他们折磨和虐待。”

我进而解释那个连续的过程，它在1972年有一个标志性的行为，首先是攻击卡罗琳，然后在20年后又拿他们自己的孩子当作更精致的性堕落游戏品。这两件事之间不可能出现这样长的停顿期，那不是这类事情发生的常理。韦斯特先生不可能在某天早晨醒来发现他自己是个性变态狂。这样的事情在早年就已经发生，而且不会轻易结束，除非到40岁末尾或者50岁出头的时候自行厌倦为止——假如他会厌倦的话——或者到他们被人捉住的时候。

“说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班内特说。

“我是在说，你们在处理多产谋杀犯——这就是人们现在对系列杀人者的称呼。你们到目前为止只找到了3具尸体，3个受害人。”

这个意思被他们大家明白以后，班内特是第一个提问的人。

“让我来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明白吧。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失踪的姑娘。一些家庭多少年来都没有听说他们女儿的消息了。如果这件事情透露出去，这样的家庭都会开始担心……”

我知道这个结果所带来的痛苦。伤口会再次打开，而牵连到的家庭将永远也无法再次弥合打开的伤口。如果确证他们的女儿是受害人之一，下落是找到了，但然后他们会从一种折磨走向另一种折磨，他们会开始猜想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只是在这个案子当中，他们永远也无法想像可怕的真实情况。

“但她们在什么地方呢？”莫尔问，“别的那些受害人在什么地方？”

“他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他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我说，“有时候，性变态杀人者会从特别处置尸体的方式中得到快感——有些人将尸体扔在沟里，有些人扔在河里去，还有一些人会烧掉尸体。韦斯特夫妇却要照看它们——他们将尸体埋在很近的地方。”

“所以他们利用后院？”

“不一定，”我说，“他利用了后院是因为房子已经堆满了。你们应该将房子拆掉，拆得七零八落，一寸寸地找，地板里，墙里，屋顶上。一定会有更多尸体找出来的，我敢肯定。”他们还在继续问问题，我努力给他们一些合适的解释，但是，我知道那不可能讲得很透彻，除非我更多地了解韦斯特夫妇以及他们彼此的影响。我谈到了他们的性

欲如何以特别的方式发展，如何将强烈的性欲与攻击行为和主宰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他们从自己施加到受害人身上的痛苦和害怕当中得到快感，这比任何种类的性交或性结合都更重要，而别的性交行为可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说。

班内特问：“他们受到了折磨？”

“几乎可以肯定。”

他深深透一口气，然后半闭着眼睛靠到椅子后面去了。

“你如何能够肯定？”

“你们是在对付这样一种人，在他们那里，对你我来说属于正常性交的极限和特征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哪怕肢解尸体的行为也能够给这些人以快感。”

莫尔说：“报纸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喜不自胜的。”

班内特说：“不，他们不会。盖子还盖着哩。”

目前的首要事务是设计一个问讯策略，要能够鼓励弗里德里克畅谈，而且希望他能够透露出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问讯问小组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如何——他是在抵触，或是拒绝谈话，或者只是承认他知道真相会透露出来的那些事情？他是不是在大谈自己的战果，而且觉得自己是某种他们以前没有见过的特殊的人？

“实际上，他相当友好，”黑泽尔说，“他希望别人喜欢他。如果他觉得事情进展顺利，他好像很能照顾自己。”

菲尔·奥尼昂斯补充说：“他好像对一些生理方面的细节不太在意——听说一些惊人的细节时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刺激。他不愿谈及那些事情。”

“他不承认很多事情，”黑泽尔打断说，“不过，他却不对我们撒谎——至少不是直接撒谎。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问他希瑟在前院的什么地方，他就一再否认。然后，当他意识到我们会一直挖下去，直到发现她为止的时候，他就说：‘啊，如果是这样，那她不在前院，她在后花园里。’他并不想被人发现是在撒谎。”

这也正是我早有预料的事情。

“你们必须明白，韦斯特先生并不是那种急于吐露真情的人，”我说，“他已经想办法对付过警察，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将警察挡在外面。他会想办法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种可爱的几乎是伯父型的人物，有

一点点茫然，还有一点点迷惑不解。他似乎想轻松地谈话，他喜欢有人听他说话。他急于当一个令人满意的人，但永远也不会说：'啊我是个堕落的虐待狂和性谋杀者，除开捉到女人并折磨她们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令我快乐。'"

"韦斯特先生并不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是，他也不蠢。他杀人已经有年头了，以前也上过法庭。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也明白调查他的人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他到底干了什么。"

我给讯问小组的建议是让他谈话。他一旦开始谈话，哪怕他管得住自己的嘴巴，而且会使谈话远离某些领域，但是，他还一直谈下去，这就会透露出一些细节，可以用来为以后的问讯搭造一个平台。

我建议他们集中在一些开放的问题上面，促使韦斯特自己大唱赞歌。他们应该避免任何厌恶、震惊或完全失去判断力的样子。"你们可以显示出难以相信的样子，但不能够以轻视的样子表示这个意思。他必须明白，而且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一个定式：你们对他有兴趣，而且也希望理解他。"

我知道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有很多层必须剥开，如果幸运的话，这一层层的剥离层最终能够不仅仅显示克伦威尔大街25号发生的事情，而且还会显示发生在别处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弗里德里克·韦斯特的一生当中许多年里发生的事情，一直显示出他顺着这条路线的活动轨迹。

我夹着自己的笔记和其他已经到手的材料离开格罗斯特警察局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从韦斯特夫妇那里去了解，但有一件事情虽然令人痛苦，但已经是非常清楚的。英国已经又暴露出了一对系列杀人者，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也不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已经杀了多少。

18 已经抓到他了！

在伦敦东南部，米基·班克斯正在申请在全国性的电视台播放普鲁姆斯泰德杀人者的细节，寄希望于这样的曝光能够引出一些可能

的突破口来。他手头上的这件刑事调查案非常棘手，因为萨曼莎有很多朋友和熟人——其中许多人过着非传统的生活，因此很难找到他们的人影。哪怕班克斯和他的专案组现在确信自己是在寻找一名奇特的杀人者和系列性攻击罪犯，但是，他们不能够仅仅看看心理轮廓描述之后就放弃传统的查案途径，比如被抛弃的情人、以前男友或者家庭不和等因素。所有常规的调查途径和传统的杀人动机都必须覆盖到，以防未来的辩护方提出异议，说警方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别的嫌疑犯或者某一类型的嫌疑犯而没有能够跟踪其他重要线索。

萨曼莎的大部分新朋友都是她通过当地幼儿园和教会团体认识的，但是，她也与过去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这些人多半居无定所——住在临时占据的某个地方、卧室兼起居室或拖车屋里。她通过交友杂志认识的那些男人也难以寻找。很多类似的服务都让做广告的人留下一个预先录好音的口讯，然后，有兴趣的人就打来电话，并留下他们的联系办法。那些电话号码经常变化，又没有人将录音电话复制下来。哪怕如此，刑警们还是想办法从归属于这一类的100多人那里找到了证词，而且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排查了别的1000多人。

萨曼莎联络的一些人有可能使她进入卖淫业，这意味着这些男性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嫌疑犯。因为她随随便便的生活方式以及她过去遗留下来的风格，我知道许多男人也许觉得她很容易勾上床。

班克斯跟英国警视台谈过有可能建立起来的犯罪再现，但是，BBC台最开始的反应不太热心。很明显，制片人觉得没有足够多的信息来制作事件的准确图景。这对于这样一个成功的节目来说会造成不利影响。我可以肯定，在英国警视台发展的早期，他们一定对警方提交来的任何一个案件都心存感激，但它现在开始挑三拣四，有的报道，有的不报道了。

在这个案子当中，一个好的再现所带来的益处不容忽视，尤其是它会提高在伦敦东南部的知名度和媒体意识，而这正是罪犯有可能藏匿的地区，那是案发当地。米基·班克斯继续游说制片人，他还向制片人出示了我的心理轮廓描述，这才使他们最后产生了一些兴趣。他们决定做全盘再现，但必须要我本人同意在节目中露面。

"我不太喜欢那一类的事情。"我说。

班克斯回答说:"如果你说不行,他们就不干了。"

"我觉得他们以为我可以直接对罪犯产生作用,但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看电视。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做能够导致查出罪犯的结果的可能性极低。"我说。班克斯问:"低到什么程度?"

"嗯,你看到的可能性还不到10%,也许15%吧。"

"嗯,那也比我们目前的情形好15%。就我而言,我会尽一切努力抓住那个王八蛋。很明显,我无法让你也这么做,但是,我在请求你,非常诚恳地请你说好吧。"

我如何能够说不呢?

在过去,我曾帮助警视台起草解说词,包括为朱莉·塔特专案组制作的那个节目在内,但是,我一直有意回避出现在镜头上。我对这个节目本身并无反对意见——它做的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而且再现也不会渲染犯罪,也不会给罪犯一个"如何躲避"的指导——我就是不喜欢坐在那里演说,那样的特写镜头令我不安。

制片人希望我将心理轮廓描述分解开来,以便能够在无线电节目中播出,但是,我成功地说服他们,作为特别调查官的米基·班克斯才是能够公布信息的人。某些细节不能够说出来,特别是一些有可能暗示萨曼莎曾经从事卖淫业的材料。这有可能会使公众对她产生的同情心下降,从而使一些人不愿意往专案室或者电视台打电话。同时,我们还必须小心不能够误导公众,从而错过有可能抓住凶手的重要线索。

我意识到,如果将他描述成某种怪物,有可能促使他进一步犯罪。重要的是不能够流露出愤怒、厌恶,也不能够说任何判断性的话。这不仅仅会助长他觉得全世界都不喜欢他的感觉,而且还会打消人们打电话来报告重大线索的念头。离凶手很近的那些人也许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或者是住在一起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他是个怪物。把他描述成怪物有可能使他们觉得,警方要找的可能是别的某个人。

1994年2月8号星期四,节目播放出来,节目里面利用长得相似的演员显示了萨曼莎和佳丝明最后的一些活动。还有母亲和女儿

在海边嬉戏的家庭录像带。

在凶案发生的那个星期开车送她们从幼儿园回家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讲，萨曼莎看见一辆黄色的有蓬货车停在西斯弗尔德台地的公寓外面时，脸上流露出不安的表情。另外一些证人也记得那辆货车和两个带着一条狗的男子。警方相信他们跟萨曼莎有关，不过她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他们。

案发当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仍然等待排查。一是晚 10 点 15 分跨过马路朝萨曼莎的公寓方向走去的那名男子，另外一个人在场的情况是最近才发现的，有人发现他在晚 7 点 30 分左右出现在那一带。此人头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也发现在那一带活动。

米基·班克斯描述了这两个人的样子，并向电视观众提问："你认识萨曼莎或者回应过她的广告吗？你知道货车里的那些男子是谁吗？根据画师的画像，你认识她夏天结交的那个男友吗？案发当天晚上你见到过这几名男子当中的一人吗？"

他第一次公开透露说，佳丝明遭到了性强暴。"我是在向那些有可能认识罪犯的人们呼吁，让他们帮助我们进行调查。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 4 岁孩子身上发生的惨剧，我肯定他们会出来与我们联系。"

主持人尼克·罗斯然后描述了心理轮廓描述的细节，并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如何。我告诉他说："我觉得我们相当清楚他在进行犯罪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但是，我倒希望他告诉我，他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因为他最后居然去杀死了萨曼莎。我还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连同孩子也一起害了。"

英国警视台的节目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晚间较早播放犯罪再现，几个小时后再重播节目，并根据观众打来的电话加上一些最新报道。在休息期间，我在一片纸上写了几句话，是直接给罪犯听的。摄像机摇过来了，米基·班克斯再次呼吁人们站出来，然后让摄像机对准我。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的住址。但我明白他的一部分感觉。我明白他以那种方式丢下萨曼莎和佳丝明所能够得到的满足和激动。有时候他也许觉得他刚刚做过的事情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因此我想他给我打电话，并把这一切告诉我。"

如我所料，他并没有打来电话，但是，这个呼吁却使很多回应过萨曼莎的交友广告的男子打来电话。每一条新线索都必须追踪下去，然后进行不在场证明。如所希望的一样，媒体开始注意这件事情，班克斯也不断地提供更多心理描述细节。

2 月 23 日，班克斯对《伦敦晚间标准报》说："我们在找一个有可能是任何人的邻居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也许还有一份工作。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似乎不太喜欢有人注意他，也不太追求名望，但是，他却很在意他对别人所做的事情产生的影响。他对于自己干下的事情没有懊悔之心，以前也许也攻击过其他妇女。如果他有男女关系，这种关系多半不太稳定。对于有喜欢主持事务的性格的妇女来说，他不太容易与她们保持关系。"

班克斯是进行过许多宗凶案调查的老手，他承认说，这个案子办起来的确有些吃力。"使我个人感到恶心的是，那个小姑娘也受到性攻击。鉴于伤口的性质，我们不知道萨曼莎是否也遭到了强暴，不过我们的化验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英国警视台的节目之后，我有 3 个月没有接到调查组的消息了，这个期间，我又愉快地回到了国民医疗服务处的工作上。同时，我还被克伦威尔大街上的那桩持续不断的搜查工作所缠绕，并且要为尼克尔案的审判工作准备文件。

"我们觉得已经抓到他了！"米基·班克斯打来电话说，我能够想像出他的手在空气中胜利挥舞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公寓里有他的印迹——我们以为已经排查了印迹，结果却找到了一个相符的对象。28 岁的罗伯特·克利夫·纳帕尔在当地一家塑料厂工作，他曾出现在那一带。他的一些外貌特征也相配。"

"哪些外貌特征？"我问。

"这也正是我想跟你谈的事情。我们已经将他与数起强奸案联系起来了，还有一些东西我想先给你看看，然后再逮捕他。"

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烟雾迷漫、边疆风格的泰姆斯米德警察局。案头工作似乎增加了，专案室的每个桌子边上都堆着成袋的文件和证言。很明显，复印机早已经坏掉了。

办公室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后，班克斯点起了一只烟，然后直接谈

起事情来。

"你盯得很准。他跟心理轮廓描述上的特征很相符，一直到档案都一样。我们还觉得他跟一系列强奸案有关联。就是艾塞斯通的强奸案，你知道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一直想理解他说的话，因此我的注意力没有跟上。

"就是绿链强奸案吗？你有多大把握？"我最后问。

"做完DNA测试后，我们会有他妈极大的把握。"

现在，我有更大的需求要发现关于罗伯特·纳帕尔的一切了。如果他就是绿链强奸者，我希望找出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候才找到他。萨曼莎和佳丝明被谋杀之前的12个月里，他一直在作奸犯科，很少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纳帕尔是通过一系列指纹和掌纹辨别出来的，那些谋杀现场的印迹原来以为是萨曼莎的。关于那个指纹的分类问题，一直都存在混乱的情况，因为从萨曼莎的尸体上取下来的第一套指纹质量很差，而且极不平常的事情是，她的指纹跟纳帕尔的指纹特征十分相似。

这意味着在卧室的门框上、阳台的栏杆上和佳丝明的床衬子上发现的印迹一开始都被认为是萨曼莎的。只到后来又从受害人身上提取一套排查指纹以后才确证，这些指纹原来都属于罗伯特·纳帕尔。

"他并不是作为萨曼莎的朋友或者熟人出现的，"班克斯说，"阳台上的印迹表明有人爬进公寓里。"哪怕在他还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比我为艾塞斯通行动起草的心理轮廓描述和为普鲁斯泰德谋杀案起草的描述了。一些细节逐步到位。萨曼莎的公寓几乎处在温斯公园的最南边，而在北边，越过一片草地就是第一次强奸发生的地方。萨曼莎和简尼都是人人知道喜欢在自家后园里进行日光浴的人，而且萨曼莎还半裸着身体在家里走来走去，根本就不拉下她的窗帘。两个人都不喜欢插门，两个人住的地方都是别人可以一眼望见而同时又不吸引别人注意的。

刑警们在纳帕尔身上做了一次家庭作业。班克斯桌上堆满了情报机构提供的有关该名嫌疑犯的已知事实。这正好就是他想让我看一看的东西。能够证明纳帕尔出现在西斯弗尔德台地的公寓并不能

够证明他杀害了萨曼莎和佳丝明。他有可能声称是一个朋友，并且他可以说自己是在谋杀的头一天顺便去看望过她。

纳帕尔住在普鲁姆斯泰德大街一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是租的一间房，并且在普鲁姆斯泰德的格林东塑料厂工作。他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还上过阿比伍德综合学校，之后他以7门课合格的成绩毕业，并学了一门可以拿市镇与行会文凭的餐饮业课程。

自那以后，他很少不上班的，虽然做的都是体力活，在早期强奸案发生的时候，他当过出版业和国防部的仓库保管人。他很守时，根据同事的看法工作也做得相当不错，但一向独来独往。

他第一次为警方注意是1986年8月，当时他持有上了膛的手枪出现在公共场所。他被判处附条件免责，并课以10英镑的罚款。

第二个日期引起了我的注意——1992年10月29日——那是我为艾塞斯通强奸案起草的心理轮廓描述打印出来的同一天。纳帕尔因为要求一名印刷商复制50张大城市警察局(格林威治)的信纸而在普鲁姆斯泰德被逮捕。那名印刷商等待纳帕尔前来取件的时候给警方打了电话。在他的住址搜查找到了一把点22毫米的手枪，244发子弹，两把刀，一把石弓和6枝箭矢。纳帕尔承认无证私藏火药罪，并被判处连续两个为期8周的拘留。法庭文件包含数处指称他有精神病的记录，还有判刑之前要求进行体检时出具的一份精神病报告，其结论是纳帕尔"毫无疑问对他本人和公众都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是萨曼莎和佳丝明·比塞特谋杀案发生之前12个月的事情。

班克斯说："我们还拿到了那次调查的复印件——他们从他房间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日记、信件和地图。"

我直瞪瞪地看着他，努力想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纳帕尔与那些强奸案产生联系的根据吗？我心里在想。

班克斯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些东西，保罗，看看它们是否能够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手头上的这名嫌疑犯的事情。你可以拿一些复印件回家，但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些复印件由一些便携本日记、手绘的地图、在旧信封和报纸边缘上记的一些字样，尤其重要的是一本伦敦字母顺序指南。当我开始研究纳帕尔的文件时，他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很模糊的，但是，有清晰的迹象表明，阴暗的思想主宰着他的思维。

奇怪的字眼和短语出现在他手绘的地图上，包括“在腿上绑胶带”，这指明准备束缚某人的方式。他还提到特别的一些街道，并指出了地图上的参考号，这与伦敦字母顺序地图相符。在他的袖珍日记里面，他还提到了不同的女人的名字，但没有提到其中任何一位是长期的女友或者是朋友。有一条上面有一个地址，但后面又有一句“湿胀淫秽的母狗”。

我还可以看到偏执思维的迹象。在日常笔记当中有提到牙医和退税的事情。纳帕尔提到跟一些人发生的争论，还有他担心食品里面可能有人做了手脚。他相信人们在背后谈论他，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最有趣和最令人不安的文件是街道地图。伦敦字母顺序指南上的一些特别页码上都做了标记，是用黑色的大墨点做的，指明某个位置，其他的一些地方还做了短横标记。大部分标记都集中在伦敦东南的普鲁斯泰德、伍尔韦奇、贝克斯雷希斯、艾尔泰姆和艾塞斯通地区。

“这就是使他与强奸案发生联系的东西？”我看着班克斯说，希望他予以确认。“其中一些标记有对应，但并不是所有标记都找得到对应事件，”他说，“看起来墨点比实际发生的强奸案要多一些。”

他解释说，伦敦字母顺序指南里面曾夹着一张会员卡，是艾尔泰姆的一家健身中心会员卡。它属于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人，当时住在艾尔泰姆格兰治希尔路。纳帕尔不知怎么拿到了她的卡，而且还将它放在字母顺序指南的合适页码里，上面还圈着格兰治希尔路。

“我们跟她谈过话，但她从来都不曾听说过纳帕尔。”班克斯说。

“那她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

在纳帕尔的文件里面还有一些自己手绘的地图，都是私密得多的东西，它跟踪的是一些特别的公园或者街道，还包括极小的一些细节，比如暴雨水闸、福斯片孔、排水渠、沙坑和二战时期的弹壳。某些通道和人行道都与一些草区和通行门道有联系。

“他不仅仅是在划定强奸地点，”我说，“其中一些标记也许是瞭望地点，他知道那些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女人，他可以在那些地方观察而不被人发现。另外一些标记有可能是藏匿之地，他可以将一些纪念品和工具藏起来。”

"这些藏匿地是什么意思?"

"你得自己想一想,他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然后看看他的草图,还有他所指的孔洞及排水处的深度。他非常了解这些地方,可以轻易地藏起他的刀子和其他战利品或者纪念品。"班克斯往前倾了倾身子:"他去那些地方的频率会有多高?"

"我不知道,但这决不是他会忽视的事情。"

"我们盯他的梢有意义吗?如果我们观察他,他有可能会带我们去他藏东西的地方吗?"

"极有可能。"

班克斯知道这是一项困难的决策。让纳帕尔留在那里意味着观察他,而且不能让他溜掉,因为如果他是杀死萨曼莎和佳丝明的凶手,他就构成严重和随时发生的危险。同时,刑警必须证明自己有理,而且希望拿到不止是指纹的证据。一件凶器或者比如萨曼莎腹部丢失的那块"纪念品"也有可能会消除任何疑虑。

当监视行动展开的时候,我又回到家里研究纳帕尔的文件和他生活以及活动时间方面的细节。

英国警方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一旦发现某个特别的嫌疑犯,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打通信息渠道。

纳帕尔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普鲁斯泰德警察局的情报档案中,因为自 1992 年 10 月被逮捕以来他已经两次引起警方注意。最值得一提的一次是 1993 年 7 月,也就是普鲁姆斯泰德凶杀案发生的 4 个月后,有人看见他晚上 9 点 30 分在普鲁斯泰德市路瑟格伦路的一栋房子的后园里。一个丈夫及妻子报告看见一名男子在他们的侧墙边,正朝隔壁人家张望,那里面有位 24 岁的漂亮金发女郎习惯于半裸着身体在屋子里面走动,而且窗帘都没有拉上。

妻子给警察局打电话的时候,丈夫尾随闯入者,并向警方指认罗伯特·纳帕尔。纳帕尔很快就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问及其活动时,他耸耸肩,说自己不过是"散散步"。

证人说纳帕尔从后墙跳下时好像掉下来什么东西,但搜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找到。其中一名警官在记事簿里写道:"此人奇怪,不正常,应该被考虑为可能强奸犯,淫猥型嫌疑犯。"

同样重要的是那个地点。路瑟格伦路的房子都朝着博斯托树

林，中间只隔着一块田，那是绿链路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都应该立即将纳帕尔列为系列强奸行为的重大嫌疑犯。除开当地警察熟知他以外，他还符合心理轮廓描述的其他许多标准，包括侵入住宅罪的可能，还有他对当地地形的熟悉程度。

我的心理轮廓描述描述嫌疑犯必须以3种方式之一引起警方注意：

1）公众提供的信息，或者当地警官提供的信息；

2）作奸犯科时被逮住；

3）针对记录检查时进行的排查过程当中。

他迟早会落入警方法网，关键是找到他所有的问题。

我最初的反应是极其愤怒和悲哀。同时，我并不知道艾塞斯通强奸案调查小组所面对的是哪些困难，是什么东西影响到了所做出的决定。我只知道12个月后一位母亲和女儿已经被人杀掉了，现在看起来，那个杀手极有可能就是绿链路强奸犯。

监视行动继续了10天之久，这期间，纳帕尔保持着正常的活动规律，上午7点30分离家，步行到塑料厂上班，他在那里上12个小时的班，然后回家。周末的时候，他去伦敦西区，看见他去了好几家店子，都是卖普通色情杂志的店子，还在一些户外遗物店里看刀具。

回家的时候，他没有搭乘去普鲁姆斯泰德的火车，而是坐车去了希德卡普，并开始顶着瓢泼大雨行走在后街上，然后才乘汽车回到普鲁姆斯泰德。这样的行走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也许包括了他最喜欢去的一些地方，他要去看那些房子里面的妇女。

因为看不出纳帕尔可能会显露他的"藏匿所"的迹象，班克斯决定于5月27日星期五逮捕他，正好就在法定休假日之前的一天。他请求帮忙设计一个讯问策略，并希望知道我是否可以到伦敦去参加初期的讯问。

星期五一大早，警官们在普鲁斯泰德大道135号外面集合，那是很大的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全都分隔成了小单间。早晨9点40分，他们进去逮捕了纳帕尔，理由是涉嫌谋杀普鲁姆斯泰德市西斯费尔德台地区的萨曼莎和佳丝明，同时还有一系列严重的性攻击行为。他被带到外面并推上警车时，纳帕尔说："我在报纸上听说过凶杀案的事情，我不认识萨曼莎·比塞特。我从来没有去过你们所说

的那个地方。"这话被执行逮捕行动的警官记在笔记本子里面了。

警察在一楼的一居室搜查完毕之后，他们请我再去里面看看，说不定可以再找到一些有可能帮助设计讯问策略的东西。房间很小，很干净，东西放得很整齐，里面有一个衣柜，两把椅子，一张餐桌，但没有床。这使房东非常惊讶，他出租这间屋子的时候，里面是有一张铁架床的。纳帕尔的物品有衣服、皮箱、鞋子、电视、音响，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只带挂锁的的红色金属工具箱。

打开箱子之后，发现盖子里面有一张用透明胶带贴着的卡片，上面写着："孤独？厌烦？喜欢刺激？希望有人注意？希望见到一些奇怪的新人？那就让你的安全容器开着吧。"

取下卡片之后，在卡片的反面发现一个足印，是阿迪达斯幻影篮球鞋印。这种鞋在英国销售的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它与在萨曼莎家厨房里发现的带血迹的足印相符。

在工具箱的顶层盘里是另一份伦敦字母顺序指南。经过检查后发现，这里面包含更多的标记和奇怪的注释，包括在西斯费尔德台地1a号旁边打的一个墨点。下层的工具盘里有几页从武术书里复印下来的书页，上面有手写的注解和绘图。武术书描述如何控制并制服对方。我特别注意到一个颈部示意图，显示各种人类肌肉工作的相互影响的原理。另一张显示人体躯干内部的解剖学结构，而且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萨曼莎的肋骨架被拉开和她的内部器官裸露出来的样子。

在他的笔记当中，纳帕尔还画了极大的一些字样图，这些字表面看上去毫无关系，但由一些箭头连着，或者散落地分布在一张纸上。他还从一本字典里面摘抄出了一连串的词汇及其意思，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与死亡、控制、捕获与扭曲关系相关。

他提到女人时都是一些毁谤的字眼，暗示她们提供"即刻的阳光"，但只是想利用他。在一个地方，他利用了这个短语："蒙格利法"，明显是指在活体和已死亡的受害者身上进行外科和心理学实验的那名纳粹医生。

我看过1992年因为以前的罪案而从他的房子里搜查出来的信件和地图，拿那些材料与后来的这些材料对比我觉得非常有趣。所有这些东西都确证了我的一个信念即：纳帕尔有一些隐藏地点，是他

用来珍藏贵重东西的。我没有看出有任何东西能够指明这是一个失控的人，反过来，他是一个告诉自己去监督、计划而不要匆忙行事的人。

纳帕尔给带到了贝克斯雷警察局接受第一次讯问，他看上去很镇定，很平静。米基·班克斯看上去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心情还不错，但他明白，工作还只做了一部分。我提醒他不要指望纳帕尔会因为焦虑而轻易承认任何事情。

“我知道很容易认为他已经疯了，但是，这个人今天完全把握住了自己，”我说，“他有足够的智力预先认识到一些提问的线索，因此会尽力不使自己牵连进去。开始，你们问到一些泛泛的事情，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时也许觉得他很合作，但你用更确凿的证据来对付他的时候，他很快就会‘不作评论’。”

意识到以前的一次精神病检查已经突出说明了纳帕尔的风险，我已经提出建议，问询期间应该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

纳帕尔对执行逮捕的警官所说的声言现在非常重要了，他当时说不认识萨曼莎，也没有在她的公寓里见过她。如果他在讯问期间仍然坚持此说，则会确证他有可资证明的撒谎行为，因为他的指纹已经在现场找到。但是，确证的方式必须是这样的，它不能够标示这份声言对调查的关键作用，同时又不能够捉弄或者诱导他，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行为。

我对班克斯说，讯问的交互式风格必须是命令式的，但也必须是温和的，因为纳帕尔会意识到对己不利的线索，并因此而产生隔膜。他们必须确定他对包括工作日程、业余生活和社会生活在内的日常起居的陈述。这可以用来引导出他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史。

“最后要开始集中在他的性欲上，请他解释他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以致于使他第一次发生了攻击行为？应该抱怨谁？给他一个在心理上保留脸面的机会，让他去怪别人，比如他的父母、早年的生活或者任何一个勾引了他的人。”

“然后问他萨曼莎有什么东西吸引他去找她的？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或者她过去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以致于使他别无选择，只好杀掉并切开她。”

“这时候没有必要提起佳丝明——以后再来谈她的事。”

我建议他们转到凶器的话题上来，问纳帕尔如何搞到刀子的，他觉得有什么地方吸引他。如果他说出超自然的东西，或者恶魔，或者表现出其他的一些精神病症状，他们不能够反驳他，也不要显出不相信的样子，而是继续收集信息，继续谈下去。最后，他们可以拿出在她家找到的指纹，并问他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次讯问于下午4点01分开始，我在隔壁房间通过现场录像带观察。纳帕尔身高6英尺2英寸，棕色头发，已经开始谢顶了。他轻松地坐在椅子里，看起来极聪明，初问期间非常自信，很有礼貌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让他签署执行刑警阿兰·杰克曼警官的非常重要的逮捕记录时，纳帕尔同意并签了字。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证实的谎言。之后，让他私下里与律师谈话，然后开始"不加评论"的警方问话。

第二天，就绿链路的强奸案对他进行了讯问，他在几个小时时间里一直东扯西拉，显得非常镇定。他说他的地图和伦敦字母顺序指南上的标记只是一些"胡写乱画"的东西和用来指示他的培训路线和里程标记点。问题更直接地集中到警方声称他所犯的罪行时，他马上就闭口不言，什么问题也不回答。

5月29日星期天，他被起诉犯有杀害萨曼莎和佳丝明·比塞特的罪行，并予以拘留。

刑警继续讯问有关强奸的事情，7月4日星期一在苏斯沃克警察局进行了现场队列身份辨别。受害人林娜和卡茜直接挑出了纳帕尔，苏珊觉得有点像他，只有简尼无法挑他出来，攻击他的男人当时戴着面罩。有趣的是，在艾尔姆斯泰德草地受到一名男子攻击的那位遛狗的教师曾说那男子智力低下，但她却没有把纳帕尔挑出来。这使我原来的想法得到印证，她是受到另一名男子的攻击。

因为有了肯定的辨别和有力的DNA证据支持，警方起诉纳帕尔还犯有强奸罪。同时，搜查活动还在继续当中，要研究他的生活方式的细节和平常活动。从他的家人、同事、以前的房东和偶尔的熟人那里取来的证言，这些东西都有助于形成纳帕尔的大致图像。其中大部分人说他是一个奇怪和不爱出声的人。他按时交纳房租，晚上散很长时间的步，回来的时候极仔细地清洗自己的鞋子。

纳帕尔是4个孩子中的长子，他的早年生活受到婚姻内暴力、父

母离婚和在继父家生活受限制的很大影响。他是母亲保琳养大的，小时候住在离普鲁姆斯泰德不远的阿比伍德区，不久他就因为逃学和小偷小摸引起人们注意。

他越来越调皮捣蛋，行为很反常了，因此被带到康贝韦尔的莫德斯雷医院去看了病，并继续治疗了6年。他的病情在12岁的时候严重了，当时，一位表亲带了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回家，这个人就带孩子们出去野营。他受到了性虐待，那个人后来也坐了牢。

纳帕尔到少年期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只在需要的时候才跟别人说话。他极讲究卫生，达到过分的程度，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留在自己的房间内，只有欺侮他弟弟或者去偷看他姐姐穿衣服的时候才出来。

离开学校并完成了餐饮学习之后，他做了好几种不同的工作，直到21岁才离开自己的家，当时就搬到了普鲁姆斯泰德现在的单间。他母亲记得1989年9月初发生过一件事，当时，纳帕尔出门好几天不见人影，还过量吃药想自杀。后来，他解释说有些人在后面追他，因为他在普鲁姆斯泰德公园强奸了一名妇女。

保琳声称，她去警方问过，但是，当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强奸案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入室强奸是在自杀企图的4个星期之前，简尼的房子也就在温斯公园后面。温斯公园一带，当地人经常称为普鲁姆斯泰德公园。

进一步的搜查和现场混杂队列辨别还填补了攻击简尼与苏珊之间3年的"空白"。一批妇女指认纳帕尔是对她们实施强暴淫猥行为的人，或者对着她们露阴，或者在她们家的窗户上偷窥，或者跟踪她们回家，或者蹲在树丛里等候她们接近。这些事件可追回到1988年的早期，并且连续数年不断。

在罗伯特·纳帕尔的审判之前，调查小组建议我也许可以就我的作用出具一份证言，还可以讲一讲我为艾塞斯通强奸案和普鲁姆斯泰德杀人案所起草的心理轮廓分析之间的类似性出具证言。最后，没有必须让我拿出证据，尽管到时候我还是得知了在强奸案调查期间发生的事情。

后来暴露出来的事情是，事实上，纳帕尔作为强奸案的疑犯已经接受过讯问。两名刑警根据邻居提供的消息于1992年8月28日在

他上班的路上截住了他。纳帕尔身高 6 英尺 2 英寸，比警察寻找的那名身高 5 英尺 7 英寸到 5 英尺 9 英寸的嫌疑犯高得多。另外，他以前没有犯过性攻击罪，也自愿进行 DNA 测试——这使警察觉得与一个有罪的男子的行为不太相符。结果，调查的时候他被排查出去了。

提到他身高的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两个星期之后，我为艾塞斯通案件提供心理轮廓描述，英国警视台还播放了其中一例强奸案的再现情景，结果引起公众打来 1000 多通电话，这使以前的一些证据顿时没有一点力量了。因为有这么多的线索要去追查，调查小组就决定建立一个"排查代码"，这会帮助警官们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在艾塞斯通行动中，这个代码包括一些明显的排查参数，比如嫌疑犯的 DNA 码对不上，或者在性攻击发生的时候正在蹲监狱。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害人和证人进行的描述。它将罪犯的年龄划定在 19 至 30 岁之间，他的身高限定在最低 5 英尺 5 英寸，最高 6 英尺之间。这里没有考虑到最后一次强奸的受害人描述攻击者为至少 6 英尺以上的事实。

根据这样一种代码，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调查名单上，罗伯特·纳帕尔作为一名可能的嫌疑犯就立即给排查出去了。因此，他不会在一个方便的日子去艾尔泰姆警察局提供血样、照片和掌纹。

当我研究排查编码方案时，一下子就看出来，在建立排查参数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心理轮廓描述的用途，这之所以造成了不幸，是因为一个心理轮廓描述的主要价值经常就在于使潜在嫌疑犯的范围更加窄小，从而使警方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最有可能的一些嫌疑犯身上。

最后，到 1993 年 3 月的时候，艾尔斯通行动调查和排查了近 900 名强奸嫌疑犯，之后决定终止行动，因为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攻击行为。此时，调查人员又采取了 390 次调查行动，但仍然没有完成调查任务。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我在想。我知道事后发表评论很容易，我也是第一个知道警方在调查暴力犯罪时肩负着压力的人，但是，看起来似乎有如此之多的警示信号和线索被误判或者被忽略，萨曼莎和佳丝明·比塞特本不该被人杀死的。

我总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本可能做得更好的。强奸案的心理

轮廓描述递交过去之后，我本应该多加追问，多在意一些的。我知道自己的一些结论并没有为人所接受，我本应该说："听我说，这才是你们能够找到他的地方。检查一下你们的记录，跟当地警方谈一谈。"我应该请他们倾巢出动，四处寻找，"否则我天天去你们家插门，直到你们出来为止"。

罗伯特·克利夫·纳帕尔直到10月份在奥贝雷接受审判之前仍然在坚持声称无罪，当时还花了数天时间进行法律辩论，看他是否在精神上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审判。5名精神病医生达成结论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或类似精神病，但纳帕尔死命掩盖自己内心的疯狂。

1995年10月9号，就在陪审团裁决他是否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审判的几分钟之前，辩护方决定在萨曼莎和佳丝明的案子中声称无故意杀人罪，但可在责任减轻的前提下承认过失杀人罪。他还承认了1992年的一桩强奸案和两例强奸未遂案。

大法官胡珀先生接受了辩护方的辩护，说纳帕尔应对数起"恶劣"犯罪行为负责，并对"公众形成了严重和现实的威胁"。他判令对他予以关押，"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可悲的是，这个判决对萨曼莎的母亲玛吉·莫里森太太来说太迟了，她于3天以前在阿伯丁南方的家中去世。根据她丈夫杰克·莫里森这位退休的建筑工人的说法，她从来都没有从"受难之地"恢复过来，因为她以如此难以接受的方式同时失去了女儿和孙女。

莫里森先生赞扬警方，但说整个警察制度已经失败。"警方在整个调查行动当中表现出色，但是，像纳帕尔这样的人本不应该带着杀人的自由在街上放任的。"

19 恐怖之屋：杀人者的天堂

搜查活动开始8天之后，在克伦威尔大街25号已经挖出7具尸体，克伦威尔大街25号也被贴上了"恐怖之屋"的标签。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都关上书房门研究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讯问录音，希望在里面找到我有可能错过的东西。我还能告诉约翰·班

内特一些什么东西?

3月7号他打来电话,脑子里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尽管警方展开了广泛的调查活动,但还是没有找到韦斯特的前妻雷娜·柯斯特罗,也没有找到最大的女儿卡尔玛因。自1969年之后,从来没有人看到或者听说雷娜,当时,她据说是跟韦斯特一起住在肯普雷附近的一辆拖车房里的,离格鲁斯特约有15英里。

卡尔玛因和她的妹妹安娜·玛丽一直跟她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并于1971年搬到了米德兰路25号。那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卡尔玛因的时候,当时她仅8岁。

"韦斯特先生对此有何说法?"我问。

"他说雷娜回家带走了卡尔玛因。"

"我觉得她们已经死了。"我悲伤地说。

"是啊。"班内特回答说。

我们两人都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此事。警方必须回到韦斯特生活过的所有地方去寻找。这样一次行动的后勤费用和成本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会在哪里结束呢?有多少栋房屋必须拆掉?又会有多少工作地要去询问?现在生活在那些地方的那些可怜的人怎么办?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在克伦威尔大街又找出两具尸体——第一具隐藏在侧屋浴室地板下面,第二具藏在地窖里。现在已经找到了9具尸体,警方相信可以确认其中5具尸体的身份。查找失踪人员是一项庞大的活动,一直查到了远到荷兰和德国。

一周之后,班内特又打来电话,极希望我回到格鲁斯特去。病理学报告已经做出来了,他希望我了解有关讯问韦斯特先生的最新情况。

"我可能星期四能够到。"

"那太好了。"他说,之后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准备补充什么一样。

"有什么我特别应该知道的吗?"

"嗯……啊……骷髅上有些骨头不见了。"

"不见了还是尚没有找到?"

"不见了。我们挖得非常彻底,"他说,显得有些暴躁的样子,"主

要是膝盖骨和颈椎骨，但也有一块肩胛骨和部分胸骨不见了。”

这可能有数种解释，我告诉他说。骨头有可能被当作战利品给取下来了，或者在捆绑或者折磨过程中给取下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但我现在不想谈。等星期四再说吧。”

班内特卷起他的衣袖，一直卷到了肘部以上，脸上还挂着在办公室工作了一通宵的疲倦神情。在他的周围，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计算机打印出来的东西和拼图。已经检查了数百份失踪人员档案，并进行了交叉检查，并与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一家人的已知移动路线进行了对比。图形上列好了尸体的号码、位置以及发现的顺序。

班内特是一名老派的刑警，出生在斯特劳德，并在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他比许多年轻的警察更快地掌握了现代科技工具。他为这个案子专门请来了软件专家到专案室来，并以典型的乐观口吻告诉我他是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

“我告诉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这样开始，一边抬起眉毛来，确保自己得到完全的注意，“我梦见我们将所有失踪人员的日期和地点登记下来，然后与我们所掌握的韦斯特先生的不同信息进行对比。这是非常有用的。你能按这个要求编成软件吗？”

那位软件专家早已经在他面前局促不安了，他说：“嗯，其实并不存在那样一种软件。以前也从来都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班内特笑了笑，然后发出了较为温和的指令：“嗯，你去吧，等你找到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谈。”

几天之后，这位专家回头来找他了。“我做好了。”他骄傲地说。

“太好了，”班内特对他说，“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接着，这位高级调查官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做了一个梦，”——说着眼睛闪了闪光——“计算机已经为我做好了这件事，但我希望它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给我看——”

然后他希望能够为每位受害人建立一个数据库，不管是已知的还是正在辨别过程当中的受害人，再使这个数据库能够与保存着用计算机生成的克伦威尔大街25号的各种图形以及尸体发现顺序的数据库兼容。

班内特以这种方式集成和展示尽量多的信息，他知道这有助于

他跟踪一场大规模调查行动的整体图景。它还能够帮助他预测韦斯特有可能设置的障碍，并迎击在未来的审判中辩护方肯定会提出来的挑战。

“这个我们做不了，”那位专家以道歉的口吻说，“一个系统可以做一件事情，另一个系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它们属于不同的公司，而且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开发的。”

“那你去想个办法让他们拴在一起。”班内特说。

“但我们不允许这么做的，软件都有版权保护的。”

“啊，那你把那些公司找来，让它们想办法。”

那位计算机专家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听我说，”班内特说，他的声音更大些了，“这件事情跟我的谋杀调查案有关。如果机器检索柱形图跟这次调查活动相关，那我就在外面的机器上装载这个系统。你去干吧。”他真的干了。尽管他们两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工作关系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计算工具的开发，它对未来的凶案调查人员有极大的帮助。

班内特打开一份文件，讲述了已经辨别出来的那些受害人的细节。4 名女性，其中包括 21 岁的大学生露西·帕丁顿，是在公共汽车站或附近失踪的，第 5 名显然是绑架来的。

卡罗尔·库柏 15 岁，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 1973 年 11 月 10 号下午 9 点 30 分，看见的人是一名公汽售票员，她跟男友一起去了电影院之后在沃切斯特她祖母家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下车。朱安莉塔·莫特 17 岁，是纽恩特人，1975 年 4 月 11 日失踪，此前她对家人说，她要搭乘去 10 英里之外的格鲁斯特的公共汽车。谢蕾·哈巴德 15 岁，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 1974 年 11 月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她离开沃切斯特的德本汉姆斯商店之后乘车回家。特里萨·西根哈勒是瑞士特拉勃的一名 21 岁的大学生，学社会学，她 1974 年在伦敦当保姆，当时她给哥哥写信说要去爱尔兰过复活节。她计划搭便车去威尔士的霍利海德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乘渡船。

最后，班内特回到了病理报告上，并递给我一个副本。正如我所担心的一样，报告显示，6 个埋人坑里都有证据说明受害人死前曾被捆绑并堵住嘴，被棕色包裹胶带缠住头部，形成粗糙的面罩。在这样的“面罩”底下，有一根狭窄的前端卷了起来的塑料管，一直插进鼻孔

里面。

看着那些照片，我感到深深的悲伤。在我看来已经很明显，那根管子用来让受害人活着，并保证各种可能性，可以令他们对她为所欲为。她无法看到，也无法喊出来，她只能处在他们的完全控制之下。

班内特翻过这一页，指着已经不见了的骨头。“还有其他一些很怪的事情，”他说，“有些较大的骨头上面还有印记。病理学家说，从肢解尸体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无意义。”

“在我看来它们是有意义的，”我说，我从照片上抬起头来，“当你剥肉的时候，经常会在骨头上留下刀痕。”

班内特的脸色大变。

我说：“这就是我不想在电话里面说的原因。我怀疑这种仪式里面还有食人狂的成分。这能够解释有些骨头不见了的现象。”

“不！”他说，一脸惊恐万状。

每一份新的信息都确证了我原来对所发生事情的分析，但是，如果我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真正进入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思想，那么，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去就显得很重要了——“恐怖之屋”。

特里·莫尔建议我们从车站走着去。我们在明亮的太阳底下肩并肩走过去，穿过较为安静的街道和方形房屋，走过已经开始长出花蕾的树木。当我们接近那所房子的背后时，我注意到很大一台电视转播车在那里，还有一口天线锅指向天空。几名男子站在附近，其中一名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停留在我脸上，就好像我看上去与他很熟悉一样。我感觉不舒服，于是继续走路，不想被人认出来。

我们离开大路向左转弯，进入数栋房子后面的一条小路。在正对着25号后侧的园中，我注意到一个脚手架和用厚木板搭起来的“正面看台”，莫尔解释说；那是一位有心的邻居搭建的，目的是让各处来的摄像和摄影人员能够拍到挖掘的情景。

已经从后园里挖出300多吨的泥土，看起来就跟一战的战场一样。现在，泥泞的长方形地块又重新填上了土，上面铺上了木板道，一边有冷杉树挡着，另外一边是七日再现会的红色砖墙。

“希瑟就是在这里找到的，”莫尔说，他指着脚下的一块地，“另一具尸体也在这里发现，第3名受害人的尸体是在那里找到的。”

韦斯特先生在70年代初期建的偏屋只有一层，那里面就好像是一块遭了浩劫的地盘。警方弄走了地面装饰物、壁脚板、家具、固定装置和装配件。一个房子如果成了犯罪现场，科学家开始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家了。使它成为安逸、隐蔽之所的一切细节都没有了。哪怕仍然留在那里的一些东西——卫生间的剃须用具、电话簿、装满衣物的衣柜——也会让人产生一种阴郁的感觉。

我们穿过房子靠后的一间卧室，进入厨房区，那是水泥地面的一个大房间。“你在想什么？”莫尔问。“我在想弗里德里克是个极差的建筑工。角对角做得很差。他到底是靠什么为生的？”莫尔笑了笑。

工作面和水槽还留着，我可以想像这家人曾坐在餐桌前吃饭，炉子上的锅里还在冒着水汽，食物装满了他们的餐盘——就跟别的人家一样。可是，我还知道这就是韦斯特所说的铺下床单肢解人体的地方。

离开厨房之后，在这栋房子的最后面，有很小的一个卫生间。这就是琳达·高夫的尸体被找到的地方，她就埋在浴室底下。她是1973年4月失踪的，离自己20岁的生日还差两天，当时，她在格鲁斯特巴顿大街的合作商店当缝纫女工。

我踩着碎石和破碎的灰泥向前走，走进更普通的一个生活区，这里的家具都已经搬走了。地板和后墙上有很大一个整整齐齐的圆洞，带绞链的活门已经打开了。我沿着滑溜溜的踏脚处低头小心翼翼地往下爬，进入了一个半地窖，人还没有完全下到地面以下。

这个地窖约7英尺深，12英尺宽，20英尺长，看上去就好像有人按照图索德夫人的“恐怖室”做了一个低成本的翻版一样，只是没有了蜡制人像而已。银灰色的指纹尘迹盖满了几乎所有的表面，已经破成一片片的儿童墙纸卷起来挂在墙上。

这个地窖明显一开始是用作储藏室的，然后又改装成了孩子们的卧室。里面没有窗户，但整个空间现在为强光检查灯所照亮，这些灯都挂在钩子上，或者夹在柱子上。地面只不过是一些深洞、硬土堆、湿黑的泥土，现在上面都搭上了木板道——里面非常之黑，就好像会把光线全都吸入进去一样。每个洞里面都装着不同的年轻妇女的尸骨。

墙纸下面是孩子们天真的涂鸦之作，有卡通人物和连三子棋游

戏。但也有一些更凶险的图画，根本就得不到解释。上面有用油漆涂上去的骷髅，或者用镂空板镂刻出来的鬼影，四处都是，在我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它们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整齐的定向侧线，指明各处埋尸点的位置。也许这对于韦斯特先生和夫人很重要，因为它们能够跟踪其“宝藏”的位置，这些鬼影能够让他们想起埋在地下的死尸。

然后，我注意到顶上有一只钩子，看上去并没有直接的用途，但它有可能轻易地挂起一个人来——将某人挂起来捆住。地窖本身是囚禁人的最佳地点，没有人能够看见或者听到，可以对一个人施加的控制几乎是彻头彻尾和完完全全的。

从地窖爬出来以后，我转身通过一个门道进入这栋房子更原始一些的地方。一道窄梯子升到二楼。爬到一半的地方，我转身看到我认为极其重要的某种东西。在门的后背是一张彩色招贴画——比真人稍大一些——那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她穿着透明的睡衣，双臂随意地搭在门框上，非常刺激的身姿。跟罗丝玛丽·韦斯特一样，她也有长长的黑发，而且是全身像。她的面部表情和身姿仿佛在说：“这里有极大的乐处。”召唤着看画的人进入她的世界。这是一条分界线。韦斯特夫妇每次通过这个房间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对面有什么东西。它代表完全的满足和他们另外的一半生活。

“这是罗丝玛丽的接待室。”我们到达二楼的时候莫尔说。照片并没有拍出真实的模样。跟任何一家有年头的妓院一样，扶手椅和靠背长椅上都盖着缎绒，一面墙上还挂着很大的挂毯，挂毯上有大海和棕榈树。对面是木刻的吧台，里面有白酒、烟缸、冰桶和鸡尾酒搅拌器。挂在吧台上的一个标牌上写着：巫术。

莫尔说：“大开眼界，不是吗？”我在房间里四处走动，看着几处有玻璃隔板和木制抽屉的展示柜。

“摸一下这个行不行？”我问。

“行。我们已经翻过了。”

展示柜里展示着不同的一些随身用具和一些普通的廉价装饰品，人们度假或者去教会市场的时候有可能会买的一些杂物。有几个玻璃容器放在一个隔板上，里面有普通的小古玩——零钱、打火机、发卡和一些手表。

"你知道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吗?"我问。

莫尔说:"为什么? 这很重要吗?"

"不再重要,在这个案子里已经不重要了。"

我知道,韦斯特先生和夫人慢慢品尝了他们对受害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本可以留下一些纪念品,是他们以后可以慢慢把玩的纪念物。在这个特殊的案子中,它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杀人者或者受害人尚不清楚,则这样的杂物会变成黄金般珍贵的东西。

打开一个抽屉后,我找到一叠家庭文件——是一些旧帐单、手册、成绩单和照片等典型的家庭杂物。每个家庭都有这些东西,它们有时候有助于显露这里住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普通家庭照片簿显示这个家庭的核心,也显示它是如何形成的。你会看到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的朋友和不断长大的孩子。你会看到他们所穿的衣服,房间装饰的方式以及生日蛋糕上的数字。离他们站得最近的那个人是谁? 谁看上去距离更远一些? 这幅图画是如何形成的? 拍照的人以谁为焦点? 受拍人有何等样的反应? 他们的关系如何? 所有这些都能够告诉你一些东西。

在韦斯特家的相册中,正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才意味着某些事情。许多常规的照片都没有了。里面有很长时间的间隔,没有任何东西显示一家人由于爱与和谐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理由是,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是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生活着的。他们是通过家制的色情像带而不是家庭相册来记录已经过去的时光的。

在同一层楼上,正对面的地方是一个小而单调的简单浴室。据韦斯特称,这是他肢解了希瑟的地方,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这个房间太小,不可能让他完成他所说的事情。

最后一层楼梯带我上了一个平台,这里有一个帘子挡着,帘子挂在一根杆子上。走进两间卧室中较大的一间,我为房间的宽大而惊讶,里面还有一张精雕四柱床,床柱和横档上画有很多色情内容的图像。

"罗丝玛丽就把那些男人带到这里来。"莫尔说。

我并没有回答,反过来却在房间里四处走动,透过很脏的窗户朝街上看去。

过了这个平台之后,还有更小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普通的双

人床，这里已经显出被人搜查过的脏乱样子。床头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洞，还有几根铁丝伸出来，像蛇一样弯下来，不知道要通往什么地方。这些是用于收听装置和摄像装置的，它可以监督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

不管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比普通的卖淫要复杂得多。很多人被邀请到这里来，喝一些饮料，畅谈一阵子，然后带到楼上去性交。这对韦斯特夫人来说不是一门生意——这是她活在世上的理由之一。

有一个术语称作“峰值体验”，它描述一个人一生当中这样的一个时期，此时，一切都汇集到一起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达到了自己的最佳潜力。一切都已经过千锤百炼，他们的感觉能够告诉他们一切，人生更为丰富，问题能够被热情有效地解决。它是一个运动员在盛大赛事的合适时刻达到最佳状态时所体会到的东西。

对于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来说，在他们进行性交和虐待的日子里，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峰值体验”。比较起那些荒淫无度的时刻来，别的一切都消退得远远的。整个房子就是他们实现色情幻想的游乐场。

走到阳光下就如同刚从黑暗阴湿的下水道里钻出来一样。我和特里·莫尔沿着克伦威尔大街走着，低头无语，直到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为止。这条街道跟别的任何一条街道都没有区别，如果你站到街道高处，会看到一条接一条的街道全都是一样的，它们彼此区别的惟一的东西就是警方在25号里面挖出来的东西。

下午出来购物的人在阳篷下窃窃私语，它们看着窗户里陈列的东西。儿童彼此追逐，被抓住的时候开心大笑，然后再次跑开。慢慢地，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远离了这些开心无忌的生活。当你在工作中的每一天都要体验这些丧亡之事时，人们会无法逃脱死亡的阴影。每次我都会沉浸其中，它慢慢侵蚀掉了我享受生活的能力。色彩照样明亮，阳光仍然温暖，人们仍在微笑，但不知怎么的，我却无法完全欣赏眼前的一切美景。

就跟在自己脑海里重放一盘录像带子一样，我开始重温那些细节和以微妙的色调画上去的图案，以及韦斯特夫妇的生活。这对表面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夫妇怎么会变成了一对杀人不眨眼的施

虐狂精神病人的呢？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使他们产生了这种需求和力量，让他们去绑架、拷打、强奸和杀害一批年轻女人的？

在许多方面，罗丝玛丽和弗里德里克·韦斯特与我们其他的人并无差别。造就了你我同样的发育过程也造就了这两个人，只有这些过程的内容产生了变化。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评估和诊断了一些拥有同样动机和病态的人。

对弗里德里克来说，这一切很早就开始了——是童年时代，当我们绝大多数人得到道德指教和管束，从而使我们束缚在社会之内，并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他的情况下，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找到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我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父母就一定是粗心大意的。很多儿童都受到过不公平对待，也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成长，他们并没有变成施虐狂杀人犯。他们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有更广泛的影响存在着，有学校也有重要的友谊，这些东西使他们产生了社会意识，也使他们害怕做出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事情。

当韦斯特先生成长并发现自己的性欲之后，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他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上了。他并没有真正学会把别的人也当作彼此不同和独特的个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需求和愿望，而且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他能够利用正确的文字，但对概念没有正确的把握，这就跟生下来就是色盲的儿童一样。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他们能够看到边缘，他们知道什么是交通灯。你甚至还可以坐下来跟他们谈绿草和红玫瑰，他们也可以对你说同样的话，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是绿色的，什么是红色的。

对于弗里德里克来说，感情——假如他有感情的话——那只是指他“自己的感觉”。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掌握这样一个概念：别的人也有感觉，而且别人的感觉跟他自己的感觉是一样重要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在他生活的所有方面，否则，他不可能存活下来，他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不可能付钱买东西。他有可能只是走了出去，或者干脆从架子上取走东西。有些精神病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弗里德里克自己的问题在他与女人的关系当中就能够表现出来。他没有诚实可言，没有对别人的尊重，而这是我们会见、追求和与之产生私密关系的人时最基本的要求。对他来说，女人只是性用

品，只能够按他所希望的方式予以利用。

他带着极强烈的性冲动长到了童年的晚期，又到了少年期。他经常需要伙伴，也希望女人能够立即到手。但是，他的欲望比他普通的社交能力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机会大一些，他没有技巧来跟聪明的女人交往，也无法跟他追求的女人来往。他也不能够让女人自愿地做他希望她做的事情。有些女人可能走到与之发生性交的程度，但是，她们很快会抽身走人，特别是当他希望实验或者更进一步的时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控制欲，不是因为对女人有怨恨或者敌视，这是很多性攻击者常用的心态，而是因为那是一种个人的丰富化需求，而且纯粹是出自对于快乐的追求。仔细的研究发现，这种态度也许跟他的第一次性交经历有关。

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会幻想到性，而且会手淫。他们的幻想内容经常会受到早年的性体验的影响，在家里，或者与学校的朋友，或者看了某些色情材料，而且会形成一个习惯。

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的人是在家庭背景里知道性活动的——不管那是因为父母、一位叔叔或者一位表亲的原因。可悲的是，他们经常被人勾引或者被逼迫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性活动。我看到过太多的例子，那些病人向我透露了他们的第一次性经验，都是发生在儿童时期，当时，一个男子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亲戚开始以性的方式触摸他们，或者以某种方式鸡奸了他们。另外一些人描述他们的姐姐或者表亲经常被人当作性对象来发泄性欲。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年复一年地进行，因此，它扭曲了他们看待性的方式和男女关系。

在学校或年龄相仿的团体背景下，上述大部分情况也适用，只不过表面的拘束更明显一些。在性的事情上进行试探的年轻男女知道，跨越界线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如果事情弄得对方不高兴，他(她)极可能会抱怨。

极常见的情况是，儿童暴露在色情材料当中，尤其是一些带有强迫因素的图片和文字。他们兴许会在看到一些妇女被捆绑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发现自己有性冲动，然后就开始将强迫、控制与快乐联系起来。

弗里德里克·韦斯特的背景当中一定出现过这样的因素，但是，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体验过这些生活，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更广泛的社会经验，更大的家庭，更重要的友谊，学校和他们与世界的接触都足以补偿发育期间的损失，并使他们与社会重新接触。因为如此，他们就慢慢害怕严重恶行的后果了。但是，在很小的一部分人身上，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不受社会以及社会制度约束的年轻人。他既感受不到真正的人情冷暖，也没有体会别人痛苦的良知。同时，他有很强烈的性欲，他能够找到的性接触与他希望进行的控制和主宰能力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隔阂。

时间长了以后，他开始通过强力实现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对于女人的需求。他不会认为这是强迫行为，也不会觉得那是强奸，因为他除了自己的感觉之外并不管别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一个女人怎么想或者说什么无关紧要。"我现在就需要她，她必须满足我的需求。"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不久之后，这样做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的控制权。

在大多数人际关系中，男女都会对彼此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忠诚，还有万事不能视作理所当然的。而韦斯特先生却没有这样的责任能力，如果有人期望他会产生这样的责任感，他就会非常生气。某个时候他杀死了一个女人，也许因为她对他提出了太多要求，因此而让他恼火。也许她怀孕了，然后问他："我们怎么办？"

"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他问。

"什么，是你让我怀了孕的。"

"你听我说，我们一起性交。我喜欢性交，而且对你也无害，那现在有什么问题？"

但这的确是个问题，因此他杀了她，因为就他那方面来说，没有任何理由不这么做。这跟扔掉一条野狗没有什么差别。同样，他知道抓住了会坐牢，因此将尸体埋了起来，然后编造一个故事掩盖她失踪。

韦斯特先生最后就是这么向警方解释他杀人的原因的，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为方便而杀人极有可能是他最初的动机。但是，根据他后来在克伦威尔大街里对那些受害人的所作所为，很明显，在其中的一次"方便"杀人当中，他走到了一个分水岭……他因此而激动起来。

当他掌握住了她，也许双手卡住了她的脖子，他看到她的脸变形，眼中露出恐惧的目光。当他挤压她的气管时，他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勃起，那个女人挣扎并死亡的时候，他的性兴奋越来越强烈了。刺激他的不光是杀人这个动作，而是她对于被杀害的反应。她脸上露出的是可怕的表情，知道自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她完全处在他的掌握之中。

虽然他不一定对所发生的事情有细节的幻想，但是，弗里德里克知道，这事情在性欲上感觉起来太美妙了——美妙到了他想再做一次的程度。哪怕处理她的尸体都是一件开心之事，因为他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可以与被动的尸体进行性交——不仅仅是因为这与平时的性交不一样或者特别舒服，而是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力量。肢解和隐蔽尸体的时候也是一样。这对他来说是一次新的体验，后来，当他手淫的时候，这样的形象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同时，他继续自己的生活——工作、与朋友喝酒，他们需要造一个院子或者在家里涂油漆的时候他可以帮帮忙。他并没有感觉到懊悔，这个词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怀疑或者质问他，因为他的朋友和熟人圈子很松散，这些人在他的生活当中进进出出，来去无影。他生活在一辆拖车里，他可以在拖车里大刀阔斧地干他的事情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或者问一些节外生枝的闲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第一任妻子雷娜·柯斯特罗 1969 年失踪的时候，没有人在心里敲响警钟。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想呢？毕竟，弗里德里克是个不错的人嘛。

最后，他跟一个小姑娘鬼混起来。罗丝玛丽·莱茨才 15 岁，她已经在性的世界里游荡过了。她的人格尚且没有完全成熟到他的水平，尽管在两年之内，她也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施虐狂。有两个可能的通道到达这一步。第一条是，从性欲的角度看，她基本上是一块白帆布，当她感觉处在他的控制之下时，他就只管在这个人的图画上胡刷一通，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她已经产生了一种施虐狂的冲动，可能在她自己早年的生活当中都已经显现出来，这也可能表现在对于动物的残酷行为、或者对她周围的人滥施淫威的过程当中。

使弗里德里克走上施虐狂、性杀手道路的因素有许多种，这些因素也有可能出现在罗丝玛丽本人的童年里。她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采纳或者接受道德约束，否则，她会明白我们大家都反感和认为不人道的一些事情。她极有可能根本没有体验过来自双方情愿和彼此关爱的性私密活动的温情和回报，因此而使她很容易听命于人。

准确的原因并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她受到弗里德里克的吸引，在早期可能还是相当被动的——这对于一个极想得到控制权的男子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她乐于接受他摆在她面前的任何东西，而且没有觉得特别反感。从一开始，他们极有可能表演出控制与侮辱的场面，一切都不是当真的，而是跟许多普通的伴侣一样穿上极有挑逗性的衣服，玩出了很性感的游戏。

然后，一个男子也可用完全同样的方式使一个女朋友或者妻子了解他的喜好——例如，到舞厅跳舞——弗里德里克因为他的爱好认识了罗丝。他打开了通往施虐狂的大门，发现他们都喜欢同样的“音乐”，也踏出了同样的“舞步”，不过是在这个例子当中，他们共享的“音乐”是临死的姑娘们的尖叫和哀求。

理解后面的一切的关键在于，罗丝是带着欢喜和性兴奋来回应他的要求的。她发现自己的施虐狂潜能可以释放出来，而且为弗里德里克所深深喜爱。对她来说，这种形式的性表达弥补了她早年生活当中的一切空虚。

在他的引导之下，罗丝玛丽很快学会了，而且成为很好的一名“演员”，跟他一样擅长性之舞蹈，兴许还胜过他。她能够听到很远处传来的微弱的节律，也听得到那“音乐”的击打声，并开始产生新的想法和新的步骤。曾经甚为粗糙的东西变得圆熟起来，他们两人都把更多的生活投注在变态的舞蹈之中，直到成为他们活在世上的理由。

1972 年卡罗琳·欧文斯被绑架的时候，一直在发号施令、精心设置拷打和虐待的舞台布景，而且亲自参与活动的就是罗丝玛丽。是她最先在车后椅上吻卡罗琳的，她并没有接到任何指令，也没有被她的新丈夫所催促。

弗里德里克找到了一位灵魂伴侣——她分享他所有的需求、希望和幻想——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罗丝玛丽的性欲在成长，然后成熟，然后产生了掠夺性。她虽然

完全能够与自己的丈夫达到性高潮，但那还不够，她希望有新的食物，有新的口味。她抓到了一系列的伙伴，也许连同男人在内，但是，哪怕手臂里已经抱着另外一个情人，她的丈夫也是这场表演的一部分，因为这样的性交使他们两个人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满足。他介绍、引荐和同意她的情人，他在那里偷听而且观察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游乐场。那不是一个拷打室，也不是一座地牢，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主题公园，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脱了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实验所。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还不是被动的，他们都有极大的控制需求，有主宰的欲望，而且必须施人以痛苦。这就是他们衡量自己在人世活下去的标准。

他们练习，使一门方法成熟，讨论如何捕捉一些人，如何关押他们。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到底如何给诱捕进汽车关起来的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但是，案例记录可以给出一些线索。

韦斯特先生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潜在的受害人，他也有一个想法，知道他自己在寻找什么样的人。她必须年轻，也许还必须有很丰满的乳房，也许必须有长发，或者穿某些类型的衣服。也可能她具备的长相是他无法解释，但等他看到的时候却非常明白，因为他的激素水平会上升，而韦斯特夫人在性欲上的错乱也会使她自己走向这样的一个女人。

如果她看上去是被动的，他们一定会知道这个人肯定会吓得要死，他们就可以玩弄她的恐惧，还可以听到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声调。或者，如果她是一个自豪的人，一个敢于顽抗的人，他们也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可以慢慢地折磨她，一直到她哀求，到变成一个百依百顺的人，差不多就是一包东西为止，然后再把她弄成一堆腐肉和白骨。

他怎么将她弄上车的？如果罗丝玛丽跟他在一起，那非常容易。年轻女人看见一个女的在车里，她会放松下来，毕竟，性攻击者一般不会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动手的吧？

"你瞧，我妻子生病了，你能否帮她？"

"她要生孩子了，我们又迷了路。"

"晚上一个人在外面走多危险呀，我们说不定可以带你一程。"

这样的办法可以说是无穷无尽。只需要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她到了他们伸手可及的地方。韦斯特先生非常强壮,而且很野蛮,他可以轻松地将她拖人车内,然后很快地粘紧她的嘴,绑上她的胳膊。

或者他也能够利用放长线的办法慢慢哄她,在这姑娘上车以后一路跟她谈天。闲散的谈话也能够使他得到一些乐趣,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她的过去某些事情。

然后,在一阵闪电式的攻击当中,她的嘴给堵住了,手也给绑了起来。她被带往克伦威尔大街,一路上还受到虐待,因为那样的诱惑简直无法抗拒。

他们的预期让他们极其开心。韦斯特夫妇想办法抓住了某人,这本身就让他们欣喜若狂,就如同来一次性欲的大会餐一样。这样的刺激如此强烈,在他们早期杀人的时候,拷打和虐待有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急急忙忙地杀人,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慢慢品味其中的快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这个过程延长,然后尽量在每一个受害人身上得到很大的快乐。他们慢慢明白,你不必每次都直接杀掉一个人——你可以推迟杀害的过程,慢慢地折磨受害人,使他们自己的快乐达到更高程度,他们的方法每次都有改进,而且一次比一次先进。

我们从卡罗琳·欧文斯的绑架当中知道,他们谈到了外科方法,还在她的性器上做文章。虽然想来非常可怕,但是,我会预期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确会慢慢地在受害人身上"动手术",一边还解释他们做这种事情的原因,而且两个人还一边做一边讨论。

我们知道,6位受害人找到以后都有被堵住嘴或者头部完全绑起来的证据,其中一套口罩里面还有塑料管子插在里面,一直通往鼻子里面。这不仅仅可以使受害人暂时活着,而且还会让韦斯特有机会往她身体里面灌东西。我们还知道他们的受害人身体都光着,肢解了,埋在地下的时候身上还有捆绑的证据。根据其他的一些证据,她们多半是被吊起来毒打过,进行过肉体的残损,还被丈夫和妻子分别用作了性用途。

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候,皮肤有可能被咬开了,血开始流下来。死前死后都有可能把肉割了下来。吃饭有可能是一次特别的盛会。

他们会穿起衣服，喝一些红酒，坐在铺得整整齐齐的餐桌前，慢慢享用一桌美餐。这是一个分享的体会。当然，我不能够绝对肯定有食人的事情发生，但是，长腿骨头上面非同寻常的刮削印迹使这种事情成为极大的可能。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一些性精神变态者，还有他们的犯罪行为。有些人在达到性快乐的某个时候会停下来，因为这种性快乐是从某一套特别的刺激当中得来的。在韦斯特夫妇的情况下，没有证据发现有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只有不断升级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当人们对一种新的刺激有连续的欲望并希望达到更高的层次时，他们会引进一些新鲜的刺激因素，使其性欲的满足得到更大程度的增长。当你看到一对夫妻走上堕落、侮辱、虐待、控制和杀人之路时，那就离食人的行为不太远了。

韦斯特夫妇将他们的“珍宝”埋在很近的地方——在地窖里，在后院里。正如有人花极大的精力在选择房间和悬挂一张画一样，他们也会花同样大的精力去寻找埋人的地点。那种自淫性的回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走下地窖，躺在一个孩子的床上，并且知道 8 英尺底下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对他们是一种非常安慰的感觉。

人们最难于理解的是，这对夫妻竟然能够在正常的世界里当一个好邻居，他们可能有特别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看上去就跟别的任何人是一样的。但同时，他们是在另外一个维度里生活着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像到那样的事情竟然都是现实。发生在那些年轻妇女身上的事情也许是最有想像力的作家也难以料到的，更不用说能够表现出来。

这就是让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们无法抓住强烈的快感、欢乐和狂喜，而这才是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从这些恐怖和受害者的死亡中得到的东西。对于一个有施虐狂的性变态病人来说，足够永远都是还不够。发现和扩大的冲动还会继续下去，永远也没有一个完。

在他们对付自己的孩子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在这里，他们只是养了一些能够予以完全控制的家养的人类而已。她们是有价值的财产，是可以兑现的财产。虽然韦斯特夫妇在绑架当中非常谨慎，但是，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张狂，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孩子的

时候。其他像教师和社会工作者最后一定会卷进来思考这些问题的。

回到警察局后，我花一个多小时向约翰·班内特和特里·莫尔解释了自己的结论。之后，在警察俱乐部的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们再次见面讨论讯问小组的事情。那里有啤酒供应，但我选了柠檬和橙子，因为还得开很长时间的车回家。

弗里德里克慢慢承认了更多的犯罪行为——他承认尸体是被绑了起来，但不承认吊打和拷打过受害人。同样，他还极力狡辩，不承认他的妻子也牵涉在案子中。

"这怎么可能呢?"班内特问，"如果他自私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他不说，不是我干的，是她干的? 她现在就是这么说的，她一直在说'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情，那都是弗里德里克干的'。他为什么要保护她?"

"你们必须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他的粘结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可以这么看：许多男人看色情杂志，跟着就发现自己幻想遇到一个在性欲上无所顾忌的女人。就是那种不仅仅情愿，而且还怂恿和煽动他们干那些淫荡之事的女人，她们会教男人做一些自己家中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干的事情。"

"韦斯特先生根本不需要产生这样的愿望。他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伙伴，她可以强化、延伸、扩展和放大他的性幻想，几乎超过了普通人的想像能力——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他的妻子不仅仅是被动的，她还能够分享他的思想和感觉，可以将她们的性游戏推向更高的巅峰。这使她成为一个无法想像的无价之宝，他会尽一切努力避免伤害这样一件宝物。他永远也不会放弃她。"

莫尔问："罗丝呢? 她有可能说出来吗?"

"我怀疑。根据我所见到的一切，她比他更聪明，在心理上也更健全一点。你们告诉我的一切都表明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觉得如果坚守到最后就有可能挺过去。她不像韦斯特先生一样需要增援和赞同。这并不是说她就更邪恶一些，这只表明她可以在没有额外的赞扬的情况下坚持更长一些时间。"

黑泽尔问："她知道弗里德里克不会出卖她吗?"

"绝对知道。我觉得她对弗里德里克的了解远胜于弗里德里克

对她的了解。他们一起下到了人类能够堕落到的最底层，她明白她对于他来说代表着什么。她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出卖她。"

莫尔说："她会尽一切力量挺住？"

"我觉得让她承认什么事情的惟一机会在于弗里德里克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然后承认她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如果他开始透露一些罗丝参与其中的细节，那么，她有可能会开始谈起话来。她不会忏悔。她会抱怨他，并声称她是不情愿的，被动的，是一个被威胁而从事犯罪行为的人。我怀疑她会承担任何一种责任。定罪之前肯定不会。"

这也是班内特问我嫌疑犯有否可能自杀的时候，我较少担心她的安全的原因。我告诉他说，罗丝玛丽有可能会顽抗到底，她很自信，相信她可以抵赖对于她的起诉。但是，弗里德里克却是不同的一个故事。他被拘留起来接受问讯的时候很喜欢在问讯过程中占据中央舞台的感觉，我说他会没有事的。尤其是在他觉得罗丝玛丽仍然对他很忠诚的时候。但是，一旦问讯过程完毕，将他押到监狱的时候，他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孤立感，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有可能与他断绝关系的时候，这种感觉有可能会变得严重起来，因为他会觉得妻子有可能会把他这个非人性的怪物抛弃掉。

我知道他的性格，还有他对待问讯的方法，尤其是他拿完全不可能的说词和固执的办法坚持罗丝玛丽并不是杀人者——我知道她对于他有多么重要。我解释说，当他得知她在拒绝他，而且他意识到他们此生再也不可能发生接触的时候，自杀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大。

虽然罗丝玛丽·韦斯特一直声称无辜，但我毫不怀疑她参与了所有的事情。仅从运输的方面看，9具尸体是在她的屋子里剖开的，也可能就在厨房里，存储了一段时间，然后埋进后园。房子底下的每一个洞都有8英尺深，而且是在厚厚的黑土层上挖出来的。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在哪里？她肯定知道这件事——其他的一切都不在可以想像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患有跟她丈夫同样类型的性变态。她有极强的性欲驱动力，跟数十名男子睡过觉，而且非常高兴她丈夫在旁边偷看和偷听。她决定自己的女儿何时准备好进入性生活，并且监督阴茎插入的过程。当卡罗琳·欧文斯被绑架的时候，看

起来是韦斯特夫人在负责指挥——她在进行舞台设计，她安排了拷打和虐待。

4 月 20 日，罗丝玛丽被逮捕，并被控两次强奸一名 13 岁的少女和一项对一名 8 岁男孩的性攻击行为。最后，她还将联合接受 9 项谋杀罪行的指控，包括卡尔玛因·韦斯特在内。卡尔玛因的尸体于 5 月 4 日在米德兰路 25 号的一处废弃煤仓里找到了。

三个星期之前，卡尔玛因的母亲雷娜·柯斯特罗的残骸也在一处玉米地里找到了，就在这家人于 1969 年生活的一辆拖车屋附近。在搜查过程当中使用了透地雷达。

我于 5 月 18 日最后一次去格鲁斯特的时候，得知了讯问罗丝玛丽的情况。跟预料的一样，她什么也不说，她承认以前有过很多男情人，但拒绝为发生在她家的任何事情承担任何责任。她能够描述一位普通的、疼爱人的母亲应该如何作为，而且声称她一向就是这个样子的。

被告知其继女安娜·玛丽亚的指控，得知她被她父亲强奸，而且还从 8 岁起受到继母的性虐待时，罗丝玛丽否认自己知道这一切事情，还说弗里德里克可能干了这些事情。被逼无奈的时候，她声称："我只做了被迫做的事情。弗里德里克组织了一切。弗里德里克有可能迫使安娜·玛丽做了那些事，我没有。"

然后她开始说"无可奉告"，并在几个小时的问讯内一直重复这个词。哪怕这样，问讯人员还是继续问她，从来都不威胁她，也不折磨她的意志，他们只是声称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并仔细地准备针对她的案子。

同时，弗里德里克已经开始接受和承认自己所做的越来越多的事情。他能够描述他如何在带篷车里找到一些姑娘，然后带她们回到家里。但是，他声称性活动是在她们的要求下进行的，有时候她们喜欢强烈的性活动，但不幸的是那些姑娘却死了。罗丝玛丽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

6 月上旬，第 12 具尸体找到了，是安娜·麦克福，年龄 22 岁，她是在肯普雷的芬格波斯特弗尔德的一场大规模挖掘地的边缘上找到的，离韦斯特的第一任妻子被发现的地方不远。安娜是拉纳克郡柯特布里奇人，她于 1967 年到达格鲁斯特，之后在韦斯特家当过一段

时间的保姆。尸检报告显示，她死亡的时候已经有了8个月的身孕。

最后，几乎是4个月后，挖掘工作才告结束。

20 被绑架的婴儿

草坪剪草机的发动机不再出声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玛丽莲在喊我接电话。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我明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又泡了汤。

20分钟内，我冲完澡换上了衣服，然后就踏上了去诺丁汉郡的路。两天以前，也就是7月1号星期五，有一名新生婴儿被人从女王医疗中心拐走，追猎犯人的消息已经成为全国新闻。负责此案的警官哈里·谢菲尔德警督在电话里掩饰不住内心的急迫感。他正在快速处理事件，并且明白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有可能导致一名儿童的死亡。

向北开往诺丁汉的路有50英里，我感到心里没有多少底，因为对那个诱拐案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看星期天早晨的报纸，而那张报纸的头版就登着这则消息。孩子的父母一定伤心欲绝，我想，然后，我的思绪便回到了艾玛和艾恩出生的时候。这两个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医疗单位鼓励孕妇去医院生孩子还是后来才有的事情，那是为了防止出现并发症。

我们差一点就失去了艾玛。她生下来的时候像一只大理石玩具，一点生命的迹象也没有。当天晚上有雾，接生婆都不愿出门，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被搁到了一边去，以为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玛丽莲很费事地生下孩子后，也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内心充满了恐惧，生怕一下子大人小孩子都没有了。

接生婆准备抱走孩子，这时医院的医生到了，他告诉接生婆再试试。他看看玛丽莲没事后就开始救艾玛了。艾玛显然是难产出生，因为脐带缠住了她的脖子，所以产生休克。他花很长时间往她小小的肺里面吹气，并按压她的胸部，直到她最后呼出一口气，苏醒的时候面色红润过来。

我们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因此，若她有个什么三长两

短，那种损失感会特别难受。玛丽莲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她怕艾玛会死掉。我挂起一只自行车灯用来照明，孩子就放在我们房间的一张儿童床里。

多少年以来，我因为工作要诊断和治疗许多母亲，有时候还要为一些父亲看病。他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或者生下不久就死掉了，我明白那种失落感是终生难忘而且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的。悲剧可能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是，影响仍然在侵害他们。有些人至今还在悲伤，另外一些人从来都没有办法公开表露自己悲伤的心情。

在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事件室是设在最顶层的。跟大部分专案室一样，它给人一种临时拼凑的感觉，就好像一时间匆忙搭建而成的：计算机电缆像蛇样弯在地板上，办公桌都是临时拉在一起的。但我看到最多的还是纸，一堆一堆的纸。很明显，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并没有关系，纸张总是在不断地往里送，也不管它有没有人来处理。

对照而言，哈里·谢菲尔德的办公室看上去几乎无可挑剔。他是个文雅和体格魁伟的人——因此使他看上去比实际的样子还矮。胡子修剪得很整齐，里面夹有一些灰白。他说话慢条斯理，跟我的个性很相像，这意味着我们有时候说话声音小得彼此都听不见。但是，这个特点很容易使人们走得更近，因为彼此都探过身去听听对方在说什么。

"上个星期五早晨10点，当地的接生婆卡伦·汉弗雷夫人在女王医疗中心生下了一个女婴。她丈夫罗杰也在场，母婴送往楼下一间小病房B27室的时候，一直都跟她们待在一起——"谢菲尔德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解释说，罗杰于上午11点30分离开医院，去接这对夫妻3岁的儿子查理，因为查理很想看看新生的妹妹。他们3个小时后回到医院，并在小病房里见到了卡伦。婴儿准备取名叫阿比，她躺在病床旁边的婴儿床里，身上盖着医院奶色的睡衣，包着大披肩。

下午3点之后不久，卡伦起床沿走廊过去打电话给她母亲。几秒钟后，一名似乎身穿护士制服的妇女进入房间。她告诉守在孩子身边的罗杰说，孩子需要进行例行的听力检测，并问他卡伦什么时候回。然后她就离开了，说她15钟内再回来。

卡伦回到房间直接去了卫生间，根本没有人提测试的事情。她

进了卫生间之后，房间门再次打开，那女护士说："现在做测试行不行？只需几分钟就好了。"她抱起阿比悄悄地走了。卡伦出来后，立刻感到怀疑。因为她是接生婆，知道新生儿并不需要做什么听力测试。她顺着走廊走过去，找到了护士办公室，不久就明白了，阿比并不是被护士抱走的。

谢菲尔德展开了那家医院的平面图，指着那间产房和各处的走道及楼梯，还有大概270码以外的医院大门。我以前去过那家医院会诊，知道医院的大概布局。

"绑架者一定是通过这些双开门进入住院部，并通过护士工作站到达侧面的产房的，"他说，然后指向附近的一个卫生间，"我们在这里找到一套扔弃的蓝色制服。"

"她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因为5分钟后保安人员就开始挨个儿搜索医院房间，并出门拦截公汽以及跟路人谈话。"

一对中年夫妇吉姆和朱莉·莫里斯在从医院大门通往德比公路的桥下通道上看见一名妇女，时间约在下午3点。她走路很快，而且以奇怪的姿势抱着孩子，抱在靠近她肚子下方。

莫里斯先生对警方说："她离我有5码远，我看到一条粉红的腿从毯子里露出来，还有身份圈套在脚上。那女的看上去很紧张的样子，直到她扭着身子装作要钻进一辆红色小汽车，也许是福特度假车吧，我才发觉事情有些蹊跷，那是个诡计。她一直往前很快地走。"

莫里斯很担心，因此回到医院去报告。但是，工作人员都已经在医院外面找去了，并没有意识到那名绑架者已经换了衣服。她现在穿的是一件绿上装和半长的深灰色护腿套裤，还戴着一副黑色的塑料太阳镜。

罗杰·汉弗雷描述那女的是白人，大约30出头的年龄，5英尺2英寸到4英寸高的样子，有长长的黑发，没有扎起来，也许是假发。她面色很白，带有当地人口音。他记得下午2点30分跟查理一起回到医院时就看见过她。他们顺着B27病房外的主走道走过的时候，那名护士就在他们前面走，身高约6英尺，而且是顺着同一个方向走的。虽然他只看到她几秒钟，但是，他记得她的样子，因为她的头发与众不同。他还注意到她的小腿比较丰满，还记得她有可能穿着紧身衣，但不记得颜色了，肯定不是黑色的。

谢菲尔德将两张黑白照片从桌子上递过来，是那种粗颗粒的照片。这家医院共有 29 台保安用摄像机，警方仔细研究了那盘带子，然后分辨出了两张照片。第一张是下午 3 点过了几分钟后拍下来的，显示一个丰满的黑发妇女的背影，她穿着护士制服，顺着走道朝医院大门走去。第二张照片是同一台摄像机在 20 分钟后拍摄下来的，看起来是同一个妇女，她现在穿着普通的衣服，前面好像还抱着什么东西。

"她有可能只是在练习……"谢菲尔德指着第一张照片说，"……她只是在调查逃走路线。"有可能，我想，但我怀疑。这个女人已经了解这家医院了。她极有可能在头几天就去过那家医院，调查各种可能性。"看起来更像是她在巩固自己的自信心，"我说，"要么当时的时机不好，因此她只能够不停地走动，因为她知道如果停下来不走，会有人注意到她，并向她提出问题。"

别的一些东西让我不那么高兴。她为什么两次造访那个房间？我感到奇怪。她第一次跟罗杰谈到听力测试的事情时就应该抱走孩子的，这才更有道理。她不可能知道卡伦是个产婆，否则她不会等在那里。卡伦一定会明白阿比并不需要进行测试。

同样，她以前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那样的话，医院会有人认出她来，她穿的那身制服看上去像是医院的制服，但不是这个医院的制服。

谢菲尔德不再说话了。时间上的紧迫性远远超过我在电话里面的感觉。他和他的小组工作的基础就是我所说的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他们弄错了，极有可能失去一个孩子，但同时，他们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向前进。内心的一切都在对你说："慢慢来，不要犯错误。"但你无法慢下来，因为一个婴儿失踪了，整个世界并且还都在看着你，时钟在滴嗒作响。这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够采取实际行动，要综观全局，监督所发生的一切，这样才能够避免犯下悲剧性的错误。

在简短会议之后的沉默中，我开始努力了解绑架者的动机，甚至是最邪恶的动机。我开始将她的行为与另外一名有麻烦的妇女的行为放在一起来考虑了。我在临床工作当中治疗过那名妇女，我还了解更广泛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儿童绑架行为。

阿比绑架案的主要信息来源一直是罗杰·汉弗雷。毫不奇怪，他

被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惊呆了,这反应在他给警方的陈述当中。如果我要给警方一个准确的报告,告诉他们我如何理解这名绑架者,那就有很多详细的问题涉及绑架的顺序,还有那个妇女的行动情况。

那个妇女到底是如何对罗杰说的?准确的话是怎么样的?她站在什么地方?她是如何讲话的?她是站在门道上还是站在室内?她是直接用眼神接触,还是用微笑?她是用右手或是左手抱起阿比的?为什么他觉得她可能戴着假发?假发戴起来是否合她的头?

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答案可以告诉我一些东西,可以明白绑架者的谨慎程度、自信心和动机。没有这些答案,那就如同在雾里寻人,而风还在不停地吹动,把这团雾吹得东摇西晃,越来越浓,只让你偶尔看到一些身影。

由于能够补足这个空虚的惟一的人就是罗杰·汉弗雷,我建议谢菲尔德对罗杰采取一次感知型问讯,让他回到事件原来的顺序中去,这样有可能弄出更多细节来。这名刑警同意了,并安排在7月5日星期二上午进行。

除非我能够得到足够多的信息来辨别和排列绑架的可能原因,否则我无法起草心理轮廓描述。同时,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最佳利用媒体对这次绑架案的极大兴趣上,因为这件事情目前更为紧急。谢菲尔德知道媒体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可以帮助也可以妨碍他的刑事调查活动。通过报纸、无线电和电视,他可以与绑架者交流,也可以与她身边的人交流,但是,他必须找到合适的策略使绑架者保持镇定,并保护阿比不受伤害。

这意味着要让媒体合作,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从绑架案发生之后,记者一直都在想办法搞到录下了那名假护士的保安摄像带。不幸的是,这件事情使刑事记者与警方的关系比较僵硬。谢菲尔德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听听我的意见。

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和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一直在想办法思考交流策略问题。星期一回到西布里奇福德之后,我在楼下的一间羁押室里跟谢菲尔德坐在一起,大致说出了我的提议。我说,抱走阿比的那个妇女如果不是很害怕的话,她不太可能伤害她。"但是,她带着孩子的时间越是长,两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就越是紧密。所以,接下来的48小时至关重要。你们必须直接恳求她,并且大大渲

染罗杰和卡伦所经受的悲伤和痛苦——特别是卡伦。她必须看到他们本身，而不是用剪纸板贴的一些人像。”

谢菲尔德问：“为什么是48小时？”

“如果到那时你们还没有找到她，可能会发生两种事情，一是她听到了你们的恳求，但不愿意回答，或者她干脆断绝联系，根本就不听。同时，她会与那个孩子产生更紧密的感情联系，她开始认为阿比是她自己的孩子。这会阻止她觉得罗杰和卡伦也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人，因此不太可能主动交出阿比。”

“48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的焦点要转移。你们不能够直接对绑架者发出呼吁了，你们要对她周围的人说话，她的亲朋好友，还有邻居。你告诉他们原因，为什么这名绑架者有可能就是他们身边的人，这个人受了误导，已经失去了分别是非的能力。你们得说服他们相信，他们能够伸手帮助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警方联系。当然，这些人早就听到之前你们对那名绑架者的呼吁了，这应该有助于说服他们站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帮忙，而不是出卖什么人。”

不管这种恳请是什么样子的，但每个信条都要传达出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警方并不认为那名妇女是一名罪犯，他们不是要抓住和惩罚她。她的生活当中一定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致使她采取这种极端步骤，从而使罗杰和卡伦失去了当父母的权利。警方明白这些情况，希望能够提供同情和帮助。

千万不能够说：“投降吧！”这需要绑架者跨越非常大的一步。反过来，她有可能反复地倾听对她的恳求，她知道人们希望她能够让卡伦知道她的孩子阿比是安全的。如果她能够迈出这小小的一步，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起联系来，并慢慢地帮助她走出来。

这些原则并不是空穴来风，自生出来的。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对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另外，我多少年来在临床和与犯罪相关的人质谈判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也确证了这些推断。这是我开始在阿诺尔德洛奇工作以后很符合逻辑的一个研究领域，因为病人有时候就会扣押一些人质。

如果阿比的绑架者是蹲在街上的某个高处的窄窄的窗台上，使用的策略也是一样的，但事情会容易办得多。如果她坐在窗台上，她

就会被认出来，她的背景资料会查到，很快就能够明白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去跟她谈的时候，这个信息就可以加以利用了。反过来，我现在是想通过警方和新闻媒体与一个未知的妇女谈话，她可能在听，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听。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媒体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记者无一例外地都想把事情炒起来，他们每天都想找到不同的角度，并促使卡伦和罗杰的所有亲戚出来恳求。这使这个恳求看上去比单独一个人要复杂，也少了个人特点——因为单独一个人能够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关系，并能够与绑架者形成差不多是一对一的对话关系。

"不能够摆出一副严厉、极生气和没有感情或者是漠不关心的面孔出来，"我告诉谢菲尔德说，"那会将她吓跑。"

"就你来做不行吗？"他提议。

"不，那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你比较合适。"

谢菲尔德以前干过每日新闻招待会的工作，而且早先已经做过几次恳请的工作。他声音细软，面孔和善，两下结合起来几乎是完美无缺。他能够直接面对镜头，忘记底下有数百万人看着他，像是直接在对那个妇女说话。他能够显示出情感上的相通和理解，淡化犯罪和惩罚的层面，恳请她与卡伦接触，让她知道阿比没有事。

"如果她和警方直接接触起来，我们需要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接听电话。这个人必须全面了解这名妇女的思想状态。"我知道这样一个人能够帮助她，并给警方宝贵的时间来追踪电话。然而，实际存在的一个事实是，很多反应都会是一些讹诈者产生的。这些人必须过滤出去，要测试他们跟这次犯罪行为有关的了解——要打来电话的人说出阿比是如何抱走的，还有其他一些只有绑架者才知道的信息。

最后，我们谈到了医院的保安录像带的事情。那些粗颗粒的黑白照片显示那名妇女的背影，而她又很有可能戴着假发。媒体要求拿到那些照片，但我建议不能够公开照片。

公众会认出她来，但是，她明显也会认出她自己来，然后有可能轻易地相信别人也会认出她来。这有可能引起她的恐慌，因而抛弃阿比，从而使人们无法找到阿比，或者找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们的会议开完以后，我离开那里开车回家。我很自信，觉得这

个方法很正确，通过心理的攻略，我们会使绑架者产生情感上的反应。同时，我仍然需要更多地了解那名“护士”，这意味着必须询问罗杰·汉弗雷。

第二天早晨，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了郊外一间挂着窗帘的接待室。高高的天花板使之看起来空荡荡的，而且很凉爽，这在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有如天赐洪福。

罗杰和卡伦跟朋友们一起一直留在这个秘密地点，这是为了避开媒体的聚光灯。星期六下午，他们已经在医院进行的新闻招待会上泪水涟涟地哭求，卡伦在那里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想知道他家的新宝宝去哪里了。如果有人知道任何消息，请一定让我们知道。”

罗杰握着我的手，我看出了这是个饱受打击的人。他的举动缓慢无力，有时候又非常激动。虽然能够集中注意力，但他很容易分神，他的面孔不能够恢复常态。

他是个安静和有分寸的男子，跟卡伦结婚已经有 9 年了，他们住在诺丁汉郡舍伍德区一处新建筑区很小的一个独门独户的房子里。他是当地一家油漆和装饰公司的现场监督人员，他对我说头一天他还在涂门廊的油漆——“6 年来我第一次重新拿起刷子来。”这是他放松自己的方式。

我对他解释了认知问讯的性质，并说这样如何能够帮助人们回忆更多他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并强化警方得到的信息，可以提高 40% 到 50% 的准确度。尽管那很痛苦，但我必须带他重新回到星期五下午的事情中去。他在一张舒服的椅子里坐了下来，向后靠着，然后闭上了眼睛。从阿比的出生开始，他描述了他自己快乐的心情，因为他又有了一个女儿，然后讲到他们如何拍了照片，然后转移到了病房。他于下午 2 点左右去接查理，然后他们就从后门走到了这家医院，还上了一道楼梯到了 B 层。

他知道自己走过的路线，因为他的公司曾在那里做过油漆和装饰工作。查理就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他显得非常激动。

“告诉我那条走道的情况好吗？”我问。

“那是一个铺了垫子的走道，照明也不错，还有很好的氛围。”

“谁在走道里？”

"就是一些来来去去的人。"

"你能够看见那个妇女吗?"

"能够。"

"她在什么地方?"

"她在我前面约 30 或者 40 英尺远的地方,跟我们同一个方向走。我看不到她的脸。"

"她怎么走路的?"

"看上去她的胳膊是抱起来的……她走路的样子很好笑,我想,几乎是弯着腰,你知道吧。身体前倾,看着下面,但也看得见前面。"

"她经过了别的什么人没有?"

"不……我想没有……等等……是的,她经过了一些人,有两个女的坐在椅子上——她一定是正好从她们眼前经过的。"

"她们是谁?"

"一位母亲,大约 50 岁,还有她的女儿。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有一张卡片,当时想借一只钢笔。那个女的向左转,朝护士办公室那边走去的时候,我问那个母亲和女儿说能否借一只钢笔。"

(这很重要,因为它使警方又得到两位可能的证人,她们有可能看到,也许能够描述那名绑架者。)

"好吧,那个妇女在你前面走,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蓝色制服。"

"什么蓝?"

"深蓝。"

"有多长?"

"啊,我觉得好像是在她膝盖稍高一点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她的腿肚子,而且还稍稍有些不对称。"

"衣服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袖子很短,腰间有一根带子束住,是在前面扣住的。"

"皮带是什么颜色?"

"不能够肯定。记不住了。如果是白色的我一定会记得。"

"她的鞋子呢?"

"黑色。"

"她穿了袜子吗?"

"穿了,但不是黑色的。我觉得也可能是肉色的。"

这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慢慢得出一些结果了。罗杰只在走道上看到过那个女的,而且只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他能够讲出关于她的衣服的新信息,她如何束的头发,她的肤色以及她如何以短促的步伐走路,就好像有什么目的的人走路一样。

我还带着他走过双排门,经过了护士办公室,然后来到"一号侧房",就是卡伦和阿比一直在那里等待的地方。通往那个房间的门有一个观察屏。在每一个点上我都会问到罗杰,问他能够看到,听到和闻到什么。他描述一些人在喂孩子,有访客来来去去,还有员工在进行他们的工作。

卡伦开始对查理唠叨起来,然后让他看新宝宝,这个时候,那个小妹妹已经在床侧的婴儿床里睡着了。几分钟后,她穿着睡衣离开房间,沿着走道出去跟她母亲打电话。

10 秒或者 15 秒钟后,那名护士就进来了,她在那里敲敲门,然后一把打开了门。走到电话间的路程只需要 10 秒钟,因此,卡伦应该在走道里见过她。查理躺在床上,那个小宝宝就在他身旁。罗杰看着他的手,正在修理儿童玩的保时捷 911 汽车模型——那是小宝宝送给查理的礼物。他半侧过身去看她。

她问:"是现在将孩子抱去进行听力测试,还是等她母亲回来再说?"(她一定看见卡伦出去的。)

罗杰回答说:"她去打电话了。"

"我 15 分钟后再回来。"

我在这里详细询问罗杰,结果他回忆出那女的似乎一直在走道里走来走去,一半是在房间内,她是用右手将门打开的。他描述了她的头发……看上去不自然,他看不到她的前额,她有可能戴着眼镜……

她很自信,也很放松,她用活跃的眼光主动地对着他微笑。

"我希望你看看她的手,"我说,"你能够看到任何珠宝手饰吗?她是否戴着手表?身上戴着名称牌吗?皮带上的搭扣呢?"

罗杰摇头。

"好吧,现在看看她的脸。你看到什么了?你能够看到她脸上多大一个部分?门挡住她的脸没有?再讲讲她的头发。"

慢慢地，一个新的图画开始出来，使罗杰最开始的一些说法更加具体化了，但同时又使另外一些说法值得怀疑。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询问，描述阿比被抱走的时候，他的眼泪都出来了。卡伦直接回到了房间，然后径直去了卫生间。那个护士似乎在跟踪她，门还开着的时候就进去了。她一定知道卡伦就在房间里。罗杰说她跟卡伦说过话，但又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她们似乎是一起进来的。他和查理在玩911保时捷汽车模型。

"现在做听力测试行吗？"她问，"我只需要几分钟就做好。就在走道那头。"这次她的声音很肯定，而且是在下指令，根本不是询问的口气。在门外的某个地方，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硬了硬心肠说："就这样了。"

她一边说话一边弯腰抱起阿比，然后镇定地离开了房间。卡伦约10秒钟后从卫生间里出来，但此时那护士已经离开了病房。又过了几分钟才弄清楚她根本就不是这里的护士，到那时，她已经到了医院外面。

询问工作做了差不多3个小时，罗杰的回答慢慢自信起来，因为他开始将感情与回忆区分开了。已经出现了三个重大的线索。对犯罪人的生理描述已经得到强化，事件的顺序也更准确一些了，而且我对这个妇女的了解也更深刻一些了——她第一次到房间来是带着那种试探的神情的，再次尝试的时候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卡伦来到了起居室，并靠着罗杰坐下来。她的精神看起来几乎要垮掉了。就在生出那个宝贝的时候，她还是自信、兴高采烈和欢乐无比的神情，她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圆满无缺了。可突然间，在几秒之内，这一切又都从她身边溜走了。这样的创伤令她几近崩溃。她的计划能力、决策能力和把持自身的能力完全丧失了，我可以看出，这个女人现在惟一希望的就是让她的孩子赶快回来。罗杰不一样，他一直在思考"假如"的事情——假如他当时要求出具身份证明，假如他说了不行等等。现在他感觉他必须做点什么事情了，哪怕这意味着开着车在街上到处找阿比。这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这至少是件什么事情。

我跟他们两个人解释说，他们并没有与外部世界断开联系，他们仍然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他们必须参与调查。阿比受到生理伤害

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情况下，这种案子最后都是孩子会找到，非常安全，一点事情也没有。

看到卡伦的痛苦，我记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等这一切都过去，他们需要或者想找个人来谈谈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只需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在我对罗杰·汉弗雷进行问讯的时候，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里正在进行一场大型新闻发布会。哈里·谢菲尔德向等在那里的记者透露了交流的策略。在非正式的简报中，他说接下来的48个小时非常重要，媒体在挽救阿比的活动当中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

记者们对这类说辞一般都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假定他们被拒绝得到信息，或者无法了解一桩阴谋的内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得到保安摄像机里面的带子，还要每天找一些"天才"来采访。但他们尊重哈里，哈里也保证过了这48小时之后，记者会得到更多的资料，警方还会做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记者也相信他的话。其中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接受采访。不幸的是，这个许诺没有事先得到我的同意就做出了。我一定情愿更少抛头露面的。

聚在一处的新闻记者接受了这个条件，然后，摄像机推拉起来，哈里·谢菲尔德发布了一篇小心措辞的恳请要求。因为没有预习的时间，他确保他要使用他自己感觉舒服的用语，这样听起来才真诚一些。

"阿比的家人非常想念她，而且我知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同情和支持她。我敢肯定，人人都希望跟我一起说，不管是谁从医院带走了阿比，我们也对其抱有一样的同情心。走到这样一个孤独的境地一定是非常困难的。我想直接对你说话，就是现在抱着阿比的那位妇女。你有自己的需要和问题，因此才逼得你去抱走孩子。我意识到你是爱阿比的，但她是卡伦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卡伦因此而伤心欲绝，所有人的悲伤你也应该能够明白，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宝宝是不是安全，而且她们不能够抱一抱自己的孩子。请给卡伦打电话，告诉她孩子是安全的。你比其他大部分人都更明白你的电话会有多么重要。"

他还说："我头脑里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那位被迫从阿比的母亲怀里抱走阿比的那位妇女。"回到西布里奇福德，我坐在楼上开始起

草绑架者的心理轮廓描述。与罗杰·汉弗雷的询问确证了这天早晨发动的媒体利用战略的准确性。同样，对那名妇女进一步的生理描述再次说明早先决定不公开录像带或画师印象图是正确的决定。否则一定使潜在的证人或者提供情报的人被误导了。

回顾了这些信息之后，我起草了一份共16点的心理轮廓描述。

我写道："该妇女年龄约在20岁到30岁出头。她对医院背景很熟悉，也了解女王医疗中心。"这从她如何在医院长时间出入而不引起别人注意，也没有引起别人阻拦上看得出来。她没有表现出迷失了方向，很紧张或者很害怕的样子。

"她的智力不错，至少受过高中教育。"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计划事件的方式。她需要一定的智力才能够想出这样的方案，找到服装和假发，并处理不曾预料到的事件。她打开门的时候不可能预料到罗杰会说什么。她必须有能力抬头看着他，微笑，并读出他的有声和无声的态度——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快速反应的脑袋。

"她有可能结了婚，或者处在类似的关系当中，但这样的关系不是很稳定，因为她希望通过找到一个孩子来稳定这种关系。"

"她很自信，很会行骗。"这听起来似乎不是很明显，但有很多外部的迹象可以表明一个人很紧张，比如脸红、口吃、出汗或者手足无措，而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此类表现。

"她是个仔细的筹划者，但并没有全力来筹划。"她在大体上非常仔细，但还没有细致到无微不至的程度。我可以看出她的局限。当她走出医院的时候，她看来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她犹豫了一下子，明显很匆忙的样子，朝四下看了几眼，因此让人注意到了她。为什么呢？因为她并没有计划到这一步。真正的理智者会把事情的全部从头到尾计划完毕，把整个情节的每一步都考虑得非常仔细。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烦起来，他们会不耐心，或者只计划到必须计划的程度，然后就靠临场发挥。这个女人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将孩子带到家里。她没有为阿比准备好任何衣物或者毯子。医院已经成了一道迷宫，她只考虑到如何走出来。这时突然有人在旁边注意她了，也看到了她的紧张。这里就是一个证据，说明她处在压力之下产生了恐慌心理。

"她是个敢于冒风险的人。"在绑架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她随时都

有被发现的可能，而且危险越往后就越大，但她继续干下去——她换了衣服，从走道里走过，一直穿过整个医院的中心地带。任何一个时候，员工都有可能问到她说："嗯，你有什么事情吗？"

到了卧室之后，她抱起阿比的时候，罗杰有可能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一个真正的护士出现在房间里，这样会使她的谎言穿帮，并且堵住她的逃生之路。这名绑架者有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但她显然是决意要冒一回险了。

她是一个人独自行动的，应该已经为那个孩子准备好了一个家，并且有足够可信的理由假装一些事情，比如装作怀孕以说明阿比到来的理由。这还必须做得令人信服，因为她并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傻子。

从临床角度看，我检查过很多有可能绑架孩子的妇女，其中一些是夫妇关系有问题，另外一些人有妄想狂。我还熟悉比较有限的一些婴儿绑架案件。自 1971 年以来，英国共有 171 名儿童被绑架，除一例之外其余的都安全地救回来了。这虽然是个不很充分的、停留在数字阶段的资料，但还是让人宽心的。

我将心理轮廓描述交给了哈里·谢菲尔德。我们都有些累了，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她的动机里面有三大可能性，还有五种不太大的可能性，"我说，"在主要的三条动机当中，你们首先要注意这个妇女可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包括某种妄想狂在内，她可能认为阿比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只是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孩子。"

"其次，你们有可能在对付这样一名妇女，她希望保护或者维持一种不断恶化的两性关系，她觉得一个孩子有可能会对事情产生一些影响。她要么希望让某人觉得他是孩子的父亲，要么她希望保持一个婚姻或者两性关系。这有可能包括一些不会生孩子的妇女。"
"第三，你们有可能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她在心理上是非常孤独的，无法与成人建立起两性关系，但觉得跟孩子会保持不错的关系。她希望有人爱，因此需要一个孩子来无条件地爱她。"

我再次强调说，这些都是最有可能的动机，但是，我也列出了其他五种动机：这有可能是一种个人间的私事。那个妇女有可能对罗杰很钟情，她之所以拿走阿比，是因为她觉得那本来应该是她的孩

子，而不是卡伦的。也有可能这是针对卡伦个人的行为，因此警方应该看看与作为一个产婆的卡伦接触过的女人。这事情还有可能是针对女王医疗中心来的，而不是针对这对夫妇。员工不满或者病人有气都有可能希望惩罚一下这家医院，而病人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事先预料到的错误没有阻止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阿比被偷走也有可能只是用作商业上的交易。或者绑架后用作某种仪式或者宗教目的。

根据谢菲尔德告诉我的情况，我排除了最后的五种可能性。卡伦和罗杰最开始是要安排在另外的一间病房的，结果很快又安排到了现在的这个病房。绑架者不可能知道这一情况，因此这意味着她不是针对汉弗雷夫妇来的，她只是想带走一个婴儿……任何婴儿。

我也不相信这是针对医院的报复行为。有更容易得多的办法来惩罚这家医院，根本无需伤害无辜者。令人宽心的是，阿比给偷去当作商品或者用作仪式目的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几乎可以不予考虑，但并不能完全排除。

有一种可能性远远超出别的可能性——我肯定阿比是拿去修补一个婚姻关系或者两性关系的。如果我在动机的分析上是正确的，那么整个拯救阿比的行动就必须据此而行。

谢菲尔德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曾经是这样的："她会伤害孩子吗？"

我告诉他："一般来说不会，但是，如果她感到恐慌，或者害怕被抓到后受惩罚，则这种风险就会增大。如果她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卡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则有可能想办法逃走，因此而抛弃阿比，这样，阿比几个小时内就有可能死掉。"

谢菲尔德说："这就是我想确保大家不做或者说出任何有可能导致孩子受伤害的事情来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哈里·谢菲尔德将会成为英国警方对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的、叔父般的形象。至少计划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记者发布会几个小时后，这个决策就受到来自一个本不该出现的部门的威胁。

中央电视是一家地方电视台，该台每月都有一个称为"犯罪跟踪"的节目，由曼彻斯特前任代理局长约翰·斯托克主持。跟英国警视台一样，这个节目综合了犯罪重现、被盗物品报告和罪犯拼凑人像

以及现场录像播放等内容。两家电视台的节目都是直接向公众播放的，目的是要帮助解决犯罪问题，我在不同时间分别出现在这两家电视台的节目当中。

根据我的经验，约翰·斯托克是一个智力相当高的人，他是反犯罪专家，为人也诚实，但我觉得“犯罪跟踪”主要还是一个诉诸公众兴趣的节目。

其中一个常规的栏目称为“局长简报”，并请诺丁汉郡的警察局长丹恩·克隆普顿对一些特别的刑事调查案件或警方的最新发展进行属于闲谈的叙述。

星期二晚上，哈里·谢菲尔德在西布里奇福德的楼下找到了我，并将我带到一边去了。

“这样的事情你简直都无法相信。我不知道如何跟你讲。”

啊，我的天，我想，他们发现阿比已经死了。

谢菲尔德说：“局长将于明天晚上亲自到‘犯罪跟踪’上去讲话。他将公布罪犯拼凑人像和医院的录像带。”

“那个策略已经更改了吗？”我简直无法相信地问道。

“没有，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无权处理。”

我看得出谢菲尔德很不高兴，他不是那种能够隐藏自己的不快和挫折感的人。我怀疑有人觉得他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但他们都错了。反过来，他是那种觉得人们会做体面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的人，尽管他多年从警的经验告诉他情况往往并不总是如此。

有一阵子，我们站着说不出话来，我发现自己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执法权力，也不能够做出操作或者政策方面的决定，但是，我关心的是阿比，关心她的父母和她的绑架者。这些人会怎么想？

“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谢菲尔德问。

“跟谁？”

“总部——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事。”

“愿意，但我是局外人。他们愿意听我说吗？”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是负责一件极为棘手的刑事案件的头儿，他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他决定了一个特别的策略，将媒体哄到了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而且知道这次刑事调查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现

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问题，他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减少损失。

在西布里奇福德开了一个会，来自“管理阶层”的警官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开一次解释战略的会议，并结束任何有关在“犯罪跟踪”上另外做一次单独恳请的话题。

我们大约有七个人，都坐在专案室的一个安静角落里，大家都因为热而脱掉了夹克。来自总部的警监穿着衬衣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他解释说他们打算怎么办。警察局长将在“犯罪跟踪”上做恳请，然后他们将公开相关照片。

“你知道我的观点是什么。”谢菲尔德坐在我后面说。

“我很欣赏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大案子，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此事。我们必须有所回应。”

谢菲尔德说：“先生，我们的确是在回应此事。我们有非常详细和谨慎的措施和策略，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措施。”

我尽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指出现存策略最大的焦点在于在监督谢菲尔德与绑架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我们希望消除这次犯罪报道当中夸大其事的影响，而“犯罪跟踪”却正有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我还争辩说，这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对被害人的父母造成创伤性的影响，而且会使真正有可能打来电话的人产生误解。

那位警监听完我们说的话仍明确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商量了。局长已经答应了“犯罪跟踪”节目中的安排，而如果他出现在节目中又不提到这个县和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件案子是不可能的。

“好吧，但他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把恳请的工作交给哈里来做，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能够让一个高级警官充当次要角色而让次级警官担当主要角色。”

啊，我的天，我在想，得想想办法。

这位警监毫不动摇。就他那方面来说，局长将去电视台做恳请工作，公布照片，而结果导致的公众反应会解决这个案子。

之后所有人都会欢天喜地地过日子，我在想。

警方选择怎么做,不怎么做,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能够说:"你们在做愚蠢的事情,你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肮脏的事情。"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我能够跟一名负责刑事调查的高级警官谈话,因为是他在负责刑事调查案件,是他来做决定的。案子是他的,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如果有事情出了错,他的头放在砧板上。现在我看得出来,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威胁到这种自治,这使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人们忘记了有一个孩子的性命系于一发,而我又对此无能为力。

我无法阻止节目播放,因此决定请他们再次考虑一下公布录像定格像和罪犯照片拼凑图的事情。我说,这是对他们的自我利益的严重威胁。大众媒体已经知道了这个策略,这也许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人像和录像带公布出去,人人都会同时看到。

"如果你们让中央电视得到独家首次公布这批照片的机会,到明天早晨,你们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媒体在说,你们骗了他们。你们没有信守诺言。他们会对你们进行狂轰滥炸,而且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也不会抱怨他们。"

这个信息终于让他明白了:你不该去跟媒体过不去的,尤其是当他们怀着足够强烈的公众精神,把孩子和父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他们自己的利益前面的时候。

我有一个印象,这位克诺普顿局长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些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根据他的情况,他多半是每个月去一下中央电视的演播室,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在节目当中谈些什么话题。这些决定一定是由他手下的人做的。

如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让不满意的程度减到最低水平吧,我同意为他的恳请起草一个底稿,主要集中在已经确认的所有重要的因素上面。

"犯罪跟踪"播出的时候我就在伦敦,是星期二的晚上。我到早晨1点30分才回到家里,6个小时后又到了去诺丁汉郡的路上。我到达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的时候,得知了头天晚上的事情。

克诺姆普顿局长是在继续做恳请的工作,但我的手稿扔到了一边,代之以由负责这个节目的高级警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重新起草

的一篇稿子。此后，一个名为“加利”的神秘者往热线打来数次电话，声称他的妻子抱着阿比。他对主持人约翰·斯托克讲了10分钟，并告诉他说阿比照顾得很好。“加利”在警方得到足够多的细节追踪他之前就挂了电话，克诺姆普顿先生也请他继续保持联系。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是，哈里·谢菲尔德却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安。没有安排好经过训练的谈判者处理电话，打电话来的人的犯罪知情度也没有进行验证。更糟糕的是，约翰·斯托克早间出现在电视上很自信地说他的“警察直觉”告诉他，打电话来的人是真实的。

斯托克是一位有经验的警察，他无疑假定打电话来的人一定经过了正式的过滤，并剔除了诈骗者，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长时间地拖住“加利”，并问出更多的细节。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一切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过滤准备，根本没有人问过这方面的技术问题——根本没有进行生命验证，也没有对打电话者的大脑功能进行分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

者生活的风险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 12 小时内共接到 400 多个电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

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王医疗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 11 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 2 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请大家回屋内去,"警官说,"没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

向前进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开始走过去了,沿着安静的街道朝着好像是一条环形路向前走。虽然我们尽量散开,并看上去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眼前的情形还是很难掩饰,因为大家都穿着厚重的皮靴,戴着头盔,还拿着盾牌。

我们到了房子跟前——是很小的一个两层台地,上面两层、下面两层,后面还有一间偏屋用作厨房。计划是打去电话,让那妇女去接电话,同时警方在外面等候,随时准备进去。她将被告知有人会去敲门,她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如果她产生了恐慌,反应小组将强行进入。我听到电话响了,经过令人神经紧张的几分钟后,前门打开了。警方很快进入屋内,翻遍了每一个柜子、盒子、抽屉、板凳和隔板。那名警官事先听到过婴儿哭的——她在哪里? 是不是被闷死了? 还是被藏了起来?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她的命运的控制吗?

那名女士二十七、八岁,她感到万分震惊,并否认曾打过任何电

话。毫不奇怪，她自己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都受了惊吓，厚重的皮靴从一个屋子响到另外一间屋子的时候大哭起来。搜查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反倒轻松一些了。我盯着她看了半天，也听她回答了一些问题，之后确定这显然是讹诈。因为警方的确在地毯底下找到了有关此次绑架案的剪报。

不管她是否绑架了阿比，她的情绪明显显示她需要咨询和关怀。她的孩子由一名社工带养，母亲被带到了奥克斯胡同警察局。

虽然没有找到阿比，但是，我没有责怪接听电话的那名警官。他一直高度紧张，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事情，而且决心要找到阿比，因此他说服自己的确是听到了背景中的婴儿哭叫声。这是过度紧张的一个指标，像这样沉重的担子压在一名谈判者头上，设身处地谁都受不了的。

不幸的是，当天再晚些时候，那名神秘的"加利"也证明是一个哄骗者。在一片愤怒声中，来自格鲁斯特的这名36岁的失业者和离婚者于次日(7月12号星期二)出现在法庭上，他被控对卡伦和罗杰·汉弗雷形成了严重的伤害。

同时，调查小组还在继续工作，他们极有可能会就此埋在山一样高的文件堆里。有报告从远自爱尔兰和伦敦的地方送来，重要的是，好的信息不能埋没。在我看来，碰到的合适年龄范围内的所有孩子都应该进行检查，并与医生、保健人员和接生婆进行交叉询问。孩子在哪里出生的问题都必须询问，什么时候出生，谁接的生等。

虽然媒体有吵闹声传来，但是，哈里·谢菲尔德不让任何外部的压力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且他还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上司允许中央电视做一个"未察觉的观察者"的纪录片，专讲寻找阿比的事情，这使哈里的工作更难做了。我被告知这是一项决策，调查小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配合。负责媒体关系的警官和中央电视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对此予以拒绝，我不想接受采访。但是，这个纪录片小组有权随便拍摄这次调查活动，因此，我有时候会抬头发现他们从门道或者走道里拍摄我的镜头。

绑架之后的第12天，开始有问题提出来了，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错过了。也许有人报告自己有怀疑，但在数千份声称看到阿比的目击报告中也许排错了优先位置。

7月15号，星期五，我有时间慢慢思考这一切，同时慢慢躺在床上修复自己的肢体。不知道是哪根椎间盘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脊椎出了毛病，或者是肌肉劳损吧，我的腰已经成了一块硬板，最轻微的动作都成了一个折磨人的刑罚。星期六早晨我也是处在类似的一个状态，突然间，早间新闻宣布说，阿比·汉弗雷已经安全找到，而且没有受到伤害，是早间在诺丁汉的一个人家找到的。

有3个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22岁的朱莉·凯莉，她以前是一名牙科护士，她承认是她两个星期前从女王医疗中心抱走婴儿的。她跟男友莱夫·吉尔伯特共住一所房子，莱夫23岁，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他跟母亲苏珊住在一起。在采访中已经透露出来的故事是，凯莉抱走阿比是为了巩固她与男友不断恶化的关系。去年8月份，吉尔伯特跟别的人见过面之后威胁着要中断两人的关系，但凯莉后来又对他说她怀孕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了，允许他为这个孩子装修一个小屋子，并且让他的家人买一个小婴儿车、小床和礼物。这个欺骗行为想得如此周到，她早晨起来假装恶心，说总想吃东西。她塞满了东西走路，并劝说吉尔伯特带她去女王医疗中心进行孕期检查，她让他在接待室里等着，然后她就假装去看医生。

到了3月份，因为渴望得到他更多的注意，她告诉他说化验表明"孩子"可能有伸舌样白痴，这使得这两个人一起去了一所严重智障学校。

可笑的是，凯莉到5月份真的怀孕了，但她并没有抛弃她原来的精心骗局。到7月初的时候，她的孕期已经超过了10个月，她遇到了压力，必须要生下孩子了，因为她周围的人都在等待。她利用自己以前的护士服，然后戴上了假发，再去母婴病房抱走了孩子。再后她回到自己家里，是沃拉顿布兰道大道的一所红砖墙房子，离那个医院不到一英里远。凯莉在莱夫上班的时候打去电话，告诉他说她在家里生了。在激动与兴奋以及家人的欢庆之中，没有人问到她是怎么生的。

同样，大多数邻居也都知道她怀孕的事情，窗台上出现一大堆毛绒绒的玩具，晾衣绳上出现一长条小孩子衣服也就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有一两个人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因为凯莉以前告诉过她们说她要

生个男孩子。在家生孩子也不是常见之事，也没有看到接生婆或者保健人员，因为这些人会仔细照看新生儿的。

朱莉·凯莉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她被描述成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因为她严重依赖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觉得怀孕和生孩子会解决她的个人问题。

做咨询工作的心理分析师劳伦斯·贝尔医生为她做了检查，并说他觉得她形成了对吉尔伯特先生的强迫性人际关系，他是她最早的真正的男友，她从17岁就认识他了。"她感觉无法让电梯停下来走出去了。她无法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她不能够让自己鼓起勇气来说出真相。"从我的角度看，拯救阿比的行动是一个极大的成功。绑架者没有任何抵抗就被找到了，不存在人质扣押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阿比一直得到很好的关照，几个小时之后重新回到了卡伦和罗杰的怀抱，他们对警方的行动感恩至极。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调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后来发现，专案组接到过5次暗示报告，说阿比就在布兰顿大道的一所房子里。第一份是一个匿名电话，就在绑架发生的4天后，当时只说出了街道名字。第二个打来电话的人是格伦尼斯·史密斯夫人，她是吉尔伯特的邻居，她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两天后警方去了那所房子，并发现一家人在庆祝孩子出世，还有礼物和贺卡。

谢菲尔德对记者说："他们在寻找一个要拯救的孩子。而他们找到的却是一个看来就在一个极好的合适的家庭里。"

还有两个匿名电话来自一位药剂师，他担心一名想要一些面霜去治孩子的肚脐眼的妇女有可能带着阿比。后来，邻居格伦尼斯·史密斯跟一位朋友谈到了自己担心的事情，这位朋友就把这件事跟一个接生婆说了，这接生婆又检查了记录，说在布伦顿大道并没有发现有在家生孩子的记录。当这份提示报告出来的时候，侦探已经准备搜查这间房子了。

这5个电话（其中3个是匿名电话）都在媒体策略之后的15天内接听到的4700个电话里面，正好表明这样一个教训，是我们以后必须要注意的。我并不责怪在绑架发生的4天后搜查了那家房子的警官，他们不可能认出阿比来，只有罗杰和卡伦才有可能做到。但他们的报告呢？醒目的细节是不是堆在山一样的文件堆里了？

当一个成功的媒体宣传引发如此庞杂的信息时，人们需要有一个准确分类和优化的办法，让这些信息形成一定的形状和顺序。没有这个工作，很多时间都会在查找一般提示的过程被浪费掉，而不是一开始就集中精力查找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线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这意味着不能够让一个处在危险之中的婴儿的紧急、压迫和情绪化的因素影响到这些信息管理的要求。不管怎么说，应该理解这里面的痛苦和所涉及到的风险，但是，应该退后一步，用几乎是数学的眼光来看看这些搜查活动。

哈里·谢菲尔德和他的小组不应该受到批评。谢菲尔德一天工作 24 小时，因为他称这次调查活动为他从警 28 年来最动感情的一次。"但是，你不能够让感情挡住你做的工作，"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永远不可能有绝望的时候。担心是担心，但是，不能够绝望。我从来都没有过百分之百的把握，说阿比一定能够找回来，但是，我总是感觉到我们能够把她找回来的。"

21 崩溃的审判：皇家法院总是搞错吗？

温布尔顿治安法院初审过后三个星期，200 英里之外的利兹市进行的一项完全不同的起诉将极大地改变拉雪尔·尼克尔案的局面。一名流动杂货商基斯·霍尔原被控谋杀了妻子帕特里茜，但一名法官宣布，一名从事掩蔽调查的女警官与该嫌疑犯交朋友而取得的证据不能为法庭所接受，因此宣布他无罪释放。

霍尔的妻子于 1992 年春失踪，邻居说此前夫妻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声称她就那样抛弃了他，然后开走了家里的福特车，后来又发现这辆车给扔在路边了，司机座椅调得离方向盘很近，这是为她而不是为他调的，但是，一名送奶的人回忆说看见过车里有过男的。

因为找不到她的下落，警方相信帕特里茜·霍尔已经被谋杀了，但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将她丈夫直接牵扯在内。根据司法建议，他拒绝回答问题，警方在他家位于利兹市郊外的普德塞的一间半独立

式房屋的后院挖掘，因为没有成功，他还露出揶揄的表情。他们还在房子附近刚刚铺好的水泥地面下挖掘。

1992 年 10 月，调查小组最终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一名妇女打来的，名叫伊莱莎，她曾在《码头谷时报》上登载过征友广告，但非常惊讶地得到基斯·霍尔的反馈。她认出了他的名字，因为她看过案情报道，也知道他的妻子死了 6 个月了。在警方的建议下，她回信给霍尔，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通信继续期间，警方用西约克郡地区反犯罪小组的一名掩蔽调查女警官替代了“伊莱莎”。在接下来的 4 个月里，两人的关系继续下去了，从信件到电话，里面谈到了很多有关人生、爱情和理想的内容。最后，他们在乔治和德拉根酒巴的停车场见面，在那里，每一个字和犹犹豫豫的咳嗽声都被“伊莱莎”身上藏的麦克风给录下来了。

他们在接下来的 5 个月里又见了 5 次面，大部分是在同一家旅馆安安静静地喝一些酒。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是，霍尔爱上了替代伊莱莎的女警官莉兹，并为她买了一枚婚戒。当他请她搬到自己家去住的时候，莉兹宣称这不可能，因为他失踪的妻子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回到他身边。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 1993 年 2 月 26 日，当他们坐在旅馆的停车场里的时候，霍尔告诉她说，帕特里茜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他已经将她杀掉了，并将她的尸体放进焚尸炉烧掉了。

他被逮捕了，被指控谋杀罪，并于 1994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在利兹皇家法院出庭受审。经过数日司法辩论之后，法官沃特豪斯先生裁定，从事掩蔽行动的警官提供的证据，包括霍尔有磁带录音的供认是不可接受的。基斯·霍尔被裁定“无罪”，没有任何证据提交陪审团。他从法庭走出来，成为一个自由人。

当天下午，我出诊开车回莱斯特的途中从无线电里收听到这个消息。我记得自己当时甚为震惊。这次行动跟尼克尔调查案的过程一模一样，但已经为一家法院所推翻。这是不是标志着柯林·斯塔格的公诉也要告一段落了，我在想。皇家法院总是搞错吗？

我找到电话亭后迅速给佩达打了电话。

“你已经听到了。”他说。

"是啊。这是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案子也完结了?"

"不,当然不会。"他进而解释说,公诉小组已经仔细地研究过霍尔的案子,并相信拉雪尔调查案中采取的掩蔽行动是按完全不同的设计思想和线路来进行的,并不能够以同样的角度来看待。那次行动一直都是"过白区",根本没有诱人入套的内容。

佩达问:"你了解你自己的,保罗,我们的行动并不是要操纵一个人,逼他自己供认的。我们那个行动是要允许他要么完全排除自己,要么进一步根据他自己的选择使自己牵扯在内。"

"是啊,我知道。"

"这就是你不必担心的原因。这件事情一直受到最高层法律机构的关注。"

他是对的。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律师们所做的决定,我也接受他们的判断,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审判日期越发临近时,在我看来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但我却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那种乐观和自信了。我们一直还在朝公正奔走,而现在所有的可能性已经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政府这边来了一位新的主律师,名叫约翰·纳丁,9 月 2 号星期五,我们在他的会议室开了最后一次案情分析会。审判将于星期一开始,就在奥贝利的中央刑事法庭开庭。佩达、米克·韦斯森、布鲁斯·巴特勒、约翰·纳丁、初级律师、我本人和其他一些人坐在一个长桌跟前,上面盖着绿色的厚羊毛毯。

纳丁大致说了初审的事情,并解释说,辩护方有可能先发制人,首先将莉西·詹姆斯的材料予以否认,宣布其不可接受,从而使案子被否决。他提醒我说,星期一有可能要求出庭。我问我的意见:"如果莉西·詹姆斯的证据不能够接受,你觉得你的证据足以定罪吗?"

"当然不行。"我说。

"我很高兴你这样说,因为这正好也是我的想法。"

他开始问一些问题,是有关我所提供的一些证言的,他不断逼我讲出更多的细节并予以解释。我开始感觉难堪了,这就像在别人面前进行交叉反问一样。然后我感觉到纳丁是在测试我。他在评估我面对法庭上一个非常强硬的律师时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会议结束的时候,往前的路好像清晰一些了——如果掩蔽行动

的证据不能够接受，那么，巡回刑事法庭就会折起帐篷回家，放弃针对柯林·斯塔格的案子。当我离开会议的时候，我对纳丁说："我有一个印象，你对这个案子多少有些悲观。"

"嗯，我们这么说吧，你就当我非常乐观。"他说得很难看的样子。

"我并不想逼你太紧，但你觉得巡回法庭有可能成功吗？"

有很长时间的停顿。"我觉得事情非常微妙。"他说。

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我一直等着，并将日程做了调整，以便能够在接到通知的时候立即赶往伦敦。同时，法律上的重量级比赛正拼得你死我活，他们都在大法官奥格纳尔先生面前激烈争论，看针对柯林·斯塔格的案子是否能够继续下去。

最后我才得知，那位法官并不需要听我的意见，并且裁定莉西·詹姆斯的证据可以从"字面上"予以采纳。辩方小组由威廉·克莱格领头，并有吉姆·斯特曼支持，他们提交了一份大纲，列出了反对意见，而且跟预料的一样，他们也利用利兹市基斯·霍尔的案子当作司法先例。

在听取有关证据可否采纳的意见之前，法官必须让自己熟悉长达700余页的通信、电话谈话和柯林·斯塔格与莉西·詹姆斯之间见面时的谈话内容。这么做了之后，他请克莱格先生拿出提议。

辩方律师声称，被告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刺探"行动的受害人，因为行动的目的在于利用一个孤独和容易受骗的年轻男子希望失去童贞的愿望。这次行动设计诱导他供认一个罪行，但是，斯塔格先生一向否认他跟拉雪尔·尼克尔的谋杀案有任何关系。

克莱格先生反复利用莉西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声称，莉西·詹姆斯促成了这种两性关系，并一直在发出性交的诱惑，还说斯塔格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个极其害羞和毫无性交经验的年轻男子正常的反应。他说，我的证据也应该予以抛弃，因为它与掩蔽行动一脉相承。

约翰·纳丁反驳说，两个人的关系当中的确隐含着性交的可能性，但是，莉西并没有告诉斯塔格在他的幻想当中写什么内容——所有的想法都是他自己的。他是第一个提到林地背景、树木、小溪、刀子、极端暴力、强奸和施人以痛苦的事情的人。

他还说，斯塔格向莉西详细描述了拉雪尔如何躺在地上的情景，

而这不是他从警方在调查期间给他看到的惟一一张照片中能够得出的信息。尤其是，他提到了她的双手的位置是掌对掌。诺丁说，这样的细节只有凶手才知道，而这几乎就是对犯罪行为的供认。

克莱格先生完全不同意，并指出拉雪尔的双手是在腕部交叉的，不是手掌对着手掌——这不是一个极小的差别。

9月14日，奥格纳尔大法官先生做出了一份长达80分钟的判断意见，该判断意见揭示了针对柯林·斯塔格的刑事审判案的核心问题，并使许多观察者受到极大震动，因此对警方提出强烈批评。他描述这次掩蔽行动构思不当、注定会失败，他说："我极愿意承认警方在这次重大调查活动当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但是我担心，这样的行为不仅仅透露出了过度的狂热，而且体现出企图通过性质极其严重的主动和欺骗性的行为来使一名疑犯受到犯罪牵连的过度行为。"

他认为，柯林·斯塔格的确在他给莉西的信中首先提到刀子的事情，说他谈到了得知拉雪尔·尼克尔被谋杀的情节时产生了性激动。但是，他说，想编辑和分离从掩蔽行动中收集来的材料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公诉方想办法劝说我，让我觉得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要为嫌疑犯提供一次机会，要么排除自己，要么使自己牵连在谋杀案中。我注定会说，我认为对这次行动的描述是虚伪的。"

谈到斯塔格提到拉雪尔的尸体的问题时，这位法官说，这只是本来无可争辩的一个记录的一部分，因为它无法得到证实，只有莉西·詹姆斯的回忆能够提供佐证。这件事情在海德公园的会面中并没有录下来，只有莉西看见斯塔格躺在地上，并展示拉雪尔躺着的样子。

事实上，拉雪尔的手是在腕部交叉而不是掌对掌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微小的差别，而是相当大的不符。"我听完双方的辩论意见后认为，说这么小小的一个证据能够形成，或者说合适地构成一种可资区别的供罪性质的材料是完全无法令我感到满意的……"

"我想补充说，哪怕我相信这份材料能够合适和公平地形成一种供罪状态，我还是会认为它的本质太过脆弱，因此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它的潜在损害明显超过了任何一种可资证明的证据价值。控方在此能够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劝我明白，这里通过掩蔽行动得到的所有材料都是以不太公正的方法获取的。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

他裁定：信件、电话和磁带对话都不可接受，巡回法院立即发还此案。柯林·斯塔格已经给关押了12个多月，他现在正式被宣布无罪，并从奥贝雷法院走出来，成为一个自由人。他的身边围满了电视摄像机和摄影人员。

在诺丁汉的西布里奇福德区的母婴室里，我接到了戴安娜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都打爆了。这里一团糟。"她说。

我给佩达打了电话，他将判决结果告诉我。他听上去内心一片空虚。他引用法官的话的时候，我希望明白其中的隐含意义。从一开始起，掩蔽行动都受到了仔细关注，而且受到领导大城市警察局的大部分高级警官的监督。他们接到财政部高级顾问的劝告，这次行动也一直列在总检察长案头大案的最敏感案件表上。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就这次行动的合法与否产生怀疑，至少我在场的时候没有提出质疑。

"他还提到了你的证据。"佩达说。

"但他甚至都没有听听有关我的证据的法律抗辩。"我惊讶地说。

"我知道。"

"他说什么？"

"他说要想劝说他接受这个证据，政府还得'爬更高的一座山'。他还说，以心理轮廓描述充当身份鉴别的证据的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让人联想到相当大的危险'。"

这话令我恼羞成怒。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心理轮廓描述或者性变态分析是一项犯罪的证明，我说的刚好相反。柯林·斯塔格自己选择了透露自己的性欲，哪怕这与我就尚未辨明身份的凶手起草的分析正好吻合，也并没有说明斯塔格就是凶手。只有当他泄露关于实际犯罪的真实世界的信息时，他才使自己在警方眼里看来无法洗脱与该凶杀案的干系。奥格纳尔法官先生决定就我的证据作出评论而不听取争讼，也不听取我本人的意见，这也是使我生气的地方。"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佩达，"我办公室的电话打断了叉簧，而且记者马上就要来揪住我了。"

他的声音里面听上去有些犹豫。"请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还有进一步的司法程序的可能性。大城市警察局和全国警察局长协会将碰头商量一致的对策。"

在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拒绝来自媒体的几十通电话，我要他们回去找大城市警察局。有些记者对此甚为不满。一名电视台的制片人在一次深夜新闻节目当中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你今晚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否则我们会将你挂起来风干。"他们真的那么干了，他们将我描述成某种恶毒的策划人，想出阴损的行动招数来陷害一名无辜的男子。

回家以后，我走进客厅，发现玛丽莲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节目。看到伦敦的一家电视演播室里坐着一群人在那里谈论我，那是多么令人感到超现实的情景啊。在他们身后，我的一张大图片已经投射到墙上。辩论的基本打击目标是抱怨这次掩蔽行动、逮捕柯林·斯塔格和审判活动在我脚下结结实实地失败了。

我的脑海里波涛汹涌，日报上的标题读起来令人头晕。"拉雪尔案崩溃。对幻想的裁判。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谁?"

我上午 9 点 30 分刚过就去上班，电话已经打爆了。阿诺尔德洛奇医院的交换机全占满了，谁也打不进来。记者们都来到接待室要求见我，并在大门外面等着我露面。

同时，我也在等待大城市警察局和全国警察局长协会的媒体陈述，他们的陈述将使这个案子落定。我被人描述成想办法"劝说"警方展开这次掩蔽行动，然后说服"本有疑心的全国警察局长协会的律师"，告诉他们应该起诉柯林·斯塔格犯有谋杀罪。当然，这是荒谬的，我也知道，大城市警察局长协会的专员会站出来说："请大家注意，你们找错了人，保罗·布里顿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在思索自己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事情，甚至都列好了逐条反驳的意见，以推翻媒体对我的攻击，但是，我又决定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向基斯·佩达许诺过不做任何评论的。最后，专员和公诉方的负责人的确发布了陈述，但这并没有使我家门前的狗仔队走远。我事先没有得到咨询，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媒体发布会，哪怕看起来我才是被媒体轰炸得最厉害的人。

当然，我现在意识到，警察部门不同的层次均有自己不同的日程表。在表面工作的侦探，比如基斯·佩达、约翰·巴塞特和米克·威克森主要集中力量处理自己手头的工作，但在更高的层次上，政策制定人和管理人员都主要关系警察部门的形象问题，如果有人受到了不

该有的批评，那么，从实用的角度讲，是比较容易处理一些。

崩溃的审判花去了纳税人巨大的一笔钱，媒体必须找个人来抱怨。法官的评论允许他们寻找一个目标，他们就面对着三种可能性：坚不可摧的大城市警察局、姓名不详的公诉方，再就是我保罗·布里顿。我有名有姓，也是目前最容易打击的一个。我拒绝评论，我觉得这使媒体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看到很多怒气和刻薄话都往我这个方向来的时候，其他人看起来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肯定他们在想：嗯，这样可不好，但总算没有针对我自己而来，这已经是万幸了。

这样的感觉约在一年后得到印证，当时我回到了新苏格兰场，是他们请我再去设计另一次掩蔽行动，这次是调查对一台保健设备的破坏活动。我对掩蔽小组的一名高级警官说："我以前来过这里，你知道吧。我们最后一次坐在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事情都进行得如何如何地顺利，正在进行多么了不起的一项工作。后来到了审判阶段，事情出了岔子，我却成了惟一站在这里的人。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

那位警官大笑："是啊，你在这里受了不少气。可你是一条胖头鱼，你有宽大的肩膀，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嘛。"

我并不是一个司法制度的辩护人，让一名凶杀嫌疑人在牢里关上一年的时间等候审判的决定不是我做出来的。警方和律师认为，他们接到了针对柯林·斯塔格的案子，而靠领薪水过日子的地方治安官员也只好同意。

在任何一次调查活动当中，有些材料是可以当作证据而另外一些材料是不能够用作证据的，还有一些需要法官来判断能否接受为证据。靠薪水过日子的地方治安官员查看证据，将嫌疑人送交审判，然后奥格纳尔法官先生裁决莉西·詹姆斯收集的证据不应该提交陪审团。公诉方收回公诉，很恰当地收回，而柯林·斯塔格也就给释放了。

我最感伤心的是安德鲁·汉斯康比、年轻的阿列克斯和拉雪尔的父母安德鲁及莫尼卡·尼克尔。尼克尔先生和夫人一直参加了整个诉讼过程，而且就在电视新闻播放的那天晚上，我还看到尼克尔先生在奥贝利法院的台阶上发表了一通非常气愤和发自内心的陈述。

"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因为1993年8月柯林·斯塔格被提起公诉，这是在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的指导下由警方组织的一次长期的掩蔽行动之后进行的。警方理解这次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能够证明或者反证自己的怀疑，确定柯林·斯塔格是不是凶手的惟一办法。"

"没有实物证据，只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警方该怎么办呢？他们应不应该让一个他们怀疑和相信犯了残忍谋杀罪的人在大街上自由走动？他们有什么选择？他们必须要维持安宁，保护社会。"

22 谋杀妻子的丈夫

星期四早晨，正当风暴在我头上滚过的时候，一位打电话的人想办法接通了阿诺尔德洛奇的电话，但他没有提到当天的报纸头条。警监柯林·波特，也就是沃威克郡刑事侦察部的首领，他有一桩谋杀案需要侦破。

三天之前，纽艾顿的一家建房合作会的女经理在当地一条繁华的公路旁被发现已经死亡。她的办公室已经有人进去偷窃了，警察到了她家后，发现她丈夫被人绑住了，而且嘴里塞着东西扔在客厅里。

"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波特说，他说话未加修饰，"如果你有空，我会让托尼·贝利斯警督跟你打电话。"

"你看过早晨的报纸吗？"我问。

"为什么？"

"很明显，我已经因为拉雪尔·尼克尔的审判案而受到批评了。"

他大笑起来："啊，我知道那事。"

"如果这事让你感到不舒服，或者很紧张，那你找别人帮忙，我绝不会生气。"

"绝对不会。我是在找你帮忙。"

我挂了电话，感到一阵轻松。我处理一些问题的办法是继续做我一向都在做的事情。这有助于让我保持住自己的注意力。

当天下午我赶往纽艾顿，那是一个小市镇，就在考文垂与莱斯特之间的A5号公路的南边。小镇中心很紧凑，四周围着繁忙的环形公路。警察局就在正中央，看上去像是侧立的一只巨大鞋盒。

我将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此时有一辆带篷车正在往外开，车后窗蒙着黑布。突然间，这辆车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倒车。我被一名电视工作人员认出来了，但是，在他们赶过来之前，我已经猫腰进了大楼。

警督托尼·贝利斯有很重的米德兰口音，听上去不太正式，好像是在谈天一样，但是，他温和亲切的外表下有一颗敏锐的大脑。他是个顾家的男人，老成持重，声誉很高，他在我成长的莱明顿温泉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有人干了一件事，结果名字就上了报，厉害呀。"他在开玩笑，指的是尼克尔的案子。"可我想过的只是安静的生活而已。"我说。

他带我上楼，去了二楼的一个大套间，那是最大的一间，用作了专案室。很明显，房间的布局很费了一番心思。无数台电脑终端都彼此合乎逻辑地摆在一起，根据每位操作员的任务排列位置。调查当中生成的文件已经在办公室管理人员的良好控制下开始流动了。警察和文职人员都明显带着自信，但他们都有些疲倦的样子。

这个摆设跟别的很多地方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看到贝利斯在专案室的旁边设了一间专用的情报室。所涉及的警官们有两个特别的功能，整理和评估已经收到的信息，将它们变成可利用的"情报"，并协助思考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另辟了一个房间用于机密管理政策会议，我们就在这里坐了下来。贝利斯抬头看看房门，示意他的助理吉诺·瓦里阿勒也进来。"我按顺序说说这件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细节方面，"他说，"看起来它有典型的周密计划的绑架和抢劫特征，但事情又出了岔子，结果造成了悲剧。"

星期一上午8点35分，一名梳洗得整整齐齐的中年妇女的尸体在A444韦丁顿车道的路侧停车带旁边发现了，那地方离纽艾顿有两英里半。警方立即展开了一项谋杀案调查，并开始检查失踪者的档案。

一个小时后，到纽艾顿的伍尔韦奇建房合作会上班的员工报告

说银行有被袭的痕迹。保险柜被打开了,地上散乱着一地的纸。在附近,一只扔在一边的便鞋与韦丁顿车道找到的那名妇女的尸体上的鞋子相配。这两个场景现在产生了联系,警方立即掌握了这个人的名字,她就是卡罗尔·沃德尔,是伍尔韦奇建房合作会的经理助理。

警方去她在麦里顿村波纳维尔克罗丝的家,离纽艾顿有 12 英里。他们发现窗帘拉开了,牛奶也在门道上,没有强行破门的痕迹。就在下午 2 点之前,两名警官来到大门前,并听到了有人被捂住嘴的喊叫声。他们发现哥登·沃德尔躺在客厅地上,身上只穿着内裤。他嘴里堵着布条,把整个头都围住了,而且还给系在一个废旧的麻袋夹持器上,双腿绑在横档上,手腕用塑料棘爪型编织带绑着。

他明显很难过,而且显出挨过打的样子,因此被立即带去了医院,并进行外伤和表面伤的治疗。沃德尔先生不停地探问他妻子的情况,直到他父亲说卡罗尔已经死了。一颗泪珠从哥登的脸上滚落下来。

"我们等了 24 小时才讯问他,"贝利斯说,"他说星期天晚上出门寄信,回家的时候有有几个坏人朝他扑来。他们拖他进去,还有一把刀子架在他妻子的喉头上。他记得住的下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天早晨醒来了。"

吉诺说:"同时,有人利用卡罗尔的个人密码闯入伍尔韦奇合作社。"

"损失了多少钱?"我问。

"包括支票在内约 1.4 万英镑。"

贝利斯还补充说:"这对于计划和风险来说不是很多钱。一个职业团伙会想法搞很多钱……"他像是自言自语,并继续说:"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卡罗尔?这只会把事情弄糟。其中之一一定说了不恰当的话,或者让她看见了自己的脸。"

"或者原本不打算这样的,是一次事故。"我说。

"那保安密码呢?"吉诺说,"伍尔韦奇合作社的计算机记录有人在案发当天早晨的 5 点 22 分用过。但是,每个持有钥匙的人都有一个'强迫码',有一位数字跟他们日常进入的号码不一样。这是设计用来防止绑架的。卡罗尔本可以使用这个强迫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同时又不触发报警器。我们本可以在几分钟内赶到的。"

"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花太多时间,"贝利斯说,"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这跟他们平时所想的行为完全不同。"

我同意:"不能够因为手头有强迫码就一定能够在紧急的时候有勇气和清醒的头脑想到利用它。她有可能吓坏了,她的丈夫在家里被押作了人质,也许她觉得自己冒不起这个险。"

贝利斯已经讨论过我在这次调查当中的作用。他希望我提供独立的犯罪分析,这意味着评估所有的事实、报告和观察,根本不用警方使用的任何一种理论。如果我通过独立的分析形成同样的结论,那就说明警方是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否则,他们就得重新考虑别的可能性了。这个案子当中已经有一些东西引起我的注意了。这就如同看着一个已经拼好的拼图游戏图案一样,已经出现的图画是一次出了偏差的绑架和抢劫。但是,我禁不住感觉到像用鞋钉强行塞进去的一样,图案拼得太挤了。

贝利斯看得出我的不安:"你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不对劲。"

"嗯,你这样说真是有意思。"

他解释说,他已经给了我犯罪现场的直接事实和陈述,只有他自己的某些考虑没有说出来,以免影响我的思考。

"应该有沃德尔先生以前的一些资料,不是吗?"

贝利斯点点头。

"24 年前他攻击过一名妇女,而且是当着她的两个小儿子的面。差不多杀死她了。他因为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蹲了 4 年牢房。"

"那人是谁?"

吉诺答到:"他的地质学老师的妻子。"

我立即变得不安起来。少年一般不会无故攻击从来没有见过的妇女,除非他们有某种人格障碍或者性欲上的病态,或者他们有精神病。

"你可以拿到原始材料。"贝利斯说。吉诺做了笔记。

但从我的角度看,这还不够——陈述材料经常不能够包括可以指明动机和思想状态的细节。

"可以重新讯问受害人吗?"我问。

贝利斯抬起眉毛来。"那是差不多24年前的事情。"

"我知道，但我需要了解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他的样子如何……所有的细节。"看了吉诺一眼后又点了一个头，这确证了此事可以进行。

我并不是说哥登·沃德尔除了一个失去妻子之外还是别的任何一种人，因为他已经经历了严重的考验。他并没有隐瞒以前的犯罪事实，他是在医院告诉警方的。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些问题，并说他对重提旧事感到非常遗憾。"我觉得这几乎是对我妻子的另一次不恭。"他说。

这位有胡须的41岁的人是戴着变色镜坐在轮椅里出现的，他说卡罗尔就是他的一切，他无法想像没有她怎么生活下去。他请求知道能够帮助辨认出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情况的人与警方接触。贝利斯递给我一份陈述。

沃德尔接受了两天的问讯，最后签署了一份长长的陈述。他描述自己是一名仓库的管理人，为一家汽车配件销售公司工作，名为英国文格公司，基地在莱斯特的享克雷。他是1994年6月进这家公司的，他有可能得到提升，还有可能选入董事会。

星期天，他和卡罗尔一起过了极普通的一天，在家里磨蹭了一整天，还看了电视。晚饭后，卡罗尔打开录像机看了一部电影，叫《三角力量》，但电影没有看完，还差一点点，因为她当初并没有录完。

然后，她问哥登是否愿意为她寄一封信出去。是写给艾克斯霍尔的一位泰勒先生的，他想像那是跟她的工作有关的一封信。因为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封信，他就没有投到当地的邮箱里，因为那只邮箱要到第二天早晨7点30分才有人取走，因此他开车去了6英里外考文垂的毕晓普大街上的邮局，那里有很大的一个分捡处，星期一一大早就会投送出去。他说，毕晓普大街的墙上有一台摄像机对着邮箱。

之后，他开车回家，并在布鲁克兰酒巴喝了一点酒。他记得酒巴的服务员保罗在那里讲了一些笑话，电视上有摩托车比赛的镜头。

喝了两品脱之后，哥登开车回家，约在晚上10点到家。

"我关上前门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烟草味。这很奇怪，因为我和妻子都不抽烟。我看到客厅的门开了一部分。我还看到厨房有灯。客

厅是黑的。我推开门，跨了一步，此时两边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有一块布蒙在我的嘴上和鼻子上。”

“我可以闻到布上面有什么味道，好像是腐蚀性的东西，让我的喉头很干。我的胳膊被拧到后背去了，正在我后背的壁灯打开了。可调光的壁灯已经调到很暗的地方。”

“灯打开之后，我看到一个男的戴着小丑口罩，他用右手将一件连衫裤工作服罩住了卡罗尔的下巴。她的头夹在他的右胳膊下面，就是那种夹头的姿势。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刀子，刀锋对着她的喉头。我看到她嘴里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吓呆了的样子……”

“那个人说：‘别出声，按我说的做，跪下。’他有很重的爱尔兰口音，但声音有点模糊，因为他戴着面罩。我在挣扎，想挣脱……我被按着跪下去了。此时，我感到胃部挨了一下。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开始有些昏头昏脑了。他们强迫我的头向前倾，我感到自己的后腿上有某种东西在往上夹。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看着在我右边按住我的那个人的鞋。那是一双黑色的鞋，是那种用带子系住的皮鞋，有很厚的黑色橡胶底。鞋子擦得很亮。我记得他穿着黑色的裤子……”

哥登估计，从他进入客厅的那一刻起，到他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总共约有 3 到 4 分钟。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但人是被绑在废麻袋架上的。他听到答录机响了几次，还听到邮局的人约在早晨 8 点到来。他浑身不舒服，内心很乱，而且身上很疼，因此一直在用力挣扎，直到警察于下午 2 点到达为止。

沃德尔先生很长的复杂陈述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但其中的一些方面令我感到奇怪。人们一般想像，在压力巨大的时候，我们会有对一些细节的长时期的准确回忆，但现实却不同。帮助一个人回忆起某些事情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哥登却记得住很小的一些细节，比如皮鞋和灯光的开关。

同样，他说从攻击开始到他失去意识之间约有 3 到 4 分钟。这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但他所说的事件的顺序全部加起来也可能只是 30 秒的事情。其他的几分钟时间呢？

也许我期望知道更多的东西。毕竟，沃德尔先生失去了一位妻子，他因为一次残酷的攻击而受到创伤。他的叙述当中出现一些反

常现象不是很正常吗?

这位贝利斯警督也有自己的考虑。星期天晚上投出去的信是要告诉"艾克斯霍尔的泰勒先生"说,他的现金卡到了收回的时间了。"显然,这封信完全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发的,"贝利斯说,"因此,为什么星期六晚上外出开那么远的车到考文垂去?"更巧的一件事情是,那天在建房合作会明显打开过的惟一的一封信也是寄给艾克斯霍尔的泰勒先生的。

我们默不出声地沉思起来,希望有所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远比原来描述的复杂得多,尽管目前还不能够说出大概来。

"我需要更多了解他们的婚姻状态,"我说,一边还记了笔记,"也需要更多了解他的工作。看看他过去20年都在干些什么事情。他们结婚多长时间了?"贝利斯说:"12年。"

"没有孩子?"

"他们明显是想生个孩子,但卡罗尔怀不上孩子,因为她开始专心做自己的工作。"

"这类的事情一般不会轻易就了结。"我想。

时候已经不早了,天马上要黑下来。我看了看自己的日记本,因此决定等白天再去看现场。然后我收起了几份陈述和照片。

"电视新闻的人在楼下等着。"贝利斯说。

"嗯,我不能够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我本人还不了解很多情况。"

"不,他们希望找你了解尼克尔的案子的情况。"

我叹了一口气。

"我派人送你下楼。"这位警督说。

"那就不必了。"

"不不,有人会抓住你的包。"

当我推开前门出去时,一台摄像机就架在我前面。

一个声音说:"布里顿先生,您准备使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案子?"

"请你去问贝利斯先生。"我说。

"您对拉雪尔·尼克尔审判的最后裁决有何想法?"

"很对不起,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问大城市警察局的专员。"

"来吧,来吧,布里顿先生,你可以自己发表一点看法的嘛,你一

定对此有一些感受的。"

我不停地走，摄影机在不停地拍，一直到我钻进汽车发动为止。

那个事件的后果是无法逃避的。周末的报纸全面报道了尼克尔案的情况，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议。时事主持人开始问罪犯心理轮廓描述是否受到致命打击。我的不信任感和愤怒并没有减轻，但对玛丽莲来说我觉得事情更糟糕。她无法相信故事怎么会编成那个样子，也不能够相信我已经孤立到了这种程度。警方为什么不出面摆平一些事情呢？

"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干？"她问，几乎是泪水涟涟的，"你为他们干了那么多事情。我想到你为他们所花的那么多时间，每个周末你都得为警方工作，我们从来都没有度过假。你从来都没有索要过一分钱，而事情到最后竟然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她不知道如何称呼这样的事情，最后她说："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努力帮助她明白一些事情："我所参与的哪一件案子得到过准确的报道？"

"一件都没有。"她说。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事情会扳过来？"

她耸耸肩："没有道理。"

可笑的是，当我的匿名状态第一次因为斯戴芬妮·斯雷特绑架案而打破以后，讲我的故事时一直都是正面的。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最终会有人来咬我一口的。澳大利亚人称此为"树大招风综合症"。所谓枪打出头鸟。

如果我走开，再也不去理会任何犯罪现场，也不去起草任何心理轮廓描述，玛丽莲会高兴得不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在为未来准备各种计划了，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考虑到再把业余时间拿去为警方服务了。我实际上已经决定这次审判是我最后一次向警方提供凶案方面的咨询了。

这一切现在都已经颠倒过来了。如果我现在住手，人们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我已经夹起尾巴跑了。如果尼克尔案的裁决会被当作使心理轮廓描述倒退的原因，我必须继续努力，告诉人们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有太多的因素会使单独一个案件的结果损害一种重要的调查方式的发展。

我向玛丽莲解释这个道理，并说我们的“正常”生活必须等一阵子。虽然很失望，但她还是表示理解。我觉得在我同意帮助沃德尔案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产生怀疑了。

我已经花了好几天时间沉浸在这次绑架案、抢劫和谋杀现场的陈述以及图片中了。总体的印象是，从一个职业团伙作案的角度看，这是一件愚蠢得不能再愚蠢的案子。同时，但如果作为单独一人作案的结果，它又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我对自己说，看过现场之后，我会有更多的了解。

我和贝利斯从警察局的后门出去了，避免有记者看到。我们首先去离警察局不到100码远的伍尔韦奇分社很快地看了看。前窗处已经堆满了鲜花，行人有时候会停下来看看，表达他们的敬意。卡罗尔是个受人欢迎的人。

之后，我们顺着风景如画的B路穿过伍尔韦奇郡，经过一些自我采摘农场和果园到了麦里登，那是离纽艾顿12英里远的一处小村子。每年秋天都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但这条路上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东西。

波纳维尔克罗丝是相对较新的一处居民区，有成排看上去类似的房子摆在安静的街道上。沃德尔夫妇住在一个两层的红砖房子里，有很大的漂亮窗户，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一只陶制的蝴蝶贴在大门附近的木制横梁上。

走出汽车后，我注意到我们完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邻居的注意。正面墙上有一个防盗盒，还有保安灯，这些东西指明事主有很强的安全意识。这家人的朋友曾对警方说过，卡罗尔很担心有人跟踪到家里来抢走她在建房合作会的钥匙。她甚至还提到不当钥匙保管人的可能性。

这就使劫匪如何进入房子里面的问题更加神秘了。卡罗尔不会为生人开门，但又没有强行破门的痕迹存在，也没有窗玻璃掉落过的证据。

警方铺的木板道在车库的地上形成了踏脚处，我们就踩着木板道从后面进去了。看起来很有顺序，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一切东西都在原位——工具、胶水、密封剂、细线、砂纸、花线和几节绳子。这里没有任何翻动过或者捣腾的痕迹。

房子其他地方都是一样。厨房案板上一点痕迹也没有，连一个人给自己倒一杯水的印迹都没有。在餐室桌子上，有一个果盘碗，也是一动没有动过。每个碗柜的门也都是紧闭着的，所有用具都放得好好的。

进入客厅之后，我看到长靠椅推到了远处的墙角，而且面对着错误的方向。一把安乐椅翻了起来，叠在另一把安乐椅的上面。

有些东西没有意义。沃德尔描述有两个人朝他扑过去，一边一人，那是在他进入客厅的时候，但是，房间后面没有可以站人的地方。而且家具为什么搬动了？

有金属框架的麻袋夹持器仍然在地板的中央，而且附近有一根黄色的塑料棘齿型编织带。这是一种奇怪的捆人方式，我想。在房间的别处，一个火炉地毯已经被扔到一边了，卡罗尔的手包里面的东西被翻了出来，扔了一地。哥登的衣物和鞋子扔在附近的地板上。但是，这个场景看起来错得很微妙。手包并没有很多翻动痕迹，里面的东西看来是逐一排出来的。同样，哥登的衣服看起来也像是有人小心地摆放起来，就好像洗澡前摆好的一样，并不是他们绑一个人的时候随便一扔的样子。他的鞋子和卡罗尔的便鞋也是成对放着的。

他们生活中的小玩艺儿仍然整整齐齐地摆在火炉和窗台上。鲜花放在花瓶里，一个花盆有一个极精致的架子，但已经移到了房间一个比较拥挤的地方，但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被捣烂或者剪掉。一切看起来绝对没有动过，损坏，也没有暴力毁坏的印迹。

我的任务是根据所提供的陈述看看房子。由4个人组成的一个狂暴和残酷的匪帮对一名妇女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他们毒打她的丈夫，并用麻醉药让他昏迷，还剥掉了他的外衣。然后才用在他的车库里找到的一台架子绑住他。这个匪帮一整个晚上都在房间里，但并没有去喝他家的一点水，没有吃一点水果，也没有打开饮料柜。

暴力和挣扎的痕迹在哪里？我自问。走道里没有暴力攻击一名女士的痕迹，客厅里看起来是重新安排而不是当时受到破坏的样子——就好像有人小心翼翼地不要把东西弄乱一样。同时，哥登·沃德尔总共在地上躺了16个小时，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膀胱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麻烦。

在楼梯的顶端，也就是平台上，有一个卫生巾盒。它的样子和卡

罗尔平时的整洁不太相称。它是从哪里来的？谁将它放在那里的。也许这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在设法使一切变得有意义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代表一种意义。

问题很快就来了。为什么抢劫者什么都没有从房子里面拿走。他们甚至都没有搜查过这个屋子。为什么要从车库里拖一口箱子出来？为什么要绑上沃德尔先生？

在楼上的第二间卧室里，我看到一台计算机和一台小打印机。旁边有一张工作申请表，里面有一份简历。警方对这些东西不太可能产生很大兴趣，但一份简历告诉给我的内容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它能够说出哪些东西是人们说的，哪些东西是人们实际知道的。你然后会开始得到一些点子，知道他们用了哪些欺骗手段，也许还能够知道他们对自己是如何评价的。

我扫了第一页，在"个人简况"下面，沃德尔描述他自己为"一流领导人，有杰出的交流技术。有亲手管理经验，积极性很高和精力饱满的性格，有创造力，有远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守纪律，有战略眼光，有分析能力，在仓储管理和分销方面有可资查询的业绩。"

他列出了他以前的一些雇主的名字，然后还列出了"职业资格"这一栏，并在下面写着"运输研究院会员"一项。贝利斯看到了我的反应，他立即问我发现了什么。"这才是关键，"我说，把上面的字指给他看，"如果沃德尔先生的确杀了他的妻子，那么，这就是他使谋杀活动得以成功的关键。这次活动显然是有背景的。"

"你意思是？"

"我们一直都在根据沃德尔的故事寻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证据，而我们都认为事情不太容易说得通。"我说。

贝利斯点头，我就继续说："同时，看起来这件事情要让一个人来完成的确不容易——太多的过程要走到，太多的障碍要克服。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运输问题。从A点到B点再到C点，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下，一路还要解决很多物证和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项目管理练习，能够预想和计划到一系列简单的行动，同时又要达到一个复杂的目标。"

贝利斯慢慢体会这里面的信息，他努力把我所说的话与这次调查的进展联系起来。

开车回到纽艾顿的途中，我开始回想有关卡罗尔和哥登的朋友、邻居和同事的大量的事实、报告和观察。整理出所有这些东西之后，我知道其中很多都在卡罗尔的死亡当中没有意义，但是，每一片消息在开始的时候都值得给予同等的注意。我现在必须把一切信息都进行归类，决定哪些消息是可靠的，哪些是可以彼此产生联系的。而且看看它们如何跟各种各样的叙述产生联系。

贝利斯邀请我去参加犯罪咨询小组，这意味着我必须从头到尾卷入其中，也在调查活动当中担当正式的责任。不是局内人很少接触到一次调查行动的内核，而我也认为这是对我的相当大的赞赏。在许多方向，我都有一种优势。跟已经参与了数百次刑事调查，而且面对时间、金钱和媒体关注的压力的警官不一样，我可以退后一步，观察更大的一个图景。

刑警最容易落入的一个圈套是形成一个概念，或者关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假设，然后想法找到符合自己的假设的事实。接连而来的信息在他们的头脑里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处理，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自己的假设，如果有数十名警官都卷在一个共同的目的当中，而且还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很多，问题就会被夸大。如果一条信息突然间出现，但又不符合事先的假定，那就有可能贬低它的价值。他们会找到理由来否定这个来源，或者说服自己这条线索并不重要。

有可能影响大型调查案的另外一个困难在于个别刑警会感觉到他们自己的调查意义最大，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投入之所在。我记得在斯戴芬尼·斯雷特的绑架案当中，我就在莱切尔格林的专案室里，当时有数名刑警都在执行不同的任务，比如查找服刑释放人员档案、当地的线人和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公司代理人。至少有三个人单独到了我跟前来，他们都相信绑架案的答案就在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当中。

托尼·贝利斯知道人们多么容易就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哥登·沃德尔的身上，因为他以前有过刑事犯罪记录，而且他的陈述当中也有反常的现象。但是，我同意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政策，不能够仅仅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每一条调查线索都应该追查下去，否则，有潜在重要性的信息有可能会错过。不能够因为沃德尔先生的历史上有暴力攻击犯罪的记录就确定他是凶手，而且也不能够成为他躲避坏运气

的理由。犯罪者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会被抢劫、攻击，也有可能被汽车轧死，就跟我们所有人一样。

卡罗尔·沃德尔是在考文垂出生和长大的，她从出纳一直做到伍尔韦奇房屋合作会的经理助理。她以前是主日学校的老师，一般人都认为她胆小，神经紧张，在现实条件下没有果断的判断力，而且很担心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在家里。

她是在当地保龄球会认识哥登的，当时他 25 岁，她 23 岁，4 年之后，也就是 1982 年 4 月 17 日，他们在考文垂市中央的圣三位一体教堂结婚。他们被人认为是一对安静、彼此相爱的伴侣，一般都在家里过日子。

根据哥登的说法，卡罗尔是他惟一知心的女朋友，婚姻当中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彼此不忠诚或者暴力冲突的事情。他说卡罗尔知道他以前犯罪的事情，他也用自己的监狱号(522537)当作自己手提箱的密码，这样他就不会忘记自己干过的事情。

卡罗尔死之前的那个星期一，他去上了班，然后声称自己生了病，拉肚子，接着便回家上床睡觉。第二天，他仍然觉得不舒服，因此一整天都泡在家里，卡罗尔也开着她的灰色标致 106 车去上班。星期三，他约在中午起床，然后去考文垂的一家工业地产公司参加面试。他说他在英国文格公司工作不开心，因为该公司对"员工的法律责任和安全保障意识不够好"。

他于星期二又去参加了另一份工作的面试，是在约克郡凯夫莱，上午 10 点离家，然后开了 140 英里的车。他留下一张便条说："卡罗尔，外出了，约 6 点回家。"这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男子要去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寻找工作而又不告诉妻子？

卡罗尔最后一次活着为人看见的时候是星期六晚上，她的同事朱恩·奥康纳尔及丈夫一起与沃德尔一家吃饭。卡罗尔与哥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磨擦痕迹，康纳尔一家离开的时候，他们还看见那两口子手挽着手站在门前挥手道别。

研究犯罪现场的照片时，我不断地碰到与沃德尔先生叙述的不符之处。一方面，他描述了一次有预谋犯罪的因素，描述了口罩、手套、连衫裤工作服和不连贯的命令，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安排，警方还是要想办法相信，他们没有自己带绳子来绑他。反过来，他们必须去

找个东西，而且必须去车库找东西。他们找到了黄色的塑料编织带，那是哥登在车库用的东西。绑人用这种方式是很奇怪的。

车库的照片显示，固定在墙上的有塑料横格的箱子里仍然可以看见一两根编织带。但是，车库里明显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用来绑人，这些东西近在手边，绑起人来更方便。这批劫匪不仅仅没有用这些东西，反而找到了那几根带子，而又没有引起任何翻动或者查找的迹象。

同样，我会预期一个哪怕半职业化的匪帮更有效地绑起人来，他的手会给绑到背后而不是前面，还会在他的嘴里塞进东西，不允许他发出任何声音。反过来，他们却在他的头上缠了一根带子，并从车库里拖来了一只麻袋架。这是毫无意义的。他本可以绑到餐桌或者椅子上的。他的手和脚也本可以绑在一处的。

所有这些情况都提出一个问题——沃德尔先生有没有可能伪造了这起攻击行为，并利用棘爪编织带作为自己捆自己的紧固器械？

我回头来看卡罗尔尸体现场的照片。她面朝上躺在地面，穿着休闲的周末服装，她的左脚附近有一只露跟蓝色女便鞋。鞋带是解开的，正如在伍尔韦奇那边找到的那一只便鞋一样。在挣扎当中丢了一只便鞋是有可能的，但同时在两个不同地方丢了鞋却是不正常的。地上或草上靠近卡罗尔的地方没有刮磨痕迹，也没有拖拉痕迹。同样，便鞋上没有印迹表明她的鞋子是拖着丢掉的，也没有被人在地上拖过的痕迹。死后尸斑表明卡罗尔死后根本没有穿便鞋，任何一段短时间都没有。

我记下了一个问题准备问病理学家："她的鞋子按照原来的鞋扣位置还能够再穿回去吗？穿上去合不合脚？会不会很容易就松脱？"

我记得沃德尔在自己的声言中所说的话。他描述卡罗尔在家里一般都穿拖鞋，楼上卧室有一双，楼下也有一双，就在客厅她的椅子旁边。很显然，星期天的晚上，她在自己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一定是穿着拖鞋的吧？那为什么一批残忍的匪帮挟持她去房屋合作会抢钱之前还要等她换上自己的便鞋？

最后，我研究了"第三犯罪现场"——伍尔韦奇房屋会——我很快意识到，袭击者一定非常了解这里的保安系统。他们必须先进入屋里移动一张桌子接近摄像机，握住带子，挡住保安摄像机，再打开

保险框——所有这些都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从卡罗尔的嘴里问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让他们如此熟悉这个地方。要么她在场，要么匪徒已经很熟悉这个地方。

9月19号星期一，也就是凶案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警方在3个地点拦截车辆和行人进行盘查，希望了解卡罗尔·沃德尔最后几个小时的情况。从早晨4点30分起，在那个停车带，在纽艾顿市中心和她家附近都设了路卡。当天早晨稍晚一些时候，我也回到了专案室。某个爱开玩笑的人从周日报纸上剪下了我的一大张照片贴在墙上。照片用的是黑白色，使我看上去更加像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政客。

罪案咨询小组由贝利斯、吉诺、瓦里亚勒、我本人和情报室的负责人组成。有时候，负责刑事案件的局长也来参加。

我很快发现，吉诺是这起调查行动当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是他使很多事情发生的。作为一名警督，贝利斯要负责策略的问题，而且要发布命令，但是，确保命令得以贯彻的人却是吉诺。

我们开始评估这个案子的时候，各种可能的解释都进行了研究。除了少数几条彼此没有联系的信息之外，没有找到任何能够支持沃德尔先生的陈述的证据。一名邻居萨哈·哈帕尔曾报告说，在卡罗尔去世的头两个星期，她曾看到一辆白色运输车一类的小篷车被人开到朝波纳维尔克罗丝去的公路上。她两次看见那辆车停在路上，她还觉得车里有两个男的。另一名证人说看见一辆银灰色或者淡绿色的奥斯丁蒙塔哥型车于星期一早晨停在伍尔韦奇房屋合作会门前，车里有好几个男的。

这些信息有可能非常重要，也有可能什么意义也没有。我必须问自己，这样的信息产生效果之前，我们必须走多远。

"哥登在关于他的完美婚姻的事情上并没有讲实话。"贝利斯说。

他的话引起了我高度的注意。

"他一直在外面另有所为。"

"一场情事？"

"嫖娼。我们从两名妓女那里得到证言，还从另外两名妓女那里听到他的名字。"

克里斯汀娜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过去6、7年的时间里跟沃德尔一直有定期的来往，他们是在考文垂的红灯区的希尔费尔茨认

识的。沃德尔一次至多付 50 英镑，他喜欢开车到乡间去，用他车箱里的绳子将自己绑起来，然后让她使劲搓他的阴茎。

她三个月前最后一次看到他，当时沃德尔开的是一辆标致车，后面还有软毛玩具（也许是卡罗尔的车）。他身上只有 15 英镑，她"出于好心肠"也接受了。她为他手淫了一把，说了很多脏话，大约 5 分钟时间。

另一名妓女珍妮描述被沃德尔带到家里，是在白天，"靠近纽艾顿的什么地方"。哥登说到他妻子时使用"她"，他说她当时在上班。

警察继续了解沃德尔的过去，结果发现 7 年之前，卡罗尔的一个朋友曾对她说，她看见哥登去了考文垂的一家下流酒吧。卡罗尔不相信她的话，后来问哥登时被否认了。这事很快就给忘了。

贝利斯想办法找到了哥登少年时期攻击别人的细节，那是导致他坐牢的原因。"她的名字是布兰达·简·赫斯，是沃德尔的地质学老师的妻子，当时在考文垂的米德兰中学。"他说。我接着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1970 年，当时他 17 岁。"

我开始读材料了。沃德尔周末在家里给赫斯夫人打电话，说他自己是她丈夫的一个学生。布兰达很惊讶，说一名学生竟然拿到了她家的电话号码，而这部电话只是一个星期之前才装上的。她丈夫彼德去了德比郡，是学校进行的一次野外旅行活动。她当时在照看两个小儿子。沃德尔告诉她说，他发现了一种植物，是赫斯先生一直想找的，并请布兰达来拿走，因为他骑着自行车，一个人不好弄。她同意了，并在离这家人不远的一条乡村小路上见到了这名少年。她将一个 5 岁、一个 4 岁的两个孩子放在车后座上，再从车后厢里拿出一把铲子和种籽盘，并跟着沃德尔走到路边不远处，当时要穿过一个小小的林地。他看着她在前面走，然后从后面抓住她，并把一把鞘刀架在她的喉头上。

"你想干什么？"她恳求他。

他说他是保罗·纽曼，他想要她的钱。然后，他要她躺在地上，这样他就可以绑起她的手来。她拒绝了，因此她站着的时候他将她绑了起来。布兰达说她家里有钱，希望沃德尔会带她去家里。他带她上了汽车，中间停留了一次想迫使她跪下来。她拒绝跪下，因此他举

起她的胳膊来用膝盖朝她腰部顶了一下。

他强迫布兰达进了乘客座，然后开车走，根本不管车后座的孩子。布兰达恳求沃德尔放过孩子们，说保证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但他将车开到一个通道的入口附近，并打她的脸。然后他朝她眼睛里喷防冻剂，并将自己的手伸进她的裙子，撕扯她的内裤。较大些的那个孩子想保护他母亲，但沃德尔抬手给了他一拳。

他们又开车并在另一个入口附近停了下来。这次，沃德尔从驾驶座上下来，并在乘客座的旁边找了个位置。他用刀子刺了后胎，然后朝她脖子上刺了一刀，并在后颈上刺了两刀，然后迫使布兰达移到司机座上去。

当他从血渍处退出时，布兰达将乘客一侧的车门猛力关上。他猛力砸门，但布兰达想法把车开走了，并发现了一名路过的摩托车手。不到6分钟，一辆救护车开到现场，但布兰达需要9品脱的血，她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件幸事。

整个事件持续了45分钟。之后，沃德尔骑着自己的自行车逃跑，当最大的儿子详细描述了凶手的样子后，他被逮捕了。最开始他被控谋杀未遂罪，但最后又改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罪。沃威克的法庭听说这次攻击完全是由性欲冲动引起的，而且有很强烈的幻想成分在内。沃德尔据称是受一种"保罗·纽曼醉心症"的影响而犯罪的。

警铃开始响起来。很明显，哥登·沃德尔有一阵子产生过严重的问题，如果未加治疗，则没有任何理由期望这种病会自行消失。虽然我对形成攻击布兰达·赫斯的这种行为的这种性幻想的准确性质并不是很清楚（我不知道他到底希望要她的什么，或他带着刀具是想控制还是想杀人），但它清楚地显示一种利用潜在的致命武器攻击的意愿，并有相当程度的预谋。他想办法搞到了赫斯先生家的电话号码，打了电话，哄她进入林地，并带了刀具和绳子。

那还是24年前的事情，但是，沃德尔现在仍偏好妓女，还有异常的性活动偏好，这表明他的性变态兴趣仍然存在，仍然隐藏着。而另一方面，沃德尔一直还保持着婚姻状态，并视其近乎神圣，并且还对不能够有孩子表现出深深的遗憾。同样，他描述自己为成功的商业管理人才，可实际上他的职业生活主要还是由临时的合同和重复性的工作构成的。尽管他显得极有希望，但他一直都没有做出什么成

果，对此他抱怨经济条件不好。故此，他看起来是一个夸大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人。

显然，他在英国文格公司的老板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描述他为一名不合格的人，并与实际的工作任务不相称。他们准备开会讨论他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为何没有进步，但沃德尔却选择这天生了病。很明显，他是在逃避此事，并选择回家过周末，而且准备去进行工作面试。

这种欺骗行为也在凶案发生之后一些医护人员和其他的一些人替他看病时显露出来。在他家里替他看过病的医务人员告诉警方说，他根本就没有显示出经受了创伤的迹象，而在发生了这样严重事件的情况下，一般会出现诸如脉搏和血压升高等症状。在医院里，他的胃口跟平时一样，相当安静，情绪波动也不大。

别的一些人谈到他时都说他相当冷酷，没有同情心，除非谈到他自己的伤痛。同时，他表达出来的疼痛看来比他实际的伤痕更严重，他继续需要拐杖才能够行走，而医生们认为这根本没有道理。

讲到卡罗尔被杀的事情时，沃德尔问到她是否受了严重的伤，还问有否受到性攻击，但是并没有问到调查进展的情况。

这种行为有几种解释方法。在巨大的悲痛之下，有些人会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思想。当然，这并不能够说明他们就是杀人者。

"他的行为举止当中，你还能够告诉我什么东西？"我问。

"他很小心，"吉诺说，"在对话的安全区内他谈得很快，也很自信，但在回答某些问题时，他会停顿一下，并花一些时间进行思考。在对他的伤口拍照时，一名警官随意问了他一声：'她的便鞋在哪里？'"

"沃德尔说：'在后面的卧室里。'然后又停顿了一下，很快说：'你说的是哪一种便鞋？'"吉诺抬起了自己的眉毛。"这使你感到奇怪，不是吗？他怎么有可能知道便鞋的事情，他一整晚都失去了意识。"

"关于以前的那次攻击他说什么了？"我问。

"他怪考试压力太大，说他母亲管得太严。"贝利斯说，他无法掩饰自己不相信的表情。

"他有没有跟任何一个特别的人谈话？"

"他母亲和父亲每天都在医院里，"吉诺说，"他母亲对讯问他一

直有敌意，说他太脆弱了。他父亲看上去更放松一些。”

他们谈话的时候，哥登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他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是那种自怜自爱的人，他对发生在自己和妻子身上的事情没有表达出愤怒。他对身边的任何人详细讲述自己的伤痛，但没有谈到他的婚姻，也没有谈到卡罗尔。他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没有，也不知道他同事会如何看待他，因为他的过去现在已经暴露出来了。

就好像承认他的行为有可能被人看作奇怪一样，沃德尔谈到“一堆的事情都出来了”，并用到了他有可能是在几十年前在格兰顿安德伍德接受治疗时听到的用词和概念。

我告诉贝利斯说，我预期哥登会有很好的正面交流的技巧，而且能够抵住人际压力。他明显习惯于维持自己的形象，而且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利特征。他对自己的运输培训非常自豪，也宣称自己有交流和视听方面的经验，这表明他在视觉预演所希望的场景和故事线索方面有过练习。同时，他很自信，有智力，在自演自唱方面有一手，也是一个宣称能够通过培训和慢跑来减轻压力的人。

我提出另外一组需要考虑的问题时，没有人感到惊讶。

沃德尔先生进行自演自唱的活动时是否穿了自己的蓝色连裤工作服？

客厅地板上的衣服是他实际穿的衣服，还是一些用来掩盖真相、从而希望误导司法鉴定的衣服？

他的眼镜为何破损得那么厉害，但他脸上却完全没有青紫或外伤？

如果有一群人绑架卡罗尔，为什么没有人看住沃德尔先生以防他逃跑并报警？如果没有人留在后面，他们如何使卡罗尔相信哥登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除非她合作？

麻醉剂是如何进去的？这种麻醉剂一般能使人失去意识达多长时间？

评估过所有这些新情况后，我们就来仔细研究调查方向。当地情报官员也在努力，仔细调查这次抢劫有否黑社会背景。我们都认为，如果的确存在，则5万英镑的奖励足以抖出细节来。同时，他们的邻居也在不断地接受调查，接受调查的还有一些朋友和同事。

“我觉得已经到了对沃德尔进行监督居住的时候了，”贝利斯说，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有必要。你们还应该继续问问他的婚姻状况。”

“不,从现在起我们视他为嫌疑犯,”贝利斯说,“我们不能在没有事先告诫的情况下问他这类的问题。我们会看看观察他能不能找出什么东西来。”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凶杀发生8天后,哥登·沃德尔被跟踪了,警方发现他开车去了伯明翰,赶赴与他妻子的老板见面的约会。到了他谈卡罗尔的养老金问题和伍尔韦奇分公司的保险赔付问题的时候了。他到得早了点,因此他就去帕利萨德购物中心散步,他随便走,并看着各种各样的橱窗展示品。然后,他回到自己的车里,拿出了一套拐杖,走近伍尔韦奇分公司之前又变成了一个跛足行走的人。所有这些都在一个8分钟的摄像机里记录下来,其中一些是通过这个城市的闭路电视系统拍摄到的。

在与地区经理的会面当中,沃德尔被告知,他的抵押会跟其他的所有债务一齐偿付。他还肯定会拿到一份年薪,还有一次性的付款共5.6万英镑。他看上去很惊讶,声称自己不知道他妻子还有一份“因工伤亡”的养老金,不过,警方后来发现,他曾签署过其中的一些文件。同时,麻醉药师也对他的故事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他说他因为某种浸在布里并盖在他口鼻上的化学品而失去了意识,而且时间长达8个小时。咨询过专家以后,他们都不知道有哪种以如此方式施药的化学品或者药物可使一个人失去意识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以上。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哪怕药物是注射进去的,所需要的量也是相当大的,而且会引起诸如记忆丧失等副作用。沃德尔身上没有注射印迹,而且能够记住所发生事件的准确的细节。

星期四我又重新回到纽艾顿,此时,刑警已经追查了340多条调查线索,并接到了打到警察局来的1000多通电话。有数条新线索出现了,包括事发当天早晨5点20分,有人看见一个男子在伍尔韦奇的现金取款机跟前,旁边还有一辆汽车,灯亮着,而且里面还有收音机的声音。这些线索都有人在跟踪调查。

但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进展还是这项发现:凶案发生的4天前,一名声称是“纽艾顿的卡罗尔”的妇女打电话到伍尔韦奇伦敦总

部的客户服务部。一般处理客户投诉事务的人是大卫·史密斯，他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接听电话。电话打到了内部的分行电话系统，那名女士一开始想找查尔斯·克劳奇，他是史密斯的前任。该公司的内部电话簿还是把克劳奇原来的号码保留在上面。

那妇女说："我是纽艾顿的卡罗尔。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分行外面总有个人站着。"她说他的动作很怪，但打电话到警方又怕影响到公共关系，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这个消息能够放在这道谜团的什么地方呢？

大卫·史密斯建议"卡罗尔"跟警方接触，但没有记录表明她打过这样的电话。尤其怪异的是，这类的问询也是一个错误程序，而卡罗尔向以按程序办事著称。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办公室并不是对着街上的，这样，她就不能够看到街上有人站着，并且该房屋合作会的其他成员都不知道有任何人出现怪异举动的事情。但是，不管是谁打来的电话，他们一定非常清楚当地的情况，因为他们说他们知道以前的办公室的名字，就在同一个地址，但那已经是3年以前的事情了。

从培训录像当中录下卡罗尔·沃德尔的声音以后，放给大卫·史密斯听，但史密斯说打电话来的人肯定不是她。为什么有人要假装她的声音呢？不管是谁打来的电话，她一定非常了解当地情况，也知道伍尔韦奇公司的内部电话号码。哥登·沃德尔这两项都有，如果他在计划一项谋杀活动，则打给总部的这样一个电话就是想把水搅混的举动。

但这个女人是谁呢？可能性是沃德尔有一个同谋，这个想法贝利斯早已经想到过了，他还没有找出记得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在布鲁克兰酒吧看见过他的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哥登能够如此清晰地回忆出在那个电视酒吧里播放的卫星电视节目。

与英国文格公司的员工进行的谈话也揭示出很多可作各种解释的新信息。同事们回忆出一些谈话，说哥登曾讲过卡罗尔担心被绑架的事情，因为她经常带房屋合作会的钥匙回家。迈克尔·鲁塞尔是负责运送货物的经理，他说凶案发生前的两三个星期里，哥登曾告诉他说卡罗尔的标致106车的备用轮胎被人偷了。哥登说他报告了失窃事件，但他又必须复核警方打来的电话，因为他担心有可能是某个想发现他的地址的人打来的。

这一条证据，是想说明一个职业劫匪团伙想跟踪卡罗尔的举动？还是他丈夫想混水摸鱼，掩盖即将来临的事情？有人已经在专案室的墙壁上贴上了一个标记，列出了所有这些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这上面写着："想到一个问题是一回事，找到支持这个想法的事实是另外一回事。"凶案发生两个星期后，警方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来办理这件事。在一次非同寻常的重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身高和身材都跟沃德尔相似的警官来剥去衣服，并重复他被发现时绑着和堵着的样子。结果非常惊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这名警官将自己绑在那台废弃的麻袋夹持架上。他然后想办法在沃德尔家的整个地板上活动，而且大声喊叫，连住对面的人都能够听到。另外，他在几分钟之内就将自己解开了。

其他一些物件也很快到位。法医格雷汉姆·史密斯描述波纳维尔克罗丝 18 号是"他在 20 年内检查过的最整洁的一套房子"。他报告绝对不可能出现过一个团伙在那个人家，甚至连手套的痕迹或者一个烟灰的迹象都找不到，但根据沃德尔的说法，攻击者是戴着手套的，而且他还闻到了烟味。

警方的外科医师现在确认，沃德尔上肢上的青紫不可能是从身后抓过来造成的，胸部的伤很有可能是通过狠命一击造成的。医学专家还对一个人被绑上 18 个小时而不拉尿的生理可能性问题产生了疑问。

到 10 月初，贝利斯和他的专案组已经在等候最后两份重要的证据，之后他们就会决定是否将沃德尔抓来进行问讯。内政部派来的法医已经检查过卡罗尔的尸体，希望能够确证死亡的更精确的时间。

结果出来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可以贯穿在一起了，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哥登·沃德尔。尸检报告发现卡罗尔的胃里有相当多的食物，这与据说她在星期天中午吃下的东西是一致的。看看消化程度，可以确定她是在午饭后 3 小时内死亡的，这意味着她是在星期天下午死亡的，而不是星期一早晨。

"我们抓到这个杂种了，"贝利斯说，他看上去很得意的样子，"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吧。"

"你得小心一点。"我警告说。

"你的意思是……"

“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假设我就是沃德尔。”

他停顿了一会儿。“啊，嗯，沃德尔先生，病理检查报告说，你妻子星期天的午餐星期一早晨仍然在她的胃里，这告诉我们你是在撒谎。她是星期天下午死的。”

“啊，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晚餐吃了些剩下的东西。”我回答说。

“但在你的陈述中，你说你们一起吃了火腿和色拉。”

“是啊，我吃了火腿和色拉，但卡罗尔只吃了剩下的东西。”

“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提起这件事？”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重要。”

热情从这位警督的脸上消褪了。我可以给他两三种完全不同，但都有意义的答案，以解释尸检报告发现的新内容。新的信息是很重要，但如果你直接问沃德尔关于胃内残余物的事情，他有可能意识到问题之后的含义，因此找个理由来搪塞。

婚姻谋杀当中有很多动机，但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次谋杀行动，尽管我并没有将贪婪放在最可能的动机当中——卡罗尔的养老金和1.4万英镑的抢劫款并不值得人们进行这样的谋杀计划和巨大的风险。哥登·沃德尔已经形成了他的成功和能力的一个错觉。他描述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和有想像力的经理，注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在现实中是一个无法在职业上完成交流的人、一个假装生病的人。他发明了一些计划，并转换自己的工作，便于自己逃避，或者便于维持自己的自我形象。

卡罗尔在他加入英国文格公司的时候很高兴。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则有可能被选入董事会，但是，他能够面对这样的冷酷事实到底多长时间？他自己如何面对这样的事实，更不谈面对自己的妻子？

在家里，哥登认为自己是最有智慧的成功者，但是，他知道自己无法长期维持这样的形象。多年以来，卡罗尔一直愿意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他，但是，现在她听到有人说他嫖娼的事情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跟她睡觉了，不想要孩子，也拒绝进行生育力测试，哪怕她因为没有孩子而很难过。我怀疑还有金钱上面的困难。

一个靠制造错觉来保护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且经常担心被发觉

的人，他们会全心全意专注于自己的情绪，他们会高兴地牺牲掉别人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并且会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作为一名失去了妻子的丈夫，沃德尔明白全世界都会同情他，他在工作上的问题会消失，他与妓女的秘密生活也会是安全的。杀死卡罗尔并不是巨大的一步——他曾经有过使用极端暴力行为解决问题的前科。

那个星期天是什么事情把这一切触发起来的？也许卡罗尔直接问到妓女的事情，或者因为他在工作上的事情而责怪他？也许，这一天是早就选好的，因为前面出现过车胎被偷的事件。不管触发事件是什么，他决定了"今天就是办事的日子了"。他整个早晨都坐在她对面，对自己说除非出了意外，否则她今天中午之前就必须死掉。根据我对此人的了解，他有可能对卡罗尔特好，而不是吐出自己最恶毒的咒骂。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杀的，也不知道现场是何等样的光景，不过，因为使用了氯仿麻醉剂，我估计这种死亡不会费太大的劲，也不会引起很大骚动。我仍然奇怪平台上的卫生巾——它的位置显然不对，而且也不符合卡罗尔的性格。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卫生巾之类的小事情而产生了愤怒，因而说出一些关于性或者怀孕等过分的话？我怀疑这类的细节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来。沃德尔事后一定进行过清理，如果卡罗尔的尸体就在房子里，他一定觉得很容易暴露——如果有人敲门问他的妻子，或者有人打来电话呢？

她有可能是被包在什么东西里面的，然后放在垃圾箱里，等到天黑再进行处理，因为房间里面没有膀胱失控或者大肠失控的痕迹。在她的物品当中找到一封信，哥登然后就开始编造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因为他去了考文垂的邮局。他知道这个特别的邮箱，而且还有一台摄像机，但他不可能知道那台摄像机当天没有开。

最后，我们不知道他回家的路上是否去了那家酒吧。别的任何客人都不记得看见过他，也没有记录证明他购买过他喜欢的啤酒。但是，他记得酒保开了什么玩笑，还知道电视里面在放什么内容。未经证实的还有一名暗红色头发的妓女所作的陈述，她的名字叫迪娜，她说她当天晚上在她的15楼公寓里接待沃德尔先生。她记得给他看过她孩子的模型收藏品。

当他回到房间时，哥登必须将妻子弄出去，然后将她放进他的汽车。卡罗尔是体形很大的一位妇女，抱起和移动一具尸体是相当困难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一次我曾不小心撞到了一只成年红鹿，我后来将它搬到了公路边。那就如同搬起巨大的一堆果酱一样，每次搬起这头，那头就会滑下去。

哥登虽然也很强壮，但是，我怀疑他一定使用了某种支架之类的东西，或者是吊索之类的东西，这样会使他搬动卡罗尔更容易一些。将她从房子里搬到车上是很冒风险的一件事，而且他一大早开车去12英里外的纽艾顿也是会使他十分焦虑的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很容易暴露，因此开得非常小心。他知道卡罗尔的安全密码，因为他星期六早晨偶尔也会陪她去办公室，当时她需要有人帮她移动家具和盒子。他还知道保安摄像机，还有隐藏起来的录像机。哪怕如此，这也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他可能是在黑暗中动手的。他必须打开保险柜，必须安排房间内的摆设，使之看起来像是被抢劫的样子。

之后，哥登必须将支票、钥匙、他的手套和衣物扔掉。我觉得他有可能在扔掉卡罗尔的尸体之前便做完了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一旦她躺到草地边缘，赌注会立即上升，因为她的尸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人看见。他的隐藏地必须是一个隐蔽的地方，而且是他容易去的地方，还不能够使他的车和衣服弄脏，它还必须是离那个紧急停车道很近的地方。

他会做得很快，因为离开房子的时间越是长，被某人看见的风险就越是大，而且使他在家里被人绑住的故事难以自圆其说。他还必须面对邻居早起、并从窗外看到他回家的风险。这又一次是他的运输背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他做了可能性判断，看看哪些是最大的风险。他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冒险，哪些是他不能够冒险的。

回到家里后，我怀疑客厅已经被他早就重新安排过了。沃德尔脱掉自己的衣服，这套衣服有可能给打湿了，以便于掩盖身上穿的另一套衣服。他用拳头和从车库里找来的工具给自己造成假伤，之后再将自己绑在金属麻袋架上。

咨询小组在纽艾顿的警察局集会，讨论逮捕和讯问沃德尔的时机。没有人猜想他会轻易承认，讯问策略必须要考虑到他对事件的陈述，而且非常仔细，以便于揭穿他所有的谎言。如果证据正好是围

绕他所做的事情提供出来的，他有可能认输服罪。

贝利斯说，目前事情还没有紧迫到必须立即逮捕沃德尔的程度，警方还没有为讯问做好准备，哪怕选择最合适的讯问人选和练习的机会都没有。

“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吗？”他问。

“愿意，如果你希望我来做的话。”我说，但我同时警告他说，事情有可能办得十分糟糕。讯问的警官必须准备好沃德尔突然采取“无可奉告”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讯问小组就必须能够继续提问，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挑战，不能够发脾气，也不能够就此受到挫折。

选择了6名可能的讯问人员，其中一名是一位妇女，我们于一个周末的早晨在纽艾顿警察局开会，当时天气已经很热了，坐在那里极不舒服。一开始，我问他们准备如何对付讯问哥登·沃德尔的事情。他们总体的方案不错，但是，我中断了他们，突然问到：“请向我提问。”出现了沉默。

“您是什么意思？”

“我听了各位的大概意见，但是，还没有听到具体的问题。请向我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很快，事情已经明了，他们并没有掌握具体的方案——那是他们讯问的一种模式。我向警官们解释说，他们需要准备自己的提问，并且让别人准备好他有可能拿出来的任何答案。同样，他们必须牢记沃德尔说过的所有事情。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警察局，然后立即被“逮捕”了，之后就带到了讯问室——那就是哥登·沃德尔即将接受讯问的屋子。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必须假扮是他本人，看看讯问小组准备到何种程度了。

我坐在桌子跟前等候……等待第一对人前来讯问。

最后，托尼·贝利斯将他的头凑在门上了。“保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起这事来。”

“什么事？”

“他们不愿意来。”

“你什么意思？”

“他们觉得这不公平。他们担心这是某种考试，是不是在接受评估，如果他们干得不好，这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前途。”

“这真是太可笑了。”我自我嘲弄地说。

“啊，我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东西。我会再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没有权利评论此事，但是，我深感惊讶。这都是些城府极深、经验丰富的警官。但是，我有时候忘掉了讯问小组处在多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准备讯问一名非常危险和恶毒的男子，他有可能会被判处谋杀罪，假如他们能够成功地在一盘看不见的棋局上赢得胜利的话。影响极大、花费高昂和全部刑事调查活动的焦点全都落在他们在这间小屋子里面的技巧上。

我假设的讯问过程经过比较可靠的论证后，第一对讯问人员过来了，角色替代开始了。整个早晨试过不同的小组，其中两名警官做得特别好。我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旨在让他们出乱子，而且还在某个时候大发雷霆，差不多就要将其中的一个人从椅子上掀翻了。

“沃德尔看到的一切会帮助他，”我解释说，“如果你们出现一点乱子，他立即会明白。他可以通过你们的坐姿、讲话的方式和彼此交换眼色的方式看出来。这个人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的。他极其危险，而且很恶毒。你们必须将他所说的每件事都镌刻在案，并从容易证明的谎言处着手。”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谈到沃德尔对卡罗尔最后一餐饭的叙述上。星期天午餐的痕迹已经从她胃里查出来，尸检报告的结论是，她可能在吃完午饭的3个小时内死亡。胃里没有找到火腿和色拉，而这是沃德尔声称他妻子于早晨7点吃的。

讯问者必须抓住他对早餐的陈述，并防止他撤回或者重新编造回忆的可能性。他们对付的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有可能对直接追问星期天午餐的事情感到蹊跷。因此，他们必须在许多其他问题中不经意地提出这个问题，比如当天他做了哪些事情等等。

“告诉他说，你们希望明白他每天都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抢劫者一定知道他或者他妻子当天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问他起床的事情，谁先下床，谁清理桌子，谁清洗盘子。然后，整个上午都这么问，只有这样当你们问起午餐的事情时，才与前面的一些事情完全相符。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因此，他会给你们关键的事件记录。”

第二个重要的地方是让沃德尔得到很大的鼓舞，让他去抱怨别人，比如让他说卡罗尔因为事故而死，之后他又因为她父母的缘故而

隐瞒了事实。或者说他也是一次敲诈行动的受害人,或者是在袭击者的胁迫下做某些事情。因为那些人曾许诺他说,如果他合作,则他妻子的性命会没有问题,但当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他因此而大为难过。

讯问者必须强调这并不是什么残暴的行为——卡罗尔并没有受到侮辱,也没有受到难堪——这允许沃德尔受到尊敬,使他觉得计划很周密,也会使他的回答比较镇定。这会使他产生自大感,因此而觉得自己很重要。

在我看来,深化到这种程度的训导在以前的任何一次行动中都是没有过的,但是,我知道成功只能够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评判,要等真正的嫌疑犯听到提问时才行。

10月20日星期四上午7点30分,哥登·沃德尔在家中被捕。在3天的时间里,他接受了讯问,之后于星期一早晨出现在纽艾顿地方治安法院,罪名是谋杀其妻子,并抢劫了伍尔韦奇房屋合作会。

当天下午,托尼·贝利斯找电话请我去警察局的俱乐部喝酒。他说,讯问人员干得很不错。沃德尔透露的细节越来越多,这有助于证明他在撒谎。后来,当我与刑警们一起喝啤酒时,才明白了他们的满足感。他们不仅仅在一层层的假相底下挖出了真相,而且他们感觉到有证据来证明。

但从我的观点看,案子在这里还没有完。沃德尔是个极端危险的人,他有性变态的历史,年轻时代还有暴力行为。同样,我也可以看出许多预谋和计划的成分,这跟他早年的犯罪行为是一样的。在这其间的许多年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与妓女之间的交易给了他一种发泄偏执幻想的机会,或者他过去的许多性暴力行为事件尚没有为人们报告或者发现?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确信。警方必须回到过去,追查沃德尔过去的生活,一点一点地查,看他过去的一切行动,看他都去了哪些地方,看看有没有与尚未了结的案件和性犯罪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从哥登·沃德尔那里寻找。

23 二十五年来他们一直在杀人!

新年元旦那天,艾恩打开电视,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弗里德里克·

韦斯特的脸。档案照片使他看上去比他52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在微笑，头稍稍偏着，故意显示自己的摇滚式短络腮胡子。

新闻播报员说："格鲁斯特建筑工人弗里德里克·韦斯特今天下午发现在他的一级安全囚室里上吊，下个月他本当因为谋杀12名妇女而接受审判的。伯明翰温森格林监狱的工作人员曾设法救活他，但下午1点22分宣布他已经死亡。"

阿诺尔德洛奇医院的控制室给我打了电话。"您听到新闻没有？有个记者一直在打电话找您。"

"我会给他打回去的，但别的任何人都不要接进来。"我这样说，因为我不想卷进此事。我的思绪仍然跟受害人的家庭在一起，心里还在惦记着韦斯特自己的孩子——那是克伦威尔大街被人遗忘的受害人。他们会如何接受那样的消息？我还想起跟约翰·班内特的一番谈话，那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当时他问我说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有无自戕可能。

可悲的是，我对弗里德里克产生的被隔离和抛弃感的担心是正确的。会见结束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爱妻和心心相印的伙伴决定与他断绝关系，他就开始找机会自杀了。他在监狱里写给孩子们的信显示出他的思想状态。他对罗丝玛丽很生气，说她不跟他站在一边，还说她煽动别人背叛他。

自杀对弗里德里克来说永远都不可能是个问题。生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杀过足够多的人，非常明白人要么死得轻轻松松，要么死得很惨。他亲眼见过从痛苦和折磨很快转向死亡的事例。但是，尽管他对罗丝玛丽非常抱怨，但是，什么东西也无法消除他对她的爱，而且我觉得，弗里德里克意识到他自己的弱点，他感觉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有可能会犯错误，会抱怨心心相印的伴侣。一旦死去，他就再也不可能因为发生的事情而怪罪她，或者将她牵扯进去。

罗丝玛丽本人也还处在羁押中，她很少讲到他自杀的事情。但是，她的律师却开始进行无罪声辩，说对他的被委托人的起诉应该予以撤销，因为缺乏证据，也因为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使韦斯特夫人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

"这是一个天真、受人操纵的、短视的年轻妇女，她碰巧跟这样一个有阴暗心理但又把一切藏在内心、别的任何人都无法看穿的一个

年岁大的人搅在一起。为什么一定要审判她呢?"他描述韦斯特夫妇过着"另类生活",说他(弗里德里克)"假定所过的可怖和非同寻常的生活以及所做的难以置信的事情是一个神话,而韦斯特夫人对此毫无所知"。

10个月之后,即1995年10月6日,一个陪审团在温切斯特皇家法院宣誓就位,并决断上述所言是否属实。罗丝玛丽·韦斯特背负10项谋杀罪名,包括她女儿希瑟和继女卡尔玛因。

在长达八个星期的审判中所提供的证据包括罗丝玛丽在1971年弗里德里克坐牢期间写给他的信件。在第一封日期为5月4日的信里,她写道:"亲爱的,是关于卡尔玛因的事。我觉得她想来点粗暴的。但亲爱的,为什么要由我来做这件事情呢?如果不是为了别的孩子,哪怕看在她本人的份上我也愿意留住她。你现在可以看到,卡尔玛因跟安娜(另一名继女)过得不错。"

另一封信是5月22号写的,开始的一句话是:"从现在直到永远。"

"致我最亲爱的情人,亲爱的,对不起,我头几封信让你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开玩笑。我知道你爱我,亲爱的。但是,有人如此看重我真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彼此的爱。最好不要写得太多,以免我把你惹烦了,哈,哈!"

谢雷·安·盖尔斯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她拿出证据说,她的女儿去过她家,有次看到卡尔玛因手捆在背后站在椅子或者板凳上,罗丝玛丽手拿一把木勺准备打她,回家后孩子很不开心。后来,盖尔斯夫人拿出来的证据被公诉方用来证实,卡尔玛因最有可能被罗丝玛丽打死,当时,弗里德里克正在服为期10个月的刑。

另一邻居伊莉莎白·阿吉亚斯夫人描述说,韦斯特先生曾吹嘘关于他从格罗丝特到伦敦寻找十多岁的处女的旅程。有罗丝玛丽在场时,他们喜欢找离家出走的孩子,认为找这些孩子更容易,因为罗丝玛丽在车里,那些小姑娘们会觉得很安全。

在一些最令人震惊的证词当中,罗丝玛丽的继女安·玛丽·达维斯描述说,她曾被父亲强奸,而且从8岁起便受到她继母的性虐待。她学会了将不停毒打留下来的伤痕掩盖起来,小学快毕业的头一年

有60次无故旷课。从13岁起，她便被迫跟罗丝玛丽的男客人一起睡觉，她父亲还在旁边看，有时候还奖给她一盒巧克力。

10月31日，罗丝玛丽·韦斯特进入证人席，她描述自己童年的不幸，说自己15岁之前被人强奸两次，第一次是被一个陌生人拉进小车里强奸的，后来一次又是被人从公共汽车站拖去强奸的。有趣的是，两次犯罪行为都没有报案，并反映出与多年以后发生在克伦威尔大街上数名受害人的绑架相同的攻击行为。这些攻击行为要么是可怕的巧合，要么我怀疑罗丝玛丽就是利用她后来的行为作为一个蓝本，帮助她自己编造一些强奸故事，好赢得陪审团的同情。

她不时抽泣几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暴戾成性和横行霸道的丈夫的感情上的受害人，并说他们后来是分开生活了。她否认自己是弗里德里克"心甘情愿的帮凶"，并一再声称自己对那些谋杀行为一无所知。

在布里安·利文森进行的交叉问讯中，罗丝玛丽说，她只模糊地记得1972年对卡罗琳·欧文斯的攻击。最后她承认，"是的，发生了一个事件……那是我一生犯下的一个错误，很明显我现在非常遗憾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被起诉强暴猥亵罪，但不是谋杀未遂罪。而现在我在这里接受审判是因为谋杀罪而不是虐待罪。"

利文森说："让我把话说得清楚些，那是你对少女进行性虐待活动的开始，不是吗？"

韦斯特夫人回答说："不是，先生。"

利文森问："你根据哪种标准来挑选那些姑娘？"

她回答："不，先生。事情不是那样发生的。"

辩护律师理查德·福格森把克伦威尔大街上的杀人案全都推在弗里德里克·韦斯特的身上，并坚持认为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可以把罗丝玛丽联系在这里面。"他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只有肉欲，是个施虐杀人狂，他就是大家有可能会想起来的那种恶魔的化身。"他说，韦斯特先生以前也杀过人，那还是在他遇到他妻子之前，而且并不需要她"知道、同意或者参与到继续杀人的活动"。虽然罗丝玛丽被证明是一个"残酷的性虐待者"和撒谎的人，但他说："但这并不能够证明她犯下了任何一桩杀人罪……"

"这可不是O.J.辛普森的审判。这里没有血印，没有手套，没有

DNA 证据。你不必在铁证面前宣告自己无罪，你接受我们的要求来辩解自己无罪是因为没有证据存在。”

11 月 22 号下午 1 点前不久，陪审团结束了 13 个小时的商讨，并认为罗丝玛丽犯下了所指控的所有罪行。大法官曼特尔先生转身向韦斯特夫人说：“陪审团一致裁定你犯下了所有 10 项谋杀罪。现判你终身监禁，而且根据本人意见，你将终身不得释放。带她下去。”

受害人的亲戚都挤在过道里，他们大声欢呼，同意这项裁决，而另外一些人也礼貌地做一些象征性的鼓掌。

接下来的几天里，到处是传闻和报道，都是讲还有可能存在更多受害人，并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早就该有人注意了。警方和福利机构为过去 30 年作出的决定进行辩护，并说只有在事后他们才能够明白，他们中间曾出现过一些连环杀手。

人们向我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这么多人失踪，竟然没有任何人将这些失踪案与韦斯特夫妇联系起来？虽然其中一些受害人是一些流浪者和离家出走的人，但是，大部分人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朋友，有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同事——肯定应该有人知道的，至少有人产生过怀疑。

但是，韦斯特夫妇在长达 25 年的时间里杀人而没有被抓到，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生活所处的文化是人们在其中始终自由穿行的文化。妻子抛弃丈夫、少年离家出走、搭便车的人没有到达目的地，这样的事例可以一直列下去。他们的命运对朋友和家庭来说是无法得知的。警方经常会得到报案，也会请一些私人侦探，报纸里面还有很多这类的消息。

这些人当中，其中的一些人单独走自己的道路以寻找不受过去影响的全新生活，但另外一些人却成了暴力犯罪的受害人。但是，没有尸体、没有血渍、如果没有俗话所说的“冒烟的枪”，警方也许没有多少理由能够怀疑有人已经实际被杀害。他们只是“失踪”而已。

韦斯特夫妇案中的已知受害人当中有 5 名与这对夫妇并没有公众所了解的联系。她们是被人在青天白日之下从大街上抢走的，或者是在搭便车旅行的途中被人绑架的。有 3 名受害人是流浪者或者离家出走的人，她们只在那栋房子里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哪怕韦斯特先生自己的孩子希瑟和卡尔玛因的失踪，在有人问起来的时候

还是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其中一名离家出走，另外一名跑去找她的亲生母亲去了。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也因为公诉案的案卷写得非常明白，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了。是啊，有一些警告性的信号，是人们都应该注意一下的，但是，哪怕在今天，哪怕警方已经有了对付复杂案件的非常先进的办法，起诉的时候仍然会出现失败或者出大错的时候。一个理由是，刑事调查人员对犯罪行为和罪犯的理解能力不够。

在韦斯特案件中，还有可能出现别的什么情景呢？警察长期的经验使他们习惯于调查因为肉欲、报复或者愤怒的冲动而导致的杀人案。而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堕落到了如此程度的男女，以至叫人感到极大的震撼，很难想像这种堕落的程度，更不用说这样的堕落有多么复杂的含义。

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额头上并没有刻着"恶魔"二字。他们是一对有可能招人喜欢和平易近人的夫妻，而且看上去对孩子们也不错。现在因为他们犯了罪，人们看到照片时就可以立即轻松地"看出"他们是邪恶之人。

他们杀了人而且躲了这么长的时期，这一点我毫不奇怪。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而且并不是怀疑——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些连环杀手有可能永远也不会被人逮住，他们的秘密也有可能随着他们一起进入坟墓，可能埋在某个花园的底下，也有可能埋在地窖里，或者埋在某个偏僻的林间小道旁边。

我还知道，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的案子一时间还不能够了结，因为将会发现更多的受害人。当然，不可能说到底还剩下多少受害人，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还会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出现。总体来说，这对夫妻杀人已有 25 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杀人的信心和手段都越来越高明了。1973 年 4 月到 1975 年 4 月，总共有 6 位姑娘受到折磨和杀害。然后，在谢雷·罗宾逊失踪之前出现了 3 年的间隔期，1979 年艾丽逊·钱伯斯失踪之前又出现了另一年的间隔期，再就是 1987 年希瑟·韦斯特失踪之前又出现了 8 年的间隔期。

根据已经掌握的韦斯特夫妇的情况，还有跟他们类似的一些人的情况，自从 1987 年之后的那么长时间的间隔期里，他们不可能会

"沉默"。试想一下,韦斯特先生的第一名已知受害人是安娜·麦克弗,就是韦斯特家的保姆,她于 1967 年失踪。当时,弗里德里克才 26 岁的年龄。如我已经解释的一样,他的危险病态心理也许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也许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一定还有更早时期的杀人案件,这些案件跟他希望完全控制女人的经验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这样的想法令人心情沉重,因为我知道,还有数百家有女儿失踪的家庭都在担心会碰上最糟糕的情形。另外一些家庭住在弗里德里克·韦斯特曾经为之工作过或者居住过的房子里,他们会突然之间想到:"我们家的院子是他建的,我在想……"

那么,对此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将此立为一个大案,让这项搜查活动继续下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搜查,不过我明白这里面所牵涉的巨大的财务和感情代价。只有两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还有一些尸体都藏在什么地方,其中一个是弗里德里克·韦斯特,他已经不再能够说话了。另外一个是他的妻子,她知道这些答案,但却没有提供这样的答案的动机。她会为自己感到难过,而对于那些家庭的受害人全无一点同情心,那不是她的天性。

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到那对夫妻曾经去过的地方,一点一点地清查他们的历史,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开始再度挖掘。

罗丝玛丽·韦斯特以她在证人席上的表演令全英国人迷惑不解,此时,在 50 英里之外的牛津,高登·沃德尔的命运正由一个陪审团进行裁决。大家争抢着报道恐惧之殿的故事,根本就把罗丝玛丽给忘了。

沃德尔因为谋杀妻子和入室偷窃伍尔韦奇建筑协会 1.4 万英镑的罪名被起诉,他自 1994 年 10 月起即被关押,并继续维持他的无罪声明。公诉人对陪审团说,他并不需要说明沃德尔为什么要杀死他的妻子。"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动机存在。可能有一次不可开交的争执,有各种各样此类的原因。公诉方不准备、也不必要耗费精力来证明一种动机。我们只花时间来证明他的故事是假的。"

12 月 7 日,沃德尔进入证人席,讲到他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卡罗尔的时候泣不成声。他坚称自己被攻击,然后给人绑起来的故事,

并说当他听到卡罗尔的死讯时，“我感觉自己的全部世界已经崩塌了”。

一连串公诉方证人的证词表明沃德尔先生有可能是假装受伤的，但辩护方请出了自己的专家，并说那些伤痕与他所描述的被攻击和捆绑的方式是相符的。请来的一位麻醉师说，他有可能被注射了一种药物，使他在约7个小时时间里失去知觉，但这要求攻击者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同样，沃德尔先生在16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小便的解释也是极少见的一种病症，称为肌红蛋白尿，这一状况有可能影响到地震或汽车事故受害人。

在长达6个星期、共牵涉128位证人的审判结束时，陪审团商谈了9个半小时，然后裁定沃德尔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大法官克莱斯威尔先生赞扬侦探在刑事调查中所做的努力，并对沃德尔说：“你是一名极度危险、邪恶和狡猾的人。你以残酷手段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用玩世不恭的手段企图逃脱刑事调查，你想尽办法编造动人故事，让别人觉得你的犯罪行为是一群匪徒所为。这种谋杀行为是对你妻子的暴行，对她家庭的暴行，也是对所有认识她的人的暴行。”

24 危险的年轻人

一个案子刚刚结束，另一个案子又开始了。围绕拉雪尔·尼克尔案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快就消失了，媒体又去寻找新内容去了。但是，我的愤怒并没有减轻，我对于自己在警方调查当中的角色也开始有了一些意识。有人可能请我去帮忙，我的建议也可以被接受，而且付诸行动，但最终我还是回到自己本来的面目。

同时，自从我记得起的时候开始，我一直有意强调自己的心理学技巧和经验虽然是属于自己的，但警方任何时候都可以加以利用。可绿链强奸案给了我太大的震动，并使我意识到我应该更直接，更有参与意识，不应该只是把自己的专业意见拿出来之后就一走了之。自从那个事件之后，我一直坚持要把事情做完，并检查一些细节，反复地检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有时候，作为咨询性的心理学家和作为咨询性的刑警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起来。例如，我在沃德尔案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他妻子的便鞋是否可以再穿上去，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心理学价值，但它们都有重要的刑事调查意义。通过询问这些问题，我不是说要暗示刑警们都很粗心或者不太在意，我只知道对信息的无判断性的分析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细节被忽视或者错误地加以解释，则有可能改变刑事调查的整个方向。

如果说沃德尔案是集中在一名男子的故事不相符上面，那么，一名15岁的姑娘内奥米·史密斯的凶杀案的特点就是有太多的嫌疑犯了。对我来说，它是从警督托尼·贝利斯于1995年9月17日星期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开始的。内奥米于3天前被发现，喉头被人割开了，性器也被人弄伤。她的尸体是在离家不到100码的一个儿童滑梯底下找到的，就在安斯雷公园，那是纽艾顿郊外的一个小矿村。

在贝沃斯警察局设了一个专案室，贝利斯告诉我怎么到那个地方，我照他的说法开过去，发现自己在贝沃斯向左转到了一个人行区，并且围着安全护柱和星期一下午购物的人群转起圈来。等我找到警察局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名妇女也同时到达，手上还拿着一个文件箱。我们站在大厅里，彼此避开眼部接触，彼此都担心对方是一名记者。最后我们到达同一个房间，她是一位科学家，是来这里讨论DNA样本事宜的。

贝利斯开始做事件简报，吉诺·瓦里亚勒和警员杰斯·克罗作了一些细节补充。星期四晚上约9点45分，内奥米·史密斯离开她父母家，那是布来茨霍尔小区的一栋半独立的红砖房屋，非常整洁。她是去替她母亲卡萨琳发一封信，邮筒在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那是一条繁忙的干道，离她家不到200码。她走到那里只需要不到2分钟的时间，而且要经过在家看电视的邻居，身边都有安斯雷公路的街灯照着。

贝利斯说："一名12岁的姑娘就住在街对面，她看见内奥米投了一封信。她说内奥米开始往回走，停下来，然后回头朝邮筒走去。她经过了邮箱，在进入一条没有街灯的胡同入口之前先停了一下子。当地人都称那个地方叫短巷，是一些房子后面的短巷，通往一个娱乐场，她的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根据证人的话，内奥米停了一两秒

钟，然后才顺着短巷走过去到了黑暗中。那个姑娘的证言可靠。"

吉诺说："我们还有一个摩托车手，他说他在9点45分左右看见内奥米站在邮筒旁边。他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在他开车走之前注意到一个少女站在那边，朝他的方向看着。"

"就好像她是在等谁一样。"贝利斯说。

"她当天晚上本来计划外出的吗？"

贝利斯回答说："根据她父母的说法，没有。"

"编个理由外出呢？"

"没有。她母亲请她去寄信。"

在白天，那个胡同口可以看成是内奥米从邮筒处回家的另一条路，但她的大部分朋友都说，她晚上不会走那边。这个胡同口通往一个娱乐场，当地人称为"乐场"，里面主要是开放的空地，有秋千，一个滑梯和设在离入口最近的那个角落的其他一些颜色明亮的固定娱乐用品。内奥米的尸体呈鹰状，是晚上11点30分发现的，她就躺在一块阿斯特罗草皮上面，是儿童坐下来玩的地方，上面有一个斜坡式的木屋，旁边还有一个娱乐场。她父亲布莱恩·史密斯和她最好的朋友艾玛·琼斯四处寻找时在这里发现了她。贝利斯开始翻动犯罪现场的照片，并讲述了几个关键地方。"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她是如何被找到的。她父亲将她扳回原来的姿式，然后盖上了毯子。救护小组也动过她。根据我们可以确定的情况，她是仰面躺在地上的，双腿分开，膝盖收起来了。"

内奥米死前穿的是牛仔裤，还有深蓝色双层套头圆领运动服，还有一件白色的阿兰式羊毛衫。此外，她还穿着最喜欢的轰炸机飞行员式的夹克，上面写着"芝加哥消防队"，正面是黄色的火焰，背后是这种服装的徽标，图案上面是"BACKDRAFT"（倒转）字样。

照片显示她半裸的尸体，牛仔裤和内裤从左腿上脱下来了，但在她的右脚踝处挂住了。她左边的鞋子没有系鞋带，现在仍在脚边，还有一块稍稍染了血的卫生巾和一只空香烟盒。她右边的鞋仍然穿着，我注意到鞋子上打着双结。

血渍的面积很小，其中大部分局限在她的颈部和脸部一侧。她的喉头给割开了，但并不是刺进去的，这是尸检医生的看法，在某个时候，她的身体被稍稍推动过，而且重新摆放了位置。对她阴道的攻

击特别残忍。某种特别巨大的东西塞进了里面，引起大面积损伤。她当时是背朝地下的，臀部的血渍样表明在某个时候，她的臀部曾被抬起过，然后给扔到血泊里面了。同时，性器上流出来的血比较少，表明对阴道实施攻击的时候她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过程当中。

在某个时候，她的左乳房被咬过。我记下了笔记，准备了解一些事情发生的经过。我需要知道攻击发生的不同内容分别是以什么顺序实施的，这可以告诉我攻击发生的原因，然后还会告诉我更多关于杀手的事情。我还必须确定内奥米的尸体发现时是如何定位的。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靠身心受到重创的父亲和她最好的朋友所做的回忆？

"关于内奥米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我问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我需要得到答案的核心问题之一上——谁是受害人？媒介报道内奥米是一个甜蜜可爱的温柔少女，她穿着校服的照片好像也可以确定所有这些事情。同样，她的老师也说她是"极好的姑娘，虽然学习成绩一般"。

根据布莱恩·史密斯的意见，内奥米出生于1980年，当时他还处在跟前妻简尼弗的婚姻当中。他与跟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在考文垂的卡萨琳有艳遇。他描述内奥米是一个正常的姑娘，很害羞，也缺乏自信。她很在意自己左脸因为神经坏死而产生的变形。很明显，这容易造成同学耻笑，大家可能在玩乐场上拿她开涮，令她很是烦心，几次从学校哭着回家。尽管如此，史密斯先生说，内奥米也不是一个不逗人喜欢的孩子，她还是有很多朋友的。

她喜欢音乐和舞蹈，也喜欢动物，养了一些小兔子，还有一只宠物鸟。直到最近，这家人还养着两条狗。塔米和桑迪是内奥米经常带着去乐场外面的野地里散步的两条狗。她父亲说，她的成绩低于大多数学生，各门功课都比较吃力，她父亲认为这是这家人经常搬家的原因。

内奥米最好的朋友艾玛·琼斯对警方说过的话稍稍有些不同，她描述内奥米是个相当聪明世故的姑娘，性格突出，很外向。对一个人形成不同的感觉是很正常的。这又回到了复杂的生活本身，也回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上。我每天看到的现象是，大体来说，人们并不完全是他们看上去的样子。内奥米并不是报纸里面所描述的简单的

人，她的生活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她认为自己希望了解周围的世界，就跟任何15岁的孩子一样，她也有一些秘密是父母也不知道的。

“她有性滥交的行为吗？”我问到，我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她的年龄来说有些唐突。

“这里有个问题，”贝利斯说，“她的牛仔裤后袋里有两只避孕套，卧室里面也有10只。”

“她父母对此说什么？”

“他们说她是个处女。父亲说她还在等待合适的男孩子。他们觉得自己无法阻止她去性交，因此他就送给她成打的避孕套以便安全性交。他同时也送给艾玛一打，因为她和内奥米都谈到了男孩子的话题。”

我看出这使贝利斯感到有些担心。他自己有个16岁的女儿，但我知道他不喜欢一个朋友的父亲给她发避孕套的点子。

“他说内奥米有可能曾有过一两个他并不知道的男朋友，但他们不太可能是当真的，否则，她一定会告诉他。”贝利斯听上去并不完全相信。

“艾玛说什么？”

“差不多。最近的一个男朋友是理查德·梅森，他在一家超市工作，是堆放货物的杂工。他有星期四晚上不在场证据。”

重要的是，梅森告诉警方说，内奥米放学回家后，他和内奥米经常在乐场见面。两个人已经约会一个多月了，但最近分了手，两个人正在商量和解的事情。事实是，他比内奥米大8岁，这个事实看上去也不太引起她父母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城区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

内奥米的父母还被问及孩子有否吸毒的事情，他们透露，几个月前，她母亲在卧室里找到一只卷烟，他们怀疑有可能是大麻。他们与警方接触过，当地的一名警官到了家里，并提出了一些劝告，还给内奥米上了一课。

“她保证说，她只是试过大麻烟，而且她并不是很喜欢，”史密斯说，“她保证再也不吸了。”

布莱茨福尔区建在纽艾顿延伸出去，沃威克郡接壤的地带。乔治·艾略特也许就是在这一带出生并以周围一带作为她的传世之作

《米德尔玛奇》的背景，但是，她所描述的这个世界不可能离开安斯雷公园的现实背景。这是一个工人区的底层，其失业率、家庭暴力和娱乐生活的缺乏问题都非常严重。专案组有人描述这一带是“变态者、流氓和白痴”的窝子。

当然，这样的评论对于这个地区大多数遵纪守法的体面公民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羹。我寻找的是基本的东西，我了解到的是很多性犯罪者，尤其是在彼此认识的人中间发生的强奸案和露阴癖案件的一个社区。这里也有一个核心的犯罪因素，一些人搭车出去行窃，然后再回家来。

同样，乐场白天是一个正常的游乐场，但天黑之后就变成了当地青年的舞台，一些人大喝高度啤酒，食用低浓度的毒品，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打消家庭生活的沉默。其中大多数人是 15 到 25 岁之间的青少年，有些外来的人年龄较大。这个地区的特征性文化和社会现象是滥交行为较多，行为不负责任，尤其是青年和少年。这是因为他们暴露在不同的价值结构中，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常态心理，这跟年龄较大的住户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工作，更没有什么前途可以指望，因此就有可能形成匪帮性质的社团。年轻人有可能开始视警察局和社会公益服务署等权威机构为敌人。

就在凶案发生前的三个月，两个敌对的团伙据说在乐场争斗，他们手拿垒球棒、刀子和铁棍，戴着指甲套简。刑警列出了相当长的一个报告单，有暴力行为、有伤风化的行为和未遂绑架案，都跟布莱茨霍尔小区和安斯雷公地有关。

这些背景当中的另一个常见特征是少女跟成年男子之间频繁的两性关系。十四五六的姑娘长到这般年纪，但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成就，因此在生理上形成了一种需要，她们看到二十几岁的男子开始注意她们，因此也就对他们发生了兴趣。

跟她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一般行动迟缓一些，更害羞，也不谙世故，而成年男子们都有钱、有汽车、有经验。不幸的是，年龄较大一些的姑娘都找到了最好的对象，而只留下一些不太成功的年轻男子。年龄小些的姑娘是他们惟一能够利用自己的男子汉吸引力使之产生好印象的对象。

少女们看到欲望的时候会明白它，她们经常有能力让 19 岁或者

20岁的小伙子对她们发生兴趣，这个事实容易引起她们对于自身性魅力的早期感觉。但是，她们不明白其中的危险，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玩火。

贝利斯组织了50名刑警，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访问了300多人，并接到了50多份陈述。各小组在安斯雷挨家挨户地调查，还对车辆进行调查，证明当时不在场并寻找证人。杰斯·克鲁负责后面的工作，他已经在与卡特凯姆取得联系了，那是一个全国范围的计算机数据库，里面列有自1960年以来被杀害、绑架或者失踪的儿童。

这个数据库建在德比郡，它是敦肯·贝雷警监多年辛苦工作的成果，在他于1994年退休之前使之得到国际的认可。这个数据库在罗伯特·布莱克谋杀3名幼女的定罪当中起了关键作用，3名幼女分别是11岁的苏珊·麦克斯维尔、5岁的卡罗琳·霍格和10岁的萨哈·哈帕，还有另外一个姑娘的绑架案。

我们坐下来思考的时候，不同的情景以不同程度的可靠度表现出来。一方面，这次攻击的可怕性质导致一些人认为应该寻找逃跑的精神病人和性犯罪者，过去一定有过不同程度的暴力犯罪历史。另外一方面，尽管内奥米被描述为一个相当不成熟的15岁少女，但是，证人的陈述表明她有可能出去等某个人，或者至少希望遇到什么人。她在邮筒前的公路边前后张望，然后带有一种目的走到短巷的黑暗入口处。她在那里等谁？她是不是希望自己认识的某个人会从那里经过？

贝利斯希望得到一份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还有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提出的任何看法。我给了他一张单子，上面列出了我需要的东西：包括重要的陈述和这个地区的详细地图，上面要显示出乐场和周围的街道及房子。事有凑巧，我去贝德沃斯警察局的时候正好碰到各种专家人员，他们也是来协助进行调查的。这些人包括我早前在伯明翰的科学实验室碰到的那名女科学家，还有一位病理学家和一位牙医，他们一直在研究内奥米乳房上的牙印。

在一间小会议室贝利斯主持了一个会议，并请我也列席参加。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少有的机会来直接向法医们提问而不是通过贝利斯警督向他们间接提问。毫无疑问，最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科学家们有可能根据在咬印上提取的唾液来

建立一份凶手的 DNA 描述。

不同的进展报告宣读之后，我问了病理学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场会有这样少的血？"

"看来其中大部分是被阿斯特罗草皮和底下的铺垫物所吸收了。"他说。

"她的喉头被切开时是仰面躺在地上的吗？"

"是的。"

"脖子上是否有手压的证据？"

"不可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切口会破坏任何青紫淤血的形成。"

我认为，她是否有可能首先因为卡脖子而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你能否解释一下脖子上的伤口？"

"至少有两刀，两者都是直线刀口。"

"有没有可能是刺入形成的伤口？"

"有可能，但刀子的刀锋一定很小。它们更有可能是割伤。"有人提出，塞进阴道的有可能是一只瓶子，是一种很宽的东西，底座很大。将这种凶器塞进内奥米的体内会需要多大的力气。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停顿，我感觉到那位病理学家不明白我的问题的重要性。最后他说，需要相当大的力量。

"她下面的一半为什么没有很多血？"我问。

"因为对阴道实施攻击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血在循环了。"

"这表明她的喉头当时已经割开了？"

"是的。"

"阴道攻击本身足以使她死亡吗？"

"有可能。"

"喉部和阴道攻击都是从正面进行的吗？"

"依我看是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乳房是在什么时候被咬的？当时她还活着吗？"他最后失去了耐心，说："你到底想知道什么？"我说了对不起，然后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如果脖子和阴道处的攻击是同时发生的，那就确切指明不止有一名攻击者。同样，所使用的

力量表明对内奥米有很大的怒气，或至少很激动。

牙医解释说，内奥米乳房上的咬印包括了上齿和下齿，这些牙印看来彼此距离很远，表明乳房在被咬的时候是扁平的。

“咬乳房的时候她是躺在地上的吗？”我问。

他点头，然后解释皮肤当时还有弹性，因此不是牙痕模型能够透露出来的最多信息的一部分，因为它有移动和扭曲的痕迹。有可能这么说，咬人的时候是用了相当大力气的，当时还没有用力吸，并且说明当时内奥米还是活着的。

“相对于内奥米来说，咬她的人在什么位置？”我问道，希望他能够做个样子给我看。

牙医对此考虑了一下，然后认为攻击者是在内奥米的一侧，与她躺在地上的身体呈90度。

这一点我有个问题。这不是做爱时咬的，内奥米不可能默许这样的动作。她一定体验到了相当程度的疼痛。一个人跪在她的左边，与她处在平行的位置，而且咬到了她的左乳，这就使旁边还有个人按住她的可能性。到底有几个人在场？

这位牙医是牙齿和齿龈方面的专家，他说他要回去检查自己的发现，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上齿和下齿是反过来的。这表明只有一个人在内奥米的身上，在她的同意下或者通过暴力将她按在地上，然后在咬她的乳房之前稍稍转动了一下她的身体。

哪怕如此，我还是不愿意认为只有一个人涉及此事。

会议结束的时候，贝利斯转头向我。“你得去看看现场？”

“是的。”

“还有没有人想去的？”

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提议。

史密斯一家是18个月前搬到布莱茨霍尔小区的，在那个区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内奥米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安德鲁，一个是克雷顿，还有一个继兄大卫。在这个非常整洁的半独立式房子里，窗帘都是拉下来的，还有一片纸张钉在前门上。

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以内奥米的脚步往回走，我和贝利斯到了邮筒，然后，他再次确认了证人的陈述。

“那名12岁的姑娘就住在对面的房子里，”他说。“她站在楼上

的凸窗边。"

"没有凸窗。"

贝利斯的脚步几乎在半空当中停下来。

"惟一的凸窗在100码以外的地方。"我说，一边指着那个地方。

"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去看看再说。"我提议。

房子的号码跟那个姑娘的陈述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她的说法不知怎么就错误地报告给这位警督了。贝利斯说，我们去看看那个姑娘是否在家，这样我可以评估一下她当证人的可靠程度。在一个整洁的客厅里，贝利斯跟那个姑娘的父亲聊起来，然后，我们带她上楼到了她父母的卧室，她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到内奥米在星期四的晚上一个人在外面走动的。

她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轻松地看到内奥米，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路上没有车辆经过。我看到她旁边一个人也没有……"

送完信之后，"内奥米经过了车站，然后向北走到大街灯底下，然后又站住了。然后，她转身，然后往回走到了人行道，跟邮筒是一个方向。现在，她的步伐加快了很多，她没有跑，但很着急……再后看到她朝后巷走去。内奥米只停了一两秒钟，然后继续大步顺着后巷走，然后就看不见了。"

那姑娘为我指出那个邮筒的时候，事情立即就明白了，她不可能看到任何人的脸，因为地点太远了。

"啊，我认出了她的夹克。"她解释说。

她能够认出内奥米来我毫不怀疑，但让人怀疑的是她描述内奥米有目的地朝后巷走去的方式时所产生的距离问题。她不可能确认。

我和贝利斯顺着街道往回走，中途停下来跟当地的一个店主聊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通往乐场的后巷走去。那几乎是一条人踏出来的小路，可以从后面通到住地，也是随便拉尿的一条捷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走完几十码之后，不太明亮的红外光突然间变得雪亮，黑夜一下子就变成了白天。以前没有人提起过这一点。如果内奥米是从这里走过去的，这种光也会闪出来。贝利斯做了一个笔

记，准备让人去调查一下。

乐场很黑，很难判断出什么距离来，因此我推测了一下内奥米能够看到的距离。不管当时是谁跟她在一起，他都必须相当熟悉这一地区，而且能够在没有光的情况下摸索。最有可能的是他们了解那个座椅，而且了解滑梯底下的阿斯特罗草皮。在星期五，警方的搜查人员在整个乐场区进行了大规模搜索，当时还下着很大的雨。没有找到杀死内奥米的刀子或者武器的痕迹。

我们回头朝内奥米的家走去，突然间被这个小区角落房子上的无源红外灯照得睁不开眼了，那个地方离乐场停车场最近。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贝利斯决定去问问户主，看看那个灯是不是在凶案发生后作为一种保安措施装上的。

一名女士应了门，她还带着一名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小孩子都抱着她的腿，还有一个婴儿在她的脚踝处爬动。她确认那只灯是新装的，然后说："你们找到那三个小伙子没有？"贝利斯问："什么三个小伙子？"

"就是星期四晚上我听到他们从这里跑走的那三个小伙子啊。"

"你听到什么了？"

"我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我当时睡在床上，然后醒过来了。有三个人从楼底下跑走了。"

"那是在什么时候？"

"约在 11 点。我当时看了钟。"

"你能够确定他们是男的？"

"我听到他们说话，而且一边跑还一边彼此吼。"

"你凭什么说他们有三个人？"

"我觉得是三个人。肯定不止一个人。"

贝利斯摇摇头："你为什么没有做陈述？"

她看上去不自在了："嗯，没有人来问我。"

这位警督看上去要发火了。这个区挨家挨户的调查已经做完了，而且活动专案室设的拖车办公室就在她家正对面的地方。很明显，警官们肯定会在她家进进出出地接水喝，但是，没有人想到要问问她。

我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知道负责的头头们肯定会在专案

室挨一顿训。贝利斯一向非常很顽固，也很有职业道德，他不可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得不到任何解释。他下令明天早晨之前必须拿到这名妇女的陈述。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警方已经在搜查星期四晚 10 点和 11 点之间在内奥米所在的市镇住宅对面的绿地上游荡的三名或者四名小伙子了。贝利斯数次利用媒体要他们站出来。他还公布了对一名男子的描述，有人看见那个人当晚从后巷跑出来朝正对着安斯雷公地路的人行道行进。一名骑自行车的人当时突然转向以避免撞倒他。他描述那个人是一个白人男性，年龄在 20 到 26 岁之间，6 英尺高，身材像运动员，而且有很短的头发，是金发，看上去像是经过漂白，顶部还有竖发。

凶杀发生的星期六晚上，贝利斯还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他透露了内奥米受伤的情况，希望这会说服任何一个想保护凶手的人。

"我觉得有人也许知道，甚至有可能窝藏他，"他说。"我想要那个人想想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有一个天真的 15 岁的姑娘被人以残酷的手段杀掉了。哪怕你们也许会有一种互相包庇的想法，我还是希望你们忘记那些想法，并站出来告诉我们他是谁。"

同时，内奥米的继兄大卫·费里曼也泪水涟涟地告诉了记者："一定有人知道这个邪恶的人是谁。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了。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这个呼吁后面还有一万英镑的奖励，是由一名中了全英彩票大奖的人提供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反复研究了内奥米父母和朋友的陈述，还再次研究了犯罪现场的照片。贝利斯要一份心理轮廓描述和案情分析，但是，除非我能够将不同叙述之间的差别推定清楚，否则我也不能够确定事件的原委。小麦必须滤掉沙子，而现在看起来沙子还不少。

调查小组看来很在意表明内奥米是出去跟某人见面的细节。但这个结论有多么可靠？如果证据不能够说服人，那最好是集中在更为肯定一些的证据上面。

在接下来的的陈述，也就是布莱恩和卡萨琳·史密斯的陈述当

中，我发现了能够看出内奥米星期四晚上发完信后去干什么的完全的解释。

布莱恩是一位45岁的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早就出车，他描述内奥米曾于星期四晚上问他是否可以给艾玛家打电话，请她于星期五早晨打电话喊她上学。他意思是说，艾玛应该在她自己家里，因此要内奥米去她家问问，看她是否愿意来家里过夜。内奥米要走的时候，卡萨琳要她顺道去邮筒投一封信。她拿着信下楼，他还听到大门关上的响声。

卡萨琳·史密斯47岁，她的叙述稍有不同。

"她(内奥米)问我是否能够在星期五早晨去接艾玛上学，因为她父亲很早就必须去工作，无法送她上学。我要内奥米从安斯雷公地的邮筒旁边经过时投一封信，是我为弗里曼的产品目录准备的一封信，同时她还要去那边往安斯雷公地北边看看，艾玛的姐姐贝姬跟她母亲生活住在一起，因此可以看看艾玛父亲的车还在不在那边。这么做的目的是，内奥米可以问艾玛的父亲可否同意让艾玛来家里过夜……"

在内奥米为何要在公路上来回张望的事情上做了很多解释，但是，答案就在这份陈述里。内奥米是想看看她是否能够看到艾玛父亲的车——不是在等某人。

同时，她父亲回忆的很多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史密斯先生在如何发现内奥米的尸体的事情上面。他说她离开家里去发信，然后他就去睡觉了。一个小时后，卡萨琳唤他起来，说她没有听到内奥米回家。他看看钟，已经到了10点50分。他起床，穿上晨衣下了楼，客厅和厨房的灯还亮着，他发现大门半开着，锁还在锁环上。

内奥米离开的时候大门是开着的——如果是出去见某个人，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反过来，它表明她是准备几分钟后回家的。

史密斯先生和夫人认为，内奥米有可能跟艾玛聊起天来，因此决定再等几分钟。到了11点15分时，她还没有回家，卡萨琳就给艾玛的母亲打电话，还有给这家人的朋友艾利森·查普曼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见到内奥米。之后，她和艾利森就开车去找，他坚持认为布莱恩想再睡一会儿，因为他明天得早早起床。

他们半个小时后回来，没有找到内奥米——中途还叫来了艾玛

——布莱恩立即就穿上了衣服。"艾玛当时说她想去乐场找找，就是房子后面的游乐场，看看内奥米是否在那边。她走了过去。我说我开车在她后面跟着，因为乐场没有装灯，很黑，她需要我用车灯照着才能够看得见。"

"车外天很黑，也很潮。艾玛顺着离我们家左侧大约20码的车道往前走，这条路通往乐场和一个小小的游玩地，那里有一些吊环和滑板……我上了车，跟在她后面开，一直到了围着那个操场的树篱跟前。我走到树篱最顶端的时候，艾玛尖叫着往我这边跑，一边还在大喊。她在喊我的名字，要我快去。我停下车来，看到游乐场的滑梯底下躺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我直接从车里跳出来，让发动机自己转着，大灯也直接对准滑梯那边。"

我从草里跳过去，到了滑梯边，看到内奥米躺在地上。我立即认出她来，因为她仰面躺在地上，脸朝着我这里。我向内奥米跑过去，艾玛从我身边跑走，她顺着车道朝我家的方向跑过去，一边在尖叫。

"内奥米仰面平躺在地上，她的头离我最远……头已经转向了右边，对着我的方向，两只胳膊一边一只平放在两侧。她的双腿是开着的，脚平踩在地上，膝盖拱起来了。她白色的外衣稍稍卷了起来，可以看见她的一部分肚脐眼。她的牛仔裤已经脱到了脚踝处，我觉得两条腿仍然在牛仔裤里。鞋子我不可能肯定，但我觉得还是穿在腿上的……"

史密斯先生进而描述她如何合上了内奥米的双腿，然后跑回家去找一条毯子盖上她——这是一个父亲想捍卫女儿的尊严。不幸的是，这就不能够绝对确定凶手最后将她留下来的是什么样子。例如，犯罪现场的照片显示她的白色夹克盖着她的乳房。是她自己被咬之后拉下来盖上的，还是凶手咬后再盖上的，或更有可能的是，布莱恩是否自己盖上了衣服，以免女儿再受辱？

还有另外的一些事情使我困惑。艾玛·琼斯为何建议去乐场找内奥米？她为什么直奔黑暗中而不是等史密斯先生一起来？

她的陈述提供了其中一些答案。她和内奥米是最好的朋友，两人一起在纽艾顿行进铜管乐队练习了一下午的打击乐器。她们两人都急着下个星期六去伦敦参加一个乐队的比赛。艾玛的父亲开车送她们回家的。

艾玛晚上11点上床睡觉，突然间史密斯夫人来家找内奥米。她穿起衣服来跟他们一起去找。开车的时候，艾玛为史密斯夫人带路，车开到一条胡同里去，其中一部分路她是步行的，一边还喊着内奥米的名字。很明显，车一直开到一个年轻人的家门口，他曾是内奥米的男朋友，内奥米仍然对他心存依恋。因为没有人答话，艾玛就朝回走了。

她说是艾利森建议去乐场寻找的，但没有解释她为什么一个人朝前走。

"一开始，我朝着树篱朝那个公园走，天黑得一点也看不见，因此很害怕。我大声喊过几次内奥米的名字，还说：'如果你在这里，请你告诉我。'没有人回答我，因此我继续朝前走。我看到了儿童游乐场那一带的滑梯底下有一团白晃晃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布莱恩先生的车灯。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一个纸袋，或者是一条毯子，但布莱恩的车灯打过来，照到了滑梯上后，我立即认出内奥米来，她面朝上躺在滑梯底下，头朝一侧斜过去。我以为她一定是昏过去了，她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布莱恩的汽车停了下来，车道照亮了公园。我朝内奥米跑过去，看到她差不多半裸着。她早先穿的衣服都脱下来了，暗蓝色的牛仔裤脱到了脚踝处，长长的白色运动衫还穿在身上。我看到脖子上有刀伤。我朝布莱恩跑过去，并开始尖叫起来……"在陈述的后面，艾玛说："内奥米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她那天晚上准备去见谁，一定会告诉我的。她有时候晚上去乐场遛狗，但她不会一个人去那个地方。"

对内奥米休闲方式了解得越多，她的生活就越复杂起来。同样，与此案有关的人看来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生活方式和隐私，而且都还有表里不一和谎言的成分。

哪怕在安斯雷公地区听到的一些人的描述也要小心处理。他们当中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也没有人被辨认出来。同样，很少发现有确证。所有这些都提高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这里的人习惯于提供虚假细节。每一种调查都有这类的"误导细节"，因此，要把这个谜团中的各个具体细节过滤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信息并不属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我在心里记住了所有这些事情，因此开始重构内奥米与凶手可

能的碰撞和冲突。我要重蹈他们在那个有雨的晚上走过的路线，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并没有计划见面。内奥米只是计划出去几分钟的。她投了信，然后顺着公路走到艾玛姐姐家看看车在不在。

她所不可能意识到的事情是，后巷里有人在观察她，是她认识的某个人。这是她不直接回家，而是听到某人喊她后折返身又朝回走去的原因。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在黑暗里叫她，她极有可能开始朝回家的路上跑了。

他看到了所有证人都看到的一切，内奥米在公路上来回看，这使他会产生疑问："你在那里干什么，内奥米？你在找什么？你是在找我吗？"

她没有害怕他的理由，因此跟他一起朝后巷走去。他可以跟她说的话有很多。

"嘿，想去乐场玩玩吗？"

"你很累吧？"

"周末准备干什么？"

内奥米必须做一个判断。她家大门还开着，她父母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回去。反正后巷也可以通到她家。也许她只是想随便聊几句，安排妥当之后就回家。

但是，凶手在指望什么呢？他星期四晚上出来干什么，他在等什么？

虽然他有可能看到内奥米从乐场回家，并等在那个地方希望她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他是当地的一名小青年，年龄约在十多岁到二十岁之间，深受当地文化影响。他出门闲逛，也许希望遇到什么人，但不一定是想害谁。他身上带着刀子，但没有带瓶子，瓶子多半是在路上某个地方捡的，他不会拿它当作一个武器看待。

他的性意识尚未醒，与姑娘们也没有很深的两性关系。虽然他有极强烈的性需求，但是，他缺乏合适的举止和金钱去找到合适的伙伴。同时，他有手淫习惯，幻想的范围也许非常广泛。它们多半包括他在某个地方诱奸妇女，或者是一些妇女诱奸他。还有强迫的行为内容在内。当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在他的自淫幻想当中起一些作用，

他有可能会跟踪一些当地姑娘，以前也缠过她们，或者挑衅性地摸过她们。这有可能发展到强奸未遂的程度。这个人在邮筒附近认出了内奥米。他看到她在路上来回张望，使人们注意到她。也许他知道她有年龄更大些的男朋友，因此猜想她一定是在与他们性交。如果她愿意替他们做那些事情，为什么不能跟他也这么做呢？他心里可能会这么想。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想到要这般见面，但是，当他们沿着后巷走的时候，他已经产生了一种期待，或者有性勃起的可能。因为内奥米身上没有抵抗伤痕，也没有挣扎过的痕迹，因此，这表明她是自由地走到乐场的，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死亡。如果是这样，那就表明她有可能极懂当地的文化价值观，未成年的姑娘会跟任何一个人性交。她愿意跟他一起到两个人都知道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是他们在漆黑的夜色里进行商谈的地方。滑梯的木架子提供了隐藏之所，阿斯特罗草皮也比地面干燥和松软。

房子排得极密是一个重要因素，我想。这是当地的一名少年在尝试自己的机会，他并不是一个老练的诱奸者。只有一声尖叫就有可能吸引很多人跑过来。这是我不相信他是专门为杀掉内奥米而出门的原因。如果他真想当天杀掉内奥米，他更有可能带她去别的一些地方而不是到乐场去。反过来，他选择去离房子较近的地方，然后可以从房子跟前跑掉。

在接下来的事情当中，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也许他想吻内奥米，并开始摸她。因为她身上的卫生巾，我想内奥米想与其性交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必需经过大量的劝说。她拒绝了，因此刀子就摸出来了。她现在不会叫了，她很害怕，因此就照做了。

我再次研究她的鞋子被找到时的情况。一只鞋子的带子解开就脱掉了，但是，另外一只却打着极复杂的鞋带结——不是那种匆忙之中没有解开的样子。在黑暗中，他不可能看到那个鞋结的样子，因此我猜内奥米自己解开鞋带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他帮助她脱下牛仔裤和内裤，但只有一条腿的裤子脱了下来。这里不可能涉及一种漫长的性交前抚弄——事情事实上是很快完成的。

她的臀部被推坐在地上，她的上衣和胸罩也从乳房上推上去了。内奥米也许自己只放了一半，但是，他却停不下来了。咬了一口之

后，一切就都变了。她现在只想走开了，但他对她的愤怒突然增强，而且把一场可能的性交机会变成了完全的强奸。

内奥米躺在地上，她的牛仔裤已经松了下来，一个人压在她的身上。她不可能有阴水流出，也许在被咬了一口之后，她将双腿夹起来，因此使他无法强行插进。因为他的性经验不足，他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已经到了恼羞成怒的边缘，特别是当受了挫折，也极其生气的情况下。有很多可能的触发因素——他有可能怪她逗引他，或者怪她改变了主意，或者怪她来了月经。他拿出刀子对准她，在他用刀子从她的喉头上划过的时候，她默不出声的担心就变成了恐惧。接下来他抓住附近的随便什么东西，也许是一只瓶子，然后用相当大的力量攻击她。

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干下的事情之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感觉。在一个层面上他想，"嗯，是我挑选她的"，然后，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又因为震惊而麻木。乐场没有灯光，这意味着他并不能够清楚地产生对所发生事件的视觉上的回忆。对于这样一些杀人犯，这通常都是形成一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他们无法忘记鲜明的图景，这会对他们的记忆形成极大的伤害。但黑暗却会减轻这样的一种影响。

我并没有排除有多名攻击者在场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情景就不同了。一定会出现责任的分散，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互相推诿或者责怪的地方。他们彼此怂恿，也不想丢脸。内奥米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就小得多了，因为在当时，那几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更加重要。

如果有超出一个人的几人在场，那就很清楚了，内奥米更有可能是被胁迫到儿童滑梯附近的，而且被追脱下了衣服。我对她的了解却看不出她会同意团体性交。他们有可能轻易地制服她，然后将她按倒在地，在她不安的时候用东西堵住了她的嘴。

9月21号，也就是凶案发生的一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贝德沃斯警察局，并把自己起草的心理轮廓描述交给了他们。当天一大早，刑警们从安斯雷公地周围的一些房子里逮捕了5名男子。他们没收了5名男子的刀具、衣服和鞋子准备拿去化验。

我到警察局以后才知道有人被逮捕的事情。很明显，这次行动是与那几名年轻人当晚去过乐场的活动有关的。调查小组一直感到

奇怪，因为当地的几十名青少年都没有站出来说自己去过那个地方。贝利斯怀疑其中一些人知道凶手的身份，因此有意保留了一些信息，以防存在数名领头者的情况发生。

那5名男子给带去了不同的警察局进行讯问。

贝利斯特别关心这几名疑犯是否有符合我对杀死内奥米的凶手的描述。

"罪犯的年龄极有可能在十多岁至二十岁之间，"我说，"他的性经验不足，过去也没有很多女朋友。也没有能力去追求姑娘。他在性行为上也没有多少经验。"

内奥米乳房上的咬伤是性交不成熟而不是性虐待的迹象，否则，就会有控制和主宰的需求的迹象。如果他想对内奥米施加痛苦，那有比咬一口复杂得多的办法。

"最重要的一些疑点就在这里，"我说，我抬起头来说。"首先，内奥米对杀掉她的凶手相当熟悉，其次，他是当地人。他就生活在离案发现场四五百码的地方。他在漆黑当中也知道乐场怎么走。他知道他可以将一名15岁的姑娘带到离她家不到100码的地方而不引起别人注意。"

"他的智力水平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但案情中没有任何东西说明罪犯有智障问题。"

"你们要寻找的人很容易生气，也容易失去控制。他太容易发火，真正发起火来的时候很容易动粗或者诉诸暴力攻击。酒精或者毒品有可能引发这种愤怒。"

"因为他以前容易动粗，所以有可能在警方留有案底，比如小型性攻击行为，跟踪或者强行摸女人。"

我抬头看着贝利斯："如果是一名罪犯所为，我觉得内奥米自己脱下衣服的可能性比较大，目的是要帮助这次匆匆忙忙和没有什么快感可言的性交，但我无法排除有多余一名的罪犯参与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她更容易被制服，更容易被迫脱掉衣服，希望因此而不会受到伤害或者留下抓破脸的痕迹。这样一来，她将自己交给一个错误的男子从而使另外一个男子极其生气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没有人听到她呼救的声音。"

我解释说愤怒和兴奋有可能很快为震怒和害怕所代替。"因为

他是当地人，他有可能回家后处在与平日相当不同的状态里。这就是他周围的人极有可能知道或者怀疑他的原因。"

"因此，一定有人在包庇他。"贝利斯说，他本来就很怀疑了。"你说他住在如此近的地方，你有多大把握？"

"非常有把握。"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已经跟他谈过话了。我们在每家每户都敲过门的。"他看了看办公室的安斯雷公地区地图。"我们已经在哪个地方见过他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找出这样的线索。"

因为罪犯有可能与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或者生活在一个社区环境里，我就解释说支持者的阵容会随着日子的流逝而加强。如果父母包括在内，那就更加困难了。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遇到这样一个母亲："嗯，我儿子是个恶魔，我知道他杀了那个小姑娘，我必须去向警方报告。"这样的事情在父亲那一方也是一样，但他们更现实一些。母亲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哪怕她们知道已经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也认为一定是一个误会。后来，这种态度还会强化成一种信仰，认为她们的儿子有可能是被诱导的，或者说那个姑娘有可能主动挑逗了他。再往前走一步，母亲就会想，是啊，那个可怜的姑娘是死了，但我儿子却没有。哪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理解他，他是个真正的好孩子。因此，把他关起来有什么用，那根本不能够将她换回来，我要想办法管住他，不能够让他再去干这样的事情。

科学家们带着确凿的DNA描述回来了。这使贝利斯能够采取步骤进行大规模筛选行动，跟"血样比对"很相似。他希望施加压力，使一些男子留下唾液样品，然后形成DNA描述，因此而与犯罪现场找到的唾液进行对比。

这个想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由心理轮廓描述确定了较小的选择范围。但是，他们希望得到准确性的保障，因此年龄和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年龄在14岁与40岁之间、生活在距犯罪现场半英里内的所有男性。这意味着要检测5000名潜在的嫌疑犯，代价为20万英镑。

贝利斯已经找到了4万英镑的费用，每份样品40英镑的费用意味着只能够取到1000英镑的样品。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抽取样品，看看哪些男子应该接受检测，而且应该以什么顺序来进行——这会增

大凶手在较早的测试中被发现的可能，因此而能够较早抓到他。

贝利斯决定利用全面的心理轮廓描述报告来缩小搜查参数。他利用了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名为“瓦特森”的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与“福尔摩斯”数据库连接起来了，这样，心理描述的因素就可以用来使潜在嫌疑犯的数量减少到1750名，然后又减少到了850名。

瓦特森系统的益处是，可以向它提出疑问，并用来跟随一个调查通道，使其越过在调查期间收集起来的山一样的信息。例如，一个编程员可能说，“把与内奥米·史密斯相关的所有男性的名字列出来，”这个系统就会列出395人的名字。然后，他可以说：“把这批有联系的男性当中年龄在18岁至23岁之间的人列出来，再看看这批人当中哪些人有过暴力犯罪史和强行淫猥史。”

这样，计算机就开始按照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程度列出一批名字来。第一批唾样提取名单就从最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20名当中挑选出来。再后会有另外一批20名出来，再20名，依次类推下去，直到凶手有可能被找出来为止。

跟前些年在纳波罗、恩德比和利托索普进行的类似工作不一样的是，这个过程已经得到完善化，而且是谨慎进行的，而且还会利用照片和证人的材料来避免有人为别人做检测。同样，还特别注意是否有人拒绝参加检测，或者离开这个地区。

从私下里来讲，贝利斯希望DNA行动的消息有可能对犯罪者的家庭或者朋友产生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站出来。他请我看了媒体的报道，并仔细研究其中的用词，明确表示这是相当有威力的一种科技，警察抓到凶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意识到游戏就快要结束了，他们有可能站出来而不是冒险承担包庇罪，或者他有可能逃跑，使他自己冒出来。

9月23日，消息透露出来，并立刻成为全国性的报纸头条新闻，比如“DNA拖网”，“内奥米凶案中的大规模测试”。

这个程序将于第二天进行，贝利斯说，届时，一组20名警官将开始给一些年轻人的家里打电话。“我们抓到这名罪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抓到的问题。我听说有人觉得调查行动已经放松了。我可以再次对你们大家说，事实正好相反。”

他补充说，警方没有权利迫使人们参与这次测试，但是，如果有

人无理拒绝，则警方会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背景。当晚在现场出现的人的样本已经提取出来，包括一些亲戚、医疗人员和警官——以便使他们排除在调查活动之外。

头一个星期四被警方逮捕的5名男子到星期天都放出来了，尽管调查人员又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并且刑警还造访了纽埃顿和贝德沃斯的另外33个家庭。1800多人接受了调查人员的问询，证人陈述已经多出了441份。

哪怕如此，刑警们还是面临批评，特别是早间的戏剧性的大行动之后。有些男性声称要采取司法行动，尤其是当他们的逮捕被一家电视台的成员录像之后。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到专案室去了好几次，中途还经常去完成临床约诊任务，并收集新的陈述。调查人员已经收集了一座山一样的数据文件，我可以看到一些男女对此穷于应付了。总有一个时候，对快速行动小组提出的要求会到达哪怕20或者30名工作人员的极限。我在阿比·汉弗雷的案子当中看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极重要的信息已经出现在案卷当中，但没有人注意到。这导致了战机的延误，而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此，我再次看到一种管理制度的需求，必须有一种办法来处理来来去去的信息。在贝德沃斯警察局的一次会议上，贝利斯站在前面，刑警们都坐在椅子、桌子和空地上，我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位警督重新陈述了最新进展，并请大家将调查活动当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再次写成报告，比如挨家挨户的调查问询和各种人的不在场证据汇总。刑警们站起身来，报告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再次坐下。

那次会议对于刺激士气是有些作用，但有迹象表明有一两项行动还悬而未决。不幸的是，人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假定，或者错误地相信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因此没有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否则，他们觉得，事情一定会表露出信号来，因而就认为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

例如住在乐场附近的那名妇女就没有接受问讯，因为有很多侦探都以为一定有别的警探跟她谈过话。

我就此跟托尼·贝利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调查小组已经提出了多少线索?”我问道。

“我不能够确切地肯定。”他说。

“有多少行动已经完成，结果如何？”

“专案室知道结果。”

“是啊，很好。但是，你在驾驶这列火车，你必须明白重要的细节都会立即向你汇报。比如内奥米是否出去见某人的问题。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是为这个问题而开的，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是，这个答案就在跟前。”

贝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应该在一开始就看到这一点。我们还讨论了如何改善信息管理系统的事情，这样他就可以准确地了解分配出去的行动有人进行，而且要将每次行动的结果报告出来。

我怀疑这个问题是负责此次调查行动的高级警官之一因家属去世而中途请假离开引起的。因为贝利斯和他的小组一直工作得不错，他们各自的角色从来都没有被完全理解，而其中一人的缺席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这有点像在一艘赛艇上发现了一个坍塌处一样。船仍然能够往前走，但速度和效率都不如以前了。

调查工作继续在更广泛的范围进行，9 月 27 日，验尸官命令进行第二次尸检。这次暴露出一个新情况：对内奥米进行的阴道攻击所用的力量非常之大，所用凶器的尺寸至少有 10 英寸之长。

事情越来越明显了，内奥米也许不是所描述的那种安静的普通女学生。安斯雷公地的一位住户曾出具一份陈述，声称一个符合内奥米特征的姜色头发的姑娘有 4 次于半夜或者清晨出现在那一带。

第一次是她于晚 11 点在那里遛一条黑色的狗。几个星期之后，约在早晨两点，这位住户从他女儿的卧室朝外面黑漆漆的胡同里看，他可以看到一个人影从乐场方向慢慢地走近。保安灯亮起来，照亮了那个公园和胡同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姜黄头发的姑娘穿着一条短裙，“打扮就跟 18 岁的姑娘一样”。

她朝安斯雷公地路跑去，然后就不见了。他在想：“这姑娘这么早打扮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去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打扮成这个样子跑出去的。”

他在同样的情景下于另外一个晚上看见她，当时还是穿着一条短裙。在那时，他不知道内奥米的名字，但是，他认出她就是 9 月 14 号星期四下午他在一家纸张店里看到的同一个姑娘，当时他去学校

接自己的女儿。

"星期五早晨，当我的女儿对我说，'爸爸，有个姑娘在乐场被人杀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打赌一定是那个姜黄头发的姑娘。'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总在很奇怪的时间看到她一个人在外面走。"

警方再次调查艾玛·琼斯，她承认她和内奥米有时候晚上一起悄悄跑出去玩，一般是出去遛狗。内奥米会将后门留着不锁，或者带上一把钥匙。她们溜出去的时候一般是艾玛在那边过夜的时候，主要原因是无聊。一旦出去以后，她们就去安斯雷公地，并且在街灯能够照到的地方玩。

艾玛说："我们不会见任何人，我们只是四处走走而已，直到累了以后回到内奥米家去睡觉。我最后一次跟内奥米一起溜出去的时候是今年 5 月份。"

在跟贝利斯的很多次见面当中，我们都讨论过内奥米晚间外出的意义。她晚间和早间穿着极挑逗的衣服在外面出现看来可以确证她生活的复杂，她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隐藏起来的秘密。

这就给这位警督提了一个难题。他相当正义地采取了措施，以使有效地利用媒体，鼓励人们站出来。让内奥米以一个生活简朴、甜蜜可爱的女学生的形象表现出来要好得多。如果传出一些滥交或者吸毒的消息，则有可能会泄露出很多信息。同时，内奥米是被她认识的人杀害的，因此，追查她的每一步行动和每一名熟人是相当重要的举措。

"问题在于，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内奥米，"贝利斯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很多滥交的事例，道德约束不是很严，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地区，我们有一位白雪公主被一个恶魔残酷地杀掉了。另外一方面，她是一个处女，她在等待合适的白马王子的出现。但是，这样一位白雪公主的裤子后袋里却备有两只避孕套，还有一名年龄很大的男朋友。"

我问他："托尼，你 15 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吗？"

他大笑："见鬼，一点都不明白。"

"你有一些秘密瞒着父母吗？"

"那是肯定的。"

"如果有人知道你的秘密,那会是谁?"

"我想会是我的伙伴。"

"对了。谁是内奥米的特别朋友?"

"艾玛。"

凶案发生的两天后,贝利斯曾请来一位专家来问讯艾玛。这名女警官在沃威克郡警察局教授认知讯问法。也就是讲过去10年问讯技术的发展。

但是,艾玛是在与内奥米的父母一起接受新闻发布会的泪水涟涟的采访之后的几小时内接受讯问的。她描述自己在失去内奥米后非常悲伤,因为内奥米是"最后和最特别的朋友"。

"有人从我身边抢走了她。我和她的家人一样觉得没有她日子不好过。她是我认识的心肠最好的一个人。我们很喜欢呆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

艾玛十分动情地当众表示了她对内奥米和她父母的感情,因此,她很难去描述关于她朋友的很多私生活,因为这有可能损害她的名声,或者使她家庭感到不安。她已经抱定决心,因此不太容易摧毁这个城堡。结果,问讯人员并没有从艾玛那里得到任何关于内奥米私生活的一些内容。

在贝利斯的要求下,我同意再进行一次问讯,但是,我首先想跟布莱恩·史密斯谈谈话,因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很多方面仍然使我感到不解。我尤其希望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问出他发现她的时候内奥米的尸体到底在什么位置。

卡萨琳·史密斯看来极脆弱,我们在安斯雷公地那个半独立式的房子的大门口见面时她就表现出来了。她的悲伤无以复加。在客厅里,布莱恩坐在一张安乐椅里面看着角上的一台特大电视。他是个大个子,长着一脸的胡子,但已经开始谢顶了。他穿一条田径运动员服装,还有一件背心。

他坐在旁边的一条长凳上,为开始问讯工作,我只得要求他关掉电视。我们开始了一段很长的、极其复杂和奇怪的对话。我对史密斯先生非常熟悉内奥米的衣服和化妆品的事实非常惊讶。他与艾玛也非常亲密。

我带领他回顾了凶案发生那一整天的情况,从早晨4点开始他

醒过来，开车去 MGM 出租车公司工作，然后到内奥米出门替她母亲寄信时为止。

在谈到的新细节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实，内奥米的钥匙在她出门的时候放在房间角落的桌子上。如果她不走远或者不在外面呆很长时间她总是这样做的，他说。这再次证明她是准备从邮筒那里直接回家的。

史密斯先生说，是他建议去乐场那边找找看的，而艾玛也主动要求跟他一起去。这跟早先的陈述不符，但并不能够解释艾玛为什么一个人摸黑走在前面。

最重要的是，史密斯先生坚持认为，当汽车大灯照到内奥米的尸体时，她是躺在滑梯旁边而不是下面的。在这一点上他坚持己见，哪怕血渍显示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他确信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她的鞋子都是穿在脚上的，而且她的牛仔裤和内裤都是拉下来的，但没有从一条腿上脱下。不能够因为这个错误而责怪他。他大为震惊，创伤严重，自己的内心也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这的确影响到了人们对他如何讲述内奥米最后留下来的样子的叙述可靠程度。

最终，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回答出来，尽管史密斯先生的确透露说她的乳房是露在外面的，他将上衣拉了下来，以保护留存下来的一点点面子。

5 天之后，也就是 10 月 10 号，我离开我在莱斯特开设的谈判者培训课程，开车到了专案室，赶赴与艾玛·琼斯的会面。这不会是一次直截了当的认知式讯问。一般来说，只有当一个人对警方说出自己记忆所及的一切时，这样的问讯才有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艾玛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说出来，但她一直无法说出来。

在我进行的大多数临床谈话活动当中，在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病人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他们会感觉到想隐藏一些东西不让我知道，并对我说一些谎话。我对艾玛也这样说。“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你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们甚至有可能都想隐瞒自己。你们不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讲这些事情。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进展，你会感觉到舒服一些，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某个时候，当我问另一个问题时，你会私下里觉得：“我应该告诉他还是不告

诉他?"你必须知道我不会称你是一个撒谎者,也不会因此而看轻你。我只想希望你帮助我认清事情的本质和真相。

我们坐在贝德沃斯警察局的一个房间里,艾玛坐在那个地方,手上拿着一只毛乎乎的小玩具在那里摆弄,那原来是内奥米的。史密斯夫人把它交给她,她也不愿意扔掉它。艾玛个子很大,穿黑皮夹克,看上去好像身心疲惫,经历了一场大的磨难一样。她一直都没有睡好,并担心凶手会来找她,因为她的名字现在已经被媒体透露出去了。

我无法想像更多痛苦和困难的情形。在15岁的年龄,她处在当孩子和成为大人之间的界线上,突然间就进入了一场可怕的谋杀案的中心。不仅她最好的朋友被人杀掉,而且,她本人还亲眼找到了尸体。

"对不起,我无法将这些情景赶到一边去,艾玛,但我真希望能够不再提起这些事情。我向你保证,这些东西慢慢就会暗淡下去,你会在生活当中遇到更好的事物,并由此而替代这些悲伤的记忆。"

我解释我是谁,并告诉艾玛,她跟所有15岁的姑娘们是一样的,我知道她有一些秘密,她只跟最亲密的朋友分享这些秘密。"你做和说过的有些事情是你爸爸和妈妈都不知道的,或者也许不会同意的,"我说,"比如你去过的一些地方,还有你们所冒的一些险。我这么说对不对?"

她点头。

"为了了解所发生的事情,为了查清谁伤害了内奥米,尽量多地了解她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她跟她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且她也爱他们。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父母也没有准备好的。有些事情你只会问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青少年都是如此。"

"我需要了解内奥米,我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了解她,而这只有你才能够告诉我。我知道你曾许诺不告诉任何人的……"她点头。"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稍稍有些不同的情形当中了。有人杀害了内奥米。如果你想一想,如果内奥米现在活在世上,我想她会说,'艾玛,你现在可以讲出来了。'"

艾玛突然说:"她说了,她真的跟我说话了。"她紧紧抓住那个玩具,解释说她抱着治病水晶球的时候,她梦到了内奥米在跟她说话、

谈到和提到了杀死她的凶手。但是,没有水晶球的时候,她就会做恶梦。

"你觉得内奥米会希望你帮助我们抓到那个人吗?"

"是的。"她小声说。我看出她稍稍有些放松了。

我们一起列出了青少年有可能瞒着父母的一些秘密。

性关系
偷窃
逃学
喝酒抽烟
晚上很晚才回家
在外面呆的时间太长
跟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吸毒

我们开始一条条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艾玛承认内奥米并不是处女,还跟好几个男朋友睡过觉。她只喜欢二十几岁的男孩子,而不喜欢跟她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子。除开她父亲给她的一些避孕套之外,内奥米还有18只避孕套,都是别人给她的。

内奥米很容易就从一个男孩子转移到另外一个男孩子,但她无法跟她们说再见,因此她只是跟别的男孩子外出而已。她喜欢在室内做爱,因为那更舒服一些,她不太喜欢在外面搞,因为她觉得那"不雅观"。

艾玛意识到我不会批评她了,因此她觉得容易和好受一些,一种似乎是宣泄的经验慢慢浮出了水面。她描述她和内奥米有时候会在早晨两三点钟出去,穿着迷你裙和"放荡的"衣服。有时候,汽车里面的男人会接近她们,但姑娘们从不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

"内奥米常常吹嘘别的男人看她,也喜欢别人对她说'嘿,性感女郎'。学校的一些同学觉得她很丑,但她穿起衣服来的时候,一些男人觉得她很性感。"

一般来说,她们只带着内奥米的狗桑迪和塔米在外面散步,但是,那两只狗最近咬死了一只猫,所以内奥米就把两只狗放走了。艾

玛觉得如果内奥米身边有狗，她就不会被杀害。

说到那天晚上的事情时，艾玛说她一开始觉得内奥米有可能是跟她喜欢的某个男孩子一起去了哪个特别的胡同。"我以为她又去见他了——我以前在那里见到过他们的，就在胡同里。"回到房子里面以后，她自愿跟布莱恩·史密斯一起去乐场找她，因为她想去提醒内奥米，怕她正好跟某个人在那里。"我向乐场跑过去，准备吓她一跳，'你在干什么？'"

很明显，一个情景慢慢浮现出来，内奥米是一个谙熟世故的姑娘，懂得利用自己女性的本能，这是以前所没有看出来的。但是，这并没有使她成为不正常的一个姑娘。事实上，事情确证了：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符合她所生活的那个社区的文化价值体系。

内奥米有了性觉醒，也很主动，她喜欢跟范围广泛的男友建立友谊，一般来说他们的年龄比她本人稍大些。她不喜欢在野外性交，这说明她不太容易同意跟别人在滑梯底下很快性交一次。同时，她倾向于跟一些男子建立逗引的关系，但他并不完全熟谙男子的性欲，也不知道玩火点炮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危险有多大。

在 11 月份的头一个星期，也就是凶案发生七个星期后，托尼·贝利斯打电话来说，DNA 测试找到了一个匹配者。

"我们第一轮查询就找到他了，几乎就在名单的第一排，"他说，"艾德温·道格拉斯·霍普金斯——他的朋友们都叫他'艾迪'——他住在安斯雷公地区，离乐场很近。"

"你们逮捕他了吗？"

"没有。我们正在调查他的历史，还在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我希望你来看看这个档案。"贝利斯知道，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他需要在进行任何逮捕前拿出针对霍普金斯的确凿证据。同样，他必须调查清楚，在凶案发生之后，是否有人对他蓄意包庇。

第二天早晨，一份专案组的特别文件送达我的办公室。里面有十几份陈述，还有跟艾迪·霍普金斯有关的情报。他是一个学喷漆的学徒，现年 19 岁，跟他母亲和父亲以及弟弟一起生活。凶案发生的 4 天后，也就是 9 月 18 日，霍普金斯就已经引起警方注意，当时他给贝德沃斯警察局打电话，并对一名女警察说："我母亲要我打电话的我那天晚上就在安斯雷公园。我身高 6 英尺，头发暗灰色，尖头发，

我当天骑着一辆自行车。"

他于当天做了一份陈述，描述他于下午 5 点下班回家，洗完澡吃过一些东西后，他去了姐姐家，只隔几个门洞。朱莉·霍普金斯年龄 22 岁，跟她的男友斯迪夫一起住在那边，还有她的两个小孩子。晚上 9 点 30 分左右，霍普金斯说他离开了那个房子，借了斯迪夫的山地车顺着安斯雷公园骑，一直骑到了特里普艾商店，这大约有 5 到 10 分钟的时间。他从布莱茨霍尔小区经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从那家亚洲人开的商店里买了 8 罐卡林黑牌啤酒和约 14 袋小吃，然后骑车回到他姐姐家，一只手还提着一只购物袋。他于晚 10 点左右到达，并在那里喝到星期五早晨一点钟左右。就在此时，他听到警方的直升机在乐场一带飞行，他和他的表弟约翰·辛普森一起上路遛狗，去看看布莱茨霍尔小区到底出了什么事。

进行挨家挨户调查的警官们在 10 月 3 日调查一名家庭主妇玛丽·奥克斯福德夫人时，玛丽说她女儿拉雪尔·汉密尔顿曾向她透露说，凶案发生当晚，艾迪·霍普金斯曾于晚 10 点 30 分去过她在安斯雷公地的家，问她要一些香波和须后水，因为他想洗个澡。

根据这个情况，刑警调查了拉雪尔，她是约翰·辛普森的女朋友。她坚持说霍普金斯是晚 6 点而不是 10 点 30 分向她要香波的。根据她的陈述，他是晚 6 点跟辛普森一起离开她家的，然后到晚上 11 点 45 分才再次看到他们的，当时他们两个人都过来要去遛狗。他们说布莱茨霍尔小区那边出事了，然后就走了。

10 月 15 日，霍普金斯又做了一份陈述，并透露他以前经常去乐场那边，当时他在哈特希尔高中上学，是在 1992 年以前。

"我常去那边踢足球，见一些朋友。那是一个普通的见面的地方。至少在过去的 6 个月以来我都没有再去过乐场了，我一般都是跟我表弟约翰·辛普森一起出去玩的……"霍普金斯再次讲述了他骑自行车到伯明翰路的商店买啤酒和小吃。他记得看见过店主的两个儿子在那边整理货架，并准备关门了。那一定是晚 9 点 45 分，当时他离开商店，直接骑车回到了他姐姐家，因为天已经开始下雨了。

然后他和表弟以及他姐姐的男友就开始玩计算机游戏，一直到半夜，然后就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他们从后窗可以看见警灯照射

在布莱茨霍尔小区，因此，霍普金斯和辛普森就出去散步。他们跟封锁乐场区的警察说过话，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分钟后，他们跟当地的一个姑娘说话，那个姑娘告诉他们说，内奥米·史密斯被人杀了。

"我知道内奥米是住在布莱茨霍尔小区的一个姑娘，也知道她是艾玛·琼斯的朋友。我认识艾玛是因为我以前常跟她姐姐瑞贝卡外出。我曾在村子里见过内奥米和艾玛，有时候还跟她们说说话。我们一般只谈普通的话题，她们平时总带着狗。我可能是几个月前跟内奥米或艾玛说过话。我不知道有哪些小伙子是和她们一起外出的，也不知道她们还跟谁有联系。"

情报已经透露出包括霍普金斯在内的一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件，那还是 1993 年 3 月的事情。当地一名少女声称他曾在乐场后面的野地里想强暴她。她声称霍普金斯一直跟在她后面，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后就绊倒了她。她说他扯掉了她的裤子和内裤，骑在她身上，还拉起了她的衣服，直到乳房都露出来了。不久之后他就跑了。

霍普金斯不承认攻击行为，数名证人对所发生的事件有互相冲突的陈述。不久之后，那姑娘撤回起诉，警方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警告霍普金斯，然后撤案。

我读到这些细节的时候，心中毫不怀疑这些情况已经进行过调查。哪怕如此，如果有人曾想早早了解内奥米·史密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答案应该就在这里了。

艾德温·霍普金斯从一开始就做了交叉刑事调查，也是利用心理轮廓描述进行 DNA 唾液测试的计算机名单中第一批出现的名字。哪怕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警方已经或者应该更早认出他来。他明显的背景和与内奥米的联系比周围街道上其他的 100 名男子比较起来也不是特别显眼、或者有价值。如果你希望得到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情节，把背景设在一个市镇住房小区而不是庞大的乡村别墅里，那这里就有了。到处都有嫌疑犯。

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里可以利用心理轮廓描述来使视野缩小，不仅仅找到一个有可能转移了注意力的嫌疑犯，而且还能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

11月16日早晨，刑警在安斯雷公地西景大道霍普金斯的父母家里逮捕了他。他们还去了当地另外的12家，逮捕了3个人，并将嫌疑犯带到了贝德沃斯、纽艾顿、阿特斯通和拉格比等几个警察局。

头一天，我曾去过设在利克伍顿的沃威克郡警察总部，并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对霍普金斯展开讯问。跟哥登·沃德尔和罗伯特·纳帕尔一样，重要的是霍普金斯必须确证他早期的陈述，证明他过去的6个月里的确没有去过乐场，而且自夏天以来再也没有跟内奥米说过话。

同样，警方曾给他机会再次叙述他当晚不在场故事。这有可能确凿判定有无可证明的谎言。霍普金斯已经给警方讲了一个故事，他相信这个故事可以使他与犯罪行为脱钩，但是，警方持有DNA证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他当晚去过乐场，而且还在攻击中咬过内奥米。

问讯开始的时候，霍普金斯很少说话。面对DNA证据时，他承认这使他与现场和内奥米产生了联系，但他坚持说他没有杀害她。11月20日，他出现在纽艾顿治安法院，罪名是谋杀内奥米·史密斯。他没有提出抗辩要求。同时，另外两名分别为23岁和21岁的男子也因为涉嫌企图歪曲司法公正而交保候审，他们届时将去贝德沃斯警察局接受问讯。

1997年1月22日，也就是14个月后，艾德温·霍普金斯在伯明翰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向他宣读罪名的时候，这个稍稍有些发胖的20岁青年对6名男性和6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说："不服罪。"

他是个动作笨拙的青年，智力水平一般，为人处世也一般，看上去不像是那种特别邪恶或者可怕的人。事实上，托尼·贝利斯后来对记者承认说："他（霍普金斯）将自己描述成一名相当没有攻击欲的青年人，从外表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会被认为是本案中的嫌疑犯。"公诉人柯尔曼·特雷西对陪审团说，内奥米是一次"极不正常的性攻击"行为的受害人，而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是毫无疑问的。他透露说，在DNA测试排除当中从霍普金斯嘴里提取的唾液样品表明他是一名极有可能的嫌疑犯。

为供分析之用而进一步采取的血样化验导致与内奥米尸体上发现的唾液中形成的DNA样本相符。结果，不是霍普金斯而是别的人杀害内奥米的可能性为四千四百万分之一。

牙科专家也提出了不利于他的进一步的证据。霍普金斯7岁时曾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过，因此门牙缺少一颗。其他的牙齿挤占了这个位置，因此他的上颌骨向一侧倾斜。

安德鲁·沃克医生是牙科法医，他对比过从霍普金斯的牙齿上取下来的石膏模，结果发现所有不规则处皆与内奥米乳房上出现的咬痕完全相符。

"这样的证据比他本人在现场签字还要确凿。"特雷西对陪审团说。

霍普金斯走进证人席时，他说他认识内奥米，有时候会骑在自行车上停下来跟她和她的同学说几句话。他有一阵子跟艾玛的姐姐瑞贝卡约过会，根据艾玛的说法，内奥米"相当喜欢他"，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外出过。

在所说的那天晚上，霍普金斯坚持他的故事，说他一直在安斯雷公地区他姐姐朱莉的家里喝酒和玩电子游戏。他约在9点30分离开她家，去那个小商店买了一些啤酒和小吃，来回骑车大约半个小时。尽管内奥米投信的时候他在同一个地区，但他不记得一路上看见过任何人。

但是，泪水涟涟的朱莉·霍普金斯毁掉了她弟弟不在场证据，她对陪审团说，他去那家商店的来回时间肯定更长。"我不想让他陷入任何麻烦。"她说。解释了她为什么开始对警方撒了谎。

霍普金斯出去的时间很长，因此朱莉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事故。45分钟之后他回来了，她注意到他换了一身衣服。他说他因为车上没有灯而停了一会儿，而她以为他只是淋了雨。

进一步的证据显示，霍普金斯对弯刀和兰博型的刀具非常有兴趣，他的卧室里面挂满了这种刀，而且身边还时常带着这种刀。他父亲很早的时候曾教他如何剥兔子皮，两个人还经常去纽艾顿周围的乡下打猎。

经过7天的证据宣读之后，陪审团判他有罪，霍普金斯面无表情。

大法官塔克先生描述这是一次残酷的谋杀行为，带有虐待的成分，他说："在我看来，你是一名非常危险的年轻人。我记得你才20岁。我判你终身监禁。"

托尼·贝利斯和吉诺·瓦里亚勒不想就此住手。虽然调查已经得出了满意的结论,但是,他们看到那么一个小区有如此之多的痛苦、混乱和不合作,因此决定详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事情发生在谁的头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他就是艾德温·霍普金斯。除非他拿出答案,否则贝利斯和瓦里亚勒不会就此罢休,因为他们下次会准备得更好。

25 尾声:我如何能说不?

自从我的名字跟警方刑事调查公开联系在一起以来,我一直很关心人们如何看待我所做的工作。像《沉默的羔羊》这样的电影和像《解密高手》一样的电视剧于现实却无补。就连亲朋好友也对我的工作如何激动人心做出种种评论。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样的反应。有些人觉得,心理学家或刑警就是去犯罪现场轻轻松松地走一走,而那些犯罪现场一般也是整整齐齐和非常有顺序的,就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一样。事实上,村舍发生的凶案跟城市的贫穷住地里一名妓女死亡有可能同样复杂,造成这些犯罪的动机也是一样令人憎恶。有些人觉得心理学家是介于千里眼与巫医之间的某种人。他们不相信自己不明白的事物,或者不愿意毫无条件地接受一些事物。

我记得起来的最令人难于接受的话是另外一名心理学家说出来的,他曾为警方的凶案刑事调查提供过建议,他描述那样的经历"激动人心,令人兴奋,是我一辈子回报最大的经验。它比性交刺激多了"。

我觉得这话听起来恶心。我很害怕警察打电话来,而且不喜欢现场重构的任何一个时刻。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嗯,这很容易解释。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是在由一些伤亡事件和犯罪而导致的悲痛当中度过的。我听到强奸受害人的声音,我看到失去亲人的家庭被毁灭。我还看到和听到一些性犯罪者

以及杀人凶手的所作所为，我也明白是什么在驱使他们。还能够有比希望结束这一切更强有力的动机吗？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刺激或者英雄主义的成分。一般来说，当我卷入的时候，某人已经死亡，我经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犯一个错误，从而误导调查行动的方向，那么别的人有可能还会死掉。这就如同站在忘却的前沿，惟一美好的时光就是它过去的时候。

当心理轮廓描述于1980年代初期在英国开始的时候，问题不是它有多么可靠，或者说警方能够对我的发现给予多大程度的重视。更直接的问话是："我们拿这个干什么用？"

我可能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犯罪，罪犯的年龄为四五十岁，做某种特别的工作，所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地理方位以及他们会对警方的调查产生何种反应，但是，除非调查人员决定利用这些信息，否则它就没有任何操作价值。做某件事情就意味着执行一项任务，并且要花时间和金钱和人力资源去做。但他们如何能够确定我说的是对的呢？如果我错了会怎样？

大部分警督都接受我的建议，有一些会置之不理，还有一些会等等看，直到我的预测之一证明是正确的时候，他们才回头去仔细看看我的总体结论。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心理学犯罪分析有了一些发展，而且广为人们所接受，最初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也变成了支持者。利用心理轮廓描述来设计内奥米·史密斯的谋杀者的DNA筛选程序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它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调查严重的犯罪时已经对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花多长时间处理谋杀和性暴力案件。多年以前我曾意识到，与其说我将工作带回家来了，还不如说我自己的一小部分都留在了每个犯罪现场。我不知道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在一台踏车上工作了很久，到目前为止这台踏车已经经历过百余宗严重的犯罪，我还必须说，这比很多高级警官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参与的刑事调查还要多。也许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现在看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警方不要对我产生需求，除开个别极难应付的案子以外，我应该去开一些硕士班课程和讲座，告诉刑事调查人员如

何辨别基本的心理学线索，还有涉及不同犯罪类别的基本原理。

更重要的是，我会继续更多地涉猎风险评估和犯罪预防领域。这意味着增多在不同领域里面的工作，包括我们如何能够以最佳方式培训人们，让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提防自己，降低使自己成为犯罪受害人的机会。

我还会继续为一些公司和其他机构提供自己的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对威胁产生反应，并组织他们的保安措施，使其达到最佳效果。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阿比·汉弗雷的绑架案，因为女王医疗中心的监控摄影机的定位极不科学，它们提供的照片成为那次调查活动当中最有毁灭作用的一个因素。它的质量也很差，根本都没有什么用途，但是，就这些东西是否应该扔掉，或者是否应该装在公众看得见的地方的问题还产生了激烈的辩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家医院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却无法取出那个“护士”的照片，而那个地方往往是风险最高的。我还记得亨氏婴儿食品案，当时，心理学建议证明在确定警方调查反应方式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些人去杀人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利用这种知识，并在事件发生的中间就阻止他们。这种紧迫性在登布莱因小学可怕的扫射案中得到最强烈的支持。根据我所掌握的跟托马斯·汉密尔顿有关的少数材料，我都可以看出，已经有足够多的早期信号表明：“让我们夺掉这个家伙手中的枪吧。”

我并不是说那样的杀人行动就一定能够逆转。哪怕没有枪，汉密尔顿先生也有可能找到别的办法来杀死登布莱因小学的那些孩子，但是，正如后来的事实一样，他手上有这么一件凶器，夺掉他的枪之后，至少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已经有某些事情不太对劲了。

1992年6月，我为内政部完成了《罪犯心理描述国际评估报告》。我在里面提出的一些建议得到了采纳，旨在让英国在两到三年内成为欧洲明确的心理轮廓描述中心。不幸的是，事情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这个预期。

问题在于，有太多的人事安排和太多的个人投机挡住了这些目标。任何领域的努力都有小小的嫉妒存在，但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因为有很多公开度围绕着它，似乎是最容易引起嫉妒的一个领域。我

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位 BBC 无线电制作人希望就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做一个节目，然后哀叹说："我做纪录片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充满政治斗争和可怕的人际困难的领域。"

已经到了别的人也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了，有很多人本身并没有在某个案例当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没有显示出别的某个人是错误的。纯粹的研究者必须说："好吧，我来看看心理轮廓描述。让我们来把它变成一个工作和研究的领域，就跟记忆、语言和认知一样。这些东西不再与半打人相关，而且会成为一门学问，可以拿去教授，也可以拿去加以改进，并且能够导致更有效的刑事调查。"

这就谈到了彼此不相关的实验心理学家的问题，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刺痛它，摇晃它，向它的各个方面挑战，剔除杂草，留下真正的知识体。

我在职业生涯中有幸跟最为优秀的一些警官工作过，他们聪明，直爽，讲究实际，对复杂的细节有极精当的把握，经验也非常丰富。总体来说他们的态度是：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刑事调查活动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利用。

可悲的是，心理学家来到专案室的事情也经常被媒体拿去炒作。这有可能导致一些人的鼻子气歪——不一定是在调查小组内部，而是在警察服务的政策制订人的水平上。他们担心会被人替代，或者得不到足够多的荣誉。

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变化的。几年以前，上报纸头条和进入公众印象的往往是一些法医，他们会激发犯罪小说、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现在又是司法心理学和"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这也会过去的，不久之后，心理轮廓描述就会变成警方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之一而已。

从其对我产生的影响而言，我看世界的方式与我开始这项工作时大不一样了。我是从风险因素来看待事物的。我注意到一些妇女穿着晨衣下楼取信，晚间睡觉也不关窗帘。这有可能成为窥淫者需要的惟一的刺激因素。人们很容易就想到，如果萨曼莎·比塞特生活在二楼，她和佳丝明就有可能活到了今天。但是，同样容易想像的事情是，如果她在夜晚将阳台锁上，并将百叶窗放下来，罗伯特·纳帕尔可能根本就不会盯上她。

同样，我看到年轻妇女从旅馆出来，手挽着手在街上走的时候还在大笑。我看着她们，按照她们所处的风险等级来排列她们。我们都通过自己所穿的衣服，做出的动作和所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公众形象。这就使人们能够评估我们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从而影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被打击的风险。

如今，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些我15年前不可能看到的事情。我看到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面孔和声音。他们穿什么、如何开车、如何彼此产生联系。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我觉得我倾向于在谈话中有所保留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了解了一些人的事情——不是我故意去了解，也不是我特别希望如此——这不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而是他们的性格和思维的方式。我发现自己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而在以前我是根本就没有兴趣或者愿望去了解的。

有一天，我拿起一块面包，上面还粘着另一块，我的儿子艾恩，他现在是我的助手，还有我的女儿艾玛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艾恩说："我敢打赌，如果你是一名材料工程师，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禁不住会从扩张强度、摩擦系数和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待这两片面包。"

艾玛补充说："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做三明治时所需要的一块面包，但是，你所受的培训和经验会给你所有这些额外的信息。"

回想往事，我已记不住受害者的面容，因为我看到的照片通常都是死后拍摄的，他们的眼中已经失去了光芒。我的确记得住的倒是他们的内心，因为我做的事情当中，有这么多涉及他们最隐秘的细节和生命的悸动。这就是要了解他们，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头上，从而使他们死亡的痛苦和悲伤更难忘怀。这可不是开心的工作。

这样的回忆挥之不去，也是最充足的理由使我在警察打来电话时无法说不。每次我都看到他们的内心，看到数以百计的人、海洋一样的人，他们被强暴、谋杀、虐待和毁灭，每次我都明白在某个地方，还有某个人将继续伤害别人。他有可能坐在什么地方，回味自己的所作所为，仔细品尝它，并在细细的把玩中获取性快感。他是真实的

人，他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最后，他的冲动会再次慢慢增强。任何时候我都无法预先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发生，但我确信，除非有人阻止他，否则他会再次杀人，一次又一次地杀戮下去。

我如何能够说不呢？